秦宝琦 著

中国地下社会

第一卷 清前期秘密社会



學苑出版社

责任编辑：战葆红
封面设计：甄婷婷


ISBN 978-7-5077-3341-9

定价：200.00元（全三册）

中国地下社会



秦宝琦 著

中国地下社会

第一卷 清前期秘密社会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地下社会/秦宝琦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77-3341-9

Ⅰ．中…　Ⅱ．秦…　Ⅲ．帮会—研究—中国　Ⅳ．D66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5772 号

责任编辑：战葆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印 刷 厂：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尺寸：787×1092　开本 1/16

印　　张：104.25

字　　数：1623 千字

印　　数：1—1500 册

版　　次：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0 元

前 言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中国地下社会》，内容包括中国历史上清末以前的秘密社会（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和民国年间（1912—1949）的会道门与黑社会。第一卷内容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第二卷为晚清时期（1840—1911）的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第三卷为民国年间（1912—1949）的会道门与黑社会。

民国以前的秘密社会同民国年间的会道门、黑社会，虽然同属地下社会，但两者在性质、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方面却有很大不同。

秘密社会也称秘密结社，包括清末以前的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是我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或生活上的互济互助和行动上的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其存在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秘密会党既有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等正面功能，也有进行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走私贩毒等负面功能。在社会矛盾激化时，他们所发动的武装反抗活动，既有反抗统治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积极作用，也有抢劫勒赎（打单）和杀害无辜百姓等危害社会的消极作用；秘密教门既可以给苦难无助的穷苦人以某种精神上慰藉，又有首领利用传徒进行敛钱渔色的负面功能。其造反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但其宗旨却是为了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以其教主为帝王的神权统治，不应一概视为“农民起义”而加以肯定，因为这种造反活动，并不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

会道门和黑社会则是清末民初分别从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蜕变而成。当时，由于政局动荡，一些政坛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失意政客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或者企图东山再起，便纷纷加入秘密教门或秘密会党。他们凭借昔日的权势与地位，往往被教门尊为“护法”，被会党拥戴为帮主。一些在位的军阀、官僚也乐于加入其中，使之成为自己角逐政坛的工具。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不仅广大贫苦群众希望从教门那里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或从会党那里

获得保护，就是一些中高级军政官员、中产阶级的工商业者、地主豪门也纷纷加入其中。如此，秘密社会不仅在成员构成，而且在性质、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等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秘密教门蜕变为带有邪教性质的会道门，秘密会党则大多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黑社会。会道门不仅从事各种封建迷信活动，毒害人民的思想，而且利用"传道"，诈骗钱财、奸污女信徒，成为具有邪教性质的反动组织；而黑社会则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不仅从事绑架勒索、走私贩毒，经营娼、赌等"黑色事业"，而且同中外统治阶级相勾结，有些黑社会头子还把从黑道掠夺的钱财，"漂白"后再投入到金融和工商业，从而跻身于上流社会，有的还成为民国时期的"党国要人"。总之，民国年间的会道门和黑社会已经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不再具有任何正面功能，其存在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客观、准确地区分历史上的秘密社会与民国年间的黑社会与会道门，是研究中国地下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不把这两种在性质、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均有所不同的组织加以区分，就会造成一系列误解。有些相关著作，仅仅看到这两类组织之间的相同或相似方面，而忽略两者之间的区别，于是把清代的秘密会党——天地会、哥老会及青帮，同民国年间的黑社会等同起来。有些著作则把秘密教门同会道门相混淆，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秘密教门，一概贬之为"邪教"，甚至把太平天国起义也归入"邪教"的行列。如此，便否定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从而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地下社会的全部历史，既包括清末以前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也包括民国年间的会道门与黑社会。并且以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地下社会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作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学苑出版社孟白社长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当前学术著述出版颇为困难的情况下，学苑出版社毅然决定出版这部150多万字的专著。在此付梓之际，谨对学苑出版社领导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方家的批评、指正。

秦宝琦

2009年4月

目　录

教门篇

会党篇

总 论

中国地下社会包括清末以前的秘密社会与民国年间的会道门、黑社会。这些组织虽然在性质、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方面均有所不同,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均处于秘密状态,当时皆属于非法的社会组织。

关于秘密社会

秘密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秘密社会的存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均有过重要影响,因而一直受到中外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秘密社会的历史更为人们所瞩目。

一、秘密社会的概念与范畴

何谓秘密社会?秘密社会这个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感到有一种神秘意味,不了解秘密社会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其实,秘密社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因为它有秘密的组织、活动方式与联络暗号,有神秘而独特的礼仪,严格的规约,从事历代政权所禁止的政治、经济或宗教活动,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因而被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清末以前的秘密社会,从其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组成,以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和"弥勒救世"、"天盘三副"等信仰作为维系内部联系与团结的纽带。以入教可以消灾获福或避劫免厄来吸引群众,要求徒众茹素食斋,诵经礼佛,表面上与佛教和道教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也被人们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像明清时期的白莲教、罗教、闻香教、八卦教等,皆属秘密教门。秘密会党是以异姓结拜弟兄的形式出现,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以

江湖义气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要求会众忠于誓言，恪守规约，严守会内机密，以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吸引群众。清代以前虽然民间有诸多异姓结拜弟兄组织，但尚未形成完备的会党。① 清代的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边钱会、兄弟会、忠义会、哥老会、江湖会、青帮等，均属秘密会党。

秘密社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阶级压迫是其产生的根源，而小农经济则是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土壤。

我国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广大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不仅身受官府的压迫、胥吏的勒索，而且受到地主、富商及高利贷者的剥削。他们终岁辛勤劳动，却仍然难得温饱。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使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难以团结起来为某一政治和经济目标而奋斗。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面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只是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默然处之，把一切苦难与不幸，皆归之于命运的安排。但是，也有少数人不甘于此，他们试图同这种命运相抗争。然而，广大农民由于力量分散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也没有人维护或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只能自发地结成各种秘密结社，来维护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

秘密教门同自然经济下个体农民有较密切的联系。个体小农在经济上是脆弱的，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总是担心失去自己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微薄的财产，对自己和全家人的前途和命运，充满忧虑和恐惧。秘密教门利用小农这种心态，宣传世界将面临“末劫”，只有入教才能消灾免厄。入教之后，不但今生可以获福，死后不堕轮回，来世还可享受荣华富贵。秘密教门的这种宣传，对广大农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而不断有人加入其中。到了晚清，小农经济日益衰落，秘密教门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破坏，因而也随之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清末民初，秘密教门蜕变为会道门，成为军阀、官僚的工具，因而又发展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大多数会道门同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会道门得到恶性膨胀。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依法加以打击，一般会道门也予以取缔。

秘密会党的产生和发展，则同农村商品经济的既发展又受到掣肘有密切关系。乾隆中叶以后，我国虽然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有些地方的商品经

① 这里所说的秘密会党，不包括文人学者的诗文社，而是专指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

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加剧，许多人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被从农村中排挤出来，涌入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谋生。他们来到新的地方，举目无亲，亟需互相帮助，以求得生存。秘密会党所宣传的入会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等，对于离家在外、谋生艰难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福音，于是纷纷加入其中。到了晚清，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中国农民大量破产，工人大批失业，于是一部分人纷纷投入秘密会党的怀抱，导致秘密会党较清代前期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从以往单纯的互助、抗暴，发展为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并积极参加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清末，部分会党首领，在革命党人的引导下，参加反清革命。民国初年，会党首领以革命的"功臣"自居，秘密会党固有的弱点充分暴露，成为新政权的异己势力，招致革命党人的打击和镇压，多数会党逐渐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黑社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明令解散。

秘密社会的历史命运是其固有的弱点所造成的。秘密社会从事各种非法的活动，奉行小团体至上的原则，加上内部实行严格的封建家长制，一般成员须对首领的意志和命令绝对服从，因此，秘密社会的组织，特别容易被各种势力所左右和利用。

首先，秘密社会容易成为一些野心家用来追求金钱和权力的工具。

秘密教门在入教时有一条规矩，凡入教拜师，徒弟需要向师傅奉献一笔"根基线"，或"种福钱"，意思是入教纳钱以后，就为日后消灾获福打下了"根基"，种下了幸福的"种子"。另外，每逢做会或逢年过节，徒弟还须向师傅交纳各种名目的奉献，如香蜡钱、跟账钱、线路钱等。声称所交银钱数量越多，将来得到的好处就越大。许多信徒出于虔诚或愚昧无知，把自己辛勤劳动所得，都奉献给教首了。这样，传徒敛钱，便成了秘密教门的一条生财之道。不少教首，通过传徒敛钱而成为巨富。有些教首，世代相传，成为职业传教世家。有的教首，利用传教所得之钱，为自己购买田产，为子弟捐官。教首们还要求教徒对自己顶礼膜拜，把自己当做圣人以至神灵来供奉。他们还利用教徒的虔诚和愚昧，欺骗教徒妻女，甚至公然借做会传徒的机会，奸淫女信徒。

秘密会党在结拜时，也要求入会者交纳一笔钱，名义上是用来购买举行结盟仪式时的香烛鸡酒，实际上大部分被会首们所分用。不少人纠人结会，目的

就是为了敛钱。不过,总的看来,秘密会党首领很少有借纠人结合这种方式敛钱致富者,他们一般是在结会之后,利用秘密会党的组织,去从事偷窃、抢劫、勒赎、走私贩毒、聚赌窝娼等活动来聚敛财物。

有些秘密社会的首领,也把秘密社会的组织,作为自己追求权力,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秘密社会的首领,虽然在教内、会内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大量财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平日只是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当秘密社会的组织逐渐发展,其势力日益壮大后,首领们便不再满足于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跻身于上层社会,甚至萌发了登极称帝的政治野心。他们往往利用手下教徒、会众的虔诚与无知,蒙蔽他们去为自己卖命。许多教首、会首在农村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为此,在官府镇压时使大批教徒、会众付出了血的代价。

其次,当社会矛盾激化时,秘密社会也往往成为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工具。利用秘密社会的组织举行农民起义,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有胆识的农民,看到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加入秘密社会的组织。在取得领导权之后,便利用秘密社会现有的组织和人力、物力,举行反抗斗争。另一种情况是一些教首、会首本身便是穷苦农民或其他劳动者,他们对地主和官府,本来就有着不满和仇恨。一旦时机成熟,便领导秘密社会的群众,举行反抗斗争。不过应该看到,农民起义虽然利用秘密社会的旗号,如"弥勒佛降生"或"反清复明"等,但是,往往也有自己的纲领口号,如有的提出反对贪官污吏,有的提出"劫富济贫"、"官逼民反"等,反映农民本身的利益和要求。农民起义在本质上不同于个人野心家利用秘密社会所举行的造反。

秘密社会在历史上被各种不同的力量所左右和利用,使它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秘密社会的性质与功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二、秘密社会的性质与社会功能

秘密社会的活动十分复杂,既存在诈骗群众钱财、奸淫妇女、抢劫勒赎、走私贩毒、聚赌窝娼以致被政治野心家利用,成为实现其登极称帝梦想的工具等阴暗面,又有被农民起义利用,成为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工具等光

明面，人们立场不同，便在分析、看待秘密社会的性质与社会功能方面，产生了分歧。

旧的封建史学，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对于秘密社会的活动，一概否定。对于那些打着秘密社会旗号的农民起义，更是深恶痛绝，视为叛乱。他们称秘密教门的起义为"教匪"、"邪匪"，称秘密会党的起义为"会匪"、"土匪"。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利用秘密社会，尤其是秘密会党的力量，进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曾对秘密社会予以好评。革命党人陶成章认为秘密教门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①] 孙中山先生曾称洪门乃"民族老革命党"，誉之为保存在汉族下层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根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家们，在论及秘密社会，尤其是有关会党的历史时，便沿用了革命党人上述论断，认为天地会等秘密会党乃是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而建立的"民族革命团体。"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者抛弃了旧史学敌视农民起义的观点，对农民起义加以肯定和颂扬。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都是打着秘密社会的旗帜进行的，因而把秘密教门和会党的活动纳入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范畴。有些论著，在评价秘密社会的功过时，只肯定其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光明面，对其阴暗面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分析秘密社会的性质时，也往往加以理想化，如称秘密教门为"农民的宗教"，称秘密会党为"农民革命组织"或"民族革命团体"。为了把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同后来的会道门加以区别，又把秘密教门归入宗教信仰的范畴，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

我认为，旧的封建史学对秘密社会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甚至称为"教匪"、"会匪"，当然是不对的。不过，如果把秘密社会加以理想化，把会党称为"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也未必恰当。至于把秘密教门归入宗教信仰，称它们为"秘密宗教"、"民间宗教"、"农民的宗教"，从而否定它是民间秘密结社，也是值得商榷的。

秘密教门是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它同宗教信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两者是形同而实异。

---

①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7页。

首先，从历史上看，秘密教门是由宗教异端演变成的民间秘密结社。秘密教门的前身乃是佛教的异端教派。这些教派虽属佛教异端，但在性质上仍属宗教信仰。可是后来经过相互影响、渗透，到元末经过农民大起义的洗礼，逐渐融合成了白莲教。白莲教形成后，已经不再是半僧半俗的念佛净业团体，而是在民间广收徒众进行秘密活动，成了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

其次，从秘密教门的本质和功能来看，也不同于宗教信仰。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人们所幻想出的这种"超人间"的外部力量便是神灵。当人们面对大自然和社会的压迫感到无能为力时，便幻想出神灵，对它顶礼膜拜，祈求它的保护和拯救，于是产生了宗教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但是，人们幻想出来的超自然力量即神灵，并不能给人们以任何实际上的帮助，只能使人们沉醉于幻想之中，暂时忘记现实生活的苦难，起到一种麻醉剂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形象地把宗教比作"人民的鸦片"，即一种镇痛剂。宗教把人们对现实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引导到对彼岸世界，而对现实的苦难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宗教教导信徒，人世间所受的一切苦难与痛苦，都是神的意志，不可抗拒。对人世间的不平，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只能顺从，不得反抗，否则便违背了神的意志。这样，宗教便起到了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因而受到历代政权的支持与保护，可以公开建造宏伟的庙宇、教堂，公开发展教徒，宣传教义。秘密教门在本质与功能上则不同于宗教。秘密教门虽然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但在本质上它是被压迫阶级中少数不肯向自己命运低头的人，以宗教信仰为纽带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其创立者和参加者大多希望借助秘密组织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某种政治或经济方面的要求，使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得到改善。秘密教门多源于佛教异端教派，继承了异端教派中的叛逆思想，具有反现存社会秩序、反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斗争，因而被历代统治阶级视同叛逆，加以取缔与镇压，只能在民间秘密活动。所以，我们认为秘密教门并非宗教信仰，其组织亦非宗教团体，而仅仅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

把秘密会党称为"民族革命团体"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354 页。

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当时，革命党人为了利用汉族人民的反满情绪，进行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便大力宣传“革命排满”的口号。他们片面地夸大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甚至把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对全国的统治，说成是中国被“异族”所“征服”和“灭亡”，因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坚决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是力量薄弱，他们希望利用秘密会党这个现成的组织，于是把秘密会党加以理想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论著，沿袭了革命党人这个说法，并进而把秘密会党说成是“民族革命团体”。新中国建立后，历史学界又把天地会、哥老会等说成是“农民革命组织”。这些说法依然是对会党的理想化，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天地会本身的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同清初满汉民族矛盾也并无多大关系。近年来发现的档案资料和会内文件表明，天地会并非始于清初康熙年间，而是创立于乾隆中叶。再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从事的活动，如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以及打架斗殴、抢劫夺财、走私贩毒等情况来看，也不能称之为“民族革命团体”。把天地会等秘密会党说成是“农民革命组织”，同样是对它们的一种理想化，也不符合历史实际。首先，从秘密会党的阶级构成来看，虽然其成员中有农民，但更多的则是城乡破产劳动者、小商小贩、雇佣劳动者，以及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秘密会党既不是农民的组织，也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其次，从秘密会党的反抗斗争来看，并不都具有革命性质，特别是那些被少数野心家所操纵的造反活动，不能因为它受当时统治阶级的镇压，就称之为“革命”。至于那些确实反映了农民阶级某种利益和要求的会党起义，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不等于参与或领导这种反抗斗争的秘密会党本身便是“革命组织”，所以，不能把秘密会党说成是“农民革命组织”。

三、秘密社会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

清代以前的秘密社会

这一时期的秘密社会主要包括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

所谓异端教派一般是指在某一宗教内部，神学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理

论相左,从而受到教内权威排斥的教派。[1] 由于宗教是当权者对平民百姓进行"教化"的工具,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其世俗统治,所以,宗教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神学理论,往往受到当权者的支持保护。相反,异端教派所宣扬的思想和教义,往往与主流社会相对立,不利于世俗政权的统治,必然遭到世俗政权的打击。在中国历史上,异端教派往往被贬称"左道惑众"团体,其教义被认定为"异端邪说",并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从法律上加以禁止。早在宋元时期就有打击异端教派的法令,在明清两代的律例中,[2]更制定了禁止秘密教门的专门条款。因此异端教派只能在下层民众当中流传、发展,逐渐演化为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有的学者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有的学者称之为"秘密教门")。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它们往往号召信徒和其他群众起来反抗世俗政权,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清两朝汉族人民的反抗活动,大多由这类团体所发动和领导,因此当时的主流社会便称他们为"邪教",严加禁止。

中国历史的异端教派大多信奉和宣扬佛教的异端思想"弥勒救世"说[3]。最早的异端教派当属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弥勒教和北魏的大乘教。

弥勒教是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傅大士首倡。傅大士生活在北齐明帝年间,他因鼓吹异端思想而被郡守以"妖妄诡诈"之罪监禁。获释后,傅大士自称"弥勒菩萨分身世界,济渡众生。"南梁时期,他又利用弥勒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之机,派弟子傅暀至梁京,上书梁武帝,请求接待。获准后,傅大士来到梁京,梁武帝对他"待以殊礼",他却在皇帝升殿时,"安然箕坐",与皇帝分庭抗礼。在傅大士以后,不断有异端教派出现。

北魏以法庆为首的大乘教,则利用"弥勒救世"说宣传异端思想并带领徒众造反。北魏熙平二年(517 年),法庆针对当时佛教内部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以佛法将灭,"魔作沙门、坏乱佛法"为依据,提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举兵造反,而且专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甚至提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

---

①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682 页。

② 《明律》"禁止师巫邪术"条款:"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清律》禁止"邪教"的律文基本上沿袭《明律》,仅稍有修改。

③ "弥勒救世"说不同于正宗佛教的弥勒降生说,属于异端思想。

者为十住菩萨”。大乘教所说“新佛”,便是弥勒佛。

之后,弥勒教不断起来造反。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弥勒教徒数十人闯入皇宫,自称“弥勒佛”,守门卫士皆对之“稽首”,而教徒却夺卫士武器,企图占据皇宫夺取政权。事败,经追查,京城中与之有牵连的达千余家。隋大业九年(613),又有宋子贤自称“弥勒出世”,欲举兵造反,旋事泄被杀。不久,又有沙门向海明在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举兵造反,“众至数万”。唐初,弥勒教在怀戎(属幽州涿郡)造反,有众5千人,教首高昙晟杀死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改元法轮。唐玄宗开元初年,王怀古宣称“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世,李家欲末,刘家欲兴。”所谓“新佛出世”,也是指弥勒佛降生。开元三年(715),又有“白衣长发,假称弥勒佛下生”者,“广集徒众”,欲行造反,被唐廷所禁。①

宋元时期利用“弥勒救世”说的异端教派及其造反活动仍连绵不断。北宋仁宗庆历七年,王则倡言“弥勒出世”,自称“东平郡王”。元代河南息州赵丑斯等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举兵造反。

北宋神宗时,又出现了异端教派白云宗。

白云宗是北宋人清觉(1043—1121)所首倡。宋哲宗元祐七年,他来到杭州灵隐寺,因从者日众,乃移居寺后之白云庵,自立为“白云宗”。信徒皆茹素食斋,故又名“白云菜”或“十地菜”。清觉主张三教合一,后因所著有忤朝政而被贬到广南恩州。清觉故后,白云宗在浙西一带继续扩展势力,并形成一种“道民集团”。因首领与信徒的行为逐渐腐化,并不断出现干犯政治忌讳及违反社会规范的事件,遂受到当局的取缔。谏臣指责白云宗乃“吃菜事魔”的左道惑众集团,并指出其宗主沈智元乃“伪民之魁,挟左道以惑众,揆之国法,罪不容诛”,要求“将智元长流远地,拆除宇庵,以为传习魔法,既视典宪之戒。”

入元以后,白云宗仍在杭州一带活动,一度获得合法地位,其首领便竭力攀附当权者。宗主沈明仁曾被授以高级官职,元朝廷还专设“白云宗都僧录司”,由白云宗教主担任,负责管辖白云宗的信徒,其徒众也享有其他宗教信徒同样不承担赋税的特权。由于白云宗的势力过大,于元成宗大德七年遭到打击。是年七月,元朝廷遂下令“罢江南白云宗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其后,朝廷对于

① 《唐大诏令集》卷113。

白云宗时禁时弛。元仁宗即位后，白云宗曾一度受宠有加，其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其全盛时期。皇庆元年，朝廷甚至特颁御旨，命江浙行省开板印刷孔清觉所著《初学记》，并将其列入《大藏经》。[①] 延佑二年(1315)，复"授白云宗主沈明仁荣禄大夫、司空"，并出任元朝廷的"白云宗总摄"。司空位在三公之列，可见白云宗当时势力之大。但好景不长，延佑三年，"白云宗僧使权贵冒名爵，恣横不法，擅剃度游民四千八百余人"之事暴露，加之延佑六年"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诳诱愚俗十万人，私贿近侍，妄受名爵。"仁宗遂下令对沈"严鞫之"。不久，复因沈明仁"不法坐罪"，而"诏籍江南冒为白云僧者为民。"[②]其后，白云宗便逐渐衰落了，但却一直存在，明初，再次被禁。

南宋初年又出现了白莲宗。白莲宗是南宋高宗时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茅子元所创立。茅子元号万事休，父母早亡，稍长，投奔本州延祥寺的志通和尚出家为僧，属净土宗。他自称某一天正在"禅定"时，忽听到有乌鸦叫声，便豁然"悟道"，遂"慕庐山远公莲社遗风，"传徒结社，创立新的教派。他"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又从佛经《大藏经》中摘取对自己有用的内容，编成《白莲晨朝忏仪》。后来，他迁往殿山湖，创立"白莲忏堂"，"劝诸男女同修净业"，他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成为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活佛"。这样，茅子元便从佛教净土宗分离出来，成了一个异端教派的教主。白莲宗与正统的佛教不同，不要求徒众出家，信徒可以娶妻生子，服饰也与百姓无异。茅子元把以前佛教松散的念佛结社，发展成教主与信徒之间的师徒关系和宗门关系，并且规定以"普、觉、妙、道"四字作为信徒"定名之宗"。由于白莲宗主张"男女同修净业"，信徒间发生过不少淫秽之事，因而受到正统佛教的攻击，说白莲宗"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白莲宗的异端思想和行为，为当局所不容，被宋朝廷归入"食菜事魔"的行列，茅子元本人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白莲宗遂遭取缔。茅子元到江州后，仍不甘寂寞，他"逆境中未尝动念，"继续在当地秘密传徒，"随方劝化"。

元初，白莲宗曾一度得到朝廷的承认与保护，因而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各地修建了许多庵堂，作为传教的中心。元代中叶，白莲宗本身发生了变化。其中上层仍然恪守茅子元白莲宗的教义、教规。下层白莲宗，则接受了"弥勒救世"

---

① 丁国范:《元代的白云宗》，载《元史论丛》，第四辑。

② 《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一。

的信仰,称“白莲会”或“香会”,在民间秘密流传。元末明初,各种异端教派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教门白莲教。明朝中叶,罗教产生后,又兴起了大量以崇拜“无生老母”为信仰核心的秘密教门,他们不断利用各种社会矛盾起来造反。

清代前期(1644—1840)的秘密社会

清代以降,秘密社会获得进一步发展,不仅存在大量的秘密教门,而且出现了名目众多的秘密会党。

清代前期的秘密社会,经历了一个从萧条、复苏、初步发展至充分发展的历程。下面按照清代秘密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作概括介绍。

(一)顺治年间时期(1644—1661),是秘密社会的萧条时期

以往许多论著,多把秘密社会视为“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而清初顺治年间正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故断定清初顺治年间乃是秘密社会繁荣昌盛的时期。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秘密社会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其盛衰枯荣,对秘密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清初顺治年间,整个中原大地,依然战乱频仍。当时,清帝国刚刚建立,正面临着统一全国的任务,南明王朝和农民起义军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清统治者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汉族人民推行高压政策,使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被激化。汉族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或者参加抗清义师,或者加入农民起义军,或者逃亡在外。当时,中原以至南方的许多地方,土地被抛荒,社会经济陷于凋敝,小农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广大下层群众,不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连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自然无力顾及烧香礼佛或结会树党。因而这一时期的秘密社会,呈现出萧条状态。当时仅有少数明末延续下来的秘密教门和少数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存在。

关于秘密教门的情况。

顺治初年,直隶真定府武强县,有赵高明“皈依大成教门”。顺治八年直隶曲周、广宗等县有宋伯光等传习白莲教,自称明代天启皇帝之子。顺治十五年,山西平阳府夏县有张天等传习无为教。顺治十六年,陕西三原县人周裕在广东传习大成教。

关于秘密会党。

顺治年间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会党,仅有少数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如顺治五年江苏如皋县有二百多人结拜弟兄,竖立“大明中兴”的旗号。顺治十三年有明代宗室朱存梧等纠人结拜弟兄,以复明相号召。

(二)康熙年间(1661—1722),是秘密社会的复苏时期

这时,清政权已经巩固,并逐步完成对国家的统一,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清廷开始采取措施,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康熙中叶起,开始进入清王朝的所谓“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尤其是小农经济的恢复,使许多原来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并拥有少量财产。他们担心受到天灾人祸而失去自己仅有的土地和财产,因而求助于秘密教门,期望通过茹素食斋消灾获福。于是,不仅明代延续下来的秘密教门得以复苏,如罗教、弘阳教、闻香教等继续在民间秘密流传,并且出现了刘佐臣创立的五荤道(收元教)。该教因分八卦收徒,又名八卦教。秘密会党这时尚未出现,只存在一些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当时,随着清帝国的巩固,公开反对清政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些具有反清情绪的人,便继续利用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聚集力量,进行反清活动,不过,大多旋起旋灭。较重要的,如康熙三十五年台湾诸罗(今嘉义)吴球聚众结盟,并约期起义;康熙四十年又有刘却纠人“歃血为盟”,并率众攻打该县清营。康熙四十六年,浙江嵊县张念一即张君玉,张念二即张君锡弟兄纠人结拜弟兄,以“朱三太子”之名号召,举兵反清。同年十一月,江苏太仓又有一念和尚(俗家姓蔡),纠人结拜弟兄,竖旗举兵。康熙六十一年台湾凤山(今高雄)朱一贵以结拜弟兄的方式组织反清起义。

(三)雍正初年到乾隆中叶(1722—1765),是秘密社会的发展时期

这时,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之中,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是,阶级压迫的存在,贫富不均的发展,使许多人不满于自己的地位与处境。而通过正常途径又难以使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其中一些人便求助于秘密社会,希望借助于秘密教门或异姓结拜弟兄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另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那些由于经营不善或遭天灾人祸而破产的人越来越多。而人口的激增,又加剧了农村人多田少的矛盾,迫使更多的农民,涌入城镇市圩或异地他乡,加速了秘密会党的产生和发展,使原来的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逐渐演变成结会树党的秘密会党。

秘密教门的发展比较明显。

罗教与罗教系统的大乘教，在粮船水手中广为流传。明季以来，在杭州拱震桥一带就建有罗教庵堂，到雍正初年，罗教庵堂已发展到70余所，苏州也建有许多大乘教庵堂。这些庵堂既是罗教与大乘教传习的中心，也是水手"回空"后及年老残疾水手平日栖息之所。雍正年间存在和新出现的教门有：浙江的道心教，山东的空子教即儒理教，直隶各地旗人中流传的大成教与依法教，直隶隆平县的摸摸教，在江西、浙江交界处的三皇圣祖教，山东的朝天一炷香教，安徽的糍粑教即三乘教，山西平安州一带又有黄（皇）天教流传。

雍正与乾隆年间，在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等省流传张保太大乘教，刘佐臣子孙们传习的八卦教已扩展到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黄天教的几个支派也在各地流传。在浙江处州府的一支称无为教，在福建瓯宁的一支称老官斋教。此外，各地还有一些较小的秘密教门。如直隶永清县高六指子所传无为教。李昌年在山西汾州、陕西朝邑所传正四香教。陕西以李绪唐为首的拜祖教。陕西西安的大乘教。湖北襄阳地区所传弥勒教、贵州思南府的朱维上也传习弥勒教。福建海澄县的祖师教。山西临汾又有胡关氏所传无为教，又名桥梁会。江苏松江、浙江杭州一带还有天圆教。江苏邳州有牛其禄为首的未来教即三元会。

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发展为结会树党的秘密会党。

雍正四年台湾诸罗（今嘉义）有蔡阴等结拜父母会"父母会"，雍正七年福建厦门又有李彩等结拜一钱会，雍正九年广东余猊等结拜父母会。雍正末年，山东高唐出现推独轮小车工人所结小车会，安徽出现由搬运工人结成的抬天会，以及以铁尺为防身武器的铁尺会。雍正末乾隆初，四川流民中出现秘密会党啯噜子，乾隆二十六年，福建漳浦县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创立天地会。以后，天地会及其分支在福建、台湾、广东等省迅速蔓延。天地会的创立，标志着秘密会党已进入成熟阶段。

（四）乾隆后半期至嘉庆初年（1766—1805），是秘密社会举行公开武装反抗斗争的时期

从秘密教门的情况来看，乾隆中叶，在山东菏泽一带流传的震卦教，改名清水教。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一带清水教首领王伦举行武装起义，乾隆四十二年甘肃河州一带有王伏林倡立悄悄会即圆顿教，并且举行造反活动。与此同

时,陕西宝鸡一带也有雷得本等传习悄悄会。嘉庆十年,王伏林之再传弟子王化周、石慈等又恢复悄悄会的活动。乾隆末、嘉庆初爆发了著名的川楚陕五省白莲教起义(实为混元教与收元教起义)。

这一时期秘密会党在福建、台湾、广东等地广为流传,并且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斗争。主要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台湾陈周全起义,嘉庆初年台湾小刀会起义,嘉庆七年广东博罗、永安天地会起义,嘉庆八年江西石城、广昌天地会起义等。

(五)嘉道年间(1806—1840)是秘密社会充分发展时期

嘉道年间,清帝国已经从鼎盛转向衰落,帝国官僚机构日趋腐朽,封建制度的没落,更加速了帝国衰落的趋势。但是,经济上却仍然保持着稳步发展的势头。小农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永佃权的出现,使佃农对所耕土地的使用权有了保障。佃农有了永佃权,可以同自耕农一样,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力和工本,这样,使小农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可能。农村的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包括自耕农、永佃农、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既希望已有的土地或资产得到保障,又盼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和财富。这种希望消灾获福的心理,正好被秘密教门的首领们所利用。在经历了乾隆后半期到嘉庆初年秘密社会的武装反抗遭到残酷镇压之后,他们用入教可以消灾获福,避劫免厄相号召,那些希望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微薄财产得到保佑的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们纷纷入教,使秘密教门在组织上得到巩固与发展。

这一时期,秘密教门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支:

天理教。天理教是由京畿和直隶固安、新城等地的红阳教、坎卦教(老理会)和直隶、山东、河南一带震卦教融合而成。嘉庆十八年天理教举行起义,京畿地区天理教徒70余人袭击了紫禁城。

离卦教。嘉道年间,八卦教中离卦教最为兴盛,主要有以下几支:直隶巨鹿人孙维俭的大乘教,直隶清河人尹老须的离卦教,直隶清河人马进忠的明天教及山西赵城曹顺的先天教。

大乘教。嘉道年间以大乘教为名的有好几支,其间并无渊源关系,仅名称相同。一支是罗教系统的大乘教,主要由湖北孝感周添华所传。人数较多的则是斋教系统的大乘教,主要由江西贵溪人张起坤所传,他是乾隆年间姚门教首吴子祥之徒。吴子祥因编有《大乘大戒经》而称大乘教。另外,离卦教中孙维俭

一支,也称大乘教。

清茶门教。清茶门教是由明代闻香教演变而来。入清以后,王森子孙以滦州石佛口和卢隆县安家楼为中心,继续传教。但多称清茶门教、清茶门红阳教、白阳教等。乾隆中叶以后,王姓子孙开始向外地发展,先后有王姓家族之人到山西、湖北、安徽等地传教,王森七世孙王秉衡曾在安徽和州收当地无为教首柳有贤为徒。柳有贤之徒金悰有、方荣升又改无为教为收圆教。

一炷香教。嘉道年间的一炷香教,有以下几支:山东城武县人姜明所传一支,又名好话教。直隶南宫县王金玉所传一支,与该县陈恭所传一支,因与离卦教关系密切,故又被归入离卦教。直隶广平府邯郸人冯大坤所传一支又称一炷香天爷教或如意教。山东历城县孙大凤所传一支,系康熙年间山东商河县人董四海所传一炷香教之嫡传。

嘉道年间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教门,大多旋起旋灭。

秘密会党有了进一步发展。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民涌向城镇市圩或异地他乡去谋生。嘉道年间人口增长的趋势更为迅猛,许多地方田少人多的矛盾也更加突出。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穷苦农民,纷纷向内地各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移民们中间有的本来就是秘密会党的成员,有的为了结伴而行或到新的地方易于立足,而自发地结为秘密会党以便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这样,嘉道年间的秘密会党比前一阶段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更加成熟。

嘉道年间的秘密会党中,以天地会的发展最为完备,不仅形成了较完善的结盟仪式、联络暗号,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一大系统。除乾隆年间已经存在天地会、小刀会、添弟会等名称外,又增加了许多新名目。嘉庆七年福建永定人张配昌建立和义会。嘉庆八年福建建宁人李凌魁在江西把天地会改为阳盘会和阴盘会。嘉庆八年福建建阳人江水柏等建立双刀会。嘉庆十年福建瓯宁人李于高等建立百子会。嘉庆十一年江西会昌人周达滨建立三点会。嘉庆十三年福建永定人廖善庆改三点会为洪莲会。同年,福建武平人朱德辉建立江湖串子会。嘉庆十六年广东顺德人严贵邱等结拜三合会。嘉庆十八年,福建宁化人熊毛等结拜仁义会。同年江西南丰人封老三纠人结拜仁义双刀会与仁义三仙会,福建霞浦人欧狼等结拜父母会,福建建宁人江文兴等结拜洪钱会。嘉庆二十一年福建沙县人邓方布结拜明灯会。嘉庆二十五年福建瓯宁人江亚奴等结拜平

头会。道光十三年广东龙川人李江泗等在福建邵武县结拜保家会。

除上述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外，嘉道年间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秘密会党。如以乞丐、小偷为主要成员的边钱会与担子会，广东陆丰县李崇玉等建立的共和义会，湖南江华县莫景兆等结拜的观音会和邹脑等结拜的兄弟会，广东新安人陈辛钧等结拜的守义会，该县监生文松龄等结拜的集义会，郑万受等结拜的连兄会，广东人柯什养等结拜的老表会，湖南衡阳人李泳怀等结拜的忠义会，湖南龙山人陈添等结拜的公义会，浙江嵊县出现钩刀会，湖北江陵县郑老鼠等结拜孤老会，江西上饶等地出现花子会。湖南宁乡出现小偷的帮会黑会与红会，湖南东安一带出现乞丐的帮会——丫杈会。

晚清时期(1840—1911)的秘密社会

晚清时期秘密社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民内部分化的加剧，地主阶级剥削欲望的增强，广大农民在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官府的压榨下，纷纷破产，成为游民。这样，秘密教门的群众基础被削弱，而秘密会党的群众基础却因此而大为增强，于是教门的势力逐渐衰落，而会党的势力则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在教门与会党的融合过程中，不是会党融合于教门，而是教门演化或融合于会党。

晚清时期的教门除了青莲教、八卦教外，其他教门多处于衰落状态。青莲教经过几次分裂、重组后，发展出一贯道、同善社、归根道、普度道等分支，后来成为民国年间的主要会道门。八卦教则以其中的离卦教最为突出，从中发展出圣贤道和九宫道。信奉罗教的两船水手行帮，进一步向会党演化，并最终形成青帮。

晚清时期除了明清以来标榜信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秘密教门外，又出现了标榜信奉基督教的洋教门——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的首领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起义，实现了中国秘密教门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了以其教主为首的神权王国——太平天国。近年来有学者把历史与现实相混淆，把历史上的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称作“邪教”。我认为拜上帝会同中国传统等秘密教门并无二致，既然不应该把传统的秘密教门称作“邪教”，当然也不应该把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称作邪教，而应该把它归入秘密教门的范畴，或者按

照国际通行的说法,称拜上帝会为“膜拜团体”(CULT)或“新兴宗教”。

会党的发展则令人瞩目。不仅清代前期已经出现的天地会及其分支外,又出现了哥老会和青帮两大秘密会党。

晚清时期的秘密会党的发展,可以分为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两个阶段。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

鸦片战争后,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导致中国下层群众,特别是手工业者和水陆交通线的运输工人大量破产,使天地会及其分支小刀会在上海、厦门等地迅猛发展。并且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举行起义,著名的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厦门小刀会起义。天地会到两广地区的发展更为迅速。鸦片战争中,两广人民遭受巨大苦难,战后清廷又把对英国的赔款,大量转嫁在两广人民身上,造成两广人民的破产和失业。天地会于是趁机举行起义,并且先后建立了大成国和升平天国等地方政权。嘉庆以降,大量天地会成员被华侨带往海外,形成海外洪门,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互助和抗暴组织。辛亥革命时期,部分两广天地会首领在革命党人引导下,积极参加革命党人举行的反清起义。海外洪门则积极为国内的革命活动筹集经费,许多海外洪门成员还亲自回国参加反清革命斗争。

这一时期兴起了哥老会和青帮两大秘密结社。

哥老会以往被说成是康熙年间郑成功在台湾所建立的“反清复明”组织,实际上哥老会是在四川啯噜子基础上,融合了天地会、边钱会等会党和青莲教等教门而在道光末年才形成的。其发展壮大则同湘军的兴衰又有密切关系。在湘军兴起时,就有大量哥老会分子渗入,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失败后,清廷大量裁撤湘军和绿营军,大量被裁汰的官兵,无以为生,也纷纷加入到哥老会的行列中,使哥老会的势力大为发展,并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在辛亥革命时期,两湖、浙江、云贵川、陕西、山西甚至新疆和西藏的哥老会都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斗争。

青帮是在粮船水手中出现的秘密结社组织,以往被说成是兴起于明代,实际上正式形成也是在晚清。青帮与秘密教门罗教和粮船水手行帮有密切关系。罗教创始人、明代的罗梦鸿本人是运粮军人出身,创教之初就在运粮军人和粮船水手中传教。明季,有翁姓、钱姓和潘姓在杭州拱震桥一带建立庵堂,“共兴罗教”。入清后,罗教庵堂逐渐成为粮船水手的互助中心。清廷为防止水手们

滋事，于雍正和乾隆年间两次查禁杭州的罗教庵堂，水手们被迫把罗教庵堂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上，以“老堂船”作为活动中心，老船堂的管理者，逐渐从以往年老无依者，变为对水手拥有生杀之权的帮主。粮船水手行帮也从原来的手工业行业组织，演化为帮会性质的组织。安徽安庆一带的安庆帮或庆帮，安东、清河一带的安清道友，以及原来的青皮、光蛋等，逐渐融合而形成青帮。

晚清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教门和会党出现互相渗透和融合的现象。由于教门逐渐衰落，而会党的势力日益增强，所以，往往是教门融合于会党。如青莲教中周位抡一支就同天地会融合，结果是教门的特点逐渐淡化，而会党的特点日益突显。再如把子会和棒棒会原来也属于青莲教，在同天地会融合后，也演化成了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时期是天地会和哥老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正在图谋瓜分中国，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腐朽的专制统治，在面临各族人民不断反抗的情况下，推行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卖国政策，成为“洋人的朝廷”。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开始走上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但是，革命党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许多还是留学生，他们大多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反清宣传，未能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缺少革命的群众基础。他们看到洪门(包括天地会和哥老会)等下层群众组织，是一支相当强大的社会势力，而且以“反清复明”为口号，与革命党人提出的“反满”口号相一致，于是纷纷对天地会和哥老会的首领加以联络和引导，使之成为革命党人可以利用的现成组织。而天地会和哥老会等会党的首领们，也正苦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于是，一部分会党首领便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引导，带领会党分子参加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反清斗争，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海外华侨和华人中的洪门组织，则在革命党人的宣传、动员下，积极为国内的革命活动进行筹款活动，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革命党人于两广、云贵、川陕等省举行的多次起义中，会党群众均积极参加，甚至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关于民国年间的会道门与黑社会

会道门乃是清末民初从秘密教门蜕变而来。著名的有一贯道、同善社、一

心天龙华圣教会等，其名目多达300余种。一贯道在张光璧担任道首期间，从山东一个地方性会道门，发展成全国性的会道门，而且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地下神秘王国。在日寇侵华时期，一贯道大肆宣扬“三期末劫”等邪说，恫吓、蛊惑、欺骗人民加入该道，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道首张光璧、张英誉父子甚至提出“日本皇军打到哪里，道就宏到哪里”的反动口号！一贯道还利用扶乩、飞鸾宣化、借窍等迷信手段，向道徒诈骗钱财，奸污女道徒；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用喝神水、服香灰等办法给病人治病，导致病人死亡。同善社的头子彭泰荣，在同善社组织不断扩大，成员超过百万的情况下，萌发政治野心，企图登极称帝，伺机发动叛乱。失败后又派遣弟子同伪满和日本侵略者勾结，企图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实现其登基称帝的梦想！一心天龙华圣教会，更是典型的邪教组织。该会道门命令信徒向教主捐出全部财产，然后集中起来过清苦的集体生活。而教主马士伟则以帝王自居，过着奢侈、腐化的帝王式生活。该会道门还拥有一支装备不错的军队，企图造反夺取政权，建立神权王国。

黑社会是清末民初由秘密会党蜕变而来。那时国内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为秘密会党的发展创造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军阀官僚需要利用会党现成的组织和人力、财力，使之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而会党首领则需要军阀官僚的支持和庇护，从而导致秘密会党的蜕变，其中大多数成为军阀、官僚的工具，如四川的袍哥和江淮一带的红帮；或者成为黑社会组织，如上海的青帮。民国年间的黑社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初期大量从事抢劫、绑架、走私、贩毒以及烟赌娼等“黑色行业”。在其势力壮大以后，便开始同当权者相勾结，特别是一些大的黑社会组织及其头目，一般不再从事鸡鸣狗盗、抢劫勒索一类低级犯罪活动。而是把从事烟赌娼等黑色行业中赚得的金钱和财富，通过洗钱的办法“漂白”，把非法获得的资金，投入到工商、金融等行业，黑社会头目本身也逐步跻身于上流社会。他们因为拥有巨额的资金和强大的经济势力，往往能够进一步与政坛头面人物相勾结，并得到他们的庇护。有些黑社会头子，如上海青帮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均成为当时的“党国要人”；四川的袍哥头子范绍增、刘湘、刘文辉等则成为当地的军阀、官僚。

第一卷　清前期秘密社会

教門篇

第一章　中国秘密教门溯源

目前史学界在秘密教门的性质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是宗教信仰，有人认为是农民的革命组织，有人认为是民间秘密结社。分歧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对中国秘密教门渊源的不同看法，故本章首先来探讨秘密教门之渊源问题。中国的秘密教门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异端教派。

一、佛教的异端教派

中国秘密教门大多被称为白莲教，故厘清白莲教的渊源，对探讨秘密教门的渊源和性质至关重要。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说白莲教始于南宋初年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茅子元，而其渊源则可追溯到东晋僧人慧远在庐山东林寺所结莲社。慧远属佛教禅宗，故白莲教被说成是佛教的一支，属宗教信仰。又因白莲教在明清时期，多次举行反抗斗争，其成员又多为农民等下层群众，故又被说成是"农民革命团体"。实际上，白莲教并非源自慧远所结"莲社"，而是由佛教的几个异端教派经过长期融合，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间秘密结社。融合成后来白莲教的几个佛教异端教派，主要是弥勒教、白云宗与白莲宗。

下面我们先来考察佛教的这三支异端教派：

弥勒教

北魏延昌四年（515），僧人法庆所倡立。弥勒教的出现，既有神学观点方面的原因，也有物质利益方面的因素。南北朝时期，正统佛教被高层僧侣所把持，他们不仅在修炼方法上，而且在物质利益上排斥底层僧侣。他们提出，能够修六度成为菩萨的，只有高层僧侣即所谓"上根人"。一般沙门皆是所谓"初根人"，仅仅由佛教诲，听听佛的声音，通过悟四谛而得道，成为"罗汉"，而不可能成为菩萨。更主要的是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当时寺庙拥有大量土地，由"僧祇

户"、"佛图户"耕种,而高级僧侣则成了大地主,一般僧祇户则成了农奴。高级僧侣在生活上也十分腐化。有的寺庙修建得非常豪华,前往观者,"以为至天堂",而普通僧侣则过着"行乞以自给"的穷苦生活。在此情况下,低级僧侣自然要起而反抗,于是从佛教内部分化出了弥勒教这个异端教派。冀州沙门法庆即不满于高层僧侣的腐化,倡立弥勒教,他"自号大乘",提出杀人可以拯救人的灵魂,所以宣称"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并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相号召。据唐长孺先生研究,法庆所说"新佛",乃是指弥勒佛。"大乘暴动的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毫无疑问,所谓'新佛',就是从兜率天宫下降的弥勒。"

南北朝时期的傅大士也借宣扬弥勒降生说干预政治。傅大士名翕,一名弘,字玄风,东阳义乌(一说乌伤)稽停里人,生于齐明帝建武四年(497)五月八日。他24岁时离家出走,在浙江义乌之松山结庵修炼,"修禅远壑,绝粒长斋"。他利用佛教《弥勒下生经》有关弥勒乃未来佛,降生人世后,将出现一个无比美好的人间净土这一教义,鼓吹反社会思想。郡首以"妖妄诡诈"之罪,将他监禁。获释后,傅大士宣称:"我从兜率宫来,为说无上菩提,昔隐此事,今不复藏。"并自称"弥勒菩萨分身世界,济度群生。"在徒众渐多以后,便萌发了政治野心。他利用当时弥勒救世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之机,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7),授意其侄纠结傅普通等百余人,"联名荐述",结果,被县令范胥所拒绝。中大通四年(532),傅大士又授意传德宣等300余人,赴县陈讲傅大士的"德业",又被县令萧诩所拒。不得已,他又于中大通六年派弟子傅晧至梁京,直接上书梁武帝,"教以治道",并请求梁武帝接待其师。获准后,傅大士便来到梁京。梁武帝向来以好佛著称,对傅大士"待以殊礼"。而傅大士却企图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在皇帝升殿时,竟"安然箕坐",并声言:"法地无动,若动则一切不安。"以表示与皇帝分庭抗礼。在法庆、傅大士利用弥勒信仰创立异端教派以后,利用弥勒救世思想从事反时政、反社会活动之事件,不断发生。

隋朝初年,民间流传的"白衣天子出东海"之歌谣,便出自弥勒教。史载:"开皇(581—600)初,太原童谣:'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亦云白衣天子。"[①]隋炀帝时,又有弥勒教徒入宫造反,欲夺取政权。"大业六年(610)春

① 温大雄:《大唐创业起居注》一。

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杖,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①]在此事件中,皇宫守卫竟向弥勒教徒稽首,说明弥勒教徒在皇宫守卫者中间已经有了一定影响。事败后,连坐者达千余家,可见当时入教者为数之众。大业九年,又有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出世",欲纠众举兵造反,旋事泄被杀。其后不久,又有沙门向海明在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举兵造反,"众至数万"。[②]

唐代,弥勒教仍不断举行造反活动。第一次发生在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当时有怀戎(隋时属幽州郡)沙门高昙晟,利用当地县令设斋食,士民聚集之机,与僧众5000造反,杀死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宜为皇后,改元法轮。[③] 第二次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初年。时有王怀古宣称"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兴,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合出银城(今陕西神木县)。"[④]王怀古事件,引起了唐王朝的警觉,于开元三年(715)十一月十七日,颁布了《禁断妖讹等敕》,以禁弥勒教。"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释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唐末,河西一带又盛传"白衣为主"之谣,亦系弥勒教徒所为。

大约在五代年间,各种异端教派为了进行反对时政的活动,编造出"末劫说",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这一说法主要体现在《五公经》中,经文中提到:"上元甲子应天机,日月光明四时辉;天上圣人皆出现,正当弥勒降生时。"并且预言"末劫"来到时的种种悲惨景象,届时将会"白骨满山川","牲畜如虎狼,灾殃遍州府","千家无一户,家家变为荒场"。把异端教派宣扬的"弥勒救世"信仰同劫难降临联系起来。声言"末劫"过后,将有"明君"出现,届时"清净好时光,国泰保安康,处处家饶人尽美,日日欢喜,春夏秋冬皆吉利,八节永无忧,百姓同登万年策。"有的经文说,在劫难过后,将出现一个太平盛世。"后出明王清帝君,山河光彩换朝廷。"可见,《五公经》的核心内容是为了向人们预言即将改

---

① 《隋书》卷三,"炀帝记"。

② 《隋书》卷二十三,志十八,《五行》(下)。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条。

④ 《册府元龟》卷九二一,"妖妄"条。

朝换代，出现新世界。历代造反者皆把《五公经》所宣扬的“末劫说”，作为改朝换代、造反夺权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从宋代起就受到官方的禁止：史载：“（宋徽宗）宣和六年二月四日臣僚言：比者纷然传出一种邪说，或曰《五公符》，或曰《五符经》，言辞诡诞，甚大可畏。臣窃意以谓其书不可留在人间，奉圣旨令刑部遍下诸路州军，多出文榜，分明晓谕，应有《五公符》自今降指挥到限一季，于所在官司首纳，当时及时焚毁，特与免罪。如限满不首，并依条断罪施行，仍仰州县官严切觉察，诏限一季首纳。限满不首，依懺书法断罪，许人告赏钱一百贯，余依已降将挥。”①

在“末劫说”和“弥勒救世”说的煽动下，五代和宋朝不断发生异端的造反活动。

宋代仁宗年庆历七年（1047），王则利用弥勒救世说，鼓动信徒造反，自称“东平王”，国号“安阳”，年号“德胜”。后为宋将文彦博所擒杀。② 宋元时期各种异端教派继续在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发展，重要的除了弥勒教外，还有白莲宗、白云宗、香会等，互相融合。

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各种异端教派为了迎合下层群众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竭力宣扬“末劫说”和“弥勒救世”信仰，并且鼓动下层群众起来造反。史载元泰定二年（1325），息州（今河南息县）民赵丑厮、郭菩萨以“弥勒佛当有天下”相号召造反；至元三年（1337），又有棒胡以弥勒佛名义造反。至正二十年（1360），袁州（今江西宜春）“妖僧”彭莹玉及其徒周子旺又以“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相号召造反。与此同时，北方的韩山童也“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韩山童祖父为白莲宗信徒，这时也信奉弥勒救世说，并最终导致了元末白莲教大起义，白莲教徒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政权，建立了大明帝国。

经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洗礼，下层白莲宗与香会、弥勒教等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组织——白莲教，从原来的佛教异端教派，演化成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结社。

白云宗

白云宗是北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西京（今河南洛阳）宝应寺僧人

---

①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第一百六十五册，刑法二之八十九）。

② 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77 年。

孔清觉所创立的一支佛教异端教派。孔清觉自称“鲁圣之裔”,因后来他居住在杭州之白云庵,故他所倡立的教派便称为“白云宗”,其徒众因皆戒荤酒而称“白云菜”。白云宗作为一支由佛教分化出来的异端教派,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他“涉猎释典,立四果十地以分大小两乘,造论数篇,传于流俗,从者尊之曰白云和尚。其徒曰白云菜,亦称十地菜。”[①]政和六年(1116)孔清觉以“事魔”之罪,被发配到广南恩州(今广西恩平北),4年后获释。至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又有白云庵僧人沈智元自称“道民”,上书皇帝,请求为其庵赐以匾额。朝廷大臣以“道民”们“非僧道童行,自植党羽,千百为群,扶持妖教,聋愚俗,或以修桥砌路,敛率民财,创立私庵,为逋逃渊薮”,实属“奸民”,不仅不应为其赏赐匾额,而且奏请将沈智元流放远处,并拆毁其庵宇。[②] 在《宋会要辑稿》中有一条涉及白云宗的史料:“浙右有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于佛老,以掩物议。既非僧道,又非行童,辄于编户之外,别为一族。奸淫污秽甚于常人,而以屏妻孥、断荤酒为戒法。贪冒货贿甚于常人,而以建祠庙修桥梁为功行。一乡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曰烧香、曰显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撰造事端。兴动工役,夤缘名色,敛率民财,凌驾善良,横行村疃。间有斗讼,则合谋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而已。每遇营造,阴相部勒,啸呼所及,跨县连州。工匠役徒,悉出其党。什器资粮,随即备具。人徒见其一切办事之可喜,而不知张皇声势之可虑也。”[③]这段记载与《佛祖统记》有关白云宗情况的描述,十分相近,是有关白云宗较为详细的一段史料。

白莲宗

白莲宗是南宋高宗时从佛教净土宗分离出来的一支异端教派。创始人是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茅子元。茅子元号万事休,据传其母柴氏因夜梦佛一尊入门,次日遂生子元,故名“佛来”。他自幼父母早亡,投奔本州延祥寺志通和尚出家为僧,诵习《法华经》。关于他创立白莲宗的情况,有一段传说:一天他正在禅定之中,忽然听到乌鸦叫声,遂豁然“悟道”,并随口诵出四句偈语:二十年余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到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于是,“慕庐山远公莲社遗风,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一不杀,二不盗,三不淫,四不妄,五不

---

① 良渚(宗鉴):《释门正统》卷四,“斥伪志”。

② 志磐:《佛祖统记》卷五十四,“事魔邪党”条。

③ 《宋会要辑稿》第130册,刑法二,“禁约”。

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普结净缘,欲令世人净五根,得五力,出五浊也。"他又"撮集《大藏》要言",编成《白莲晨朝忏仪》,"代为法界众生礼佛忏悔,祈生安养。"[①]后来,他迁往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②] 于是,从佛教净土宗中分离出来,创立了白莲宗这个异端教派。

以往我国史书记载中,多把白莲宗的渊源,追溯到东晋慧远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元代白莲宗的著名人物果满在《庐山复教集》中更对此说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吾祖庐山东晋远公法师,自太行恒山来止九江,睹匡庐之境胜,乃卜山阴,立精舍,隐居以乐其道。有汉楚元王之裔刘遗民、散骑常侍雷次宗、太子国博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揖其高风,与之同修净业,念佛为宗,十八贤为上首。乃种白莲花,以显佛性清净无染故,缔盟立誓,期生净邦,因名白莲社焉。"[③]但据著名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研究,所谓东晋慧远在庐山与十八贤等人同结莲社一事,乃出自后人虚构,历史上并无其事。汤用彤先生经多方考察后指出,"莲社"之名,乃中唐以后始见于史籍,在此之前,并未出现过"莲社"之名。称莲社创自东晋,于史无征。而且,以往有关慧远与十八贤同结莲社之说,主要根据《十八高贤传》。该书系陈舜俞所刊定,陈氏自称该书"不知何人所作",因其"文字浅近,以事验诸前史,往往乖谬,读者陋之"。他于是"乃因旧本,参质晋、宋史及《高僧传》,粗加刊正"而成。至南宋大观初年,又由沙门怀悟"复为详补"。最后由僧志磐依《庐山集》、《高僧传》及《晋史》、《宋史》等书"再为补治",才成为后来人们所见到的"定本"。可见《十八高贤传》并非信史。汤用彤先生还指出《十八高贤传》所载内容,有许多失实之处。如十八高贤之一的释慧持,早在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便已辞别慧远入蜀。十八高贤中另一高僧佛陀跋陀罗,是在晋安帝义熙六、七年(410 或 411)才到达庐山,可见他们两人都不可能与慧远于元兴元年(402)在庐山同结莲社。[④]

茅子元所创立的白莲宗,其教义主要源自佛教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净土。故

---

① 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四,"慈昭宗主"。见杨讷编:《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八,"法运通塞志"。

③ 杨讷编:《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77 页。

④ 汤用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59—264 页。

茅子元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①认为弥陀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之产物,人人都可以做到。茅子元著作颇丰,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圆融四土三观造佛图》,被白莲宗信徒们奉为"开示莲宗眼目"之作,该书系茅子元模仿佛教天台宗教义编成,所谓"四土"是指四种报果土,即天台宗对佛土等级之划分。这四种土是:"凡圣同居土",指凡人与圣人共同居住之处;"方便有余土",指罗汉降生之地;"菩萨果报土",指菩萨居住之处;"常光寂大土",指诸佛如来所居之处,是个充满智慧、彻底解脱的世界。茅子元把"四土"作为让信徒们追求、向往的目标,用来吸引下层社会中文化水平不高的徒众。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坐受门徒的顶礼膜拜,俨然以活佛自居。并以"普、觉、妙、道"作为弟子取名的辈分排行,用来确定门徒的宗门关系。白莲宗不要求徒众们祝发出家,而且可以娶妻生子,与平民百姓无异。白莲宗允许"男女同修净业",因而受到正统佛教的攻击,称白莲宗"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并称"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向诳惑,聚落田里,皆乐其妄"。②

白莲宗创立时,已经有弥勒教、明教、白云宗等异端教派在民间流传,并不时举行反抗时政的活动。故白莲宗之出现及其活动,便很快引起了宋朝当局的关注,并把它与弥勒教等异端教派,皆归入"食菜事魔"的"邪教"行列。茅子元本人也被流放江州(今江西九江),白莲宗遭到取缔。不过,白莲宗并未由此灭绝,茅子元在流放期间,"逆顺境中未尝动念",且"随方劝化",在江州继续传教。后来,白莲教甚至迎来了顺利的发展时期。南宋高宗乾道二年(1166),茅子元被诏至京师,并且在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被赐以"白莲尊师慈昭宗主"的称号。事毕,朝廷又把他送归昆山,以至白莲宗更加发展,"宗风大振"。③ 不过上述说法乃出自元代白莲宗首领普度的记载,究竟是普度为了抬高白莲宗的身价而伪造,还是确有其事,已不可考。茅子元去世后,白莲宗虽继续发展,但在教规、教义方面,已有所不同。据宗鉴记载,在茅子元之后,"有小茅阇复收余

---

① 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二,《念佛正教·离相念佛三昧无住法门》。

② 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七。

③ 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四,"慈昭宗主"。见杨讷编:《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 年。

党，但其见解不及子元。又白衣辗转传授，不无讹谬，唯谨护生一戒耳。”[①]南宋末年，江西抚州官府曾下令将当地一座白莲教堂查禁，“除去妖邪，毁其巢穴”，并没收其“田业”。[②] 反映白莲教在南宋后期既存在又未得到顺利发展的状况。

到了元代前半期，白莲宗一度得到朝廷的保护，并得到较大的发展。元成宗大德年间(1298—1307)，“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至与梵宫道殿匹敌，盖诚盛矣！”[③]当时著名的白莲宗教堂，除传说中庐山东林寺与昆山白莲忏堂十分兴盛外，还有福建邵武和平里报德堂，徽州东门观音堂，丰城万缘堂，建宁白莲都掌教报恩堂，抚州崇仁县长安乡会善堂，大都(今北京)寅宾里无量寿庵等。这些白莲庵堂为首的“道人”，口头上以“清净”自诩，实际上大肆聚财敛钱，并且交结权贵，勾通官府。由于白莲宗可以娶妻生子，白莲庵堂及所属产业也就父子相承。庵堂的住持，实际上成了业主，使得许多白莲宗的传教世家，都成了当地的殷实富户。元武宗时，又对白莲宗采取了禁止、打击的政策。元武宗至大元年五月，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④] 在元《通制条格》载有这条谕令的原文：“至大元年五月十八日，中书省奏：江西、福建奉使宣抚并御史台官人每，俺根底与将文书来，建宁等处有妻室孩儿每的一枝儿白莲道人名字的人，盖着寺，多聚着男子妇人，夜聚明散，佯修善事，煽惑人众作闹行有，因着这般别生事端去也。又他每都是有妻子的人有，他每的身已不清净，与上位祝寿呵，怎生中？将这的每合革罢了。麽道与将文书来有。俺商量来，将应有的白莲堂舍拆毁了，他每的塑画的神像，本处有的寺院里教放着。那道人每发付元籍，教各管官司依旧收系当差，已后若不改的人每根底，重要罪过。更其余似这般聚着的，都教管民官禁约，不严呵，教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密呵，怎生？麽道，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⑤]元至大元年五月元朝当局下令禁白莲宗后，普度立即赶至大都，设法使朝廷解除禁令，恢复白莲宗的合法地位。他“率

---

① 宗鉴：《释门正统》卷四，“斥伪志”。

② 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十五，《申安抚司乞拨白莲堂田产充和籴状》，转自杨讷：《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9年。

③ 刘埙：《水云村泯稿》卷三，《莲就万缘堂记》，转自杨讷：《元代的白莲教》，中华书局，1989年。

④ 《元史》卷二十二，“武宗纪”(一)。

⑤ 《通制条格》卷二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弟子十人，芒屦草服，诣京师上书，演为万言。”又作《莲宗宝鉴》一书，呈送皇太子，得到称许，“敬奉令旨，教刊板印行者”。不过，并未达到解除白莲教禁令的目的。至大三年正月，普度又向元武宗上书，竭力为白莲宗辩护，并力证白莲宗“念佛之道以兴善止恶为其大端，实益陛下政化者多矣”，能帮助朝廷“省其刑狱”，而“坐至太平”。① 至大四年正月，元武宗去世，仁宗即位。他崇儒重佛，于同年七月，正式恢复了白莲宗的合法地位，并下令对各地白莲宗的庵堂予以保护。不过，好景不长，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闰五月，元朝政府又下令“禁白莲佛事”。② 此后，白莲宗再次转入地下，在民间秘密流传。

二、白莲教的形成

白莲教形成于元末这一点，目前在史学界已取得共识，但对于白莲教形成过程中，究竟是否有明教融合其中，尚存在较大分歧。一种意见以吴晗为代表，他认为白莲教是白莲社与明教融合的结果。他在《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中指出：“明教在会昌禁断后，已合于佛，已混于道，又与出自佛教之大乘教、三阶教合，至北宋末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白莲社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弥勒佛教合。”③其主要根据是何乔远在《名山藏》中的一段话：“小明王韩林儿者，徐人群盗韩山童子。自其祖父为白莲会惑众，众多从之。元末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④吴晗据此指出：“以‘弥勒降生’与‘明王出世’并举，明其即以弥勒当明王。山童唱明王出世之说，事败死，其子继称小明王，则山童生时之必以明王或大明王自称可决也。此为韩氏父子及其徒众胥属明教徒，或至少羼入明教成分之确证。”⑤有的学者进而认为白莲教是由明教与民间弥勒信仰相结合，“在宋元时代逐渐形成了白莲教”。⑥ 另一种意见以杨讷为代表，认为

---

① (元)果满编：《庐山复教集》所载普度撰：《上白莲宗书》。见《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

② 《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二。

③ 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1页。

④ 何乔远：《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记”。

⑤ 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 冯佐哲：《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载《清史论丛》第2辑。

白莲教与明教“本来互不相涉”，只是由于1941年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发表后，“明教之久合于白莲社”的说法，才不断为人衍用，几乎成为定论。[①] 杨讷认为，明教即摩尼教，与白云宗、白莲宗虽然在宋代曾同被斥为“事魔邪党”，三派有共同之点，但“并不等于三派混合”。直到元代，明教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宗教，而且还取得了合法地位，元朝当局还设专人“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②] 入明以后，明教与白莲教同属在被禁之列，两教的区别仍很清楚，并不存在明教与白莲教混合的问题。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在元代中后期渗入白莲教并且终于使它大为改观的，是弥勒净土信仰”。[③]

从白莲教形成的历史和它的主要教义来看，杨讷的意见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茅子元在创立白莲宗之前，原属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他所创立的白莲宗，虽然成了净土宗的异端，但他仍崇奉弥陀佛。中国的佛教净土宗，分为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两派。前者礼念弥勒佛，后者礼念弥陀佛。他们虽然都信仰“往生净土”，但弥勒派指的是“兜率天”，弥陀派则指的“西方极乐世界”。白莲宗是由弥陀净土中分化出来的异端教派，在其教义中强调“念念不忘于净土，心心不离于弥陀”，并无弥勒信仰的内容。到元代中叶，在白莲宗的教义中，出现“弥勒下生”信仰时，还受到正统白莲宗信徒的不满。当时白莲宗的著名人物普度曾说：“夫白莲正法，以本性弥陀为体，念佛信原为宗。……比来学者迷失宗旨，贪著事相，不尊教典，向外妄为，心眼不明，竟称师长，实法门中一弊事也。或搜鬼窍，或若巫师，或称弥勒下生，或言诸天附体，或向烛光上见神见鬼，或在香烟上断吉断凶，瞒昧三光，欺贤罔圣，诳滹闫间，邀求利养。”[④]他把弥勒下生的信仰，归入巫师弄神弄鬼一类骗人把戏之中，可见正统白莲宗是排斥弥勒信仰的。元末，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下层群众不断利用弥勒救世的信仰，举行反元斗争。元泰定二年（1325）六月，“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⑤]至元三年（1337）二月，“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棒胡系陈州人，“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曾破归德鹿邑，焚陈州，军中有“弥勒佛小

① 杨讷：《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9年。
② 《泉州宗教石刻》，第46页。
③ 杨讷：《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9年。
④ 杨讷：《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45页。
⑤ 《元史》第二十九，“泰定帝纪”。

旗"。弥勒佛下生的信仰在下层群众中的广泛流传,自然会影响到主要在下层社会中传播的白莲宗(会),在其教义中也融入了弥勒下生的信仰。在组织上,也从佛教异端教派,逐渐转化成了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积极参加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两支主力军,即南方的天完红巾军和北方的大宋红巾军,皆由白莲教领导,都以"弥勒佛下生"相号召。至元四年四月,袁州(今江西宜春)慈化寺和尚彭莹玉与弟子周子旺,都是白莲教首领。[1] 他们举兵反元后,以"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相号召。彭莹玉后来被天完红巾军奉为祖师,活跃在北方的大宋红巾军,其首领韩山童也倡言"弥勒佛下生"。史载:"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2]

从白莲教形成过程来看,自从南宋茅子元所创白莲宗起,便逐渐开始了白莲教的形成过程。不过,在元末以前,白莲宗与白云宗、弥勒教还都是独立的教派。但是,由于它们长期以来都是在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因而互相接近,互相渗透。到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这些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异端教派,便进一步融合。其中,以佛教净土宗教义为基础的白莲宗,在吸收弥勒教的"弥勒救世"教义以后,便形成了白莲教。白莲教无论在教义还是组织上都已不同于茅子元的白莲宗。它不仅融入了弥勒救世信仰,而且不再是半僧半俗的净业持修团体,而是成了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民间秘密结社。

---

① 杨讷:《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9年。

②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

第二章　罗　教

罗教是明清时期一个重要秘密教门,明代罗梦鸿所创立。罗教在创立之初并无罗教其名,后因罗梦鸿以"清净无为创教",人们即称之为"无为教"。又因教内尊罗梦鸿为"罗祖"而称"罗祖教",简称"罗教"。罗梦鸿的籍贯大体上可以确定为山东即墨县猪毛城成阳社牢山。有关罗梦鸿平生事迹的记载很少,我们只能依据他所著的《五部六册》及弟子有关《五部六册》注释方面的著作,加以推断。明代万历年间临济宗僧人兰风在他所著的《祖师行脚十字妙颂》中,提到其师罗梦鸿的事迹。该书已失传,幸好其弟子王源静在所著的《开心法要》(原名《金刚般若经注解全集》)中引用了兰风的原文,现转录如下:"老古佛,来托生,以罗为姓。为众生,降山东,普度众生。""正统时,七年间,处世为人。十二月,初一日,子时出现。离母胎,不食荤,菩萨临凡。生下祖,三岁时,丧了父亲。七岁上,又丧母,撇下单身。可怜儿,无父母,多亏叔婶。蒙抬举,养育祖,长大成人。每日里,怕生死惜惶不住。想生死,六道苦,胆颤心惊。到成化,六年间,参师访友。朝不眠,夜不睡,猛进前功。茶不茶,饭不饭,一十三载。到成化,十八年,始觉心明。在十月,十八日,祖成道果。""到嘉靖,六年间,无心住世。交正月,八十五,放下身心。"①从上述记载中可知,罗梦鸿生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十二月初一日,卒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正月二十九日,终年八十五岁。

一、罗教的创立

罗教的创立并非罗梦鸿出于一时冲动或神灵的启示,而是同他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罗梦鸿祖辈当兵,隶军籍。明代的军籍同匠籍一

① 王源静:《金刚般若经注集全集》卷一,"苦功悟道",顺治九年刊本,同治七年重刊。

样，社会地位低下，当兵是一种农奴性的义务，不得随意脱离。罗梦鸿14岁时便以卫所军人的身份被征召入伍，在直隶密云卫充当运粮军人。退役后，仍然挣扎在饥饿与贫困之中，力图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处境，于是走上了创立秘密教门的道路。罗梦鸿创立罗教，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罗梦鸿生活在明代中叶，当时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后果。

首先是地主阶级的变化，商品经济刺激了他们的贪婪欲望，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有些地主则开始经营工商业，他们不仅用地租方式剥削农民，而且利用手中控制的工商业剥削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加上这时皇室、贵族大肆兼并土地，迫使大批农民逃亡，成为流民。其中有些人进入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垦荒；有些人则铤而走险，举行公开武装起义。

其次，农民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民同市场发生联系，彼此间展开竞争，结果少数人上升为富裕农民，大多数人沦为雇佣劳动者或被排挤出农村。社会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少数人突然变得富裕了，大多数人变得更穷、更苦了。人们大多把这种变化视为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但也有少数人希图同命运抗争，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与处境，罗梦鸿就是这些人中间一位代表性人物。

罗梦鸿自幼父母双亡，过着孤独悲惨的生活。及长，又充当运粮军人，终年漂泊在数千里长的大运河上，备尝人间的艰辛与苦痛。他亲眼目睹运粮军人、水手们的苦难生活，退役后，他便希望寻找一条使自己和同伴们的命运得到改变的道路。至于《五部六册》中所宣扬的惧怕生死轮回，希望得到解脱和永生，无非是掩盖他组织秘密结社的神秘外衣。罗梦鸿在创立罗教的道路上曾经备受艰辛。最初，他试图从正宗佛那里得到帮助，拜临济宗宝月和尚为师，他在《苦功悟道卷》中写道："忽一日，有信来，朋友相见。说与我，孙甫宅，有一明师。连忙去，拜师傅，不离左右。告师傅，说与我，怎么修行。拜多时，不肯说，心中烦恼。求半年，我师傅，才发慈心。下苦功，一拜下，不说不起。告师傅，发慈悲，转大法轮。说与我，弥陀佛，无生父母。这点光是婴儿，佛嫡儿孙。就跪下，告师傅，佛在何处？师傅说，弥陀佛，彼国天上。告师傅，说与我，怎么上去？举念着，四字佛，便得超生。每日家，念弥陀，不肯放舍。行也念，坐也念，猛进功程。"就这样，无昼无夜地念了八年阿弥陀佛，并无收效。正统佛教只能给人们以心灵上的慰藉，并不能真正帮助苦难中的人们摆脱生活上的困难与痛苦。罗

梦鸿于是辞别师傅，又去另访名师。一天夜晚，他听见邻人家中因父母亡故，请僧道超度亡灵。有僧人诵念《金刚科仪》，其中有一句是“要人信受，拈来自检看”，于是他也请了一部《金刚科仪》来诵念。他一直念了三年，仍未悟出摆脱贫困痛苦的途径。又外出游方二年，终于“悟道”。在明末问世的《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第五品，对罗梦鸿“悟道”的经过加以颂扬说：“苦功悟道第一仙，昼夜下苦十三年；迷念弥陀八年整，简选科仪整三年；游方二载心开悟，白光摄醒坐西南；忽悟真空原不坏，遗留法宝度人天。”为了替自己“悟道”的经历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罗梦鸿专门编造了一段神话故事。“梦中哭痛，惊动虚空。老真空大发慈悲，从西南放道白光，摄照我身，梦中摄省。省过来，烦恼不止，朝西南端然坐定。忽然间，心花发朗，心地开通，洞明本地风光，才得纵横自在，才得自在安稳。”①那么，“老虚空”究竟向他指点了什么，使他“大彻大悟”了呢？如果剥去那层神秘的面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表达，那就是罗梦鸿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从佛教那里真正找到解脱之路，但又必须在佛教的掩盖下，创立秘密教门，广收徒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与苦难。于是，他一面传播其思想，一面撰写经卷《五部六册》，终于创立了继白莲教之后最重要的秘密教门——罗教。罗梦鸿为了掩盖自己创立秘密教门的事实，故意把自己说成是佛教正宗教派，并且竭力同白莲教等异端教派划清界限。他攻击白莲教说：“白练（莲）烧纸是邪宗，哄的大众错用心；邪水照着公侯伯，正是邪气引迷人；信邪烧纸不打紧，闪赚许多众迷人。你行白练（莲）是邪宗，万剐凌迟不称心，求拜日月是白练（莲），哄的男女都遭难；法水照着公侯伯，早晚拿住都遭难。”对弥勒教也攻击说：“书佛咒，弥勒教，躲难邪法。入城中，躲灾难，正是邪风。书佛咒，弥勒院，正是诳语。凡所相，皆虚妄，永下无间。弥勒教，是色相，空即是色。……哄迷人，下地狱，永不翻身。”②罗梦鸿创教之初，多在戍边军人、运粮军人及粮船水手中传播。他在密云卫的司马台建有经堂，作为传教据点。入教者对他皆有馈赠，使他得以借传教而致富。嘉庆二十一年直隶总督那彦成曾亲自来到密云县查办罗教，事后他向皇帝奏称：“查询年老乡民，据称罗道（教）始于明末，系山东即墨县人，当年流寓距石匣六十五里，距古北口二十五里之司马台，堡外建造讲堂，自称罗道。并将眷口移居石匣，远来馈送颇多，因以而致富。然行踪诡秘，

① 罗梦鸿：《苦功悟道卷》。

② 罗梦鸿：《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

并不传教于石匣之人，而石匣之人亦无习其教也。”[1]罗梦鸿通过创教、传教收徒，获得馈赠而致富，这便是他创教的真正用心和目的。他正是利用创教和传教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藉创教、传教而致富。当时就有人揭露他“口说清虚，而心图利养，名无为而实有为”的实质。罗梦鸿的传教活动，不久引起了明朝当局的注意，并于正德年间将他逮捕入狱。据清人采衡子所著的《虫鸣漫录》中记载：“前明正德时，有罗姓者奉佛甚虔，茹斋持戒，而不祝发。居家生子，无异平民，人使之从者颇众，散处齐鲁间，有司惧其摇惑，执而系入狱。适大旱，赤地千里，祈祷无验。罗自言能致雨。大吏奏请暂释，试其术。罗至海滨，望洋诵咒，不日大雨如注，稿禾尽苏，民竟为请命，不复系狱，纵之使归，数年病殁。”罗梦鸿出狱后，仍在密云一带传教。其妻颜氏，子佛正，女佛广也一道从事传教收徒。后来，罗梦鸿又回到山东家乡去传教，万历年间，罗教在山东已十分盛行。与罗梦鸿同时代的僧人憨山大师在《梦游记》第五十三卷《自序年谱》的“万历十三年条”中，曾记述他在崂山所见情形。“予年四十，东人从来不知僧，予居山中，则黄氏族最大，诸子渐渐亲近。方今云外诸罗清者，乃山下之阳城人。外道生长地，故其教偏行东方，绝不知有三宝，予居此渐渐摄化。”说明罗教当时在山东传布之盛。据史书记载，在山东西南部，罗教也很盛行。“侯表，鱼台人也，常与金乡、巨野、南皮人群辈数千，诵罗道五部六经。于是分为三千余社，每社立社长一人，社举一人。社出金一分，封输社长。诸社一旦有缓急不能办，即以社金□之。人人皆以罗道利赖己，乃益尊崇表，殆如神明矣。”[2]这不仅说明罗教当时传播之兴盛，而且反映出罗教的秘密结社性质。

二、罗教的教义

罗教的教义集中反映在罗梦鸿所著的《五部六册》中。所谓《五部六册》是指：《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分上下两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共五部经卷，分为六册，故曰“五部六册”。《五部六册》是罗梦鸿在传播罗教时逐渐完成的，它集中反映了罗梦鸿的思想体系，既是罗教传教的工具，又是用来掩盖罗教作为秘密结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②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一，北直隶，“罗道教侯表列传”，中华书局影印本。

社本质的神秘外衣。所以，在《五部六册》中摘引了大量佛教典籍，据郑志明先生研究，《五部六册》中摘引佛教的经籍，大致可分成四个系统：

1. 佛教经论系统。以大乘经华严部、方等部、般若部、法华部、涅槃经、小涅槃经、报恩经等。属于小乘经的有佛因果经、譬喻经。属于经论的有金刚论、智度论与大丈夫论。

2. 禅宗语录系统。以禅宗僧众的语录为中心，如达摩血脉论、庞居士语录、傅大士（善慧大士录）、宗镜录、六祖坛经、传灯录、永嘉禅师证道歌、五灯会元、宗眼语录等。

3. 净土宗阐教系统。以元代普度的《庐山莲宗宝鉴》为中心，即优昙语录、庐山宝鉴及净土指归集、龙舒净土文、法苑珠林等。

4. 佛教科仪宝卷系统。以金刚科仪为主，其他还有地藏科仪、慈悲水忏、金刚宝卷、圆通卷、心经卷、大弥陀卷、香山宝卷、圆觉卷、信邪烧纸宝卷等。[①]

《五部六册》中尽管摘引了大量佛教经典，但是，其基本教义却并不同于佛教，而是自成体系。《五部六册》所宣扬的教义，其核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宇宙缘起说

罗梦鸿除了用大量篇幅论述人的生死问题外，一个核心思想是讲述宇宙的缘起。罗梦鸿吸收佛教虚无与道家无为等思想，创造出“虚空”这一概念，认为宇宙缘起于“虚空”。他在《苦功悟道卷》“达本寻源品”中写道：“忽然参透虚空，未曾有天有地，先有不动虚空。无边无际，不动不摇，是诸佛法身。”认为在宇宙产生以前，便有一个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的“虚空”。这个虚空，并非空无一物的无有，而是宇宙万物之本源，也称做“本来面目”，即人的本性。他在《叹世无为卷》第一品中又写道：“无边的虚空是无极身，大千世界总是虚空安住，大千世界总是无极化体，人人本来面目真无极圆身。里外相连太虚空，虚空原是无极身，认的本来面目，东西南北不可思量。”所以又说先有本来面目后有天地。“未曾初分天地，先有本来面目。从旷大无量劫，先有本来面目，永劫长存，后有诸佛三教，后有僧俗戒律善恶，后有天堂地狱，后有无当万物，后有古今。”虚空既先于宇宙万物而存在，又是宇宙万物之本源，神通广大。“想当初，无天地，无有名号，本无成，亦无坏，不增不减，太虚空，无名号，神通广大，太虚空，生男女，

① 郑志明：《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第 231—234 页。

能治乾坤。太虚空,不动摇,包天裹地,太虚空,变春秋,五谷能生。太虚空,穿山海,泉水常涌,谁知道,太虚空,好个能人;化菩萨,广无边,虚空能变,有阴阳,和日月,虚空能通,谁知道,太虚空,神通广大,他是我,我是他,一体虚空。又无修,不是仙,不是佛祖,除虚名,一步地,自在纵横。”在这里,罗梦鸿又把虚空说成是人的本性,所以又说“他是我,我是他,一体虚空”。罗梦鸿又把虚空转化为一位人格化的神,其正式封号便是“无极圣祖”。无极圣祖既是权威的主宰,可以使“迷人”永下地狱,又是一位仁慈的救世主。他为了使众生免遭万劫沉沦,经常化为各种各样的人物,到尘世间化度众生。在《正信除疑卷》第五品“无极化现度众生品”写道:“无极圣祖大慈大悲,恐怕众生作下业障,又转四生六道不得翻身,故化现眼阳宝莲宫主,太子叹退浮云一切杂心,显出真心,参道究这本来面目,出离轮回生死苦海。”以上便是《五部六册》中有关宇宙缘起的说法。

二是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和“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

无生老母崇拜和“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既是罗教的基本教义,也是明清以来秘密教门和会道门的共同信仰。概括地说,“无生父母”或“无生老母”就是人类的始祖和宇宙的主宰,“真空家乡”就是“无生父母”居住的地方,乃是人类的出生地和最后的归宿,相当于佛教的“净土”或“西方极乐世界”。无生老母崇拜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在罗梦鸿开始“悟道”以前,民间就流行着崇拜“无生父母”的信仰。台湾学者王见川在《龙华教源流探索》一文中提到:“学者一般认为‘无生老母’源出罗祖《五部六册》,其实,在《苦功悟道卷》中写的很清楚,‘无生父母’是当时信仰弥陀的宗教结社所持念的真言,并非罗祖所主张和提倡的观念。”①罗梦鸿在讲到他自己的悟道经过《寻师访道第三参》中写道:“忽一日,有信来,朋友相见。说与我,孙甫宅,有一名师。连忙去,拜师傅,不离左右。告师傅,说与我,怎么修行。”可是,这位师傅并不肯告诉他如何修行,经过他苦苦哀求,师傅终于“发慈悲,转大法轮”,“说与我,弥陀佛,无生父母”。并且告诉他“举念着,四字佛,便得超生”。② 据此可知,在成化六年罗梦鸿退伍以前,民间早已流行着有关对无生父母的崇拜,而且把无生父母说成是“阿弥陀佛”。罗梦鸿按照那位师傅教给他的方法进行修炼,“每日

---

① 王见川:《龙华教源流探索》,载《台湾的斋教与鸾堂》,台北天南书局,1996年,第4页,注12。

② 开心法要本《五部六册》,台湾:正一善书出版社,1994年,第22—23页。

间，念弥陀，不肯放舍。行也念，坐也念，猛进功程”。“念弥陀，无昼夜，八年光景。朝不眠，夜不睡，猛进功程。使尽力，叫一声，无生父母。恐怕我，弥陀佛，不得听闻。”经过八年无昼夜地念诵阿弥陀佛，却仍然“心中烦恼，不得明白”。于是便拜别师傅，外出再访名师。在外出期间，一次邻居家老母亡故，众僧诵念《金刚科仪》，罗梦鸿在听到“要人信受，拈来自检看”后受到启发，也请了一部《金刚科仪》诵念，并通过对宇宙起源问题的思考，否定了民间流传的有关无生父母是阿弥陀佛的说法。罗梦鸿在《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的《本无婴儿见娘品第十六》中说：“愚痴之人说本性是婴儿，说阿弥陀佛是无生父母。阿弥陀佛小名号曰‘无净念王’，父亲是转轮王，阿弥陀佛是男人，不是女人，他几时生下你来？阿弥陀佛生本性，本性生谁？爷爷生父亲，父亲生儿子，儿子生孙子。大道门中，本无此事。”①在否定民间所流传的无生父母是阿弥陀佛的说法之后，罗梦鸿便开始创造自己的神祇。他首先利用老子有关宇宙形成的说法，和佛教有关虚无的观念，创造出“无极圣祖”这个人格化的神。老子认为，“道”乃是“万物之宗”，也就是万物的本体和本原，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又是它的本原，即宇宙本身便是由道所产生的。道“先天地生”，是“万物之母”。道产生宇宙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一”，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数字一，而是指宇宙万物在生成之前所处的一种混沌状态。由一生二，是指由混沌状态产生了阴阳两个方面。再由阴阳交合而产生三即“冲气”，然后便产生了宇宙万物。老子认为道是无形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是超感觉存在的。不过，道却是真实存在的。老子认为，道乃是“有”与“无”的统一，无与有乃是“同出而异名”。又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命题。意思是：因为万物都是可以命名的，而给万物命名的“道”，却是不可以命名的，“无名”的“道”乃是宇宙之始，它产生了天地万物这些“有名”的东西，所以说是无名产生有名，“有生于无”。总之，在老子看来，宇宙万物都是由“道”也就是“无”所创造出来的。道教产生后，继承了老子的这些说法，作为自己的教义。罗梦鸿便利用和改造了道教的宇宙缘起说，他把道教关于世界万物的创造者“道”，改换成“虚空”。他在《苦功悟道卷》中提出：“未曾有天地，先有不动虚空。”此虚空“无边无际，不动不摇，是诸佛法身。”他又进一步把“虚空”变成人

① 开心法要本《五部六册》下卷，台湾：正一善书出版社，1994年，第156页。

格化的神"太虚空",说"太虚空,无名号,神通广大;太虚空,生男女,能治乾坤。"又说:"谁知道,太虚空,好个能人;化菩萨,广无边,虚空能变。"他又因道教称"道"为"无极大道",故又在《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中,提出"无极圣祖"这位人格化神,把他作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始祖。可是,当初他否定"愚痴之人"有关阿弥陀佛是无生父母时的主要理由,便是阿弥陀佛是男性,不是女人,不能生育。而如今罗梦鸿创造出来的"无极圣祖"同样也是男性,不能生育。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又提出"母即是祖,祖即是母"的说法。他在《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的《一字流出万物的母品》中,又说万物名号都是由"母"这一字流出的,因此"母即是祖,祖即是母"。这样,"无极圣祖",也就是"无极圣母"了。所以,在罗梦鸿眼里,"无生父母"也就是万物的本原"虚空",在《五部六册》里,有时也用禅宗的用语"本来面目"加以代替。罗梦鸿有关宇宙形成的说法,也融入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宋明理学兴盛的明代正德年间,他直接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汲取营养。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写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无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而合宁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变化无穷也。"罗梦鸿在《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的《未曾初分无极太极鸡子在先品》中也说:"无极是太极,太极是无极,无极是鸡子,鸡子是太极。无极、鸡子都是假名,假名叫做无极、太极、鸡子,即是无边太虚空。天地日月,森罗万物,五谷田苗,春秋四季,一切万物,三教牛马,天堂地狱,一切文字,都是无极、虚空变化。"在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不仅是统治思想,而且是步入仕途的工具,因此,所有学童的启蒙读物,皆要贯穿儒家思想。如《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读物中,皆宣扬儒家有关宇宙形成的观念。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气之清轻,上升者为天,气之重浊,下沉者为地"等。同时,中国古代有关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女娲、伏羲的传说,人们也都耳熟能详。这些也都为无生老母的创造,提供了素材。到了罗梦鸿弟子时代,"无生父母"又进一步具体化。在罗梦鸿弟子大宁和尚所著的《明宗孝义达本宝卷》的《无想恩重品第十》,把无生父母尊为天下的主宰:"阿难问佛云:'何是无生父母?'世尊答曰:'无生者,乃诸佛之本源也,万物之根基也,人人之家乡也,乃无极之法体也,谓天下之

主宰也。”[①]罗教第四代传人孙真空所著的《销释真空扫心宝卷》中，更创造出无生父母的完整故事。他把“无生父母”说成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只从老古佛安下乾坤，立就世界，观看东土并无一人住世。因此才将自己本家儿女发到下方串壳住世。”临别时，无生父母眼含痛泪嘱咐儿女们：“你到东土莫要贪尘恋世，迷了真性，不得还乡。”儿女们听说，满眼流泪，双膝跪下，苦苦哀告，向父母讨个“归家妙偈”。无生父母对儿女们说：“你们若是思想双亲，一心回家，只要你昼夜殷勤，少贪尘睡，举念南无阿弥陀佛，自然就得道了，刹那就到家乡。”众儿女降于东土后，因为“只贪红尘，男女配合，华花世界，饮酒食肉，贪欢作乐，各赌刚强，认定聪明，夸会夸能，专习琴棋书画，再不思本来家乡，也不肯思想无生的父母。”[②]于是无法再回到无生父母身边。在《销释真空扫心宝卷》的下册，“无生父母”已经被说成是“老母”。孙真空在此编造出一个神话故事，把自己说成是无生老母下凡到尘世的失乡儿女，“老母”为了寻找他而化作贫婆下凡到人间。“我在灵山坐不住，才做乞儿叫化门，领定金童和玉女，东来西去把你寻。”“我今叫化只为你，大地众生怎知音。若问老拙名和姓，我是灵山老母亲。有人见我贫婆面，就是龙华三会人。”这时，“无生父母”已经被描绘成一位慈祥的母亲形象。[③] 在罗梦鸿弟子明空所撰的《销释印空实际宝卷》中，也提到临凡众生在尘世“虚度了这时光，何日得还乡？尘世里贪快乐，争名利，逞高强，家中盼望。无生母，家中盼望”。[④] 罗梦鸿及其弟子们在创造无生老母的过程中，把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说成是由无生老母所创造出来的，无生老母既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又是人类的主宰。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道家宇宙形成说的篡改，它同老子的本来思想是相悖离的。老子提出道乃万物之本原，是为了否定殷周时期把上帝与神作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的说法。老子用“道”取代了上帝和神的宇宙创造者和主宰的地位。同时，老子还主张圣人应该以“道”来治理天下，而不应该依靠鬼神，从而在政治上排除了上帝和鬼神的统治地位。而秘密教门罗教则是要用一个人为造出来的“无生老母”这个至高

---

① 大宁和尚：《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下，光绪刻本。

② 《销释真空扫心宝卷》上卷，载张希舜等编：《宝卷初集》第18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4—398页。

③ 张希舜等编：《宝卷初集》第18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109页。

④ 《销释真空实际宝卷》，载张希舜等编：《宝卷初集》第18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5—156页。

无上的神,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人类的主宰。这当然是同老子的思想相悖离的。

三、罗教的流传

罗梦鸿故后,罗教便分成许多支派,由其子女及弟子各立门户。其子佛正继承了教主地位,世代传习罗教,到雍正年间已传有七代。其女罗广,法名佛广,与婿王善人(亦作王盖人)则以无为教或大乘教名目继续传教,故在清代,罗教与大乘教都是明代罗教的延续,主要在漕运水手中流传。清档记载,明季有钱姓、翁姓、潘姓三人在杭州创立罗教庵堂,作为罗教传教之中心和老弱病残水手的驻足之所,所以罗教在流传过程中,一直同漕运水手有着密切关系。

(一)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流传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满足其财政需要,便把从全国征收到的田赋,特别是粮米运往京城。因为要利用水面运送,这种运输方式便称为"漕运"。明清两代每年皆把征自江南(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以维持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是用于支付官俸、军饷及维持宫廷的花销。明代漕运主要是军运,即由运粮军人承担运输漕粮的任务。在明英宗天顺以后,共有漕船 1770 余艘,运粮军人多达 12 万。[①] 这些运粮军人可以得到"行粮"和赏钞,并有大量屯田,以维持其生活。所以,明代运粮军人实际上还带有服徭役的性质。清代最初仍沿用明制,也由运粮军人承担。具体做法是,由粮户按地区远近,给予运粮军人以"耗米"和轻赍银,称为"长运"。运粮军人的组织,大体上也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度,粮船皆按各省的卫所分帮,每帮又分若干分帮,每帮有二三十只至五六十只船。每个分帮由卫所千总一或二人领运,称为"运弁",粮船上的兵丁称为"运丁"。后来,由军运改为民运,每船只设运丁一人,其水手、舵工等,皆雇用直隶、山东一带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充任。据《清史稿·食货》三记载:"清初沿明卫所之制,以屯田给军分佃,罢其杂徭。寻改卫军为屯丁,毋得窜入民籍,五年一编审,粮道掌之。

---

① 《明史·食货志》卷五十五。

康熙初，各省卫所额设运丁十名。三十五年定漕船出运，每船佥丁一名，余九名以谙练驾驭之水手充之。凡佥选运丁，佥责在粮道，举报责卫守备，用舍责运弁，保结责通帮各丁。"雍正二年，各省的卫所被裁撤，漕运各卫所虽然名义上仍然保留，但因运丁可以雇用水手充任，所以卫所运丁的军籍同水手的民籍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消失了。"盖论詹籍虽有军民之殊，而承佃输赋则屯户与民无异。"[①]这样，粮船水手船帮，在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成了手工业行帮性质的组织，具有互济互助的功能。水手之间，不仅存在劳动组织的关系，而且在经济上也具有利害关系，水手们在回空往江南携带"土宜"时，需要船帮的集体行动。早在明代，漕运水手就可以在载运漕粮之外，附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免征税金，称为"随船土宜"，但数量上限制极严。成化年间每只船只准携带十石，多带者要没收入官。后来增加到六十石。雍正七年对此予以放宽，准许"于旧例六十石以外，加装四十石"。[②] 水手们除公开携带土宜之外，也常常从事"偷盗米石"、"挟带私货"等活动。水手帮之间，为了本帮的利益，还常常"操刀持戈，杀伤多命"，甚至"公然抢夺，扰害居民"。粮帮水手们还同"风客"相结合，由风客帮助水手在各地销售他们携带的货物。"有一种积枭巨棍，名为风客，惯与粮船串通，搭载货物，运至淮扬，托与本地奸徒，令其卖货买盐，预屯水次。待回空之时，一路装载，其所售之价，彼此明分。粮船贪风客之余利，风客恃粮船为护符。[③] 有了风客的帮助，水手们携带土宜、夹带走私更加方便，数额也更多。而罗教则在水手帮中起到了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作用，粮船水手们便纷纷皈依罗教。所以，粮船水手们加入罗教，与其说出于信仰，毋宁说是出于求生的需要。我们对粮船水手的具体情况加以考察，就可以了解水手们皈依罗教的奥秘了！

首先，粮船水手们大多是来自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破产劳动者，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④] 水手们的劳动极为艰苦，且充满风险。他们漂泊在长达1790多公里的大运河上，常常会因为遇到风浪而覆船。一旦粮船沉没，即使旗丁、水手幸免于难，而粮米所受损失，按照清朝当局的规定，也要由旗丁、水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廿九，征榷一。

③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七年五月甲子。

④ 《江苏海运全案》卷一，监察御史熊遇泰折。

手们赔补。"查漕船在内河失风,例应查明沉失米石着落,旗丁赔补。"[①]有关粮船遇风浪覆没及由旗丁、水手赔补之事例,在史料中多有记载。乾隆四十八年,江苏粮船六帮的三百五十只船,行至鄱阳湖西汉长湖地方,陡遇风暴雷电。该帮刘忠远之船被风吹断大桅杆,打烂船楼,烟囱火星迸出,燃及船上幕篷,引起全船火起。火焰蔓及邻船,致使十七只粮船被烧,损失漕米一万七千三百六十四石,死伤水手及其家属三十一人。[②]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初二日,镇江后帮船六十一只,行至临黄坝下,陡遇狂风骤雨,旗丁薛七襄等漕船六只被风浪冲入大溜。该处波浪汹涌,粮船中有的被刮断大桅杆,有的船身断裂,粮米立时沉没水中。其中旗丁夏永源所在粮船上,淹死副舵一名,薛七襄所在船上淹死舵工之女一人,各旗丁、舵工、水手之行李衣物,尽皆漂失沉没。尽管官员们"目睹情形",认为这一事件"实为可悯",但仍"请旨将该六船漂失米石,令其照数买补交纳"。[③]

其次,粮船水手们收入微薄,漕运又有季节性,水手们俱属临时雇工性质,每年将粮食从南方运往北京称"重运",空船返回南方称"回空"。当时规定,嘉白等帮水手,在重运时,头工给工价银六两五钱,舵工给银五两二钱,水手给银四两。回空时,舵工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④] 雍正年间的米价,苏州一带为每石售银一两。这样计算下来,粮船由南到北往返一次,水手、舵工、头工所得价,仅能购买米五至七石。由于漕运带有季节性,每年有半年时间,粮船水手们无工可做,只得靠外出佣趁来维持生活。罗教、大乘教针对粮船水手这种状况,早在明季就在杭州、苏州一带建造庵堂,作为水手们回空时驻足之处,与老弱病残栖息之所,因而使大批粮船水手皈依罗教、大乘教。据乾隆年间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和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他们在杭州北新关拱震桥一带,分别建立了罗教庵堂,接待年老水手在此茹素诵经,称为钱庵、翁庵和潘庵。因拱震桥一带"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依,该庵遂为水手己业"。[⑤] 后来,随着清代漕运事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长麟折,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十九辑,江西巡抚郝硕折,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③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十九辑,漕运总督毓奇折,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④ 杨锡绂:《漕运则例纂》卷九。

⑤ 闽浙总督崔应阶折,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2期。

业的发展，水手人数不断增加，原有罗教庵堂不敷使用，又陆续兴建了大量庵堂，总数达到70余处。据永德奏："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氏，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嗣因水手众多，续又分有七十余庵。"①各庵还"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②这样，罗教庵堂不仅成为罗教传教与活动的中心，也成了粮船水手们的临时收容所和互助的中心。"每年粮船回空，各水手来庵居住者，每日给饭食银四分，平日仅止一、二人管庵，并无辗转煽惑，教诱聚众之事。皈教之人，有吃斋念经者，也有不吃素、不念经者。"又说："每年粮船回空，水手人等皆有无处佣趁者，即赴各庵寓歇。守庵之人垫给饭食，俟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其各庵借寓之水手，亦不尽归罗教之人。而每年平安回次，则各出银五分，置备香烛素供，在庵酬神。"③罗教庵堂这种社会保障的性质，自然受到穷苦水手们的欢迎。

水手们皈依罗教，当然也有信仰方面的原因。

水手们艰苦的劳动与生活条件，加上命运未卜、生死无定的前途，使他们在精神上需要寻找一种慰藉。罗教、大乘教所宣扬的人生充满苦难，"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只有皈依罗教才能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回归"真空家乡"得到永生等说教，对于苦难中的粮船水手们，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而，纷纷皈依罗教。罗教徒众的增加，庵堂的不断兴建，自然引起了清朝当局的关注。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下令对杭州的罗教庵堂进行清理，并将结果上奏朝廷。李卫奏称："浙帮水手，皆多信奉罗祖邪教。浙省北新关一带，有零星庵堂，住居僧道老民在内，看守其所。供佛神各像不一，皆系平常庙宇。先有七十二所，今止余三十所。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冬日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饭食供给余剩，即留为沿途有事讼费之需。而淮安、通州、京师俱有坐省之人，为之料理。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数以万计。歇店饭铺，不敢容留。若将此等庵堂尽行拆毁、驱逐，则冬月回空各水手，无所依归，反生事端。且细查其故，亦止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齐心，欺人生事，尚

① 浙江巡抚永德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2期。

② 闽浙总督崔应阶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2期。

③ 闽浙总督崔应阶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2期。

无别项不轨之处。”[1]这次清理罗教庵堂，因仅只发现水手们“借此齐心”，尚无越轨行为，加之担心水手回空以后无处栖身，反生事端，故仅拆毁了其中的40余处，剩下的30余所，改称“公所”，不许再奉罗教，只作为水手们临时居住之处。

浙江查禁罗教、清理罗教庵堂一事，波及江苏。江苏巡抚陈时夏在苏州也对当地大乘教庵堂进行清理。查出苏州有闫姓庵一处，守庵人姓沈。并于长洲县拿获闫姓庵堂主毕君甫，及同教之施文斗、李起龙等，俱系扬州人。另有俞庵，亦系闫庵同教，守庵人姓姚。王庵内有王经远，系山东省东昌府人。西来庵内有湖广人陈伯霞，同住者还有李二、杜三，也是扬州人。施茶庵，内有谢金升，系安徽宁国府人，同住者还有徐御苍等。另一王庵内有刘广生，扬州人，同住者还有吴子佩、薛伍，俱系安徽太平府人。再一王庵内住王四海，同住者有丁念先、夏贵生，俱系扬州人。元和县地方还有马姓庵，有袁四海，系山东人，同住者有邵玉，系徽州人。李庵，内住李君赛，南通人，同住者有谷中均、汤明等。龙庵，住有安庆人贵生芝，同住者有王君甫。倪庵，住有周瑞九，山东人，同住者有詹君惠、李世居。刘庵，内住刘桂生，系江苏清河县人。

上述各庵，房屋不过数间，皆供“三世佛”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佛，定期诵经做会，“非僧非道”，皆与粮船水手相往来交结，粮船多以米粮资其食用，粮船水手如有疾病流落者，各庵之人，亦资助其治病及给予盘费。[2] 上述庵堂亦同罗教庵堂一样，具有水手间互济互助的性质。经过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对杭州一带罗教庵堂的查禁与清理之后，未被拆毁的30余处庵堂，虽然表面上改名为“公所”，仅作为回空水手的栖居之地，但实际上，“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而且守庵之人与栖居之水手，不久便又“故智复萌”了。因为这些庵堂本身是靠罗教的组织来维系的，守庵人与水手们如果不信奉罗教，失去了精神力量，就难以对借住之水手进行约束与管理。所以公所实际上仍然作为罗教的秘密中心而存在，继续传播罗教。清朝当局发现这一情况后，于雍正六年再次对罗教庵堂进行查禁与清理。主持这次查禁的漕运总督张大有奏称：“罗教流传日久，各处俱有庵院。而粮船水手入其教者尤多。”故请求朝廷“敕部将罗教名目，严行禁止，永不许私立教门”。雍正七年，刑部奉旨移谘各省督抚，严查罗教。令各府、

---

① 《雍正朱批谕旨》浙江巡抚李卫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② 《朱批奏折》江苏巡抚陈时夏折，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州、县官员，如查出罗教庵堂，即将庵内教首逮捕。奏准后，各省纷纷查办。不久，雍正皇帝认为罗教信徒众多，一味严拿，将会激起事端。急忙于同年九月发出“上谕”，要求于查办罗教案犯时，应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罗教始于明代，流传已久，从教者人数众多。其中有聚众生事者，亦有无知入教者。概严不可，概宽亦不可。惟有地方官随事因人分别轻重。生事倡首者不可不惩，无知附和者量加宽宏，未有尽行解京之理。”①雍正五年李卫在浙江查禁罗教时，牵连到了罗梦鸿的七世孙罗明忠。雍正七年，清廷因罗教屡禁不止，遂将罗明忠逮捕。福建巡抚刘世明曾对罗明忠亲加审讯，并将审讯结果上报朝廷。刘世明奏：“据罗明忠供：我们教内所有的人：永平府石佛口有个王道，也念罗经，因他们另立一教，名为少无为教。山东登州府米家庵住的孙洪载，浙江杭州府城外翁姓庵住的汤白菜，钱姓庵住的廖本元，潘姓庵住的‘钱串子’冯志伟，保定府王姓庵，天津州独柳村李姓庵，正定府富城驿徐姓庵，苏州府北关闫姓庵，涿州占姓庵。再，将我发到宁古塔，在厢红旗五日一次点卯，只见过我们教内滕进禄一人……”②与罗明忠同案受审者，也供出各地罗教庵堂的情况。孙一先供：“同教所有，河间府交河县靳家庄施茶庵内住的孙聚之，东安县董庆村茶棚庵内住的王九道，杨村河东里地方塔圈内住的李道。又东安、武清地方塔园内住的张四道，保定府东关无为庵内住的罗廷还等。”夏义供出罗教内还有两个福建人，一个姓万，一个姓王，曾到北京德胜门内罗教庵堂内请经。③ 同案之张维英对罗教内部情况也曾述及：“此教是罗明忠的祖上罗成就在正德年间传下来的，封为无为教，诵的是一部《苦心(功)悟道经》，吃斋点烛。”④罗教同粮帮水手的结合，逐渐形成一个既带有教门特点，又带有帮会性质的团体。虽然这时尚未出现青帮这一名称，不过可以说这种组织，已经是青帮的前身了。这个组织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教规。教首对水手有奖惩处置之权。“各帮粮船，舵工、水手各立教门，多收门徒，结为死党。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⑤雍正五年十一月，江淮卫七帮水手严

① 《上谕档》雍正七年九月廿六日内阁奉上谕。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福建巡抚刘世明折，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

③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福建巡抚刘世明折，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

④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福建巡抚刘世明折，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

⑤ 《抄录刑部咨文》，载《史料旬刊》第2期。

会生，因不服教主刘把式管束，被割去左耳。据奉刘把式之命执行这一使命的赵玉供称："我系江南庐州府人，在金衢所帮当水手。刘把式是我师叔，与我已故师父同罗祖教的刘把式，因他干儿子严会生在孟有德船上持斧砍人，又诓了工价银逃走。刘把式告诉我说，你与他们的船相近，我求你管着严会生。他若再来吵闹，你就打折他的腿，不然割了耳朵羞辱他。后来，我看见严会生同孟有德吵闹，我将严会生唤去骂他时，他与我打架。我拿刀子将他左耳割去。"①

经过雍正五年、七年两次查禁之后，罗教并未被禁绝，而是继续在粮帮水手中秘密传播。不仅罗教本支如此，罗教系统的大乘教，也以苏州为中心，建立庵堂，作为粮帮水手们的驻足之所。乾隆三十三年，清朝地方官员对苏州城内的大乘教庵堂进行了查禁，江苏巡抚彰宝在办理此案时奏称：

"苏州城外访出久经奉禁之大乘、无为二教经堂十一处，拿获管堂人朱文显、傅浩然、闻汉公、陈文高、姜汉如、鲍士凤、郭肇中、周士华、胡士英及僧人性海等，共计师徒工伙住宿各犯七十余名。该管堂之人，非僧非道，藉称各有宗派，开堂施教。平日茹素诵经，招徒传授，并与无籍水手往来存顿，非仅煽惑本地愚民，更恐与外海驾船之人勾引为匪，潜滋不法。""细加根究，据该犯等坚供，堂内居住之人，各系年老残疾。""伊等原系驾船出身，年老无依，赴堂入教。现在所传徒弟及招接入教人等，仍系粮船水手及内河驾船之人，并无与外海水手往来。"地方官经过搜查，发现庵内所诵经卷，多属"罗教所传"，"名为苦工悟道、破邪开心、还源报恩等项"。这次在苏州查办大乘教，查出经堂六处：

削筋墩经堂。原为康熙十六年徐士鸾所建造，有房八间。乾隆四年时，由朱文显拜许士斌为师，入教吃斋。许士斌故后，即由朱文显接管，到乾隆三十年，管庵人已经历三代。

陈姓经堂：亦称南堂，由陈文高掌管，康熙三十九年由周元甫买地建造，有屋十四间，传徒张华霄。乾隆十六年，陈文高拜张华霄为师入教。张华霄故后，传与陈文高接管，管堂人到乾隆三十三年已历三代。

姜姓经堂。由姜汉如掌管，亦称"北堂"，康熙五十二年由盛姓所建，有房二十一间，传徒陈聚升。乾隆二十一年姜汉如投拜陈聚升为师入教。陈聚升故后，传与姜汉如接管，管堂人也换过三人。

① 《抄录刑部咨文》，载《史料旬刊》第2期。

在以上经堂中，陈、姜二姓经堂与其他三座经堂，都是从削筋墩经堂分出来的。这六座经堂，俱属罗教系统之大乘教。据管堂人朱文显供称："平时有各处驾船水手入教往来，每至堂住宿，给与香钱，多寡从便，惟驾船外出回空时，助银数两及钱数不等，以作堂费。其中有老病无归者，即留堂长养，死后代为埋葬。"①看来，苏州大乘教庵堂同杭州罗教庵堂在性质上完全一致。

另外，当时在苏州还有四处属于无为教经堂：

西来庵经堂。系僧人性海掌管，康熙五十三年傅姓建造，有屋八间。先传与陈楚芳，乾隆四年间，性海投拜陈楚芳为师入教，陈楚芳故后，递传至性海接管。

马庵经堂。由郭肇中所管，康熙六十一年马姓买地建造，有屋十九间，传与李翠庭，后转授与高聚功。乾隆二十四年郭肇中投拜高聚功为师入教。高聚功故后，由郭肇中接管。

闫庵经堂。由胡士英掌管。

楼下庵经堂。由鲍士凤掌管。

以上二经堂掌管人俱系钱有恭之徒，于乾隆二十二、二十三年拜钱有恭为师入教，分住二堂。马庵、闫庵与楼下庵三堂，与性海所管之西来庵，俱称无为教，亦系罗教支派，系罗梦鸿之女佛广与婿王善人所流传。② 朱文显所奉之大乘教，系属北边郎姓一支，传与衡水张姓。以前张家湾有大乘经堂，分至南边，为另外一支。性海所奉之无为教（大乘教），则系先由淮安钱姓传至凤阳闫姓，又递传至苏州，最后传至性海。

上述无为教经堂，皆奉罗梦鸿为始祖，属罗教系统。教内规定，每年冬至，在教之人皆齐集堂内，将传下经卷诵念礼拜，每人各出银一钱及七八分，作为买备斋供之用。教徒平日吃斋修行，初入教者须交银一二两，作为拜师之资。在上述大乘教、无为教庵堂内居住者，有王志兴等 31 人。俱系归教吃素，随同念经。另外还有梅起桂等 6 人，俱系年迈残疾之人，因贫无所归，被经堂所养，长住堂内。还有王文元等 43 人，俱系驾船为生。因粮船减存修造，闲空歇业，而各经堂又不收取房租，只收饭钱，因而来堂暂住。"遇有生意，仍各弄船他往，均

① 《朱批奏折》江苏巡抚彰宝折，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② 江苏巡抚彰宝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载《史料旬刊》第 15 期。

非入教之人。"①

苏州大乘教堂在查办过程中，又牵连到杭州的罗教庵堂，使这里的罗教庵堂也再次遭到查禁。西来庵的僧人性海当时供出"杭州孔圣桥有钱庵、翁庵、潘庵，亦系罗教"。② 浙江省地方当局闻知此事，遂在杭州进行核查，但杭州并无孔圣桥之名，仅查明在头道巷内有钱庵，宝善桥有翁庵，司马渡巷有潘庵。搜查结果，发现三庵"俱系尼僧"，所供神灵乃如来等佛，所藏经卷亦系佛教的金刚、法华、观音等经，并无罗教经卷。九月初三日，终于在杭州北新关外拱震桥地方查出"不僧不道庙宇十余处，俱系供奉罗教、罗经之所"。经搜查，发现罗像二轴，罗经三箱，并在刘庵内查获罗经七部，在老庵、万庵、王庵及清凉庵等处搜获罗经五十余部。这一事实表明，杭州拱震桥一带的罗教庵堂，虽经雍正五年、七年两次查禁，但因该庵堂中有一部分仍以公所名义保存下来，因而使罗教仍然在漕运水手中秘密流传，以致到乾隆三十三年时，又有大量罗教庵堂及罗教经卷、图像被发现。这次查禁罗教，清朝当局不仅对罗教庵堂进行了彻底清理，并将庵堂全部拆毁，使罗教庵堂受到致命打击。当时清查出来的罗教庵堂计有以下一些：

李庵。查获罗像二轴，罗经三箱。

刘庵。查获罗经七部。

老庵。即钱庵，是明季钱姓所创立，雍正年间查禁后，又逐渐恢复。因年久遂称为老庵，守庵人为朱光辉。

万庵。即翁庵，也是明季建立，雍正年间被查禁后，又由万姓改建，故又称为万庵，守庵人为唐潮。

王庵。即潘庵，也是明季所建，雍正年间被查禁后，因由王姓改建，故名王庵。

另外，还有从钱庵中分出来的一些庵堂，有刘天元住的李庵，丁天祐住的刘庵及陆云庵、八仙庵、滚盘珠庵、李庵、周庵、闫庵、石庵等。从翁庵中分出的有：杨钦所住的刘庵、李应选所住的李庵、周成龙所住的王庵及章庵、黄庵、虞庵、彭庵等。从潘庵中分出的有：高万成住的清凉庵，丁文学住的王庵，张国柱住的刘庵。其中清凉庵创建于明代天启年间，原属佛教禅宗，后因无僧尼居住，由附近

---

① 江苏巡抚彰宝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载《史料旬刊》第15期。

② 浙江巡抚永德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2期。

民人姜汉文在内看守,姜汉文故后即空闲。后有直隶人高万成流落江苏,于乾隆二十七年拜苏州盘门外陈文高为师入大乘教。乾隆二十九年,姜汉文之弟姜汉如告知陈文高清凉庵空闲,陈文高即将高万成送入清凉庵居住。[1] 清政府在乾隆三十三年查禁罗教庵堂过程中,吸取了雍正年间的教训。浙江巡抚永德最初奏请仍沿用雍正年间成例,把庵堂改为公所,以便使回空粮船水手得以暂时栖居。乾隆皇帝指出,此奏"未尽妥协",认为:"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智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如沿用前法,则"数年之后,查察稍疏,伊等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至于回空水手的栖止一事,则"不必官为筹划",令其自寻出路。并谕令永德等地方督抚官员:"除将本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庵堂,拟概行拆毁,毋得仍前存留,复贻后患。"[2]浙江巡抚永德接此谕旨,即令藩、臬两司,将北新关外查出之罗教庵堂共二十三所,"概行拆毁",拆下之料物及地基,逐一估价,造册报部,"留充地方公用"。[3] 经过这次打击,杭州的大乘教、苏州的无为教被彻底摧毁。从此罗教经堂便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设有经堂之粮船,称"老堂船",继续作为罗教之活动中心。

(二)罗教、大乘教在各地的传播

早在康熙年间,罗教(包括罗教系统的大乘教、无为教)已传至广东。康熙年间有不明籍贯之云游道人柯养会,"素习罗教,又名大乘无为教"。他来至广东乐昌县琵琶山,建造洞头庵,招徒传教。柯养会故后,其徒黄国征于康熙四十八年在广东乳源县另造"乐成仙经堂",传徒黄岳贤,黄岳贤又转传刘可嘉。刘可嘉又传徒王万宝、杜清漠、余成学等。杜清漠又招徒张梅魁、廖云际、刘绍章、邓观连四人。余成学又传徒朱玉亮,均在乐成仙经堂习教。

至乾隆十三年正月,有江西人萧文士来至该堂画神像,并携有"护道榜文"一张。刘可嘉见榜文内容系崇奉罗教之词,即令萧文士照抄一张,交给杜清漠裱画,然后转交真武阁的李海云收藏。刘可嘉故后,杜清漠自恃对所习罗教深得奥妙,便自作经文十七卷,于乾隆十四年正月内携赴湖广,欲寻访有道之人,

---

① 闽浙总督崔应阶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2期。

② 《朱批奏折》浙江巡抚永德折,所载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上谕"。

③ 浙江巡抚永德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2期。

就正所学，旋于武汉被捕。杜清漠原名杜清磨，系广东省韶州府乳源县武阳都芦溪乡人，父母早故，弟兄四人，杜清漠行四。他自幼读书，后因患黄肿病(肝病)而从其表兄刘士林即刘可嘉信奉罗教，又名大乘无为教。乾隆十四年初，杜清漠计划前往北京，欲奏请清廷将罗教定为合法宗教，并将罗教"真经"颁行天下，以"普度众生"，然后他本人即剖腹自杀以殉，到西天"成佛"。他于同年正月十二日从家乡起程，只携带五两白银作为盘费。先在徒弟张梅魁家住宿一夜，于初三日到达乳源县。二月十八日来到湖广武昌后，被当地官员逮捕。① 受审时，他供认向习罗教，吃素诵经，并供出余学成曾交给他一件《护道榜文》。所诵"罗经"，"说的是罗祖修行得道，劝人吃斋奉佛，并不许扰乱教规"等。经内"画有龙牌"，中间写的是万岁神位。从这些内容判断杜清漠所诵经卷乃是《五部六册》，特别是其中的《苦功悟道卷》。杜清漠又供称，"罗教一人得道可传十人，十人得道可传百千万人"。② 官员从杜清漠包中搜出抄本经卷十六本，经卷总册一本，木图章一块。一面刻有"宝华光陀罗印"，一面刻有"祖孙受禄"四字。据杜清漠供称：凡有吃斋之人作古，念经超度，用此图章盖上祷告，罗祖便替他消悔罪孽。又说："罗祖叫罗杰空，系前明正德年间受过敕封。"③地方官根据杜清漠所供线索，对乐昌、乳源一带的罗教经堂进行查禁、清理，发现该县共有罗教即大乘教、无为教经堂七处：

乐成仙经堂。由柯养会之徒黄国征于康熙四十八年建造，传徒黄岳贤，转传刘可嘉，刘可嘉又传徒王万宝、杜清漠等人。

苏仙堂。即苏仙阁经堂，系朱学文于雍正三年建造，传徒何公仪、朱荣松、何天彩、吴次正等人。何天彩故居，庵房倒塌，何公仪又另至乐昌县毓泉庵修建一楼庵，改名苏仙楼，后有年老无依之毛日先来此就食。

真武阁经堂。系生员何大成之祖于康熙二十六年建造，后延请罗廷章在该堂住持。罗廷章素习罗教，曾传徒李海云。李海云又传徒徐学古，并辗转相传。

紫微山经堂。系邓姓于康熙二十一年所建，延请邓慈济在该处住持。邓慈济亦素习罗教，曾传徒邓连子，并转传饶德风，饶德风又传邓观连为徒。后来，饶德风弃教出外为僧，邓观连便转拜杜清漠为师，传习罗教。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广总督新柱折，乾隆十四年正月十八日。

②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新柱折，乾隆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③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新柱折，乾隆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紫云庵经堂。原系邓连子于乾隆五年建造,招徒叶辰生、叶法灵传习罗教。

琵琶山洞头庵经堂。系道人柯养会所建,后经罗慧仙重建,招徒杜道明、杜道全、张道贤,在该处传习罗教。

选家洞经堂。该处原有倒塌之观音阁一所,康熙六十年由谢三珠重建,招徒朱观祥,传习罗教。朱观祥又转招王连贵、廖石祥等人为徒。

以上七座罗教经堂,俱于乾隆十四年被广东地方官府查禁。[①]

除广东外,乾隆前半期其他地方也有传习罗教者。乾隆十一年,陕西地方官员在陕西省西安西关一带发现罗教系统之大乘教。该教系以丁济顺为首,主要活动是"施舍茶汤"。自称该教系传自山东即墨,祖师为"罗宏梦"。每逢朔望,烧香聚会,以报答天地君亲师之恩。[②] 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地方当局在嘉兴府发现罗教活动。在嘉兴府平湖县境内有刘阿长、王叙山等"设教开堂,诱民入教",名为"罗祖教"。该教先由钟四掌教,后由王叙山掌教,钟四、王叙山皆传自沈广林。凡入其教者,需持长斋,入教者还有刘百叙、王大等人。[③] 沈广林在传教时,规定教徒须于每年正月二十八日,六月十九日,八月十五日三次聚会,拜佛念经。沈广林于乾隆二十年故去,即无人念经。乾隆二十二年正月,钟四又与刘阿长、王叙山等,将佛像、经卷交付毛南高抄写,刘阿长遂成为掌教。在刘阿长、王叙山两家内悬挂佛像,一同诵经聚会。[④] 总之,雍正至乾隆前半期,罗教无论在漕运水手中,还是各地均在秘密流传。

---

①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硕色折,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②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陈弘谋折,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五日。

③ 《朱批奏折》福州将军新柱折,乾隆廿二年八月十六日。

④ 《朱批奏折》浙江巡抚杨廷璋折,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三章　黄天教

黄天教产生在明代中叶，入清以后继续流传，并且由北方传入南方，在浙江处州形成无为教和龙华会即姚门教。在乾隆年间，姚门教又与来自北方的罗祖大乘教和圆顿教融合，形成以吴子祥为首的江西大乘教。吴子祥故后，其弟子何弱继续传教，后被破获，发遣到贵州龙里。他在那里又秘传袁志礼与袁志谦等人，袁志谦又在四川华阳传徐继兰和杨守一，并创立青莲教，成为嘉道年间和晚清时期重要的秘密教门。

一、黄天教的创立

黄天教又称黄天道、皇天教，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出现的一个秘密教门。关于黄天教的创始人，在史料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普明，二是普静。明末秘密教门的宝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把黄天教始祖说成是普静。在该宝卷《天真收圆品第二十三》，讲到明末诸教门始祖时称："黄天教，设宗门，度下儿女。黄(普)静祖，领皇胎，皈依佛门。"①明末另一部宝卷《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也写道："有静老祖在顺圣县里，留下一百零八经，设立黄天法门，度下善人，念佛出苦，同赴龙华三会，不违善愿也。"②清康熙年间黄天教的经卷《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则把黄天教创始人写作普明。该宝卷卷一写道："普明禅师在膳房村烧丹炼药，九莲池脱胎换体化未来皇极之位，老祖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岂非圣翁圣母也。"③又说："普明禅师传流三元了义，普度九十二亿人缘。"④在《太阳化混元朝元归一品第四》中又写道："普世间诸佛谁

①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贞集，卷四。

② 《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前言部分。

③ 《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载《宝卷初集》(七)，第12页。

④ 《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载《宝卷初集》(七)，第152—153页。

为主？普明佛偏知会群星。天地精月，乃后天气，老太阳原是个诸佛得主，老太阳原是个开天祖，诸佛的总领袖。"[①]在《太阳化真空空性如来归一品》，还提到"虎眼禅师"即李宾："说真空空性如来，乃浑然之说也。况空乃万里长空，真者是日月法相。真空二字相连一处，所以难明。虎眼禅师恐误后学，故谓程冉二大贤人说，太虚中有三光在上，后天管夜，先天管昼，群星过度，共为真空。"[②]在普静与其弟子所撰《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也写道：普静"父母早亡先归空，自幼持斋向善拜师真。普明老祖传心印，九年功满性归宫。"又说："普明佛，戊午年，传通大道。壬午年，功行满，早去归宫。"[③]鉴于《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和《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皆非黄天教自己的经卷，尚不能据此认定黄天教乃普静所创立。而《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乃是黄天教本身的宝卷，特别是《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乃普静与其弟子所撰，[④]故可以断定黄天教乃普明而非普静所倡立（关于普静及其在教内的地位，我们将在后面详述）。不过，问题并未就此解决。清道光年间曾任直隶巨鹿知县和沧州知州的黄育楩在所著的《续破邪详辩一卷》中称："无为祖即普明，名李升官，曾著《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⑤]李世瑜先生据此认为，"明代无为教祖普明名李升官，今日黄天道道祖名李宾，两者不同，我断李宾之名一定是错传。因为这个名字的来源是由于膳房堡志明和尚修庙时发现一块石碑上刻李宾的名字，便说这就是普明祖的墓碑，且在碑阴伪刻字体不同的普明祖三个字，所以根本是不可靠的。"[⑥]

为了弄清黄天教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李宾的身世、经历，笔者不仅查阅了清代档案史料及相关文献记载和黄天教内的经卷，还亲自到河北省万全、怀安、阳原等地作了实地考察，走访了当地老人与学者，查阅了当地政府保存的档案。现在根据这些资料，探讨以下问题：

关于李宾的出生地问题。

现有史料中，对李宾的出生地有几种不同说法：

---

① 《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载《宝卷初集》（七），第115—116页。

② 《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载《宝卷初集》（七），第119—120页。

③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卷上，第13页，普济善书流通处。

④ 王见川：《黄天教前期史新探——兼论其支派》，载《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⑤ 《清史资料》第3辑，1982年，第82页。

⑥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30页。

李世瑜先生曾于1947年夏，对黄天教、一贯道等进行了为时一个半月的实地考察。考察范围包括今河北省万全县的南部、怀安县的一部分及张家口市，经过了92个村庄，不仅发现了李宾夫妇的塑像，寺庙的壁画，而且看到了有关记载李宾生平的墓碑。该墓碑正面刻有以下文字："明故高祖行三李公讳宾之墓"，右面刻有两行小字："祖原籍万全左卫后揆兑本堡。"①不过，当地人传说普明是"万全本地的人"。

日人泽田瑞穗所藏《虎眼禅师遗留唱经卷》（简称《唱经卷》）中有以下记载："普明乃北鄙农人，参师访友，明修暗练，悟道成真。性入紫府，蒙玉清敕赐号曰普明虎眼禅师，设立黄天圣道，顿起度世婆心，燃慧灯于二十四处，驾宝筏于膳地宣云，遗留《了义宝卷》清净真经。"另外还有如下记载："古佛耶（爷），上牛村，地名兴宁，然后住在膳房村。""古佛原在上牛村，次后住在膳房村。木虎年中明大道，南岸荷叶北岸生。"②

喻松青认为，"根据以上经文，可得知普明是宣化府南兴宁口镇上牛村人。"③

马西沙也认为："李宾出生在地处长城脚下的直隶怀安县兴宁口上牛村地方。"④

民国《万全县志》记载，李宾乃是马房州人："明嘉靖四十一年有马房州人李宾来膳房堡，娶许姓女，夫妇修道成真。"⑤

这些记载，互相歧异。为了确定李宾的出生地，我们首先在万全、怀安两县的地方志办公室、县公安局查找万全左卫（今万全、怀安邻近地区）的"揆兑本堡"，可惜皆未能找到。又在万全、怀安寻找"兴宁口上牛村"。但两县有关人员皆称，当地没有"兴宁口上牛村"这个地名。后来我们又邀请到当年修地方志的学者和一部分老年人，开调查会，请大家回忆有无兴宁口上牛村。大家众口一词地说，本地确实没听说过"兴宁口上牛村"。我们又请大家回忆，本地有无"马房州"？许多阳原县籍的人回答说，阳原县桑乾河北岸一带，有二马房、三马房、

---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15页。

② ［日］泽田瑞穗：《增补宝卷之研究》。

③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

④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4页。

⑤ 民国《万全县志》卷七，政治・建置。

五马房、东六马房、西六马房、七马房、八马房，通称马房川”。那么，民国《万全县志》上所说“马房州”是否即“马房川”，值得考虑。

在《普明古佛遗留八牛宝赞》中提到：“七祖普明姓李，居住牛角堡。八祖普光姓王，居住狮子村。”那么，牛角堡又在何处呢？我们在当地政府档案中，得到了一点线索。50年代一位黄天教（当时称“黄会）史姓教首的谈话记录中提到，教内相传，普明原籍是“怀安县牛家堡人”，父亲名叫李用，母亲姓王名琳，王琳娘家是怀安县狮子村人（一说狮子沟村）。牛角堡是否就是牛家堡呢？也许是角与家在当地读音相近所致。但在怀安却找不到“狮子村”，后来当地人告诉我们，在张家口市东北的崇礼县，有狮子沟。也许狮子村便是狮子沟村，当地是山区，称某某沟的地名甚多，为了简便，便称“狮子沟”为“狮子村”。可是，狮子沟村是在崇礼县而非怀安县，史料中并无李宾夫妇是崇礼县的记载，故此说并不可信。如果说李宾夫妇都是怀安人，又与墓碑记载相矛盾。总之，迄今为止，我们对李宾的出生地，尚难以作最后结论。只能大体上确定在今怀安、阳原一带。

关于李宾的生平事迹。根据《佛说利生了义宝卷》的如下唱词，可以得到一些了解：“普明佛，为众生，投凡住世。化男身，姓木子，四十余春。娶王门，为结发，开花二朵。长嫂康，次嫂高，两氏夫姻。有如来，再不知，已为佛体。边塞上，受尽了，苦楚官刑。戊午年，受尽苦，丹书来招。大开门，传妙法，说破虚空。”[①]可知普明姓李，活了40多岁，娶妻王氏，生有两女，一嫁康氏，一嫁高氏。但民国《万全县志》却说：“就耆老传闻，明嘉靖四十一年有马房州人李宾来膳房堡，娶许氏女，夫妇修道成真，号曰普明，葬于碧天寺内。后寺宇为官家所毁，仅存佛像，经该堡许姓迁佛像于其家。”这段记载虽出自“耆老传闻”，但对照档案记载，却有一定的真实性，如称李宾号“普明”，死后葬于碧天寺，该寺于乾隆二十八年被毁等，皆与档案相符。[②] 唯称普明娶许姓为妻一事，则与档案及该教经卷的记载不符。档案虽提到“许姓”，但称许姓仅在膳房堡居住和“接待”来明光塔（李宾夫妇葬处）上坟之人，而称李宾之妻乃“王氏”。[③] 中国台湾学者王见川认为，民国《万全县志》有关李宾娶许姓为妻一事，“可能是活跃于碧天寺附近

① 《佛说利生了义宝卷》，《戊午开道普明如来归宫分第十三》。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许姓教友所传"。[①] 这一推测不无道理。我们在万全、怀安、阳原一带调查时，看到了教内人士的谈话记录，也称李宾系娶许姓女为妻。当地民间传说，李宾7岁来到万全县膳房堡，被该村财主许姓收养，后招为女婿。[②] 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呢？我们从调查中得知，如今在膳房堡村中，有一半以上村民姓许。当地一直流传着许多有关李宾为村民做好事的传说故事。如他为当地村民祈雨，解决因干旱无法播种的困难。又传说一次春耕大忙时，他用十几个化身，同时为十几家人耕地等。当地有的老人至今仍称李宾为"普明爷爷"。教内还传说，普明故后，普佛寺系由许姓家族的许奎掌管。从这些情况来看，李宾娶膳房堡许姓女的传说，很可能是该村许姓家族编造出来的。因为这一传说，在清代乾隆年间尚不存在。乾隆二十八年李宾第八世孙李遐年供称："我是李宾第八代孙，李宾是黄天道教，道号普明，妻王氏，道号普光，同葬一塔。"[③]前引黄天教经卷《佛说利生了义宝卷》也说："普明佛，为众生，投凡住世。化男性，姓木子，四十余春。娶王门，为结发，花开二朵。"说明李宾曾娶王姓女子为妻。直到民国年间重修万全县志时，编纂人员才采访到有关许姓招李宾为婿的传说。我们判断，李宾娶许姓女一事，最早也是乾隆以后才出现的。

关于李宾的生平，我们还可以从李世瑜先生当年调查时在万全县庙宇内看到的有关李宾生平壁画中，得到一些了解。我们在此次调查时，本来计划对万全县有关普明的庙宇再次进行考察，可惜所有有关普明的寺庙全部被拆除，无法见到这些壁画，幸好这些壁画的目录尚保存在李世瑜所著《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一书中。这些目录是：贾贤庄共38幅：1. 十化牛角始诞圣身，2. 运父林母赐名解愁。3. 立春随父移居膳房，4. 亲恐不寿往认师僧。5. 狮林卖地天缘相凑，6. 效力边庭御侮伤目。7. 千手眼佛降丹救难，8. 回心向道化顶求师。9. 洋遇周祖亲传大道，10. 参禅入定运出阳神。11. 再诣化顶传度赵先，12. 性入都斗亲领天轴。13. 头百户屯佛坛大开，14. 修盖三天长生宝殿。15. 演留经典降妖伏魔，16. 李庄谐亮建铁佛寺。17. 创设雨坛广救世人，18. 锄禾显圣无数化身。19. 亲传六候镇服五魔，20. 边役诬害告欠粮草。21. 麻景苦拷富商赔补，22. 大众贤良代祖赔补。

---

① 王见川：《黄天教早期史新探》，载《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54页。

② 万全县公安局档案。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折所附供词，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二日。

23. 粮草补足释放还家,24. 偕众贤良申文谢圣。25. 顺圣生道注成清净,26. 宣阳宝地说妙谈玄。27. 蔚州开道救度皇胎,28. 马房说法宣演大乘。29. 西河度众阴阳乖戾,30. 飞符显圣日月光明。31. 玉敕封镇北天教主,32. 祖师果满腹胯回宫。33. 枳儿岭上说佛剩生,34. 通传皈戒不染瘟疫。35. 广度人缘二十四会,36. 聚众悲泣秘授家堂。37. 静祖掌船续亲大法,38. 五佛果成入圣回宫。

在张贵屯、赵家梁、张杰庄的画传中,除与上述相同者外,还有以下十五条目录:1. 九化朝阳船开真定,2. 菩萨传言令正人伦。3. 后真赵越发誓领经,4. 十经忏成并留钥匙。5. 贤祖接法演留混沌,6. 经成了义救度原根。7. 广昌救旱祈雨救民,8. 老母开法整理传灯。9. 水庄坐道传周九法,10. 演三元偈并留四维。11. 慈悯众生注千佛忏,12. 李景清家入圣回宫。13. 酬恩谢圣岁大有年,14. 功圆果满七七回宫。15. 怀安化度善男信女。①

将上述目录与档案史料、地方志记载、民间传说及实地考察的资料相对照,可以对普明生平作以下推论:从贾贤庄的第1幅画传目录"十化牛角始诞圣身"可知,李宾是出生在与"牛"字有关的村庄,《唱经卷》所载"兴宁口上牛村",既然在当地找不到,教内所传李宾是"怀安县牛家堡"之说似尚可信。当地传说中"运父林母赐名解愁"一句,据教内所传,是因为李宾之父名李用,运、用读音相近,李用也可能是李运之误。李宾之母名王琳,李宾乳名叫"解愁子"。壁画中"运父林母",当指父名李用,母名王林,"赐名解愁",即指李宾父母为他所起乳名"解愁子"。"立春随父移居膳房",与教内所传李宾于七岁时随父母从怀安县牛家堡移居万全县膳房堡一事相符。"效力边庭御侮伤目",指李宾应征入伍后,在野狐岭受伤一事,也与教内传说一致。教内称李宾于18岁时应征入伍,在离膳房堡西北仅10余里的野狐岭服役。野狐岭是由蒙古进入北京的必经之路,在今狼窝沟一带。教内相传,李宾在入伍后第四年即22岁时,在一次抵御蒙古族入侵的战斗中,失去左目。"千手眼佛降丹救难",当指他左眼受伤后获得治疗一事。医治好后,他继续服役。"边役诬害告欠粮草","麻景苦拷富商赔补","大众贤良代祖赔补"及"粮草补足释放还家",当指他伤愈后到退役前的一段经历。"洋遇周祖亲传大道",教内传说李宾回到膳房堡后,28岁时与妻王氏开始吃素念佛,曾在万全县地藏寺拜周祖为师,一年后周姓师傅去世,又到观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16—17页。

音寺拜师，一年半后师傅又去世，夫妇二人便来到北天寺（即碧天寺），创立了黄天教，并且编造了"玉敕封镇北天教主"的传说。"顺圣生道注成清静"，是指李宾在顺圣川（顺圣川即阳原县东城，详后）一带著成《清静经》。"演留经典降妖伏魔"、"偕众贤良申文谢圣"、"枳儿岭上说佛剩生"、"李庄偕亮建铁佛寺"，"通传皈戒不染瘟疫"、"创设雨坛广救世人"、"宣扬宝地说妙谈玄"，皆指李宾在怀安、万全一带进行传教和慈善活动。"广度人缘二十四会"，是指李宾亲自所传的二十四个黄天教的分支。最早的二十四会会首在《普明遗留考甲文簿》中有所记载：万全右卫会主左天成，吴家庄会主陈聚虎，洪庙儿会主蔡岳，张贵屯会主陈田武，孔家庄会主吕景清，杜家庄会主杜时羹，膳房堡会主王世英，新开口会主郭淮，头白户会主郭子清，七马房会主刘宝，岳家庄会主秦正，百岔沟会主牛胜，李怜庄会主李朝，窑子沟会主赵越，胡家庄会主杨的宽，蔚州城会主杨瑗，潮淘里会主田忠，孟积岭会主周云，芦子沟会主陈明，广灵县会主赵花，皂里洼会主彭景，辛庄儿会主席中朝，吉家庄会主张添库，宣府城会主李汉英。[①] 直到20世纪50年代，黄天教仍分为24个会，每个会又分为8个分会。[②] "蔚州开道救度皇胎"，是指李宾到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传教之事。"马房说法宣演大乘"，是指李宾在马房川（今河北省阳原县境内）进行传教活动。"静祖掌船续亲大法"，指普明、普光故后，由普静继承教主，接续传道。"贤祖接法演留混沌"，指普静之后，又由外孙女普贤接续传教。"怀安化度善男信女"，指李宾在怀安传教的情形。"五佛果成入圣回宫"，指李宾一家五口皆成正果之事。总之，将当年万全县存留的庙宇中有关普明的壁画，结合档案、实地考察的资料，可以大体上了解普明一生的事迹。从清档可知，普明生前通过传徒，聚敛到大量财富，因而才能修建高达十三层的"明光塔"，作为葬地。

我们在万全怀安一带考察时，看到当地迄今仍处于贫困状态，属于河北省的贫困县之一。当地自然条件较差，干旱少雨，无霜期甚短，一年中只有180天。明代这里的贫困程度，更可想而知。李宾在这样一片贫穷的土地上传播黄天教，确有其有利一面，如人们渴望得到温饱生活，期盼风调雨顺，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只能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庇佑。李宾为百姓做好事的传说，便反映了群众的愿望，该教也就藉此神话得以在当地广为流传。从李宾夫妇生前

---

① 引自王见川：《黄天道前期史新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

② 见万全县公安局档案。

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明光塔"一事,不难看出黄天教在敛钱方面是如何凶狠。

关于李宾创立黄天教的时间,尚有不同看法。喻松青根据《佛说利生了义宝卷》中的记载:"癸丑年,遇真传,说破玄关,卯酉之功。""青虎年,古镜明","木虎年,古镜明"。认为李宾创立黄天道是在"虎"年。虎为寅,即甲寅年,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经文中"当阳佛,埋名千年无消耗,青虎年中,古镜当空照。"当阳佛是指李宾,他在《佛说利生了义宝卷》中,就自称"当阳佛"。经文中"普明如来东华主,青莲菩萨相伴你,道从此年出,黄天圣道有谁知,拜名师指与你先天理。"可与上述甲寅年创道说相印证。并认为经文中"癸丑年,遇真传。"癸丑指嘉靖三十二年(1553),普明遇名师指点,并于次年创立黄天道。① 王见川则认为:"对照《佛说利生了义宝卷》的相关记载,《唱经卷》中言及普明"戊午年说根源"一事,可能是指普明在戊午年开道场说法。《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也说:"普明佛,戊午年,开荒下种。"显然,戊午年(嘉靖三十七年,1588)才是黄天道正式开道之期。但是,普明在戊午年正式开道说法,并非意味着黄天道创于此年。早在甲寅年普明就已领悟大道。《唱经卷》说:"木虎年中明大道。"《佛说利生了义宝卷》也说:"道从年(甲寅)出,道从此年出。"所以,"嘉靖三十三年确实是普明创立黄天道的日子。"②马西沙则认为普明创立黄天教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于驻守长城生活艰苦,环境孤寂,宗教气氛应运而生。大概这时开始求道访真。他孜孜以求,数十年走访名师,后来到直隶怀安卫顺圣川,其地位于桑乾河北岸。癸丑年在顺圣川狮子村得遇明人,说破玄关卯酉之功,即教给他修炼内丹的方法,到了第二年即所谓木虎年即甲寅年他修成了内丹,又称金丹。"故认为"黄天教的创立应从他得遇真传之日算起,即嘉靖三十二年。"③我认为癸丑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李宾"得遇真传"一事,尚不能作为他开创黄天教的时间。从教内传说可知,李宾先后拜过两位师傅,一位是地藏寺的"周祖",据《普明古佛遗留灵符真宝经》所云:"普明传法是何人?你怎么修炼来?传法是周祖玄云,传与我卯酉香公。"④这位周祖便是周玄云。另一位是观音寺

①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122页。

② 王见川:《黄天道前期史新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

③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4—415页。

④ 转自王见川:《黄天教前期史新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

当地师傅，大约是该宝卷提到的曾传他五戒的赵玄越。从秘密教门的一般情况来看，拜师并不等于创立新的教门。《佛说利生了义宝卷》所说："普明如来，投凡住世，失迷真性，自己也不知，是古佛发现。当时在世，有身必有苦，曾受苦无数得苦恼，受尽苦楚，后有天人来请，始得道。乃果位因缘，遂将其真天大道，归家大事，细传后人，使后人个个成了真道，人人返本还源。传说已毕，骤然锻炼五方，弃舍凡体，割碎身心，供养诸佛龙天，其一点真性，径入空王殿，转都斗，参见原身去了。"又说："戊午年，开道场，普明佛，归本乡，身体舍弃在龙天上。""戊午年，受尽苦，丹书来召。大开门，传妙法，说破虚空。"[①]从这段经文可知，普明确实是在戊午年创立了黄天教。另外从《普静如来钥匙宝卷》所说："普明佛，戊午年，通传大道。""普明佛，戊午年，开荒下种。"[②]这些，也说明黄天教确实创立在戊午年即嘉靖三十七年(1588)。

关于李宾的生年，以往的史料中尚无记载，我们在调查中，看到20世纪50年代教内信徒的谈话记录，称"普明爷爷出生在明正德八年"。在没有其他说法之前，尚可备此一说。李宾去世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马西沙根据《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壬戌年，功行满，早去归宫"，认为李宾死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但根据《唱经卷》中"癸亥数尽甲子"一语，又可知李宾死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不过，李宾死后并未立即安葬，而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安葬的。[③] 王见川根据《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和普明碑文记载，也同意此说。[④] 而喻松青则不同意嘉靖四十一年(1562)说。她认为，《众喜粗言宝卷》虽然称李宾于嘉靖四十一年圆殁，但该宝卷乃道光时的作品，距明代嘉靖为时已久，难免失实。而李宾碑文则"有伪造痕迹"，也不可为据。因此，"唱经卷中戊午年归宫之说，可作定论"。因为，《唱经卷》中有"壬戌初起，大叫一声"一语，"大叫一声"绝非圆殁，而是另有所指。[⑤] 我认为，从《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众喜粗言宝卷》及李世瑜所见李宾墓碑来看，李宾去世时间，当以明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十一日之说为可

---

① 《佛说利生了义宝卷》，《戊午开道普明如来归宫分第十三》，载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

②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蕴空妙法第十六》。

③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5页。

④ 王见川：《黄天教早期史新探——兼论其支派》，载《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⑤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信。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的材料称普明死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可能不确。

二、黄天教的传承

普明故后,黄天教的教主地位由其妻普光继承。不过,普光最初并未得到教内正式认可,只是“暗传”,7年以后她自称“悟道”,才正式接掌教权。其后黄天教便认可了她在教内的地位,称她为“普光祖”。普光的籍贯有两种说法。喻松青认为普光是“狮子村”人。“普光姓王,隆庆三年己巳(1569)受普明暗化,传道七年,设法七十二套,传徒七十二贤人。万历丙子(1576)殁。”可见她是狮子村人。《唱经卷》中“狮子村,遇明人”,即普明遇见了普光,两人结为夫妻。并认为《佛说利生了义宝卷》所称颂的“狮子尊者”,便似指普光。该宝卷还多处提及当阳佛居住狮子宫,便反映了普明、普光与狮子村的关系。[①] 这一说法得到《众喜粗言宝卷》的印证。“普光佛,狮子村人,得普明暗传,隆庆三年己巳说法,传正法眼藏。万历四年丙子回宫。”[②]王见川则根据《普静如来钥匙宝卷》,认为普光出生在顺圣县。又根据《普明古佛遗留灵符真宝经》所云:“先生普光佛在于何处? 甚么年降生,甚么年传的法。壬午癸未降凡间,度众生无边无崖。”认为普光生于嘉靖元年(1522)或二年(1523)。于己巳年(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通传妙法”,丙子年(万历四年,1576)“归空”。[③] 普光故后,黄天教分为两支继续流传。一支由普静接掌,普静之后,又传普善即汪长生;另一支由普光传给她的女儿普净和普照,普照又传给女儿普贤。李世瑜先生当年调查时,发现黄天教供奉五位神,即普明、普光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大女儿普净,二女儿普贤,三女儿圆通。[④] 而《众喜粗言宝卷》中又提到“普静”,普静又著有《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以致有人把普静与普净混为一人。此事已由喻松青加以辨明,普静与普净实为两人。普静姓郑,号明钟,字光祖,是男性而非女性,有弟兄三人。[⑤] 他便是普明、普光以后黄天教的重要传人,以致明末宝卷《古佛天真考

①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② 《众喜粗言宝卷》卷五“续化儒门”。

③ 王见川:《黄天道前期史新探》,载《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9页。

④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15页。

⑤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

证龙华宝经》和《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皆把普静称为黄天教始祖,这显然同明末普静一支黄天教势力大增不无关系。大量资料表明,普静仅仅是李宾和普光的继承人,是黄天教的教主之一,并非黄天教创始人。在《太阳化三普如来归一品》第三十五写道:"说三普者,普明、普光、普静。三普者,昼夜常明,普照四大神州,度化群迷,诸佛万祖,都在光中所现,此乃万神灵宝聚会之乡。"《中国民间宗教史》将此段引文误作《太阳化现无愚宝月如来归一品第十五》。[①] 我们从李世瑜当年调查时所见万全县贾贤庄普明佛殿内第37幅壁画《静祖掌船续亲大法》中判断,普静乃是普明以后的掌教人,而非创始人。在普静及其弟子完成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有两处提到普静生平。在《钥匙佛如来开七宝妙诀分第十二》写道:"钥匙佛,传宝卷,亲临降世。丙戌年,九月内,性下天宫。转在了,邑奠城,埋没真性。吃五谷,养佛性,随类化生。"[②]在《钥匙佛如来开蕴空妙宝法第十六》又说:"普静佛,戊寅年,临凡降世,丙戌年,九年满,转化三清。钥匙佛,开天地,从来降世,罗罗,转化在,邑奠城中。"[③]文中"戊寅年,临凡降世"并非指普静出生在戊寅年即万历六年,而是指这一年他开始行教,因为他不可能在万历丙戌年即万历十四年便"归空"了。我们从《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也可得知普静是普明、普光的继承人:"三佛绪度钥匙卷者,三佛钥匙也。普明佛,钥匙一十八把,普光佛,钥匙一十八把,普静佛,钥匙一十八把,共合钥匙五十四把,宝卷五十四分。"[④]普静在谈到自己经历时说:"贫子自幼心慈向善,学好持斋,别开拔苦之门。父母早亡,耽误训教,半字半识,自守本等,不受非财,丝毫不染。幸遇普明、普光老祖,天法施现,顺度在俗。""贫子受三皈,持五戒,对天发宏愿大誓","戊寅年,天性尽开通,普光祖,三周续度普静僧。"[⑤]在《钥匙佛如来开内外五行分第五》也说:"弥勒佛,拨开得乾坤转,三元圣祖,三心一转,普明、普光、普静,现收元了道进朝元。"这些都说明普静是普明、普光的继承人。关于普静的籍贯,有三种说法,一是《众喜粗言宝卷》称他是昌平州顺义县人。在《众喜粗言宝卷》卷五"续化儒门"的注文中提到:"普静佛,顺天昌平州顺义

---

①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9页。

②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卷上,第22页。

③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卷上,第29页。

④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序》卷上,第2页。

⑤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序》。

县人，号明钟，字光祖，于万历六年戊寅显圣，十二年吐经五千四十八卷，十四年丙午十一月冬至回宫。”二是《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称他是“顺圣县”人。“有静老祖在顺圣县里，留下一百零八部经，设有皇天法门。”三是他与弟子所写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称：“南瞻部洲一群好贤民，（你怎知道谁人纳贤？）钥匙佛出在蔚罗郡中，（他是哪里人？）北直隶有他家门。（姓什么，谁人？）邑奠城中为姓。（他弟兄几个？）生下弟兄三个。（他父在世不在？）”①说明他乃是北直隶蔚罗郡邑奠城人。此说出自普静与其弟子之手，应当可信。但是，“蔚罗郡邑奠城”又在何处呢？我们走访了阳原县、怀安县一带的老人和学者。他们说阳原县南面是蔚县，又称罗川县，地处山西广灵东面。那么，蔚罗郡是否与蔚县有关呢？《唱经卷》中提到普明：“访名师，数十年，却来到顺圣川，蔚罗辛庄儿重相见。”及“躲离了，广灵往东行，蔚罗郡里化贤人”。《普明无为了义宝卷》也说：“钥匙佛，古弥勒，今朝下界。无后人，为眼目，借假修真。北直隶，有一尊，真佛出现。顺圣川，住在他，蔚罗郡中。”为此，我们又在怀安、阳原一带，寻找蔚罗郡和顺圣川辛庄儿。我们在今阳原县找到了“辛庄子”，当地人呼作“辛庄儿”。据此可知，普明曾从山西广灵县向东来到蔚县（罗川）和顺圣川，并在辛庄儿与普静相见及收他为徒。而经文中所说“邑奠城”则不知何处。喻松青认为《众喜粗言宝卷》说普静是顺义县人，可能是顺圣之误。这一判断，基本正确。不过，她说顺圣川是“桑乾河支流”，则不够准确，实际上顺圣川既是一条河流，又是地名。作为地名，顺圣川位于今河北省阳原县一带，明代属宣化左卫，《明史·地理志》记载：“宣府左卫，有顺圣川，北有东、西二城。东城元为顺圣县，西城元为弘州，洪武中俱废。”洪武以后分别称为“顺圣川东城”和“顺圣川西城”。清代康熙三十一年，巡抚郭世隆奏请将顺圣川西城改为西宁县，翌年，又将东城并入，俱称西宁县。民国初年，改为阳原县。另外，她把“广灵”误作了“应灵”。广灵属山西，在顺圣县即今阳原、蔚县之西，故《唱经卷》中有普明“躲离了，广灵往东行，蔚罗郡里化贤人”之句。“蔚罗郡”究竟系何地，尚难断定，不过，从地理位置判断，大约在今蔚县和阳原县一带。有可能普静原籍是昌平州顺义县，后来到了顺圣县即今阳原一带。“有静老祖在顺圣县里，留下一百零八部经。”这句经文，说明普静在顺圣县一带进行过传教活动。关于《众喜粗言宝卷》称普静

①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卷下，《钥匙佛如来开地涌金莲分第二十一》。

"吐经五千四十八卷",王见川认为是"夸大之词"。因为五千四十八卷乃是佛教大藏经的总数,从现有史料来看,他仅著有《普静如来钥匙宝卷》(据有的学者研究,《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乃普静弟子所撰,详后)。《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所说普静在顺圣县留经一百零八部,应该是指他在那里"遗留"了一百零八部经卷,而非他著有那么多经卷。据王见川研究,普静的弟子共有三人,即张易明、罗睺罗和余腾伦。罗睺罗便是钥匙佛,他后来以"圆顿教"之名继续传教。在《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对"圆顿教门"的含义,作了如下解释:"古佛留下圆顿教,普度众生离凡尘。圆者,十方都圆满;顿者,顿吾(悟)心意明;教者,教人都成道;门者,门人躲阎君。"①在前引《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提到,"钥匙佛,传宝卷,亲临降世。丙戌年,九月内,性下天宫。转化在,邑奠城,埋没真性。吃五谷,养佛性,随类化生。久等着,鸡王叫,天时催动。有春雷,就地响,震动乾坤。张先生,他与俺,为媒作证。展宝卷,逼邪魔,通讲三乘。度惺他,主人公,诸佛大地。亲升俺,诸佛祖,金榜标名。开金船,到处行,普天知道。才显出,圆顿教,清净法门。""钥匙佛,开天地,从来降世。罗睺罗,转化在,邑奠城中。丙戌岁,从续职,三返四换。领僧卷,度九祖,钥匙经卷。""才显出,圆顿真教。"②说明钥匙佛并非普静而是罗睺罗,他继承了普静的教权,并以圆顿教名义行教。不过,罗睺罗并非其真名,而是假托释迦牟尼之子。释迦牟尼出家前,曾与表妹耶输陀罗结婚生有一子,名罗睺罗,他 15 岁出家,后来成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普静的弟子便假托其师名为"罗睺罗",以抬高其身价与地位。

普静这一支黄天教又称圆顿教,该教后来传到江南,由普善即汪长生承袭并转化成"长生教"。在道光年间陈众喜所撰长生教经卷《众喜粗言宝卷》中,讲到长生教的传承。其前六祖乃攀附儒释道三教始祖,并不可信。七祖为普明,八祖为普光,九祖为普静,十祖为普善。"第七光化李普明,广度人缘续人伦。第八光化王普光,隆庆三年法说明。第九光化郑普静,万历十二吐经文。第十光化汪普善,又化儒教学长生。"对于汪普善的身世和经历,《众喜粗言宝卷》写道:"万历三二神光现,衢州西安化汪门。积祖向善汪正义,年庚五十显后英。小名和尚长生号,西湖溪滩儒修行。广度男女三千余,向西归家转云程

①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卷上,第 2 页。

② 王见川:《黄天教前期史新探》,载《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 年,第 50—81 页。

（城）。崇祯十三八月升（生），又托康姜与高清。佛号普善不出家，今人所以俗修身。"[1]从上述经文可知，长生教乃是与黄天教一脉相承的，即由普明、普光、普静再传至普善即汪长生。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崇祯十三年（1640）。从以往研究成果来看，黄天教和普静的圆顿教最初仅在直隶、山西一带流传。那么，汪长生又是如何把长生教传到了浙江呢？喻松青对此作了两种推论：一是，根据崇祯三年刻本《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所说："差我今来度凡尘，东土东方三星地，投胎赵北与燕南，降下汪家为男子，九龙冈上造法船。"说明汪长生原来也是河北省人，后来才迁到浙江衢州去的。二是，明末北方秘密教派如黄天教、圆顿教、龙天教等，皆卷入了天启年间的闻香教大起义。普善在闻香教起义失败后，来到浙江，在衢州创立了长生教。为了逃避追捕，而把过去的历史隐瞒下来，久之，便被徒众认作是浙江人了。[2] 马西沙认为，长生教虽然与黄天教关系密切，但是，汪长生并非普静的亲传弟子，因为普静于明万历十四年就已去世，汪长生当时尚未出生。因此他推测："或是普静曾在崇祯年间在北方学道访真，投拜到黄天教门下；或者是黄天教影响已经到了浙江西安一带，汪长生投入了黄天教门下。"[3]王见川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喻松青的推测并不准确，理由是《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中所说"投胎赵北与燕南"一句，是指弥勒佛而非指"儒童玉佛"，故经文中"降下汪家为男子"一语，极有可能是汪长生派下掺入的。他认为《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的重点，在于宣扬"北儒皇极道"，"北儒"是指普静所传教法，经文中："南儒读书来赶考，吃素归道北儒行"一语，是指"南儒"北上科举时，在京师皈依普静派下，而这个"南儒"即是衔接普静与普善（汪长生）之间的宗教人物。所以，汪长生会成为普静派下，既非如马西沙所言，他曾到北方学道，或黄天道已经影响到浙江西安一带，亦不是如喻松青推测的北人南迁，而是透过南儒，认识普静派下所传教法。[4]

上述推论都有一定道理，但又缺乏确凿根据。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把黄天教、圆顿教、罗教、应继南的无为教、姚文宇的龙华会及长生教间的关

---

① 《众喜粗言宝卷》卷五，"续化儒门九九"。民国己巳（1929），尚德斋主人谢氏重刊本。

②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8—209页。

③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7页。

④ 王见川：《黄天道前期史新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

系，联系起来考虑。应继南的无为教，并非来自罗教而是传自黄天教。明末黄天教和罗教都已传入南方，不过，黄天教的势力远不如罗教。所以，应继南虽然拜卢本师入了黄天教，却自称罗祖转世，假称罗教，仅保留了以普字派名的传统。后来姚文宇又假称应继南转世，也保留了以普字派名的传统，自称龙华会或姚门教。应继南、姚文宇都是打着罗教旗号的黄天教。浙江西安人汪长生，也曾经入过打着罗教旗号的姚门教，并且成为该教第二号教首“清虚”。在《太上祖师三世因由》的《庆元三复》，记载了汪长生的一段经历。“会下有一汪长生，同容南山，众广心高。往龙虎山与张天师会道。见一对联云：信手严提高着眼，此处密地是功夫。因问天师，不能回答。共相讲道谈玄，天师不能及。天师以显法十二部，付于汪长生。汪以单提一着传于天师。张不及信，将要回时，师遣赵公前往各方，分付防魔。岂期汪长生不依师言，另立科规，自言日月岂可并行。”这段记载表明，汪长生是个既有才华，又有野心的人。加上又得到了张天师付给的《显法十二部》，自然更不肯屈居姚文宇之下，甘当一名“清虚”，而是“另立科规”，创立了长生教。我们从汪长生与应氏无为教和姚门教的关系上，终于找到了汪长生和普静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汪长生与普静之间，并非通过什么“南儒”才建立了联系，而是直接从黄天教南传后的应氏无为教、姚门教同黄天教的普静建立联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众喜粗言宝卷》把普明尊为七祖，普光尊为八祖，普静尊为九祖，而把汪长生尊为十祖的原因。实际上不是汪长生背离了应氏无为教和姚门教的教义，而是他回归了黄天教的传统。应继南和姚文宇看到罗教在浙江的势力大于黄天教，便打起罗教的旗号。但是罗教来源于佛教禅宗，而黄天教却接近道教，主张修炼内丹。汪长生正是坚持了黄天教的基本教义，并同当时道教的张天师“讲道谈玄”，得受《显法十二部》，倡导通过修炼内丹达到长生不老，所以是汪长生回归了黄天教。《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所说：“差我今来度凡尘，东土东方三星地，投胎赵北与燕南，降下汪家为男子。”应该理解为汪长生弟子要表明祖师汪长生确实是普明黄天教的传人，而不是表明汪长生是河北人。由普光所传的一支黄天教的教权，传给了她的两个女儿，即普净和普照。李世瑜先生调查时，当地人称普明和普光即李宾夫妇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是普净古佛投胎，二女儿是普贤古佛投胎，三女儿是圆通古佛投

胎。[1] 我们这次调查时，查看到50年代教首的谈话记录，也称李宾夫妇生有三女，称为米姑姑、面姑姑和糖姑姑。死后分别成了普净、普贤和圆通。为了纪念李宾夫妇及其女儿、女婿的生日，黄天教每年要作八次"圣诞会"：十月十一日为普明会，七月二十七日为普光会，三月初四日为普净会，三月初九日为普贤会，八月初六日为圆通会，三月十三日为文义圣真会，五月初一日为武功大真会，三月二十日为颂功大主会。直到20世纪50年代，万全县一带的黄天教，仍供奉普明、普光、普净、普贤和圆通，并无普照。那么，圆通是否就是普照呢？黄天教皆以普字派名，不知为何出现了一个"圆通"？很可能是乾隆以后才把普照改成了圆通。因为清代档案记载称，普明仅生有二女，称为普净佛、普照佛，"次女之女称普贤佛"[2]，并无圆通。此折中的说法系来自乾隆年间李宾后裔李遐年，比之后来传说，当更为可信。所以，李宾夫妇并非生有三个女儿，而是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她们是长女普净，次女普照，普照之女普贤。普贤并非李宾的长女，而是他的外孙女。

三、黄天教的经卷和教义

李宾及其后继者们，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和出于传徒的需要，便以罗教《五部六册》为模式，撰写了不少经卷。据中外学者研究，黄天教的经卷保存下来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俄罗斯莫斯科东方研究所藏有一部，1977年莫斯科东方古代文献丛书，系据明万历二十七年(1594)重刊本影印，俄罗斯学者娥·斯·司图洛娃曾作注及序、索引。该宝卷共有36分，乃黄天教创始人李宾即普明所吐之经，普明生前似未刊行，而是由他的外孙女普贤即米康氏增删后刊刻成书。此书也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宝卷初集》。宝卷刊印者为了迷惑官方和吸引徒众，在宝卷扉页印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和伪造的《御制文》。在《开经偈》中讲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话，来表明普明吐经的缘由，乃是因为"阎浮世界，万类群生无脱苦解恶之方，广有诸邪宗门，假名引道，虚投教典，各立三乘"，以致众生"沉沦苦海"。普明为了度救这些"苦业难逃"的众生，

---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15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钦差大臣兆惠等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才创立"黄天圣道",并"传留心印真诀"即这部《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这部经卷乃是李宾外孙女普贤增删刊刻,所以加进了许多抬高她自己身价的内容。她把自己同普明置于同等地位,"普明如来者,无为了义也。普贤全真大道,千圣不闻,万祖非说,今遇古佛慈悲,指透天真大道。"甚至把自己说成是普明的化身。"无为祖,降中央,说下真经。度人人,只要你,处新用意。发宏愿,离苦海,得种金身。龙华会,圆觉天,普贤化现。"她还把普明与她夫妇,比作如来佛与文殊、普贤二菩萨,"皇极古佛即是普明如来,善财童子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文殊即是大地万类群生真阳之父,普贤菩萨乃是诸佛祖母。"足见其野心之大。在该宝卷充斥着劝人信奉黄天教的说教。"普明宝卷才展开,诸佛万祖降临来。天龙拥护尊如塔,保佑众生离尘埃。"①"无为奥妙,好一个黄天圣道,劝人人返照回光,说与你,西来奥妙,休要。一心常观,定乐淘淘,任逍遥。"②"今时遇着黄天道,人人似此与佛同。古佛原不留空语,弘誓大愿度众生。"③

李宾创立黄天教是在罗教之后几十年,因此,在教义方面深受罗教影响,并对罗教教义有所发展。罗教最初称为"无为教",黄天教也称"无为教",普贤还尊普明为"无为祖","无为祖,降中央,说下真经。度人人,只要你,处心用意。"其经卷亦冠以"无为了义"字样,并宣扬"无为妙法一性空,能生万象众群真。"并且接受了罗教创造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信仰。在《宝月如来分第十》中,造经者劝人入黄天道,以期死后灵魂得以返本还源,见无生老母。"人活一世,不知生从何来,死归何往,拱高嫉妒,贪爱五欲邪淫,不知尘轮(沉沦)苦报,一世光阴,刹那之间丧尽。一点真灵无所归,生老病死,阳尽阴灭,受地狱之苦。四生六道,若失人身,怎躲轮回业网。各劝贤人,趁有身有相,借假修真,得无上之道返本还源,同见无生圣母。""忽一时,有仙童,亲来引见。幢幡盖,仙乐响,喜笑盈盈。朝圆洞,见无生,亲身下拜,子母们,团圆会,永不投东。""三元了义,一卷真经,万法都不生,吾今说破,个个参因,休贪尘世,跟我回宫,身入圆顿,同见无生。"在《无垢如来分第十一》又描述了失乡儿女见到无生老母的情景:"提起来,腮边泪,吊撞三关,开通一窍,见了我得(的)无生老母,哭在娘怀裹抱。子母们,哭哮啕,从灵山失散了。因为我贪心不舍,串轮回,无归落,今遇着老母家

①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宣演真经》。

②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桂枝香》。

③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宝火如来分第七》。

书，才得了无价宝。老母你听着，普度众生出波涛。老母你听着，无上真经最为高。”在《离垢如来分第十二》又写道：“说离垢如来，自从灵山失散，在于阎浮世界，东土苦海娑婆，贪恋尘世之苦，妄上生，妄无足无厌，不守一性之真，身外贪求，染污自己灵光。”普明宝卷中还有许多关于炼丹的内容。“炼金丹，无为老祖说妙玄，先锁心猿和意马，日月光中采精源，铅汞两家同一处，二八相合炼先天，还丹理，几个全超凡人圣透长安。”①在《普明无为了义如来第三十分》，最早提出了三教应劫思想，经文中说，“三世古佛立于三教法门，三世同体，万类一真，九转一性，乃为三周说法人间，譬喻过现未来，三极同生，无极圣祖安天治世。”在《普明无为了义如来第三十六分》，更进一步提出：“无极圣祖，一佛分于三教，三教者乃为三佛之体。过去燃灯混元初祖，安天治世，立下三元甲子，乃是三叶金莲，四字为号，五千四十八卷为一大藏真经，五百四十日为做一年，一百八十日为做一甲，六个月分做一年。昼夜按着六时，每一时辰八刻，一昼一夜共合四十八刻。”这时，“人人长寿，无我无人，灵光各照，草衣遮体，身住巢穴，人吃动融之食。头上有角，身上生毛，兽面人心，一无邪染，与佛同明，不分异相，一无文字，个个长生。”在普明看来，这时生活虽艰苦，但人可以达到“人人长寿”，而且是“兽面人心，一无邪染，与佛同明，不分异相”，是个理想的境界。而现在的世界，则处于“有明有暗，有圆有缺”的时代。这时，“人有生死，天有形相，庄严为色，人有形体，五欲邪淫染尘，末世不得长生。人活百岁，七十者稀。”这时，十二个月为一年，三十日为一个月，昼夜十二时辰，共合九十六刻。总之，现实世界是处于苦难之中的。因此要“从(重)换山河，另立星辰，安天治地，倒海移山。”人类如果能够“都依普贤全真道”，便可“大男小女赴仙乡”，“同登彼岸”。那时，“一十八劫已满，改形换体，十八个月为做一年，十八时辰乃为昼夜，一年正合九甲，四十五日为做一月，昼夜一百四十四刻，循环周转，总计八百一十日为一年。人人老少，十八岁脱胎换体，都是丈八金身。天地无圆无缺，人无老少无男女相，无生亦无死，无短本无长，才是长生大道，寿活八万一千，天数已尽，又立乾坤世界，另换一十八岁童颜。”造经者明确提出了三佛三世说，即把宇宙从形成到毁灭，分为过去、现在与将来三个劫期，分别由三佛度化九十六亿“人缘”：“九十六亿人缘，过去佛度了二亿，此是道尼；现在佛度了二亿，乃是僧尼释

---

① 《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清净施如来分第十五》。

子；后留九十二亿"，将由"皇极古佛"转化来的"在家菩萨"即普贤最后度回天宫。[①] 该宝卷共六卷五十四分，是继罗梦鸿《五部六册》之后，秘密教门最重要的经卷之一。有人认为该宝卷是由普静本人所撰，[②]也有人认为是其弟子所为，时在万历中叶。[③] 日人泽田瑞穗、浅井纪则认为该宝卷的作者，是普静弟子、宣化蔚州的罗睺罗。[④] 王见川则认为该宝卷作者可能是该宝卷中提到的余腾伦。[⑤]

这里仅就该宝卷的内容，作简要介绍。

首先，造经者提出了自己对宇宙起源的看法。黄天教虽然受到罗教的影响，崇奉无生老母，但在宇宙起源问题上，却与罗教有所不同。在《钥匙佛如来开人根分第二十三》写道："混沌初分，无天无地，无我无人。自无始以来，原始天尊立世，即是无极之母，无极转化。威音以前，空性以后，混沌初分，赤白气两道，无日月三光。女娲、伏羲治世，三皇五帝呈神农，掌立五谷，天地万物有生。立人根者，女娲、伏羲也。"这些说法带有明显的儒、道两家思想。不过，作者仍然强调无生老母乃宇宙创始者。"不是无极能变化，无生老母生老君。东西南北分明暗，安立日月定乾坤。"

其次，进一步完善了三佛三世说。"九宫八卦团团转，三极周转立人伦。无极立下青阳会，化显掌教是燃灯；太极立下红阳会，转化释迦是教尊；皇极立下白阳会，八十一转弥勒尊。三佛轮流有改变，一劫本是立百春。九劫燃灯他过去，一十八劫现在行。未来九九八十一，一百八十定三空。燃灯本是无相劫，庄严劫是释迦尊。弥勒又安星宿劫，南北转丹推二轮。"作者在《钥匙佛如来开先天分第五》，又对"先天"即"无极"、"无生老母"作了诠释："先天者，乃为无极心也。无始以来，无生有，能生万物，说是先天，即是无生之母。"从这里可以知道，秘密教门所谓"无生老母"，乃是来源于道家的"无能生有"的思想。道家主张"有"生于"无"，"无"也就是"道"，乃是宇宙万物之源。无生父母或老母虽是罗

---

① 《普静如来钥匙宝卷》。

②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26 页。

③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425 页。

④ 浅井纪：《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结社研究》，日本东京研文出版社，1990 年。

⑤ 王见川：《黄天道早期史新探》，载王见川等编：《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 年，第 67 页。

教最先提出的，但普静及其弟子却对它作了教理方面的阐述。① 卷首扉页上半部为三教同源图，如来佛坐于上首，老聃坐于左下首，右下首为孔丘。下半部为龙牌，上书“皇帝万万岁”。作者在卷首声称“古佛投凡住世，单传直指，说与明天大道，留下利生宝偈七十二句，引人唱偈归家。吾得此偈，昼夜参详，时时精进，不敢少懈，觉特自护。自后有感有应，无邪无恶屡验，逢凶而化吉，屡遇难而便（变）安，百求百效，所思所得，吾则顶之不尽，戴之不浅，遂将七十二句布为三十六分，攒成上下二册利生了义宝卷。”全卷除宣扬生死轮回和地狱天堂之说外，还大量宣扬众生平等和末劫归家说，穿插目连僧救母和普明投凡住世的故事。宝卷中无生老母的地位已在弥陀之下，信仰弥陀而非弥勒。经文中多次称颂黄天道“而今始得黄天道，九莲花开在近年。”在《戊午年普明如来归宫分第十三》，叙述了普明的生平，对研究黄天教和李宾生平有重要价值。

《太阳生光普照了义宝卷》，原为郑振铎收藏，现藏国家图书馆，明折装本，分上下两册。据马西沙研究，该宝卷的经文和序文，皆以女性口吻所写，据此判断该宝卷的作者，当是普明第二个女儿普照即小康李氏，成书年代不详，估计在万历中叶以前。在宝卷中，有一段经文，对该宝卷的名称作了诠释：“说太阳生光普照了义者，从无始以来，光明照耀。太阴者，阴光之首，群星领袖，万圣班头。诸佛菩萨、罗汉、圣僧、洞府群仙，仗光明而成道。生光者，日月生光，盗夺天精，亦派生阳，光明增长，众生难识。普照者，光明宝满，普复乾坤，诸贤借光而成圣。了义者，万人成真，亦无高下，贫富不分，了其义也。宝卷者，内有超生了死之路，升仙成佛之径。”这段经文，表面上是在诠释《太阳生光普照了义宝卷》的含义，实际上是在颂扬其父母和自己。作者称普明夫妇为普照大地的“太阳”。他们“从无始以来，光明照耀。”而“诸佛菩萨、罗汉、圣僧、洞府群仙”，皆“仗光明（即普明夫妇）而成道”。而作者本人即普照，则是“太阴”，她乃是“阴光之首，群星领袖，万圣班头”。诸贤皆要借她的光而“成圣”。《中国民间宗教史》认为，该宝卷实为“女性修炼的经书”，主张男女双修，认为“孤阴寡阳不成丹”，修炼者应当“采玉蕊真精取入红炉，结就金丹，可证无极大道。”具体修炼方法是：修炼者应得“两弦正气”，即于阴历初七、初八和二十二、二十三日将月亮的精气吸入“金舍黄房”。再于朔望之期，使“两弦正气”归于一处，运上泥丸。

---

① 《佛说利生了义宝卷》，北京中国佛教文物图书馆藏有一部，上下两卷，三十六分，明刊梵夹本。另收录在王见川、林万传主编的《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五册。

如此则“凡圣相结，丹珠自成”。①

《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全书共四册，三十六分。收入《宝卷初集》第七册。从第三十六分《太阳化诸佛归一品》可知，该经卷系黄天教门徒于清初顺治丙申（顺治十三年，1656）开始代笔撰写，康熙丁未（康熙六年）完成。“千一十口门中后，付东一土木童儿。丙申代笔四恩卷，现出燕南一宝珠。”“上天不负男儿志，出身宝卷代天题。幸际康熙真明主，丁未孟春上元期。”这两位门徒一个姓王，一个姓田。该宝卷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大力歌颂黄天教，借以吸引徒众。经文中写道：“太阳宫，永坚牢，炮来打，万丈高。刀来砍，彀不着。才证了黄天道，阿弥陀佛，才证了黄天道。”“想当初，好痴愚，自到如今遇知识。指与我，黄天圣道，清净无为。从师命，采取真阳，果然是出身妙偈。祖机炼，宝月登仙位，赴蓬莱，那有愚痴。”《太阳化三普如来归一品第三十五》写道：“普明如来了义真玄妙，玉兔金乌二亿答查号。跨虎骑龙，玉帝丹书诏，赴我光中证了黄天道。”

其次，将其始祖普明神化为“太阳”神。经文《太阳化混源朝元归一品第四》写道：“普世间，众诸佛，谁为主？普明佛，遍知会，群星天，地精月，乃后天气。老太阳，原是个，诸佛得主。老太阳，原是个，开天祖，诸佛的，总领袖。”“老太阳，原是个，主中主。”在《太阳化释迦伽叶归一品第十》把普明与燃灯、释迦两佛并列，并隐喻普明乃未来佛。“昔燃灯采五千四十八卷真经，为过去庄严教主；梵王太子，真金出矿水银汲散，现出牟尼宝珠，为现在圣贤教主；普明禅师外按八卦，内安九宫，借太阳真火，炼破须弥山，烧干星宿海，采黄芽万物之气，化未来皇极。”又说“过去佛是谁？生混元中无姓名，托借佛名号燃灯。”“现在佛，号释迦，苦参禅，功劳大。”“未来佛，化皇极，九品莲台登仙位。”而这个化皇极的未来佛，便是普明。在《太阳化三普如来归一品第三十五》中写道：“过现未来一气通，末后拈花是普明。教演三乘都领袖，一齐归一太阳宫。”“过去时，化燃灯，号称无极。化释迦，为现在，普照当空。第三回，化普明，未来掌教。总收元，众诸佛，同去归宫。”在这里普明更成了将要普度九十二亿人缘的“未来佛”。

继承黄天教的传统，按照道家思想解释“无生”。

在《太阳化无生无相归一品第一》中写道：“混沌之中古无生，无中生有妙亨

①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1—452页。

通。无生本是混元气，开分独显太阳尊。”道家认为，“无名”的“道”，生出了“有名”的世界万物，故提出“有始于无”这一命题。又认为，“混元”乃是宇宙生成的第二个时期，这时，阴阳初判，天地生成。《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便是按照道家上述思想，来解释“无生”这一概念的。在造经者看来，“无生”乃是“无中生有”之意。“无生本是混元气”，表明阴阳初判，天地生成，皆来源于“无生”，而产生于混元时期。又说：“想当初，混沌了，不分天地。阳共阴，成一性，名唤无生。”这样，便用道家思想，解释了“无生”。

宣扬通过修炼内丹，达到长生不老。

黄天教从普明开始，便宣扬通过修炼以达到长生不老。《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仍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太阳化玉帝森罗归一品第九》中写道：“一升一降无为道，二气相合在其中，乾卦为天坤为地，虎在西方龙在东。分宫楼下张大帝，丹书敕旨诏真人。日为阳父月为药，玉炉金顶造真经。须把乾坤颠倒过，虚空神鬼也难明。太上老君分明说，水重半斤火半斤。大足丹成功元满，入口立化紫金身。”在《太阳化真空空性如来归一品》中说：“老真空，说与我，西来意，果然是真实，参透玄妙机。姹女婴儿，一处居，丹砂安在这丹炉里。老真空普说下玄中，妙药炉儿勤看照，固济要坚牢。汞虎铅龙一处包，水火交炼成个无为宝。”造经者也继承了黄天教修炼内丹的传统，把人体看作丹炉。在《太阳化收元归一品第六》中写道：“说收元者，天收三光，地收三气，人收三宝。天收三光者，太阳为元神，太阴为元气，星宿为元精。收元之时，精归于气，气归于神，乃为三光一性。人身三宝，与天亦然。炼得功满之时，阳神离体，接引本命星官。星归于月，月归于日，此乃九转一性。”炼丹的目的，则在于长寿。在《太阳化大藏宝莲花善住娑罗树王如来归一品第三十四》中说：“二六时，采先天，熬铅炼汞。一个个，成正觉，寿与天齐。”在《太阳化离垢无垢如来归一品第十六》中又说：“日精月华演三乘，黄娘引入戊己宫，九转还丹出阳神，阳神飞上太阳宫。随佛昼夜转西东，寿活八万一千春。”通过修炼以达到长生不老，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得到的，黄天教正是藉此吸引徒众，发展组织，这也就是黄天教为什么能够在华北以至江南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原因。

《古佛当来下生弥勒出西宝卷》，系“云僧留传”，“出在大明万历丙辰年，御制党小庵刊版留行”。刊刻于明万历丙辰即万历四十四年，现将其内容介绍如下。

首先,从宝卷前言部分可知,该宝卷属于黄天教支派圆顿教经卷。文中提到:"普明古佛宝卷开,普光妙法劝众贤。普静云僧化人善,普善法王度皇胎。南北先儒古道传,无如善法化三千。本庵士女消灾障,师留皇极出世间。教行圆顿用置立,主定龙凤上品选。"

其次,该宝卷强调弥勒信仰,并具有强烈的叛逆思想。为了否定现世而赞扬未来,造经人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把尘世间一切灾难的根源,皆归之于现在治世的释迦佛。故事称燃灯古佛、弥勒世尊与释迦佛乃一母所生的亲兄弟。在燃灯古佛掌教已满后,三佛商议谁当立世,普度众生。恐言语无凭,各立誓愿,同入金杖,禅定三日,出定观看金杖开花,先开者先去治世。但是,释迦佛未到一日,便"开眼私看",见弥勒佛的金龙杖上,开有一朵龙华,万道金光,便"暗去移换在自己金锡之上"。遂决定由释迦佛在人间治世,结果给尘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三千年间,众生贫富苦乐不同,五谷少收,四民不安,国家争竞不宁,贼盗最多,世间众生受苦无穷。后被魔王搅乱,再有三灾八难,世间众生又遭末劫。"①总之,尘世间的一切罪恶与苦难,皆是释迦佛"偷花之报也"。一旦由弥勒古佛治世,将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大地众生俱以富足,到处和平,世间百草皆生,五谷早生早割,迟生迟割。一切树木尽生果子,大者如升,小者似钟,令人吃用,自然饱满,保人精神,养性红颜,味如甘美,吃一个数日不饥,皇胎子女寿命延长。"那么,如此美好的生活,何时到来呢?造经者许诺说:"从万历,更申年,以归家庭。我佛救,众群生,持斋行善。早归依,圆顿教,置立法门。弥勒佛,治世界,男女享福。"②也就是只要早日皈依圆顿教,就可得到幸福。

第三,劝各行各业之人皆入圆顿教。先是劝告官吏入教。造经者首先谴责了官吏的各种罪恶,称"一切官吏人等,办事不清,贪图名利,毫无慈心,百般屈断,陷害良民。有钱以屈为直,无钱真直是屈。"本来应该"永堕地狱"。但是,如果"忏悔前愆,改作慈心",并"入圆顿正宗",仍然可以"送归云城",即回归家乡。接着又劝告富豪入教。也是先谴责富豪们"依势欺贫,买卖不公,欺侮良民,小斗量出,大斗量进。盘算重利,多挖银钱,不知穷苦,无有慈心。"至"强霸田地山林","强占妇女"。此等恶人,本应"抽换归狱,永不超生"。但是,如果能"持斋受戒,行正道,进圆顿",仍可以"天榜上标姓名",把罪孽"一切消清"。

---

① 《古佛当来下生弥勒出西宝卷》,《玉佛出西品选第一》。

② 《古佛当来下生弥勒出西宝卷》,《扫灭文才品选第十四》。

为了劝告贫人入教，造经者先是责难“世间贫民不守本分，打爹骂娘，怨恨天地”，甚至“不敬长上，弗兴善事，兄弟不合，偷盗财务”。此等之人，也应堕入地狱，永不超生。如果“存好心，归圆顿”，仍可以“轮回永断，尽归西林”。在劝告读书人入教时称，有的秀士“断绝仁义礼智信”，“无常全无”，甚至“怨天恨地，不敬日月，弗忠君主，不孝父母，弗敬师长”，因此，造经者“奉劝读书贤良君子”，“作急换心肠”，“速进圆顿正教”，以便“尽赴西林大会”。造经者还劝当兵者入教。说“当勇兵，依势横行”，并且“强抢劫，财务金银”，甚至“杀良民，强奸妇女”，以致到头来，无路可走。“此等人，罪孽重，地狱受苦。自作恶，加重愆，难得超生。”只有“速回心，归儒教，孔圣法门。忏前愆，悔后过，劝人为善”，才能“救父母，跳出红尘”。最后，造经者还向信徒们允诺，一旦“我佛”治世，将会出现无比美好的生活。那时，“百草生谷，千树结果，大者如升，小者如钟。吃一个数日不饥，人参果吃一个，五眼圆明。”而且有“香水汤，密罗茶，流霞酒，香泉水”，这些“饮之不老，食之成圣”。人人可以“寿活九千岁，重换头发牙齿”。造经者为信徒开出了一张张进入天宫的廉价门票。

黄天教最初虽仅在直隶、山西一带流传，后来很快发展到江南，分别以圆顿教、龙天教等名目传播。由普静所传支派圆顿教，后来在乾隆年间与北方南传的罗教支派大乘教融合。传到江南的黄天教，最初在浙江处州一带，曾以“无为教”名称传徒。到应继南时，因见罗教势力强大，遂攀附罗教，应继南诡称罗梦鸿转世。后来，姚文宇又诡称“应继南转世”，称姚门教或龙化会。在浙江衢县的姚门教“清虚”汪长生，脱离姚门教回归黄天教传统，称“长生教”，这一支后来发展很快。入清后，在福建的一支姚门教，又称“老官斋教”。因被禁止，又以该教继承“普字派名”的传统，故又称“一字教”。姚门教在吴子祥时，又与来自北方的罗祖大乘教融合，仍称大乘教。后来，由其弟子何若传入贵州和四川，以后形成青莲教。

四、直隶万全县的李氏传教家族

入清以后，黄天教在直隶宣化、山西大同以及京畿一带广为传布，甚至成了不少乡村社会迎神赛社活动的一部分。黄天教仍以万全县碧天寺为活动中心，一年分四时八节做会，已具相当规模，并且常常有黄天教信徒来这里拜谒“普明

老祖”。黄天教在宣化、怀来一带传播较广，因而当地的黄天教“会首”也比较多。万全县的李文忠和黄天教李宾家族虽不同宗，但也是一位“会首”，此外，怀来县柴沟堡的刘万德也做过当地黄天教的会首。[①] 只不过碧天寺是黄天教的祖庙，当地人多知道李家为普明老祖李宾之后，更加尊重罢了。至迟在清代康熙四十年(1701)之前，[②]黄天教在碧天寺的明光塔庙就开始由外姓“道人”担任住持，庙产也是供应香火之用的，李家后代至多是作为“东家”而已。根据现存的档案可以知道康熙四十年左右，碧天寺住持为直隶怀来县道人倪子佩，其后为任纬、王玉成，乾隆七年(1742)，怀安县华山庙道士、山西榆次人李怀雨和徒弟李继印也被请去住碧天寺，乾隆十七年(1752)李怀雨死后，李继印住庙主持。[③]

入清后的具体流传情况大体如下。顺治、康熙年间，北方有一支直接传自教祖普明的黄天教，上述黄天教的《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就是该教教首王姓和田姓所造。他们自称是黄天道祖师虎眼禅师李宾亲传，在该经卷《太阳化诸佛如来归一品第三十六》末的偈子，用秘密教门传统的方法，暗示造经者直接传自李宾，造经、成书的时间分别为丙申(顺治十三年，1656)和丁未(康熙六年，1667)，地点在“燕南”：太阳老祖出身偈，虎眼禅师亲受持；直指单传称夫子，前法会卷谨遵依。享邑非衣皆欢喜，何人转卷透天机；千一十口门中后，付东一土木童儿。丙申代笔四恩卷，献出燕南一宝珠；卞和三进濮中玉，君王背断十分悲。上天不负男儿志，出身宝卷代天题；幸际康熙真明主，丁未孟春上远期。[④] 经卷《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乃是模仿普明《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写成，并且把普明再度神化成“燃灯佛”、“释迦佛”之后的“第三化”，即“未来掌教”和末劫临头时的“总收元”，[⑤]也就是劫难到来时人类的救世主。同时也把“内丹”炼养当作回天宫的重要途径。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折，附李文忠、刘士连等供词。

② 据兆惠等调查推算，见《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协办大学士兆惠奏折。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协办大学士兆惠等奏折附李继印供词。

④ 张希舜等主编：《宝卷初集》第7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 《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宝卷初集》第7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4—495页。

清初人颜元(1635—1704)对当时黄天教的流传情况作了如下记述:"我直隶隆庆、万历前,风俗醇美,信邪者少。自万历末年,添出个黄天教,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①]康熙年间黄天教仍以直隶万全县为中心,在宣化府及华北一带传播。康熙四十一年,黄天教嫡派正宗传人、教首李蔚曾公开为普明树碑。[②] 李蔚为贡生,系普明胞兄李震四世孙,死后被教内尊为普慧佛。李蔚死后,其弟李赉接管家中存留的经文,并充当会首;李赉故后,其孙李昌年继任会首。乾隆八年(1743),李昌年病故,因子年幼,遂把经卷交给族弟李遐年,李遐年即"普慧佛"李蔚的嫡孙。他充当会首时,黄天道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同年,李遐年之父李景膺因山西收元教的案发受到连累。[③] 李遐年害怕受到更大的牵连,就把祖传的经卷全部烧毁,在一段时间里,碧天寺也不敢做会,该教一度沉寂。

雍正年间,黄天教重新开始活动,曾有山西平定州的李福在当地传习黄天教。雍正十三年(1735),该教平定州人李尚被捕后,供称所藏符咒,"系邻居李福之物"。并称李福所习之教名为"皇天教",家藏邪书五种,其中《冠天宝书》内载"二康发现到卯年时节交换"之语。并藏有"龙翅黄帽"一项,称其子李复成会"呼风唤雨",并亲见他"咒倒大树",此外家中还藏有许多刀枪器械。李复成本人还"能知兵法",其弟李满成亦会要棍。当地三四村人,皆习其教。[④]

乾隆年间万全县碧天寺仍然是该教传教中心。乾隆五年,碧天寺住持李怀雨与山西介休县人曹生泰往来交好,曹生泰曾抄录黄天教的经卷,并且在封面上绘图。其后,曹生泰又在山西介休县设立"山西老会"、"天真堂"、"继安会",继续传教。乾隆八年,李怀雨传李继印为徒。乾隆十七年,李怀雨故后,由李继印充任碧天寺住持,传习黄天教。[⑤] 在山西黄天教也继续流传。乾隆七年(1742),潞安府长子县收元教田金台被查获,清吏从他家中搜出一封乾隆四年(1739)他和黄天教教首之间的来往信件。[⑥] 事情缘起是,乾隆初年,田金台在直隶做生意时,曾遇到黄天教的信徒孙耀宗。二人闲谈时,田金台向他夸耀收元

---

① 颜元:《四存篇》,"存人篇",卷二。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兆惠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附李遐年供词,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④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李卫折,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⑤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7 辑,兆惠、方观承等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西巡抚喀尔吉善折,乾隆七年十月十三日。

教的教理教法如何细致。孙耀宗遂将此况转告同教的丁玉,丁玉又将此转告自号"宣化善人"的同教白尚璞。白尚璞闻讯,写了一封书信,并附上"偈言一张",转托孙耀宗带给田金台。信中称黄天教为普明佛所传,并请田金台来宣化县"论道"。田金台收到信后,以年老多病、不便远行为由,加以婉拒,并未前往。但田金台收元教在山西犯案后,田金台手下的教徒丁玉、孙耀宗却因此受到牵连而遭流放,黄天教的名称和普明的姓名与经卷从此也在当地官府的档案中留下了记录。[①] 田金台案发没过几年,直隶收元教的教首胡二引进、张仁等纷纷落网。不久,清廷在查办孙耀宗案时,又有了重大突破。乾隆二十七年(1762),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查办孙耀宗习教一案时,从乾隆八年(1743)田金台、丁玉等一案的档案中发现黄天教系由明代万全县属膳房堡的李宾所创立,并得知万全县建有庙塔,奉其教者,不远千里,前来拜坟。年末,方观承向来省城之古北口道玉神保询问该县黄天教情况。玉神保向他禀报了该县碧天寺的情况,并称住庙人李继印"不僧不道,诓惑愚民,行踪诡秘"。此事奏报朝廷后,乾隆皇帝十分重视,便谕令协办大学士兆惠、侍郎钱汝诚前往宣化府,会同直隶总督方观承一同查办。

碧天寺位于万全县膳房堡西,四面环山,基址颇大。寺门镌"祇园"二字,一、二、三层供立佛、坐佛等像。三层东、西两壁绘有李宾生平事迹。后层高阁上有匾额,中间题"先天都斗宫",东边题"玉清殿",西边题"斗牛宫"。阁前的石塔有十三层,高三丈六尺,周围十二步,称"明光塔",因李宾号普明,妻王氏号普光,故名。楼下东、西二间内,用灰砖发圈,砌为洞形,绘有"种种异像",住持李继印住屋内亦圈砌成洞。[②] 兆惠、方观承等在碧天寺内搜获大量经符等物,其中有三角符三张,每张各有四个怪字。这些怪字,拆开分析,乃是上下皆为雨、山,中间夹有"大王未相朱王复照日月天下"等字。又有《先天敕札》一张,内称"走肖传与米家,米家传与木子"等语。兆惠等认为这些经符印文"词意隐显虽有不同,而狂悖妖妄实无异致"。为了彻底摧毁黄天教的传教中心,兆惠等下令将明光塔连夜拆毁。但塔下最初并未发现普明夫妇之棺尸,于是又将弥勒殿中间深掘入土一丈六尺多,始发现尸骨。遂将普明夫妇尸骨掘出,投弃于城外车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吏部尚书署直隶总督史贻直折,乾隆八年四月初七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廿七日。

道，“寸轹扬灰，宣示众庶”，并将碧天寺屋宇也“拆为平地”。[1] 对于被捕的教首、骨干，均予以严惩，碧天寺住持李继印“照大逆凌迟律处死”。李家的会首李遐年及其侄子李奉吉都被发配乌鲁木齐，同宗李椿年在乌里雅苏台经商，尽管与“逆词”案无关，也照李遐年等一律发配。至此，“所有普明族属”，全部被查获。[2] 埋葬在碧天寺的普明一家五口被剉尸毁塔，为普明立碑的四世孙李蔚也被毁坟戮尸。[3] 碧天寺历代住持也都被“毁坟戮尸”，寺产没收入官。曹生泰因曾抄写经符而被认为“实属同恶相济”，也“一体凌迟处死”。教徒王进贤、吴自显等因看到“逆词”，知情不报也被斩立决。和他一同去碧天寺的深州人吴自显，虽然不识字，也不知有逆词，也被发往乌鲁木齐充军。经过这次打击之后，黄天教并未在万全县绝迹，仍然有信徒世代秘密相传。光绪初年，该县又建造了“普佛寺”，除供奉佛教神祇外，仍供奉普明一家五口的塑像。[4] 而且在直隶和山西的大同、天镇等地的农村社会仍然秘密流传。乾隆三十三年（1768）直隶口北道保安州查获黄天道董朝喜、孙嘉谋等复兴黄天道。[5] 嘉庆二十四、五年（1819—1820）间，清廷在山西查获天镇县民罗若升在天镇以及直隶万全地方传播黄天道，传徒敛钱。[6]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兆惠等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兆惠等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兆惠等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④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11 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五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道光元年三月初六日。

第四章　弘阳教

弘阳教相传创自明代万历年间的“飘高老祖”。飘高老祖自称“弘阳子”，故称所创之教为弘阳教。又因该教崇奉“混元老祖”为主要神祇，故又名“混元教”。入清之后，该教因持“青阳、红阳、白阳”“三劫三世”说，又称“三阳教”，也分别称青阳教、红阳教与白阳教。乾隆年间，官府为避弘历之讳，凡破获弘阳教案俱称“红阳教”。该教自己也因信奉青阳、红阳、白阳“三劫三世说”，也称红阳教，亦称混元教、混元门。

一、弘阳教与飘高老祖

关于飘高老祖创立弘阳教一事，在该教经卷《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中的《无天无地混沌虚空品》中，有如下记载：“无天无地，虚空在前。先有不动虚空，后有一祖出世，什么祖？祖是混元祖，宗是老祖宗，佛是治世老天。”[①]那么，飘高老祖又是谁呢？对此，人们尚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飘高老祖是山西洪洞人高扬，另一种说法，认为飘高老祖是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韩太湖。清吏黄育楩认为飘高老祖是高扬，而韩太湖则是假冒的飘高老祖。他在《又续破邪详辩》中提到：在《红阳宝忏中华序》内，虽然有“治德文佛悲愍浊世，临转云空，广平地界，俗居韩门”等语。但“惟查序尾，有顺治十七年四月初八日飘高登坛演法字样，可知韩太湖传教在本朝顺治年间，高扬传教在明朝万历年间。是高扬为真飘高，韩太湖为假飘高”。[②] 我国台湾学者庄吉发先生根据《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序文，也主张飘高老祖是山西洪洞人高扬一说。[③] 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则认

---

① 《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混浊虚空品第一”，载《宝卷初集》第16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1994年，第371页。

② 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辩》，见《清史资料》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110页。

③ 庄吉发：《清代三阳教的起源及其思想》，载台湾《大陆杂志》第63卷第5期。

为，弘阳教创立后，出现过许多个飘高老祖，曲周韩太湖只是其中之一。他说："弘阳教亦称混元教、混沌教、宏阳教。其正式教名为混元弘阳教。教祖为山西平阳人飘高祖，于万历二十二年在太虎山（据推测为湖北省均州南部的武当山。——原注）创教。随后上京，接近明廷官员，进行传教并取得成功。因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自称飘高老祖的人，其中之一便是直隶曲周的韩太湖。"①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飘高老祖究竟是谁的问题，又提出了新的见解。喻松青认为飘高老祖确系曲周人韩太湖。她不同意黄育楩的说法，指出，《红阳宝忏中华序》在结尾处所说"顺治十七年四月初八日飘高登坛演法"一事，实指飘高老祖韩太湖"临凡所降下的坛训"，即通过扶乩的方式，假托飘高老祖所降坛训，而不是指飘高老祖韩太湖亲自"登坛演法"。故不能据此推断说韩太湖是清初顺治时人。喻松青又根据万历庚戌（万历三十八年）重刊的《混元弘阳苦功悟道经》中一段记载，证明飘高老祖确系韩太湖。在该经卷《圣中催赶徒弟品第十八》写道："祖曰：苦功悟道。我与师父同上河南，同父母拜见老师尊。我的苦楚不尽，圣中颠沛，老母又埋怨，师父又说我无功。圣人老爷，就要摘功。内有师兄跪倒，哀告世尊发大慈悲：'能（即'宁'）可摘我黄道人，休摘韩道人功。当初扶会，河南岸北，多亏他证教。'圣中老祖赞叹：'少有这等贤人，我不摘功劳，即便起身，跟找元人。'"这段话证明飘高老祖姓韩，同门师兄称他为"韩道人"。另外，在《红阳宝忏中华序》中也提到："治德文佛悲愍浊世，临转云空，广平地界，俗居韩门"，也说明飘高老祖是韩太湖。此外，广平府还查出飘高名韩太湖，系曲周县人，曲周县还有韩太湖之墓。光绪年间重修的《广平府志》卷六十《仙释传》中，也说韩太湖号弘阳，曲周人，通医术，曾在北禅山曹溪洞修行数年，著有《明心经》、《救苦忏文》等，天启元年刊行于世。这些都是"飘高老祖"是韩太湖的确证。② 我们认为喻松青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韩秉方先生则认为高扬就是韩太湖。对此他提出三点理由：第一，历史上确有韩太湖其人。在《广平府志》卷六十，有韩太湖传，说他名叫太湖，号宏阳，曲周县人。早年曾读书，并解医道。在北禅山曹溪洞静修多年，得真人口诀，著《明心经》、《救苦忏文》，受敕封为"正德明医真人"。另外，《广平府志》还记载道光二十一年知府沈涛奉文

---

① 转自铃木中正等：《千年王国民众运动研究》一书中"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八节"乾隆后期的宗教运动"。

②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4—45 页。

查办韩太湖案时，称韩太湖系"道人"，死后无嗣，当地有韩太湖庙，后被毁废入官。黄育楩在《破邪详辩》中也明确指出："道光十九年有广平府禀报，查出飘高名韩太湖，系曲周人，曲周现有坟墓。"①第二，几部明代刻本的宝卷，皆明确指出飘高老祖就是韩太湖。如《混元弘阳叹世真经》下卷《说自心生品第十八》用拆字法，点出了飘高老祖的姓名和籍贯：阿罗一人日月国（大明国，韩秉方注，下同）。三黄二心府（广平府）三口十同县（曲周县），弟（第）十二丁田社（十二町社），弓长河以西（漳河西），一一丁田村（二町村）。一十八姓卓韦，乃是早吾巾（韩），立下四回为中，才召为名（高招）。一八日月一口元（大明国），三黄二心三付前（广平府），川口十同泉系县（曲周县），一二丁田弓长连。水何十八一为本，西山片二说丁田（西岸二町），上也十一提本姓，十早吾巾觅觅绵（韩），立字下头四回字（高），才召金可是名言（招）。有人识破十三句，不会通神也成仙。叹世四部经，留下本姓名，家住弟一一，丁田卓韦风。根据上述记载，韩秉方得出以下结论：飘高老祖的姓名、籍贯为：大明国广平府曲周县漳河西岸第二町村人，姓韩名高招，留下叹世四部经。在《弘阳妙道玉华随堂真经》卷末写道："祖居广平府曲周县东北第二村人氏，俗姓韩，祖父韩公，祖母张氏。祖生于隆庆庚午年（1570）五月十六日落凡，年方一十九岁出家，参拜名师，在临城太虎山修悟，曹溪洞打坐，三年得道。乃祖因缘相遇，感动圣中老祖，弘阳宝敕透凡笼有惺，留出五部真经，京都开造。多蒙定国公护持，佛教通行天下，普度道俗四众群生，同出苦沧入灭。祖于万历戊戌（1598）十一月十六日皈西还元。"②第三，清档记载也证明飘高老祖即韩太湖。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刘和供称，"红阳教有九干十八枝，所传刘和之教，系按接圣干金容玉花枝，又名海会。头一辈系飘高老祖，前明隆庆四年（1570）曲周县人韩春坡（即韩太湖）"。③ 笔者认为喻松青、韩秉方关于飘高老祖就是韩太湖，和韩太湖也就是高扬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从现存史料我们大体上可以确定，韩太湖号弘阳子，生于明代隆庆四年（1570），卒于明万历戊戌（1598）。万历十四年，

① 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辩》，见《清史资料》第3辑。

② 《弘阳妙道玉华随堂真经》，载王见川等编：《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纪念戴玄之教授论文集》所附。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

③ 韩秉方：《红阳教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

适逢直隶一带发生大旱灾，他因“家中难把光阴过”而“弃舍家缘逃性命”。[①] 先后到河南与江苏徐州一带求师访道。万历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他“进圆顿教，证出弘阳”。当时，他年仅22岁。其后，他又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潜心修炼，终于在万历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在太虎山中“悟道”，立教开宗。次年，又来到北京弘扬其教。来京后，他攀附权贵，勾结宫中太监，以便发展其势力。他这段经历，在《弘阳苦功悟道经》中皆有所记载。“大明万历年中，佛立混元祖教。二十六岁上京城，也是佛法有应。先投奶子府内，转送石府宅中。定府护持大兴隆，天下春雷响动。御马监程公，内经厂石公，盔甲厂张公三位护法同赞。”[②]据喻松青研究，上述引文中的“程公”，可能是太监陈矩之讹，石、张即太监石亨和张忠。内经厂的石公，不是指英宗时的大将军、忠国公石亨，而是指万历年间掌管内经厂的太监石亨。因为弘阳教刻印经卷需要得到内经厂的帮助，因而在经卷中对内经厂的太监石亨百般恭维，甚至称他为“中八天天王”，“中央玉帝老石亨”等，尽其阿谀奉承之能事。至于赞文中所说的“定府护持”，定府何指？黄育楩认为定府指天启元年封为定国公的魏忠贤府第。喻松青则认为，魏忠贤虽在天启元年爵进三公，但并未被封为定国公。黄育楩这么说，无非是为了把弘阳教同臭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联系在一起，以搞臭弘阳教的名声。实际上韩太湖根本不可能于万历年间进京投奔魏忠贤，因为在时间上已相差20多年。明朝历史上真正的定国公始封于永乐二年。徐达的次子徐增寿，因勾通燕王朱棣，被建文帝处死。燕王夺取政权后，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永乐二年追封为定国公。万历时的定国公是徐增寿的十世孙徐希。因此，赞文中“定府”，乃指定国公之府，而奶子府何指，则不可考。西宁府当指永乐年间西宁侯宋晟的九世孙宋世恩。[③]

① 《混元弘阳苦功悟道经》，《要想出家又见年慌父母留当品第四》，载《宝卷初集》第15辑，第175页。

② 《混元弘阳苦功悟道经》，载《宝卷初集》第15辑，第141—143页。

③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46页。

二、弘阳教的教义与经卷

(一)弘阳教的神祇

弘阳教同明清时期其他秘密教门一样，也崇拜许多神祇，而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谱系。其中最重要的有混元老祖、无生老母与飘高老祖。

混元老祖

又称“南无太上混元老祖”、“混元至真老祖”、“南无最乘至真老祖”、“混元至上真空老祖”等。它是弘阳教崇奉的最高神祇，被说成是宇宙的创造者，至高无上的神。在《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第一品中写道：“招想无天无地，虚空在前。先有不动虚空，后有一祖出世。什么祖？祖是混元祖，宗是老祖宗，佛是治世老天。”“想无天无地，一人治世。先有鸿濛化现，后有滋濛混沌。先有鸿濛，后有滋濛，长大结为元卵，又叫做天地玄黄，玄黄迸破才现世，治世天佛，宗祖出世。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诸般都是老祖留下。”“无天无地一虚空，混天老祖立人根。”[①]弘阳教的混元老祖，相当于罗教的“太虚空”、“无极圣祖”，是宇宙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造物主，是一位人格化的神。按照弘阳教教义的说法，所有临凡东土普度众生的诸位佛祖，皆受混元老祖之派遣。混元老祖被描绘成一位慈父，在《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的《老祖宗想儿女赞叹品》第三中，说混元老祖垂泪思念沦落尘世的儿女。后来他亲临东土拯救众生。

无生老母

无生老母本来是罗教创造出来的一位最高神祇。弘阳教从罗教引进了无生老母，不过，在弘阳教诸神当中，无生老母已屈居于混元老祖之次，并且与混元老祖结为夫妇。这样，在弘阳教教义中，所有东土众生，都是混元老祖和无生老母的儿女，共有九十六亿之多。这些儿女下凡尘世，贪恋虚花浮景，因而堕入四生六道，成为“失乡儿女”，在尘世受轮回之苦。混元老祖与无生老母日夜思念这些儿女，盼望他们早日返回“家乡”，永绝轮回之苦。在《销释归依红阳觉愿

---

① 《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载《宝卷初集》第16辑，第370－375页。

真经》中写道："普请诸佛临东土，度脱苦海小婴贤。原人早遇千佛会，相伴老母赴金莲。大众贤良同参拜，各度虔心续真言。见性明心撑门户，开荒展教度婴贤……拜谢无生老母，婴儿早还乡，遇得千佛会，极乐认家乡。"①

飘高老祖

指弘阳教创始人高招即韩太湖。他被说成是混元老祖与无生老母的幼子，在《无极老祖讨护教品第六》写道："无极老祖低头寻思一会，有长子临凡，文章在世，也有名号。二子又立乾坤，同有功劳。三子立门久等，考教儿孙。止有源沌飘高，头遭临凡，转为正信希有，从与古佛证教。今日跟我临凡，保我跟找大地元人。"②文中说的长子便是指孔子，二子便是指释迦，三子则是老子，这一说法，反映了弘阳教三教合一的思想。混元老祖与无生老母鉴于红阳末劫将至，悲叹他们失乡儿女所受苦难，因而派其幼子飘高老祖降临尘世，托生在广平府曲周县的韩门。在《销释混元无上拔罪救苦真经》中提道："老祖言曰：……今同诸众，议演迷津，拔超离苦，还得书行先垂一宝，降此闫尘。韩居为姓，离母根明，参寻正果，设防明宗，点传一性，乃见当人。"又说："老祖慈书复到，苦海浮生，多性在世，久住闫中，弘阳照惺，贯在其中。今同在弘阳法，明圣光垂照，凡圣跟寻。三心一体，复造真经，冲阳性转。……今一土中，托与圣光，飘祖降临。"③

（二）"三阳说"与"救世说"

"三阳"指青阳、红阳、白阳。三阳说是指过去为青阳劫，现在为红阳劫，将来是白阳劫。在《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中写道："红阳法者，现在释迦佛掌教，以为是弘阳教主。过去青阳，现在弘阳，未来才是白阳。"（《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混元教弘阳中华经序》。）④其含义是：当今红阳劫期正值大劫来临，劫尽之后，将是幸福、理想的白阳时期。由此得出："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的教义。不过，据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研究，在弘阳教创立之初，尚未形成"三阳说"的明确内

① 转自韩秉方：《红阳教考》。

② 《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无极老祖讨护教品第六》，载《宝卷初集》第16辑，第428—430页。

③ 转引自韩秉方：《红阳教考》。

④ 载《宝卷初集》第16辑，第350—351页。

容，也未强调未来佛掌管的白阳劫期将要来临这一思想，仅告诉人们应安于现在佛即释迦佛掌管的红阳时代，反映出当时社会比较稳定这一现实。自万历、天启以至崇祯年间，由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不安，才出现希望未来佛降临这一思想，形成三阳即青阳、红阳、白阳与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相配合的三阳说。①

"救世说"是弘阳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弘阳教宣扬该教宗旨便是为了使世人在面临红阳末劫时，可以得到飘高老祖之拯救，度回天宫。因为沉迷东土的众生，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僧道男女，皆陷入了无穷的苦难之中，都要遭受四生六道轮回之苦。在《弘阳叹世经》的《叹世人呆痴不回头品第二》中写道："大地儿女不得还乡，一个个沉迷东土，倘然末劫至近，怎躲轮回之苦？思想受苦元人，不舍家乡，不得出苦，怎得还元。想当初圣做凡，如今要凡做圣。认定凡世风光，不知圣中盼望。"②因此，只有皈依红阳教，信奉飘高老祖，才能得到拯救，回归"家乡"，享受到天堂的幸福。在《销释混元红阳救苦天生宝忏》中写道："昔有飘高圣祖，领吾金旨，普度群迷。家书照彻，见惺冲阳，替佛传法，跟寻家乡做客。""今逢弘阳妙少，普度原根，而明天榜挂号，地府除名。或在各家堂内会领当行。……仗佛宝号，老祖真文，救拔在弟子众等各家三世亲，尽得超升。"③弘阳教的"救世说"是同"劫变说"相联系的。弘阳教宣称，现存世界正面临着红阳时期之末，是最大的一次劫难。在劫难之后，将是理想的白阳劫时期。这一说法起源于对佛教《弥勒成佛经》中的龙华初会、二会、三会说的改造。《弥勒成佛经》中提到，弥勒佛在龙华菩提树下成佛，先后于龙华树下举行三次说法盛会。第一次有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次有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次有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这便是"龙华三会"。④ 后来，弥勒信仰在民间流传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弥勒救世"信仰，便出现了青阳、红阳、白阳三会之说，红阳教吸收了这些内容，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在《混元弘阳显性结果经》中写道："混元一气所化，现在释迦佛掌教，为红阳教主，过去青阳，现在红阳，未来白阳。"红阳教宣扬过去燃灯佛掌教时，已度化二亿"元人"，现在释迦佛掌教时，再度化二亿

---

①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期民间宗教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八节。

② 《弘阳叹世经》，载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

③ 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

④ 《中国佛教》(三)，第598页。

"元人",还有九十二亿元人,将由未来掌教的弥勒佛所度化。飘高老祖的使命,便是在红阳末劫来临之时,为混元老祖和无生老母去度化这九十二亿元人,使之脱离尘世的苦难,永归"家乡"。在《混元弘阳中华宝忏》中写道:"东土末劫至,天破有岔声。众生无投降,杂法遍地兴。缺少玄妙理,怎得出沉沦。我今发慈悲,说忏度众生。能消贪嗔罪,千年业障根,忏除诸恶业,早得达本宗。"[①]红阳教的三阳说与救世说,对明清时期其他秘密教门有很大影响,成为各个教门的共同信仰。

(三)伦理道德观念与社会功能

红阳教同其他秘密教门一样,也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因而在教义中也采取了儒、释、道三教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经卷中推崇儒家的"三纲五常",颂扬忠、孝、节、义,提倡禁欲,宣扬"酒是串肠毒药,色是杀人钢刀,财是人间脑髓,气是惹祸根苗"。[②] 又大力宣扬佛教所主张的因果报应说,劝人"积德行善"。

红阳教社会功能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提倡教徒间实行团结互助。红阳教在教义中,把儒、释、道三教的创始人说成是混元老祖的几个儿子,彼此间乃亲生弟兄,教导信徒们能够亲如手足,遇到困难时互济互助,最后都由飘高老祖度回"家乡",永享幸福,使全教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二是为人治病。红阳教创始人韩太湖本人通医道,被尊为"药王",相传受封为"正德明医真人",其画像乃一包治百病之神医。该教一向以替人治病相号召,传教招徒。其治病方法主要是诵经求神,让病人饮服供奉过飘高老祖的茶叶,许多教徒都是因为久病不愈而加入红阳教的。由于用此方法,偶尔也能把病治好,便大加宣传。清代京畿一带红阳教在妇女,尤其是寡妇中传教,以治病为手段,诱人入教。

(四)弘阳教经卷

弘阳教经卷,多冠以"混元"字样,计有:

---

① 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

② 《混元弘阳叹世真经》:《叹酒色财气品第十一》,载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

《混元弘阳悟道明心经》

《混元弘阳经》

《混元弘阳显性结果经》上,下

《混元弘阳苦功悟道经》上,下

《混元弘阳叹世真经》

《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上,下

《混元弘阳血湖宝忏》

《混元弘阳明心宝忏》

《混元弘阳观灯赞》

《销释混元无上普化慈悲真经》

《销释混元无上拔罪救苦真经》

《销释混元红阳拔罪地狱宝忏》

《弘阳妙道玉华随堂真经》

《太上全真清净礼斗科仪》

《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诞生保生妙经》

《高上玉皇经》本行集上中下忏

《销释混元救苦生天宝忏》

《混元红阳中华宝忏》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尊玉枢宝经》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

《元始天尊北方真武妙经》

《太阳真经报太看照之恩》

《太上说消禳火灾经》

《元始天尊说济渡血湖真经》

《关圣帝君济世忠义经》

《清微红范功课经》

《红阳结果二品上经》

《混元红阳请祖母报恩觉愿》

《弘阳佛说镇宅龙虎妙经》

《弘阳佛说镇宅龙虎宝忏》

《弘阳后续天华宝卷》

《佛说弘阳青花报恩天通宝经》

《混元宝灯提孤施食科仪》

《南无混元弘阳宝忏》

《销释混元弘阳大法祖明经》(又名《销释混元弘阳随堂经咒》)

《销释混元弘阳灯光华藏经科》(二种)

《弘阳祖明经科仪》

《销释混元弘阳荐亡本、孤魂调》

《混元弘阳教佛韵全册》

《混元弘阳表文全册》

《弘阳至理归宗思乡宝卷》

《混元弘阳救苦观灯》

《混元弘阳宝灯》

《混元宝灯起止规范》

《混元布袋经》

《销释授记无相宝卷》[①]

《销释归依觉愿妙道玄奥真经》[②]

另外,据奏折中所列经卷,尚有《飘高老祖临凡目录》、《红阳结果二品上经》、《混元红阳请祖母报恩觉愿全书》,[③]以及佚失的《混元点化经》。不知李先生所言之《混元点化经》是否即指乾隆年间河南杨集、樊明德混元教所传之《混元点化》,此经后被刘松、刘之协改名为《三阳了道经》、《心王宝卷》、《佛根源治天宝卷》等。[④]

① 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将此经列于弘阳教宝卷之下,见吉冈义丰:《民众社会に於ける宝卷流宗教の展开》,载[日]《宗教文化》3(1950)。

② 附于《销释混元弘阳大法祖明经午科》之后,编者疏忽,未将二者分开。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所附清单,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④ 以上所列经卷名称见韩秉方:《红阳教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宋军:《清代红阳教》,第104—105页。

第五章　浙江无为教与姚门教

从历史渊源上看,明末清初浙江处州一带的无为教,实际上属于明代黄天教的支派。黄天教自北方南传以后,成为三个分支。一支是浙江处州缙云县无为教,一支是浙江处州庆元县的龙华会(姚门教),一支是福建瓯宁的老官斋教。

一、应继南与无为教

黄天教传入浙江处州后以"无为教"的名称流传。明末该处无为教教首卢本师法名普僧,收徒应继南,应继南相传是该县虎头山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44)七月十五日正式加入无为教。后来,应继南通过与其师辩论,其师折服,遂自称罗祖(罗梦鸿)转世,卢本师便承认应继南为无为教之二祖(初祖是罗梦鸿),并且拜他为师,从此,该教留下"三十年前师度徒,三十年后徒度师"的传统。这样,应继南便成了当地无为教教主。有一偈语说:"先选山东莱州府,翻身又到虎头山。六年苦行遭魔难,双林说法度群迷。"偈语首句是指罗梦鸿为山东莱州即墨人,次句指罗梦鸿转世托生在缙云县虎头山,成为应继南。

有关浙江处州无为教始祖应继南的姓名,历史记载尚有歧异。姚门教的经卷《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称该教祖师是在"缙云县五台馆殷家出世","取乳名,殷继南称"。[1] 而在该宝卷的《庆元三复》中在讲到姚文宇系应继南转世时,却说姚文宇"至在山东人不识,转身缙云投应家",称无为教祖师姓应。在无为教的经卷《应祖行脚宝卷》中,也称该教祖师姓应,"应祖师于嘉靖六年二月廿八日降凡在处州府丽水县应家庄,父元汇,母李氏,讳继南"。[2] 另外,我们从清顺治九年无极正派即应氏无为教的传人普伸在重刊开心法要本《五部六册》时所撰《祖经法要补注宗教会元序》中也提到:"无极圣祖复化应翁,讳继南。舍身喂

① 《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缙云舟转"。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浙江巡抚三宝折,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虎,割肉饲鹰。六年苦行,入灭双林,遗三乘教法。"这些记载又皆称该教始祖姓应。在姚门教的《龙华科仪》里也说:"无生老母在家乡,观见大地男女轮回受苦。老母慈悲,亲自降凡在山东莱州府即墨县罗家。苦悟一十三春,注集五部六册经书颁行天下,扫出一宗公案,离却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钥匙未付,直指未传,诸人不得安心命。转到缙云投应家,大众功未完,化未满,单度二十八位化师。后来又转庆元姚家,开化度人天,钥匙交付诸人,开透无缝,玄关钥匙就是三乘,三乘就是钥匙。"[①]鉴于《应祖行脚宝卷》乃无为教的经卷,《祖经法要补注宗教会元序》乃是应氏无为教传人普伸所撰,而《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和《龙华科仪》则是姚门教经卷,况且在该宝卷中也有无为教祖师姓应的记载,故当以无为教始祖姓应为可信。为了核实此问题,笔者曾亲自到浙江缙云县进行实地考察,确认处州无为教的创始人确实是"应继南"而不是"殷继南"。[②] 而且从教义来看,处州应继南所传无为教,更接近黄天教而非罗教。不过,由于应继南的加入并被承认他是罗梦鸿转世,处州的无为教也发生了变化,该教后来不仅自认是罗教分支,而且把《五部六册》奉为经典。应继南为了使人信服,还编造了一个罗祖传承的谱系。

罗祖——普能(殷继南)——普记——普羽——
- 普卿——普积——普记——普上
- 普伸——普会——普里
- 普电——普奏——普官
- 普护——普中——普钦[③]

这个谱系乃应继南为了假冒罗教而编造的,据明代秘密教门的经卷《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可知,在罗梦鸿的传灯弟子中,并无应继南其人。"度传灯共七位续祖源根,头一位心安祖遗留语录,心安集共六部刻本开通。洞山祖留了义通传大道,上中下三册经印造流通。孤舟祖十七年留下宝卷,留双林上下卷刻造通行。旧儿峪孙祖师受苦无数,留真空二册经万载标名。昆仑祖闻妙法三十七载,留从林上下卷接续传灯。玄空祖在山中苦修数载,留般若七部经刻造通行。西天有四七祖东土立世,无为门有七位续祖传灯,从无始到如今

① 《龙华科仪》上卷,第91页。

② 秦宝琦:《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新发现》,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87—95页。

③ 《台湾通志》卷二,人民宗教篇,第三章,第六节,第78页。

三十六祖。"[①]从这段经文中可知,罗梦鸿弟子所传一支,第一代为李心安,著有《心安三乘语录》共六册;第二代为秦洞山,著有《无为了义》三册;第三代为宋孤舟,著有《双林宝卷》二册;第四代为孙真空,著有《真空宝卷》二册;第五代为千昆岗,著有《丛林宝卷》二卷;第六代为徐玄空,著有《般若莲花》七部;第七代为明空,著有《了义保命真空宝卷》,六册。[②] 应继南之所以能取代其师的教主地位,并自称罗祖转世而为弟子所信服,绝非仅仅因为他能言善辩。他本人曾著有诸多经卷,如:《圣论宝卷》、《天经》、《结经》、《直指口诀》、《恳切为叹世歌》等经卷,并且有传教与组织方面的才干。他于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率领弟子登天台山,宣扬其教法,集徒众三千余人,引起明廷之警觉,遂以"妖言惑众"之罪,把他逮捕,囚禁于处州监狱中,万历十年(1582)八月四日被处决,终年43岁。

从应继南的生平事迹来看,他原来属于黄天教的支派无为教,后来,他在处州所传无为教中融入了罗教的内容,并念诵罗教经卷《五部六册》,于是遂以罗教自居。清朝官员根据教徒供词,也就把这一支无为教归入了罗教。雍正七年(1729),无为教教首张维英被捕,福建巡抚刘世明曾对他亲自审讯,并将其供词上奏朝廷。"据张维英供:我们是乡间人,此教是罗明忠的祖上罗成就在正德年间传下来的。封为无为教,诵的是一部苦心悟道经,吃斋点烛。问其教主是谁?答云是罗祖所传,有浙江处州府庆元县人姚文羽,他的子孙姚细妹,法名叫普振,就号为祖师。""各人俱在家修行,浙江姚家有一祠,名为西雨堂。初进这教,只要六分银子,就传一乘经,是默念的。若交一钱二分,传他二乘,也是默念一百零八个字。若交银三钱三分三厘,就传三乘经的。遂问:你这经典从何处得来?据称原是宁化县人陈万善,法名普万,我们也不认识。他于康熙二十年间曾到京赴会请来的。遂问其陈万善现在何处?据称他一家儿都搬到江西抚州府经堂里住去多年了。又问:你们的经既陈万善在那里请来,为何又称姚细妹是祖师呢?据称,经虽是陈万善请来,到底是姚家传的教,所以尊崇姚家的。"[③]张维英所供"罗明忠祖上罗成就",便是指罗教始祖罗梦鸿。供词中提到的"浙

---

① 《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第六品。

② 郑志明:《天生老母信仰溯源》,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③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三辑,福建巡抚刘世明折,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第697页。

江处州府庆元县人姚文羽”，便是自称殷继南转世的姚文宇（详后）。福建巡抚刘世明当时正在奉旨查办罗教，既然张维英自认无为教乃“罗祖所传”，并自认属于罗教，刘世明当然也就顺水推舟以罗教案上奏朝廷了。

乾隆前半期无为教在浙江处州府一带仍很活跃。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上杭人郑统来至处州府遂昌县传教收徒，他自称系无为教教首张普天即张玉柱之徒，劝人持斋念佛，可以消灾祈福。乾隆十六年（1751），该县蔡立贤、鲁圣先二人拜郑统为师入教。其后蔡、鲁二人又各自传徒十余人。该教规定：每年正月二十九日，二月二十八日，八月初四日及十二月初一日，同教之人各出银六分，在郑统家中摆设蔬菜果品，并设置空椅一把，指为无为教罗祖之位，并悬挂天地君亲师画像，献祭诵经，礼拜图像。遇有烧香之人，便向其讨求布施。用敛得之钱建造寮篷、塑像，号称斋公，并用来购置田亩，供教内用度。[1]

二、姚文宇与姚门教（龙华会）

应继南之后，又有姚文宇假称应继南转世，创立龙华会。姚文宇，号镜山，法名普善，生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农历三月十九日，浙江处州府庆元县松源镇姚家村人。以往有学者根据《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中所记载“太上无极圣祖乃浙之括苍庆元松源东隅人也”一语，认定姚文宇是庆元县东隅村人。其实“东隅”并非地名，而是指庆元县的东面。实际上姚文宇及其家族，皆生活在庆元县东面的松源镇姚家村，其子孙至今仍聚居在该村。有关姚文宇的生平及所创姚门教，在姚文宇孙婿普浩所撰《松源实录》及该教经卷《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的《庆元三复》中，皆有所记载。笔者曾在庆元县进行过实地考察，并结识了姚文宇的嫡传子孙姚德泽先生，承他提供《庆元姚氏总谱》，使我们对姚文宇和姚门教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从《庆元三复》中可知姚文宇自幼“家贫无艺，挨延岁月”，靠为人放牧绿鸭为生。后因“逐日见伤性命甚多”，“终期见物伤心”，遂欲寻别业谋生，但又“无处可投”。一日，他偶坐后山准提阁凉亭，“遇一游方道者，问他为何在此久坐？”姚文宇讲明上述缘故，道者曰：“既有如此好心，何不皈依道门，自有超凡入圣之日。”姚文宇欣然依从入教，取法名普善，

① 《朱批奏折》浙江巡抚三宝折，乾隆四十年二月初四及三月二十五日。

号镜山。从这位“道者”为姚文宇所取法名“普善”来看，他肯定也是黄天教徒。道者又劝他可以在路旁“做些点心生意”，既可维持生计，又可济行人饥馁，自己则处于“半凡半仙”境地，度化他人。姚文宇听从其劝告，便“日间店中生意，夜则止静参功”。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即姚文宇三十六岁时，因羡慕无为教教主应继南的教主生涯，便来到缙云县吴谷阙为应继南坟边守墓一年，然后又到各处去求道。他在回到庆元县家乡后，便自称“悟道”，并悟坐功：“头一层功夫名小乘，念二十八字偈语。第二层功夫名大乘，一百八字偈语。上乘没偈语，单是坐功。学小乘送香资三分三厘，学大乘一钱二分。上乘出银一两，以六钱七分供佛，三钱三分送老祖堂。”[①]他又声言自己是“二祖”（指应继南——引者）转世，自称“无极圣祖”。后来无为教与龙华会内之人，皆尊罗梦鸿为祖师。据老官斋教（即姚门教在福建建安、瓯宁一带的名称）内之人称：“姚姓远祖普善，遗有《三世因由》一书，托言初祖姓罗，二世姓殷，三世姓姚，现为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②]他最初因“人缘未至，人不知信”，难以传徒。后来在浙江武义县逆溪地方，遇到化师普理、普波夫妇，二人拜姚文宇为师。其后，又得到在逆溪靠种靛为生的同教、福建汀州人李老麻（法名普敬）十两白银的资助，使姚文宇得以在普波家中“开堂接众”。两年之内，便“道法大行”，收徒 3784 人。在《庆元三复》中写道：“遍十方，到处访，不遇知音。到天启，元年间，逆溪行道。有普理，共普波，斋戒同心。俱有缘，听指点，早求正法。得正法，明心性，果是原人。种靛青，李老麻，集资十两。肯助缘，开道门，就付单传。天启二，因缘至，渐渐明显。遍金华，各会下，处处传开。”姚文宇从万历末年起开始立教传徒，称“龙华会”。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他在汤溪湖塘开初次龙华会，天启七年（1627）三月初七日，在郭口叶家开第二次龙华会。崇祯五年（1632），在金华汤溪县庭九地方开第三次龙华会兼千佛会。[③] 姚文宇为了便于传徒，于崇祯二年（1629）把龙华会分为三支，按照“三支九派”向各地传播，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教网络。所谓“三支九派”，就是由姚文宇本人任教主，下面分为中、左、右三支，每一支又按照“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和”分为九支，总共九九八十一派。后来因为王姓化师退道，永丰化师赴高丽，遂将悌、信两支取消，改为七支。

---

① 浙江巡抚雅尔哈善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四期。

② 《朱批奏折》福州将军新柱折，乾隆十三年二月十三日。

③ 《台湾通志》第1册，第3章，第6节。

左右两支也减为五派,变成三支七派。姚文宇自领中支的礼字七派,所属化师7人是:普相、普全、普柏、普金、普卿、普敬、善传。在礼字化师之下,每人又各传七名义字辈化师。如此,义字辈化师便有了49人,每人再各传七名廉字辈化师,依此类推。左支由其徒弟普理所领,其下有礼字辈化师5人,即普花、普涛、普香、普元、普果。这5人之下,便是义字辈五派,共计25人。其下也是廉字辈五派,依此类推。右支是由他的最早的女弟子普波所领。五派弟子为:普绣、普宝、普英、普鲵、普贵,每人又领五名廉字辈化师,共计25人,其余依此类推。[①]姚文宇企图通过这个庞大的传教网络,形成"定代相传,枝枝叶叶连绵不绝,永远流传"的局面。在清代,尽管该教不断受到当局的打击,但仍然一直流传,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取缔会道门时仍在秘密活动。由于姚文宇能言善辩,很快拥有了众多的弟子,以至在明天启元年(1621),位在其上的普福也拜他为师。他又以应继南有过"三十年前师度徒,三十年后徒度师"之言,使他的师父、永丰化师普记也拜他为师,并承认他为应继南转世。不过,姚文宇此时虽然弟子甚多,但却面临着"各方信邪者众,正信者少"的困难局面。"罗门不信姚门道,如茶当酒不醉人。殷门不进吾门教,如石做宝未为真。旁门不归姚门法,如有沉海苦无穷。吾门不守吾之行,如日当空被云霞。"不仅如此,就连当时教内的"清虚"即副教主汪长生也"不依师言,另立科规",从姚门教中分裂出去,另立长生教。[②]为了巩固自己的教权,姚文宇于明崇祯二年(1629)对教内"各方大众"曰:"我今三世复来,普传正法","今幸人缘已至,正法流通,欲续灵山正派,接续人天。"从而正式脱离了应继南的无为教,而自称"灵山正派",后来自称"姚祖教"或"姚门教"。姚文宇还对教内的组织加以整顿,按照"三支七派"建立了传教网络,姚门教从此便以更快的速度,向各地传播开来。

崇祯四年(1631),姚文宇见各方道场已盛,令各支皆建造"太极祠"。翌年,又与方汝茂前往徽、宁二府传徒,崇祯十三年(1640),收金华人佛寿为义子。经过姚文宇的多年努力,使姚门教"道法通行明显,信香遍传于各方"。众多的信徒,则为他带来滚滚财源,使得姚姓家族"富饶遍传于各方"。适值明清鼎革之际,各地群雄蜂起。清顺治三年,割据处州的杨鼎卿父子,以"助饷"为名,对姚文宇进行勒索。姚文宇的义子佛寿此时正在杨鼎卿帐下任职,称姚家"田连阡

① 《朱批奏折》提督浙江总兵史弘蕴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

② 《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

陌，米烂陈仓，金银盈床，珠宝盈箱"，更激起了杨鼎卿父子的贪欲，遂把姚文宇押往相邻的龙泉县，令他"助饷"。姚文宇不肯，杨鼎卿大怒，即派兵数百，将姚家住宅团团围住，尽掠其家财而去。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姚文宇也"被害归天"。姚门教经卷《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关于姚文宇的终年，与《姚氏总谱》的记载不同。前者称姚文宇"寿六十九"，而在该族谱《姚文宇传》中却称姚文宇"享年七十有四"，相差五年。我认为此差异与《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关于姚文宇出世后五岁前不曾言语，明万历十年应继南故后"才开言语"的神话有关。《庆元三复》为了把姚文宇神化，并附会姚文宇是应继南转世之说，特意编造出一段神话，称姚文宇出生后直到五岁，一直"不曾言语，如梦未觉"。直到应继南"归空"，即明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三日子时，姚文宇"才开言语"。"蒙祖师，来托化，以姚为姓；为众生，又转凡，三复庆元；因十方，难化度，胎里食素；到万历，六年间，身又临凡；生五年，不谓说，无言无语；十年间，殷祖没，并性归员源；一时言，能谈论，知根达本。"《庆元三复》所说姚文宇终年69岁，是从明万历十年姚文宇开始说话即应继南去世那一年算起的，故比姚氏总谱中《姚文宇传》少了5年。这乃是为了附会姚文宇乃应继南转世的神话，并不足信。而《庆元姚姓总谱》属于族谱，较为平实，未采用神话故事，故所记载的姚文宇终年74岁之说较为可信。

姚文宇故后，其发妻夏氏与长子避难于铁岭，后来移居福建西表，继妻周氏与子姚铎避之前山。周氏因"子幼身孤，祖堂难以居住，在外暂住数年"。清顺治七年(1650)，周氏返回松源，将姚文宇的尸身葬于镜山之阳，其教主职位，便由姚铎承袭。有著作称，姚文宇故后，"次妻周氏及幼子姚绎避之前山"，"顺治七年(1650)周氏葬姚文宇于庆元铁岭之阴"。[①] 此说与《太上祖师三生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中之记载不同，当有所本，为此，我又对姚家的后裔进行了采访。我在庆元县有幸见到了姚文宇的嫡传后裔姚德泽先生，他家中藏有一套完整的姚氏族谱，在道光五年重修的族谱《庆元姚氏总谱》提到，姚氏一族"世居晋

---

① 马西沙等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中把姚铎误作姚绎，并根据《庆元三复》，称"普法(姚铎)死于康熙年间，时年五十七岁"。这是作者误解了《庆元三复》的一段内容。在该书结尾处提到："大祖母夏氏"于康熙丁巳(十六年)身故，"寿享六十九岁"。"二祖母周氏"于康熙辛亥年"归天"，寿五十七岁。文中提到周氏曾"教训其子讳绎号孟宣"，作者便把文中有关周氏故于康熙辛亥一事，误作姚铎于康熙辛亥年"归天"了。见《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5页。

阳，追宋季南迁，从临安而龙泉，由龙泉而庆元”。在《庆元姚氏总谱》中载有姚文宇小传，称姚文宇“字汝盛，号镜山”。他“不饮酒、不茹荤”。姚德泽先生告诉我，姚文宇之号即取自所居松源附近之镜山。从姚文宇的小传中可知，他的次子名姚铎而非姚绎。总谱中亦载有姚铎之传，称他“讳铎，字孟宣，母周氏，流离困苦，及国朝定鼎，甫归家”。姚铎回到松源后，其母周氏为他延师读书，及长，便承袭了姚门教教主的职位。不过，姚铎传中称他年38身故，与《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中记载姚铎“于康熙辛亥年五月十七日归天，寿五十七”不同。何者可信，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姚门教的相公制度与十步教法

姚文宇一生致力于姚门教的创立与发展，他为了实现“以家治道”的理想，使自己的嫡系子孙永远担任教主，在教内建立了“相公”制度，即以姚姓嫡派子孙作为教主，称为“相公”，世代相传，在教内实行封建家长制统治。相公作为教主，有权决定教内一切重大事务，各地佛堂的收入，除一部分留作佛堂经费外，大部分要上缴相公。所以，相公不仅拥有教权，而且有着丰厚的财源，故成了姚姓子孙们争夺的对象。除第二代相公由姚文宇次子姚铎承袭外，从第三代起，每代至少有两位相公。如第一代相公为姚文宇，法名普善。第二代为姚铎，法名普法。第三代有两位相公，即普高和普宗。第四代有三位相公，即普恩、普人、普主。第五代有六位相公，即普母、普守、普汇、普标、普御、普题。第六代有三位相公，即普富、普裕、普尧。相公只负责教内重大事务及为信徒授取法名，以及为信徒授予较高教阶，一般教内具体事务则由“总敕”、“当头”管理。

姚文宇还在教内制定了“十步教法”。

我们从乾隆、嘉庆年间有关姚门教教徒的供词可知十步道法的基本内容。乾隆十八年（1753）浙江宁波的教徒周喜吉供称，“祖师普善没有经典，唯头一层功夫名小乘，念二十八字偈语。第二层功夫名大乘，有一百八字偈语。三层没偈语了，只有坐功。”[①]嘉庆十九年（1814）江西贵溪人张起坤供称：从万年县人叶益章入吴子祥的大乘教，又称“姚祖教”，传有“五戒”及“十步教法”。“第一

① 《朱批奏折》提督浙江总兵官史弘蕴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

步名小乘，仅只吃斋。二步名大乘，兼习静功，三步名传士，取普字派名，并授经卷。四步名小引，传点信香，即可掌法。五步名大引，六步名四句，""七步名传灯，八步名号敕，九步名明敕，十步名蜡敕。"①

与张起坤同教的桂自榜则供称该教有十二步教法，其内容是：

一步名小乘，系七字经句："一心心善念弥陀，莫等流落下街头；真心常念菩提路，凡自跳出自心窝。"

二步名大乘，系经咒二十八句："一心只念，本是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跟巴跟结长觅随身佛，急难多，白踏呐，随他落心，早念假(伽)罗汉，娑婆诃金刚。早念假(伽)罗汉，娑婆诃菩提心。早念假(伽)罗汉，娑婆诃审问心。早念假(伽)罗汉，娑婆源觉心。早念假(伽)罗汉，娑婆门，心空月日渺，空地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文中多有错别字)

三步名三乘，学至此步者，便可取法名。取法名时，将桌子排设天地人和方位。上为天，下为地，左右为人和。受教之人面向外，两手反卷背后。传教师傅将他手脚掐捏，称为"开五行口"。称左手三分仙骨，右手三分仙骨，两手合住，反复揣摩。口念"娑婆诃"即将两手轮之印堂，闭目伏气，即为心印。相传参功悟道，自"开五行"之后，即不许打人，不拿秽物，不拍掌。伏气之后，又将小乘、大乘各咒并为一起诵念。每念四遍为一回，能多念更好。然后再念《大乘心经》即《十进步十退心经》，及《结经》、《天元经》、《十报经》、《十忏经》等。

四步为小引。凡学此步者，拜佛要烧五炷香，中炷名为定香，次炷为戒香，三炷为慧香，四炷为知见香，五炷为解脱香。老师傅传下说，左手善，右手恶，先烧头二炷香，用左手，后烧四五炷香，左右两手分执，一齐插上。拜佛时，将左手包住右手，名为"善包恶"，拜毕即念三皈五戒。

五步名为大引。学习此步者，每于三更时候参功悟道，每日无事打盘脚坐，紧闭六门，静心运神，使气上升，自顶心由鼻口而出。六门系指：眼系东门，又名广木；耳为西门，又名撑丈；鼻为北门，又名都闻；口为南门，又名赤田；下部前为生门，后为死门。

六步名祀主六门道。此道名是要在老师傅跟前学会祀主六门道，方可掌教。在佛前进香，带领众人拜佛，其"法力"与小引、大引无异。其余众人总由祀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主派充稟斋等项执事。所有供桌上两支蜡烛,称为两轮日月,贡献各果品,称为金木水火土。内系佛饭为金,枝圆为木,茶为水,烛为火,香炉为土。亦要参功悟道,六门紧闭。拜佛事用碗两个,上下合着,内装糯米斋饭,安放供桌上面,将两手在袖内挽住,后用左手揭开上覆之碗,名为"开天",即口念"十方阿弥陀佛"及《心经》、《天元经》、《十报经》。

七步名燃灯,八步名清水,九步名号敕,十步名明敕,十一步名蜡敕,十二步名总敕。七步之后,供词未加详述。[1]

从该教所立相公制度及十步教法可知该教与罗教有很大不同,故有台湾学者认为"殷继南、姚文宇为自我研习罗教之人,非罗教正统之续灯弟子"。[2] 大陆学者韩秉方也认为:"斋教(指其中的姚门教)已经发展成枝叶繁茂独立的新兴民间教派,已与北方的罗教不相统属。尽管有时外界仍称其为罗教,那只不过是见其追认罗祖为始祖,仍讽诵罗教五部六册,不了解内情而已"。[3] 姚文宇故后,其子孙和教内骨干便把姚门教向四面八方辐射式地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教网络。在浙江庆元县的一支,一直由姚文宇的嫡派子孙担任"相公"即教主,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取缔会道门时才终结。清顺治三年(1646)五月二十九日姚文宇身故,教主职位由其次子姚铎承袭。姚铎字孟宣,法名普法,清顺治二年(1645)生,庶母周氏所出。《庆元姚氏总谱》讳言其传教及充任姚门教第二代"相公"等事实,而称他曾入太学,并应北直隶乡试,后参加清军,随征福建,平定耿精忠之乱,年三十八岁身故。我们虽然尚不知《庆元姚氏总谱》中的记载是否属实,但是也不能据此认为姚铎并未参与过传教活动和曾任姚门教第二代"相公"等事实,因为《庆元姚氏总谱》中所有曾任姚门教相公的姚姓子孙的传中,皆未提及其传教活动和曾任姚门教相公之事,如姚必起、姚瀛松、姚汉揖、姚海查、姚秉信等人,皆系姚门教教主,清档中皆有关于他们传教活动的记载,而《庆元姚氏总谱》中为他们所立的传,皆讳言其事。可见,《庆元姚氏总谱》中没有姚铎传教收徒和曾任第二代相公的记载,并不等于他未参与过

---

① 摘自教徒供词,见《军录》2790/2。

② 郑志明:《台湾斋教的渊源及流变》,载《台湾民间宗教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40页。

③ 韩秉方:《罗教的教派发展及其演变——兼答王见川先生的质疑》,载王见川等编《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94页。

姚门教的活动。

从清档可知，姚铎即普法在康熙年间已从庆元迁居浙江温州的永嘉县，据乾隆十八年(1753)该教的普栋供称，“祖师普善(姚文宇)的儿子普法在温州落了业，那里有老祖堂。”①所以，乾隆年间姚门教在庆元和温州永嘉皆有祖堂。姚文宇的发妻夏氏生有一子，乳名长生，顺治三年(1646)姚文宇身故时，长生刚满周岁，随其母夏氏避难于铁岭，旋迁居与庆元比邻的福建政和县西表村。② 后来，这一支姚门教便在闽西北一带流传，称“龙华会”或“老官斋教”，因为“入会吃斋之人，乡里皆称为老官”，③故名，并自认属于罗教。康熙年间，姚门教的一个教首陈万善，回到家乡江西临川县传徒。他为了抬高自己在教内的地位，特意把姚姓子孙姚焕一从浙江请到江西临川。雍正七年(1729)清朝当局查拿罗教，因姚门教自认是罗教，受到查拿，遂改名为“一字教”。④ 所谓“一”字，便是指“普”字。为了躲避查拿，当时的教主姚文谟便偕妻蔡氏迁居到江西石城县高田村，投奔在该处居住的同教黄子敬。姚文谟弟兄四人，大哥姚千佑，二哥姚成武，姚文谟行三，弟名姚际媚。乾隆十三年(1749)，老官斋教在福建建安、瓯宁举行反清暴动，被清方所镇压(详后)。乾隆年间，浙江庆元县虽然已不再是姚门教唯一的传教中心，但是，姚文宇的嫡派子孙仍然居住该处，该处也设有祖堂。乾隆十三年以前，姚姓教主姚普益、姚正益每年仍到福建建安、瓯宁一带，为当地入教者派取法名敛钺，“携回作香火之资”。⑤ 该教一部分迁往浙江温州府的永嘉，另一部分早在雍正年间就已迁往江西临川和石城了。

嘉庆年间姚姓子孙继续传徒习教，如姚瀛松、姚海查及迁居温州的姚汉揖即姚狄先弟兄，皆继续传徒。姚海查又传其侄姚秉信，把该教传到江西玉山、临江、鄱阳等地。⑥ 在江西的这支姚门教，在清乾隆年间与来自北方的罗祖大乘教相会遇，通过江西贵溪人吴子祥融合为大乘教，以后又在西南四川和贵州形成了青莲教。

---

① 《朱批奏折》浙江总兵官史弘蕴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
② 《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
③ 《朱批奏折》福州将军新柱折，乾隆十三年二月十三日。
④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开泰折，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⑤ 《朱批奏折》福州将军新柱折，乾隆十三年二月十三日。
⑥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程祖洛折，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第六章　清初秘密教门从萧条走向复苏

清初顺治与康熙前半期，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凋敝状态。经过明清之际长达半个多世纪战乱的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土地多被抛荒，作为我国当时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即自耕农与佃农阶层，受到很大摧残。他们中间只有少部分继续留在农村，挣扎在饥饿或死亡线上，其他人有的背井离乡，逃亡他处；有的参加了农民军或抗清义师。以小农为主要成员的秘密教门，自然也呈现萧条状态。当时只有少数明季以来延续下来的秘密教门进行零星的传教活动，有些则参加了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总的看来，清初顺治到康熙前半期，秘密教门不仅规模小，而且大多旋起旋灭。

一、萧条中的清初秘密教门

（一）社会经济凋敝与小农经济的破坏

清初我国依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直接生产者主要是自耕农、佃农与农村小手工业者。自耕农拥有一小块土地和生产工具，独立进行生产，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通常既不大于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少于足以养活他家口的限度”。[①] 在当时，小农是被视为“中人以下”的社会阶层，他们“自食其力，薄田数十亩，往往子孙世守之”。[②] 佃农是失去土地所有权，佃耕地主土地的农民，不过他们享有人身自由，拥有生产工具，只是需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向国家缴纳赋税。手工业者往往也拥有一块土地，同时从事手工业与农业生产。还有一种农村直接生产者，是农奴。他们不仅没有土地，而且没有人身自由，如北方旗地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98 页。

② 光绪《霍光县志》卷二。

的奴仆，南方的"世仆"、"伴当"等，不过，在数量上已远不如前两种多。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生产规模小，自给自足，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其收入一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自家消费及向地主缴租，向国家纳税。男耕女织，生产技术落后，墨守成规。农户之间很少交往，"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绝"。[①] 因而大多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式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地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惧怕天灾人祸，渴望过上好日子。既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又担心失去仅有的一点薄产。由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而变得思想保守，愚昧无知，容易为各种迷信宣传所吸引。秘密教门有关入教后可以消灾获福，死后不变畜类，来世可享荣华富贵等宣传，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所宣扬的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侠肝义胆等内容，也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因此，早在明代，秘密教门和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便都很盛行。可是，明末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与社会动乱，把大批小农抛向了饥饿与死亡的深渊，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他们不堪地主的剥削、压迫而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许多人因不愿忍受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而加入各地抗清队伍，或因战争的破坏而流离失所，逃亡异地他乡。在这种情况下，对处于饥寒交迫下的广大农民，首先要设法生存下去，终日都要为吃穿而奔波，自然顾不上烧香礼佛，或结拜弟兄了。所以清初顺治到康熙前半期，秘密社会的活动便处于萧条之中。

（二）处于萧条状态的清初秘密教门

顺治到康熙前半期，只有少数明季以来延续下来的秘密教门存在。它们的活动，一般规模较小，很少引起官府的注意，所以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也比较少。

顺治年间秘密教门的活动，一般比较零散，多与武装反清有关。陕西总督孟乔芳奏：顺治二年六月十六日，"妖贼胡守龙等假焚祝之名，阴行煽惑，聚众数万，自称徐会公，僭称清光元年，造妖符妖印，结党倡乱"。并有"皇极妖经"一卷。[②] 所谓"皇极妖经"，即闻香教的《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胡守龙以闻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93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教在陕西聚众造反，孟乔芳即调兵将其驱散。其他地方亦相类似，当时山西地方清将说，"晋省邪教社党，实繁有徒"。[①] 顺治二年三月，宣化府的蒋家峪，爆发了善友"邪教"对抗清军的事件。四月，又有善友会徒众占据村堡抵抗清军。[②] 顺治四年五月垣曲县有"邪教高飞、凌尚等盘踞山谷为乱，抚宪檄平潞各营兵进剿之，地方以宁"。[③] 阳城县民王希尧、贾国昌等"以邪教倡乱"。[④]

教门的反清活动，迫使领军追击李自成农民军的清军统帅阿济格等人，不得不改变既定计划，调动军队，对教门的造反活动进行军事镇压。山西巡抚马国柱也暂时停止了对大顺军高九英部的攻击，整兵防堵，并行文合力剿除，调动军队来对付"邪教"，以便"随起随灭"，根除晋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

在南方，同样出现了教门抵抗清军的事件，同样遭到清军的镇压。顺治五年二月，福建宁化"秘密妖贼赖子明拥众数百，扎乌村。高副总擒诛之，党悉平。"[⑤]

在以军队围剿"妖民"的同时，清朝地方政权也着手对教门进行查处。顺治二年五月，山西宣府巡抚冯圣兆奏报捕获"妖民"刘伯泗，以其"掘穴得石匣，内函天书。又石弹内有元帅印，遂自称天罡星"，顺治"命斩之"。[⑥] 个别地方还发出告示，严禁教门，如顺治三年三月，直隶武强县即接到保定府、定州道的帖文宪票，要求地方官员出示严禁白莲等教的告示，贴遍四处。[⑦] 当时京师附近"邪教"盛行，对中原的教门如何处理，成了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清廷在临以兵威的同时，亦考虑制订律例加以惩治。

顺治三年六月丙戌（十一日），新科进士、吏科给事中林起龙上"速禁异端止讹言以安人心疏"，文中说，明末教化不兴，风俗大坏，异端蜂起，白莲教、大成教、混元教、无为教，"种种名色，不能枚举"，"此辈以游手奸民妄称教主，聚众招群，男女混杂，不分昼夜，私印经文，讹言滋兴，人心煽惑。良民不安生理，不务耕作，烧香礼忏，不曰此处有活佛，则曰来世生真主，抑或谓目下天降异灾，人死

① 明清档案，A6－50，山西巡抚申朝纪题本，顺治四年七月。

② 《贰臣传》卷四，李鉴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

③ 光绪李焕修《垣曲县志》卷四，兵防。

④ 《清史稿》列传二十七，申朝纪传。

⑤ 康熙朝李元仲修《宁化县志》卷七，寇变志。

⑥ 《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⑦ 见郝晋揭帖，顺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九分，或谓几时国动大兵，杀尽大半。"林起龙认为此等愚民，争相随逐，别生事端，以至抛家弃业，或至从盗贼，或起逆谋，"真奸民之尤者"，因而建议敕令内外官员严加谕禁，"如遇各色教门，即行拿问，处以重罪"。①

林起龙认为异端蜂起，教化不行，实乃关乎"人心安静、根本永固、杜渐防微之大端"，万万不容忽视，确实为当时的要务。当时清朝刚定鼎北京，人心未稳，一有传闻，即闹得满城风雨。为了巩固新的政权，必须对不利于统治的"左道异端"予以打击。林起龙的奏折，明确提出严禁教门，"以为防渐杜微之计"，顺治帝下令"从之"。②

当时，各级官吏求颁布新律，以便"示民划一"，利于新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否则，"天下无所遵守，不但犯法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用法者不免乘一时之意"，③清帝即命臣下"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裁量"④，制订《大清律集解附例》，并将有关禁止"邪教"的律文，列入其中：

"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惑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以行祈报者），不在此限。"⑤

《大清律集解附例》系根据明律略加修订而成，内容变化很少，"禁止师巫邪术"条文与明律原条例比较，只增加了括号内的小注，以使意义更加明确，而对为首者的处罚由绞改为绞监候。

清初由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比较尖锐，故当时秘密教门的活动，往往同反清斗争相结合。尽管新颁布的清律有禁止传习"邪教"的专条，但教门活动仍然继续存在。

顺治三年七月，直隶真定府晋州武强县有赵高明等人"专习邪教，听信妖书妖言，传用鼓众，煽惑人民，夜聚晓散"。赵高明同教之赵万银、赵应亨等人，自

---

① 《皇清奏议》卷二。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刑科给事中杨璜疏。
④ 顺治三年《御制大清律序》。
⑤ 马建石主编：（吴坛）《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 543 页。

顺治二年起吃斋，曾拜从饶阳县孔姓之人为师，“俱皈依大成教门”。大成教即大乘教，每日叩头三次，一报天地，二报皇天，三报父母，以烧香避事。并宣称：“将来兵火临头”，入教之后，便可“消灾免厄”。赵高明曾邀请孔姓教首来到家中，抄录《九莲经》、《定劫经》及《黄石公御览集》等经书。其中有“十疋小月是个赵”之句，鼓动赵姓之人入教。该教之经卷皆“装订缮写精工”，但“其词语谬戾”，既“非明心见性之说”，又“无吃斋念佛之句”，内中且有“弥勒佛掌教”之语，以及诸多隐语、暗号、图忏、符录及“兴亡姓氏、年月地理”等内容。据赵高明供称，隐语中“十疋小月坐龙墩”之句，意指赵姓将得有天下。清政府认定该教“明有争夺天下”之意，乃“效张角、刘福通之所为”，加上赵高明等人在被捕时还“违旨蓄发”，遂依照叛逆之罪，处以绞刑。①

顺治五年五月，江苏通州“妖人苏成造逆书，谋为不轨，被获伏诛”②，苏成实以教门宣传抵抗清军为清军所杀。顺治十年，安徽霍邱县民以洪福教起兵抗清，教门组织群众公然进攻县城，并杀死投清的生员，自然会遭到清军的残酷屠戮。

顺治八年，直隶曲周、广宗等地有宋伯光、栗丁等人传习白莲教，并策动反清起义。宋伯光自称明天启皇帝第三子，欲举兵反清。适有白莲教首栗丁来访，宋伯光以栗丁系教内首领，结识的人多，遂封他为“首帅”，又封曾替他算命的曲周县人张振魁为“军师”。他还令人制造了大量号布、旗帜，上书“约访天下诸侯、贤士、英杰”等语，号召各地“聚练屯兵”，以“保稷助国，宁社安民”相号召，纠人约期举事。他又借散发号布来敛钱，每块号布，收钱三四百文。给旗一杆，收银一两。将敛得之钱，作为购置马匹、弓箭之费用。顺治八年二月，宋伯光、张振魁等人商议，于二月十六日举事，届时先攻曲周、广宗、肥乡等县。曲周城内已约有唐修已等于暗中策应，约定届时将城门销簧用铁丝缠绕，以火光为号，将城门打开。广宗有生员李召即李振唐与其弟皆与之同谋。肥乡县有马腾鹗等，散给该县胥吏及工房书办张耀斗等人号布24块，又给其婿刘君显号布11块，二人皆答应届时同攻县城。后因张振魁之兄张经魁恐事败后受到牵连，向官府出首，官府即将张振魁等50余人逮捕，事遂败。③ 顺治十三年，直隶平山县

① 《揭帖》，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郝晋，顺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页310。

③ 《刑科题本》，张存仁题，顺治八年二月初七日。

韩太净"突倡邪教,意欲创乱"。韩太净原籍山西平阳县,寄居直隶平山县。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五日,韩太净在该县马家村等处"啸聚多人",举兵起义,为首者除韩太净外,还有朱慈焞、陈一道、郑良成等三人。朱慈焞自称系明崇祯帝的第三子、河南开封府周王。此次举义是为了"上雪君父之仇,下救万民之苦"。声称"谋事十有余年,即京内亦有我们的人"。以韩太净为军师。事败后,韩太净与朱慈焞等皆被处死。①

以上两起秘密教门的反清事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反映了清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初期,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作为下层群众组织的秘密教门,之所以假托明室后裔,是因为当时以"复明"相号召,在广大汉族人民中间容易得到同情与支持。清统治者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对秘密教门的活动,明令禁止。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上谕礼部曰:"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起会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姿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希谋不轨。无知小民被其引诱,迷罔颠犯,至死不悟。历考往代覆辙昭然,深可痛恨。向来屡行禁馀,不意余风未殄,堕其邪术者,实繁有徒。"甚至"京师辇毂重地,借口进香,张帖鸣锣,男女杂糅,喧填衢巷,公然肆行无忌。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之大蠹"。因而下令,凡"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者,一律"设法缉拿,穷究奸状",并且"于定律外加等治罪"。②

清初顺治年间秘密教门的活动虽然并不频繁,规模也不算大,之所以仍然引起了清朝当局的关注,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总结历代秘密教门造反对抗朝廷的教训,认为各种秘密教门,名目虽然各异,但本质却都一样,那就是俱为"张角、刘福通"一类的造反者,"往代覆辙昭然",必须严加防范。其二,清初秘密教门的活动,往往带有政治色彩,且以复明相号召。这在当时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清朝当局对此十分关注。

尽管清朝当局严加禁止,然而,秘密教门并未因清当局的禁令而停止活动。

顺治十五年,山西平阳府夏县张天等人又秘密传习"无为教"。张天系平阳府夏县曹漳镇上王村人,其父张一品生前便传习无为教,且造过经书12本,自称"弥勒佛下界",传有"正、心、护、元、气"五辈字号,曾收陕西人高林霄等为徒。明季,张一品见天下大乱,向徒众宣称:"山西遍地流贼,要好惟有河南安

① 《刑科题本》,直隶总督李荫祖题,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六日。

② 《揭帖》,监察御史张问政,顺治十七年正月(日缺)。

静。有人跟我下河南，就是有命的"，其徒高林霄便随他前往河南居住。后因河南年荒，难以度日，又返回山西，在高平县寄居，又传该县王明兴等人为徒。顺治十三年张一品身故，其子张天遂自称"未来佛下界"，于胸前刺有"日、月"二字，两臂刺有"乾、坤"二字，两膝刺有"天、地"二字，自任无为教教主。他劝令徒众"吃斋学好"，每逢初一日念经，供以饼果之类敬神。其徒高林霄尊张天为"天师"，先后传宋国友等13人为徒。其后，张天见高林霄之三女儿颇有姿色，便自称"菩萨下凡"，于顺治十三年八月，将高的三女儿诱娶为妻。又令铁匠为他私铸铜印一颗，重五斤半，上篆"正平王镇国宝"字样。还藏有碧玉石一块，重十斤。又在一张纸上书写"金光总明佛包天裹地镇国宝"。并撰字"敕书"一道，其文曰："圣旨一道，跪听宣读：皇帝诏曰，从古帝王所兴创业，自有一代勋臣，定国安民。嗣后名垂玉帛，万古流馨。于今为照兹者，照得胜地天降英才某，仁勇兼具，文武两全，堪为盛朝栋梁，急宜奋身图功，毋容缓待。圣旨以毕，望上谢恩。"①表明张天企图登极称帝。秘密教门的首领中，许多皆怀有政治野心，企图利用教门组织的势力，夺取政权，登极做皇帝。尽管他们本身所拥有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总抱有这种幻想。这些教首，还利用自己的地位，骗诱他人妻女。教徒们出于对信仰的虔诚，往往上当受骗。张天利用传习无为教，企图当皇帝并骗娶教徒之女为妻一事，在秘密教门中是屡见不鲜的。

顺治十六年(1659)，陕西三原县人周裕在广东传习大成教。周裕于顺治六年(1649)投拜吏部侍郎周希贵门下，后来常往广东做生意，并在暗中传习大成教。自称传教目的是为了"靠着入教的人里头布施些钱粮，去盖观音堂"。该教规定，"死了不哭，不做斋，不烧钱化纸，是得大涅槃到清福里去的事"。周裕自任教主，向徒众们传授"七珍八宝"，劝人"领香聚会"。周裕的传教活动十分诡秘，就连跟随他多年的盛启明、小存子二人，皆不了解教内详情。②

顺治十八年在江苏溧阳县也有大成教的活动。当地有端应国、曹氏夫妇，"妄称大乘邪教，煽惑愚民"。③

以上是顺治年间秘密教门活动的情况。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秘密教门的活动，尚处于低潮，大多为明季秘密教门之绪余。由于受当时民族矛盾之影响，多

① 《题本》，钦差提督雁门关等处白如梅题，顺治十五年(日月缺)。

② 《揭帖》，广东巡元张政，顺治十七年正月(缺日)。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七月丙午。

带有反清之政治色彩。

二、康熙前半期秘密教门的复苏

康熙前半期,清廷一方面致力于对全国的统一,另一方面也开始采取措施,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小农经济开始恢复元气,根植于小农经济的秘密社会也开始复苏。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清除了代表保守势力的鳌拜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先是下令停止圈地,明确宣布:凡民间开垦的田地,“自后永不许圈”。① 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汉族农民的生产情绪。接着又实行“更名田”,把原属明藩王而已经由农民耕种的土地,“给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田,永为世业”。② 朝廷正式承认了农民对所耕土地的所有权,使原来明藩王的佃户,成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之后,又奖励垦荒,放宽起科年限,对垦荒的贫苦农民以必要的资助,并以法令形式保护垦荒者合法利益等,使许多原来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又造就了一大批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总之,经过康熙前半期的一系列努力,使清初陷于凋敝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以小农经济为滋生土壤的秘密社会,也从萧条走向复苏。

康熙前半期秘密教门复苏的重要标志,是刘佐臣倡立五荤道、收元教,并且发展为八卦教。

刘佐臣创立的五荤道、收元教,同明末京畿一带的弘阳教有密切关系。明末弘阳教即在京畿一带十分盛行,特别是在宫中太监中拥有不少徒众。清初,弘阳教继续在京畿旗人和宫中太监中流传。顺治年间,京畿弘阳教的一个首领、太监魏子义,曾把弘阳教传给一名叫李乐天的人。③ 据教内首领供称:“传教祖师,自顺治年间太监魏子义转传于李乐天,到山东又改名刘奉天。传于南方部姓,又传于清丰秦姓,又传于曹县王姓。”④那么,这位李乐天又是谁呢? 近年,

① 光绪《畿辅通志》卷一,诏谕。

② 《清朝通典》卷一,食货。

③ 李尚英:《天理教新探》,载《华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秦学曾供词,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有人在手抄本《浩然纲鉴》中发现了一条有关李乐天的传说史料:“李祖生于大明天启二年己未,河南归德府白阳县乐民庄,姓李名亭玉,父乐天。”[①]《浩然纲鉴》的内容荒诞不经,但书中关于李亭玉的父亲名叫李乐天,则大概是真实的。而且李乐天原籍河南的说法,也非虚妄。从秦学曾供词中判断,李乐天可能就是康熙初年创立五荤道、收元教的刘佐臣。根据有二:其一,李乐天到山东后改名刘奉天,而刘佐臣也曾被教内之人称为“刘奉天”。其二,李乐天“曾传教给南方部姓”,而刘佐臣恰好也是把五荤道、收元教传给河南商丘的部云龙。因河南在山东单县南面,故称“南方部姓”。据部云龙的五世孙部添佑在嘉庆年间供称:“高祖部云龙从前原是山东单县人老刘爷的门下。那老刘爷原是弥勒佛转世,高祖从他得道,叫透天真人。老刘爷派高祖掌离卦教。”[②]其三,《浩然纲鉴》中称李乐天是河南归德人,从档案记载可知,刘佐臣原籍正是河南。据嘉庆年间教内人供称:“我们八卦教首刘佐臣原籍河南,寄居单县。”[③]

从以上情况分析,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结论:五荤道、收元教倡自李乐天即刘佐臣,刘佐臣又传自弘阳教首领、太监魏子义。关于刘佐臣创立五荤道、收元教一事,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山东单县人刘佐臣于康熙初年倡立五荤道、收元教,编造《五女传道》等邪书,分八卦收徒敛钱。”[④]刘佐臣为什么要称所创立的秘密教门为“五荤道、收元教”呢?有人认为刘佐臣称其教为“五荤道、收元教”,乃是因为该教“不开斋”、“不破戒”,“不食大五荤,忌生葱生蒜”。并且“以收元结果,即把尘世间的芸芸众生度回天宫作为主要教义”。[⑤] 这一说法的后半段即对“收元教”的解释无疑是准确的,而对“五荤道”的解释,似应作进一步探讨。据日本学者研究,刘佐臣称所倡之教为“五荤道”并非由于该教禁食大五荤,相反,乃是由于该教不戒大五荤。《清宣宗实录》中提到,道光十六年在山西阳曲、代州、崞县、五台、忻县、定襄等地有人烧香念经,不戒荤酒,称“五荤道”。日本学者据此认为,“这种关于五荤道的解释,无疑也适用于刘佐臣教派”。[⑥]

---

① 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51 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九月三十日部添佑供。

③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王大臣永琅折,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⑤ 马西沙:《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载《清史研究集》(四),第 179 页。

⑥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四节《山东单县刘佐臣创立的教派》,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

看来日本学者对"五荤道"名称的解释,更接近实际。刘佐臣在传教时所编《五女传道》一书,现已失传。据日本学者研究,其内容大概同19世纪后半叶山东流传的《五女宝卷》相类似。《五女宝卷》的内容大致如下:五女即观音菩萨及其他四位女菩萨。有一男子为寻求不死之秘密而外出云游,独自夜行,虎狼之声不绝于耳,遂祈求观音菩萨的保护。这时,前面忽然出现一座小屋,内有五位女神,手捧珍珠。男子发现珍珠耀眼的光芒后,便走向小屋。进屋后,见到五位女神正在纺线、织布、刺绣。当五位女神把宝卷中的含义告诉他时,天已亮了。女神赐予男子一杯清茶,该茶能使病人康复,凡人成为圣人,使积有功德之人,永远年青,长生不死。[①] 我们从乾隆年间有关刘佐臣子孙传教案的档案史料中得知,刘佐臣传教时所编之书,除《五女传道》外,还有《禀圣如来锦囊》、《神仙说》、《八卦图》及《六甲天元》等。[②] 五荤道、收元教因"分八卦收徒",又称为"八卦教"。八卦是《易经》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用"—"和"－－"两种符号,称为"爻"所组成。用"—"代表阳,用"－－"代表阴。用"—"和"－－"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古天字,☷为古地字,☲为古火字,☵为古水字,☴为古风字,☳为古雷字,☶为古山字,☱为古泽字。代表了八种自然现象。八卦是由"四象"演化而来,故又分别表示八个方位:乾(西北)、坤(西南)、震(东)、巽(东南)、坎(北)、离(南)、艮(东北)、兑(西),以及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冬、立春、立夏、立秋这八个节气。《易经》原为儒家经典,被孔子尊为"六经之首",历代封建统治者皆利用八卦来预卜国家的盛衰安危,民间也利用它预卜凶吉否泰。因此,八卦在中国古代具有神秘和神奇的功能。刘佐臣用八卦作为发展组织的框架,无疑是为了增加五荤道、收元教的神秘感与权威性。

康熙前半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小农经济的复元,滋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秘密教门也逐渐从凋零、萧条转而得到复苏。刘佐臣创立五荤道、收元教得到发展,是因为该教教义迎合了个体小生产者的一种心态,即今世保平安,使自己仅有或刚刚获得的一小块土地与资产得以保全,并可以进而发财致富,死后免受轮回之苦,来生还可享受荣华富贵。正是受到这种心态的驱使,大

---

①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四节《山东单县刘佐臣创立的教派》,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批穷苦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纷纷加入其教。在五荤道、收元教创立之初，刘佐臣虽然设想按八卦的框架来组织徒众，但因人数不多，“尚有数卦未曾得人”。[1]最初，他仅“传于南方部姓，又传于清丰秦姓，又传于曹县王姓”。[2] 部姓指河南商丘县的部云龙，刘佐臣派他执掌离卦。王姓指王容清，“康熙初年，王容清为刘佐臣分掌震卦教。”[3]其他各卦尚阙如。部云龙及其子孙，后来把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发展成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秘密教门，其子孙也形成一个强大的传教世家。据嘉庆十八年部云龙后代部添佑供：“监生原是河南商丘人。……高祖部云龙，曾高祖高（部）晋中，祖高从化即部敬庵，大伯部大即部永福，二伯部二即部得福，三伯部三即部建福。四伯从幼夭亡。父亲第五，名部鸣福。”[4]关于部家世代传习离卦教的情况，档案史料中记载颇详。据部道远弟子靳某供：“拜高道远即部添麟为师。部添麟世居河南商丘县，其高祖部云龙倡立离卦教，自号透天真人，传徒跪香，紧闭四门。”[5]离卦教在传徒时有一套神秘的仪式，声称：耳为东方甲乙木，眼为南方丙丁火，鼻为西方庚辛金，口为北方壬癸水。不许乱听、乱看、乱说。要传授“心法歌诀”，并口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及“天榜挂号，地府抽丁”等咒语。规定每日朝太阳吸气、咽沫。凡弟子入教时，要先送师傅钱文，名为“根基钱”。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再送“跟账钱”。以出钱之多寡来确定来生的福泽厚薄。教内还订有秘密联络暗号，“见面各骈食指，中指往上一指，名为剑诀，以作暗号”。部云龙之后，因其子孙部三等在河南犯案，至部添麟时便举家迁往山东聊城，将部姓改为高姓，将部添麟改为高道远，以隐瞒其“邪教”身份。[6]

康熙年间八卦教的另外两支为震卦与坎卦。震卦最早的教首是谁，史料中有两种记载：一是指山东金乡县侯棠。据侯棠之子侯位南供：“当年刘佐臣将震卦教传给我祖父侯棠，祖父故后传给四叔祖侯朴，四叔祖故后传给我父亲侯绳武。”[7]另一记载是指山东菏泽人王容清。“康熙初年，王容清为刘佐臣掌震卦

①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徐绩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秦学曾供词，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署山东巡抚琦善折，道光四年三月十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日高继远即部添佑供。
⑤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钟祥折，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钟祥折，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⑦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教。王容清故后，其教系长子王中接传。”[①]据学者研究，刘佐臣传给侯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传给王容清一说，可能是王姓子孙之伪造。[②]

关于坎卦最早之教首，众说不一。或曰侯棠兼任震、坎二卦之首，或曰坎卦教首系霑化县人郭姓，或曰系直隶容城县人张柏，或曰系山东曲阜人孔万林。据学者研究，坎卦教最初由侯棠兼任之可能性较大。[③] 刘佐臣创立的五荤道、收元教即后来的八卦教，由他自任教主。秘密教门的教主，大多世代相传，刘佐臣也沿袭了这一传统，由他的子孙们形成了一个世代相传的传教世家。刘佐臣生有四子，长子刘儒汉，又名刘如汉或刘维翰；次子刘如浩，三子刘如淮，四子刘如清。刘佐臣故后，长子刘儒汉仍“踵行此教”，[④]并充任教首。在他掌教期间，五荤道、收元教即八卦教有了较大发展。“所收之徒分八卦，每卦以一人为卦长，二人为左干右支，以下俱为散徒。每卦各自收徒，各出银钱送于卦长，卦长汇送于教主，多寡随便。”因当时八卦仍未凑齐，故仍“有以一人而兼两卦者”。[⑤] 刘儒汉凭借传教敛得的财富，跻身社会上层，曾任山东单县知县。康熙四十四年，因其父刘二达即刘佐臣传习“邪教”事发而受到牵连。但他坚称并未传教，山东巡抚赵世显以刘儒汉传教证据不足而把他释放，但革除了他的知县官职。其后，他又利用从教徒身上敛得之钱财，并隐瞒自己的“邪教”教首身份，捐得知县官职，在山西荣河县做了十年知县。在此期间，刘儒汉停止了传教活动，这表明刘儒汉是个热衷于仕途之人。不过，也反映出秘密教门的首领们，在拥有大量财富之后，已不再满足于自己平民的社会地位。秘密教门毕竟只是以下层群众为主要成员的民间秘密团体，尽管身为教首，在教徒们面前十分荣耀，但是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仍然是个普通平民百姓。所以，教首们便企图利用拥有的财富，跻身于上层社会之中。当时一个方便条件便是可以用金钱来“捐官”。刘家不仅为刘儒汉用钱捐了山西荣河县知县，而且为刘如清也捐了候选教谕。具有“邪教”教首身份又担任地方官员，毕竟是一件危险的事。康熙五十八年终因同教犯案，供出教首系刘佐臣，刘儒汉再次受到牵连。事情经过

① 《朱批奏折》署山东巡抚琦善折，道光四年三月十八日。

② 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05 页。

③ 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23 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永琅折，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⑤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是:康熙五十六年九月,山东、河南一带的白莲教徒、兰阳县生员李雪臣、李义山与监生曹钧等欲"聚众杀官"。被河南兰阳县冉介异派兵役"密行围拿"。[①] 李雪臣等供出同教还有山东单县人赵勋公和曹州人袁进。[②] 清政府根据此线索,又将袁进捕获。袁进原名范光智,乳名小宛儿,山东曹州人。因过继给河南扶沟人杨秦为子,取名杨元进,被外人误呼为"袁进"或"袁追"。[③] 袁进于被捕后,供出该教教首乃山东单县人刘佐臣。清政府立即派人赴山东单县查拿,结果得知刘佐臣早已病故。[④] 查明他的两个儿子尚在,且任山西荣河县知县与候选教谕。遂以"邪教之子"的罪名,将二人"俱行革职"。[⑤] 刘儒汉回到原籍山东单县后,便不再亲自过问教内事务,将具体事务交给各卦卦长负责,自己仅向他们收取一部分教徒交纳的"根基钱"。乾隆三年(1738)刘儒汉病故。在刘儒汉掌教时期,八卦教已传至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省。山西最早入八卦教者,是定襄人刘起祥、刘起凤兄弟二人。二人靠干泥水匠为生,曾在山东寻觅工作,并"入刘儒汉家的教","给天地烧香磕头,求来生荣华富贵"。[⑥] 康熙四十四年,刘起凤由山东返回原籍,欲传韩德荣入教。告以入教须对天地烧香磕头,可修来世富贵,不忌荤酒。韩德荣应允,并随同刘起凤前往山东单县,拜刘儒汉为师。刘儒汉抄给《锦囊神仙论》、《八卦图》、《五女传道》、《禀圣如来锦囊》等经书。刘起凤旋即迁居山东城武县,韩德荣则返回山西。刘儒汉的另一重要弟子是王天赐。王天赐祖籍直隶长垣,后移居河南虞城。康熙五十三年到山东卖布,遇山西定襄人刘起凤、刘起祥弟兄,随同刘起凤拜刘儒汉为师入教。据王天赐之子王之卿供:"父亲王天赐在日,于康熙五十三年在山东卖布。回来说,我在山东认识一个刘起凤,他原籍山西,却住在山东城武县,是单县刘儒汉教内人。那教叫收元教,又叫五荤道,我同刘起凤见过刘儒汉入了教。"[⑦]康熙三十一年王天赐身故,所遗《五女传道》、《八卦图说》、《小儿喃孔子》等,均由韩德荣带回山西,作为继续传教之用。

---

①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李树德折,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②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李树德折,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③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李树德折,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④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⑤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准泰折,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⑥ 《史料旬刊》第三十期,阿里衮折,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⑦ 《史料旬刊》第三十期,河南巡抚硕色折,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面对教门的活动，清廷不断修订针对“邪教”的律例。

康熙元年，禁止私下以治病为名行“师巫邪术”。题准凡人有“邪病”要请巫觋道士医治，须得禀明都统，用印文报部，经批准后方可，“违者，巫觋道士正法外，请治之人亦治以罪”，[①]康熙五年重新强调严禁“邪教”，并制订了对官员的相应处分条例：“凡邪教惑众，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督抚，转行文武各地方官，严禁查拿。如不行查禁，督抚等徇庇不参，事发，在内该管官每案罚俸三个月，在外州县官降二级调用，督抚罚俸一年”[②]，以促使有司重视。康熙七年再次复准，“凡邪教惑众者，照律遵行。其地方各官，仍照例一并治罪”。[③] 所谓“律”，是指顺治初年规定的禁止师巫邪术之条款，“例”是指康熙五年制订的罚俸降级条例。鉴于当时许多官员往往于案发后尽量掩饰，自行了结，或以他案结案，并不以“邪教”犯事上报。对此，康熙十四年又规定：“凡傍人出首邪教者，不论犯人男妇多寡，共追银二十两给赏。如原专拿之人拿获者，追给赏银十两。”[④]以奖励出首告发的方式来广官员的耳目，以图消患于未发之时，即有捉拿之责的捕快、衙役、保甲长等人，亦给予奖赏。至康熙十八年下令：“凡迎神进香、鸣锣击鼓、肆行无忌者，为首之人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⑤]

康熙认为“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⑥]要求地方官注意对百姓的教化。特别是对于教门的经卷，以禁止淫辞小说的办法予以查禁。[⑦] 康熙十一年，傅达礼奏请禁治教门说：“黄天、弘阳等教，男女混杂，诵经说法，先经严禁，至今尚未革除。切思此等之人，自古以来，此足为害，若不预行禁止，恐愚民被其煽惑，深为不便。伏乞皇上斥逐此僧，且严禁黄天等教，以肃清京畿内地，则天下幸甚。”康熙曰：“朕亦知此僧狂妄，自古以来，此等之人，往往为害不浅。尔言朕

---

①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十六，禁止师巫邪术。
②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十六，禁止师巫邪术。
③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十六，禁止师巫邪术。
④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十六，禁止师巫邪术。
⑤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十六，禁止师巫邪术。
⑥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四，第 461 页。
⑦ 《清圣祖实录》卷十五，第 232 页。

已知之。”[1]康熙二十六年，康熙指出：“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民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荒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2]

康熙年间对“邪教”案件的处理，虽然以《大清律集解附例》中有关“禁止师巫邪术”的律条作为量刑依据，即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流。但许多案件是以妖书妖言律论罪的。[3] 如果发现有“谋逆”情节，则以“谋反大逆”罪论处。康熙末年发生在河南的李雪臣“邪教”案件就是如此。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山东巡抚李树德奏报，风闻十月十七日河南杞县有一木匠忽然口吐狂言，声言当日即要危害某人某人，地方上的人听了诧异害怕，即将他拿送县官究讯，木匠供出有兰阳县的李雪臣约好次日（十八日）“聚众杀官”。地方官查明李雪臣确系“白莲邪教”，遂将有关人员尽数捕获，在李雪臣家搜出“蒸就馒头数千，并宰猪数口，以及骡马兵器等项”，据供均系伺候外来诸人之用。兰阳县知县冉介异即以谋逆罪当场将“生员李雪臣、李山义、监生曹钧、民人张尔岷并李山义不知姓名之住房人等五名立时杖毙。又拿获李山璧、李三让、李兴邦系李山义三子、乔大伦，尚有不知姓名二十余人”，监禁在案。[4]

① 《康熙起居注》（一），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
② 《康熙起居注》（二），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第1595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一，第14页。
④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山东巡抚李树德奏。

第七章　雍正年间秘密教门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伴随着清王朝经济的恢复,秘密教门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时,明末以来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创伤已经平复,正处于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盛世"。在小农经济巩固与发展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商品经济也重新得到发展。这种情况,也正有利于秘密教门的传布。在广大农村,出现了大批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和拥有少量资金、掌握一定生产技能的农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他们在经济上十分脆弱,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既担心自己仅有的微薄财产、土地会再度失去,又期望获得更多的财产和土地,因此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柱。而贫困使他们无法获得科学知识,加之长期受到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的熏陶,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大多迷信鬼神,相信天命,容易受到各种宗教的影响,这就为秘密教门的传播创造了方便条件。秘密教门比正统的佛教、道教在广大下层社会的群众中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因为正统的佛、道教,虽然能给穷苦人民精神上的慰藉,却无法使信徒得到现实的好处。秘密教门在本质上乃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教首与徒众之间,教徒彼此之间,均有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往往形成一股社会势力。许多人加入秘密教门,与其说出于信仰上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有人入教是为了造反,登基称帝;有人入教则为了借传徒敛钱;有人则为了求医治病或延年益寿;也有人是为了学习拳棒或坐功运气。因此,当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稍稍得到改善之后,秘密教门也随之广泛流传开来。从雍正初年到乾隆中叶,秘密教门比之清初,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清廷对各地秘密教门的查禁

清廷鉴于康熙后期各地秘密教门的活动日趋频繁,而且不少秘密教门还带有反清的政治内容,对清统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官员们不断奏报教门的活动。

雍正元年四月，翰林院庶吉士董思恭奏称，“山东之内，邪教有二，一曰一炷香，一曰空字教。名虽不同，而其所以为人心之害则一”。[①] 并指出该教对民间的危害极大，“其人专以烧香惑众，谓领香一炷，诸福立至，百病皆除”。以至“无知愚民，因相崇奉为师，或五日或十日轮流作会，效尤成风，以致荒弃农业，不事生理”。而空字教，“其人惟以邪术哄诱人心，一家之内有一人其教者，势必举家从之。之后遂如痴如迷，卖田宅、弃物利，以悠其掌教者之欲。甚至妇女杂处，恬不知耻，昼则散居各村，夜则相聚一室”。因而奏请饬令山东巡抚就地查禁，并提出具体的查禁办法：于每村之中牌甲相互保结，由地方上的里长经常稽查，“倘有其人，许即告首。如或隐匿不报，事觉之日，一并重究”。[②]

同年八月，刑部侍郎阿锡鼐又奏称，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有白莲教徒，“奉女人为首，财物共有，其内法纪极严，人心甚齐”。“若不预先严禁，人聚渐众，一旦遇雨水不调之年，庶至抢劫之案四起，亦未可定”。[③] 不久，新任刑部尚书励廷仪奏称：“国家整齐亿兆，在乎诘奸止邪，表正民风，尤必防微杜渐。似当早为之计，而预翦其萌也。”励廷仪强调“邪教”虽然名称不同，但都向愚民讲说“邪法”，又常常夜聚晓散，男女混杂，“伤风败化”。百姓一旦入教，往往欲罢不休，欲退不能。而且，“党羽日多，则其心叵测”。[④]

励廷仪的奏折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警觉，遂谕令各省总督巡抚在自己辖区内立即进行查拿。其后，雍正帝不断发出谕旨，指示各地督抚大吏如何对教门进行治理，并告诫他们：“国家整齐风俗，必先诘奸止邪，绥靖人心，尤在防微杜渐。豫省向有奸民，以白莲教等名色诳惑愚民，潜结党类。今或变名易实，阴相煽诱，乡愚无知，受其诳误者，尚所在有之。此等之人，心术奸回，踪迹诡秘，故其奸回愈不可测。地方大僚有澄清风俗之责，岂可苟且姑容，养奸不发，以致滋蔓难图。令道府州县各官，不时察访。其有妄立教名，夜聚晓散，巧作幻端，诬民惑众者，即将为首之人严拿治罪。愚民有先受笼络、能去邪归正者，概与宽免；有能出首为首之人者即量加奖赏，庶于风俗人心均有裨益。如或姑息苟容，

① 董思恭折，雍正元年四月，《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
② 董思恭折，雍正元年四月，《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
③ 刑部侍郎阿锡鼐折，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82页。
④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

后经发觉,该管各官一并从重议处。"①

雍正二年六月,直隶总督李维钧奏称,邢台县之中岩寨,发现"顺天教"的活动。该县有一叫刘言基者,人称"刘大师傅",在当地"聚众讲法,煽惑乡愚",称为"顺天教"。教内骨干有要国卿、周定国、杨自起等人,皆系当地农民。经审讯,查明该教倡自刘言基之曾祖刘才运。当年,刘才运与要国卿、周定国、杨自起等人之祖父,同入中岩寨,托称"修行持斋",创立"顺天教"。雍正初年,该教传至刘言基任"大教主",而要国卿、周定国、杨自起等皆为"小教主"。教内供奉"真空老祖金公"与"无生佛母黄婆"之塑像。每年三、十两个月,聚众烧香,向徒众敛取金钱,书符"消灾"。② 中岩寨内有祠宇及香客住房五百余间,附近之太子寨亦有庙宇。信徒一般先至中岩寨,然后再至太子寨烧香,称为"烧转香"。③ 同年九月,山东巡抚陈世倌又发现江南邳州五圣堂地方,有罗教与大成教徒礼拜吴滔天夫妇之尸身。据称吴滔天已身故五十余年,其妻也已故去十余年,尸身一直未安葬,当地人称二人乃"金刚不坏"之身。每逢正月十三、二月二十及九月二十四吴滔天夫妇忌日,各地男女徒众多至其尸身之前焚香礼拜,称为"朝祖",其徒众自称信奉罗教。另外,在邳州徐杨山有一瞽目人冯君重,亦踵行其数,但自称系"大成教"。④

雍正皇帝向各地督抚指出:"邪教大抵妄立名目,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苟不绝其根株,必至蔓延日甚,地方各官倘务姑息,不行访拿,是养奸也。""尔等督抚,亟当严饬各属,密访为首之人,严拿治罪,去邪归正者,则予以从宽。如有出首者,即量加奖赏,务令萌蘖尽除,阴翳全消,风俗人心咸归醇正。其或仍前因循不能查禁,事发之后,该管官一并从重议处。"但要求官员们不要扩大化,提出:"所谓邪教者,并非世俗寻常僧道之流而言也,慎勿错会,或致纷扰多事。即此查禁邪教,亦毋得张大声势,以骇众听。惟当留心密访,设法缉获,只将为首者重惩,其余被胁诱惑者,概不深究。"⑤并且要求官员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可多加株连,只须对为首者加以惩

---

① 河南巡抚石文焯折朱批及附件,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

② 《雍正朱批谕旨》直隶总督李维钧折,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

③ 庄吉发:《清世宗禁教考》,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二卷,第六期。

④ 《雍正朱批谕旨》山东巡抚陈世倌折,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⑤ 《雍正朱批谕旨》第7册,第10页。

办，对于一般“被惑者”，则可不加追究，以免“不肖有司借此惩吓平民，累及无辜。”①同年九月又提出：“朕惟除莠所以安良，黜邪乃以崇正。自古为国家者，绥戢人心，整齐风俗，未有不以诘奸为首务者也。”②

雍正三年修订的《大清律》中规定：“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者，交与步军统领五城顺天府不时严拿，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雍正七年六月刊行的《则例新编》中，更明文禁止“邪教”流传：“至于妖言惑众，始于一二不法之徒，射利营奸，创为一种邪说，愚民听其簧鼓，遂群相附和，流于邪妄。嗣后应令该地方官责成保甲严行稽查，如有妖言邪说，或诡设名目，聚党附和者，即行举报，该地方官严拿惩治，并追查倡首之人，按律究拟。倘保甲隐匿不报，发觉之日并保甲一并治罪。”③不过，也强调宽严相济的政策，他说：“概严不可，盖宽亦不可，惟在地方官随事因人分别轻重。生事倡首者，不可不惩，无知附和者，量加宽免，未有尽行解送来京之理。总期化导愚顽，去邪归正，以杜蛊惑人心之渐，岂可株连无辜也。”④

在雍正帝的督促下，各地掀起了查访“邪教”的高潮，河南、直隶、山东、山西、浙江、江西等地都查出了教门名目，拿获教首并进行了惩处。但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政策。雍正朝查禁邪教政策的成功之处，主要有三点：

首先，将“邪教”与正常僧道区别开来。雍正帝明确告诫臣下：“邪教非世俗寻常僧道之谓，不可借此多事。”所以，当有大臣要求把回教也当作邪教处置时，即被雍正皇帝拒绝。

其次，采取只查拿惩治为首，对一般入教者从宽的原则。雍正指出“愚民有先受笼络、能去邪归正者，概与宽免”，要求只查拿为首之人，不得“骇众滋累”，从而缩小了打击面，避免激化矛盾。

第三，采取明察暗访的办法，因为教门大多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尤其是教首，更是行踪诡秘。如果大张旗鼓地追查，不仅找不到教首，反而令“魁奸深藏防范”。因此，要求官员“秘密访查，徐徐行之，不可严急，令百姓惊骇不安”，更

① 《上谕档》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上谕。

② 江西巡抚裴率度折上谕，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

③ 又名《律便全书》，藏人大图书馆善本室。

④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4辑，第2788页。

要避免“无知州县借端生事”。

上述政策，不仅使雍正一朝在打击教门活动方面取得很大效果，而且没有因此而造成社会震动和百姓惊慌。

雍正三年，福建、浙江一带破获了“道心教”的活动。道心教主要教首王文治住在福州汤门内毕水巷。另一教首姓张（系由陈立昭冒充），号称“弥勒老佛”，住在福州城内有政司后之白云洞。该教最初是由王文治的祖父王还初传自号称“弥勒老佛的”张姓教主。张姓故后，即由王还初继任教主。教内“供奉弥勒佛，烧香招众”，向信徒们发给铜锡小牌，作为入教之凭证。康熙年间，王还初被官府捕获，在福州双门前被杖毙，该教即无人敢信。雍正初年，王还初之孙王文治因贩卖药材，经常往来于浙江温州、处州一带。该地教徒陈立昭知王文治尚存有祖父遗留之经卷，便同他商议，由陈立昭冒充张姓教首，由王文治在温州诱人入教。为了使人信服，王文治用驼骨、铜锡制成数寸长的小牌，上面凿成花纹。又用白纸画龙，制成“小票”，作为入教之凭证，票上写有：美、旺、隆、奎、雷、霆、霦、霖、霂、霐、震等字。每件收取银一两至五六两不等。又用香饼假冒“丹药”，每粒收银一钱至一两不等，用以骗钱。另外，王文治等又把铜镜两面磨光，在铜镜的一面贴上用纸剪的莲花，在信徒面前用翻转的办法，哄人出银照镜。每年用各种手法向徒众骗取钱财，多达一百余两。骗得之钱，于二、八两个月，由王文治送至陈立昭处，二人分用。① 道心教在浙江的教首范子盛，也借传符、卖丹药骗钱。他向徒众们宣称：“天地已届末劫，午未之年（按：指丙午、丁未年，即雍正四、五年——引者）就要塌陷。若吃丹药，有此符牌，则可以逃劫。”② 又自称“不用刀兵，可作人王臣宰。”破案后，清吏在范子盛家中搜出画有五爪金龙的纸数张，绘有五爪金龙的大小金银牌十余面，上面皆有字迹。还搜出名册簿二本，以及金龙丹药等物。据范子盛供，在浙江温州的永嘉、乐清、瑞安、平阳等县，约有男女教徒五千余人。实际上在他所藏教徒名册中的人数，还不止于此。③ 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龙是帝王的象征。范子盛所藏绘有五爪金龙的金银牌等物，乃犯了封建统治者之大忌，被认为是“谋反大逆”

---

① 福建浙江总督满保折，《雍正朱批谕旨》第18册，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浙江按察使甘国奎折，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② 《雍正朱批谕旨》浙江按察使甘国奎折，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③ 《朱批奏折》浙江按察使甘国奎折，雍正三年六月初二日。

之罪。加之他已拥有信徒五千余人，自然更对清统治构成了威胁，必然受到镇压。

秘密教门此后仍继续秘密流传。因其行动十分隐蔽，官府也更难破获。雍正五年，雍正皇帝又指出："邪教人等，惟河南、山东及直隶南四府最多，率皆夜聚明散，踪迹甚秘，非深入其教者，断不可窥测底里。"甚至"察访愈严，则闭藏愈固。不但地方大吏莫可施为，即州县有司，亦无从探其脉络"。而究其原因，则在于"胥吏中即有党羽为之耳目，以伺官之动静"。必须有才能干练之官员，"默运机巧，设法钓致，弗克缉获"。[①] 山东巡抚陈世倌便派人打入秘密教门内部，以破获其组织。他经过"辗转托人，馈以财物，假意投教"，探明教内教首、骨干的姓名、地址之后，即派遣差役前去查拿。先后在鱼台县拿获空子教教主李万禄等人；在金乡县拿获张焕，在单县拿获王天保等。据李万禄供，入其教者，每逢朔望烧香，编有《八卦歌》令徒众持诵，称为"运脉"。传授口诀，闭目卷舌运气，默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二语，称为"内承法"。不能闭目卷舌运气者，称为外承法。在内承熟悉后，即给予法名及来生"品级"。为此信徒须致送"谢品级钱"。该教规定，一人入教，则全家皆成为教徒。[②] 据李万禄供称，该教是由东平州杨得禄所传，由赵伦收敛钱文，教内称向徒众收钱为"走线"。[③]

清廷对于秘密教门的发展，尤其是其反清政治倾向，越来越感到担忧，雍正七年六月颁布的《则例新编》中，重申了有关禁止"邪教"流传的内容："至于妖言惑众，始于一二不法之徒，射利营奸，创为一种邪说，遇民听其簧鼓，遂群相附和，流于邪妄。嗣后应令该地方官责成保甲严行稽查，如有妖言邪说，或诡设名目，聚党附和者，即行举报，发觉之日并保甲一并治罪。"[④]

不久，又破获了空子教。该教虽然在雍正六、七年被发现，但早在雍正初年已经流传。据范存信供称，雍正二年三月，空子教的李大本劝他烧香，按四时磕头，早晨求衣服，晌午求好模样，晚上求财帛，子时求寿限。按全家人口缴钱，每月一口人须交三个香钱，一年收一二次。而李大本则是山东诸城县空子教教首牛三花拉（一作牛三花子）之徒弟。牛三花拉原名牛见德，山东兖州府东平州

①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田文镜折，雍正五年十月初四日。

② 庄吉发：《故宫档案述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第26页。

③ 庄吉发：《清世宗禁教考》，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二卷第六期。

④ 雍正《则例新编》（又名《律例全书》），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人，寄居诸城县，以贸易经商为名，往来于胶州、高密等处，暗中传习"空子教"，又称"儒理教"。空子教实际上是"孔子教"，或称三元会，亦主张三教合一说。牛三花拉在传教时，头戴五福冠，身穿青绸褊衫，坐在桌子上发表牒，超度人的三代宗亲，持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四句咒语。他本人一般很少亲自传徒，多由徒弟李大本代为传授。[①] 牛三花拉又以替人治病为号召，招人入教，借以敛钱。再将得到的钱财，作为资本，与别人合伙贸易，从而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商人传习秘密教门，在清代前期尚比较少见，牛三花拉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子。牛三花拉虽然凭借传教、经商获得大量财富，但他并未把这些财富用于扩大经营，而是利用这些资产，诱骗教徒之妻女。他先后骗娶了教徒李士俊之妻孙氏，赵玉仙之妻张氏及孙氏之义女小兑姐，以及吴齐之女吴氏等人为妾。[②] 雍正九年起，在直隶各地旗人中，流行、传习大成教与依法教。直隶大成教教首是旗人王姓武举，家住滦州石佛口。他手下有两名"次掌教"。其中一人是周世荣，住在饶阳县曲吕村，后因瘫痪，由其弟、广东丁忧通判周世臣代其主事；另一人是王瑛，住深州贡家台。该教发展颇为迅速，其中周世荣一支"教中约有千余家"。王瑛一支所传之徒，亦"几及千人"。教内凡能宣经讲道者，即可充当小道首，招引徒众。如深州之郑自昌，衡水之杨林金、侯燕平，河南之靳靖宇等，皆系教内"领头门徒"。[③] 据日本学者研究，大成教首领、滦州石佛口的王姓武举乃是王森子孙，所传大成教便是大乘教。[④] 这一说法看来很有可能，因为石佛口王家也是旗人，大乘教（东大乘即清茶门教）亦称大成教。不过目前还未见王姓武举确系王森子孙之确切史料。"依法教"也是在直隶旗人中间流传的一支秘密教门。教首是旗人董一亮。董一亮故后，由其女代为掌教，居住易州地方，由饶阳县武举王作梅管事。次教首则是饶阳县人孙连治。据直隶总督李卫查明，大成、依法二教，皆始于清初顺治年间。其教义主要宣扬生死轮回之说，劝人吃斋念经，以修"来世善果"。每逢朔望，教徒们皆在自己家中献茶上供，各出钱十文或数百文，积至六月初六日，齐到教主家念佛设供，名

---

① 《雍正朱批谕旨》署山东巡抚岳浚折，雍正八年八月十七日。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三辑，河东总督田文镜折，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③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辑，第867页及《雍正朱批谕旨》第九十三册，第28页。

④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三节，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曰"晾经"。教徒聚会时,"男女混杂,彼此不避"。并把平日所积之钱文,交给次教首,称为"上钱"。次教首再将所积之钱,转送至老教首处,称为"解钱粮"。每年一次,各有数百金不等。这在当时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依法教与大成教所诵之经卷,主要有《老九莲》、《续九莲》等。教主往往以欺骗的手法,骗取教徒的信任。如教主欲到某一教徒家时,便事先同仆人约定时间,将自己住房旁边的小屋点燃焚烧。当教主在教众家中估计仆人已将家中小屋点燃时,便对徒弟们宣称"我家有灾",即仓惶而归。当徒弟们赶往看视时,便发现教主家中果真发生了火灾,于是对教主更加信服,结果中了教主玩弄的骗局。有时,当有数名教徒同往教主家时,教主便先令人窥探徒弟的人数,再按数为徒弟安排好床铺。徒弟一到发现各人的床铺都已安排妥当,以为"奇异",实际上却是自己坠其术中。正是因为该教教首采用各种欺骗手段,蒙蔽徒众,许多人以为神奇而纷纷入教,使该教徒众日增。教徒也把教首"供奉敬礼如神",见面时俱要跪接。不过,大成、依法二教主要为了传徒敛钱,"尚无谋为不轨情状"。①

雍正十年,大成教已由直隶传入江苏常州。清廷在常州府阳湖县发现当地有周天祚等纠众传习"大成教",而且"从者颇多"。据周天祚被捕后供称,所传大成教系得自其子周文惠。周文惠从前曾在粮船上做裁缝,于粮船路过天津时,遇见大成教教首周天成,遂拜师入教。该教规定,每逢上元、中元、下元等日,各地教徒均需出钱做会,茹素诵经。教主敛得之钱,除做会花费外,剩余部分,每当凑足 5 两或 10 两之后,便寄送给天津的教主周天成。雍正十年正月,周天祚传教之事败露,供出教主系天津的周天成,清吏便在天津将周天成拿获。在他家中搜获折二扣、经七部、书札稿一本。关于大成教之来源,据周天成供,其师周尚礼称,是由石伸首倡,石伸传与董自亮、吕九发、陈耀驭、周应魁、张玉含、周尚礼、周士秀。并称该教诵习的乃是"罗门经",吃长斋,劝人为善。② 那么石伸又是何许人呢?是否也属于滦州石佛口王家?因为王家祖先原姓石,王森原名石自然,但目前尚没有史料足资证明。既如此,天津周天成所传大成教,同滦州石佛口王姓武举所传大成教,究竟有无同源关系,则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辑,直隶总督李卫折,雍正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 867 页。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九辑,乔世臣折,雍正十年五月初一日。

雍正十年，直隶赵州府隆平县的李思义，以治疗疾病为名，传习“儒理教”又称“摸摸教”。李思义籍隶直隶隆平县，自幼读书，因“不得上进”而学习医书。后因病人甚少，贫苦难度，遂创立“儒理教”，借此骗人钱财。据李思义供称：“我是隆平县人，今年三十六岁了。从小读书，因不得上进，就学看医书，会二十四样针法，还会揉掐治病。近来因看病的人少，穷的过不得日子，就想出一个法儿来，捏称儒理教。只说今年灾病很多，若礼拜太阳，供养祖先，就无灾病。有张茂林、姜承宗听了我这鬼话，转收了殷兆祥、孙成名、张重义、田亮、孙成义、李建这几个人。要他们每月不论多少，各人拿出几个钱来给我，替他上供，一共一千多钱，都是我使了。我原因穷苦不过，想诓骗人家几个钱，因为揉掐疾病，外边就都叫我是摸摸教，其实并不是什么邪教，也并没有什么符咒和传授我的人。至我到人家治病，用黑豆皮驱逐邪祟，原是看他病势将好，故意装出个像有法术的样子来，哄人信服的意思，其实并没有什么法术。”①李思义的徒弟张茂林加入儒理教是为了替儿子请医生看病。他听朋友说李思义会治病，便拜李思义为师入教。据张茂林供：“我是隆平县人，今年四十九岁了。我因儿子有病，到城里去请医生，遇着张重义。他说有李思义善会医病，就请了李思义来医。他说今年有灾，有个儒理教，每日向太阳叩头三次，家里要供三代宗亲，早晚烧香，可以免得灾难，我原依了他。他叫我每月给他几个钱，替我上供，保佑阖家平安。我给过李思义二百个大钱，一百九十个小钱。我认识的田亮、孙成义，我也叫他如此，都归入教中。”②儒理教或摸摸教同其他秘密教门并无渊源和组织上的联系，是穷苦人民按照秘密教门的模式，自发创立的一个秘密教门，并未产生大的影响。

雍正十年江西南昌发现“三皇圣祖教”，该教又名“圆顿大乘教”、“白阳会”。该教传自北方的圆顿教，并受大乘教影响。教首为黄森官。他因开店铺折本，无法生活，便与妻子的亲戚傅秀山商量，在省城南昌城内建造斋堂，设立“三皇圣祖教”，又称“圆顿大乘教”或“白阳会”，借以传徒敛钱。黄森官之父黄廷臣自称“天老爷”，又称“黄太师”，黄森官本人则称“弥勒佛紫微星”。凡入其教者，俱奉黄森官为教主，见面时须向他下拜。即使其胞叔，入教之后见他也甘心下拜。黄森官又与黄珍、熊簪举、周簪风等共15人结为“生死之交”。黄森官

---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九辑，第827页，《李思义供词》。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九辑，刘于义折，雍正十年闰五月初六日。

见入教者日众，便萌发了造反的政治野心。他于盟布内书写“天下大乱”等“狂悖之语”。[①] 又颁布写有“大元帅之阳”等名号的札付。[②] 雍正十二年初，浙江江山县人吴士荣加入该教后，被封为“文阳王”，旋为其父告发。三皇圣祖教教徒主要分布在江西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在浙江、江西二省交界处的封禁山内的棚民中，也有许多教徒及支持者。[③] 该教因有武装造反的意图，故十分重视军事，如新昌县天宝乡的教首沈士荣自称“大将军”，手下有“军师”二人，曾颁布札付、铜印，并且纠众“夜聚晓散”，演习武艺。[④] 在另一教徒家中，还藏有兵书，写有五方、二十八宿、旗号、阵图等。[⑤]

雍正十二年，山东又发现“朝天一炷香教”的活动。该教由夏津县陈永顺传自肥城县的王弼公。雍正十二年，山东高唐州西北一带村庄中，有居民杨翠、王天柱等七人信从该教，又名“愚民弟子教”。该教规定：每日三次向太阳磕头，念诵咒语，祈求神灵消灾降福。每过一两个月，教主便向徒众收钱一次，每人出钱三文，作为祭礼太阳之费用。[⑥]

同年在安徽南陵县又有糍粑教又称三乘会的活动。该教系由南陵县潘茂芳即潘千乘所创立，原名三乘会，因用糍粑供神，外人遂称之为“糍粑教”。潘千乘生前所撰《雾灵山碑文》中，有“罗祖”字样，看来三乘会同罗教之间有某种联系。潘千乘在日，曾传过南陵县人王子玉、侯君耀、余自全，宣城县人董君瑞，无为州人王子开，合肥县人郭平言、夏公旭，巢县人荣德明，铜陵县人吴彬然等为徒，入三乘会。凡入其教者，皆起有“法名”，并须向教主交纳“根基银子”，数量不限，视每人财力而定。一般为三五钱不等。潘千乘之子潘玉衡于其父在世时，亦跟随吃斋念经，并靠其父传教敛得之钱，捐过监生，后因被人告发传习邪教而遭斥革。潘千乘故后即由潘玉衡接续传教，并继任教首。糍粑教念经时，只穿平时随身之衣服，由教主站立上首，徒众们均跪在下面。所供奉之神是“笑罗汉”即弥勒佛 诵经时须点燃蜡烛，供奉茶果、糍粑，由黄昏直念到次日五更。这时，教徒们因 夜诵经饥饿，由教主把所供糍粑切开，分给徒众们食用，然后

---

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十七册，浙江总督程元章折，第26页。

② 《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十七册，浙江总督程元章折，第26页。

③ 《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十七册，浙江总督程元章折，第26页。

④ 《雍正朱批谕旨》赵弘恩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⑤ 《雍正朱批谕旨》赵弘恩折，雍正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⑥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四十九辑，山东巡抚岳濬折，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散去。潘玉衡掌教后，糍粑教不仅以念经治病为名骗钱使用，同时还乘念经治病的机会诱奸妇女。据潘玉衡供称："那妇女来求治病，有钱的送钱，如贫穷无钱的，也不拒他，或有不正经的哄诱他成奸，也是有的。"并承认利用治病的机会，诱奸过妇女戴氏、史氏等人。本地人皆知道潘玉衡借念经、治病为名奸淫妇女，皆不敢前往入教，潘玉衡便主要引诱远处不明真相的妇女入教。潘玉衡诱奸妇女的手法十分恶劣。因念经时，皆"男女混杂"，且由黄昏念起，直到次日凌晨。经过一夜之后，信徒们不仅腹内饥饿，而且精神也十分疲惫。他在给徒众们分食糍粑之后，便把男女教徒分别安排在前后两楼歇息。男教徒在前楼，女教徒在后楼。其后楼是"串楼"即前后两旁之门，皆与潘玉衡的卧室相通，潘玉衡便利用这一方便条件，将妇女诱入卧室，加以奸污。潘玉衡传教及奸淫妇女一事，终于在雍正十三年被破获。经审讯，清官员以潘玉衡"私习罗教惑众"及"诈骗钱财"，"诱奸妇女，伤风败俗"等罪名，将他当堂杖毙。①

雍正十三年，山西平安州一带有"皇天教"的活动。教首系该县之李福，他家中藏有符咒、"邪书"五种。其中《寇天宝书》中写有"二康发现到卯年时节交换"之语。家中还藏有"龙翅黄帽"一顶。李福声称其长子李俊成能"呼风唤雨"，且可"咒倒大树"。李福也同许多秘密教门的首领一样，具有政治野心，欲纠人举兵造反，家中藏有许多刀枪器械。他本人通晓兵法及武艺，其次子李满成会使棍棒。平定州附近有三四个村庄之人，皆已加入其教。李福于雍正十二年准备举兵造反，以陈蛮子为军师，由教内左文泽画符，举人王忠替他打点衙门之事，以免遭破获。同年七、八月间，该教在龙天庙做会，陈蛮子同举人王忠曾至李福家中，看其演习，为举兵做准备，后事泄被捕。该教的主要经卷有《黄婆经》、《拯世破迷宝诰》等。该教在教义中宣称，将来必有大劫，不入教者不可免，入其教则可能达到"乐土"，传皇天教经卷者，亦可免水火兵刀之厄。② 雍正年间清政府所破获的秘密教门，见于官书、档案记载者，主要就是上述这些。

二、云南张保太所传大乘教(无为教)

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往往有一教多名或多教一名的现象。雍正、乾隆年

---

① 赵弘恩折，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二日，载《史料旬刊》第十一期。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李卫折，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七日。

间流传于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等省的张保太大乘教(亦称无为教、铁船教、瘟船教),与直隶滦州石佛口王森子孙所习"东大乘教",及罗教系统的大乘教等,虽然皆称大乘教,但其间无论在源流、组织和教义、教规等方面,皆有很大区别。张保太所传大乘教究竟来源于何种教派,目前还无定论。

(一)张保太所传大乘教

张保太亦作张宝泰(约1660—1741),系云南省大理府太和县人,为云南景东府贡生。他自幼吃"报恩斋",及长,拜腾越州贡生杨鹏翼为师,吃长斋念经,以避"风劫",取名"道岸",释名洪裕。张保太以"道岸"为法名,系出自《龙华经》的故事。《龙华经》中称,"老古佛"为了拯救沉沦于苦海中的东土众生,制造了无数只大法船、大金船、中金船、小法船、小孤舟,以便把东土众生从末劫的三灾八难中拯救出来,同赴龙华三会。[①] 康熙二十一年,张保太在云南大理府鸡足山"开堂倡教",自称"西来教主",倡"三教合一"说。声称该教系陕西泾阳县八宝山"无生老祖"开派,杨鹏翼系该教第四十八代祖师,张保太本人则是"第四十九代收元祖师",[②]与"西来正宗"乃"同祖分派"。据称"西来正宗"姓徐,广东人,乃禅宗六祖慧能转世。达摩自西域过东土传教,至六祖慧能,被七十二魔赶至广东,故名"西来正宗"。后来,白玉祖师从江西起教,与张保太同祖分派,张保太故后,大乘教将重新与西来正宗合而为一。[③] 看来所谓"陕西泾阳县八宝山无生老祖开派"一事,大概出于张保太本人之伪托。杨鹏翼可能是张保太的启蒙师傅,所以被张保太尊为"第四十八代祖师",借以向世人表明该教源远流长。鸡足山位于云南大理府东北部(今宾川县西北约30公里处)。因该山前有三峰,后有一峰,形似鸡足,故名。[④]

鸡足山地处亚热带、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林木葱郁,方圆40里以内,俱为树木所覆盖。元末以来鸡足山与五台、普陀、峨眉、九华等山齐名,成为我国五大佛教圣地之一。山内寺庙林立,著名的有八大寺院,如悉松寺、大觉寺、迎祥

①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六节,《乾隆初期诸教派》。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己未。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己未。

④ 《鸡足山志》,范承勋序文。

寺、华严寺、伽叶寺、传衣寺等。历史上，香火颇盛，"每逢岁朔，四方缁素进香，自汉至今未绝。大刹七十二，兰若三百六十，山庵不计其数"。[①] 清代鸡足山有三十六大寺，七十二庵之说。鸡足山一带的佛教寺庙，皆属禅宗一派，受宋以来禅、净一致，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颇深。张保太所倡大乘教主张的三教合一教义，大约同鸡足山一带佛教的这一特点密切相联。[②] 清人对张保太主张三教合一的思想，亦有所记述，朱象贤在《偶闻见录》的"三教合一"条中写道："康熙间云南大理府太和县贡生张保太，受永倡杨鹏翼之说，称大乘教。吃斋念佛，做会烧香，劝人入教修行。声称将来可以成佛升天，免受阴司苦累。尊奉儒释道三教同源说，加入鄙俚不经之说，惑人根本，数十年间呈几遍天下之盛况。"张保太大乘教的教义中，十分突出弥勒佛降生说，这一点又使该教更接近佛教的净土宗（弥勒净土）。这种情况，大约同鸡足山的历史、环境有关。佛教弥勒信仰有个传说，佛祖弟子迦叶尊者受佛法衣入鸡足山，等候弥勒佛降生，将佛法衣给弥勒佛之后涅槃。后来，人们便把传说中印度的鸡足山，说成是中国云南的鸡足山。鸡足山的这一传说，大概对张保太大乘教突出弥勒降生说起了重要作用。张保太创立大乘教以后，刊刻了其师杨鹏翼所著《三教释道》及《皇经注解》、《先后天图》等书，借以"惑人入教"。凡入其教者，俱要赴张保太处购买这些经书，并"请领绶记"。[③] 来鸡足山的进香者，也多至张保太处，请求为自己"传经授记"，每人为此须交银一、二钱。张保太在鸡足山的传教活动，逐渐引起了官府的关注。雍正八年，云南地方当局将他以"左道惑众"之罪逮捕，"拟绞监禁"。雍正十三年九月，张保太因逢大赦获释，"交地保安插"。[④] 有的学者根据乾隆十一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的一件奏折，认为"张保太本人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就被官府捉去监毙狱中了"。[⑤] 张广泗原折称，张保太"于雍正十年事发，经滇省拿究，照左道惑众为首律拟绞监毙"。[⑥] 事实上张文泗此奏不确，因为乾隆三年江苏人夏天佑来到鸡足山时，张保太还曾向他传授《存心经》二部，张

① 《滇系》卷二，"山川"。

②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六节。

③ 《朱批奏折》张允随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④ 《朱批奏折》云南总督庆复折，乾隆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⑤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⑥ 《朱批奏折》贵州总督张广泗折，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保太直到乾隆六年才去世。[①] 不过，张保太经过雍正八年被捕入狱的挫折，获释后便不再吃斋传教，后来又因其子身故，加之自己年老多病，遂“闭门安分，不敢与人来往”。[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张保太本人虽不愿继续传教，而他所传弟子们却不肯就此罢休，大乘教继续在各地流传、发展。乾隆三年，江苏江阴人夏天佑等人来至云南鸡足山，向张保太“请玉皇经卷”，并请求张保太给予“绥记”。张保太因该经经板已毁，只有《存心经》之经板尚存，遂印刷了两部，交给夏天佑，夏天佑亦送给张保太以食物及银六钱，对于与夏天佑同来鸡足山的其他人，张保太皆拒而不纳。[③] 乾隆四年，江苏地方当局以“设立邪教，诱引愚民，茹素诵经，男女混杂”等罪名，在江阴以东张泾镇将夏天佑等5人逮捕。经审讯，夏天佑等将张保太倡立大乘教，自称达摩第四十九代嫡传等情供出。江苏当局便行文云南，云南地方当局再次将张保太逮捕。审讯时，云南总督庆复认为张保太只见过夏天佑一面，且不肯接见其他之人，仅得食物银六钱，而且给予夏天佑之《存心经》又系佛教通常诵念之经。张保太又已“年逾八十，老病昏耄”，遂欲对他“网开一面，免其治罪”。但又担心以后仍有附近乡民前来请经，难保不再“故习复萌”，最后决定将张保太“看守省城，庶不致再犯违犯”。[④] 乾隆六年，张保太死于省城看守处所。[⑤]

（二）张保太故后大乘教在各地的流传

张保太去世以后，大乘教继续在各地流传，乾隆十一年，大乘教再次遭到打击。当时贵州有一名被参革的通判吕瑛，为了立功复职，特意打入大乘教内，投在教首魏王氏门下为徒。他在探悉教内秘密后便向贵州总督张广泗密禀，从而引发了这次查禁大乘教的事件。据张广泗奏：“原任都江通判吕瑛，因参革罪配徒限已满，在省候谘。该员颇有心计，访悉逆犯授受渊源及教内渠魁张保太、刘奇姓名，及设立称号名目，种种不轨之迹，密禀到臣。随受臣指划，伪投入教。魏王氏深信不疑，给以书信，因前往四川，亲见刘奇，得以洞悉其悖逆实情。又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五，乾隆十一年九月壬戌。

② 《朱批奏折》云南总督庆复折，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③ 《朱批奏折》云南总督庆复折，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④ 《朱批奏折》云南总督庆复折，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五，乾隆十一年九月壬戌。

委令协同把总胡勋至四川重庆府地方，访实逆犯苏君贤住址。适巴县知县张松闻知，因得弋获。”[1]张广泗又根据吕瑛从魏王氏处探得大乘教定于四月十五日做“火宫会”一事，遂派兵于是日趁大乘教首徒聚集做会之机，将魏王氏、唐世勋及教徒共140余人，一举捕获。[2] 同时搜获魏王氏与四川大乘教首刘奇、云南大乘教首张晓（张保太养子）之间的“往来密札”，从而为进一步追进大乘教案件，打开一个突破口。最后查明，“张保太所倡白莲教流入贵州、四川各省。贵州省城有魏斋婆，集多人习教。四川涪州刘权（即刘奇）、云南张二郎（即张晓）等为首。今魏斋婆已就获，并密咨云南、四川查禁。”[3]乾隆皇帝接此奏报后，对张保太大乘教一案十分重视，命令各有关督抚“不动声色”，彻底查办。四川地方官员在接到查拿刘奇的谘文以前，曾于乾隆十一年六月初将刘奇捕获。当时因尚不清楚刘奇同张保太大乘教之关系，便按一般“邪教”案件处理，刘奇仅被“充徒枷责”。在接云南方面查拿刘奇的谘文后，四川当局再次将刘奇捕获。刘奇供出：“当年曾学习‘无生最上一乘数’，原是云南张保太传与泸州郑之元传授的”。[4] 随着案情的进展，官府发现张保太故后，大乘教在其养子张晓、弟子刘奇即刘权、魏斋婆等人传播下，已波及四川、贵州、江苏、湖广、江西、山西等省。[5]这一后果，更加深了乾隆皇帝对张保太的痛恨。虽然张保太此时已经去世5年之久，仍然下令将其戮尸。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钦差侍卫达青阿来到云南，宣布了乾隆皇帝这道谕旨。云南总督张允随、钦差侍卫达青阿率同云南鹤丽镇总兵温朝宰等文武官员及兵丁差役，于十月初三日将张保太尸棺起出，“枭去首级”，又“将尸骨碎剉，焚烧扬灰”。刘奇、张晓二人，也被“凌迟处死”并“剉骨扬灰”。[6] 乾隆十一年清政府官员在查办、处理张保太大乘教一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档案资料，这使我们今天得以对该教在各地流传的情况，有所了解。云南张保太于乾隆六年故后，由其养子张晓接充教主。张晓并未完全继承张保太生前所传之教义，他特别强调对龙华三会的信仰。张保太掌教时，比较偏重于茹素诵经，祈求死后得福。张晓则更着重面对现实，强调对现实社会的

---

① 《朱批奏折》张广泗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二，乾隆十一年六月辛未。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〇，乾隆十一年四月癸未。
④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六月庚午。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六月辛未。
⑥ 《朱批奏折》张允随折，乾隆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不满，因而滋生了叛逆思想，并著有“悖逆妖书”，[①]用来组织动员群众，反对清政权。

四川

四川的大乘教有三支。一支称“法船教”，以刘奇为首；一支称“瘟船教”，以僧人雪峰为首。雪峰又名龙，系江西人，原姓陈，早年在浙江杭州灵隐寺出家为僧。自称手掌中有八卦纹，脚下有七个黑痣。瘟船教的教义中也比较强调弥勒佛救世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叛逆性，提出弥勒佛掌教，由李开花当皇帝。[②] 还有一支称铁船教，以朱牛八为首，更具政治色彩，其教首姓名便表明该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四川这三支大乘教，虽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实际上均属云南张保太大乘教之分支，故当局认为这三个支派“名虽有三，其实则一，皆奉大乘教之邪术”。[③]

四川大乘教还有一名教首，名叫唐登芳，是四川邛州人，乾隆三年，他同况奇壁同赴云南张保太处，张保太曾差他与黄中清、况奇壁“往京里开道”。乾隆三年冬在京中患吐血之病，旋去世。其子唐世勋是魏斋婆的孙女婿。[④]

贵州

贵州与云南相邻，故张保太大乘教较早便传入了贵州。贵州大乘教教首，初为魏明琏与其妻魏王氏，人称魏斋婆。魏明琏夫妇曾拜张保太为师入大乘教，先后得到张保太授予的左、右、中宫绶记。魏明琏故后，魏王氏接教开堂，得到张保太之封，以左、右宫兼管中宫，又加升总统宫之佛权。其子魏之瑗等三人，俱受封为“果位金刚”名目。在贵州，凡有入张保太大乘教者，皆须到魏家去“挂号”。魏王氏接掌大乘教后，同云南张保太之养子张晓较少联系，同四川刘奇的关系较为密切。乾隆八年，魏王氏与子魏之瑗前往四川，投见刘奇，“共谋举事”。同时又拜会了瘟船教首、号称“李开花”的苏君贤。由于魏王氏接掌贵州大乘教后，积极活动，并且说“苏君贤要受刑戮，恐做不成皇帝”等话。乾隆皇帝判定她“不特邪教内倡先惑众之首恶”，而且是“不轨案内主持之要犯”，命令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三，乾隆十一年八月辛巳。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三，乾隆十一年八月辛巳。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〇，乾隆十一年七月甲辰。

④ 《朱批奏折》张广泗折，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张广泗对她“务必严加研讯，按律正法，以昭国宪”。[①] 结果，魏王氏被判处“凌迟”，其夫魏明琏也被作为“倡乱之首”，将尸冢“发掘戮裂”。[②]

贵州大乘教教首除魏王氏外，还有唐世勋，系魏王氏之孙婿，四川教首唐登芳之子。唐世勋曾得受张保太“承中绶记”。在贵州大乘教教首中得受张保太封号者还有：吕仕聘，得受“上绕绶记”；魏三鐾，得受“督果位护道金刚绶记”；魏明璋等得受“上徒、下徒绶记”；雷大鸣系“年满千总”，也曾得受“上绕绶记”。[③]

江苏

江苏最早信奉张保太大乘教的，是江阴人夏天佑等五人，自称“西来教”或“龙华会”。夏天佑是江苏江阴县东长乡人，在本地倡“西来教”，茹素诵经，传有徒众二百余人，曾赴云南鸡足山拜见张保太，得受《存心经》。乾隆四年，江苏大乘教遭破获，夏天佑等被捕，供出张保太系教主。与夏天佑同时被捕的还有：邱立先即邱立仙，嘉定县人；黄衷清即黄中清，兴化县人；张理正即张履正，甘泉县人。江苏信奉张保太大乘教的还有一位教首，名王冕即王严。他于乾隆四年来到四川重庆府涪州，会遇张保太的徒弟刘成名。刘成名向他传授“经像教法”，遂入其教。回到江苏嘉定后，又传他的妻子徐氏及徐氏堂弟徐树绩等人入教。徐树绩原习燃灯教又称灯郎教，该教之名系暗寓“复明”之意。教首除嘉定县的徐树绩外，还有张南应、邱笠三等人。徐树绩等三名教首，各有铜灯郎一座，藏于密室。灯前树立小红旗，朝夕对之顶礼膜拜。三人各传有徒弟多人，日间聚会，排班礼拜，凡入其教者，皆须立誓不逃教、破教，故教内之事甚为机密，教外之人皆不得而知。王冕从四川学习张保太大乘教返回后，灯郎教之徐树绩等便“为之附合”，王冕令其学习坐功，声称“功夫已深，默然出神，即能升天谒圣”。徐树绩等即广为传播，并敛取财物供给王冕，以致远近男妇皆称他为“活佛”，多皈依其教。王冕故去，由妻王徐氏“接开教堂”，传习张保太的大乘教。乾隆九年，以前从江苏逃往云南的大乘教徒陆元祥，自云南寄信至江苏，假称张保太已借四川刘奇之躯窍“临凡度众”。王徐氏接信后，便令教内之左允文赴川探听虚实。左允文返回后对王徐氏说，刘奇确系张保太转世，现在雪山梁浩聚

---

① 《朱批奏折》贵州总督张广泗折，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五，乾隆十一年九月壬戌。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五，乾隆十一年九月壬戌。

集多人，帮助李开花。张保太之继子张晓亦在云南设教，欲开"龙华大会"，推刘奇为教主。因闻知王徐氏素有"德行"，欲邀令入川。王徐氏得此信息十分高兴，复令左允文等再次赴川，并将香金纱衣一件赠送刘奇。乾隆十一年正月，王徐氏将过继周彦章之女周氏"指为活佛"，并捏造乩语，教令坐功。周彦章听从其说，即在家中"开堂惑众"。[①] 乾隆十一年大乘教遭破获，王徐氏一支也受到牵连，王徐氏及周彦章之女周氏等数十人被捕。经审讯，官府将王徐氏交与其子王大观"领回约束"，周氏由侯姓迎娶。王徐氏仍不甘心，便指使教徒数十人，来至州衙请愿。声称王徐氏是"活佛"临凡，周氏系"观音转世"，请求将其迎接供奉。当时署知州高廷献外出不在衙内，未得结果。五月二十八日，高廷献回城时，嘉定、宝山等县一百数十人，焚香跪拜，自称皆系"卖产入教之人"。"如今活佛被拿，不可得见，求提来一见，死亦甘心"。高廷献逮捕了其中多人，被捕者供认他们前来，乃受王徐氏指使。"是王徐氏叫小的们来的，说是真心修行的前进，不真心修行的就退后。你们到苏州去做个龙华大会，就可升天，并超度众生。"[②]

湖南

湖南的长沙、普化、湘阳、益阳、茶陵、衡阳、巴陵、武陵、龙阳等地，皆有人传习张保太的大乘教。

江西

江西的大乘教系传自四川。

教首是钟大乔，赣州府信丰县人，雍正十三年赴四川贩卖棉花时，会遇大乘教内的唐登芳，拜师入教。唐登芳授以《最上一乘经》三卷、玉皇像三轴，张公、张婆像两轴。后来钟大乔又住在广东归善人徐善从家，一同吃斋念经，并曾到涪州见过教首刘奇。其后又欲赴云南亲见张保太，但只见到张保太之女婿马周保，得受"前中宫绶记"。乾隆十一年大乘教遭破获，钟大乔被捕，审讯时对清吏提出的质问，他"不惟满口支吾，而且佯作疯癫举动，或哭或笑，总不说话"。而对于大乘教的信仰，却毫不动摇。在狱中"仍然吃素，荤腥毫不入口"，抱定"惟有拚以一死"的态度，与官府相抗，"断不肯吐露真情"。钟大乔这种坚定的态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五，乾隆十一年九月壬戌。

② 《朱批奏折》江苏巡抚陈大绶折，乾隆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度，使审讯他的官员们“甚为诧异”。[①] 钟大乔在被捕之前曾劝令其表弟侯九发入教。侯九发住所虽居广东境内，但与钟大乔的住处仅隔三十余里，彼此经常往来。钟大乔因受有大乘教内“中宫”封号，便劝侯九发入教，并给予经卷、图像、《岸前书》稿及张保太夫妇画像，以后又带领侯九发赴四川寻访刘奇，至徐善从处“讲求经典”。他本人曾传徒李维桂、黄禄山等百余人。[②] 江西大乘教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曾瑞芳，他是赣州府龙南县人，原名曾凤科。乾隆三年正月，曾凤科送其姐赴四川，在重庆遇见大乘教首唐登芳，入“最上一乘教”，吃斋诵经，改名曾瑞芳。乾隆五年返回江西，继续习教。[③]

直隶

张保太大乘教由贵州通过吕斋婆传至直隶。吕斋婆是贵州省南笼府安南县人，在灵官箐居住，有四女四婿。吕斋婆原姓朱，曾于雍正年间携带干儿王相朝即王桂林进京，住在京城西便门外白云观王真人处。[④] 雍正七年她又进京“劝化人”，住在北京城隍庙侧李寡妇家，一同吃斋传教。乾隆三年，四川大乘教首唐登芳由云南来至北京，曾会见过吕斋婆。

以上是云南张保太大乘教在各地流传的情况。

张保太大乘教，经过乾隆十一年的查禁，其教徒大多被捕，该教遭到彻底破坏，经卷亦基本上被销毁了。在乾隆十一年六月丁丑的一道上谕中提到，对于大乘教的“逆书邪说”，皆“应查出销毁，以免蛊惑人心”。命令各地官员必须对此“上紧办理”，并“务将伊逆书邪说悉行搜出，应行陈奏者，抄录进呈，并将书板焚毁销迹，以杜后患”。[⑤] 同年十一月初二日再次下令查禁与销毁大乘教经卷。“大乘教蛊惑人心，皆由伊等著有邪书，辗转传播，以致愚民被诱。今邪教之案已经完结，川、黔、滇三省所有邪书，已经汇缴。其审讯逆犯供词内邪说底稿，亦着检出销毁。至江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邪教书籍图记，一应牵涉邪说者，俱着该督抚于结案之后，查明销毁，毋致留存，以滋后患。”[⑥]经过这次大规模查禁、销毁之后，张保太大乘教的经卷基本上不复存在，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部经卷，是

---

①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塞楞额折，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② 《朱批奏折》广东巡抚准泰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③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塞楞额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④ 《朱批奏折》张广泗折，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六月庚午。
⑥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八，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六日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折中所录的《末法灵文》(在刘奇处搜获)。后来,清吏在江苏宜兴办理吴时济及其徒张仁、杜玉良一案时,搜获《归元直指》、《母生三教》、《根本命脉》三部经卷。[1] 据供皆系张保太所传,原件亦未保存下来。这些情况,使我们今天研究云南张保太大乘教,遇到很大困难。

乾隆二十一年,四川合江县人宋朝伦等又传习张保太的无为教即大乘教。宋朝伦以前曾入过张保太无为教(大乘教),刘奇犯案后,被"枷责发落",不敢再吃斋习教。乾隆二十一年六月,永川县人罗文仕来至其家,自称张保太的徒孙、孙奎的徒弟。他假称孙奎于刘奇案内"虽经正法,其实脱壳隐身"。如今孙奎的两个儿子在铜梁县,孙奎传教时的经忏、书籍,都传与他们,让宋朝伦帮助传无为教,宋朝伦应允。同年九月,罗文仕携带经忏、纸柬及印章,来至宋朝伦处,称印章"佛果圆成"与"道满乾坤",俱系张保太所传。另外还有一方刻有"丝子真人"者,系孙奎遗留,并给宋朝伦几张"敕谕",为他取道号"国常",声称安设东、西、南、北四盘,又称"四金"、"四圣"。封宋朝伦为东盘,陈天位为南盘、王文选为西盘、黎宾为北盘,并称孙奎从前掌过教,系有名之人,将来由其子孙学海为中盘教主。另外又给予张保太所传无为教旧册式,开有丞中、上绕、中绕、下绕等项绶记名称。宋朝伦遂刻了"国常"图章,并刻印绶记纸帖,分头招人入教,借以敛钱。罗文仕又称孙奎为"道岸"(与张保太道号相同),自称"岸前",宋朝伦为"代岸前"。罗文仕旋为疯狗咬伤身故,宋朝伦恐教内之人日久涣散,遂邀同陈天位等,由罗文仕之子罗之扬带领,前往孙学海家,欲奉孙学海为教主。孙学海初未应允,后来宋朝伦又对他说:"你父亲没有死,日后还可见面,现在图书在我家里。"经过再三劝说,孙学海才来至宋朝伦家。宋朝伦又邀了同教的王文选等人,称孙学海乃"七祖转世",相貌酷似其父孙奎,可作"收圆末祖",将来"必当出世"。遂由宋朝伦等辅佐,奉为"龙华教主"。令孙学海居中正坐,宋朝伦站立旁边,令徒众向孙学海叩头礼拜,称之为"天七爷"。其后,孙学海便与宋朝伦住在楼上,不令外人见面。乾隆二十二年六月的一天,孙学海酒醉睡熟,宋朝伦乘机将他鸡奸,孙学海醒后不依,宋朝伦只得许他30两银子作罢。后来宋朝伦又奸过孙学海几次。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宋朝伦在教徒郑怀家见到泸州孀妇杨李氏之女杨幺姑貌美,即生邪念,以治病为名,令杨幺姑拜他

---

① 据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刑部档,陕甘总督吴达善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

为干父。后来又把杨幺姑接来家中，与之奸宿。[①] 秘密教门打着茹素诵经、拜神礼拜的招牌，实际上却干了大量伤风败俗的勾当。宋朝伦以传教治病为名，对孙学海屡次鸡奸，并诱奸杨幺姑，充分暴露了秘密教门的阴暗面。

乾隆三十三年，被发配在甘肃的张仁、杜玉良等，又在配所复兴张保太大乘教。张仁、杜玉良系张保太大乘教内吴时济之徒。乾隆九年，僧人时济（俗名吴时济）"得受云南张保太龙华邪教妖书，在常镇一带倡教惑众，招引张仁、杜玉梁即杜玉良"等"附和传播"，并拜其为师。吴时济妄言"功行圆满即可白日飞升"。[②] 当时曾在江苏常州府宜兴县之蒋法祖等男妇、幼孩15人，听信吴时济之言，驾船前往太湖内西昂山水牛王庙烧香，误信"七日不食烟火，即可成佛"之言，以致俱皆饥饿而死。[③] 事情暴露之后，吴时济被处斩，其徒张仁发遣甘肃文县，杜玉良发遣甘肃礼县。张仁因母亲年老，留妻子侍养，单身发配，并由其亲戚宗正虔陪伴同行，代运行李。张仁临行时，密将张保太留传的《归元真指》、《母生三教》、《根宗命脉》等三部经卷带往配所。后来，他在文县城隍庙旁小屋内栖身，披剃为僧，自号"云玉子"，在街道挑水卖钱度日。乾隆十三年冬，张仁之母央求宗正虔赴甘肃探望其子，为张仁带去白银20两及鞋子等物、家信一封。当时宗正虔亦已出家为僧，号同然，向张仁密称龙华教中漏网教徒，如今仍然吃斋做会。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又有张仁之徒、江苏溧阳县人殷万里来至甘肃文县探望其师，带有教内史有衍之弟史文元所著《鹦言诗集》。张仁亦与史文元等各有字札诗句，往还唱和。乾隆三十三年，张仁、史文元等人的活动被官府拿获，在史文元即史起润家中搜获张保太所传《先后天太极说》一卷，张保太所撰《口口相授》一本，在教徒朱玉成家中搜获张保太旧案之人所刊《四官表》一本，在教徒蹇正祥家搜获吴时济抄传《三教指迷》一书，龙华教《支派祖谕》一本，及杨鹏翼撰《佛教》一纸，在教徒卢显廷家中搜得张保太所撰《末劫法宝》一本，刘奇所撰《东明历》一本。[④]

---

① 《宋朝伦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朱批奏折》江苏巡抚彰宝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苏巡抚陈大绶折，乾隆九年三月十三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苏巡抚彰宝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第八章　雍乾年间的八卦教

雍正、乾隆年间，八卦教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康熙年间已有的震卦、离卦、坎卦等，都已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秘密教门，而且其他各卦，也已逐渐完备。

一、雍正至乾隆前半期的八卦教

（一）山西定襄韩德荣所传八卦教

韩德荣曾于康熙年间在山东随刘起凤、刘起祥拜刘儒汉为师入五荤道、收元教。后来回到山西，继续传教。康熙末年，刘儒汉所传八卦教遭破获，韩德荣也暂停活动。雍正五年，韩德荣又重新开始传教活动，他自称"孔子再世"，自任教首。雍正十年，韩德荣命其徒张印、田大元二人至山东，同刘起凤之子刘二长儿，一同至河南虞城县王之(子)卿处，面商复教之事。王之卿系王天赐之子，王天赐曾于康熙年间与刘起凤同拜刘儒汉为师入教。王天赐故后，王之卿便从河南虞城县迁至商丘县小庄。韩德荣找到王之卿，商议复教之事，被王之卿回绝。乾隆二年春间，刘起凤之侄刘二长儿又带领两名山西人张印和田大元，来至王之卿处，声称韩德荣系星宿下降，成了"收元祖师"，劝王之卿入教，结果又被回绝。张印、田大元又来到山东单县刘家楼，托侯进忠通知刘儒汉之子，商议入教之事，亦被斥回，未能同刘儒汉之子见面。①

乾隆十三年正月十四日，直隶长垣人徐文美、吕大训、吕小二3人又来至王之卿家。徐文美之父徐国甫原是王之卿之徒，20年前曾来过王家，因当时王之卿之父王天赐已故，便拜王之卿为师。王之卿送给他一本《金丹还元宝卷》、一本《五女传道书》。乾隆十三年，徐文美再次来至王家，送给王之卿六七两银

---

① 阿里衮折，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载《史料旬刊》第三十册。

子。[1] 乾隆十三年初，韩德荣在山西被捕，供出河南虞城县王之卿乃系同教。清政府派人在河南虞城县，遍查全县并无王之卿其人。后来终于在河南商丘县小庄把王之卿捕获，并于其家中搜获《五女传》（疑为《五女传道书》）、《八卦图》、《训蒙说》、《小儿喃杂抄》等书，[2]王之卿于被捕后不久死亡。

（二）刘恪、刘省过所传八卦教

乾隆前半期，八卦教在刘恪、刘省过掌教期间有了较大的发展。乾隆元年，刘儒汉身故，由其子刘恪继任教主，刘恪捐有州同职衔，虽身为教主，却热衷于仕途。故乾隆二年春山西收元教首韩德荣派弟子张印、田大元托侯进忠与他商议复教之事，竟被斥回。不过，韩隆十三年韩德荣案发后，刘恪仍受到牵连，被押解到山西接受审讯。当时因清吏确信"刘恪并未踵行邪教"，而将他释回。实际上，刘恪确系教主，故当刘恪被押解赴山西时，八卦教离卦卦长部从化还同教内陈霞九等向教内凑了1000两银子，准备送给刘恪做盘费。后因刘恪释回，才未将银两送往。[3] 继刘恪之后任八卦教教主的，是刘恪之子刘省过。在刘省过掌教期间，八卦教在组织上已更加完备。除"坤卦一卦未曾立教"[4]外，其余七卦俱已配齐。各卦教主及传播地区如下：

离卦：主要在河南、山东、直隶一带传播，教长为河南商丘的"部大兄弟"及其家族。[5]

震卦：主要在山东、河南、直隶、苏北流传，以山东菏泽为中心，王中本系震卦教主。[6]

坎卦：中心在直隶容城，"白沟河张二即张柏系属卦主"，[7]在直隶、山东一带传播。山东坎卦教长是孔万林，直隶大兴县坎卦头目是屈得兴。[8]

---

① 河南巡抚硕色折，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载《史料旬刊》第三十期。
② 河南巡抚硕色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载《史料旬刊》第三十期。
③ 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收元教及其支派》，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三卷第四期。
④ 《朱批奏折》两江总督书麟折，韩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⑤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⑥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惠龄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三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艮卦:传教中心是山东金乡,由张玉成、张静安父子相继为卦长。[①]

巽卦:传教中心在山东单县,"卦长系单县人张炎兄弟"。[②]

乾卦:传教中心在河南虞城县,"卦长系虞城县人张姓"。后来传其子张玺、张之士。[③]

兑卦:传教中心在直隶东明县,"卦长系东明县人陈善山兄弟三人"。[④]

二、王中与清水教

关于清水教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马西沙认为,"八卦教发展到刘恪、刘省过时代,已易名清水教",因此清水教来源于八卦教,教首便是刘省过。[⑤] 而日本学者则认为清水教乃是王中创立的一个相对独立教门。指出:"王中虽与刘省过关系密切,但他在八卦教中并不居重要地位,因而另创独立派别清水教。"[⑥]并且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军机处档》,对王中创立清水教的情况,作了如下叙述:王中是山东菏泽县沙土集人,又名王忠玉,其祖父王志诚行医为生,会坐功运气,著有《运气歌诀》一书。王中自幼读书未成,遂改学外科医理。乾隆三十五年其祖父去世之后,自己独立行医,治疗疮毒患者。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因行医行业不景气,遂决意作劝善之书以骗取钱米度日。他将平素耳闻记忆的祖父所遗《运气歌诀》同鄙俚歌诀相混,写成《行善书》。又做一块二尺多长的黄布,上写中天老爷、先天老爷与后天老爷字样作为牌位,供奉家中。又于牌位前供三杯清水,故取名清水教。恰好他的亲戚王振到来,王中便将《行善书》传给他,并劝其入教,及转传他人入教。凡入其教者,皆需携带钱米至王中家中诵经。先后有四人入教,《行善书》也从王振手中依次传至第四人龙居泾处。四人每逢朔望,便携钱10文,米一二升,来到王中家中供奉清水,烧香诵书。龙居泾又将《行善书》传给李孟炳、李孟镶弟兄。后李孟炳兄弟到河南临颍县传教时被捕,龙居泾闻讯后将《行善书》烧毁。

---

①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书麟折,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②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③ 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④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⑤ 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⑥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叶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四节,《山东单县刘佐臣创立的教派》,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王中所倡清水教供奉先天、中天、后天，王中又自称后天老爷之子。此说大概同《皇极经》中过去由燃灯佛掌教、现在由释迦佛掌教、未来由弥勒佛掌教之说有关。① 从档案史料来看，王中供奉先天、中天、后天，尚有另外的原因。他尊五荤道、收元教创始人刘佐臣为"先天老爷"，而自己又称是"后天老爷的儿子"。② 这样，王中便把自己提高到了与刘佐臣相同的教主地位。可是，当时八卦教的教主，毕竟是刘佐臣的嫡传子孙刘省过，所以王中在表面上也只好尊刘省过为清水教教主。刘省过虽以教主嫡传自居，却很少亲自参与一般传徒活动，也乐意担任清水教名义上的教主。清水教只是八卦教一个分支，所以刘省过乃八卦教老教首，而王中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即清水教的教首。乾隆三十七年，清水教因教徒李孟炳等人在河南临颍县传教犯案，牵涉王中、刘省过等人。是年二月，山东濮州小长治村人李孟炳等携带"邪书"在河南临颍县一带传教，为当地官府查获。经审讯，又究出同教的李孟醇(李孟炳的兄弟)与教首王中，以及龙居泾等人。清吏又于三月初在山东把王中等人逮捕，并在教徒谌梅家中搜到一本"邪书"。河南巡抚何煟将李孟炳、谌梅所传"邪书"呈报给乾隆皇帝过目。结果，乾隆皇帝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发现该"邪书"中有重大"悖逆情事"。在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的一道"上谕"中写道："朕……及阅谌梅家搜出王中所传逆书内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察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即后页'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钩周朝八百秋'二语，亦俨然有自居太公与周公之意。"③由于这涉及"谋大逆"的要案，王中当然不敢承认，因而辩解说："平明为天明时运气流转，太公及八百秋，为行善可如太公有寿。"④乾隆皇帝对于王中的解释自然不会相信，便下令继续严究此事。但命令到达山东时，王中已被绞死。王中死后，龙居泾等人在清吏的一再严审之下，终于供出了事情真相。"王中原本及递抄各书，俱系平胡字样。前以河南抄送书内改为明字，王中极端狡猾，是以随同附合。"⑤至此，王中一案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起一般性传习邪教、邪书的案件，变成了一起重大"谋逆"案件。乾隆皇帝看到事实真

---

①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叶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四节，《山东单县刘佐臣创立的教派》，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

② 《秦学曾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③ 《上谕档》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上谕"。

④ 《上谕档》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上谕"。

⑤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何煟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六日。

相同自己最初的判断完全一致，因而决心把这一案件进一步深究下去。乾隆三十七年四月，河南巡抚何煟通过对李孟炳的审讯，究出了清水教的老教主刘姓。李孟炳供："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小的与同教张勤说起兴教的人，张勤说王中还有老教主刘姓，住山东曹州府单县东门城里。"又说："刘姓是个监生，祖上做过官的人，皆称为'山上主儿'。家中现在行教，又有先天、中天、后天称呼，王中是其分支行教的人。""又听得刘家门户甚体面，只有王中与他往来。"[①]表明刘姓乃清水教实际教主，王中是他手下做具体工作的，因此清廷对刘姓教主十分重视。同年五月，山东方面根据河南当局提供的线索，逮捕了王中的徒弟王振等人。王振等供出："王中系单县监生刘宗礼之徒，惟王中能入老教主之家，余人不能与老教主见面。"[②]这样，清吏遂查明该教的刘姓老教主便是单县的监生刘宗礼即刘省过。五月初，山东方面终于拿获了刘姓老教主刘宗礼。山东按察使国泰奏："据署单县史国辅禀报，奉文饬拿老教主刘宗礼今已拿获。据供名刘省过，系捐纳县丞。伊祖刘佐臣于康熙五十八年因邪教犯案，奉拿病故。"[③]五月十二日，国泰又亲抵单县，对刘宗礼即刘省过家进行抄查，于刘家地下"刨有大小瓶罐二十七个，皆贮银两，兼有散埋土中者。"共计银12427两，并有金子一小锭，计二两五钱。[④] 清朝官员对于刘省过家中居然藏有如此巨大的财富，深感惊讶！因而对刘省过加以审问，追究金银之来源。刘省过供称："内中多有伊祖、父传教徒弟、徒孙等陆续帮助，逐年积累，致有此数。"至于帮送银两的具体人，刘省过供称："河南商丘县部大兄弟，并虞城县人孙圣仪、贾茂林、王继圣，山东历城县人崔柏瑞，章丘县人李大顺、潘筠，荣城县人张柏及已正法的王中兄弟，并现获之孔万林、秦舒等。"这些人"皆伊祖、父教中支派，内多有送银之人。"[⑤]随着案情的进展，清朝官员也更加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山东巡抚徐绩在奏折中表明了这种担心，他说："刘省过等祖孙相继传教，得受伙党馈送，坐拥多资，必另有邪逆不法书物，足以煽惑人心。"而且"刘姓家道殷实，闻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臣思该犯现银多至万余金，庄田富有，自必均系传教所得，其徒党之众更不待言。"[⑥]这里，徐绩已经暗示刘省过可能或将要进行

①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何煟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二日。

②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徐绩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六日。

③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十日。

④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⑤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⑥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徐绩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更大的"谋为不轨"的行动。清朝官员们从政权的安危出发,主要关心两方面问题:一是该教的组织状况,有哪些教首、骨干;二是该教有哪些是足以"惑众"的"邪书"。通过对刘省过的审讯,清廷查清八卦教自刘佐臣以来的世袭,即刘佐臣到刘儒汉到刘恪到刘省过即刘宗礼。刘儒汉传教时,所收之徒分为八卦,每一卦以一人为卦长,二人为左干右支,以下便是一般教徒,每卦均可各自收徒。所收之徒,各出银钱送给卦长,再由卦长汇送于教主。当时因人数不多,未能将八卦配齐,故也有以一人而兼两卦者。[①] 当时查明八卦教的三个主卦长,是河南商丘的离卦卦长郜氏弟兄,山东菏泽的震卦卦长王中及直隶容城的坎卦卦长张柏。关于八卦教内所传"邪书",刘省过等人供出的计有:《五女传道书》、《禀圣如来锦囊》、《神仙论》、《八卦图》及《六甲天元》。经国泰审阅,认为这些"邪书"的内容中,"尚无悖逆字句"。但在教内骨干孔兴已家中已搜获一本"无名邪书",书中载有"走肖、木易、卯金刀来争战"等句。国泰认为"较之王中逆词周刘等字尤为悖逆"。书中还有"贼星八牛,火焚幽燕",及"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等句,其内容"皆悖逆之极"。[②] 因为"朝廷离幽燕",暗指清朝朝廷将离开北京。"建康城里排筵宴",暗指南京城里举行筵宴进行庆贺,也就是暗指清朝灭亡,明朝复兴。这对于清政府官员来说,自然是"悖逆之极"了。正是这些内容,大大加重了刘省过等人的罪行和惩处。刘省过被处以"斩立决",刘省过之弟刘省愆于秋后处斩。刘省过之长子刘铨即刘大洪判以"斩监候",囚于单县监狱。刘省过之次子刘二洪当时不在家,闻讯逃往河南。刘省过之妻李氏及刘把即刘三洪、刘永庆、刘五子以及刘铨之妻黄氏等6人,押赴北京,给功臣之家为奴。其中李氏与刘省过四子、五子分给副都统果升阿为奴,住东城帽儿胡同;刘三洪分给鄂岳家为奴,住西城帅府胡同,刘铨之妻黄氏及幼子,分给公复兴家为奴,刘姓其他近亲则发遣至新疆为奴。

八卦教在雍正及乾隆前期得到了较大发展,而这也正是它遭受打击的原因。经过这次打击,八卦教又采取改换名目或化整为零的办法,继续在民间秘密流传。

---

①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②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三、乾隆后期的八卦教

八卦教经过康熙、雍正与乾隆前半期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秘密教门，不仅拥有大量教徒，而且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对清政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虽然不断受到清政府的打击，但是，八卦教却仍然秘密流传。

（一）吴克已等人传播的清水教

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在打击清水教的过程中，将八卦教教首刘省过、清水教教首王中处决。此后清水教仍然秘密流传，其核心人物便是吴克己。吴克己原籍河南确山县，后迁居山东曹县，乾隆三十六年拜菏泽人布伟为师入清水教，得受《灵山礼》、《采茶歌》等书。乾隆三十七年，王中、刘省过因案发被处决后，吴克己迫于形势，暂时停止了传教活动。乾隆四十五年，吴克己因家道贫苦，重新开始传教，先后传徒位荣，并转传李书、李忠、黄存义、李步云等人。李步云又劝其父李太智，兄李腾云、李宏天，侄李松业等人入教。对这段经历，吴克己在供词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小的六十三岁，是确山县生长，先到菏泽住过几年，如今在曹县黄家庄住。小的习的这清水教，就是白莲教。小的师父叫布伟，是菏泽县卢墩集的人。""小的转（传）教位荣，他又传李书、李忠，徒弟们入教念咒语，只是口传并没有经本，小的还能默背。至入教之人，必须先送谢礼，自三四百文起至七八百文及一千文不等。"[①]吴克己恢复传教以后，很少新的创造"止传习其旧习邪说"。据其徒位荣供："小的师父吴克己入教的时节，只用三钟清水磕头，所以叫清水教，又名白莲教。"[②]但他的弟子李步云等则对教义、教规作了较多发展。入教时由教主传给《灵山礼四象歌》，宣称："入了这教，有饭吃，就荒乱也不怕。"要求徒众们出钱送给"上头祖师"，以便"安排户口"。声称"安排户口，逐户往来念咒消灾难，将来必有好处"。教内还以"乾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为《九经》；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八书》。[③] 教内尊刘省过为"顾劫数主儿"，意思是"会避灾难的主儿"。"能顾劫数"，"不怕水旱荒乱"，借此"哄诱（教徒）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吴克己供单。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位荣供单。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杨起玉供词。

出钱"。[1] 经过吴克己及其弟子几年的努力，清水教在山东菏泽、单县、曹县一带又逐渐恢复。并在教内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谁传的人多，就赐予他大执事职分，这大执事是最体面的，管着许多人"。[2] "大执事职分管人，系做教主传教的意思。管的人多，就如做官的一样。"[3]乾隆四十七年清水教再次遭到破获，教首吴克己及布伟的三个儿子布文起、布文彬、布三及教徒崔廷珍、范志嘉等共75人被捕。

(二)直隶大名府八卦会杀官劫狱事件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四日夜，直隶大名府发生了八卦会(八卦教)首领段文经、徐克展等率众杀官劫狱事件。这是八卦会首领段文经，借营救监狱中的教首刘铨即刘大洪相号召，以实现自己登基称帝政治野心的一次暴动。段文经原是大名府的"皂头"，直隶广平县张孟村人，曾拜震卦头目焦玉坤为师入八卦教，又拜河南虞城县孟村李老五为拳棒师傅。以"治病求福"和"学习拳棒"相号召，招人入教。[4]

段文经为首的八卦会，要求教徒"每日烧香磕头"，"每逢初一、十五供三钟清茶，朝上磕头，说是代免灾难，也有咒语"。[5] 所传咒语是："一炷信香点上苍，拜上蒲州关大王。忠胆一清垂千古，玉泉山前立庙堂。清世千古镇上将，能知福祸与存亡。四季开观三进礼，戮斩端静鬼神亡。先世敕令关大王，可在违令遭贬。牒文随身带，法令带随身。诸佛归本位，法令随牒文。"这个咒语尚无政治内容，无非歌颂关羽的忠心义气，求其庇佑。而另一首咒语则带有明显的政治内容："汉室孙祖玉楼关，限他冲广遇夭魔。水烟(淹)东鲁三千里，血染西秦八百坡。蛇头马尾容易过，猴头羊蹄可奈何。贤君若真消息(疑缺一字)，火烧山西定干戈。"该符咒的中心思想是号召教徒们准备动武造反。教内还传有"护身咒"："金刚灵佛紧随身，镇住鬼神不敢侵。威镇天门听敕令，佛封四大天王神。遮罗神，佛罗神，正封南海观世音。"[6]八卦会另一头目徐克展系段文经之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明兴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四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明兴折，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明兴折，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刘峨折，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明兴折，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补288/2。作者不详。

徒，是直隶元城县小潭口人，在本县充当捕快。[1] 段文经既是官府的皂头，又是八卦会首领，在当地拥有一定的地位与社会势力，因而萌发了造反的念头。他"恐同教之人不肯同行，故以救单县刘洪为煽惑同教之计"。[2]

八卦教经过刘佐臣、刘儒汉、刘恪、刘省过等祖孙几代的传播，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已拥有大量徒众，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虽然屡次遭到打击，教首被杀或被囚禁，但是刘姓家族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秘密教门作为一个封建性很强的民间秘密结社，深受我国传统的封建世袭制的影响。教主一般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加上在传教过程中，教主已经被神化，虽然经过乾隆三十七年和四十七年两次重大打击，刘姓教主或被处死，或被囚禁狱中，或流放各地，或充发为奴，但教内骨干仍然以刘姓子孙的名义在各地传教收徒。在山东一带的八卦教骨干们便主要利用刘二洪的名义进行传教活动。刘二洪是刘省过次子，乾隆三十七年刘省过、王中犯案时，他恰好不在家，闻讯后便逃往河南，靠卖针度日。乾隆四十年秘密回到家乡单县，从同教张世英处得知其父刘省过已被处决，大哥刘洪尚在单县狱中，母亲、兄弟均被解往北京给官员为奴。于是决定前往北京，寻找母亲、弟弟的下落。他忆起父亲在日，提到过当年在北京时，曾同前门外小椿树胡同的方姓方中正相好，遂打算到北京寻访方姓。他在张世英陪同下，于乾隆四十三年来到北京。[3] 刘二洪找到方中正后，便留在方家暂住。方中正答应替他打听其母亲等人的下落，又因自己年老无子，便认刘二洪为义子，将刘二洪改名方孝。不久，方中正果然打听到刘三洪即刘把在西城帅府胡同鄂岳家为奴；其母亲与四弟在东城帽儿胡同果升阿家为奴，大嫂在公复兴家为奴。刘二洪便找到母亲与四弟，使母子兄弟在经过多年漂泊离散之后，重新相见。刘二洪在北京逐渐恢复了同以前教徒间的联系，并且传京畿及直隶章丘等县之人朱二、梁迁等多人为徒，恢复了教主地位。后来，刘二洪听杨林说，山东的教徒吕栋等人利用刘二洪弟兄的名义，广为招徒。乾隆四十五年，刘二洪来到大名府，找到该处教首杨林，对吕栋等人借他名义传教一事表示不满。指责吕栋等人"指着我兄弟的名色，在外招摇敛钱"。"他们敛的钱都是自己分用，不过给我几十两。将来闹出事来，我母子兄弟性命俱不能保"，故让杨林阻止吕栋等不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明兴折，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刘峨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刘峨折，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要再用自己的名义招徒。[①]

在直隶,段文经、徐克展等人也利用刘铨即刘大洪的名义传徒敛钱,并以迎救刘铨为号召,在大名府杀官劫狱。段文经准备造反登基做皇帝一事,酝酿已久。他向人宣扬自己"是龟背,有些异像",[②]暗示将来可能临朝称帝。乾隆五十一年春,段文经与徐克展、王廉等人来到小庄王八家里,声称要将许三的女儿雨姐、王八的女儿冬姐、徐克展的表妹冯容姐及申光的女儿申贤姐等四人封为"四菩萨",并娶四人为妻,"将来有好处"。又对教徒们封官许愿,答应某人封为知府,某人封为同知、总兵以至太师、太保和"魔王"等头衔。[③] 另外,段文经还做了物质上的准备,借传徒大量敛钱,要求教徒"行好",即每季每人要出100钱,"由会中公用"。他利用这些钱,一方面做造反的物质准备,另一方面则通过吕栋送钱给狱中的刘铨即刘大洪,以便得到刘铨的信任。同年四月,段文经令同教的甄汉杰等人写信给狱中的刘铨,说段文经"心里至明,稳坐大名,心思已定,忠心不退"。暗示段文经将占据大名。吕栋将信交给秦德祥,秦德祥见信内有"违碍"字句,即将信焚毁。[④] 同年七月初十日,段文经派人来到吕栋处,告诉他教内已决定在八月十五起事,让吕栋等事先把刘铨从狱中救出,送至大名府许三家中。[⑤] 后来,段文经考虑"各处传人,日子久了,风声出去反被查拿,不如早些先得了大名府。吕栋们于八月十五日救了刘洪,也就有安顿的地方了",[⑥]打算提前举事。他请"军师"邢士花占卜,以定举事日期。邢士花占卜后认为闰七月十五日乃大吉之日,段文经遂决这一天举事。七月十三日,段文经、徐克展招引了五十余人,相约在大名府城内许三家中会齐。因许三家中有三间空房,位置又靠近道署。是日三更以后,段文经等点香叩头,各用红白绸布包头,有人手执器械,有人徒手,由许三家推倒院墙,进入道署,邢士花、许三、张永年等人在外面接应。大名道员熊恩绂闻声出堂,喊人擒拿,结果被段文经等人用刀枪砍扎,伤有十余处,回至中堂后即倒地殒命。家人、衙役惊起拒敌,被段文经等杀伤十余人。段文经正欲攻打库门,见差役人等逐渐增多,遂率众由大门退出,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刘峨折,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刘峨折,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许三、杨进、程二小等人供词。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明兴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二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明兴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二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刘峨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分赴大名、元城二县营救刘大洪(刘铨)等囚犯。在大名县仅将监狱头门打开,内监未动。在元城县已攻入内监,欲令囚犯同行,旋闻枪声,始"夺门逃逸"。[1]段文经袭击大名府一事失败后,参与其事的八卦会成员大多被杀或逮捕后处死,而段文经却得以逃逸。官员从被捕者邢士花、许三等人口供中,得知段文经袭击大名是为了营救监禁在单县的刘铨,遂将他从狱中提出审讯。刘铨供:"收禁在监已十四年,并不能结交同党。吕栋、刘兴邦数次送过银两,收受属实,实不知段文经等谋为不轨,先寄逆书及欲劫伊出监之事。"[2]被捕的骨干吕栋、刘兴邦、李得禄、甄汉杰等人,皆供称刘铨从未参与段文经袭击大名府之事,甚至不知段文经、徐克展等为何人。但因刘铨乃八卦教教首,仍将他于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六日与吕栋等人一同处斩。段文经案件也使刘姓其他成员受到牵连。吕栋供出刘二洪曾于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在鄂岳家中见过其母,后改方姓,在前门外小椿树胡同开小古董铺,遂于八月初二日将其逮捕。刘三洪曾随鄂岳赴福建,同年九月十七日,被闽浙总督常青在福州处斩。刘四洪也同刘二洪一同被处决。

(三)乾隆末年八卦教的复教活动

乾隆末年,身在新疆喀什噶尔给伯克为奴的八卦教教首王子重(王中之子),通过教徒刘照魁往来于各地、联络通信息之便,企图复兴八卦教之震卦教。刘照魁是陕西渭南县人,自幼穷苦无依,从八岁起在渭南县跟人学变戏法为生。乾隆三十五年起独自外出谋生,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各处游荡。乾隆四十八年又往广西佣工。乾隆四十九年四月,来到养利州地方,在军犯刘书芳所开店铺内居住。刘书芳是山东单县八卦教徒,因犯案发配养利州充军。刘照魁向他询问入八卦教有何好处?刘书芳答以"入了这教,可以消灾免祸,不但今生获福,来世必得好处"。刘照魁遂拜刘书芳为师入教。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刘书芳派刘照魁去山东单县家乡送信。刘照魁从养利州出发,前往山东,于同年四月十五日来到单县刘书芳家,把信交给他的妻子李氏。并于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回到养利州,把在山东单县听到的一些消息,如发配在广东的同教李大志、魏荣、李书等均已病故等事告诉刘书芳。刘书芳出于对同教的同情和关心,要求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刘峨折,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明兴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二日。

刘照魁把他们的骨灰运回家乡。刘照魁便"慷慨应允"。临行时,刘书芳交给他10两银子作路费,并带给妻子25两银子和一封书信,嘱咐刘照魁到广东德庆州时,可顺路探望同案被发配的步文斌。乾隆五十三年夏,刘照魁来到广宁、鹤山,将李大志等人骨灰带往山东,途中在德庆州的步文斌处住了十余日。步文斌见他"专心好道",便收他为义子,并托他带信给妻子萧氏。同年年底,刘照魁来到山东,把银、信、骨灰交给各家,然后留在步萧氏处帮种庄稼。乾隆五十四年冬,步萧氏令刘照魁送500文钱给菏泽县北袁庄的王袁氏。王袁氏之夫乃震卦教掌教及清水教教首王中,于乾隆三十七年犯案被绞死。其子王子重继任震卦教掌教,因犯案被发配到了新疆的喀什噶尔(今喀什)。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刘照魁随步萧氏来到王袁氏家拜年,王袁氏称赞刘照魁是个"有义气的人",求他到"口外"去看望儿子王子重。刘照魁因王子重乃震卦掌教,便欣然同意,并于同年二月十九日从山东出发,前往"口外"的喀什噶尔。途经库车时,又见到了同教遣犯毛有伦,在阿克苏又见到周法才等,在叶尔羌见到屈进河等。此六人皆托刘照魁向王子重报告他们"善心不退",要向王子重讨"封号"。同年十月,刘照魁来到喀什噶尔,见到王子重,交明家信,并将屈进河等人求封的事,向王子重告知。王子重留他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把八卦教内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讲解。为表彰他从广东搬回同教骨灰,及到口外来送信,称他是"教内有功行的人",封他为"东震至行开路真人"。并希望他回山东后,能够兴复原教,那时还要封他更高的职务,让他"执掌教内的事"。还向他许愿说:待他把会事兴起,再到喀什噶尔送信,还要给他"瑶数铜釰剑",就可掌"生杀之权"。当刘照魁回到家乡渭南歇息时,即被人告发而被捕。从这个案件的供词中,透露出乾隆末年八卦教内已经形成严格的封建等级制。教内"定有八种名号",入教后便有了"功行"。"先封为传仕,由传仕升全仕,由全仕升点火,以后流水、总流水、档来真人、开路真人、指路真人,挨次递升。到全仕上就可传教徒弟,到流水上可以经营账目,到真人上可以动用银钱。"[①]这些规定,反映了秘密教门内部的组织情况与等级关系。

① 《刘照魁供词》,见《天地会》(五)第408—412页。

第九章　山东清水教起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在山东寿张、堂邑两县同时爆发了以王伦为首的清水教起义。起义者于数天之内,接连攻占寿张、堂邑、阳谷。后来又占据了临清土城。临清位于运河之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城有土城与砖城之分。以往人们习惯于把土城称为"旧城",砖城称为"新城",实际上土城修建在砖城之后。砖城系明景泰年间(1450—1456)所建,官府、衙署皆位于砖府之内。后来在砖城以外的西南面,又兴起了商业区,人口日增。明正德六年(1511)朝廷为了"防盗"而在商业区"掘堑筑城",用来保护城外商业区的居民,故所修土城又称"边墙"。[①] 这次起义发起在距离清帝国统治中心北京不远的山东省西北部,而临清又位于运河之畔,扼漕运孔道。一旦临清完全落入起义军之手,将会使清廷的漕粮断绝,这对清帝国来说,不啻是个致命的威胁。这次起义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清代前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拉开了清中期以后各族人民武装反抗斗争的序幕,使人们看到了在表面繁荣昌盛掩盖下,清王朝深层存在着的危机。这次起义虽然只坚持了短短的一个月,但对清廷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一、王伦其人和清水教

王伦是山东寿张县党家庄人,党家庄位于寿张与阳谷两县交错的张秋镇附近。王伦大约生于雍正末年,乾隆三十九年率众起义时,年约40岁。他身体矮小,"身长四尺光景",约合1.60米左右。四方脸,有浅白麻子,留有约五寸长的胡须。王伦弟兄姐妹六人,在兄弟四人中,王伦居长,王真行二,王朴行三,王枢

① 《临清县志》,建置志。

行四。王伦家庭小康,有土地一百五六十亩,15 间瓦房,雇有长工代为耕种。[①] 王伦精于拳棒,兼通医道,时常借替人治病来传教收徒。"伦,阳谷人,貌魁岸,性狡谲,多力有拳勇。尝为县役,因事责斥,无以为生,遂抄撮方书,为人治痈疡颇验。择受病男女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愿为义儿、义女以报德。又诡称遇异人授符箓,能召鬼神诸邪法,以惑愚民,积十余年而奸党遍诸各邑。"[②]又载称王伦"居阳谷党家店,凶狡无赖,以教拳棒往来兖东诸邑,阴以白莲教诱人练气,称练气饥数十日不死,可避劫。以十日不食为小功,八十一日不食为大功。练气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③]档案史料记载:"王伦系寿张县人,自乾隆十六年起从张继成入了邪教,不敢露名。后来因伊父身故,无人管束,自三十六年上遂收起徒弟,至今已有三年。凡入教之人,转相招引,各处乡落愚民,多有为其煽惑者。"[④]有关王伦所习之教,清代官方文献和私家著述中,多笼统地称之为"白莲教"。如"逆匪首犯王伦,系寿张人,本属白莲教,煽惑愚民"。[⑤] 私家著述则称王伦所习系清水教者,如俞蛟称"清水教主招聚训练,择八月二十八日起事矣"。又说"察查每村,果有贼目数人教习枪棒,声言饮水一瓯,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为清水教"。[⑥] 从清代秘密教门流传情况可知,乾隆三十六年山东菏泽县曾破获过以王中为首的清水教。那么,王伦所传习的清水教是否传自王中的清水教呢? 二者有无组织上的联系呢? 日本学者铃木中正认为王伦所习之清水教可能传自王中。因为王伦的家乡寿张,与王中传习清水教的菏泽县,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远。而且王伦传习清水教的时间,与王中传习清水教的时间也大体相同。并且提到,王中在创立清水教之后第二年,就被官方拿获处刑。其后致力于复兴濒临危机的教团者,是与王中结拜弟兄者布伟。除布伟外,还有许多人也致力于维持清水教的存在,王伦便是其中之一。而自乾隆三十六年即已开始从事传教活动的王伦,不会不受邻县王中的影响,虽无明确证

---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十六辑,山东巡抚徐绩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及《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二。

②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方南生等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 208 页。

③ 潘相:《骙文书屋集略》,《邪教戒》。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⑤ 《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九,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午。

⑥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方南生等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据证明王伦曾拜王中为师,但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王伦的治病术传自袁公溥,而袁公溥有可能传自王中。"①日本学者佐滕公彦也认为王伦的清水教与王中的清水教有密切关系,"清水教是八卦教中震卦的别称",又称王伦清水教乃是八卦教中震卦教的支派。② 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guin)则认为:"王伦并不想寻找已经存在的教派集团,也不想让它们与他自己的组织发生联系。他似乎只满足于为自己树立一个新型的、满足别人的人物和创立他自己的集团而已"。③ 她认为王伦传习的清水教同流行于山东、直隶的八卦教有着组织上的联系,只是不去寻找这种联系而已。我国学者俞海兰也认为:"王伦所发展的支派名叫清水教,它和当时华北地区最主要的支派八卦教似乎并没有联系。因为王伦起义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的响应和支援。"不过他又说:"王伦所联系的群众,和联系的方法,所传播的教义和仪式,却都跟八卦教大体相同。"④

那么王伦传习的教门究竟属何教派,其渊源和传承关系如何呢?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据王伦起义中被俘者王朴供称:"王伦之师张既成,系阳谷县黄姑冢人,已死二年。张既成妻弟张克印现在行医,张既成之师袁公溥系东阿县马山头人。王伦于乾隆十六年从张既成学道,三十六年始收徒弟十八人。"⑤可是,王伦从张既成所学之"道",究竟属于哪个教派,从这段史料中尚无法找到答案。而《清高宗实录》中一段记载却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本日福长安奏,有直隶南宫县人魏玉凯喊禀,讯据供称,在本县魏家庄居住。该庄有乡约李存仁及魏学宗、简七、王三、严龄等,与山东王伦都是高口地方李姓徒弟,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演习拳脚。"⑥这里所说的高口李姓即普宁县高口村李成章,系收元教徒,简七是直隶南宫县简家庄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随其姐夫邓耀羽学习拳棒,旋因李成章的地亩被水淹浸,无法耕种,即迁至南宫县卫村暂住。简七闻知李成章的拳脚功夫很好,便准备了贽礼大钱800文,拜李成章为师,学习拳

① [日]铃木中正等:《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七节。

② [日]佐滕公彦:《乾隆三十九年王伦清水教叛乱》,载《一桥论丛》,第八十一卷第三号。

③ 韩书瑞(Susan Naguin):《一七七四年王伦起义的教派》,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四)。

④ 俞海兰:《王伦起义及其史料》,载《文史哲》,1963年第4期。

⑤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

⑥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二,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壬寅。

脚功夫。在李成章返回普宁高口以后,简七每年仍然前去拜年。李成章不仅教授拳棒,同时传习收元教(即八卦教),而且是八卦教内掌兑卦教的卦长。[①] 可见,王伦早在乾隆三十六年以前,已经拜李成章为师入收元教,即八卦教中兑卦教为徒了。潘相对收元教与八卦教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国初乃有单县人刘佐臣者,倡立五荤道、收元教,妄造《五女传道》逆书,分八卦收徒党,传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四语,日供清水。以消灾获福诱民诓民钱。""乾隆三十七年濮州人李孟炳得其书于菏泽人王忠,携之赴河南临颍被获"。"又于王忠家获黄巾牌位二尺许,上书先天、中天、后天等字,供清水三杯,名清水教。"[②]这段史料表明,山东菏泽人王忠(中)所传清水教,实际上传自刘佐臣创立的五荤道、收元教,也就是后来的八卦教。所以,王忠在菏泽所传清水教与王伦在寿张、堂邑一带所传清水教,都来源于刘佐臣创立的五荤道、收元教即八卦教。大概王伦因为乾隆三十七年王中在山东菏泽破案,尤其是该教的李孟炳在河南临颍县传教时,所传"邪书"曾被乾隆皇帝定为"大逆"之罪,所以王伦在传徒时,便竭力回避与王中清水教之间的关系,以避免遭到官府的查禁和使一般群众望而却步,不敢加入。

当然,王伦传习的清水教与刘姓所传八卦教也有不同之处,王伦平日敬奉真武神,这是华北一带民间供奉的神灵之一,俗称真武大帝,荡魔天尊,原系道教之神,民间信仰甚笃。王伦的清水教也信奉"无生老母"。不过,王伦把天也称为"无生父母",他每天在院子里或空屋内对天顶礼膜拜,叩头九次。王伦把传教同练拳棒、运气结合起来。他曾向李成章学习拳棒,有人认为王伦精于梅花拳,是梅花拳第三代传人。[③] 王伦还会练气功,其练功方法是:"第一口气咽了,第二口气往上顶,第三口气自咽喉下运至大腹小腹及命门,环绕到背脊骨内,直至天顶。复自上而下,贯入口中。如是者三次。"[④]王伦的弟子张百禄也提到清水教练气的方法:"每日午时向南方,并着脚,闭住气,作一个揖,向南出口气。"并说:"会了这法,可以数日不吃饭。"[⑤]清水教内的徒弟分为"文弟子"与

---

① 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收元教及其支派》,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三卷,第4期。

② 潘相:《邪教戒》。

③ 李世瑜:《义和团源流试探》,《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第162页。

④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穆建甫供词。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许遂供词,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供。

“武弟子”。练气者称文弟子，练拳者曰武弟子。声称练成运气之法，“饮清水一瓯，可四十九日不食。”[①]“以十日不食为小功，八十一日不食为大功。”[②]王伦又把传教同治疗疾病结合起来。他借助于为人医治疾病，收了许多徒弟。他的众多弟子当中，有许多便是因为被他治好了疾病而拜他为师的。他的义女乌三娘，便是因为被他治好疮毒而拜他为师和认作义父的。“乌三娘，兖州人，年二十许，娟媚多姿，而有臂力，工技击。其夫某，为角牴戏，俗所称走马卖械者也。尝与三娘挟技走楚、豫间以糊口，而三娘技实过其夫。尝患疡，遇王伦治之而愈，不受值，且助以资。三娘感其惠，愿为义女。”[③]王伦在众多的弟子之中，选出18名得意者认作义子，他们是：王经隆（王圣如）、闫吉祥、李桐、李玉珍、艾得见、邵然、赵大坊、赵焕、杨佩、赵玉佩、景淑、李得深（申）、丁若锦（金）、李质一、李士杰、张百禄、温炳、赵传。这些义子中，许多在起义过程中成了骨干。王伦经过短短三年的努力，在教内培养出一批骨干，除上述王伦义子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首领：梵伟亦作范伟，俗姓郭，寿张县人，自幼在南台显庆寺出家，会“过阴”、“灵魂出窍”及“与鬼神相通”等巫术。起义爆发后，充任王伦的军师。史料中称他“无赖好博，负多不能偿，为徒窘辱，匿王伦家，久之，髡顶，名为僧而无师传，所为多不法。逞其称智，妄谈天文谶纬以惑众。”[④]孟灿，兖州人，平时“勇鸷凶悍，尝因争博，以一掌毙其徒，亡命至楚。素与范伟善，闻谋逆，潜返。”[⑤]王经隆即王圣如，堂邑张四孤庄人，系王伦义子，起义时被王伦封为元帅。张百禄，河南太康县人，是孟灿的外甥。曾在河南遂平一带传徒。在遂平一带与人比武时，被他打败的人，都拜他为师入了教。乌三娘，王伦的女弟子，是杂技出身的江湖艺人，有较高的武艺。丈夫死后，她同王伦住在一起，名义上是王伦的义女，实际上是王伦的情妇。以上这些清水教骨干，在传徒和武装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①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08页。
② 潘相：《邪教戒》。
③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26页。
④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22—223页。
⑤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22—223页。

二、起义的背景和原因

进入乾隆中叶以后，清帝国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所谓"康乾盛世"已经辉煌不再。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尤其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更加剧了矛盾的激化，使清帝国开始由鼎盛转向衰落，这是清代乾隆中叶以后各族人民反抗斗争接连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然，任何一次农民起义的爆发，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王伦所领导的清水教起义自然也不例外。王伦起义的具体原因，可以从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客观条件来看，乾隆中叶以后，封建制度已进一步走向衰落。可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依然巩固，它严重地阻碍着封建社会母体内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清帝国的庞大躯体内新的因素得不到发展，使得封建体制已难以保持昔日繁荣昌盛，统治机器逐渐腐朽。军队缺乏战斗力，官吏贪污腐败，地主阶级为了满足其贪婪欲望，加紧对农民剥削，造成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广大人民群众中潜藏着极大的不满情绪。当时的工科给事中李漱芳在一件奏折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查山东省寿张县奸民聚众滋扰一案，臣于三、四月间即闻进京人传说，各路上因雨泽稀少，麦收歉薄，行旅车马，动辄十数人围绕，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迩，可资接济。迨五六月后，虽节次得雨，总未透足。岁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复粉饰相沿，收成分数，捏报七分、八分不等。抚字无闻，催科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机起衅。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又说："夫无食流民所在多有，饥寒之念迫，则盗贼之心生。臣闻目下近京西南一带，扶老携幼，迁徙逃亡。地方官着人于卢沟拦住，不令过桥北上。道途传言，因未足据，岂尽无因？……且直隶、河南毗连东省。万一奸民辗转胁诱饥民，伺机窃发，文武员弁，狃于以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之习，视同泛常，共同容隐，道路村庄，骚然不靖，密迩畿辅腹心重地，诚宜早图！"[①]这段话痛切地道出了在当时"盛世"掩盖下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和严峻形势。可是，仍然陶醉于"盛世"表面太平景象的乾隆皇帝，却对李漱芳所奏内容大为恼火，武断地说李漱芳的话"殊不足信"，而将该折加以"封存"。并且以李漱芳在奏折中把"奸

①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四。

民"说成"饥民"为理由，给他加上"置顺逆大义于不问"，"代奸民饰词诿罪"等政治罪名，把李漱芳调离原任。① 其实，李漱芳所奏情况，并非虚妄，我们从史料里也可找到不少旁证。起义军首领之一孟灿在受审时说道："因年岁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以致激变。"②对此供词，乾隆皇帝也以"贼供本不足凭"加以否定。为了寻找当年山东一带并未歉收的证据，乾隆皇帝还命令军机大臣去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结果找到一个从起义军占领地区逃出来的寿张县捐纳吏目杜安邦，向他询问是年寿张县收成情况。杜安邦对军机大臣询问他的用意，自然心领神会，回答说寿张一带"收成实有对半，各处俱有盖藏，并非荒歉！"杜安邦的回答虽然是投其所好，不过还是露出了马脚。因为仅有五成收成，称之为荒歉并不为过。李漱芳也只说地方官捏称有七八分收成，并未说是颗粒未收。可见李漱芳所奏，尚属可信。也就是说王伦起义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反映。但是仅仅看到客观原因还是不够的，还应考察起义爆发的主观原因。王伦所传习的清水教的发展，乃是造成王伦起义的重要原因。王伦从乾隆三十六年起招收弟子，经过师徒们辗转相传，已经传有五代弟子。到乾隆三十九年夏间，清水教已有徒众二三百人，加上他们的亲友和同情者，已达500至1000余人。③ 王伦的弟子大多来自山东的寿张、阳谷、堂邑、馆陶、恩县、汶上、临清及河南的遂平、太康，直隶的威县等县。徒众中大多为男子，亦有少数妇女。从职业分布来看，大多为一般穷苦农民，也有少数兵丁、差役、和尚、江湖卖艺者、小商贩等。随着清水教组织的发展和势力日益膨胀，王伦作为清水教的首领，也萌发了夺取政权，登极做皇帝的思想。他向徒众们声言自己"梦见是龙，将来大贵"。④他还"称孤道寡"，以皇帝自居，⑤许多人为了将来事成得到荣华富贵而纷纷加入清水教。王伦还利用教内宣扬的劫变思想，鼓动人们参加起义。他宣称："将有四十五天劫数，即使神仙也逃不过，唯有入道运气、不吃饭的人才能避过劫数。天下开黄道者有七十二家，将来由一家来收元。他本人为真紫微星，就是收元之主。"⑥王伦利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迷信鬼神、惧怕灾劫的心态，以达到其

①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四。
②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六十八，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巳。
③ 韩书瑞(Susan Naguin)：《王伦起义的教派》，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四)。
④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六。
⑤ 《张百禄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⑥ 《东案口供档》，转自庄吉发：《故宫档案述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第251页。

反抗官府和进一步夺取政权，登极做皇帝的政治目的，这是他利用清水教举行起义的主观原因。

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王伦便开始同弟子们酝酿起义之事。据王维全供："七月间我到了王伦家，还有李士杰、闫吉祥、闫吉瑞等数人在彼，商同要到寿张杀官劫库。"①八月十五日，王伦派归太（归太原名国泰，因与清总兵国泰同名，山东口语国与归读音相同，故清官方文献中便将国泰改为"归太"）②进京探听动静。不久，寿张县知县沈齐义风闻清水教准备造反之讯，即密令差役对清水教徒进行搜捕，并声言："俟阳谷县张令乡试出闱之日，会同查办，一个不饶。"③县役王士爵、刘焕等人均已入教，闻讯后即报告给王伦，从而加速了王伦举行起义的进程。他向弟子们宣称："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从我者可免。"④清水教起义就此酝酿成熟。

三、起义的经过

为了抢在官府大搜捕之前动手，王伦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派遣孟灿到堂邑县张四孤庄，通知首领王经隆"传人起事"。并告诉当地教徒："二十八日有风雨，是时正好动手。"⑤据王经隆供："（王伦）叫我传纠众人齐集张四孤庄，同到寿张会合。我就借称劫数已近，遍传有道之人，令其各自带刀一把，于二十八日齐集我的庄上，吃肉过劫。"⑥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时（约晚六时），王经隆在堂邑张四孤庄聚集了四百多人"先将刘四全家杀了，起手迎会王伦。"⑦次日凌晨，王伦在寿张县党家庄亦率众起义。由梵伟、闫吉仁、李旺等率领六七十人，头缠白布，各带器械来至县城南面之南台寺。县役刘焕率领教徒二十余人爬墙进入城内，与在城内接应的王维全等，打开县城南门，引导众人进城。⑧ 起

---

①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五。
②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 212 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道总督姚立德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④ 潘相：《邪教戒》。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⑥ 《东案口供档》，转自庄吉发：《故宫档案述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 年，第 252 页。
⑦ 《东案口供档》，转自庄吉发：《故宫档案述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 年。
⑧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五。

义队伍首先来到游击衙署，焚烧西库军械房。署游击赶福急忙呼人，衙署中人俱已逃散，“无一人应者”。赶福只得从衙署后院院墙缺口处狼狈出逃，前往兖州求救。[①] 起义队伍随后来至知县衙门，见到知县沈齐义，劝令投降。沈齐义拒降，并“喊骂”不绝，遂被杀死。[②] 王伦随后进入寿张县城，堂邑的王经隆亦率众来此会合。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寿张一带恰好遇有风雨，与王伦所预言的相符合，因而“人益信服，所过之处，胁附日多”。[③] 王伦在占据寿张县城后，以梵伟为军师，孟灿、王经隆为正、副元帅，李国贞为参谋，归太、闫吉仁、吴清林、李忠等为将军，赵付、杨墨、林哲、张百禄等分别为四路总兵，李旺为宣行。并于城内置办旗帜、盔甲、弓箭、枪炮等，把起义队伍武装起来。清地方官员闻知王伦、王经隆等率众在寿张、堂邑“杀官劫库”，即调兵前去镇压。九月初三日，王伦探知临清副将叶信率领清军来攻，即率众放弃寿张北上，攻打阳谷县城。阳谷县清水教徒甚众，“胥役皆党羽，故陷之倍易”[④]起义军在城内教徒接应下，顺利夺取县城，杀典史方光祀、县丞刘焘希等。署寿张营游击赶福逃至兖州后，率领清军前来援救。东昌府总兵唯一，会同游击赶福同来阳谷。起义军见清军来攻，即于城南迎战。接战后起义军佯退，赶福纵马往追，结果被起义军击毙，唯一只得率兵退往张秋。当时有一首民歌，描绘了这次战役：“黑乌如云覆墙屋，纷纷豚犬聚山谷。振臂一呼寿张破，横刀跃马进阳谷。游击死，总兵生，两人同阵不同心，惜哉谁救赶将军！”[⑤]起义军占据阳谷县城后，继续北上，欲攻打东昌府城（今山东聊城）。河道总督姚立德下令引运河之水灌东昌府城之护城河，以阻起义军。[⑥] 起义军遂绕过东昌府城，于九月初四日夜去攻打堂邑县城。堂邑城内仅有汛兵 18 人，而城内清水教教徒却很多，甚至县衙的书役皆已入教。教内之人闻知起义军攻至，守城兵丁皆已逃散，便焚香燃烛，出城迎接。[⑦] 起义军

---

①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五。

② 俞蛟在《临清寇略》中称沈齐义系被曾任县役的李旺所杀。《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六十八。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④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⑤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⑥ 《山东通志》卷七十四，职官第四。

⑦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三。

进入县城后，将知县陈枚处死，[①]并在城内"劫库放囚，焚烧军器，未动仓廒"，声言"攻城只杀官劫库，不杀百姓"，[②]被监禁的教徒都获得释放，并加入了起义队伍。使起义军的人数已达三四千之多。[③] 王伦等人见堂邑县城地方窄小，且城墙低矮，难以防守，又继续向北进军，九月初五日到达临清南面的柳林地方。署知州秦震钧与副将叶信、参将乌大经在此防守，山东巡抚徐绩与河道总督姚立德闻讯急忙前来救援。初六日，起义军兵临城下。秦震钧、叶信二人见临清土城城垣颓坏，难以守御。砖城不但城墙坚固，易于防守，而且衙署、仓库、监狱等皆在其内，"转而疏虞，获罪更大"。于是将土城放弃，率军进入砖城。起义军兵不血刃便将临清土城占据。初七日清晨，徐绩与兖州镇总兵唯一率兵在柳林附近的小邓家庄，与起义军相遇。接战后起义军诈败，把徐绩诱至树林茂密之处，以两千人之兵力将其团团包围，然后纵火猛攻。唯一前来救援，亦被包围。徐绩以为自己"必无生理"，[④]最后在唯一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起义军乘胜进占运河闸口，切断了清方的漕运通道，许多回空粮船在此受阻，不少船上水手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并"附从攻城"。初七日晚间，起义军开始攻打临清砖城。"其领众之人，两手持刀，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亦俱憨不畏死，不避枪炮"。[⑤] 起义军作战勇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教门迷信的煽动。王伦告诉徒众们，他施以法术即可躲避枪弹。打仗时教徒们念咒："真空家乡，儒门弟子"及"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咱"，"你看是隔的近，我看比千里还远"。[⑥] 或曰："千手挡，万手遮，盖世英雄就是咱。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神齐招在我身。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灵。"[⑦]有的咒语为："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着。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当！"[⑧]在队伍行进时，往往有数十名妇女在前面，手摇素扇，口中喃喃有声。又有和尚数十，执幡指挥。[⑨] 王伦起义爆发以来，数

---

①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十六辑，山东巡抚徐绩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③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一。
④ 王元启：《敕封忠义神武大帝灵应记》，载《瘫平居士集》卷二十三。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⑥ 戚学标：《纪妖寇王伦始末》。
⑦ 《穆建甫供词》，见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⑧ 《王经隆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⑨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日之内连破数城，并顺利占据了临清土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水教在数年之内在寿张、堂邑、阳谷等县有较为雄厚的群众基础，起义军在攻城时，往往内应外合。其次是起义军有着较好的纪律，受到一般群众之欢迎。起义军进入临清土城时，"听国师樊（梵）伟之谋，伪收人心，不杀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价"。[①]所以起义军每至一处，皆有许多教内之人和一般群众加入。参加起义者，不仅有汉民，而且有回民。据周元理奏："正定县解到盘获匪郑克忠、杨魁之、马有状、任三四犯，臣逐一严讯，审得郑克忠等俱系临清回民。"[②]九月初八、九两日，起义军继续攻打临清砖城。起义队伍皆"黑布缠头，衣履黑色"，"亦间有服优伶彩服者"。使用的武器大多得自清军营汛，有的仅将厨刀、樵斧缚于杆上，作为武器。清军则掌握着当时比较先进的劈山炮、佛郎机（指葡萄牙人所铸之大炮）、过山鸟（一种山炮）。清军武器虽然先进，但战斗力并不强。清军往往在目标尚未进入枪炮有效射程时，便匆忙施放枪炮，以致"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坠落地"，而起义军则"无一中伤"，而且见状"益跳跃欢呼"，声称这是由于施行了法术而使清军"炮不过火"，清军遂声言起义军有"邪术"，可以避枪炮，借以掩饰其怯懦。甚至也用"邪术"来对付起义军的"邪术"。当起义军攻城时，"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而令燃炮。群见铅丸已坠地，忽跃起，中其腹，时兵民欢声雷动，贼为之夺气，知其术可破，益令老弱妓女裸而凭城，兼以鸡犬血、粪汁，缚帚洒之。由是炮无不发，发无不中。"[③]身为清军统帅的大学士舒赫德也对此信以为真，上奏称："临清西南二门俱有关圣帝君神像，纵有邪术不能胜正。然起初施放枪炮，贼竟敢向前，叶信因想起俗言黑狗血可以破邪。又闻女人是阴人，亦可以破邪，是以用女人的垛口向他，复将黑狗血洒在城上，那日放枪即打着手执红旗贼目。各兵踊跃放枪炮，打死贼甚多。"[④]潘相的一段话便是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清军"每战，距贼半里许即放枪，不中，再入药。贼故习俯趋，争死斗哄而前。再次，再从贼背上过，又不中。马步兵皆惊曰，贼果有神术，不畏枪。则相率溃走，走且数十里不止，贼以益无忌。"[⑤]可见并非起

①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 214 页。
②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六。
③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 215—216 页。
④ 《朱批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⑤ 潘相：《邪教戒》。

义军有"邪术",而是清军在枪弹射程以外进行射击的结果。起义军对临清砖城之围虽然只有17天,而城内守军处境却已十分狼狈困窘。"临清以孤城当贼锋,南北隔绝,城中守御需用之物俱尽,裂旧布衣为火绳,收民间锡器为铅弹,以油灯代蜡烛,势甚窘迫。盖缘城内居民寥寥,铺户亦少,城外尽为贼所踞。故守城数日,便有罗雀掘鼠景象。"[①]清廷担心绿营兵"不能得力",又派遣精锐的健锐、火器二营兵丁1000名,由额驸拉旺多尔济与左都御史阿思哈带领,前往山东助战,并令正在河南勘察河工之大学士舒赫德前往主持军务。因虑及健锐、火器二营精兵难于短期之内到达,遂令舒赫德先将沧州、德州之兵调往使用。河道总督姚立德、山东巡抚徐绩见事态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也急忙调兵遣将,准备待舒赫德将所率援军抵达之后,包围临清土城,以解临清砖城之围。他们派遣总兵唯一率满汉官兵2000余人,由临清以南的梁家浅从西南进攻;令参将尚维宝、都司洪哲燕等率官兵800名,在孔家集、柳林等处进行拦截,以防备起义军从运河西岸向南逃走。[②] 九月初十日,起义军炮击临清砖城南门,"飞弹入城,声如饿鸮,人人惴恐"。双方都受到不少伤亡,起义军统帅王经隆在战斗中受伤,由吴清林、李忠为统帅。九月十二日,兖州镇总兵唯一、德州府城守尉格图肯率清军与起义军战于临清砖城之北门外。清军被截为两断,首尾无法相顾。"贼呼声动天,官兵无一人迎敌者。"总兵唯一见状,转旗回马,败走东昌,格图肯逃往夏津。入夜,起义军又以大炮轰击南门,"火药轰起,声震山谷,炮子飞入衙署,击断碑石",以致"城几陷"。[③] 九月十四日,起义军又在南城外观音咀地方抢夺当铺,并于城西将夺得的漕运粮船横排河上,拦截往来船只,以切断清军文报。[④] 九月十五日,清总兵唯一由东昌领兵一千余人进抵临清城下,欲解砖城之围。双方接战后,"兖镇力不能支,率数十骑策马驰去,计败阵三次"。[⑤] 乾隆皇帝闻知唯一接连战败,甚为震怒,下令将唯一与格图肯于军前正法。逃回之满兵,为首者亦被处决,其余则被削除旗籍,发往乌鲁木齐为奴。九月十五至十八日,起义军未曾攻城,但"每日仍有数十人及百余人在近城地方呐喊骚扰"。[⑥]

---

①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②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五。

③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④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十六辑,第556页,作者不详。

⑤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18页。

⑥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四。

九月十九日夜，有武生吴召伦为起义军出谋划策，帮助起义军攻城，“以牛马驾车不能避矢炮，因去轮，两旁设木板，约定三四尺，名曰‘大鹏双展翅’。令有臂力者七八人，伏其下，背负而行。冀至城下，发火焚敌楼。”[①]起义军在吴召伦帮助下，建造了三辆这种大车，车上装满火药，上面再覆以秫秸等易燃物，向临清砖城推进。清军情急，遂向大车投掷砖石，以阻其前进。又用棉花裹以火药，束之箭头，射向大车。有两辆大车中箭后车内火药起火爆炸，另外一辆则顺利抵达城下，清军遂派令兵丁縋城而下，以水泼灌车上之火药，并将车下隐蔽的六人击杀。[②] 九月二十三日，清军把队伍汇集于临清东、南、北三面，对起义军进行围剿，王伦等人率领五六百人“排列作迎拒之势”，与清军三次交锋。在清军强大炮火攻击下，有数百名起义者牺牲，主力被迫撤入土城之内。舒赫德、徐绩两路清军会合后，从东南面攻入土城。当晚，清军因对城内路径不熟，又撤出城外，仅在城墙上“彻夜把守”。九月二十四日，两军激战了一整天，王伦欲设法突围而出，但未成功，从而被包围在临清土城之内。二十五日清军进入城内，双方在城内展开巷战。舒赫德、徐绩二人亲自在城内督战。临清土城系商业与居民区，人口稠密，民房“皆坚壁峭墙”，街道逼窄，小巷纵横交错，多达百余条，且处处可通。这一复杂的地理环境对起义军在城内进行巷战十分有利。清军进城后即对起义军占据的庭院房屋纵火焚烧。起义军则“到处直接迎扑”，并上房向清军抛掷砖瓦，由首领们手执红旗，进行指挥。九月二十七日，侍卫音济图探知王伦住在前河南巡抚汪浩的院内，当地人称为“汪姓大院”。遂带领前锋绷阿尔图等数人前往搜寻，找到了王伦并将他擒住。正在捆缚间，孟灿等十余人突然冲出，将音济图用矛刺伤，使王伦得以脱险。[③] 此后，清军加紧了对王伦的搜捕。“每日督率官兵，自朝至暮，分头搜捕，挨屋逐户严查，下及地窖水沟，无不遍加寻觅”，仍未找到王伦踪迹。其实，王伦仍在汪姓大院内，不过转移到院内一座二层小楼内罢了。九月二十九日，清军终于发现王伦踪迹，遂将大院团团包围。守卫大院的起义军便登屋抛掷瓦石打击清军，并在大院附近的街上同清军继续巷战。战斗场面颇为激动人心。在一次激战中，“朴刀元帅”杨五从屋顶跳下，连杀清兵数人后牺牲。王伦之嫂王王氏，号称“五圣娘娘”（亦作无生圣母），当

①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 216 页。
②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③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 223—224 页。

时年已 60,她白发盈头,仍"跨马舞刀"与清军交战,后力竭被擒。[①] 王伦的义女乌三娘也表现得十分勇敢,她带领十余名女兵,与清兵短刀相接,进行拼搏,直到最后仅剩她一个人,仍坚持战斗。"三娘独舞两刀,能扫薮锋镝。忽于马上跃上屋,自屋而楼"。最后乌三娘在力战一天之后,中炮牺牲。"[②]王伦等人最后坚守在汪宅大院的小楼上,楼高清军难以攀登,便在楼下喊话,企图诱使王伦投降。王伦则置之不理,且以砖石作答。后来,清军欲借助于楼房四周烧毁的墙壁向上攀登。突然见楼上起火,有七八个人自楼上跳下,其中之一是王伦的义子和主要助手王经隆。关于王伦等在楼上的情况,王经隆在被捕之后说:"二十九日我同王伦及伊义子李上杰等数人,俱在楼上,见官兵跳在围墙上,欲入楼擒拿,我遂劝王伦投降,王伦说我宁可烧死楼上,断不肯降。遂将堆积乱纸坏木令人放火,众人不肯动手,王伦即自己放了火。"[③]与王经隆同时跳下被捕的还有王经隆的侄孙王峻等,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补充:"火热炎烈时,王伦须发已经焦灼,仍坐楼不动。"另一同时从楼上跳下的杨佩也说:"楼上火起时,我即乘空逃出。王伦及伊母、伊妻并两弟同梵和尚俱仍在一起。王伦说,就在这里烧死,我是不出去的。"[④]目睹当时现场的清军游击刚塔也说:"见汪宅被焚时,楼房之傍紧贴一楼,有数人在内。中间一人正坐,穿着紫袍,面有长髯,疑系王伦。"[⑤]王伦等死后,清军继续在临清土城内进行搜捕。首领梵伟、孟灿等皆被俘,解京审讯后被凌迟处死。王伦虽自焚而死,仍将其家属"不分男女大小,尽行处斩",并将王伦等人祖坟刨挖。一般起义参加者被杀者亦甚众,以致"所杀尸身,填塞街巷"。尸体皆按照乾隆皇帝的命令,埋于大坑之中。

乾隆三十九年爆发的清水教起义,是清代前期秘密教门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斗争,也是清水教首领们为了夺取政权,希望自己登极称帝,享受荣华富贵而进行的一次尝试。从这次反抗斗争的整个情况来看,清水教教徒在整个起义队伍中只占十分之一左右,在二三千名的起义者中,教徒只有二三百人。对于大量起义农民来说,他们加入起义队伍,主要是为了反抗

---

①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 228 页。
② 俞蛟:《临清寇略》,载《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 227 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④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八。
⑤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九。

官府的压迫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因此,可以认为清水教起义乃是贫苦农民利用清水教的人力和组织所举行的一次反对剥削与压迫的斗争。而这种自发的农民起义,是不可能通过秘密教门的组织与领导而获得成功的,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第十章 乾隆年间的福建老官斋教

一、福建老官斋教的造反活动

乾隆年间福建的老官斋教来源于清初的姚门教，又称龙华会或灵山正派。[①]因该教信徒茹素食斋而被称为“斋教”或“江南斋教”。乾隆年间姚门教在福建的一支称“老官斋教”。在江西的一支于吴子祥掌教期间，融入北方圆顿教与罗祖大乘教，改称“大乘教”。后来，吴子祥的弟子何弱（若）被发配到贵州龙里后，又辗转传给当地的袁志谦等，进一步发展为青莲教，该教在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及江西等省广泛流传，在晚清和民国年间，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福建建安、瓯宁的老官斋教，乃是姚门教在福建的分支，不过它不是清初姚文宇传人普步来建宁府所传龙华会的直接继承者，而是雍正末、乾隆初年，姚文宇后裔姚正益即普益所创立。姚正益传入的教门本来名为龙华会，因当地“入会吃斋之人，乡里皆称为老官”，[②]加上教徒皆茹素食斋教，故称为“老官斋教”。瓯宁的老官斋教主要在农村流传，教徒们于乡村中设立斋堂，作为聚会之处。清档记载称：“该教传自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姓，远祖普善遗有《三世因由》一书，托言初世姓罗，二世姓殷，三世姓姚，现为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无论男妇皆许入会吃斋。入其教者，概以普字为法派命名，其会众俱称为老官。闽省建、瓯二县男妇从教吃斋者甚多。”[③]该教“平素诱人吃斋从教，诡言可以成佛。其吃斋之时，每月一二次，或数十人，或近百人。至期聚集，率以为常。”[④]最早建立

① [日]武内房司：《台湾斋教龙华派的源流问题——清末浙江灵山正派与觉性正宗派》，载王见川等编《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〇九，乾隆十一年二月甲申。

③ 大学士讷亲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批，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七期。

④ 大学士讷亲另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批，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七期。

的斋堂是该县遗立(一作移立)村的"斋明堂",堂主是陈光耀,法名普照,自称能"坐功参道"。其后,各处亦纷纷建立斋堂,在后周地村有"千兴堂",堂主为江华章,法名普才。在芝田村有"得遇堂",堂主魏华胜,法名普腾。七道桥村建有"兴发堂",堂主黄朝尊即黄朝庄,法名普衡。在埂尾村有"纯仁堂",堂主王大伦,法名普法。老官斋教教徒平日俱在家吃斋诵经,每逢朔望及佛诞之日,由堂主召集徒众聚会一次,各持香烛到斋堂诵经礼佛,吃饭而散。聚会时人数多寡不一,或数十八,或数百人不等。福建建安、瓯宁二县的老官斋教,皆受浙江庆元县姚文宇后裔控制。乾隆初年,姚普益、姚正益每年皆来福建一次,为建安、瓯宁二县的徒众代取法名。取名时"总以普字为行,每一名送香资三钱三分,愚民奉若神佛,姚氏视若世业。当地地方官员因该教教徒仅吃素食斋,劝人行善,未有不轨行为,亦未加取缔。①

乾隆十三年(1748)十二月,建、瓯二县老官斋教举行了一次造反活动。起因是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十五日,遗立村斋明堂堂主陈光耀在村内街上搭盖篷厂,聚众多人念经点烛。乡长陈瑞章等即将此事禀报县署,该县知县即委派县丞程述祖率领兵役前去查拿,将为首的陈光耀、李天章、刊永发、李顺郎、黄成意等5人捕获监禁。当时已届年终,官府循例"封印",不再审理案件。老官斋教的教首、堂主们担心次年"开印"审讯时,陈光耀等若供出教内情况,将牵涉各堂堂主及会众。同年十二月,各堂堂主"日夜聚会",以商讨对策。适有教内骨干魏现的妹夫葛竟仔,因犯案受到追捕,逃来瓯宁,在魏现家中藏匿。闻知此情后,即建议劫狱救人,各堂堂主皆表示赞成。于是由七道桥堂主黄朝尊、埂尾村堂主王大伦及七道桥教首朱锦标之妻、女巫严氏商定,于来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行斋之日,动手劫狱。届时由住在城内的教徒、画匠丘士觉(法名普觉)为内应,于县城对河大洲地方纵火,焚烧民房。俟官兵出城救火时,乘势入城劫狱,以营救陈光耀等人,并顺便抢劫富户。议定之后,便着手制造札付、兵簿、旗帜等,令教内李潘书写元帅、总兵、副将、游击、守备、千总等名目。又令人搜寻旧存之鸟枪、腰刀、钢叉、火药等物品,并制造绸布包头,上面盖有"无极圣祖"图记,发给每人一块,作为标记,以便届时互相识别。规定以包头颜色之不同,列分等级。以青缎包头者为首,绫绸包头者次之,青蓝布包头者为一般参加者,以

① 福州将军新柱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批,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七期。

绿布包头者为跟随同行之人。在事件的整个筹划与组织过程中，皆以教内朱锦标之妻严氏为首。严氏法名普少，原系女巫，人称“老官娘”或“朱小娘”，平口素能“降神”及舞剑“召魔”，施行巫术。乾隆十三年正月十二日，严氏聚众降神，捏称“坐功上天，师父嘱咐下降治世”，并得到“神言”，称“弥勒佛要进府城”。并由葛竟仔等人利用“神言”，分头纠集徒众，命令教徒们于十四日齐集各堂，定于十五日托名“抬迎菩萨”，进城劫狱。瓯宁的老官斋教的斋堂，皆分散于各处村庄，主要位于建安、瓯宁二县西北一带。这里群山环绕，仅有一二处可与外面相通。正月十三四两日，教首命令教徒把守要口，只许进山，不许出山，以免泄露风声。十五日清晨，各斋堂队伍齐集芝田村，祭旗起兵，竖立大小白旗，上书“无为大道”，“代天行道”，“无极圣祖”及“劫富济贫”等口号。称朱锦标为“弥勒佛”，以魏现为总领，普照、普才、普衡、普觉、普洁、普泽、普法等人为帅。共聚有千余人，各执鸟枪、短枪、腰刀、叉械等物，分为三队，向建宁县城进军。[①]第一队由严氏(普少)率领先行。普少坐轿张盖，鸣锣掌号，由徒众扛抬神像，口称“抬迎菩萨”，一路跳跃而行。第二队、三队分别由魏现、黄朝尊、李潘、官月照、王大伦、葛竟仔等人率领，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到行进队伍中来。老官斋教徒平日与附近村民原有矛盾，村民闻知老官斋教徒将起兵造反，便纷纷逃离。老官斋教的队伍，即趁便于沿途抢掠焚烧，在经过高掘等九村时，共焚毁村民房屋514 间，殃及村民 193 户。[②] 清护理建宁镇总兵、游击刘启宗，建宁府知府徐士俊等地方文武官员闻讯后，即派遣把总吴雄、卓士起等，各带兵丁四十余人，与瓯宁县县丞朱国相一同前去镇压。在离府城 15 里之单岭头地方，与普少一队相遇，互相厮杀。单岭头地处要冲，官兵在此用连环枪及小炮进行堵截，故以少数人即将老官斋教徒杀伤多人。该处路径狭窄，易守难攻，加之清军有比较先进的火器，而老官斋教徒乃临时凑集起来的乌合之众，仅有刀枪棍棒等简陋武器。接仗后，老官斋教的队伍纷纷溃散，死伤亦多。后面二三两队教徒，闻知前队受到攻击，虽欲前往接应，但为村民所阻拦，只得四散奔逃。溃逃的队伍，又受到官兵及附近村民的捕杀，首领普少、葛竟仔、王大伦等当场被打死，余众分散逃入深山。在清朝当局方面，护理总兵刘启宗派遣守备任琦等带兵 100 名在七道桥一带驻扎，并于十六日入山搜捕，陆续将首领魏现、黄朝尊、官月照、李潘、朱

---

① 大学士讷亲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七期。

② 福州将军新柱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四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七期。

锦标等及徒众三百余人捕获。经审讯,将被捕者分六等定罪惩处,其中凌迟处死者2人,斩立决者49人,"现正法者"37名,被乡民打死及自缢、饿死、监毙者12名,立绞者6名,绞候者1名,发遣乌刺者88名,枷责者95名,缘坐家属19名。①

二、老官斋教造反失败后清朝当局的查禁

乾隆十三年福建建安、瓯宁老官斋教徒聚众反抗清朝当局的事件平息以后,地方官员根据教徒的供词,继续追查老官斋教之根源。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根据老官斋教经卷《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中提到该教初祖罗因即罗清,二祖殷(应)继南,三祖姚文宇等内容,认为老官斋教"起自罗祖,乃罗教之别名"。②因此,乾隆皇帝在老官斋教事件之后,使命令各地督抚严查罗教。清朝当局从老官斋教被捕者供词中得知,该教"传自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普益之祖姚文宇,法名普善"。该教"自明代以来流传已久,曾经雍正年间查禁而迄今不改。其姚氏子孙仍往各处代取法名,总以普字为行。每一名送香资三钱三分,愚民奉若神明,姚氏视若世业"。因此,乾隆皇帝在老官斋教事件平定之后,便下令各地对姚姓子孙及其传教活动严加追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在办理瓯宁老官斋教事件中,因发现该教"传自浙江庆元县姚姓",即将姚姓后裔姚必起、姚家震等捕获,"提解来闽,归案究办"。在老官斋教事件平息后,喀尔吉善又于同年六月,再次向姚姓后裔追究老官斋教流传情况。经审讯,姚家震供出"江西抚州府临川县有已故陈万善,立有斋堂,后伊族姚焕一即往江西相依居住传教。焕一已故,生子细妹现存"。③ 喀尔吉善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移谘江西。江西巡抚开泰立即命令赣州府石城县将姚文谟捕获,并在其家搜获印绫一幅,石图章一方,道帽一顶,法衣一件,抄写道家保安等项文偈及祝圣颂神等文词小簿二本。姚文谟供称:"小的祖居浙江处州府庆元县,父亲姚焕一,乳名细妹,④移住抚州府

---

① 福州将军新柱等折,乾隆十三年六月初九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九期。

② 大学士讷亲折,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八册。

③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折,乾隆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④ 姚家震在供词中说姚焕一"生子细妹",与姚文谟所供姚焕一乳名细妹不相符合。看来,姚文谟的说法较为可信,因为他是姚焕一之子,姚焕一不可能"生子细妹",不然,姚文谟就成姚细妹了。

临川县。小的祖上原奉罗教,雍正七年奉文查拿,就改为一字教,又名老官斋。小的法名姚世(普)英,父亲法名普振,父亲的师父叫陈万善,法名普万。雍正七年查拿罗教,有同教的黄子敬在石城高田住,小的携妻蔡氏逃奔他家,就租了黄子敬房子居住。"又供:"小的兄弟原有四人,大哥子姚千祐死了,二哥子姚成武,弟郎姚际媚现住临川地方。"官府根据姚文谟所供线索,又将姚成武逮捕,并于其家搜获乾隆二年所立《记名簿》二本,康熙年间抄存破碎《科教心经》一本,刊印残破《无量佛经》一本等物。姚成武供称:"小的祖上都是入罗教的,这画像是小的高祖姚华卿,法名普绪;曾伯祖姚安福,法名普掌;曾祖姚安庆,法名普器。"姚焕一之四子姚际媚也同时被捕,供称:"小的名四妹,父亲乳名叫细妹,土音相同,小的实不是细妹。"[①]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姚文宇的子孙曾传江西临川人陈万善为徒。陈万善回到江西后,在抚州府临川县设立斋堂,自任斋头,进行传教活动。所传之教实为黄天教的支派,仅融入某些罗教内容而已。但因应继南从前假冒罗教或皈依罗教,姚文宇沿袭其说,故后来姚姓子孙及徒众皆自认为是罗教。陈万善为了加强自己在教内的地位,于康熙年间把姚文宇的后裔姚焕一请来江西临川,收为徒弟,取法名普振。从此,姚姓子孙中便有一支便在江西定居并传教。姚焕一即姚细妹于康熙十九年(1680)身故,生前传有徒弟二人,一名严友辉,一名黄永乔。雍正七年(1729)清朝当局在浙江查禁罗教时,姚姓子孙为了免被查拿,而改为"一字教",当地人则称之为"老官斋教"。在这场查禁罗教的风波中,姚姓子孙中有的被迫开荤出教,有的外逃躲避。姚焕一之子姚文谟携带妻子蔡氏来到江西石城县,投奔同教的黄子敬,并租赁他家的房屋居住,继续传教。他时常到福建宁化县严友辉、长汀县黄永乔两个徒弟家中去念经。严友辉等于每次姚文谟离开时,皆送他几两银子,作为盘费。乾隆十三年九月,姚文谟供出其父姚焕一生前传徒严友辉、黄永乔后,江西巡抚开泰又将此事移咨福建。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知县周天福得知本县严友辉乃老官斋教教首,便率领兵役18人前往严友辉家查拿。严友辉家居住在宁化县陇上里,该处距县城一百多里,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是个仅有数十户人家的山僻小村,村民皆系与严友辉同教。[②] 九月十五日夜间,知县周天福带领兵役18人,"便服小轿,乘夜而往"。四更时到达陇上里,传同乡约刘瑞周,一同步行来到严友辉家

①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开泰折,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②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折,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门口。兵役们并未叫门，而是用“打肩椿”的办法，扒上楼屋，从院内打开大门。周天福即率众上楼，将严友辉锁住，进行搜查。搜获无极圣母像一幅，竹筒一个，内获老官天尊画像一幅及木符一块，木印一方，老官经六部，“邪书”四本、“邪经”二卷，绸法衣五件，布法衣四件，法冠十顶，印符二十余张。[1] 严友辉之妾见周天福等人皆系便服小帽，且系越墙而入，疑系盗贼，遂逃出大声呼救。村民于睡梦中闻声惊惶赴救。村民严松、严推仙、严显等率领一百余人，手持棍棒，将严友辉家楼房包围。周天福见状，在楼上声称系“官府拿人，不许打扰”。众人皆以黑夜扒楼，非官长行径，疑为盗贼假装。严松等与众人各将瓦片掷抛，并用火点燃楼前所堆树枝乱草，声言烧楼。周天福无奈，只得开门，令差役下楼喝止。严松等人上楼搭救严友辉，乡约刘瑞周对众人宣称：“县官在此！”众人见周天福头戴小帽，身穿马褂，不像县官。严显向周天福索要牌票，周等亦无，更加怀疑乃乡约与强盗串通，进行抢劫。遂称不许拿人，并勒令县役开锁释放严友辉，将差役们所搜获之经卷等物抢回。周天福等被迫步行出村，严松等人又赶上前称：“若是假官，定要送官究处。果是真官，请回吃饭。”周天福见对方人多势众，即狼狈返城。[2] 宁化县知县周天福微服捕人，且不走正门，于夜间翻墙入室，其行径实无异于强盗。村民闻讯前来救援，将周天福等人赶走，亦理所当然。但是，在封建社会，总是官官相护。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在处理此事时，虽然承认此事因“万山之中，又值黑夜，村民惊惶群起哄闹，放火围房”，实属“衅起一时，初无预谋纠约情事，且系本村亲属，亦无外来流匪勾结”。但仍断定此事乃“奸民目无法纪”，“拒捕抗官”，因而下令将“倡率附和各犯尽行捕获、不使一名漏网”，并要求地方官于审明之时，将被捕村民“从重定拟”。乾隆皇帝恐如此处理不利于“闾阎宁谧”，对于长治久安，实属无益。因而指出：“周天福既经查访明确，或密差捕役，或遴妥佐杂，俱可前往查拿。即必须亲行，亦不妨明目张胆，擒获究处。何至黉夜微服，率役扒墙，以致村众惊惶，放火夺犯”。认为周天福此举，实属“行径乖张”，故命令喀尔吉善对村民“不可论以拒捕抗官之罪”而“概予骈斩”。[3] 但当地村民仍遭到一场浩劫。严友辉在村民保护下逃跑后，福建汀州府知府曾日瑛便会同汀州镇左营游击顾亲往宁化县陇上里处理善后事

① 《朱批奏折》福建陆路提任武进升折，乾隆十三年十月初四。

②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折，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③ 《上谕档》乾隆十四年七月十八日“上谕”。

宜。当时严友辉已逃往邻近之江西省石城县。该村村民皆与严友辉同属姚门教，故在事件发生后，纷纷逃往各处躲藏，致使村内居民“无一存者”。官兵进村后，便将斋堂拆毁，并将率众包围周天福家，保护严友辉出逃之为首者严松、陈及臣、张榜等人逮捕，又派兵役前往江西石城县将严友辉捕获，押解回县。[①]

通过镇压福建瓯宁老官斋教起义及查拿姚文宇子孙等事件，清朝官员确信姚姓子孙所传之教乃“罗教余孽”，故于事定之后，便进一步在各地加紧查拿罗教。从清档有关内容可知，乾隆十三年(1748)清朝当局在福建各地均查获一批斋堂。对于这些斋堂，地方官员均以罗教、大乘教名目上报。其中兴化府属的莆田、仙游二县有金童教(金幢教)，供奉观音大士；邵武府邵武县查出有大乘教徒在家吃斋者，未建经堂；建宁县有罗教斋堂2处，汀州府长汀县有罗教、大乘门、一字门斋堂14处，宁化县有由罗教斋堂后改供观音之斋堂13处，清流县有各教斋堂13处，归化县有大乘门斋堂13处，连城县有观音教、大乘门斋堂2处，武平县有观音教堂6处，延平府南平县有罗教斋堂1处，福宁府霞浦县有罗教斋堂1处，建宁府建安县有罗教斋堂4处，松溪县有罗教斋堂1处，崇安县有观音斋堂1处，台湾府诸罗县(今嘉义县)有罗教斋堂2处。这些斋堂每处的在堂吃斋者，各有二三人至十人不等。平时仅诵经礼忏，并有废疾衰老无所依倚之借此存活者。[②] 乾隆十八年(1753)，清朝当局在浙江宁波府鄞县一带，也发现有姚文宇所创龙华会中左支流传的情况。当年姚文宇所创龙华会分中左右三支。本章前面所述均系姚文宇自己嫡传之中支。乾隆十八年宁波鄞县官府发现的，乃是其中以温州为老祖堂之左支。据鄞县知县禀称，该县有自称龙华会之曹进侯，“茹素纳钱，哄诱民人励明远及兵丁陈禄、柴斌、张永尧等入教”。[③] 该教教主曹进侯已88岁，随同习其教者还有其徒掌教周喜吉。周喜吉已年届72岁，系其岳父李必达所传，法名普栋，在家中设有经堂，劝人拜佛吃斋入教。家中藏有大、小乘法引及护道榜文板片、会簿、愿单及《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等书。自称祖师系浙江的姚文宇，法名普善，是罗祖转世，当年在处州庆元县松源东隅地方悟道。曹进侯、周喜吉所传一支，是由扬州人李建侯所传；李建侯法名普禄，传到周喜吉已有百年。普禄以后至周喜吉共传7代，即普瑞、普馨、普在、普

---

①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折，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②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折，乾隆十三年六月廿六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九期。

③ 《朱批奏折》提督浙江总兵史弘蕴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

奇、普盛、普爵、普栋。其中普爵便是曹进侯，普栋即周喜吉本人。① 曹进侯、周喜吉被捕后供出温州永嘉县有老祖堂及姚姓子孙姚必彪与徐宏文。浙江巡抚雅尔哈便令温处道朱椿、杭州府知府吴作哲等派人前去查拿。最后查明姚必彪等人俱已"去邪归正"，徐宏文已无其人。② 姚姓子孙中居住永嘉者，原止数家，皆系生监。家中只有寻常经书、佛像，并无罗教经卷。遂又派人前往庆元县搜查姚文宇祖居各家及姚文宇坟前庙宇，亦无罗教经卷及收取香租簿籍，才算结案。③ 后来，姚姓子孙继续在民间秘密传教。嘉庆年间浙江庆元县姚汉揖、姚汉查所传"罗教"，也就是姚门教。

姚汉揖即姚遂先，原籍浙江庆元县，后迁居温州府城居住，系乾隆己酉科拔贡生。其兄姚瀛松在日，便传习"罗教"，持斋念经，法名普盛，曾翻刻经卷，劝人祈福消灾。故后，其弟汉揖"听从沿习"，法名普慎，曾传姚振义、叶扒、包五等人为徒。④ 嘉庆十九年(1814)"犯案拟遣"。姚汉揖之弟姚海查系嘉庆辛酉科拔贡生，姚海揖犯案时尚未入教。道光七年(1827)，姚海查于旧货摊上见有《传灯蜡敕单》，即购回记熟，欲用来"兴复旧教"。他还自刻"太上正宗"、"太上心宗"两枚图章，凡有人拜师入教，便点灯一双，收受香钱千文。如有送给洋钱2元以上者，则给予"传灯蜡敕单"一纸，上盖图章，作为转传徒弟之凭据。姚海查传其侄姚秉信等人为徒，后来又到江西省玉山、临江、鄱阳等县传教。其徒拜师时，必须送他洋钱5元。而且"在家茹荤，外出茹素"，本地人知其诓骗钱财，多不相信。⑤ 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原籍江西抚州、寄居浙江衢州之张受幅即姜守富向江西玉山县人黄钧隆即黄志大告知，伊习浙江姚姓所传大乘教即罗教，可以祈福延年。黄钧隆即拜张受幅为师入教，取法名普好，吃斋念经，祈福求寿，供普贤菩萨，给张受幅香钱5000文。张受幅授给三皈五戒、十报八步名目。"所云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云五戒，一不许杀生害命，二不许偷窃财物，三不许邪淫外色，四不许搬弄是非，五不许饮酒茹荤。所云十报：一报天地，二报日月，三报君恩，四报父母，五报祖师，六报引进，七报护法，八报善友，九报

---

① 浙江巡抚雅尔哈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四期。
② 浙江巡抚雅尔哈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四期。
③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折，乾隆十八年八月初六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四期。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浙江巡抚奕畴折，嘉庆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⑤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程祖洛折，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九族，十报三教圣人。所云八步：一步是念小乘，二步是念大乘经，三步是念十报经，四步是小引，可以引人入教，五步是大引，可以传徒，六步名四句，其四句：一空身，二空心，三空性，四空法。七步名传灯，八步名蜡敕。”嘉庆十九年(1814)，黄钧隆闻知浙江传习该教的姚汉揖获罪，不敢继续传徒敛钱。道光九年，黄钧隆即黄志大得知姚汉揖之侄姚秉信继续在浙江传习大乘教，即托浙江人翁添受向姚秉信领得蜡敕一纸。道光十年(1830)十月，黄钧隆之子黄海鑫又亲自拜姚秉信为师，取法名普扬。因黄钧隆平素为人厚道，不爱讲话，绰号“石菩萨”，其子黄海鑫曾被人殴伤未死，人称“铜将军”。①

① 《朱批奏折》福建巡抚魏元折，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章　红阳教在清代的流传

早在清人关之初，弘阳教（红阳教、混元教）便继续在民间秘密流传，引起一些大臣的关注。顺治三年（1646）六月十一日，吏科给事中林起龙上奏："臣观明末教化不兴、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所谓白莲教者，有所谓大成教者，有所谓混元教者，有所谓无为教者，种种名色，不能枚举。"并说：混元教即弘阳教"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真奸民之尤者也。"[①]他从维护清王朝稳定的立场出发，要求对弘阳教等教门严加禁止。当时，清王朝刚刚建立，正忙于对全国的统一事业，故林起龙的奏折并未产生大的反响。所以，弘阳教流传的情况，在档案和官书中皆鲜有记载，我们只能从林起龙的奏折中了解到当时仍有弘阳教活动的情况。

一、康熙年间的弘阳教

康熙十一年（1672）冬，康熙帝玄烨前往南苑，途经海会寺时，派大学士傅达礼进入寺庙探访，傅达礼在寺内见到一名自称得道的"狂僧"。回来复命时奏请康熙将其驱逐。并称："黄天、弘阳等教，男女杂集，诵经说法，先经严禁，至今尚未革除。且思此等之人，自古以来，止足为害，实无裨益。若不预行禁止，恐愚民被其煽惑，深为不便。"奏请严禁黄天等"邪教"，以肃清京畿内地。[②] 康熙二十七年（1688），直隶人蔡万贤在奉天（今沈阳）下家河地方传习弘阳教，规定每年七月十五日办盂兰盆会一次，十二月初八日做太平会一次。在请神疏文内写有："元泰阳梦样真空之光，先光白门黄民"，蔡万贤本人亦不解其意。蔡万贤在该地传梁起凤入教，后来梁起凤又收陈贵为徒，传习弘阳教。[③] 康熙五十八年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三，顺治三年六月丙戌。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条。

③ 《朱批奏折》奉天府尹弘晌折，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六日。

(1719),奉天一带有正红旗公明英家奴郭进英、全国弼等人入弘阳教。① 在南方,广东省广州府也有旗人传习弘阳教。该教传有两支,一支是汉军镶红旗已故郭世勋之母,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自北京来到广州,带有弘阳会经像,"每岁于上元、中元、下元以及腊月为收元,各旗下老疾男妇自敛分资,相聚做会"。郭世勋母死后,其会遂散。另外一支为原任参领袁文伟家人林鸿范,"亦于康熙三十几年自京带有红阳经忏,来广做会念经"。后来以正黄旗兵丁王世华为会首,率二三十人吃斋念佛。成员多为"老妇及衰迈疾病之人,不过意在延年求福"。②

雍正年间(1723—1735)未见有关弘阳教活动的记载。

二、乾隆年间红阳教的流传

清朝当局为避乾隆帝弘历的讳而在官方文件中改称"红阳教",史料中出现大量有关该教活动的记载。乾隆三年(1738),关外奉天一带有正蓝旗和楞额位领下人李全,因生手疮拜直隶人田道士为师,学习红阳教。③ 乾隆十一年(1746),锦县人王重兴在直隶滦州地方贸易时,拜该地董姓为师,学习红阳教。④ 在京畿一带,红阳教亦很活跃。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直隶顺天府拿获红阳教董应科等人。据顺天府府尹蒋炳奏称,"此教传习百余年,牵引十四州县。据大兴县访得京南紫各庄三教堂,为宏(红)阳教聚集之处,塑有邪教神像。宛平县访得宏(红)阳会头,郎垡村系连玉惠,坎坛村系任一魁,大井村系刘氏等。……至各村会头连玉惠等供认,祖父以来,传习此教"。⑤ 经勘查发现,紫各庄的三教堂"孤悬村外,计有瓦房九十一间,土房二十二间,共瓦土房一百十三间,地七十一亩八分六厘五毫"。⑥ 此外又查出直隶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涿州(今河北涿州市)、房山、霸州(今霸县)、滦州(今滦县)、磁州(今磁县)、邯郸、成安、肥乡、清河、长垣(今属河南省)、定州(今定县)、易州(今易县)等州县

① 《朱批奏折》奉天府尹弘晌折,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六日。
②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策楞、广东巡抚准泰等联折,乾隆十一年十月初八日。
③ 奉天府尹弘晌折,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六日。
④ 《朱批奏折》奉天府尹弘晌折,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庚戌。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苏图、顺天府尹蒋炳联折,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共有大小三教堂91处，[①]俱被改作书院义学、僧寺道院、文昌祠，或作为收养贫病无依之人的普济堂。同年，步兵统领衙门在京城拿获传习红阳教的旗人赵王氏、孔芝华等人。“旗妇赵王氏，因伊夫赵宗普在日，曾行宏（红）阳教惑众，夫故，赵王氏即传其教，招引民人孔芝华等做会，散香持咒，以治病为名，蛊惑诓骗，殊属不法”。[②] 文内提到的赵宗普，可能就是步军统领衙门所奏之拜河南卫辉府道人为师的赵姓旗人。据赵王氏称，该教最初由河南卫辉府（治所今在河南省汲县）道人赵姓、恁姓传与右安门外居住的旗人赵宗普，授以用茶叶为人治病之方法，到处“散香传教”，并托名“静养功夫”。其方法为令人以右手扣住左手，右脚扣住左脚，舌头抵着上牙根，如此便可以祛病延年，时有永平府石梯口地方的“道人”前往参加，[③]说明该支红阳教同永平府滦州石佛口王森子孙有着某种联系。赵宗普故后，其妻赵王氏接续传教，“散香持咒”。

经过乾隆十一年（1746）查禁之后，红阳教仍在直隶，特别是京畿一带流传。[④] 乾隆三十四年（1769），直隶总督杨廷璋又查出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良乡、涿州等地传习红阳教之人。其中有旧日犯过案的红阳教首桑自雷、包文玉等人的子孙桑文之、包义宗等人，暗中招徒做会。有的教徒经过官府查禁之后，名义上开荤出教，实际上乃将存留经卷暗中持诵，或以代替他人诵经、超度亡人，借以觅利。从档案记载可知，桑文之系通州人，祖父桑自雷是正红旗包衣投充壮丁，汉军旗，向习红阳教，桑文之的父亲桑进魁亦随同入教。乾隆十一年，因官府查拿，桑进魁即将红阳教的组织“奉禁解散”，旋即身故。乾隆二十三年（1758），桑文之因家中老少均不平安，忆及祖父在日，因供佛念经，家中无有灾祲。于是商同祖父在日之同教人子孙，其中有正黄旗投充壮丁吴成顺、周腾玉及民人赵九正、张文德、焦七、王文魁、田吉祥、李守敬、焦二、马成端等10人，仿照红阳教旧日教规，习教做会。以每年五月十六、十一月十六日分别为红阳的生、故日期。届时每人出小钱100文，上供念经，由教徒轮流做会，祈保平安。包义宗是直隶顺天府涿州人，其父包文玉曾与同村之郑起龙、鲍三入红阳教。乾隆十一年官府查禁红阳教之后，郑起龙等先后身故。乾隆十九年（1754）包义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苏图折，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癸亥。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乾隆十一年六月癸未。

④ 参看本书天理教部分。

宗因其母董氏患病，忆及红阳教内向有将茶叶供佛祷祝治病之法，遂将茶叶一包，放在家中观音佛前，供奉祷祝，然后让母亲服用，恰好其母服后逐渐痊愈。于是又把红阳教遭禁时送归本村寺庙之经卷取回诵念，并代人治病行善。后来有良乡县人霍振山之母董氏患病，包义宗即给予祷祝过之茶叶，令其服用。恰好病人服用亦愈，霍振山拜包义宗为师入教。包义宗传给经卷，并让他每逢五月十六日、十一月十六日在家中上供念经。乾隆二十九年(1764)及三十一年(1766)、三十二年(1767)，在良乡县又有民人李士勤、姚林及涿州人王老六及正白旗汉军张三等人，均因红阳教教首为其治病，偶然得愈，先后加入红阳教，希望借入教消灾降福。其治病方法，亦仅将茶叶供奉佛前，焚香叩头祈祷，然后给予病人服用。用此法治愈之病人终属偶然，故信奉者亦不多。在京南大兴县一带，红阳教的活动亦很活跃。该县李国聘之祖李文茂在日曾入红阳教，家中藏有经卷，李文茂之子李尚珍亦随同吃斋习教。乾隆十一年(1746)京畿红阳教遭禁时，李文茂业已身故，李尚珍亦即开荤，但经卷仍然留存。其后，复与其侄李国聘、李国用及邻街居住之翟仲银、翟仲库学习念诵经卷。后李尚珍双目俱瞽，翟仲银患病身故，该处红阳教亦不禁自灭。在京南良乡一带亦有红阳教活动。该县张天佑及其子张生培，曾将红阳教改名为"龙天会"，供奉"至正菩萨"，每年四季摆香供诵经礼拜。张生培之子张二及邻居李德茂、焦仲林等俱入红阳教。乾隆十一年红阳教遭禁后，被迫解散，李德茂等均皆开荤，张二仍然吃素。在京西房山县亦发现有红阳教之活动。该县齐如信、齐四父子皆入红阳教，乾隆十一年红阳教被禁后开荤。但齐四遇有附近贫民丧葬之事，无力延请僧道者，即前去念经超度发送，以借此得利。[①] 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在直隶承德府塔子沟(今辽宁省凌源县)有李潮传习红阳教。李潮原系奉天正白旗庄头下壮丁，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迁居塔子沟海亭居住。乾隆十二年(1747)，因患病觅医，在奉天遇直隶武清县人张万善为之医痊，遂拜其为师入红阳教。其后，遇有丧葬之家无力延请僧道者，即邀李潮等前往念经发送。[②] 乾隆四十年二月，直隶承德塔子沟通判清格在该厅海亭地方查办保甲，发现该地居民李潮等持有弘阳教经卷、画像，即将其逮捕解省审讯。通过李潮的供述，当局得知此案的关键人物为已故之张万善。张万善是个四处闯荡、来往于关内关外之间的红阳教

① 直隶总督杨廷璋折，乾隆二十年二月十二日，载《史料旬刊》第十六期。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周元理折，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

首领,他最初从家乡直隶顺天府武清县来到奉天花儿营。乾隆十二年(1747)为奉天正白旗庄头名下壮丁李潮治好疾病,收其为徒。此后,张万善又于乾隆十八年(1753)到塔子沟海亭,当时该厅哈拉鬼沟的陈世禄,因母亲患病许愿修建一座关帝庙,也来海亭化缘。二人相遇,陈世禄拜师入教。乾隆十九年(1754),张万善携经卷进关前往直隶玉田县令人抄写,之后又回到花儿营倡立红阳教,招徒做会,乾隆二十六年(1761)赴哈拉鬼沟陈世禄所盖庙内任住持,不久便患病身故。乾隆三十二年(1767)李潮迁居塔子沟海亭,继续行教,念经疗病,代办丧事。①

在关外奉天有锦县人王重兴传习红阳教。王重兴于乾隆十一年(1746)前往直隶永平府滦州地方贸易,拜当地董姓为师入红阳教,后返回锦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在锦县得知何家屯王姓教徒家中获得红阳教经像,邀人一同习教,并约定每年做会四次,届时诵念红阳经。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锦县知县查获,讯出红阳会名目,但并未予以深究。② 锦县王姓之人虽然在家中藏有红阳教经卷、图像,但不曾邀人做会。后因家中之人先后去世,仅剩一年老妇女,遂起意邀人做会。先后约得同县之马从正等人,于每年正月初八、二月十九、四月初八及六月初六等日,各做会一次。届时一同念诵《红阳经》,所供神像,除释道二教者外,另供该教祖师画像四轴。③ 另有刘起凤即刘老道,原籍直隶顺天府宁河县,其父在籍曾拜赵姓为师,习红阳教,后"携眷来至关东,入籍锦县"。刘起凤因病随父入教,父亲去世后便加入王重兴、马从正教内。④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当局又拿获王重兴案中马从正之徒郭孙氏,经审得知该案主要人物有郭孙氏等四人。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奉天海城县有旗人刘得智、民人陈得贵等"私立混元红阳教"。经府尹弘晌等人审讯,查明该地红阳教共有三支:一支以刘得智为首,刘得智系正红旗萨尔图家奴,所习红阳教系传自沈自祥。康熙年间,平南王尚可喜的家奴沈自祥到海州地方倡立混元红阳教,供奉混元、飘高等祖师画像。康熙五十八年(1719)有正红旗公明英之家奴郭进英、全国弼加入其教。刘得智于乾隆十八年(1753)入教,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周元理折,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② 《朱批奏折》弘晌、喀尔崇义联折,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③ 《朱批奏折》奉天府尹弘晌折,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弘晌、富察善折,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充任佛堂管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又有正蓝旗宗室华玉之家效杨文礼入教。据刘得智等人供称，红阳教有“九干十八枝”，刘得智等所奉乃“接圣干玉华枝”，其经卷俱系红阳教劝善理俗之说。第二支以陈得贵为首。陈得贵系尚姓佐领下开户壮丁，于乾隆二年出旗为民。因其故父陈国奉原习红阳教，陈得贵即于雍正年间拜梁起凤为师入教。第三支即上面提到的以李全为首一支。李全于乾隆三年入红阳教后，又传镶蓝旗满洲哈克散佐领下闲散(未出任官职之人)李文明入教。① 乾隆后期，华北一带仍有红阳教继续流传。乾隆四十四年(1779)，山东德州曹家庵人刘和因患病拜本村红阳教教首尹成功为师入教，供奉老君圣人、玉帝、混元祖师。尹成功向他传授“三皈五戒”，念诵“香厨妙供”等咒语。并传给他《销释混元红阳大法祖明心经》一部，《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经》一部，《血湖宝忏》一部，《延生真经》一部。并对他说，红阳教共有九干十八枝，尹成功本人系“圣子金容五花枝”，又名“海会”，教内共传有十二辈，第一辈是飘高老祖，即前明隆庆四年曲周县人韩春坡。第二辈是巨鹿县张家庄人张斗楼。第三辈是林红阴，即抄本内所载有南县人林光士。第四辈是刘姓，冀州人。第五辈是郭姓，故城县柞子上人。第六辈邢姓，是德州城北第八屯人。第七辈万之正，即抄本所载故城县万家庄人万姓。第八辈刘道名是德州西边人。第九辈左九章，是德州李凹庄人。第十辈刘大宿，是德州香房刘家庄人。第十一辈是尹成功。第十二辈便是刘和本人。②

乾隆四十五年(1780)，山西平遥人渠闰甫拜同村人王增元为师入红阳教。乾隆四十八年(1783)，渠闰甫破案被捕，供出教内有师叔王毓山、阎庆廷即阎青廷，师兄郭永都等十余人。该教规定，每年七月初四日做会一次，供奉飘高老祖，持诵《观音普门品经》。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廿七日，直隶总督刘峨移咨山西巡抚农起，查拿王增元、王毓山等人。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增元、王毓山等在山西平遥被捕。官府从他家中搜出经卷、佛像及会簿三本，内开写红阳教教徒姓名33人。查明王增元与王毓山同村相好，王毓山之父王永福生前曾学习红阳教，王增元拜他为师，向他学习经卷。乾隆十一年直隶红阳教遭禁后，王永福即将经卷、佛像交给王毓山、王增元分别收藏。乾隆十七年(1752)，王永福病故，王毓山即外出经商，王增元仍在家务农。乾隆四十四年(1779)冬天，王

① 《朱批奏折》奉天府尹弘晌折，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毓山因生意折本，回至家乡。王增元亦因年老力衰，难以耕作，二便商议“复兴旧教”，以消灾求福诱人入教，借以敛取布施，得银分用。王毓山又令其子王治珑也一同习教念经。王增元、王毓山二人素会针灸治病，附近村民间有被其治愈者，二人便以替人治病及消灾获福之言，劝人入教。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郭全仪、渠闰甫、郭永都等，拜从王增元为师，其后又有王执斌、王孟珑等拜从入教，随同念经。同年七月初四日，王增元、王毓山同教教徒7人，一同在王增元家中做会，供奉飘高老祖，念诵《观音普门品》等经。当时有段方基等6人求王增元用针灸治病，并拜佛布施，但未入教。王增元仅将6人姓名写入会簿，代祈保佑。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有王庭福等投拜王增元为师，同时入教者还有许福贵等人。同年曾做会三次，所敛得之钱，均为王增元等花用。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渠闰甫因知南政村龙天庙内有房屋地亩，欲充任该庙住持。恐无经卷不能入庙，忆及曾见许福贵家有王增元给予的《祖明经》一本，经面写有“京都党家老铺造卖经文”等字，又闻说京城琉璃厂五圣庵有经本出卖，于是将住房三间卖给堂兄渠成仑，得银50两。十一月初六日，渠闰甫携银40两进京买经，行至直隶海城时，被差役盘获。①

乾隆、嘉庆年间，直隶红阳教中还有一支称为“邱祖龙门派下混元红阳教”。乾隆五十三年(1788)，直隶新城县人苏敬劝其雇工刘辉远入教，称系“邱祖龙门派下混元红阳教”，供奉红阳老祖、观音老母、混元老祖、飘高老祖，念诵《混元经》，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为八字真言。每逢朔望做会一次，教徒各带钱200文“上会”，“念经贡献”，会毕一同食斋而散。同教之人皆称苏敬为“爷”，向他叩头礼拜，而苏敬并不答礼。苏敬向教徒们传授打坐功夫，并念诵咒语：“南无阿弥陀佛请祖师爷慈悲，到吉勒城，到南洋城，到额勒城，小弟子万物不挂一丝毫”。该教一直在直隶新城一带流传，直到嘉庆十八年林清领导天理教攻打皇宫事件发生，才畏惧解散。② 宋军博士根据现存档案记载统计，清代由朝廷直接处理的红阳教案，自乾隆至道光三朝，共有45起，其中乾隆朝8起，嘉庆朝26起，道光朝11起。③

---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十九辑，山西巡抚农起折，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

② 《朱批奏折》刘环之折，嘉庆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③ 宋军：《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三、嘉道年间的红阳教

经过乾隆十一年(1746)查禁之后,当局认为红阳教的经卷、图像,虽然“多系劝善俚鄙之词,并无邪悖语句”,①但仍严加查禁:“如有藏匿红阳邪教经卷,不以首缴销毁,查出严加治罪。通行在案”。② 在清廷严厉打击下,红阳教的传教活动被迫有所收敛。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嘉庆十七年(1812)的二十八年间,仅发现个别小规模的传教案件。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震惊朝野的“癸酉之变”,虽然是以“天理教”的名称出现,但也有京畿地区的红阳教教徒参加,此后,仍不断发现红阳教的活动。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初八日,东安县大黑垡村村民11人赴顺天府衙门呈告南路同知衙门快役等人于初二日在该村以搜捕为由,妄拿无辜,打人并抢夺财物。顺天府在调查此事时,却意外地发现了该村的“红阳会”,乃由已故孙大丫子传给张第四,韩九、李孝儿、姚瞎子均先后入会,供奉飘高老祖像。③ 同年十月十二日夜,巡城官兵在大马神庙地方盘获大兴县采育南凤凰营人张老,供出由通州南神树村孙二及其弟、过继给王姓的王老为“红阳会”的师傅,他每年做大会两次,正月叫开元会,十一月叫收元会;每月十五日叫月会。每逢会日,入会的人约计百余人,出钱百文,将名字写入簿内,大家跪着念经立誓,还有人帮助他挂灯,灯上都有名字。所有入会的名灯、名簿,俱在王老家收存。嘉庆十六年(1811)十一月,张老在孙二家中见到其他领会之人尚有张各庄李五、大兴县沙锅店黎公武、南神树村宋二、大兴县胡家营席师傅、东安县张各庄北边半壁店李师傅。“其余采育、武清县东南荀庄等地方及城里到的人都不少”。④ 同年十一月十日,地方营弁又拿获外出讨饭的房山县李家庄人翟四(翟亮),供出去年八月拜马驹桥薛玉为师入红阳教,每日烧香拜佛念经,习得请鬼王六句经:“佛慈广大,感应无差,吉光三变河沙。愿不离却牙,降福宅家,金地涌莲花。南无祥云盖菩萨摩呵娑”。请三面菩萨、黑煞神、黑

---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杨廷璋折,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周元理折,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刘环之、费锡章联折,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九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巡视中城御史嵩安、巡视中城给事中倪琇折,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虎星八句经文："占台海岸，月余之母，至性行香火，内得心凉一炷遍十方。南无祥云盖菩萨摩呵娑。南海观音菩萨，东海观音灵芝草，北海王禅老祖。"声称念诵之后即能飞沙驾云。[①]"癸酉之变"后，清廷在追查"余犯"中，又拿获一些与官方关系密切的习教之人。肃亲王永锡于十一月十四日奏称，查出家人三等护卫、在广渠门外看守坟园的乔德兴，"于三十年前因患病曾求一荒厂村李姓治病，病好后即拜李姓为师，后听得李姓是红洋（阳）会之人"。[②] 当局还查出，红阳教中的李盛得（李五）也与宫中太监交往密切。嘉庆十八年李盛得（已78岁）称自己二十来岁时（即乾隆二十年）"遇著一个人，都叫他赵佛，他是红阳会，我拜他为师入会，学坐功念佛"，[③]供奉飘高老祖、无生老母。自己又收太监朱玉、侄女婿王双庆（王三）等为徒，朱玉收杜平安、史福禄为徒，杜平安又收太监卢忠为徒，辗转相传。据与李盛得同住的王双庆称，平日与他"往来的人，太监居多，除杜平安、朱玉、李进忠外，还有告退首领太监李进魁，现寓海甸西庙里南府当差的太监李进喜、彭如海，又有朱玉的徒弟小太监曹进玉，杜平安的徒弟小太监周邦太，已故太监王忠的徒弟张进福"。[④] 此外还有冀州城西黄村人王书香、衡水县大柳林村人王青连、高杰秀也都是同教。与此同时，大兴县又查获了安杰传习红阳教案。安杰供称自己"于嘉庆四年间，因染患痢疾，经已故之护军校文三即文祥给予茶叶一两，饮服病愈。因询知文三学习红阳教，系大兴县民人李文清之徒，平日供佛念经，只用茶叶代人治病。伊遂拜文三为师，学诵心经。文三旋给飘高祖像一座，令伊在家供奉"。嘉庆十一年（1806），又从李文清之徒镶白旗满洲马甲广明宝（广五）处获得红阳经六本、李文清像一轴，安杰即携回供奉，并用茶叶为人治病。是年十月五日，闻知当局查拿"邪教"，安杰急忙将所藏《泰山娘娘经》烧毁，其余未及焚烧即被逮捕。[⑤] 刑部审问确实之后，原拟请将安杰等人仅"杖徒鞭笞发落"。嘉庆帝认为如此处理"殊属轻纵"，降旨将安杰"发往乌鲁木齐"，广明宝等发配充军。并指斥刑部"显系惮于研鞫，意存诿卸。所有刑部堂官著传旨申饬"。[⑥] 继而又降旨："嗣后各直省州县官到任后，先周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翟四供单。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肃亲王永锡折，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李盛得供词。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双庆供词。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董诰等联折。

⑥ 《军机处剿捕档》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旨。

历村庄，稽查保甲，将境内有无邪教申报该管上司。如访有萌孽，立即查拿究办，毋稍玩亵。"①刑部遂于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中旬颁布了"传习邪教治罪条例"，命令京师及各省地方各出告示，公布新定条例，督促各"邪教"成员报官自首。各地官员不敢怠慢，纷纷查拿"邪教"，京畿顺天府、直隶、河南又先后破获了数起红阳教案。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初，河南归德府柘城县知县在赴乡清查保甲时，发现该县王元印有传教敛钱行为而将他捕获，审明王元印之兄王元正于嘉庆二年(1797)外出行医，三年后回家时带回黄纸朱符并黄布会一卷、《报恩经》一本、经片一纸。声称朱符可以治病，会箓《报恩经》为劝善之词，而念诵经文"酒色财气四堵墙，解透迷人在里藏，人人不尊佛言语，妻财子禄那里藏"四句则可以求福。并教王元印"一棵白菜七寸高，师父度根我度梢。有心度你西天去，恐怕根浅扎不牢"四句咒语，声言念此经咒"生前可以免灾，死后更有好处"，教名为"红阳会"。此外，王元印又传徒二人，每年四季在其家礼拜一次。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因西华县查拿"邪教"，遂不敢再行聚会，王元正于次年病故。至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王元印因贫困再度兴教，收徒敛钱，不久案发被捕。② 与王元印犯案的同时，顺天府永清县也捕获了传习红阳会的邢连枝，审明邢连枝从前曾与已故崔起瑞拜新城县苏敬、车子孝为师入"红阳门"，供奉"浑(混)元老祖"、"飘高老祖"。相约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做会，打坐，念诵"南无阿弥陀佛，请祖师爷慈悲，到吉勒城，到南洋城，到额勒城，小弟子万物不挂一丝毫"等句。入会者各交三四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以作斋饭费用。新城县随即拿获已故苏敬之子苏自泰、车子孝归案。③ 同年十月，直隶保定府束鹿县发现了一支以寡妇为中心的红阳教组织。该教自称为红阳教的"第四支"，现任教主是魏北村的马杨氏。马杨氏的婆婆马刘氏生前曾拜同县张各庄靳氏为师习教，而靳氏之师为王氏，二人均已亡故，马刘氏遂将靳氏所藏弘阳教经卷、佛像携回，供奉念诵。马杨氏早年守寡，马刘氏"令其入教，烧香诵经，修行来世"。马刘氏已于30年前去世，说明她在乾隆中晚期就已入教。嘉庆四年(1799)七月，马杨氏追念王氏与靳氏两位教中前辈，请人为她们画像供奉。嘉庆十二年(1807)之后，又有李吉氏等5人因"夫故绝嗣，无所依靠，往求马杨氏教经修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九，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②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方受畴折，嘉庆二十年九月十七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顺天府尹刘环之、费锡章联折，嘉庆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善”，拜师入教。此后，“邻近村民因马杨氏等认真修行，如遇白事或酬神还愿，即邀马杨氏等念经，供给饭食”。① 该教于每月初九日、十九日聚会两次，诵佛念经，劝人行好。“如有上供烧香，随意给送钱文，不计多少。会中仅止妇女，并无传有男人”。② 同月，锦州府义州也拿获了红阳教徒朱王氏与杜韩氏。其中朱王氏为义州城北娘娘庙火居道姑，嘉庆二年（1797），朱王氏因病求“混元门红阳教”教徒岳寂运医治，病愈后即被劝入教，得“混元门传徒小手折”一个，上书从前《弘阳教流传支派》（疑即《飘高老祖临凡目录》）作为传徒凭据。岳寂运病重之际，将太极八卦木戳一个、《红阳玉华真经》（即《弘阳妙道玉华随堂真经》）一本、《混元红阳经》一套、飘高老祖图像一幅、治病符书一本全部传给朱王氏收藏。因朱王氏不识字，并未念诵。朱王氏当道姑之后，“近村患病之人，有到庙内求神，伊在旁代为随口祷祝，将所供茶叶给吃，多不见效”。此外，杜韩氏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因病许吃长斋，后拜岳寂运为师习“混元门红阳教”。③

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月，通州查获曹七习教案。嘉庆四年（1799），同村赵忠曾作“红阳会”，曹七、吴文焕、曹文升、永新和尚亦跟随参加，并抄有《了言经》一本，内载：“信香元上斗牛宫，飘高圣祖显神通”。村中遇有丧葬，曹七等便同去为丧主礼忏，吃斋而散，并不敛钱。④ 同年四月，山东陵县发现县属大新庄民陈谨收藏和念诵“红阳经”，搜获神像五轴，红阳经忏十六套，《普门》等经六套及《太阳》等经二五本。据供其父陈学孟生前“因年老多病，不知由何处携回经卷图像一箱，独自在家供像诵经，不令旁人观看”。乾隆四十六年（1781）病重时，嘱咐陈谨将经像收藏，“遇有灾病，供像念经即可消除”。当时陈谨只有16岁，未加留意。直到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初，陈谨患疟疾，久病不愈，忆及从前父亲遗言，便开始念诵经忏，供奉神像，果然病愈。庄邻同患疟疾者数人闻知后，也前来求其念经疗病。⑤ 同年七月，官方在直隶衡水县武生英凌宵家搜出“祖遗印板《十王经》两本、图像两轴。一轴系佛像并飘高老祖像，一轴系画无生老母”。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1790—1791），有英家亲戚胡德明，见英凌宵之母

---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月初七日。

③ 《朱批奏折》晋昌等联折，嘉庆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④ 《朱批奏折》顺天府尹刘环之、费锡章联折，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⑤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英李氏烧香念佛,就传给她"大乘门教,即一炷香又名红阳教。每逢朔望教令先用净水洗脸,在于桌上用白石灰画天地人图像,烧香磕头,念诵《十王经》,并讲视、听、言、动四门,讲毕复用净水洗面,烧香磕头而散。英李氏习教之后,即有本村妇女数人,于朔望各带香钱数文前往,随同烧香入会,并无男人在内"。[①] 同年十二月,直隶拿获籍隶景州的婴添诚(婴洛盛)、赵一鹏(赵友鹏)二人。婴添诚曾请已故景州人赵堂治愈父病,赵堂即劝其入"混元红阳教",吃斋医病。赵堂还送给婴添诚《混元红阳经》一部,共10套,声称为人念诵"可以消灾延年"。赵一鹏为赵堂族侄,也随同习教。乾隆五十九年(1794),赵堂去世,婴添诚、赵一鹏二人虽停止吃斋念经,但婴添诚仍常为人供茶治病,赵一鹏则将经卷图像、念经器具收藏在家。嘉庆十九年(1814),婴添诚见有官府告示禁止收藏经卷,便将所持经卷送到邻近武邑县北石村的宝山寺寄藏。[②] 嘉庆二十二年(1817)六月初三日,步军统领衙门在处理一起斗殴案时,当事者杨全安声称其已故妻父刘黑达子素习红阳教,并引他拜李盛得(李五)为师,"供奉飘高老祖"。武清县赵大、通州小车子张姓、领催刘九、马甲于三都是同教。打架原因即在于街邻干涉自己习教念经。虽然杨全安之子和邻居都作证说"杨全安委系疯病,时常混骂混说,并无入红阳教之事",但审问官员仍怀疑他"恐系畏罪出教,后复染疯病亦未可定"。[③] 同月,直隶提督徐锟奏称新安县发现任永兴等传习"红阳教"。案发后任永兴已经潜逃,仅在该村三义庙内起获《泰山东岳十王经》、《销释收圆行觉宝卷》等经卷及木印一方,上刻"红阳寺宝"四字。其中《泰山东岳十王经》中有"往黄村进钱粮"之语。因林清当年居住在大兴县黄村宋家庄,教徒中有"往宋家庄进钱粮"之说,且黄村距京城甚近,嘉庆帝特命直隶总督方受畴严查"所指黄村又系何人",并怀疑"或即祝现等在黄村潜藏勾结"。方受畴仔细查阅手抄的两本《泰山东岳十王经》,确认该经为"年久之物,并非新近抄写"。而另外两册刻版印刷本与手抄本内容相同,"内有临清县景泰六年字样"。此外还有"黄村吕祖立,至今得兴隆。天下众喜人,挂号对合同"等句。而《销释收圆行觉宝卷》中也载有"前明万历年号"并"古黄村真空无生老母"字样[④],说明此案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③ 《朱批奏折》英和、那彦宝、西拉布联折,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
④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片,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与林清余党并无关联。八月，当局捕获暂住北京德胜门外的献县人王尚春夫妇，据供该县"井家庄住的张廷瑞，同王家庄住的王寡妇俱是红阳教首"。嘉庆九年(1804)，其父王仲来拜张廷瑞为师入教，并于十七年张廷瑞病故后接充教首，传徒五六十人。"每日晚上烧一炷香，坐功念咒"，供奉混元老祖黄纸牌位，收有经咒两小柜，只准教内人阅看①。献县当局据此捕获李张村王存来(王仲来)、王张村王宋氏(王寡妇)、张村杜学成三人，俱供称是同县井张村张廷瑞之徒。同时在王存来家起获刻本《混元红阳经》9本，杜学成家起出抄本《三藏经》1本、不全《十字经》1本，王宋氏家起出抄本《道场总抄》1本、《阳宅起首》1本。该教于每年六月初六日在李张村与王张村相连处的三教庙，亦称韩祖庙内晒经一次。② 同月，直隶吴桥县拿获了红阳教徒陈玉章，供称传自山东德州人刘和。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因刘和为陈玉章治病得愈，拜其为师入教。陈玉章被捕后供出师傅刘和及同教的德州人赵家彦③及崔中旺。崔中旺8岁时因母患病，请德州五曹年村已故道人李谦堂治愈，便拜其为师入"红阳教"，与刘和同派，但师承不同。嘉庆帝在查阅刘和案内收缴的大批经卷时，发现经内写有："山东济南府德州河西高海庄清修观刊，《销释随堂祖明经》板，一堂施财合会人等同一发心，如有印请者请板成造。康熙三十六年孟夏吉旦。"便谕令山东巡抚陈预查明经板所在，验明后当堂销毁。陈预随即派人前往高海庄清修观，先获《销释混元红阳大法祖明经》，通过讯问该观道士，继而在南乡庙内起出两面刊刻经板大小19块，验明确为嘉庆帝所阅《大法祖明经》原板④。九月，新城县又捕获弘阳教徒贾敬、刘宽、王燕3人，其中贾、刘表兄弟二人分别于嘉庆十四(1809)和十五年(1810)入宋家辛庄张汶所传"红阳会，又名茶叶教"；王燕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拜韩村营车二为师学好，烧一炷香入红阳会"。⑤ 嘉庆二十四年(1819)六月，山东商河县在办理一炷香教案件时，发现该县"习一炷香者甚多，间有红阳教，而红阳教中又另有龙天门一支"，当即逮捕红阳教徒王新。⑥ 因为当时办案重点是追查该地的一炷香教，因此对红阳教未加重视。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英和、英绶联折，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③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④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英和、英绶联折，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⑥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温承惠折，嘉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道光朝的红阳教案也时有发生，其传教范围仍以直隶和京畿为中心，活动方式也仍以祈祷治病为主，但也出现了与民间武术团体相结合的倾向。道光五年(1825)，直隶霸州、文安、永清三县同时破获红阳教案。这三县红阳教"教名虽同，均非同伙"，并不属于同一支派。其中南皮县人李可学于嘉庆三年(1798)因病拜同村已故张成位为师入教，焚香治病，每年正月与十月在张成位家做会，"讽诵《地藏经》，唱说孝顺父母、和睦乡邻等好话。赴会之人各给京钱一二百文不等，名为如意钱，备办斋供，并未入教"。嘉庆十五年(1810)张成位去世，李可学便停止做会，仅有时替人治病。嘉庆二十四年(1819)，李可学将原籍住房变卖，在霸州等地四处佣工，并无一定住处。道光三年(1823)正月，李可学在永清县与同教不同派的于三道相遇，"讲论三皈五戒，彼此称为道友"。文安县张宾故父张泳发生前也曾学习红阳教，并收同县杨得绪故父杨成碌为徒，"每年按春秋两季供奉飘高老祖，焚香诵经，做会四次"。张泳发故后，杨成碌接续传徒做会，张宾又拜其为师。嘉庆七年(1802)，张宾与杨成碌发生争吵，即分开各自做会传徒。[①] 杨得绪于父亲去世后，"亦踵习其教，照旧供奉飘高老祖，诵经做会"。嘉庆十八年(1813)因各地查拿"邪教"，遂停止做会。道光四年(1824)，杨得绪因所藏经卷为印板大本，怕被发现，便请人抄成细字小本，并将原本烧毁。永清县于三道在嘉庆元年(1796)"希图免灾获福，拜青县八里庄人习教之卢得业为师，传习红阳教并三皈五戒经词"。卢得业病故后，于三道便每逢初一、十五在家焚香诵经，后于嘉庆十八年停止。[②] 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吉林伯都讷厅(今扶余县)访获红阳教徒辛存仁。辛存仁原籍直隶，移居该厅苇子沟屯。嘉庆十七年(1812)，已故吉林三道岭真武庙住持僧王庆环(法名广庆)游方来到辛存仁家化缘，并留宿其家。当时，因母亲患病，辛存仁问及应如何医治。"王庆环以供奉飘高老祖、学习红阳教《九莲经》，并用黄纸写无生老父、无生老母牌位。如虔心供奉，日久能以无中生有，有中消无，混元一气，病即痊愈之言答复"。于是，辛存仁拜师入教，写出牌位。王庆环当即给留"秉教沙门"篆字木印一个、《九莲经》一本、《报恩经》二本、《扫心经》一本、《明宗卷》一本、《护道榜文》一本、《达本还元经》一本。令其供奉牌前，每月初一、十五烧香十二炷，诵读经卷，并传教"打坐三回九转运气工夫咒语"。此后，辛存仁便积极传徒，念经做

① 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辩》，见《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会。嘉庆十八年，因查禁“邪教”风声紧迫，辛存仁便“将原写牌位撕毁，改供释迦、如来等佛，照常烧香念经”。[1] 道光十三年(1833)十一月初，直隶玉田、遵化、蓟州、宝坻等地同时查获红阳教。教徒刘起旺等都是该处村民，各自“务农及手艺生理度日”。嘉庆年间，“或因己病，或因亲病”，请已故玉田县人董文魁等人医治。“董文魁等俱系红阳教，茹素诵经，妄称可以消灾邀福，与亦已身故之崔显庭、丁良弼互相传习，均以授茶、看香占病为由引诱愚民”。刘起旺等病愈后，都各自拜师。董文魁等“授以《红阳混元》、《随堂》、《玉华》等项经卷，告知教中旧规，每年做会三次：三月初三为蟠桃会、六月初六日为晾经会、十一月十五日为收原会，俱悬挂飘高老祖图像，供设素菜，敲击铜磬、木鱼，环跪讽经而散。还另给木戳一个，上刻“混元门封”四字，“系为摆供焚疏在疏纸上印用”。此后，刘起旺等便按期做会、辗转传徒长达三十余年之久。[2] 与此同时，直隶清河县也发现了红阳教，遂行文山东恩县，逮捕了该县红阳教徒赵文元归案。[3] 道光十六年(1836)二月，北京南营东珠市口汛修缮守备衙署，请来画匠张四油画屏门，闲谈中张四言及“近京东南地方有传习邪教之人”，遂引发了教案。原来张四于道光六年(1826)到通州永乐店东尖村为人画佛像和阎王像，住在该村东大庙。因患病，庙内道士李汰和劝他“领香入红阳教”；又有教徒冯泳谅在飘高老祖像前为其“祈求念咒”，病果然痊愈。道光十年(1830)，张四又到该村，红阳教首李八等“拿出经卷一部，上有飘高老祖之像，并拿出混元三祖像一轴”，让张四照式描画29张。有一日夜间，张四见东大庙内供着他画的飘高老祖、混元三祖像，李八等29人“一同聚众念经跪香”。[4] 李八等被捕后绝口否认习教之事，其他被捕者“供词并与先获之李八等相同”。[5] 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直隶总督琦善获悉深泽县与祁州村民有人习教，遂令线人打入该教内部，探得教内首从及做会日期，一举逮捕了王洛增、霍礼达等24名教徒，搜获经卷、铜像等物。审明深泽县王洛增之父王得玉生前素习混元门即红阳教，“学习盘坐功夫，借画茶治病，煽惑乡愚”，传教授徒。“凡教中人见面询问姓名，告知真姓，必复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富俊折，道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琦善折，道光十四年七月初九日。
③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钟祥片，道光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耆英、桂轮联折，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⑤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琦善片，道光十六年(月日缺)。

问究系何姓,答称姓‘无’,即知系同教无生老母之徒”。王得玉去世后,“王洛增接传其教,仍按期在家摆供做会。同教之人有赴会者,各带京钱一二百文不等,作为香资”。祁州已故张进忠曾拜王得玉为师,同时与传习混元门教之定州人边洛胜、晋州人杨盛堂关系紧密,时常将自己无法治愈的病人推荐到他们那里去,杨盛堂去世后由张进忠接充教首。另有已故深泽县人陈洛飞在乾隆末年即已为人供茶治病,传混元门教。其中王得玉父子每月十四日做会一次,杨盛堂每月二十四日,边洛胜、张进忠每月十六、二十四日,陈洛飞每月初一日,做会日期各有不同,说明他们虽属同教,但支派并不相同。[①] 同年年底,盛京访获陈喜等十人先后学习红阳教、拜师传徒、诵经治病。[②] 从以上罗列的大量红阳教案例中,可以看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红阳教在东北、华北一带发展蔓延的基本情况:教徒们入教大多为了医治疾病或消灾祈福,其活动不外做会念经。除了嘉庆十八年部分红阳教徒卷入“癸酉事件”外,尚少参与造反活动。因此,有的学者将该教归入“温和型”教门。[③]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琦善折,道光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〇四,道光十七年十二月辛酉。

③ 嘉道年间红阳教的流传情况,参考了曹新宇,宋军和鲍齐合著的《中国秘密社会》第三卷《清代教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7—116页。

第十二章　混元教与收元教

乾隆年间，在直隶、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流传着混元教与收元教，并于乾隆末嘉庆年初发动了著名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

混元教有两个不同渊源的教门。一是雍正年间山西长子县张进斗，即张冉公①的弟子王奉禄、冯进京等人所传，又称混沌教，另一个是河南鹿邑人樊明德所传，称混元教。收元教又称元通清净佛门教，是张进斗弟子周隆庭、李彦稳及田金台等人所传。下面分别叙述这三个秘密教门。

一、王奉禄所传混元教（混沌教）

王奉禄是张进斗之徒，雍正三年传山西长子县冯进京为徒。据冯进京供称："小的是长子县西北呈村人，年五十九。（乾隆十八年）……小的平日剃头、算卦、卖针营生，又会参禅说偈，运气念无字真经，烧香占病。三十岁上，有本村王奉禄是个教门，劝人吃斋说偈，遂拜他为师。他传小的两首偈语：'化言化语化良人，同进天宫证佛身。修身圆满正果位，胜积宝贝共黄金'。及'清凉厅上好欢喜，我下灵山暗吊贤。无生慈悲加生意，要分三乘也不难'。"并称三乘的含义是指上、中、下三乘，"上乘官员吏典，中乘一切富豪，下乘受穷贱人"。王奉禄还告诉冯进京，偈语是张进斗即张公祖所传，张进斗"一字不识，可以讲道，讲出来段段都是偈语"。冯进京即同王奉禄同往拜见，张进斗又传冯进京一偈："虚空悬挂一庙堂，青松贵柏闹元阳。禅林长就奇山景，人人难到古家乡。"冯进京遂又拜张进斗为师。冯进京又供："小的这教名为混沌教。混者，混然凡气；沌

① 张进斗系山西潞安府长子县人，自康熙末年至雍正五年，一直在山西长子县一带传教。雍正六年因"作妖书妖言，煽惑愚民"，且与教内之李积原等"商谋劫掠"被捕获，官府从他家中搜出三眼铳等兵器，将他处斩。

者，沌悟明心。男子学成就是混天佛，女人学成就是沌天母。"[①]冯进京世代习教，其祖母曾留给他一部《李都御救母经》和一部《立天卷》。《立天卷》即《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李都御救母经》即《李都御参岳山救母书苦经》，又名《劝人宝鉴》。乾隆十年，冯进京传直隶沙河县北刘村人王会为徒。王会原系邢台人李起奉之徒弟。乾隆十年，王会来至山西潞安府北关赶集，遇见冯进京在集上卖针。冯进京即劝王会入教，自称家中藏有两宗经卷，只要将其念熟，且不宰牲，不偷盗，由佛法度化，即可保佑不死。并称自己会运气，闭着眼睛可以看见花果树木。还会念咒，把香火放在水盆里可以不灭。王会见冯进京所说神奇，即拜冯进京为师，并与另一入教者郗成业送给冯进京银一百二十两。同年腊月，王会、郗成业二人又送给冯进京银200两。[②] 后来，王会萌发了政治野心，欲夺取政权称王。他假称其师冯进京是"未来佛爷"，他家有一座南楼，北边有五个土窑子，叫做五龙洞。冯进京"看乾坤如反掌，只用佛爷金光一点，就能翻转乾坤，变换世界"。又假称其师冯进京曾告诉他，"将来要立中京"，由王会"坐天下"。并说经上有"鸡叫一声天下明，狗咬一声天下乱"之句。明年是狗年，该立中京了，他将帮助王会坐天下。届时"不用兵马粮草，只用仗他的法力就都有了"。王会又对弟子宣称："癸酉年八月里要在潞安府里立中京，冯佛爷有合手是地、仰手是天的法力。"[③]王会不仅企图登极坐天下，而且以此诱骗和奸淫妇女。据教内刘郭氏供称，王会收她为徒后，"教小的须要修心养性，采清气换浊气，叫小的与他睡，说他日后得了志，封小的做宫院。有钱出布施，无钱出身子，总是一样功。小的听信，就在他家与他睡了一夜。"同年四月，刘郭氏的妹妹冯郭氏去看望她，王会又劝其妹入教磕头，也与"王会宿了一夜"，王会许她"日后事成受封"。[④] 乾隆十八年五月，王会在教徒唐明礼家暂住，恰值教徒胡显送女儿来唐家，王会又趁机诱奸了胡显的女儿。王会后来不断借收徒、"封宫院"之名，奸淫妇女，计有：史胡氏、胡辛姐、徐胡氏（胡五姐）等。[⑤] 乾隆十八年七月，混元教即混沌教破案，冯进京、王会等俱被捕，官府在冯进京处搜获《立天

① 《冯进京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西巡抚胡宝瑔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及《郗成业供词》。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折并附供单，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廿六日，刘郭氏等人供单。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观承折及所附供单，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二日。

卷》。冯进京于受审时,“闭口运气,一言不吐”,后经杖责,无法运气,始行吐供。最后因杖疮溃烂而死,王会则被当场杖毙。[①]

二、樊明德所传混元教

樊明德自乾隆三十九年起,在河南鹿邑县传播混元教。樊明德所传混元教,与王奉禄所传混元教即混沌教不同,从源流及教义上看,系属于红阳教系统。樊明德是河南鹿邑县人,“务农为业,兼习医道”。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樊明德身染疾病,适有素识之余成明前来探望。他对樊明德说:本县的杨集为人治病,颇有效验。樊明德便托余成明延请杨集来家治病。樊明德病愈后,又前往杨集家拜谢,此后二人便经常往来。杨集传给樊明德《混元点化经》及《大问道经》、《小问道经》各一部及《请神疏头》一纸。杨集声称:这些经书、疏头,皆系“仙人传留”,让樊明德每晚烧香,先念疏头、默通姓名。后念问道经,可以消灾获福,死后不落地狱,世世转生好人。并告诫他,《混元点化经》一书,不可泄露。樊明德在收授这些经文、疏头后,便“起意倡立混元教名,诱人学习,图骗钱财”。[②] 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樊明德所倡立的混元教,实际上是明代弘阳教之绪余。明代弘明教的经卷,都冠以“混元”二字。杨集传给樊明德的《混元点化经》便具有这个特点。当然,从杨集所传大小向道经及《请神疏头》的内容来看,又在教义上有所发展,主要增加了不满和反对现存社会秩序,鼓动反抗现政权的内容,如在《请神疏头》中,写有:“万善同归性复初”七字,鼓吹恢复到往昔的日子。在《大小问道经》中,写有:“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结(劫)年”等。在《混元点化经》中写有:“末结(劫)年,刀兵现”,“子丑寅卯夏旱多”,“龙虎二将中元斗,三十六将、二十八宿临凡”[③],以及“龙花(华)会,立新春,丙子年,防备底下反乱年”等。[④] 这些叛逆性内容出现在混元教教义里,反映出乾隆中叶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现状,改善处境的愿望和要求。混元教正是为了迎合人民群众不满现实的心态,才提出“末劫年,刀兵现”和“换乾

---

①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胡宝瑔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廿五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南巡抚徐绩折,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廿八日。

③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徐绩折,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④ 《朱批奏折》安徽巡抚裴宗锡折,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

坤，换世界”等口号，借以吸引徒众。樊明德在河南鹿邑县创立混元教之初，只有他的朋友和亲戚等少数几个人参加，如余成明、樊宗年、樊良贵、连善礼等。其后，樊明德又劝说其胞兄樊成德、侄樊世贵、樊世祥及子樊世正、樊世太等人入教，并同余成明商议，以后每年清明及五月十五日、九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等，在樊明德家中聚会念经。其后，樊明德所传弟子日增，陆续有辛永禄、胡添文、秦玉楼、王怀玉等 19 人入教。樊明德又编出“波弥斟、波弥天”口诀，令辛永禄等人各自传徒，于会期皆来樊明德家中烧香。以后，经过辗转相传，入教者越来越多，辛永禄传王廷亮等 9 人，王廷亮又传刘文炳等 12 人，刘文炳又传田世敬等 5 人，胡添文又传刘文世、刘成章等 11 人，樊宗年又传连李敬等 9 人，连善礼又传桑同成等 7 人，秦玉楼又传侯子钦等 3 人，王怀玉又传刘松等 15 人。[①] 混元教通过张菊、丁洪奇等人又传到安徽。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安徽亳州人张菊、丁洪奇来到河南鹿邑县邱家集贩卖草帽，寄居樊明德家中。张菊见樊明德每夜烧香诵经，即向其询问。樊明德自称藏有《混元点化经》与《大小问道经》，皆“系仙人传下真经，虔诚诵念，身死不落地狱，世世转身好人，并可替人代诵祈福”。劝令张菊入教。张菊与丁洪奇便送给樊明德钱文，请他代为诵经祈福，但未入教。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丁洪奇、张菊各带八折钱三千文，来到樊明德处，拜其为师。樊明德令二人将经疏抄写带回。二人回家后，因年终事忙，未及开诵。乾隆四十年二月初二日晚，丁洪奇、张菊二人开始持诵所抄之经疏。三月初七日，又有丁本礼等 7 人，各出钱四百文给丁洪奇，请他代诵一夜。[②] 其后，丁洪奇又引胞兄丁洪度拜樊明德为师入混元教。丁洪度又收河南人陈中礼、孟三及鲁伟等人为徒。鲁伟则传田恒业为徒，并传授《上大人》歌词。乾隆四十年三月初十日，樊明德等人传教收徒之事被鹿邑县知县沈佐清访闻，派遣兵役将樊明德、樊宗年等人捕获，并搜获混元教所传经卷与咒语。其中一首咒语同王伦清水教的咒语相近：“通天山上一颗椒，吾请师父把徒教。吾徒下方身遭难，不请师父无所靠。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着。人看招在我身上，我看比千里还远。特禀圣宗老爷来得知，求天天应，求地地灵，那枪不过火箭儿”。[③] 河南

①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徐绩折，乾隆四十年五月廿八日。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十三辑，署安徽巡抚萨载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③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五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6 页。

按察使荣柱接到鹿邑县禀报破获混元教案后，又派兵役在汝阳、睢宁、西华、上蔡等县进行查拿，先后捕获混元教徒93人。[①] 河南巡抚徐绩等人对此案亲自审理，将樊明德凌迟处死，其兄樊成德等7人被处斩，其妻及子女皆判给功臣之家为奴。樊明德之师杨集虽已身故，仍被"起棺戮尸"。其他教内骨干或处绞，或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②] 樊明德的再传弟子刘松等人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充军。[③] 樊明德的弟子王怀玉父子闻讯逃往江南。[④]

经过乾隆四十年这次打击，混元教受到严重摧残，重要教首、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此后，混元教徒又在樊明德弟子王怀玉、王法僧父子及王怀玉之徒刘松等名义下，继续活动。乾隆四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怀玉、王法僧父子在逃往江南的途中，来到河南阜阳县瓦店集的一座空庙中歇息。王怀玉令王法僧到附近集上购买食物充饥，恰与同教王文进相遇。王文进先于四月二十五日逃来阜阳县仵明集，假称"犯赌逃出"，先投在同教刘锐处，后在亲戚处帮工度日。是日在瓦店集与王法僧相遇，便一同去见王怀玉。王怀玉亦与刘锐熟识，此时因缺盘费，即令其子王法僧与王文进同至刘锐处告贷。途中又与同教之段永年相遇，一同至刘锐家中。时值天晚，即同在刘锐家中留宿。次日清晨，王法僧、王文地、段永年等即被阜阳县差役拿获。他们是否被刘锐告密，史料中未提及，故难悬测。在庙中等候的王怀玉闻讯即行逃逸。经审讯，王法僧因仅只"随父烧香"，即判以边远充军，[⑤]发往甘肃隆德，与王怀玉之徒刘松"间壁居住"。[⑥] 乾隆四十二年，丁洪度之徒田恒业见樊明德之案已结，丁洪度在逃未归，遂欲自任教首，兴教敛钱。可是混元教之经卷已于乾隆四十年破案时被搜毁无存，只记得《上大尺》等歌诀，只能借此传徒。《上大人》歌词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摘引如下："上大人，生中国，戊己土，人不知。山东曲阜来下世，领定三千徒弟子，内有七十二贤士。燕南赵北埋名字，落贫家人人不晓，到后来，大势动，一齐收拾。丘己，孔圣人，燕南祖，度众生，临凡下世三转姓，三心地上收乡子。……"这段歌词的中心内容，是宣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上大人"即

---

① 《朱批奏折》河南按察使荣柱折，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八日。

② 《朱批奏折》河南按察使荣柱折，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八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南巡抚徐绩折，乾隆四十年五月廿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南巡抚徐绩折，乾隆四十年五月廿八日。

⑤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徐绩折，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初九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陕甘总督勒保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初六日。

指"孔圣人",说他生于中国的山东曲阜,有三千名弟子,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他为了"度众生"而临凡下世,并且"三转姓"。他本来是古佛即儒童菩萨,"二转为孔丘夫子,三转为弥勒教主"。[①] 也就是说孔夫子为了拯救世人而临凡,转世为弥勒佛。最后达到"三阳开泰"和"万教收元"的境界。除《上大人》歌外,田恒业还利用佛教四生六道,生死轮回之说,编一"轮回苦"歌:"轮回苦,是胎生,骆驼象马。说骆驼象马,也曾为人,皆只为,耳听了妄言造语无明世,贬到他骡马群中。无昼夜,站槽头,何人来问到天明;遭鞭打,埋怨何人?这就是头一道轮回之苦,说与伶俐人,牢记心中。轮回苦,是卵生,鸡禽燕雀。说鸡禽和燕雀,也曾为人。皆只为,眼观了花红柳绿无明世,贬他到燕雀群中。无昼夜,站树梢,何人来问?遭严霜,打身体,埋怨何人?这就是第二道轮回之苦,说与伶俐人,牢记心中。轮回苦,是湿生,鱼鳖鳅蟹,说鱼鳖和鳅蟹,也曾为人。皆只为,鼻闻了分外香臭无明世,贬到他鱼鳖鳅蟹,无昼夜,串湖海,何人来问?到冬来,封了河,埋怨何人?这就是第三道轮回之苦,说与伶俐人,牢记心中。轮回苦,是化生,蚊蝠蛆虫。说蚊蝠和蛆虫,也曾为人。皆只为,口谈了人恶是非无明世,贬到他蚊蝠蛆虫。到夏来,串草坡,何人来问?清早生,晚上死,埋怨何人?这就是,第四道轮回之苦,说与伶俐人,牢记在心。"这首歌词是利用佛教四生六道,生死轮回的说教,劝人早日信教。还有一首歌词,在教内颇为流行。"奉母亲命祖完篇,安天立地总收缘。替佛完结立后世,真经母子保团圆。"(原注:此歌王仲等人会唱)"大道分明在人身,迷人不知向外寻。南里北里求福寿,各朝名山枉费心。福寿不知从天降,求真还是访明人。为人不惺天命性,总修万年不出尘。"田恒业担心仅传授歌词,难以服众,遂假称河南同教王怀玉道行甚高,侯子钦知其下落。即于是年二月内,带教徒朱继祖前往河南找到侯子钦,因王怀玉一直逃亡在外,故未能得见,田恒业便把钱交给侯子钦,约他来自己家中上供,以期借其名声,抬高自己身价,便于招人。同年三月初一日,侯子钦来到田恒业家中,田恒业即拜侯子钦为"老师傅"。当时还有同教的朱继祖等人,也各出钱数十文,来到田恒业家中,一同上供。乾隆四十三年,一直逃亡在外的丁洪度回到安徽亳州家乡,也欲兴教敛钱。先后传邓成林等人为徒,约定每逢三月初三日、六月初六日、九月初九日及十二月初八日,在同教家中做会,每人出钱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按察使富尼善折,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折中所附手抄本经卷。

数十文至百文,交丁洪度收受。丁洪度再派邓成林等送往侯子钦家。丁洪度在传徒时,也唱有《上大人》歌诀。乾隆四十七年,混元教受到山东吴克己清水教一案之牵连,再次受到打击。是年六月,清水教内崔廷珍等人被捕后供出河南永城县陈中礼曾教习拳棒。当局遂将陈中礼拿获,陈中礼又供称:"从前听得亳州人丁洪度说,鹿邑县王怀玉是活佛。王怀玉在侯子钦家住,我拜丁洪度为师,丁洪度引我至鹿邑县见过侯子钦。"[①]咨文到达安徽后,亳县地方当局随即将丁洪度拿获。但丁洪度仅承认系丁洪奇之堂兄,一同入过教。丁洪奇故后,自己便"悔过自新"。与永城县陈中礼虽然认识,但并未拜他为师,也未见过王怀玉与侯子钦。清吏认为丁洪度所供"悉系狡供,全不足信"。[②] 但因没有更多线索,也无法深究。

此后,混元教徒不断进行复教活动。乾隆五十一年,田恒业之胞弟田恒实纠人复教。田恒实原名田恒时,原籍安徽亳州,住居河南永城县。其兄田恒业当年传教时,他常常在旁听唱歌词。其兄犯案后,田恒实仅"杖枷发落",获释后务农为业。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他"贫苦无聊",又见邻人多患时症,遂欲借治病为名,复教敛钱。当时,混元教一再被查拿禁止,无人敢信,便改称"儒门教"。田恒实传授歌诀为:"清清凉凉栋梁材,翻三五四正午年,大家都到龙华会,等候佛法保周全。"此乃混元教原有之歌诀,早在乾隆四十九年李百禄传阮沉入教时已传有此歌诀,但语句稍有不同。李百禄所传为:"清清凉凉栋梁材,翻三舞四正五年,大家都等龙华会,后嗣福发保周全。"他向徒众宣称:每日念诵三次,望空礼拜,即可消灾获福,长保安全。先后招得亳州人康惠、刘全同及在永城种地之安徽亳州人李善如等人入教。[③] 同年五月,田恒实犯案被拿。

乾隆五十三年以后,被发配在甘肃隆德配所的刘松,又与其徒刘之协秘密进行复教活动。混元教在樊明德故后,其徒王怀玉成了樊明德嫡传弟子中仅有的一位幸存者,故被教内尊为"老教主"。在这次混元教复教活动中,王怀玉的弟子刘松与刘松的弟子刘之协起了重要作用。刘之协是安徽省太和县原香集人,生于乾隆五年,曾以做"棉花买卖"和贩卖花布等经商活动为掩护,秘密从事传教活动。关于刘之协的师承关系,因史料记载多有歧义,故尚难做最后定论。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十一辑,安徽巡抚谭尚忠折,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十一辑,安徽巡抚谭尚忠折,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③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六十辑,河南巡抚毕沅折,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刘之协本人自称是太和县李伯禄之徒。[①] 而李伯禄则称刘之协乃他的师傅。也有史料说刘之协的师傅是王怀玉。[②] 刘松则自称曾收刘之协为徒。[③] 从各种史料分析，以刘之协系刘松之徒一说比较可信。乾隆四十年混元教破案后，刘松未将刘之协供出，使之幸免于难。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刘之协来到甘肃隆德配所探望，与刘松商议复教之事。他们感到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必须另立教名，才能吸引徒众，遂将混元教改名"三阳教"，将所诵《混元点经化》改名《三阳了道经》，把"灵文"改称"口诀"，但仍沿用混元教之咒语"清清凉凉栋梁材，翻三四五正午年，大家都到龙华会，候者佛法保周全。"[④]刘之协恐怕此举仍不能"动众"，又与刘松商议，寻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假称系"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相约刘之协传徒敛得之钱，俱先送至刘松处收存，凑成总数后"再为分用"。刘松因系"军犯"，恐在配所传教无人信从，又易于破案，遂令刘之协另往别省招收徒众。[⑤] 刘之协在各地传徒时声称，凡入其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并传授经咒："从离灵山失迷家，住在娑婆苦痛煞，无生老母抄书信，特来请你大归家。"[⑥]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刘之协传湖北襄阳人宋之清为徒。宋之清在此之前，已经拜宋文高为师入姚应彩之三益教。因三益教在教义中仅提到"将来弥勒佛转世掌教，有水火瘟疫诸灾，念经尊奉方可躲避"，尚无政治内容。而刘松、刘之协所传三阳教，则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乃"弥勒佛转世"，将要"保辅牛八"，不仅有复明的政治色彩，而且弥勒佛转世已非遥远的未来，而是近在眼前，因而更加具有吸引力。宋之清遂又拜刘之协为师入三阳教，并且一同到甘肃隆德配所去看望"老教首"刘松。之后，宋之清又先后传齐林、伍公美、王学陇等人入教，并把敛得的根基钱经过刘之协送给刘松收存，[⑦]自乾隆五十四年到五十六年，共送给刘松白银二千多两。[⑧] 每逢送到银两，刘松便用黄表纸一张，对天烧化，口念灵文、经

---

① 《剿捕档》嘉庆五年八月，刘之协供词。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阿桂等折，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十六日。

③ 《朱批奏折》陕甘总督勒保折，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廿九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安徽巡抚陈用敷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⑤ 《朱批奏折》大学士阿桂等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⑥ 《剿捕档》嘉庆五年八月初七日，刘之协供单。

⑦ 《朱批奏折》大学士阿桂等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安徽巡抚陈用敷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句，为出银之人“消灾”。① 宋之清于所传之徒日益增多以后，便不肯再将敛得的“根基钱”送给刘之协与刘松。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借口刘之协未曾让牛八同他见面，乃是对他的诓骗，于是便另立“西天大乘教”，不再把根基钱转送刘之协与刘松。声称“弥勒佛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才能躲避灾难。宋之清另立新教之后，为了寻找精神支柱，又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称他乃是“真弥勒佛转世”，又称“李三瞎子之子名叫卯金刀，小名卯儿，将来必定大贵”。并把他在此之前所传徒弟如齐林、伍公美等人，皆拉入新教。刘之协对此甚为不满，遂于乾隆五十七年三月来至刘松配所，“告述前情”，并邀同刘四儿前往襄阳，与宋之清“理论”。在争辩时，宋之清毫不示弱。他称“刘四儿不像弥勒佛”，“李三瞎子才是真弥勒佛，现在黄沙盖面，等时运一到，眼目就开”。并说以前刘之协所说“牛八”乃是“虚词哄骗”，反劝刘四儿归入他的西天大乘教。刘四儿当然不肯，便回到甘肃隆德去了。刘之协未能辩倒宋之清，仍不甘心，便回到安徽太和县杨家集，找到王廷章及其侄王双喜儿，打算让王双喜儿充当“牛八”，以资号召。那么王双喜儿究竟是什么人呢？刘之协为什么又要让他充当“牛八”呢？原来王双喜儿乃是老教主王怀玉的侄孙，刘之协欲利用王双喜儿这个地位，再去同宋之清“争教”。王双喜儿与王廷章在乾隆四十年混元教破案、其祖王怀玉逃亡之后，便来到安徽，王廷章改名刘胜洲，其兄改名刘胜传，王双喜儿改名刘成儿。他们在被捕之初，仍然以改后之姓名招供。王双喜儿供：“我是亳州人，本姓刘，名叫成儿，今年十五岁。父亲刘胜传已故，这刘胜洲是我胞叔。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内，我才十二岁，刘之协与叔叔说明要带我出门学生意，叔叔应允。刘之协于二月内叫我跟他到甘肃去，走到路上，刘之协告诉我说，到甘肃见刘松时，只谎说名叫王双喜儿，若依他的话，骗得钱文，要替我做衣服，与我好东西吃。走到甘肃一个老头家，说是姓刘。他问我什么名字，刘之协代应说，这就是王双喜。他们说有人来磕头，只叫我打坐，不许说话。随后陆续有人来叩头，我与刘之协、刘松俱端坐不动。每人给刘之协们几十文至百文不等。刘之协又把我领回，由湖广地方回家，至五十八年方回到家里。我把刘之协叫我捏名王双喜磕头骗钱缘由，向我叔叔刘胜洲告知，叔叔就向刘之协不依说，伊不该改名骗钱，要五十两银子。刘之协只给了银十两，钱五千，他就出门去了。”

① 《朱批奏折》大学士阿桂等人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刘胜洲也供："我是亳州人，今年四十二岁。这王双喜本名刘成儿，是我胞兄刘胜传的儿子。我哥哥、嫂子已故，我就收留养他。……乾隆五十七年正月里，刘之协叫我入他的教，我给他一百文钱，他教我清清凉凉栋梁材口诀。后来刘之协要带刘成儿出去学生意，我应允，将刘成儿交与刘之协带了出去。刘之协替他改名王双喜，至五十八年才回来。我侄儿将刘之协替他改名骗钱的事向我告诉，我就不依，向刘之协要五十两银子，刘之协只给我银十两，钱五千。"[①]实际上，王双喜儿、刘胜洲（王廷章）在乾隆六十年被捕时的供词，俱是伪供，隐瞒了他们与老教主王怀玉之间的关系。清朝官员当时也被他们骗过了，以为王双喜儿确是刘成儿，王廷章确是刘胜洲。直到20年以后，即嘉庆二十年，才真相大白。据与当年同刘胜洲等同时传教的阮朋龄供称："王双喜即刘成儿，他本是教首王怀玉之侄孙，本系河南人。伊叔刘胜洲因王怀玉案内逃往安徽，改为刘姓。王双喜同去，就取名刘成儿。后来，伊叔刘胜洲受刘之协银十两，钱五千，将刘成儿给刘之协作为义子，仍名王双喜，谎充教首王怀玉之亲孙，以便惑众敛钱。"又说："王双喜即刘成儿，并非刘姓改为王姓，他是王法僧的堂侄。"[②]王双喜本人也供称："我今年三十四岁，原籍河南鹿邑县人。父母早故，跟我叔父搬在安徽。十二岁时，我叔父刘胜洲将我给刘之协作义子，后经犯案，将我同我叔父刘胜洲一齐发遣至黑龙江。""我记得我八九岁时，有人带我往甘肃省我叔父王法僧那里去过一次。"[③]以上史料说明刘之协之所以到安徽太和县找到王双喜并让他充当"牛八"，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早就知道王双喜乃是老教主王怀玉的侄孙，他企图利用王双喜这种身份，作为与宋之清"争教"的资本。关于王双喜的真实身份，刘松本人也是清楚的。据教内张百四称：王怀玉于乾隆四十年混元教破案时，曾设法脱逃，其子王法僧被捕后充军发配。王家因王怀玉无嗣，"即将伊二兄之子小王三过继，生王双喜，迁居安徽太和县原香集阮沉家种地。及小王三病故，王双喜即跟伊叔小王四即王廷章度日，是本教小教主，教内人亦俱称伊为牛八。刘松曾经寄信给阮沉等，令教内各徒众好为照应"。[④] 从这件史料可以知道，乾隆五十三年，刘之协与刘松在甘肃隆德配所商议复教时，打算觅一幼童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王双喜儿、刘胜洲供词，乾隆六十年二月。

② 《朱批奏折》特依顺保折，嘉庆二十年九月初二日。

③ 《朱批奏折》特依顺保折，嘉庆二十年九月初二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南巡抚阿精阿折，乾隆三十年闰二月初六日。

捏名牛八，实际上他们心里早有打算，他们要找的幼童，实际上就是王怀玉的侄孙王双喜。所以刘之协不去他处，而径赴安徽太和县王廷章处寻找王双喜，并非偶然巧遇，而是事先有明确目的的。刘松专门寄信给阮沉，让他好好照应王双喜儿，也是因为王双喜是老教主王怀玉的侄孙。刘之协原以为有了老教主王怀玉侄孙王双喜儿这个资本，一定可以使宋之清折服。于是于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从甘肃隆德出发，前往湖北襄阳，去找宋之清。后因得到王怀玉本人还在河南的消息，便准备径赴河南舞阳去迎接王怀玉。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刘之协令教徒张珍给王廷章即刘胜洲 5000 文钱，让他把王双喜带到河南舞阳，去迎接"老教主"。[1] 刘之协又寄信给阮沉及其侄阮明龄等，"约定四月内撑船到舞阳县北舞渡地方，迎接老师傅王怀玉"。[2] 但届期阮沉等在舞阳并未接到王怀玉，仅迎到刘起荣，这是因为发生了意外。阮沉是刘之协的堂弟，刘之协在襄阳交给他 200 两银子，让他到舞阳后把银子交给阮明龄。在二人交接银子时，被差役发现，向刘起荣追问银子的来历。刘起荣因该银两系教内攒凑的未敢直言，遂被公差拿了。恰巧在河南扶沟地方发生窃案，移咨舞阳县，称扶沟县有客民谢万山被船户所劫，且银数亦为二百两，船户亦系刘姓，遂将刘起荣等解赴扶沟质讯。到扶沟后，刘起荣又改供，称所带银两系族兄刘之协托他购买棉布之用。当时刘之协已回太和，扶沟县遂移咨太和，将刘之协"关提赴质"。[3] 刘之协被押解到扶沟后，住在该县南关柳添祥客店内。恰好当时阮臣（沉）、郭彦忠也来到扶沟。名义上阮臣是来看望侄儿阮明龄，但郭彦忠为什么也来此处呢？看来，很可能是专门来向刘之协通风报信的。十月十五日，郭彦忠趁到县前换钱之机，与刘之协会面，向他悄声说："刘松在甘肃隆德县因邪教案发，将我们供出，行文查拿。"[4]刘之协闻说，甚为惊慌，随即乘机逃走。其后，便在新野一带同教家中藏匿。嘉庆二年十月，他曾到湖北起义军张汉潮营里，见过姚之富等人。在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爆发后，刘之协因"怕地方官查拿"，而在河南南部"隐姓埋名"。[5] 清朝当局后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故意夸大了刘之协在川楚陕白莲教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王双喜儿、刘胜洲供单。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阮沉等供词。

③ 《朱批奏折》苏陵阿折，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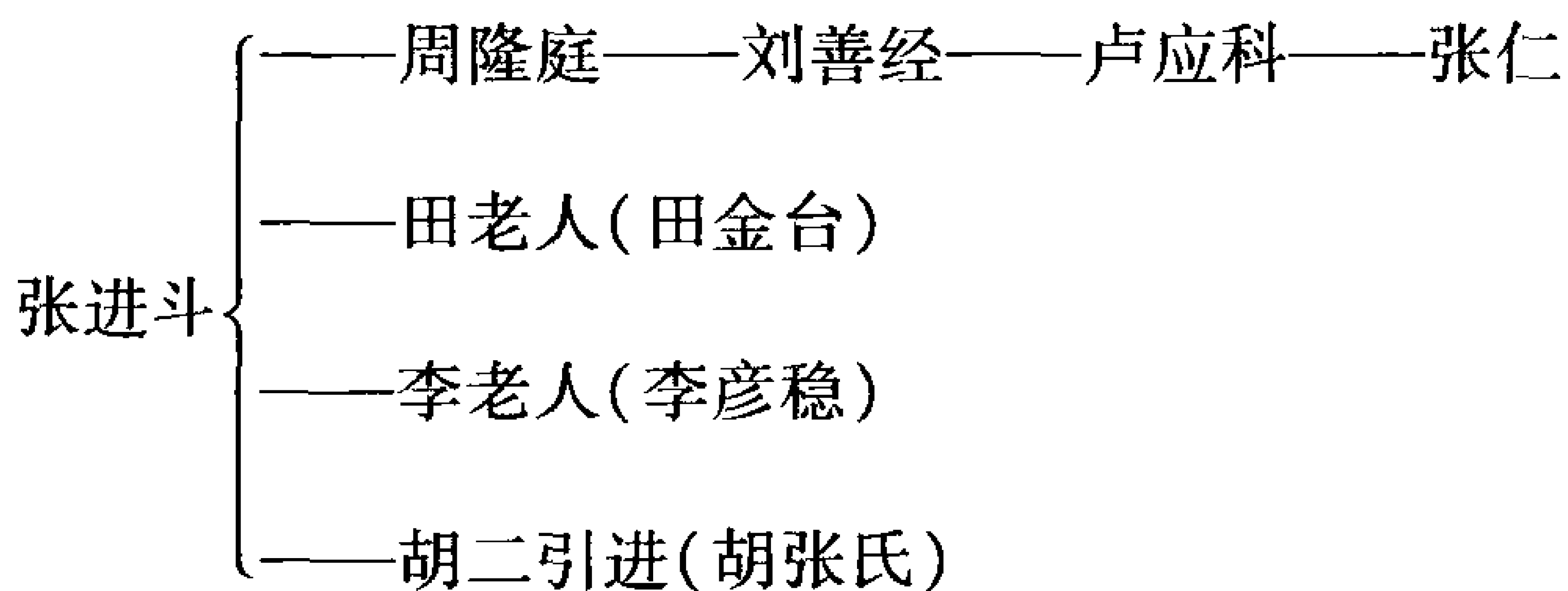
④ 《剿捕档》刘之协供词。

⑤ 《剿捕档》刘之协供词。

起义中的作用。[1]

三、周隆庭等人所传收元教

张进斗生前除传王奉禄入教外，还曾传山西长治县周隆庭、李彦稳（即李老人）和长子县田良村人田金台即田老人等为徒。其中周隆庭又传壶关县人刘善经为徒，刘善经又传卢应科为徒。田金台又传直隶沙河县胡二引进即胡张氏为徒。据山西巡抚胡宝瑔奏："李老人及周清水之父周隆庭、胡二引进等，皆系山西已正法张进斗之徒。周隆庭传刘善经，刘善经传卢应科，卢应科传张仁之弟张义，因传张仁，此豫省之来由也。"[2]当时张进斗所传的秘密教门支派，师承关系并不十分严格，有的徒弟又拜其师祖为师，如"张仁系卢应科之徒，卢应科系山西壶关人刘善经之徒，刘善经系长治县人周清水父周隆庭之徒。周隆庭与同县民李彦稳及已故田老人，俱系已正法张进斗之徒。其直隶沙河县胡二引进即胡张氏又系田老人之徒。均属一教流传，因而各通声气，张仁又曾拜李彦稳为师。"[3]从张进斗传教谱系来看，张仁已是第五代传人，卢应科是第四代传人，刘善经是第三代传人，李彦稳是第二代传人。可是，张仁又拜第二代李彦稳为师。



由于收元教的师承关系不十分严格，故胡张氏既是张进斗之徒，又是田金台之徒。张仁既拜卢应科为师，又拜李彦稳为师。

乾隆年间，胡张氏与张仁在传习收元教方面，起了较大作用。胡张氏即胡二引进是直隶沙河县人，其夫胡大即胡宗是河南顺德府人。乾隆五年七月，胡张氏与父张寅来到山西潞安府田良（梁）村，见到田老人即田金台，拜其为师，田

---

① 许曾重等：《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起义中作用的考察》，见《清史论丛》第2辑。

②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胡宝瑔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③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胡宝瑔折，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老人传给坐功。乾隆七年，田金台因直隶收元教破案受到牵连，被捕发遣，于乾隆十一年病故。田金台故后，胡张氏以田金台之徒周三亦系田金台之徒，且"自幼吃斋，说话最妙"，便捏称周三乃田金台之"后身"，作为收元教之教首。不久，胡张氏之父张寅病故，其夫胡大便送胡张氏到北京，住在西直门外螺蛳坑朱魁家中，以为人治病消灾为名，传教收徒。又将张文建认为义子，改名胡文保。在周三故后，胡张氏又恐教内之人分散，便又捏称周三的"灵光"已入了胡文保的身上。又捏称山西的周隆庭为"活佛"，李彦稳为"李老君"，借以传徒敛钱。[1]张仁是河南省开封府洧川县人，为李彦稳之徒。乾隆十八年，张仁将收元教改称"荣华会"，收徒王五钧、闫玉、柳兴林、孟教友等人。张仁编有《教考五更》等歌词，声言诵习者可以消灾。并称"明年不定日期，有七日七夜天昏地黑。入会之人给药一丸，含于舌下，即不为灾"。并自称家中藏有"缺角金镶印信"。[2] 乾隆二十一年张仁犯案被捕。捕前，他将会内事务托付其徒王五钧掌管。王五钧又传李存智、王文、王章、靳百成等人入荣华会，共敛钱二百余两，暗中送给狱中的张仁使用。同年十二月，张仁被判处"拟绞监候"。为了设法减刑，张仁写信给王五钧，令他将传徒所得之银钱及所卖粮食、瓷器所得之银共 1100 两，用来托其师李彦稳代寻门路，设法为己减刑。王五钧即令师弟闫玉往山西寻找林县人郝玉凤，引他到李彦稳家，托其代为"打点"。李彦稳初未应允，后经郝玉凤转托周清水(周三之兄)帮助从旁劝说，才答应代为垫银 450 两，并与周清水联名写信一封，由闫玉带往直隶沙河，寻找胡张氏与胡文保，央她在京时寻找门路，为张仁减刑。胡张氏表面应承，实际上却欲借此骗钱。王五钧托闫玉把银子送到李彦稳家后，李除扣下所垫 450 两外，还扣下 50 两作为利息。胡张氏收到李彦稳送来的银两后，胡文保谎称已经托人，但需银 1800 两。秘密教门的信徒表面上虔诚信神，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李彦稳、胡张氏等利用张仁托人减刑进行敲诈勒索一事，充分暴露了秘密教门这一本质。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胡张氏与胡文保、闫玉去河南，在离省城一百多里的路上，遇见张仁被押解上省。闫玉将解役支开，张仁对胡张氏母子说："我现今犯了官司，闻得你在京行道，认识人多，才烦闫玉接你来商量，央你上京寻找门路。"并向胡张氏密传歌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南巡抚胡宝瑔折所附胡张氏供词，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四日。

②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梁肯堂折，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诀:"新天新地新乾坤,新人新书新星辰,新人新象新时辰,新人新世新长人。"说完用手指自己鼻子说:"这就是我张公。"①同年四月,张仁秋审回来,在洧川县东关遇见教内赵子信等,让他们帮写合同。张仁写有两个草稿,一个是四句:"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担,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射箭到长安。"系暗指收元教的四个教首。首句指山西长治县的周清水,次句指长治县李老人即李彦稳,三句指直隶沙河县胡张氏,末句指张仁自己。② 另一个是八句:"辛金立天差,牛祖落瑶池,庚金一去隐大道,虎奔山林万人迷。庚金回来乙木换,鱼龙变化人不知,戊土养成麒麟子,木虎山前把榜题。"其内容中包含张仁的"八字",张仁系辛丑年、庚寅月、庚辰日、戊寅时所生。每句藏一个字,头两句是说他原是佛祖,第三、四句说他现在不好,第五、六句是指他想脱罪出来成佛作祖,第七句是说他自家说戊土是麒麟,第八句中"把榜题",是说要表扬搭救他的人。③ 但是,张仁这一切努力均未奏效,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末被处斩并"戮尸示众"。张仁一案牵连到的教首周清水、李彦稳、胡张氏等,皆被拿获处死。④ 清吏在张仁一案中,搜获收元教持诵的一批经卷,计有:《皇极宝卷》、《十佛了道》、《灵机显露》、《三阳应劫》、《十佛临回》等。⑤ 张仁、王五钧犯案以后,其徒等继续传习收元教。张仁之徒王五钧曾传徒孙士谦,孙士谦又传徒徐国泰。⑥ 乾隆二十二年,张仁、王五钧案发后,孙士谦被"问拟杖罪",其弟孙士信及徒徐国泰漏网脱逃。孙士信从乾隆二十三年起自号"真人",与任洪均、徐佩等借传徒"骗钱惑众",旋在河南裕州被拿。其兄孙仕谦则以"知情不首"之罪,再次被捕,二人皆被处以"枷号游示"。孙士谦于枷号途中,将其师祖张仁所传经卷及推背图,授予徐国泰收藏,嘱令事后再传徒行教。孙士谦弟兄二人在枷号游行至河南泌阳地方,先后病故。⑦ 乾隆二十八年,徐国泰见事已宁息,便欲兴复旧教。恰好这时同教徐珮也已徒满回籍,遂与之商议复教之事,徐珮答应帮助。徐国泰将张

① 《胡张氏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梁肯堂折,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南巡抚胡宝瑔折所附赵子信供词,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④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梁肯堂折,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⑤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胡宝瑔折,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⑥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阿思哈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⑦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阿思哈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仁、王五钧所传荣华会又改称收元教。将其师孙士谦传给他的经卷,捏称系张仁、王五钧等所给。并称张仁等人“俱已转世在京,其书中之言悉皆应验”,借以招引徒众。同入其教者,皆须磕头立誓,并传给“十字经”,即“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与“八字真言”即“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以及张仁所编咒语“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担,十口和同西江月,开弓射箭到长安”。[1] 徐国泰先后招得潭思阮、冯恺为徒,徐珮招得陈中伊等共15人入教,于三月二十五日在家中设立神像,烧香传徒。谭思阮等人皆送给徐国泰160至1000余文不等,皆由徐国泰、徐珮二人分用。其后,徐国泰又因卖画进京,在京中购得烟袋、荷包等物,带回后分给徒众,捏称系进京探望张仁时,张仁令他带给众人之物。其徒众受其愚弄,对他更加信服,各“诚心奉教”。徐国泰也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钱文。乾隆三十年,徐国泰又在河南泌阳县收李文振为徒。李文振“素无恒业”,向与其表甥张成功一起生活。乾隆三十年二月,李文振经陈中舜介绍,拜徐国泰为师入收元教。乾隆三十二年,徐国泰闻知清政府派兵征缅甸,忆及《推背图》内有“鼠尾牛头”字句,遂编造“戊子、己丑天下大乱”之语,诈称系张仁等从前所作,预先已知乾隆三十三、三十四年有滇省用兵之事,以表明该教之神奇功能。又编出“言午在中原,月月上下连,十佛来住世,超度女共男”,借以招引更多的人入教。[2] 乾隆三十四年冬,徐国泰之徒李文振又将收元教改称“收元荣华会”,于次年三月十五日正式“开教”,有梅正行等多人入教,由李文振向众人传授“十字真经”。[3] 从乾隆三十二年起,徐国泰开始把收元教从河南推向湖北。是年,徐国泰的表弟、湖北枣阳人李从呼与钟祥县人、当地罗教教首叶正远来至徐国泰处“访问教术”。徐国泰即将所编歌词给二人阅看,并劝令归教。二人入教后,徐国泰又派遣教内过永城携带“邪书”同申廷赞等人,随同李从呼前往湖北传教,让他们“盟誓取信,给出传抄”。[4] 李从呼回到湖北后,于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招得孙贵远入教。孙贵远住在湖北襄阳、枣阳两县交界地区,靠石匠为生。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孙贵远在李从呼家中钻磨。李从呼对他说,如

①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阿思哈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②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阿思哈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③ 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收元教及其支派》,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三卷,第4期。

④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阿思哈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信奉收元教,吃斋念经,可以消灾免祸。孙贵远便送给李从呼钱百文,拜师入教,李从呼遂传授孙贵远"南无天元太宝阿弥陀佛"及"十门有道一口传"等咒语。又把徐国泰所传《九莲》、《苦难》、《五女传道》等经书各一本,咒语单一纸给孙贵远带回,让他劝人入教,以便赚钱。[①]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收元教在河南被破获,徐国泰、徐珮等一批教首、骨干在许州、汝阳等处被捕。经审讯,徐国泰被凌迟处死,徐珮等 3 人处斩。这次案件波及祥符、陈留、洧川、尉氏、鄢陵、通许、新郑、舞阳、郾城、遂平、西平、安阳等地,大量教徒被捕。[②] 孙贵远闻知徐国泰等人被捕之讯,即将经卷、咒语收藏。李从呼在湖北被捕后,未将孙贵远供出,使孙贵远得以幸免,仍赴各处靠石匠手艺为生,但不敢传教收徒。乾隆四十九年冬,孙贵远因穷苦难度,忆及从前李从呼曾告诉他传徒可以赚钱,又故智复萌。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孙贵远路过素识之王易荣家,进内叙谈,对王易荣说,入收元教吃斋念经,可以消灾获福。王易荣即拜孙贵远为师入教,孙贵远传给教内"十字真经"及咒语,让他每日念诵。次日又送给王易荣三本经书及咒语单,让他抄录,劝人入教。后来,孙贵远又传萧允题、李尚德、姚应彩等人为徒,王易荣也传彭永升为徒,彭永升又转传詹正林、刘起荣、詹世贵等 18 人入教,詹正林又传严黄氏入教。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一日,严黄氏之子严正邦外出归家,闻知其母被诱入教,即同詹正林吵闹,结果被襄阳县知县张睿闻知,会同枣阳县进行查拿。孙贵远、王易荣等 26 人先后被捕。经审讯,孙贵远被凌迟处死,王易荣则被处斩。教徒姚应彩、刘起荣、詹世贵等人被杖 100,枷号两个月。[③] 收元教通过姚应彩、宋之清、萧贵、孙赐俸等人的活动,又从湖北北部、西北部传入陕西南部与四川东部。姚应彩是湖北省枣阳县鹰架山人,乾隆五十年因孙贵远犯案受到牵连,被枷号两个月。获释后因畏惧而未敢继续传徒,在家耕种度日。后因患病,不能力作,遂以制卖膏药度日,其招牌名为"三益堂"。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姚应彩因生意萧条,贫苦难度,又欲借传徒来敛钱。他恐当地之人皆知其原系收元教,曾被枷号而不肯信从,遂以其卖膏药时所用"三益堂"之名号为教名,称"三益教"。三益教初创时,仅有姚应彩嫂嫂前夫之子、僧彻傅及其胞弟姚添福等人听从入教。姚应彩沿袭收元教之教规、教义,声言入其教后可以消灾

①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特成额折,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②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阿思哈折,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③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特成额折,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获福，令其徒众诚心诵念“十字真经”及“十门有道一口传”等咒语。姚应彩在本地传教很不顺利，当地人都知道三益教所传咒语实系收元教的咒语，已经“奉文查禁”，因而很少有人教者。他只得前往河南新野一带借卖膏药为掩护，暗中传教。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姚应彩于赶集时，与素识之王太青、刘正坤等相遇，即劝令二人入教，总算传到两个徒弟。后来，又住在素识之余能家中，收余能为徒，向他传授咒语，让他早晚诵念，称每逢朔望对空烧香磕头，自己可以免灾，还可为别人治病。同年年底，姚应彩回湖北家乡过年，次年年初又来到新野，仍住在余能家中。适因余能邻居宋文高之母臂痛，延请姚应彩为之医治，宋文高即拜姚文彩为师入教。乾隆五十四年宋文高之族兄宋之清来到河南新野，宋文高向他述及自己拜姚应彩为师入三益教，素习经咒。并称将来弥勒佛转世掌教，有水火瘟疫诸灾，只有念经尊奉，方能躲避。宋之清求其传授，并送给宋文高“根基钱”。宋文高即传给咒语“十门有道一口传”，又给他《灵文》一本，内有“五魔下降”及“八大金刚”等句，还给他一本《太阳经》。宋文高令宋之清每季出给香资转送姚应彩处“供佛升丹”。[1] 宋之清又传宋显功、高成功等为徒。同年二月，宋之清又听从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之劝说，入混元教（此事详见本章混元教部分）。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因同刘之协争教，又自立“西天大乘教”，声称将来弥勒佛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才能躲避灾难。当时有湖北人齐林、宋相、李成贵、张添美、薛国玺等 5 人拜宋之清为师入教。宋之清令众人各自收徒，“不拘何处，四季升丹，各出银钱，交伊使用”。齐林收伍公美、王秉富 2 人为徒，伍公美收樊学鸣为徒，樊学鸣又收萧之周、萧贵等 9 人为徒。萧贵又把西天大乘教带到了陕西安康。[2] 萧贵是湖北襄阳人，于乾隆四十一年来到陕西安康县滔河地方种地为生。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其妻弟樊学鸣来到安康看望。适值当地流行天花，樊学鸣欲借替人烧香拜佛免灾之机，传徒骗钱。不久即被当地官府发觉查拿，解省枷责，然后递解回原籍湖北，此后他即未敢再赴陕西传徒。乾隆五十七年六月，萧贵回至湖北襄阳探望，樊学鸣告诉他，有同县人伍公美、宋之清等正传习西天大乘教，将来有五魔下降及水火诸劫，必须尊奉弥勒佛，烧香念经，方能躲避。萧贵即央樊学鸣引他入西天大乘教。樊学鸣令萧贵立誓，并出根基银一两，把他带到同教王之兆家，用黄纸开写姓名，望空拜佛，念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广总督福宁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广总督福宁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经焚化，名为“打丹”。又授给他《太阳经》及灵文合同二本，并向他“粗为讲解”，然后又带萧贵至宋之清家中见面。宋之清嘱咐萧贵说，《太阳经》可以随便给人看，而灵文合同必须慎重传授。樊学鸣又嘱令萧贵，以后传徒所得“根基钱”，须先送到他家，然后再由他转送宋之清处“供佛消灾”。[①] 乾隆五十八年三月，萧贵抄得经卷、灵文，回到陕西安康，欲借以传徒敛钱。他先后邀得平日相好之萧正杰、张大用、薛文斌等6人，传授为徒。萧正杰等各出根基钱七八钱至一两，在萧贵家中发誓“打丹”。不久，萧贵又邀得孙赐奉即孙老五入教，并抄写经卷，分给萧正杰等各一本。其后，萧贵又传梁得成等为徒，孙赐奉又传韩陇为徒，并同兄孙赐富等人，一同打丹念经。萧贵本人又在陕西传徒一百多人。[②]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萧贵、萧正杰等人在陕西安康县滔河地方被捕。萧贵供出其教传自妻弟樊学鸣，樊学鸣被捕后，当局又拿获了宋之清及同教尊为弥勒佛的残疾幼童刘喜狗儿和齐林等18人。[③]

收元教又经过湖北西北部房县一带传入四川东部。这一任务主要是通过孙贵远之徒王应琥和艾秀所完成的。王应琥是湖北监利县人，迁居房县。其父王全与好友艾秀，俱系孙贵远之徒。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王全因艾秀熟悉教内经咒，遂令其子王应琥拜艾秀为师。艾秀传给王应琥偈经一本，内载：“正德四年三月初八日，神传黄龙山黄二女，收在宝藏库内，但等牛八来掌教，并弥勒佛掌教，七日七夜黑风黑雨”等语。声言“习此经咒，尊奉弥勒，即是龙华会上之人，可免三灾八难”。此外还传授他合同、灵文及《太阳经》一本。王全故后，王应琥“贫无聊赖”，于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同其师艾秀商议“兴教骗钱”，声称“弥勒佛转生河南无影山张家，扶助牛八即朱姓起事，百姓要遭水火风三灾，念经可免”，借此招人入教。先后收廖芳等7人为徒，并令其各自传徒升丹，送给银钱。嘱咐教徒说，牛八等语系哄人谎词，原属“教内秘密”，不可轻易泄露。廖芳即将经文抄录，并转传唐名科、王义等10人为徒。王义又收胡胖子等10人为徒，胡胖子又收王大烈等12人为徒，王大烈又转传湖北竹溪人陈金玉为徒，陈金玉又把西天大乘教传进四川。[④]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陈金玉来到四川大宁县红线

①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秦承恩折，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②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秦承恩折，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③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毕沅等折，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十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广总督福宁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岩，遇见该处谢添绣，向他传授"灵文"与"观音祖师"等语。灵文主要有"八大金刚将，哪吒揭谛神"等等。陈金玉称，学习此灵文、经咒，将来可以免灾难。谢添绣即送他根基钱三钱，拜陈金玉为师。陈金玉告诉谢添绣，"凡入教之人，先令过愿，传给灵文，后与升丹。"所谓升丹，系指将姓名、籍贯写在黄纸之上，向空焚化，亦称"打丹"。所谓过愿，系指发誓学习此教，并且做到"上不漏师，下不漏徒，中不漏自身"。又告诉谢添绣说，"将来到了下元甲子，百姓遭水火风三灾，弥勒佛转世，现已生在河南无影山张家，要保牛八起事，牛八即系朱字。入教之人出了根基银两，遇到劫数，都能免难。如今河南、陕西的人，多有学习此教的"。又说，河南有张、高、薛、梅、梁、孟、丁、萧八姓，称为"八大功祖"。①

从西天大乘教的教义来看，它已带有浓厚的叛逆性与反清的政治色彩，因此遭到清朝当局大规模镇压。乾隆五十九年，清政府开始在湖北、四川、陕西等省，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实际上是收元教与混元教），王应琥、胡胖子、王大烈、陈金玉等人纷纷落网。不久，湖北襄阳的西天大乘教首领宋之清及骨干樊学鸣、伍公美、齐林等也先后被捕，遂激起了川楚陕的白莲教大起义。

① 《朱批奏折》福康安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廿八日。

第十三章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1]

乾隆后期,秘密教门已经发展成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省的混元教(后称三阳教)和收元教(其中一支称西天大乘教)的力量尤为强大。这些秘密教门已不再仅仅以"消灾祈福",或回归"真空家乡"相号召,而是加入了许多政治性内容和一些直接涉及下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世俗性口号。因此,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一次秘密教门的反清斗争,而实际上已成了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利用秘密教门的组织与力量,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九年,遍及五省。清廷为了镇压这次起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因此,被历史学家视为清帝国由强盛转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一、起义的原因和社会背景

从乾隆下半期起,清帝国历时百年的"康乾盛世"已经结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正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一)阶级矛盾的激化

乾隆后半期阶级矛盾的激化,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统治阶级的腐朽。乾隆皇帝对其父、祖遗留下来的财富,大肆挥霍。他下令在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离宫别苑,耗费了大量财富。他的两次南巡,尽管有一定政治作用,但也是借此机会游山玩水,耗费各地大量民脂民膏。每当其母皇太后过生日,也要求文武官员进行献纳,地方官更趁此机会利用搜刮来的钱财借以邀宠。乾隆四十二年,乾隆皇帝曾为其母铸了一座"藏发塔",

① 嘉庆初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实际上是由混元教与收元教所发动。因历史上均称之为白莲教起义,本书亦沿用此称呼。

仅用去黄金就达三千多两。

其次，各级官吏的贪污之风也十分盛行。乾隆朝最著名的权臣和珅，大肆招权纳贿，嘉庆四年被抄家时，其财产折合白银达八亿两以上。在和珅的纵容、包庇之下，文武官员贪赃枉法之事，层出不穷。地方督抚大吏中，如国泰、王亶望、伍拉纳、李侍尧、浦霖等被惩处的官员中，每人被抄查的家产都在数十万两以上。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一般地主、富商们的奢侈胃口，大大加重了对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剥削。四川、陕西等省的农民，甚至把收获的六七成交给地主。高利贷者又利用农民青黄不接时的拮据处境，进行高利盘剥。地主也利用各种机会，大肆兼并土地，使许多自耕农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成为佃农。乾隆朝人口的激增，又加剧了农村土地问题的矛盾，大批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来到川楚陕老林地区垦荒谋生。

（二）川楚陕老林地区的移民和社会环境

嘉庆初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最早酝酿在河南、湖北，逐渐深入到川楚陕老林地区，在当地移民中进行传教活动。

川楚陕老林地区，包括南山老林与巴山老林，通称“南巴老林”，是我国著名的原始森林地区之一。南山老林主要包括：陕西的略阳、凤县、宝鸡、郿县、周至、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及湖北的郧西等县；巴山老林主要包括陕西的宁羌（今宁强）、褒城、紫阳、安康、平利，四川的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及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兴山、保康等县。[①] 老林地区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②] 居民大多系来自外省的移民。“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从历史记载来看，早在雍正初年，已不断有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省的移民，进入老林地区。[③] 到乾隆中叶，更形成高潮。仅陕西兴安州所辖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在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便有大批来自河南、江西、安徽等省的移民，“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造

---

① 卓秉恬：《川陕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编：《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一。

③ 《东华录》卷十二。

成当地人口“骤增至十余万”。[1] 因而兴安由州升府。所以，在老林地区的居民，大多为外来移民。“江、广、黔、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数以百万计。”[2]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大。

移民们背井离乡，前来老林地区谋生，往往要遭受巨大的艰难困苦，他们大多“扶老携幼，千百成群”，踏上前来老林的旅途。在途中，为了逃避官府的阻拦，他们“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到老林后，“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土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3]老林中的租佃关系，也同于内地其他各省。地主“视地之高下，田之肥饶为准”，向佃户收租。有的“与佃户平分租谷”，有的“主四客六”，有的“主六客四”。[4] 移民们进入老林以后，不但要受山里地主的剥削，还受到来自山外的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山外客民携资本入山内”，对移民举放高利贷。“山民最朴，入市交易，所欠债项由客民滚算。如春间限至秋还，秋后则限至明年收麦之时，过期以利息并入”。倘若移民无力偿还，“则以土地为质，而非己有，客民以此致富者多”。[5]

移民们还要遭受官吏、差役、兵弁的欺凌。“讼棍勾结差役，无风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附合为奸。”[6]许多移民因不堪地主的剥削，便到老林中木厢或各种“厂”中去当雇佣工人。“种地之外，多资木厢、盐厂、铁厂、煤厂，佣工为生。”[7]木厢或各厂里的劳动条件极为艰苦，劳动强度极大。木厢工人要到山林中去背运“枋板”。“计枋板一块，重二、三百斤，上下峻坂之中，厂人号曰某骡子。实则骡亦不逮矣。但不能远行，日不过三、四十里，亦不赶歇店，自带铜锅、干粮，结队宿岩屋、树阴之中”。[8] 在四川盐井中背盐的雇工，也极为艰辛。“开县温汤井所用夫匠，水陆运煤及商贩运背之从，井旺时日以万计。其盐行至

---

① 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
② 卓秉恬：《川陕老林情形亟宜区处》。
③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④ 光绪《定远厅志》卷五，“地理志”。
⑤ 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
⑥ 光绪《定远宁志》卷五，“地理志”。
⑦ 卓秉恬：《川陕老林情形亟宜区处》。
⑧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太平及定远、紫阳南境。背用木架,盐用竹篾包安架上,以背负之。撑手有丁字木棒,小憩用木棒撑架,遭雨水辄不能行。”“所负重常二百四十斤,包高出肩背,上重下轻。石崎树角,偶一失足,坠陡坡深涧,是人毙包烂。此等自食其力之夫,极勤且苦,所获仅足糊口。”①

移民们在来到老林之前,曾对老林的生活充满幻想,以为到老林后,便可以丰衣足食,过上平安、富裕的生活。而来老林后,面对这一切严酷的现实和他们经受的种种遭遇,使他们原来所憧憬的美好生活,皆成泡影。绝望中的移民们,便成了秘密教门流传、发展的群众基础。进入老林地区的秘密教门首领、骨干们,正是利用移民们的不幸遭遇和绝望心理,向他们宣称,如今已经是红阳劫末,将有水火刀兵诸厄,入教之后,便可以消灾免厄,死后不堕地狱,来世还可托生好人。又针对移民们所处艰难环境,孤单无援和命运前途未卜的心态,在传教时又增加了许多世俗内容。提出“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② “从教者先送供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赀财,悉以均分。”③“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④这种乌托邦式的说教,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而使秘密教门得以在老林地区的移民中,迅速传播开来。进入老林地区的秘密教门,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希望借助于这股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的,造反夺取政权。他们提出,“换乾坤,换世界”,及“弥勒佛降生,保辅牛八”等政治口号,终于酿成了历时九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三)乾隆朝对教门传教活动加大打击力度

经过雍正年间的有效治理,秘密教门的活动有所收敛,但是,到了乾隆前半期,各种教门又开始大量涌现,如乾隆六年直隶发现“清净无为教”,乾隆十一年陕西发现“四正香教”和“拜祖教”、“大乘教”,湖北发现弥勒教。同年发现云南张保太大乘教的支派法船教,“妄言历代兴衰、气运劫数”,内容“悖逆显然”。另一支派铁船教教首苏君贤声称将要辅佐朱洪生(也称朱牛八,即明朝后裔的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②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一,《记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③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平安教区总论》。

④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指称)起事。还有一支瘟船教教首陈雪峰,公开宣称如今该弥勒佛管天下,皇帝是李开花,他将来要做其军师。乾隆帝断定该教并非一般传习邪教,而是“谋逆”案件,遂下令将教首张晓等7人照“谋逆”律凌迟处死。在处理这起案件中,发现了大量教门的经卷,清廷下令将这些“逆书”全部查出销毁。其后,又相继发现了多起教门案件,特别是教门活动已经由秘密的“谋逆”发展为公开的造反,给了乾隆皇帝以强烈的震撼,导致了当局对教门打击、惩处的加重。

首先是以“谋逆”重律来处理教门案件。对于公开造反或造反未遂者,一律按照“谋叛”之罪严厉打击。如对老官斋教起义、王伦起义等,皆以武力坚决镇压;对于查获有“悖逆”内容的经书或咒语,立即彻底究查,也以“谋逆”论处。乾隆二十八年直隶万全县查获黄天教一案,查出经卷、符箓、字迹、木戳等,不仅将已故多年的该教创始人普明、普光尸骨挖出,投弃城外车道,寸磔扬灰,而且将碧天寺和明光塔夷为平地,将普明二女、外孙女、侄元孙李蔚等亦同样戮尸。事后,直隶、河南、山西再将案由告示通谕,“凡有收藏普明所遗经卷者,勒限一年,准其自首,令地方官即行销毁,以绝邪妄之萌,以开自新之路”,限后一经发觉,即从重治罪。对涉案的李继印等也照谋逆案严加惩处,许多人被凌迟处死。乾隆三十七年王中清水教一案,因查出教徒李孟秉所传逆书内有“平明不出刘周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乾隆发现“明”字系由“胡”字补改而成,因此把此案由一般“传习邪教、邪书”案件,提高为“谋逆”重案,加以严惩。特别是最后因为从教内骨干家中搜出的“无名邪书”内发现有“走肖木易卯金刀来争战”、“贼星八牛火焚幽燕”以及“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等句,被认为“悖逆之极”,不仅把李孟秉严加惩治,而且把涉案的该教教首王忠和刘省过等皆以“谋大逆”之罪,“斩立决”,其兄弟眷属皆给功臣为奴,刘姓近亲发遣新疆。

其次,对查证确实没有“谋逆”内容的一般习教案件,也加重了惩处力度。如居住漕运水手的罗教庵堂,雍正朝仅将庵堂改为公所,不许住在庵堂的水手信奉罗教,水手仍可在内居住。而乾隆则下令将罗教庵堂彻底平毁,连拆下来的房屋木料也没收入官。

第三,对于一些慈善性教门也加以取缔,如一些由寡妇参加的红阳教,主要从事为人医治疾病,并未危害社会,也未威胁到清政权,但也遭到打击。又如山西临汾桥梁会首胡关氏、胡冒思夫妇,平日替人念经治病,召集被医治好的男女教徒分别念经。届时各人自带粮米,食后所剩用来补路修桥。乾隆十七年以

“防微杜渐”为由，也加以禁止。

由于对教门活动不断加强打击力度，官员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政绩以便得到升迁，往往乱捕滥杀，甚至借打击教门活动趁机勒索，终于导致嘉庆初年的五省教门大起义。

二、起义的筹划与准备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具体筹划与准备工作，主要是襄阳地区以宋之清及其弟子齐林、姚之富等为首的西天大乘教和湖北西北部以王应琥等为首的收元教进行的。混元教在起义准备过程中，由于教首刘松尚在甘肃隆德配所，另一教首刘之协逃匿在河南新野一带隐姓埋名，不敢露面，因而未起大的作用。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湖北各地西天大乘教教首们商定于“辰年辰月辰日”即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在各地同时举义。为此，教首们又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向教徒们宣称：山西平阳府乐阳县王家庄长春观有个李犬儿，是戊戌年生的，左右两手有日月两字纹，凤眼龙睛，相貌异人。刘之协是军师，朱九桃是辅佐他的臣子。王家庄向有一块大石，一日忽然迸开，现出一篇经文，内有“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推山，血流成河”四句。凡是念熟了这几句经文者，就可免得灾难。“李犬儿到辰年辰月辰日就要起手，若有人制备枪刀火药接应他去，将来事成定有好处。”[①]各地教徒们在上述说法鼓舞下，纷纷行动起来，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

白莲教的迅速传播及其准备武装起义的活动，引起了清朝当局的关注。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陕西巡抚秦承恩首先查获陕西安康一带萧贵等人的传教活动，逮捕了为首的萧贵、萧正杰等5人及教徒张大用等67人，搜获太阳经、灵文、合同等经卷。[②] 与此同时，四川总督福康安也发现四川大宁谢添绣等人的习教活动，并拿获谢添绣、谢添福、萧太、谢添明等9人。[③] 乾隆皇帝接到秦承恩、福康安的奏折后，立即发出“上谕”，令各省督抚对习教者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张正谟供词。

②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秦承恩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廿九日。

③ 《朱批奏折》四川总督福康安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体缉拿,务将案内各犯全数拿来,毋使一名漏网"。① 于是,在陕西、四川、湖北、河南、安徽、甘肃等省,开始对白莲教进行大规模搜捕。在湖北省方面,地方官根据四川大宁县谢添绣等人所供出的线索,于七月二十四日在竹溪县混沌沟地方将西天大乘教的胡胖子、陈金玉等拿获。② 接着,又根据陕西安康萧贵等人所供线索,在襄阳逮捕了西天大乘教教首宋之清及教内骨干樊学鸣、伍公美、齐林等18人,及一般教徒44人,共62人。又在郧阳府及房县、竹溪、竹山、咸丰、来凤等县逮捕了陈樊等50人,一共捕获112人。③ 九月十一日,又在房县獐落河石岭沟地方,捕获收元教教首王应琥、王应凤等21人。④ 在河南方面,当局则根据四川、湖北被捕者供出的线索,逮捕了西天大乘教的重要骨干宋显功、高成功、张思瑶及李三瞎子等51人。九月下旬,清吏又在甘肃隆德配所对老教首刘松加以审讯,刘松供出自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八年,曾有刘之协、宋之清等人曾先后六次来配所探望,并送银两。清吏遂在刘松所住炕下,搜出瓷缸一个,起出白银2000两。十月初六日,又将刘松之子刘四儿捕获,与刘松一同解赴湖北候审。在解至甘肃会宁地方,突接嘉庆帝命令,将刘松、刘四儿于该处就地处决。⑤ 在清朝当局大规模搜捕白莲教的过程中,各地官吏趁机对群众敲诈勒索,大饱私囊。他们"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⑥ 湖北武昌府知府常丹葵,"素以虐民为事"。他在荆州、宜昌等地搜捕教徒时,更是殃及无辜。"凡衙署寺庙,关锁全满。内除富家,吓索无算。及赤贫者按名取结,各令纳钱若干释放。其有少得供据者,立予惨刑,至以大铁钉钉人掌于壁上。"⑦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令衙役挨户搜查。"习教之人,无不遭其诈索",以致"民怨沸腾"。⑧

白莲教本来已经在积极筹划起义,而清朝当局大肆搜捕白莲教徒,官吏、差

---

① 《上谕档》,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②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毕沅折,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十八日。
③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毕沅折,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④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毕沅折,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⑤ 《朱批奏折》陕甘总督勒保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廿五日。
⑥ 《清仁宗实录》卷七十二,嘉庆五年八月乙丑。
⑦ 《清史稿》卷二一六,列传一四三,"谷际岐传"。
⑧ 《清仁宗实录》卷七十二,嘉庆五年八月壬子。

役们的敲诈勒索，更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终于引发了这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斗争。

三、湖北教徒首举义旗

乾隆五十九年，清朝当局通过各地对白莲教徒的搜捕、镇压，使西天大乘教、三阳教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主要教首如宋之清、王应琥、刘松、齐林、樊学鸣、伍公美、萧贵、谢添绣、韩陇等均已被捕杀。在四川方面，仅有骨干薛国玺、廖芳、孙赐俸、萧泳题、冉文俦等尚存；在湖北方面则仅有齐林的妻子王聪儿，弟子姚之富及张汉潮、高均德、樊人杰、王廷诏等。他们为了替牺牲的教首们报仇并完成其遗愿，积极进行起义的各种准备工作。

乾隆六十年四月，湖北宜都一带的首领张正谟、刘盛才等，组织教徒们购买硝磺，准备制造火药，打造兵器。同年八月，张正谟从长阳回到宜都，令教内之人准备刀枪火药。[①] 年末，襄阳地区的姚之富、姚文学父子来到房县、竹山、竹溪一带，组织教徒准备武装起义。并用书信通知各地教首说："来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②]十二月三十日，襄阳的"王掌柜"来到来凤县，要求该处教首胡正中、杨子敖于嘉庆元年二月十五日举兵。[③] 与此同时，宜都的刘盛才又到南漳、保康、施南、宜昌、郧阳一带分投纠人，以便到枝江帮助张正谟。在枝江、宜都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以防备湖南苗民起义为掩护，制造兵器，囤积粮食，缝制红、白布帽。[④] 嘉庆元年正月初八日，张正谟从长阳带领几百人来到枝江，向教内人宣称："劫数将到"，凡入教的人分为上下、文武两班。竹溪、房县、保康各处为"上头武仙"；枝江、宜都、宜昌为"下头文仙"。三月劫数一到，武仙与文仙会齐，杀人无数。只见头戴白布号帽，身上带有黄绫符帖，就晓得同教的人，可以免难。[⑤] 张正谟等人的活动，很快为官府所侦知，只得提前举事。张正谟以聂杰人"家道稍裕，房屋宽

---

① 《向瑶明供词》。本章所引供词，均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

② 《陈德本供词》。

③ 《胡正中供词》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北巡抚惠龄折，嘉庆元年正月十五日。

⑤ 《聂杰人供词》。

大"，且地处僻静之处，遂把各处前来参加起义者，安置在聂杰人家中，推聂杰人为名义上的首领。正月初十日，官府前来聂杰人处查拿，张正谟便率众拒捕，起义就此爆发。张正谟向众人宣布，"先抢了枝江、宜都县城，夺了荆州，直到襄阳，再往河南内乡县保护李犬儿成事"。[1] 正月十三日，张正谟、聂杰人等来到江家垱，同先期来此的刘盛鸣、张宗文会合，共聚集了一万多人，并且从各处运来许多粮食与火药。后因见该处地势不够险要，难以防守，又转移到灌湾脑。枝江、宜都起义打响后，湖北各地白莲教徒们纷纷起而响应。嘉庆元年正月末，东湖县教首闫正鼎、周凡彬等，闻知聂杰人、张正谟已经起义，便组织了六七百人前去帮助。二月初八日，东湖县的另一教首陈德本也集合了七百多人，在该县宋家咀地方起义，于十四日来到当阳县城下，在城内教徒熊道成等人接应下，于十五日攻下当阳县城。次日，安远县教首杨起元率众赶到，同各处起义军会合，共有数千人，把当阳知县黄仁处死。杨起元自称元帅，把队伍分为五营。枝江、宜都起义爆发后，长阳县教首林之华，与来自房县的张驯龙率领教徒在该县榔坪起义，并率领两三千人，欲往枝江、宜都去援助张正谟。这支起义队伍还立有"天运"年号，并设置军师、都督、先锋等称号。二月十五日，来凤教首杨子敖、胡正中纠人在小坳的唐贵家中"祭刀起事"。两三天之内，已聚有二三万人，并攻破来凤县城。后因该处难以防守，而旗鼓寨的田谷敦已在该处率部起义，杨子敖、胡正中遂前去与之会合。二月十四日，姚文学与曾世兴起义，占据湖北西北部的保康县城，姚文学自称都督，曾世兴任元帅。于是附近的竹山、竹溪、房县等地教徒，也纷纷举兵起义。竹山、竹溪一带以吴名山、翁名远为首，房县以石魁、温见道为首。在湖北各地白莲教纷纷起义以后，襄阳地区的王聪儿、姚之富亦率领众教徒按照原来约定的计划，于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在襄阳附近的黄龙垱起义，聚有一万余人，于三月二十九日，焚烧吕堰驿。四月初，攻樊城不下，渡河攻打襄阳县城。清朝当局对湖北各地白莲教起义甚为震惊。陕甘、湖广、四川等省的督抚大吏，纷纷出动，对起义军进行镇压。由陕甘总督宜绵负责剿办郧西一带的起义军；湖广总督毕沅、荆州将军成德、头等侍卫舒亮等负责剿办当阳、远安、东湖一带的起义军；湖北巡抚惠龄、总兵富志那负责剿办枝江、宜都一带的起义军；头等侍卫鄂辉等负责剿办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一带的起义军。

---

① 《向瑶明供词》。

由都统明亮“总统湖北诸军”。另外,又调直隶古北口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率兵两千,又赦免在湖北、河南的蒙古“窃马谪犯”,将其编为骑兵,与上述各路清军协同作战。

湖北各地白莲教起义,对清统治者虽然构成很大威胁,但因各地起义军之间,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在战略上又被动地据守县城或山寨,消极防御,因而使清廷得以从容地调兵遣将,对各地起义军实行各个击破。结果,湖北的各支起义军,在不长的时间内,便相继失败了。嘉庆元年二月,枝江起义军因首领聂杰人投降而削弱。四月,竹山、竹溪被清军永保、恒瑞部攻占,两处起义军皆溃散。五月,房县、保康起义军兵败,首领曾士兴、祁中耀被俘。四月,孝感一带的起义军,也被明亮所部消灭。六月十九日,当阳起义军首领杨起元被清军奸细杀害。七月十二日当阳县城失陷,首领陈德本被俘。七月十六日,来凤起义军占据的旗鼓寨失陷,首领唐贵、田谷敦被俘。二十八日,杨子敖受伤被俘。八月二十七日,枝江城破,张正谟投降,所部瓦解。只有以张驯龙、林之华为首的长阳起义军坚持到了嘉庆二年年底,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襄阳起义军,由湖北转战四川、陕西等省,其主力坚持到嘉庆三年初。在湖北各支起义军中以襄阳起义军力量最强,取得的战果也最大。

清朝当局从嘉庆元年四月起,便集中力量来围攻襄阳起义军。王聪儿、姚之富率众在襄阳一带转战了五个月以后,于同年八月来到钟祥,队伍发展到四五万人。[①] 清军一直尾随其后,并且把钟祥四面包围。八月下旬,王聪儿等率众突围北上,于九月到达襄阳东北的双沟,然后兵分两路,向河南挺进,一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从枣阳进入河南,到达唐县;一路由张汉潮率领,由白河西进,经吕堰驿到达河南邓州。嘉庆二年二月,襄阳起义军的两路又在河南唐县附近的滹坨镇会合,然后又分成三路,开始流动作战。一路由王廷诏、高均德率领,从河南桐柏出发,先围叶县之保安驿,又围清军于裕州,再经叶县进入陕西商雒的镇安。一路由李全、樊人杰率领,也由桐柏出发,进兵信阳。三月又折返湖北,来至应州(今应山县)、随州(今随县)。不久,又重返河南,经信阳、确山,沿楚豫边境到达淅州、卢氏、内乡,又由武关进入陕西,在镇安与王廷诏一路会合。主力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从桐柏出发,经南阳、嵩县,进入陕西、湖北边

---

① 《湖北通志》卷六十九,《武备志》七、兵事三,教匪一。

境地带的山阳，后又折回湖北境内的郧西、孝义，最后又进入陕西，于嘉庆二年五月与另外两支队伍会师于陕西镇安。襄阳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边界地带进行分散、流动性作战，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战术灵活，不固守一城一池。行进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①]使清军捉摸不定，难以集中兵力对付他们。起义军经过之处，白莲教徒们又纷纷起而响应。"楚豫两省习教之犯，处处皆有。只以畏惧官兵，未敢出而从逆。一经贼兵逼胁招邀，千百为群，一呼而至"。[②] 襄阳起义军在流动作战过程中，因各地教徒的不断加入，其力量日益壮大。加上他们在老林地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当地信徒不断加入，力量得到壮大。加之起义军对地形、路径十分熟悉，各地清军只能尾随其后，疲于奔命。清军将领们哀叹："贼人生长此地，凡有捷径小路，无不熟悉。往往官兵探明贼踪，直前攻击，贼已闻风预从他处逃逸。不但兵力徒劳，且使迎剿之兵，转成尾随之势"。[③] 另外，各地清军将领们，为了保存实力，也尽量避免同起义军作战，大多观望避战，民谣中讽刺说："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及"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方出现"。[④]

襄阳起义军的三支队伍在陕西镇安会合后，又沿汉江北岸，经洵阳、安康到达汉江上游的紫阳县。五月十二日在该县白马石浅滩渡过汉江。由惠龄指挥的清军，一直在追赶襄阳起义军，但在到达汉江北岸时，起义军早已过江七八天了。嘉庆帝闻奏，大为光火说："贼匪于十二日偷渡，惠龄等于十九日始到白马石，相距已有八日之久。贼匪陆续偷渡，岂有八日不能渡毕之理！"因而革去惠龄总统军务之职。襄阳起义军在渡过汉江之后，又分兵三路，越过大巴山，进入四川。

四、起义在川楚陕诸省的发展

嘉庆元年九月以后，四川各地白莲教纷纷举行起义，响应湖北白莲教的斗争。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②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惠龄等奏，嘉庆二年正月十七日。

③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惠龄等折，嘉庆二年正月十七日。

④ 《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壬申。

川东北的达州、东乡一带，与湖北郧西等地相近，该处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冷天禄、徐添德等人，皆系湖北西天大乘教孙赐俸之徒。他们在闻知湖北各地教徒起义的消息后，便积极进行准备。嘉庆元年九月，四川白莲教起义的炮声，便首先在达州打响。达州白莲教首领徐添德是该地亭子铺人，“世业农，尝充本州役，缘事革职”。嘉庆元年六、七月间，他便着手为起义做准备，“整衣粮造器械”。旋为乡约发觉，禀报官府。徐添德见官府查拿紧急，便与弟徐添寿及同教之王登廷、张泳寿、赵麻花等人，于九月十五日纠集同教之人，在亭子铺举行起义，“旬日间有众万人”。[①] 九月二十一日，东乡（今宣汉）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冷天禄等率领教徒和百姓七八千人，在该县莲池沟起义，次日到达达州之丰城。十月，徐添德之兄徐添富率众起于太平县之城口。[②] 十二月，王三槐与徐添德攻打东乡县城，于二十九日将县城攻占，杀死知县张宁阳。四川白莲教起义的消息传到陕西南部，那里的教徒们也纷纷起义。嘉庆二年十一月，陕西兴安府安康县冯得仕起于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于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于安岭，胡知和、廖明万等起于汝、洞二河。[③] 同年十二月，四川巴州罗其清与其弟罗其书及苟文明、鲜大川等起于巴州的方山坪。通江的冉文俦及其侄冉天元等，起于该县王家寨。太平县的龙绍周、徐万富、龚建等，起于南津关。清廷见四川、陕西各地白莲教纷纷起义，便命令陕甘总督宜绵率师入川，总统川省军务。

四川各地的白莲教起义军，也带有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分散性弱点。他们同湖北各地的白莲教起义军一样，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在战略上固守山寨、城镇，很快即被清军各个击破。嘉庆二年二月，陕甘总督宜绵来至东乡，王三槐、徐添德等退据金峨寺、香炉坪、重石子一带。不久，孙赐俸也率众从太平来此会合。五月，王三槐被包围在香炉坪，突围时孙赐俸牺牲，使起义军失去了一位有威望的首领。王三槐与冷天禄、徐添德等逃至东乡之中河。正在危机之时，恰好湖北襄阳起义军从通江县竹峪关来到此处，使东乡起义军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湖北起义军与四川起义军在东乡会师了。王聪儿、姚之富率军驻守南天洞，李全、徐添德、王三槐等驻于温汤井，起义队伍“分屯山冈，延亘三十余

① 石香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一，“蜀述”。

② 《四川通志》卷八十二，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

③ 《四川通志》卷八十二，武备志，武功“平定教匪”。

里”,[①]甚为壮观。

东乡会师的主要成果,是对湖北、四川两支起义军进行统一编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中,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一支称“襄阳黄号”,主要骨干有王光祖、樊人杰、伍金柱、辛聪、曾之秀、齐国谟、王廷诏等;以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的一支称“襄阳白号”,骨干有宋国富、杨开甲、高二、高三、马五、杨开弟等;以张汉潮为首的一支,称“襄阳蓝号”,骨干有李潮、李槐、冉学胜、胡明远等。四川起义军中,以徐添德为首的一支称“达州青号”,骨干有徐添寿、赵麻花、汪瀛等;以王三槐、冷天禄为首的一支称“东乡白号”,骨干有张子聪、庹向瑶、符日明等;以龙绍周为首的一支称“太平黄号”,骨干有唐大信、龚建、徐万富等;以罗其清为首的一支称“巴州白号”,骨干有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以冉文俦、冉天元为首的一支,称“通江蓝号”,骨干有冉天泗、王士虎等。此外,还有以林亮功为首的云阳月蓝号,骨干有林定相、张长更等;以龚文玉为首的奉节线号,骨干有龚其位、卜三聘、陈得俸等。[②] 东乡会师并未使四川、湖北各支起义队伍联合起来,更未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与口号,各股起义队伍之间,除短暂的协同作战外,仍独立行动,各自为战。有的首领甚至为了本地区和小团体利益,拒绝同其他起义队伍联合。东乡会师后,襄阳黄号的王聪儿、姚之富曾向东乡白号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结果遭到王三槐的拒绝。他认为“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教他们湖北的人来糟蹋”,“大家分散,便于逃走”。[③] 遂率部向通江、巴州一带转移。襄阳起义军只好留李全、樊人杰、王光祖等人在四川,王聪儿、姚之富则率领主力,返回湖北。由于两支当时最强大的起义队伍未能联合行动,其他各支也都各自分散活动。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襄阳黄号,从嘉庆二年七月初,由东乡出发,经过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再顺长江东下,进入湖北。前队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约有两万余人,由兴山北上,攻保康、南漳一带。后队以王廷诏为首,约一万余人,经远安、当阳转而北上,至南漳与前队会合。九月,起义军来到襄阳,那里清军防守严密,只得又转向西北方面,经房县、竹山,进入陕西南部,准备渡过汉水,挺进关中。汉水南岸清军防守坚固,只得沿汉水西行,来到安康。十月,原先留在四川的李全一股,也从川东北来到陕西南部,在安康同王聪儿、姚之富会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②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一,《记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③ 《王三槐供词》。

合，然后一同在陕西的平利、镇坪、安康、洵阳、紫阳、石泉一带活动。十二月，襄阳黄号来到汉中西面，欲渡过汉水北上。因清军在这里设有重兵，王聪儿、姚之富便把清将德楞泰引至宁羌、广元一带，使高均德一股乘势渡汉水成功。德楞泰发现中计，遂弃王聪儿一股，而往汉中去追赶高均德。王聪儿这时又率两万人来到西乡、洋县一带，再翻越秦岭，来到宝鸡，向东攻打鄠县、周至，直取西安，其中李全一股甚至已攻至西安附近的焦安镇。这个出其不意的军事行动，造成"全陕震动"，陕西巡抚秦承恩急忙回救西安。起义军在西安附近同清军总兵王文雄一军激战失利，首领王士奇战死，余部败回。王聪儿、姚之富在清军追击下，折向陕西东南，在山阳一带再次受挫，只得且战且退。嘉庆三年三月，王聪儿、姚之富率众进入湖北郧西，在山岔河被清军、乡勇包围在山沟之内，进退不得。王聪儿与姚之富与十数骨干爬上卸花坡山梁，最后跳崖牺牲，起义军七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被俘。

王聪儿一支覆没以后，襄阳起义军虽然还有李全、高均德等骨干，同四川的阮正隆一股，聚集在陕西的镇安、山阳一带活动。但是总的看来，襄阳起义军从此便一蹶不振了。从嘉庆三年起，白莲教起义军的主战场已转移到四川。四川的起义军中，比较强大的，有以徐添德为首的达州青号，以王三槐、冷天禄为首的东乡白号，以冉文俦、冉天元为首的通江蓝号及以罗其清为首的巴州白号。湖北起义军的余部在李全、高均德率领下，也在四川活动。在川东北的东乡白号与达州青号，曾经接连获胜。嘉庆三年初，清军把林亮功的云阳月蓝号包围在白岩山，形势十分危急。东乡白号与达州青号闻讯立即前往救援，与清军大战于云阳、开县之间，切断了清军自重庆到川东的粮运通道，使包围白岩山的清军得不到粮食补充而难以支持。林亮功率部突围，并同东乡白号合攻开县。接着，东乡白号又在太平县金盆池大败清军总兵朱射斗。但这时对起义军来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王三槐因惑于南充知县刘清廉吏的名声，被清军统帅勒保用计诱擒，解京后处死，东乡白号遭到重大损失，在冷天禄率领下，继续抗击清军。通江蓝号与巴州白号，于嘉庆三年五月占据了川北营山县的箕山，襄阳黄号的王廷诏、白号的高均德、张添伦与达州青号的徐添德等，皆来此会合。清将德楞泰率部前来，双方于六月间在此进行了一场激战。九月，罗其清被清军诱下山应战，结果中计战败，与王廷诏、李全转移至大鹏山。十月，清军又以四路来攻，罗其清再败而退至方家坪。十二月初，罗其清兵溃被俘。冉文俦也率通

江蓝号退守通江，在脂麻坝修筑寨门等工事。除夕，清军三路来攻，冉文俦执旗率众突围，不幸中枪牺牲，四川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

嘉庆四年初，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帝真正掌握了帝国的实权，对各种弊端着手进行整顿。他首先罢黜了权臣和珅，铲除了他的党羽，从而改变了以往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军务皆由和珅及其亲信调度指挥的状况；其次，任用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豫、甘五省军务，并且撤换了一批无能的将领，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第三，在军事上推行"坚壁清野"和"剿抚兼施"的策略，来对付白莲教起义军。

从起义主力方面来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战略中汲取了前一段因固守山寨、城镇而被动挨打的教训，采用流动作战的办法，同清军周旋。在战斗中以战养战，逐渐恢复了元气。起义军中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将领，如谯诚、颜中考、方文祥、冉天元、王衍、罗丰年、雷罗榜、张纪、李尧辅、于纲等。[1]

嘉庆四年上半年，起义军主要在三个战场上同清军战斗。

川东战场

达州青号徐添德一支，由垫江向南攻打长寿、涪州，然后又向北攻打开县，后因遇清军阻击而绕道攻打太平。包正洪与张子聪一支，进攻邻水。冷天禄一支，从忠州转向西北方向，攻打大竹，后被清将额勒登保追至岳池，旋于广安人头堰中箭牺牲。五月，川东各股会合于开县、东乡之间，决定进入川陕老林地区。一部分在太平、大宁的巴山老林活动，一部分在川陕边境南山老林地区游弋。

甘肃、川北战场

嘉庆四年四月，杨开甲、张士龙一股进入甘肃阶州（今武都），一度深入到巩昌（今陇西）、会宁地区。后来又在秦州（今天水）、成县、徽县、两当一带流动作战。六月，杨开甲一股在白水抢渡嘉陵江，来到陕西略阳。张士龙部一度同杨开甲分开，后来又合兵一处，进入川北。

陕南、楚西战场

嘉庆四年上半年，湖北起义军的张汉潮与张天伦，主要活动在陕西南部。其中张汉潮部最初在陕甘边境的徽县、凤县一带，后来进入陕南的镇安、商州，

---

①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一〇七，福宁折，嘉庆四年六月十二日。

又越过秦岭，到达关中的蓝田。张天伦部由陕南的平利，进入湖北的竹溪。高均德、樊人杰先在陕南的紫阳一带活动，后来也准备回到湖北。经过半年多的较量，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战略，逐渐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嘉庆皇帝对起义军在川、楚、陕、甘等省往来穿行，十分恼火。他把责任全部归之于勒保，将他革去五省经略大臣之职，改由额勒登保继任，以德楞泰为参赞大臣。

额勒登保上任后，推行了两项打击白莲教起义军的策略。一是拟把起义军引出老林，再驱赶到川北，加以消灭；二是加紧推行坚壁清野之策，以断绝起义军的粮食供给和人员补充。

十月，襄阳蓝号首领张汉潮战死，余部由陕西返回四川的通江、南江一带。十一月，高均德、冉天元等欲在陕西紫阳、西乡一带抢渡汉江北上，高均德兵败被俘，余部也返回四川。十二月，冉天元一部挺进到苍溪一带，被额勒登保包围。双方在此进行了一场激战，起义军大胜，击毙清军副将以下将弁 24 人，额勒登保只得向嘉庆帝请罪。嘉庆五年正月十五日，冉天元率领各股起义军，趁清军官兵欢度元宵节，疏于防守之机，在定远县抢渡嘉陵江成功，进入四川腹地的遂宁、西充、苍溪一带。在高院场一役中，将清川北镇总兵朱射斗击毙。接着，冉天元又与徐万富、陈得俸、汪瀛等股，与清将德楞泰大战于江油县境内的马蹄岗。冉天元用伏兵将清军包围，双方激战竟夜，清兵大部溃散，清将德楞泰身边仅剩数十名亲兵，以为必死。但起义军突然受到团练头目罗思举所率乡勇的攻击，加之冉天元战马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使起义军转胜为败。余部由张子聪、汪瀛等带领，由剑州南下，在射洪县智渡潼河，插入"川西完善腹地"，迫使清朝当局宣布省城成都戒严。嘉庆帝闻讯大惊，命令四川总督魁伦自尽，重新起用勒保，由他继任四川总督。

起义军经过这场战役，又兵分两路。一路在川西牵制清军，一路由射洪、盐亭、阆中，沿嘉陵江上游，前往甘肃的阶州、岷州，同那里的起义军会合。不过，这时起义军的实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一再受挫。不久，达州青号的汪瀛被俘，杨开甲、鲜大川先后被内部叛徒杀害，起义军只得进入川东北老林地区。

五、清廷新政策的出台：坚壁清野与剿抚兼施

清廷为了镇压这次起义，不仅调动了大量军队，花费了巨额军费，但是，仍

然无法把起义镇压下去。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以后,对其父亲的一些政策和具体做法进行了一些调整。

(一)剿抚兼施政策的实施

嘉庆帝认为,教门起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奈为贼所胁者",从而改变了乾隆认为教门造反纯属"叛逆"的看法。不久,又因"教匪聚众滋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认为"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得出教门造反的根源在于官员们"多方婪索,竭其膏脂,因而激变至此"的结论。于是,提出对教门实施"邪匪必不可赦,良民必不可诛,剿抚兼施,方为正办"的方针。

(二)"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政策的出台

为了加快平定川楚陕教门起义的进程,嘉庆决定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提出"只问匪不匪,不问教不教"的策略。嘉庆四年,御史马履泰奏称,川楚陕等省被裹胁而并未传教的难民,应停止发遣。对于"守业良民,仅只诵经茹素,所诵之经既非邪教捏造,又未传徒敛钱,不过愚民心存邀福,律法原所不禁"。因此奏请"其仅只诵经茹素,并无学习邪教,捏造经咒,传徒敛钱惑众者,均令地方官善为安插,并饬胥吏人等毋得借端挟制"。嘉庆帝阅后批示:"依议",①并提出:"白莲教名目由来已久,即据刘之协所诵经文,大意不过劝人为善,并无违悖字样。"而教首刘之协之罪在于"托名牛八,潜造逆谋",此事与白莲教无涉。并宣布:"现习白莲教者,安静守法,即是良民,地方官毋庸查拿;若聚众煽惑,即非素习白莲教之人,必当按律惩治。"不久,嘉庆又颁布《御制邪教说》一文,说白莲教"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又说:"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乃显而易见之理。"同年八月在给清军统帅额勒登保的"上谕"中说:"白莲教由来已久,即刘之协所诵经文,多系劝人为善,并无违悖字样。其学习此教者,持斋诵经,原与良民无异,地方官毋庸再行查禁。"又命令额勒登保"现在陕、甘、川、楚窜匪如能悔罪投诚,即可妥为

---

① 《大清律例根源》卷三十九,"禁止师巫邪教",嘉庆六年条。

安插，不必问及是否习教之人。若始终怙恶抗拒官兵，即素非习白莲教者，临阵之时，必当尽数歼戮。"并将此谕旨，"宣示中外"。[1] 这就是所谓"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政策。不过，该政策并非真的允许白莲教等教门可以任意传习，仅仅是为了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军事行动中，把一般教徒与参加起义的教徒分别处理而已。所以《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时川楚教匪猖獗，仁宗姑从宽典，特颁此谕以解散胁从，俾民自新……非真以白莲教可不问也。"说明该项政策乃是在特殊情况下为瓦解起义军，早日解决白莲教起义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嘉庆帝的真正意思也不是说对白莲教不必加以治理，而是指办理"叛逆大案"时不必同时办理一般的习教者，而是要达到"教匪分治"的目的。他说："申明习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查拿，其聚众犯法者方为惩办。原以此等愚氓，但能安静循分，即不必过事苛求，初非欲留此白莲教之名，任蚩蚩者日趋于惑也。"

这个政策和策略实施后，使起义军遭到了极大困难，从而陷入了起义后期的困境和导致最后的失败。

六、起义军后期的艰苦作战及失败

从嘉庆五年下半年起，白莲教起义进入了后期，开始走向衰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以从清军和起义军两方面来看。

在起义军方面。经过五年多的战斗，一大批有能力和威望的教首和能征善战的将领，相继牺牲或被清军俘虏，使起义队伍失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者。起义军长年奔走在老林之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战斗和生活，又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起义初期被教首们所鼓起的宗教狂热已经淡漠，产生厌战情绪。在首领牺牲或被俘之后，队伍往往也随之溃散。

在清朝当局方面。从嘉庆五年后半期起，各地推行的"坚壁清野"和"寨堡团练"政策，已产生明显的效果，逐渐切断了起义军同老林地区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他们提出"多一民即少一贼"，"民存一日之粮，即贼少一日之食"的构想。于是"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

① 《朱批奏折》领侍卫内大臣、经略大臣额勒登保折，嘉庆五年八月十七日"上谕"。

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寨堡建好以后,还需要防守,于是又“团练壮丁”。其办法是:“每户抽壮丁一人或二三人,编成部伍,鸟枪刀矛,各习一枝,官为给价,制备器械”。“壮丁由营中弁兵勤加训练”。有事则“登陴守卫,自保乡里”。①

“坚壁清野”使起义军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以前他们在行军途中,“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协之人为之乡导负运”。② 此时则因“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中,亦挖壕作堡,牲畜粮秣,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③ 起义军得不到粮食和兵源,其力量逐渐削弱,只得退缩在南巴老林之中。嘉庆六年以后,起义军各股“分合靡常,大势集三省之边缘。楚剿急则遁入川陕,川剿急则遁陕、楚”。④ 处境十分艰难,军事上也接连受挫。嘉庆五年二月,高二(高天升)、樊人杰一股被清军夹击,败于陕西南产的山阳县,高二遇伏阵亡。三月,王廷诏在川陕边境的鞍子沟被俘。四月,马五(马学礼)、高三(高天德)在四川大宁县二郎坝被俘。只有以冉学胜为首的一股,在留坝一带袭击清军获胜。但后来因受到额勒登保等大批清军的追击又遭到沿途寨堡的阻遏,只得转入巴山老林之中。

在湖北,徐添德、荀文明等股转战于郧阳、竹山、兴山、房县一带,也因受到清军的追击与寨堡的阻遏,只能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后来在湖北无法立足,又于同年六月进入陕西。以后,徐添德在陕西西乡两河口因覆舟身亡。嘉庆六年下半年以后,起义军只剩下龙绍周、荀文明、王国贤、戴士杰、曾之秀、辛聪、冉学胜等几股,活动地区也仅限于寨堡较少的老林地区,起义军人数也已减至二万四千余人。

嘉庆六年七月,清军统帅额勒登保与参赞大臣德楞泰又重新制订了作战方针。分别从西南与东北两面同时向老林进攻,以便把起义军压缩到四川边境地带,加以消灭。八月,冉学胜联合齐家营、高家营转战于川北的南江、广元地区,结果被清军三路围攻,冉学胜被俘牺牲。龙绍周出老林后,于九月同清军在陕

① 龚景瀚:《坚壁清野议》,载《澹静斋文钞外篇》。

②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③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策略”。

④ 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八,兵事四,教匪二。

西平利作战身亡。其他各股,所剩仅有千百及数十人不等,只得进入老林深处,总数已不及一万。起义军为了摆脱困境,曾计划离开老林,前往川南富庶地区,或北渡汉水,经陕西进入河南。不过,因力量过于薄弱,加上清军防守严密,使这些计划无法实现。进入嘉庆七年以后,形势对起义军更为严峻。虽然年初曾有几次小胜,但总的形势已无法逆转。二月,王廷诏、曾之秀、樊人杰率部返楚,在马鬃岭地方与湖北巡抚全保、提督长龄等相遇。大败清军,毙清军总兵以下将领14人。[①] 六月,樊人杰在湖北竹山、房县一带兵败,误入马鹿坪,被河水三面所阻。加上连日大雨,山水猛涨,最后力竭,全部溺水牺牲。七月,苟文明在陕西宁陕厅的花石岩被包围,力竭,跳崖牺牲。九月,襄阳蓝号的戴士杰在湖北兴山县施家沟战死。同月,东乡白号的汤思蛟在四川东乡的芝包口被俘。十二月,清军统帅额勒登保等向朝廷奏称"大功勘定"。嘉庆帝闻奏下诏曰:"三省荡平,上终先帝髦期未竟之志,祭告裕陵,宣示中外。"[②]并庆幸说:"从此海寓敉宁,升平永庆。"[③]可是,实际上起义军余部仍在老林中活动,并且用设伏、狙击等战术,诱使官兵进入老林,予以袭击。[④] "官兵稍不检查,即堕其计。"嘉庆八年三月,起义军于四川南江县把官兵诱入老林之中,将清提督穆克登布击毙。[⑤] 清军参将张明德也在羲州搜山时,被埋伏在林中的起义军用矛刺死。[⑥] 嘉庆八年七月,额勒登保、德楞泰等再次奏报"三省肃清,官兵凯旋",并且回京庆功。同时,大量裁撤随军打仗之乡勇,"每人以银五钱缴刀矛,银二两资回籍"。[⑦] 乡勇们无家可归,纷纷投入起义军队伍。由起义军将领苟文润率领的一支由被遣散乡勇组成的队伍,与巴山老林中起义军余部联合,在西乡将清军副将朱槐击毙。[⑧] 起义军余部虽仅有零散小股,人数不多,但他们"皆百战之余,腾走趫如猱,且悉官军号令及老林路径。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复乘雾溜崖突

---

① 《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八,兵事四,教匪二。
② 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③ 《清仁宗实录》卷一六,嘉庆七年十二月癸丑。
④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七,额勒登保折,嘉庆八年三月初四。
⑤ 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⑥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勒保折,嘉庆八年三月初四日。
⑦ 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⑧ 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以致迫使清朝当局在三省一直“不得解严”。[①]

这些小股起义军，一直坚持到嘉庆九年，最后两位起义军将领苟文润、苟朝九牺牲，历时九载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才算最后被平息。

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是清代前期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农民起义。清廷为了镇压这次起义，调集了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了二亿两军费，这个数字相当于清廷四年的全部财政开支。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被起义军击毙的提督、总兵以下官员达四百余人。其中提、镇大员多达二十名，使清帝国的元气大衰，因此被看做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秘密教门白莲教（主要是收元教及其分支），利用川楚陕老林地区移民们生活困苦的状况，在他们中间发展组织，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贫苦农民参加到起义军中，发动了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使清王朝的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基本群众是老林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他们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是正义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当然，秘密教门作为一个落后的、原始形式的组织，不可能把封建社会的农民真正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去。如果他们取得胜利（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也只能是改朝换代，由他们的首领登极做皇帝，广大贫苦农民依然无法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既是封建社会农民的悲剧，也是秘密教门本身的悲剧！

---

① 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第十四章　甘肃、陕西的悄悄会

乾隆后期和嘉庆初年，在甘肃、陕西流传着几支名为“悄悄会”的秘密教门，有人根据嘉庆十年陕西巡抚方维甸所说王伏林在河州“倡立圆顿教即悄悄会”一语，断定这几支悄悄会“起源于明末的圆顿教”。不过，从具体情况来看，此说尚值得研究。首先，甘肃王伏林的悄悄会与陕西宝鸡的悄悄会并无直接联系。其次，王伏林的悄悄会原名“无为教”或“红羊教”。“悄悄会”的名称，大约因为其行踪诡秘，外人称之为“悄悄会”，后来教内人也沿用其名了。

一、甘肃河州王伏林所传悄悄会

乾隆三十八年，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将所传之教称为“无为教”或“红羊(阳)教”，向徒众传授“三皈五戒”，令弟子们“持斋行善”。称每天早日“吸日光三口”，便可以“避水火”之灾。王伏林还自称能“点石成金”。[①] 不分男女，皆可入教。乾隆四十二年八月，王伏林将无为教改名“元顿教”，并称其母亲乃是“五圣老母”转世，妹妹是“观音转世”。王伏林又声言自己“法力无边，不怕刀兵水火”。他母亲有一件“扫霞衣”，凡是投在他门下入教者，由他把那人的姓名写在衣上，待天上星辰全时，作起法来，将衣抡转，要那个星附在那个人身上，那星就会掉下来。那人得了星宿，就猛勇无敌。[②] 王伏林改无为教为元顿教后，便着手准备造反，攻打河州。十月末，王伏林在王家坡(离河州州城约50里)，自称“大教主”、“正教主”；教内骨干张克明称“北霸天”休乐王；石忠信为“西霸天”相继王；王得彦为“南霸天”焰摩王；王九儿为“东霸天”迎春王。另外还封了将军、军师、十二星、金刚、二十八宿、八卦头领等。并且向徒众们宣称：“现在是末劫之时，从了教主王伏林，就遇劫不死”。王伏林还编了两句歌诀：

① 《上谕档》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二日，杨伏龙、党日清供词。

② 《上谕档》杨伏龙供词。

"正月里春花开，万寿宫里显道来"。两句歌诀的含意是，先夺取河州的印信，然后前往兰州"坐万寿宫"。到了万寿宫，现出未来佛，众人便推王伏林为首。一些人为了事成之后"可得一官半职"，便纷纷参加，[①]使王伏林的徒众，很快发展到二千余人。[②] 十一月初四日，王伏林在河州白塔寺附近的王家坡，聚集徒众"竖幡念经"。王伏林当时有三十多岁，是个"青衣和尚"。他头戴铜箍，身披道袍，下穿红裤，腰系褡包，内有铜镜一面。让教徒们"各带家口前来念经"，声称"待功果圆满，点金赐与众人，都有好处"。令徒众们广为宣传，以期多多招人。又令当地群众供应粮食，入教者皆以白布为号。王伏林派石忠信、郝天祥等7人，赴河州城探听消息。王伏林等人的活动，很快被当地官府侦知，派遣差役前去查拿，教内骨干王丙顺等人"拒捕伤差"。遂决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先派人在河州城内埋伏，夜间率众来攻城。[③] 赴河州探听消息的石忠信、郝天祥等7人被官府查获，供出王伏林准备率众造反并攻打河州等情况。陕甘总督勒尔谨闻讯，亲自带兵前往镇压。朝廷得知后又加派三全于宁夏驻防满军内选派1000人，令索诺木策凌于乌鲁木齐驻防满军内挑选2000人，前往助战。十一月十三日，勒尔谨来到河州，围攻王家坡。王伏林率众迎战，他与张克明、王九儿并有妇女，皆"披发仗剑，念诵咒语"。其他人则各执朴刀、木棍、流星等兵器与官兵对敌。当清军发起进攻时，起义队伍"全无畏惧"。[④] 清军手中虽然掌握着比起义军远为先进的火器——鸟枪等，但因平时疏于训练，临战时难以发挥其效用，只得仍然依靠弓箭刀矛等旧式武器，对付起义军。自十三日至十四日，双方激战一昼夜，清军还是靠弓箭把王伏林射倒后，才取得胜利。勒尔谨为了掩饰清军的无能，上奏时称王伏林有"邪术"，因而鸟枪等火器未能发挥其威力。乾隆皇帝见奏驳斥他说："彼既有邪术避枪，独不能以邪术避箭呼！"指出："此必绿营兵丁平日不习准头，临时施放过高，不能中贼。或者未见贼而先行放枪，至铅药已完而贼至。"说明乾隆皇帝对当时清军的素质，确有较深的了解。[⑤]

王伏林的队伍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主要利用教徒的虔诚与愚昧，相信他"法

---

① 《上谕档》杨伏龙供词。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四十辑，陕甘总督勒尔谨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四六卷，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辛丑。

④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四十辑，陕甘总督勒尔谨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⑤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四六卷，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辛丑。

力无边”，因而面对强大的清军能够“毫无畏惧”。不过，这种靠迷信结成的“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仅仅交战一天，便失败了，除被杀伤者外，被俘者多达522名。[1]

二、陕西宝鸡雷德本所传悄悄会

陕西宝鸡一带的悄悄会，最早来源于康熙年间山东馆陶游方道士刘某。他在陕西扶风县自称“受天花玉皇差遣”，身穿白衣，“演唱道情”。曾有该县之杨添寿拜他为师，得受《数珠经》和《皇极经》各一本。道士刘某自称“无相天花”，杨添寿则称“兰玉宝花”。刘道士故后，葬于该县东观村内。杨添寿又收李德沛、姚继业及杨忠三人为徒，均得授抄本《数珠经》与《皇极经》。李德沛自称“胜景龙花”，姚继业自称“护法”。杨忠因腿有残疾，不能外出演唱，只向人传授寻常念诵之《太上功课》、《元门施食经》二本。刘道士因身穿白衣故取名“白阳会”。[2] 姚继业所得之《数珠经》、《皇极经》，后来授与陈文秀，陈文秀又转传李如玺，并未立有教名。李德沛则赴各处云游，演唱《数珠经》内水火刀兵灾厄之说。

乾隆三十六年，他与宝鸡人杨加相遇，李德沛对他说，宝鸡地方本年当有兵马之灾。杨加便把此事转告素好之雷德本。同年十月，适值清政府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宝鸡一带常有官兵经过，雷德本遂相信其说，并留心寻访李德沛。乾隆四十二年，雷德本终于在宝鸡玉皇山地方遇见李德沛，即邀请至家。李德沛对雷德本说：“将来尚有大难，念经可以躲避。”又称雷德本手内的粗乱碎纹系“梅花井字”纹，可以“传经授教”。并将刘道士、杨添寿及他本人的传教原委向雷德本告知。称刘道士为“白花祖”，杨添寿为“接法祖”，李德沛自称“续法祖”，称雷德本为“天盘梅花”。雷德本即拜李德沛为师，送给他钱750文。李德沛随身未曾携带经书，无法传授，只将《数珠经》、《皇极经》之大意，向他简要介绍，答应以后传给经本。并口授“上大人”俚语一篇，名为《大成经》，令雷德本念诵，待雷德本念熟后，李德沛才回家，后于乾隆四十四年病故。

乾隆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厅回民起义，雷德本想起李德沛曾有“将来大遭兵

---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四十辑，陕甘总督勒尔谨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六十八辑，陕甘总督勒保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火"之语,此时"似有征验",随访至李德沛家。李德沛之妻李氏将家中所存《数珠经》、《皇极经》找出,送给雷德本。雷德本给予钱文,将经本带回阅看。见经内有"无影山可避灾难"等句,遂"倡言煽惑,妄立悄悄会名目",并收侯荣、马本、侯受廷、李文、王春等5人为徒。因马本识字能书,雷德本即令他抄录《数珠经》四本,《皇极经》一本,同原有一本,一齐分给李文、谭四、胡迎瑞、侯受廷等人,令其以"念经避难"为词,招人入会。侯荣等5人各自传有男妇大小十余人或数十人不等,雷德本自己也招有一百余人,总共招有三百余人。凡入其会者,需出钱一二百文至一二千文不等,所敛之钱,俱送雷德本收用。每年也分一些钱文给李德沛之妻李氏,并到李德沛坟前祭扫一次。据陕甘总督勒保称,雷德本所传《数珠经》内"悖逆语句不一而足",其中有:"南方丙丁,木易先要起","西北乾天李刘起,各引雄兵直上长安地",及"曲江池边生下姓李家","小心鼠尾木易兴,小心牛头卯金龙",以及"钢刀削发,遍地是僧"等句,皆有"指斥本朝"之含义。[①] 据李德沛生前解释说,卯金、木易、木子等句,系指刘道士、杨添寿及李德沛之姓。鼠尾、牛头系指子丑二字,即指乾隆五十七、八两年,隐喻乾隆五十七、八年将由雷德本坐金殿当皇帝。乾隆五十三年,雷德本"自称神仙",并将白阳会改称"悄悄会",出钱入会之人渐多,同教之杨忠见雷德本之会敛钱不少,心生羡慕。杨忠以自己乃杨添寿之徒,在教内辈分比雷德本为高,故欲别立一教,以便与雷德门之悄悄会并行。他感到立教收徒,需有名目。自己从前并未得授《数珠经》等经卷,所传《太上功课》、《元门施食》等卷,乃人人诵习之经,"不足动众"。又忆及杨添寿曾说过刘道士所传白阳会内,凡拜师之人,各自备白绫一幅,上写"钦差领法教主佛王敕封"字样,将姓名填入,然后用火焚化,便算"佛门弟子",死后可得冥福,遂与姚继业商议,借此招人入会。因自己年老昏花,令教内陈大德代为抄写,先后招有四十余人。[②] 杨忠又见刘道士坟旁有三教庙一座,已被雨水淋塌,遂以修复古庙为名,与吕良栋、陈大德等借此为由,向附近居民、教徒等募化钱文二百余千,将该庙修好,欲在庙内聚众烧香,以复兴白阳会,敛钱渔利。庙刚修好,即被拿获。[③]

---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六十八辑,陕甘总督勒保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陕甘总督勒保折,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八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陕甘总督勒保折,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三、陕西宝鸡杨生斋所传悄悄会

嘉庆初年，陕西宝鸡一带所传悄悄会，同乾隆五十三年雷德本所传悄悄会有关。教首杨生斋自称“白衣真人转世”。[①] 而白衣真人乃是康熙年间在陕西扶风一带传习白阳教刘道士自称，可见杨生斋之悄悄会，乃雷德本悄悄会之延续。乾隆五十三年雷德本传习悄悄会一事遭到当局镇压以后，悄悄会仍在陕西的宝鸡、汧阳、陇州、凤翔、岐山及甘肃之灵台等县秘密流传。嘉庆六年正月，悄悄会会首杨生斋（该县清水河人）将宝鸡会首王延、杨居，汧阳（今千阳县）会首武振关，灵台会首车举鼎，陇州会首邵宗贤，岐山会首高之雄，凤翔会首李通桂等人召集到家中，商议举兵造反之事。对大家说，三月初六日该当造反起事，事成之后，大家即使不做王公，也必“飞升佛祖”。嘱令王延等人各回本籍纠人入伙，定于三月初五日，各带家口潜赴褴阳县会齐。三月初六日在武家半山子举兵造反，乘官兵猝不及防之机，多抢粮食、骡马，预计“不过数天之内，即可裹胁一二万人，再由虢川进山，虽有官兵，亦无可虑”。王延等人俱各允从。汧阳会首武振关便先在附近纠约一千五六百人，灵台县会首车举鼎也纠约了二三百人，共聚有二千余人。但是，凤翔一带悄悄会首领之间在是否造反问题上发生分歧。当李通桂回到凤翔召集众首领开会时，有首领张机坚持反对造反。他“声言入会烧香，原是求福，何敢举兵造反”！李通桂即威胁说：“汝等不反，将来我们反后，必将汝等全家老幼悉行杀死。”张机仍反对造反，并声言要“出首告官”。凤翔县知县李师白闻讯，即将李通桂捕获。[②] 消息传到陇州，知州李永道带领兵丁于三月初五日将杨生斋家包围。杨生斋当时正在家中与王延、杨居等人议事，见状即“放枪拒捕”，击伤清兵十余人。终因势单力薄，难以抵拒，最后杨生斋举火自焚，王延、杨居等人被捕。在汧阳的首领车举鼎虽面临严峻的形势，仍照预定计划三月初五日齐集武家半山竖旗起义。清将王元道举兵剿捕失利，陕甘总督长麟亲自率兵四面围攻。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有一千余人牺牲，四五百人“滚崖跌毙”，无一人投降。车举鼎的徒弟、甘肃灵台县会首王应泰、杨之连，于三月初六日率领起义军队伍赶赴武家半山，途中闻知官兵已将车举鼎

① 《朱批奏折》陕甘总督长麟折，嘉庆六年三月十八日。

② 《朱批奏折》陕甘总督长麟折，嘉庆六年三月十八日。

的队伍包围并"剿杀净尽",只得逃归。

四、甘肃河州石慈、王化周传习的悄悄会

石慈、王化周是乾隆年间甘肃河州悄悄会首领王伏林的再传弟子。石慈曾拜王伏林的徒弟杜养杰为师,得有《皇极还乡》与《龙华合同经》二本。王化周系皋兰县红水人石忠信之徒,石忠信乃王伏林之嫡传弟子。乾隆四十二年王伏林领导悄悄会起义失败后,王化周、杜养杰幸免于难,此后便"匿迹多年",未敢再行传教。嘉庆六年十二月,王化周来到沙泥站地方贸易,恰好同石慈相遇,彼此谈及贫难。王化周称欲兴复悄悄会旧教,借以敛钱。石慈恐人不肯信服,遂借经书内有"刀兵水火劫数"及"弥勒佛降生"等语,招人入教。又闻知素识之张添佐自称能见鬼神,人皆信服,遂令其代为传扬,将来得有香火钱文,彼此分用。张添佐允从,并向人宣称石慈系弥勒佛转世,王化周乃陈抟转世,劝人拜石慈为师。石慈称每天夜间烧香跪听诵经,可以消灾祈福。遂令王化周、张添佐拜自己为师,石明也首先入教。王化周等人又招祁全必等31人为徒入教,皆称王化周为"大师傅",祁全必为"二师傅"。石慈认为"不示新奇,恐难怂听"。因见经书内有"三字合同"及"三宗、五派","头行、失乡"等语句,而编造合同暗号:一系握手为"手合同";一系伸舌卷舌为"口合同";一系指心为"心合同"。将此传授徒众,即素不相识之人,见此合同暗号,知系同教,彼此默喻,即不相侵害,故以悄悄会为名。[①] 石慈又向徒众们宣称,王化周为陈抟祖礼义宗,张添佐为正机祖量主宗,石明为悟道祖众重宗,指此三人为"三宗"。又令祁全必、李世运、石汉柱、张兴、马有宝为金、木、水、火、土五派师傅。在五派师傅以下之头人,名为"头行"。头行以下之众徒弟称为"失乡"。王化周等共尊石慈为"弥勒佛祖总师傅"。其后,石慈因见沙泥、红水两地人教之人渐多,遂与张添佐、王化周等约定,凡入教之徒众,不拘人数、日期,皆到他家中念经,或在三宗、五派各师傅家中念经,听其自便。又见徒弟中多有携带妻子来听经者,石慈便起淫心。借口经书内有"金丹"字样,便以"传丹"为名,奸淫妇女。每天深夜念经完毕,便令妇女灭灯与他同宿一室。石慈上炕翻滚,名为"滚丹"。与妇女行奸,名为

①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方维甸折,嘉庆十年四月十五日。

“传丹”。既奸之后，名为“得丹”。凡不肯被其奸污者，谓之“无缘”。不仅石慈本人如此，其教内骨干张添佐等人，也竞相效尤，皆以传徒为名，诱奸妇女。该教奸淫妇女之丑行逐渐暴露，遂被官府查拿，石慈等93人被捕杀。①

秘密教门教首、骨干借传徒、诵经、做会之机会，诱奸妇女之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秘密教门吸收教徒时，往往不分男女，来者不拒，诵经做会时，大多“男女混杂”，因而为教首奸淫妇女创造了方便条件，以致多次出现教首利用诵经、做会的机会，奸淫妇女的事件。石慈被捕后，被处以“凌迟”，王化周、王添佐、石明等，皆“处斩枭示”。

五、甘肃安定县杨登魁所传悄悄会

嘉庆十一年，甘肃省安定县有杨登魁、马才成等人传习悄悄会。二人乃姑表兄弟，甘肃皋兰县人，均系乾隆年间甘肃王伏林的再传弟子，主要在安定县柴沟硖一带传教。马才成系杜养杰之徒，杜养杰传习圆顿教，传给马才成《度常合同》、《皇极收圆出细宝卷》、《九莲正信钥匙通天宝卷》、《万圣朝元》等经卷。嘉庆五年，马才成因贫苦难度，欲兴复旧教以便敛钱使用。适有杨登魁来他家探望，马才成对杨登魁说，自己乃是圆顿教首杜养杰之徒，号无为祖。杜养杰曾传给他经卷，内有仙佛轮回，水火刀兵劫数等语。若诵此经，即可消灾祈福。杨登魁便拜马才成为师入教，马才成用香头指向杨登魁眉间，称为“开透寒关”。又指其胸，称为“开夹脊关”。又指其咽喉，称“开玉枕关”。又向他口授经文，令其背诵。其后，马才成又先后招收马攀忠等11人为徒。嘉庆七年，马才成听说悄悄会首领石慈因有“三字合同”暗号，传徒甚多，欲行仿效。但因宗派关系，不便与石慈相同，致有混淆，遂立“天然、迎春、玉春”三宗和红梅、首春、昌春、义春、迎春五派。五派以下，设“即发”、“贤良”等。在所传经卷内有“天地改换，乾坤推动，卯金刀下聚缘人。青阳会、红阳会、白阳会，末劫世界争夺社稷”等语。② 马才成又封杨登魁为天然宗，马攀忠为迎春宗，王大魁为玉春宗，均称为师傅。命张文得充红梅派，侯惠柱为首春派，魏国选为昌春派，李临春为义春派之首领，亦称为“师傅”。该会规定每年三月初三、九月初九等日，徒众们皆携带

---

①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方维甸折，嘉庆十年五月初五及初七日二折。

② 《朱批奏折》陕甘总督倭什布折，嘉庆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香资赴马才成家或杨登魁家念经拜佛。马才成、马攀忠、魏国选等故后，杨登魁即收存、整理马才成所遗经卷，发现其中有符药式样一本，随"照画符张，依方配药"，借以骗人糊口。嘉庆十年三月，杨登魁听闻石慈等破案，出外逃避，年末返回，亦不敢念经聚会。嘉庆十一年二月，杨登魁见石慈一案结案已久，又欲复教敛钱，遂纠约徒众至家念经，旋被官府所获。① 官员在杨登魁及其徒众家中，搜获大量经卷及"合同"：《传法大乘皇极收圆归一十二愿合同》、《定劫出细宝卷》、《灵感出细宝卷》、《度常万圣朝元合同》、《九莲正信钥匙通天宝卷》、《四生总忏》。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陕甘总督倭什布折，嘉庆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十五章　乾嘉道时期众多的秘密教门

乾嘉道时期，秘密教门除前述各大支以外，还有许多零散的传教活动。这些小的教门，名目繁多，但大多旋起旋灭。

一、乾隆年间

清净无为教

该教名义上的教首是直隶永清县人高六指子，他祖籍直隶永清，寄居北京顺城门外。其高祖高宏龙在日，便信奉清净无为教，供奉天地君亲师字轴，自任教主，劝人行善。高宏龙故后，由高六指子之父高从贞与兄高二接替掌教，每年清明及高宏龙忌辰（九月廿六日）做会两次。乾隆六年，高二身故，由高六指子接续掌教。因高六指子本人目不识丁，无法诵经，且饮酒茹荤，遂由其亲戚王佐家人韩必登代掌教内事务。[①]

四正香教

该教相传始于明代永乐年间，由直隶宣化府李立荣创立，后来传至山西汾州，又转传陕西朝邑。乾隆十一年，李立荣之子孙李昌年在汾州、朝邑等地收"纳香钱"，以"供佛烧香、施茶修路"为名，传徒敛钱。陕西朝邑的教徒，每年把敛得的"纳香钱"收集起来，送至汾州的李杰及侯、王等姓，再转至直隶宣化，由李昌年收受。[②]

弥勒教

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贵州思南府有朱维上、杨胜佑在当地传习弥勒教。教主游瑶系遵义县宋家坝人，自称"罗陀菩萨"，声言将有刀兵水火之灾，入教诵经，即可禳解，散给徒众红绫符纸。乾隆二十四年，杨胜佑见祖传《风轮经》

---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苏图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②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陈弘谋折，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五日。

内有“午未年饥荒，戊亥二年大乱”之语，恰好当年二三月内该地米价稍昂，杨胜佑即称经书之言有应验，将经书携至朱维上之堂叔朱文元家，述及其事。朱文元亦将游瑶存于其家之《定劫经》、《东明书》、《善经》等三本经书，寻出阅看，其内容同《风轮经》大略相同。杨胜佑希图借此敛钱，商之朱维上、朱文元等欲兴复旧教。二人允从，遂于是年六月十五日纠约黄业、黄之才二人至朱文元家“燃烛诵经”。因众人不信，无人前来入教。杨胜佑以该教原系游姓传习，遂与朱维上等商议，欲赴遵义接取游瑶前来掌教，定可招人。朱维上、朱文元二人应允，每人凑银一两，由朱维上、杨胜佑亲赴游瑶家，送给银两，请他同来思南县开堂设教。游瑶欣然允从，即于十月二十日一同来到朱文元家。由杨胜佑邀得徐生、黄业，朱文元邀得朱仲元、朱相元等，拜见游瑶。杨胜佑犹恐众人不肯信服，又称游瑶为“陀罗菩萨转世”，掌教度人，可保平安，令徐全等八人向其叩头礼拜。事毕，又凑盘费银九钱六分，送游瑶回家。同年十二月，游瑶买备红绫五段，并将家中所存小图章一个，寄交杨胜佑，令其将红绫裁断。凡有入教之人，便于红绫上书写“忠孝”二字，盖上图章，分给徒众。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廿四日，游瑶又来至思南朱维上家中“开堂燃烛”。朱维上请游瑶上坐，称为“教主菩萨”，自与杨胜佑分坐两旁诵经。当天有徐长临等七人入教，每人出燃烛银一钱二分，俱交游瑶收用。同年九月，杨胜佑与朱维上查阅《风轮经》内有“子丑动刀兵，寅前卯后，黑风黑雨扰世界，将符顶在头上，可免灾难”等语，便商议画符骗钱。又见《七字经》内有“八牛挂起天罗网”及“长寿佘太君、杨令公”等语。杨胜佑便自称“杨令公之后”。朱维上见八牛之字系属朱姓，亦自称“明朝朱太子后裔”。二人又依照书内式样，画成朱符，于九月初九日持赴同教王绍文家“燃烛”。王绍文邀得王绍祖等十二人入教，每人出银一钱二分。杨胜佑便向众人称朱维上为明朝子孙，自己乃杨令公之后。又向大家宣称：“子丑年动刀兵，寅卯年火烧一城，水淹二城，风卷三城，天下人尽死。教主游瑶系陀罗菩萨转世，扶助朱维上度救十万八千人，可以为帝”等语。令众人买领绫符，以求免灾难。众人皆向朱维上磕头，买绫符而散。以后，朱维上、杨胜佑等人多次以“燃烛”为名，向徒众骗取银钱。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教内杨光前因传徒诵经被捕，供出杨胜佑、朱维上等人，官府即将二人捕获。[1]

---

① 《朱批奏折》贵州巡抚良卿折，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

无为教即桥梁会

乾隆十七年，山西临汾人胡关氏所传。胡关氏住在临汾县小榆树地方，其父关纶民在日曾传习无为教，经常替人念经治病。胡关氏之夫胡冒思自幼务农为生，十八岁时身患癞疮，因被关纶民"念经得愈"而皈依无为教，茹素持斋，并娶关纶民之女关氏为妻。关纶民故后，胡冒思即将其所遗经卷取回诵习，以治病为名，传徒敛钱，先后将王存古、赵福林、赵玺、李大有、贺永等人之病治好而收其为徒。每年正月二十九日，胡冒思召集治愈的男人念经，三十日复召集治愈的妇女念经。届时，每人各带粮数升，供众人食用。剩余部分，用作修桥补路之资。其后，胡冒思又捐地募银，于路旁修建茶房五间，向过路行人施茶。后因当局查禁而改名桥梁会。乾隆十二年六月，胡冒思身故，胡关氏无以为生，即移居茶房，沿袭其夫念经治病之法，召人做会，募得银钱，除维持生活之外，剩余部分，仍用作修桥、补路之用。后来，其夫之徒弟贺永康又设立疏头，协助募化，并增修茶房三间，作为过往路人憩息之所。胡关氏又邀同教贾谭氏做伴，迁居其内，乾隆十七年被官府查禁。①

天圆教

乾隆年间在江苏松江、浙江杭州一带流传，以杭州府学生员舒敬，松江人徐筠、杨维中等为首。舒敬之祖舒思砚于顺治年间"设教惑众"，他自称"弥勒下凡"，自任教主，编制忏语，内称"弥勒治世，救度残灵"。乾隆二十二年春，舒敬自江南回到杭州，见其嫂徐氏染患疯病，即称祖上原有天圆经忏，专为消灾延寿之用，现在松江，可以取来拜诵，为其嫂徐氏治病。同年秋，舒敬又从江南带回《脱苦离尘宝忏》三十六张及路引、符咒和木戳两个，交与徐氏拜诵。拜诵之后于圈内记点，待点满后即将木戳焚化。结果，徐氏之病不仅未愈，反而身故。②乾隆二十八年，天圆教遭破获，此后仍在民间秘密流传。乾隆三十四年，官府在浙江乌程县教徒汤起龙家中搜出《天圆拔黄忏》、《天圆接续朝源忏》、《弥勒忏》等经卷手抄本及刊本《延龄改进》一部。③

未来教即三元会

江苏邳州赣榆县还俗僧人牛其禄传习三元会。牛其禄八岁时在原籍赣榆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辑，山西巡抚阿思哈折，乾隆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8辑，浙江巡抚熊字鹏折，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③ 《朱批奏折》浙江巡抚永德折，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县出家为僧，到三十二岁时还俗为民，在山东峄县经商。后因病被孟怀斗治愈，即入三元会，并且跟随孟怀斗去邳州西乡僵石沟朝拜该会祖师吴大虚的"老堂"。堂上供有吴大虚夫妇的棺木，会内传说吴大虚是该会祖师第九世"转身"，当地人每年对吴大虚的尸棺烧香礼拜，并称三元会的祖师还要转世。牛其禄闻言，便谎说"我即是祖师转来的"，在该地住了四五年，记得些经文，又得了些医方，加之从前当和尚时学过《大悲咒》，逢人便称会医治诸病。会内皆以为他乃"真祖师转世"。[①] 乾隆十七年，牛其禄等八人犯案被捕杀。[②] 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湖广江陵一带亦有未来教活动，为首者是江西南昌人李纯佑。李纯佑自幼读书未成，来到湖广江陵县学习裁缝手艺。当地人贺坤，平日吃斋，家中藏有三官、观音、雷祖、玉皇、金刚、还乡、末劫、定劫等八部经卷，劝人茹素念经，祈福免灾。每年三月初三、五月十三、九月初九等日，做会一次，最初尚未定立教名。乾隆二十五年春天，李纯佑偶然遇见该教之邹连桂，听从入教吃斋，并于五月十三日同至贺坤家做会。同年十二月贺坤身故，其子贺祥，因欠同教黄昌绪钱三百文，无力偿还，遂将其父所遗八部经卷给黄作为抵押。黄因出外谋生，即将经书存放同教之吕法振家中。乾隆廿九年十二月，李纯佑来至吕法振处探望，见到"末劫"、"定劫"两部经书，名色新奇，希图借其"惑众骗钱"，遂向吕法振借抄。并将《末劫经》改编为《五公末劫经》。内称志公系弥勒佛转世，并增加"戊亥、子丑年大乱，刀兵争夺。寅卯年，百姓饥荒，人死无数。辰巳年，方见太平"等内容。又于经卷末尾注以"李纯佑抄写"字样，以掩饰其自行编撰之痕迹。乾隆三十年八月，李纯佑又令木匠为他雕刻龙头小棒一根，作为受戒之用。还镌刻"报恩堂"三字，遂创立"未来教"之名，谎称系山西安邑县西古村老教主段思爱令他充当教主。复令人刻成票板一块，凡有入教之人，即刷印纸票，填入姓名，作为入教之凭据。声称持有此票，死后烧化，即可免堕地狱。乾隆三十一年五月，李纯佑又将《五公末劫经》中添入"躲兵避劫"等语，称为《大唐国土末劫经》。乾隆三十二年四月，李纯佑又假造康熙六、七年间的两道谕旨，写成《护道榜文》一篇。请人抄写后，谎称榜文系得自山西安邑县段家。又规定每年正月、七月、十月，逢十五日做会，称为"三元会"。[③]

---

① 《牛其禄等人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朱批奏折》暂署山东巡抚杨宏瑶折，乾隆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③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吴达善折，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太阳经教

乾隆三十七年在湖北、河南边境地区流传太阳经教。教首朱洪系湖北宏山县人,居住在该县广水地方。朱洪之父朱子常生前便持诵"太阳经咒",声称持诵该咒,可以"消灾致福",并于屋内贴有"荒诞咒语"对联,自称"敬佛好善,可修来世",并未传徒。乾隆三十七年六月,朱洪突患疾病,因念经得愈,村民皆恳请传授,许送银两。朱洪即欲借此敛钱,因恐难取信于村民,忆及其父生前曾提及"太阳经",朱洪便以"太阳经"作为教名,称太阳经教,并默写其父在世时之对联,"人人从天命,佛明九真;阴阳还照理,天换世界人"粘贴屋内。先后有亲戚、邻居徐加谟等人入教,各送给香钱或米豆等物。[①]

青阳教

乾隆三十九年,河南鹿邑县有赵文世等人传习"青阳教"。赵文世原靠推小车度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其堂兄赵文中夫妇卧病在床,无人照料,即前往探望,并帮助照料。后于房中捡得手抄经卷一本。赵文中称系礼拜太阳之《青阳经》。每月朔望焚香诵经文,今生可以消灾免祸,来世可托生好人,不受轮回之苦。其经文中最重要一段是:"奉母亲命祖万篇,安天立命总收元。替父完经立后世,真金子女保团圆。"这段经与同时河南鹿邑县樊明德所创混元教的歌词十分相近。赵文世见后甚觉新奇,于赵文中病故将《青阳经》抄本拿回,欲创立青阳教,借以敛钱。是月十五日,赵文世邀请其弟赵文炳、赵文协、赵文杰等人,一同焚香礼拜太阳,同念歌词。其邻人吴大山、刘言秉、赵智、朱日鲁四人闻知后,于乾隆四十年正月,皆来拜赵文世为师入教,由赵文世传给歌词,吴大山等各送给赵文世钱三百文。其后,赵文世又陆续传本县李训等十四人为徒,共敛钱三千四百余文。吴大山自己也传丁复臣等八人为徒,赵文臣又传武洪升等四人为徒,其侄赵子万亦随同入教。青阳教经过赵文世等辗转相传,徒众日多。乾隆四十年三月,河南鹿邑县混元教破案,教首樊明德等人被拿获,赵文世等便暂时停止传徒。同年八月十五日,赵文世与弟子吴大山等同在家中聚集同教之人诵经。九月二十日,被官府访闻拿获。[②]

皈依无为教

乾隆五十九年,浙江台州府仙居县有李鹤皋等传习"皈依无为教"。李鹤皋

---

① 《朱批奏折》署湖广总督陈辉祖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初九日。

② 河南巡抚徐绩折,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五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七期。

原籍临海县，自幼出家为僧，因不守清规，被师傅斥逐还俗。后只身无归，遂在附近乡村中靠讲因果，赖以糊口。乾隆五十九年九月，李鹤皋来至仙居县大张庄地方，先后遇见张光献等人，便以吃素念经可以消灾获福之言，向其哄诱，并随口编出四句歌诀：一心浑想念弥陀，莫等流落下寒途；未心常念菩萨路，翻身跳出葬生关。李鹤皋把歌诀令张光献等人念诵熟悉，张光献又转邀张开聪等人入教，共传有三十多人，俱拜李鹤皋为师，各人送钱数十文至三四百文不等。后来，李鹤皋见传徒日益增多，闻知其徒张光献在上坑山有空屋一所，可以在那里"开堂设教，多骗钱文"，遂向张光献借用。又在杂货担上购得佛像三轴，遂在山上空屋中开设经堂，倡名"皈依无为教"。后来，李鹤皋又编成《传灯录》、《弥勒指龟文妙经》二种，自行刊刻，供入教之人诵念。①

八卦教的复教活动

乾隆三十七年刘省过作为清水教一案主犯被判凌迟处死，后从宽改为斩决。其弟刘省愆被判处秋后处决，其长子刘大洪被囚禁在单县监狱，次子刘二洪脱逃。其妻李氏及三、四、五三子皆判给功臣之家为奴。乾隆五十一年大名八卦教暴动一案，使刘家再次受到牵连，刘大洪、刘二洪等人皆被处死。这样，刘省过的本支便被消灭了。后来，八卦教内骨干又推刘省过之族弟刘廷献为教首，以便利用刘佐臣子孙的名义，进行复教活动。

刘廷献又名刘闻诗，是刘省过的族弟。在刘省过犯案时，受到牵连，与其子刘成立、刘成器、刘成林等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安插在济木萨地方种地。乾隆四十五年，八卦教内骨干侯朴即侯尚安为了恢复八卦教，需要利用刘廷献作为刘佐臣子孙的地位进行号召。侯家与刘佐臣一家早有渊源。康熙年间刘佐臣创立五荤道收元教之初，便让侯朴祖先侯棠掌管震卦一支。据嘉庆年间侯朴之侄孙侯位南供："当年刘佐臣将震卦交给我祖父侯棠。祖父故后，传给四叔祖侯朴。四叔祖故后，传给我父亲侯绳武。"②刘、侯两家后来又曾联姻，关系更为密切。侯尚安为了恢复八卦教，打算派人到新疆去寻找表弟刘廷献，尊他为教首，以便利用刘氏子孙之影响，广为传徒。据山东巡抚陈预奏："乾隆四十五年，伊父刘廷献在日，有直隶人徐卿云、山东人刘南喜来济木萨寻见伊父。说表亲侯尚安叫徐卿云等赍送银信前来，并说教首刘省过死后，无人掌管八卦教，现在侯

① 《朱批奏折》浙江巡抚吉庆折，乾隆六十年元月十三日。
②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尚安复兴此教，所以前来寻找，推为中天教首，总管八卦教中之事，伊父应允。"这样，侯尚安在内地恢复八卦教便有了法统上的依据。乾隆五十八年，侯尚安又同张贵九敛银二千两，及黄金若干两，派徐卿云、宋相贵等送往乌鲁木齐，交给刘廷献收用。嘉庆七年，侯尚安身故，由其侄侯绳武接续掌教。侯绳武后来并未将教首位职传于其子侯位南，而是传给另外两位教内骨干。他把坎卦传给刘元善之胞伯刘上达，将震卦传给张贵九及其子张圣文。[①] 侯绳武为了使这一传承关系具有合法性，于嘉庆七年五月又派冯卿云（冯青云）、宋相贵等人来到济木萨地方，将传刘上达、张贵九一事向刘廷献报告。但此时刘廷献已经身故，只见到了他的两个儿子刘成器与刘成林。只得把教内凑的三千九百五十两白银及侯绳武本人的五十两，共白银四千两，交给刘氏弟兄。[②] 冯卿云等又从刘成林处检出刘廷献手录之书四本，图章一方，带回交给侯绳武，作为凭据。刘成林则将大印一方，上刻"崇德堂"，小印二方，上刻"克己堂"、"儒林堂"，送给侯绳武，作为他掌教的凭据。另外，还送给侯绳武手折、敕书、锦囊及刘家之谱系和八卦教教首之谱系。后来，刘成林又派人到山东金乡县，送给侯绳武"香块"，又名"信香"，声称"每遇劫数，焚烧此香，自有诸神救护。"及一套《传教成全书》即《西皇经》。[③] 嘉庆十四年五月，侯绳武再次派冯卿云、宋相贵等人，赴济木萨刘成林处，送给他白银三千两，刘成林复函称"仍烦侯绳武代管教中之人。"[④]在乾隆末到嘉庆年间八卦教复教活动中，侯家利用刘家世袭教主的地位，大量敛钱，先后送往刘廷献及其子刘成林处之白银，已达万两之多。这一方面说明八卦教势力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秘密教门对教徒们剥削之残酷。该教教徒绝大多数都是下层穷苦农民或其他群众，在短短二十年之内，竟然聚敛到上万两白银（还不算侯尚安一家在山东本地所使用之数字在内），实在是十分惊人的。嘉庆二十二年侯位南被山东齐河县知县拿获，供出山东、直隶八卦教的情况，使这一复教活动被彻底摧毁。在新疆的刘成林也于同年十二月在新疆被捕，其父刘廷献也被戳尸。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② 《朱批奏折》庆祥折，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廿五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④ 《朱批奏折》庆祥折，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廿五日。

儒门教(混元教的复教活动)

乾隆六十年,刘松之子刘文焕与王法林之妻王侯氏倡立儒门教,实为混元教的复教活动。刘文焕又名刘二富,系混元教老教首刘松之子,乾隆五十一年因田恒实案受到牵连,发配广东海丰县安置。乾隆五十三年在配所脱逃,即在各处漂荡,并未传徒。从前王怀玉之侄王法林在日,掌管混元教(官府统称白莲教)。王法林故后,其妻王金氏与王法曾之妻侯氏不睦。王侯氏即回至河南鹿邑县,自立门户,将其教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为安徽颖州、太和等处,由王廷章之子王大保弟兄经管;北路为安徽宿州与河南商丘、柘城、鹿邑、太康等处,由王侯氏自己掌管。乾隆六十年,刘文焕在河南商丘县宋家瓦房地方,与王侯氏会遇,商议白莲教(实为混元教)不时犯案,无人信从,遂改名"儒门教"。①

罗教

乾隆后半期,江西宁都县怀远乡有朱文瑞等传习罗教。怀远乡地处万山之中,人迹罕至,山上有河树庵一座。斋公朱文瑞及其徒孙先懋、黄安康等将该庵修葺后,在庵内居住,并"私奉罗教"。朱文瑞故后,由其徒孙先懋等接替传教。乾隆三十年,孙先懋、黄安康等以"消灾祈福"为名,招徒入教。此后,该教分为两支,一支由孙先懋为首,传徒罗奕祥、谢老会、李维也、王志福等人;罗奕祥又传徒廖庭瞻、曾廷华、王万华三人;廖庭瞻又传张焕彩、罗林秀及福建人沈本源三人为徒。谢老会亦传多人为徒。另一支以黄安康为首,传徒刘开兰、吴兰生、陈永辉、张式先、詹志清、张六人等六人,但未再转传。②

在宁都县狮子岩地方,又有詹明空传习罗教。詹明空系江西石城县人,自幼在外游荡,乾隆二十七年回至江西原籍,信奉罗教。最初,他见宁都县狮子岩地方幽静,便欲在此焚修。旋以该处艰于行走,便另于山下盖屋居住。乾隆三十年,其表弟陈必先自石城县来此,同他相依种地度日,并拜其为师入教。其后,詹明空又陆续传谢云章等十二人为徒。他假称"得受异传",并以"阿弥陀佛四字分贴性命心意"之说传授徒众。乾隆三十七年,詹明空将收藏《五公尊经》、《红炉接续》、《护道榜文》等之抄本各一册及多项经卷,传给谢云章等人。《五公尊经》一书,系假托志公、宝公、唐公、化公、朗公并观音大士之偈言。③ 后来,

---

①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琦善折,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及十二月十一日。

②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郝硕折,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③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郝硕折,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廿四日。

宁都怀远乡的孙先懋因其师朱文瑞身故，又闻知詹明空之议论新奇，倾心佩服，遂来至狮子岩拜见詹明空，自愿退居弟子之位。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孙先懋之三传弟子沈本源也来至宁都，并于同年八月随罗奕祥、廖庭瞻往见詹明空。詹明空见沈本源年少心灵，颇为赏识，欲收其为徒。沈本源遂拜詹明空为师祖，自称徒孙。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詹明空见沈本源会写字，便将《护道榜文》一本及各种经卷交给他抄写。沈本源将经书抄完后，即将旧本带回福建，先后传宁瑞云等人为徒入罗教。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沈本源在福建建阳、建宁一带卜卦传徒，不久被捕。官吏在他身上搜获《护道真言》、《西来法宝经》、《明宗孝义经》等抄本三册。[①] 其中《罗祖护道真言》中称，崇祯年间罗祖被拿，勘问时，有"大地山河化夷土"之句。清吏认为此句有反满内容，"殊属狂悖。"[②]该教传徒时，由师傅传授"五戒"：即一不许宰生，二不许偷盗，三不许邪淫，四不许诳言，五不许饮酒食荤。教内所诵经卷，主要是《五部六册》。

乾隆末年，湖北各地仍有罗教秘密流传。不过，大多属于零星传播，并未形成大的气候。乾隆四十九年，湖北隋州人王士廉等传习罗教。王士廉平日靠种地为生。是年隋州所属寇家店民人赵士成来到王士廉家中，告以家中藏有"罗教真经"，如能持诵，便可消灾获福。王士廉便送给他香资三百文，拜赵士成为师，入教吃斋。同年十月，赵士成因老病无子，寄信王士廉，并将经卷交他收藏。乾隆五十三年，王士廉传习罗教一事为知州访闻，旋即被捕，官吏于家中搜获《五部六册》。乾隆四十九年，安徽歙县福惠尼庵内有道士吴明也即吴昭煜自称"大乘道人"，传习大乘教，亦属罗教系统。吴明也原来一直在外游荡，行医度日。乾隆四十五年回家，学习道教，吃斋念经。因其姨母许唐氏向为福惠庵之斋婆，便常去庵中探望，遂与庵内女尼佛惮认识，并时常往来。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吴明也会遇素识之程大道。程大道向他说，其叔祖程毛官遗有榜文、戒经两本，愿送与吴明也，吴即带回持诵。吴明也见护道榜文及大乘戒经内有"护道修行"之语，便自称"大乘道人"，希图借此招人入教。因恐人不信，又撰著《云水集》，谎称"道祖点化"，并托人请画工为自己绘制打坐图像，左右各有童子侍立，并显出菩萨龙虎形象，又将自己做的偈语写入图内，借以骗乡民信从。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明也见族人吴东阳穷苦无依，劝他吃斋修道。吴东阳便投拜为

①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郝硕折，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② 《朱批奏折》福建巡抚富纲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师，每逢佛诞，同至福惠庵内礼拜。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吴明也干脆搬入庵内居住，与女尼佛惮、华保、佛寿等人通奸，后被查拿。①

二、嘉庆、道光年间

内蒙古土默特的清净无为教

清净无为教系罗教分支，嘉庆年间在今内蒙古一带流传。嘉庆二十年，内蒙土默特蒙古王公的庄头郝得来等人，传习清净无为教。郝得来与其婿胡拉嘎齐均系庄头，居住直隶承德府建昌（塔子沟），系"祖传清净无为教"，吃斋念经，家中供奉"罗祖"像，藏有七部《大乘真经》，在塔子沟一带传有阿里雅等七人为徒。该七人皈依清净无为教，或因父母患病，或因自己患病，许愿吃斋，拜郝得来为师。该教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本村老爷庙念经一次，三月初三、七月十五，赴贝勒府附近之老爷庙念经二次，此外，每月初一、十五，也要聚集在同教家中，轮流念经，所诵经卷有《破邪显证经》、《发愿劝文》等，据清吏奏，俱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② 土默特贝勒旗蒙古庄头贡子阿格岱、绰勒海小六，也是祖传清净无为教，家中藏有无为等经卷，供奉释迦及罗祖画像。他与同旗之蒙古庄头青巴叶勒齐、高金等皆自幼许愿，吃斋念经，祈求免父母及自身之灾。③

大乘教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应城县又有陈其才等人传习大乘教，属罗教系统。陈其才系湖北襄阳人，曾于乾隆二十年拜同县人杨日纬为师入大乘教，持奉"五授五戒"。乾隆四十六年五月，陈其才因传教被捕。官府在他家中搜获大量经卷、图像。其中有画像四张，背后写注"罗祖"、"赵祖"、"李祖"、"华祖"字样。其经卷有刊本八部，内有《大乘诸品经咒》一部、《销释金刚科仪》一部。还有罗教所诵经卷，内有《雾灵山人天眼目》、《扶教明宗》各一本。在《雾灵山人天眼目》的序文中，称罗教之始祖罗孟浩是山东即墨县人，于宋淳熙年间纂集《雾灵山人天眼目》一书。书中又称罗道霞系罗孟浩之孙，生于明英宗正统年间，从军密云，成化时罗孟浩开示受记，正德年间封为国师云云。把罗孟浩即罗梦鸿说成宋代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安徽巡抚书麟折，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和宁等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③ 《朱批奏折》庆祥折，嘉庆二十二年四月廿六日。

人，大概是为了表明该教源远流长。称罗孟浩之孙曾封为明代国师，也无非为了表明罗教乃合法之宗教，曾得到国家保护。这些俱非事实，纯属虚构。

嘉庆年间湖北孝感一带流传的大乘教，属于罗教系统，教首为孝感人周添华。周添华之高祖周斯望早在康熙年间便拜大乘庵僧人罗继恒为师，传习大乘教。他吃斋念经并绘制图像、布幅等项。周斯望故后，其子周仲坤相沿习教，有同族之周大相、周怀仁、周仲春等十余人及附近居住之付金例子等人之父、祖，皆拜周仲坤为师学习经咒。周仲坤故后，各家之后裔，共尊周添华为师，都相沿吃斋戒酒，以期修善求福。嘉庆十九年，官府查禁，周大相等因害怕而一同开荤，并将大乘庵改为"大慈庵"，供奉观音佛像。而周添华等人则被破获，在他家中搜获《苦功悟道》等经卷、图像、布幅等物，又在大乘庵中起获大乘等经二部。[①]

无为教

嘉庆十四年，王立在北京传习无为教。王立是直隶枣强人，在北京东安门外开切面铺。嘉庆十四年正月，遇见南宫县人董宁德，劝他入无为教。告以入教后，来生不堕畜类。王立便拜董宁德为师入教，于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出京钱四五十文至一百文，到教首刘洛治家上供磕头。[②]

嘉庆年间，上海县有徐国泰[③]等人传习无为教。徐国泰平日靠训蒙度日，嘉庆元年八月，遇崇明县人陆云章，自称曾从陈之伯为师习无为教，入教后吃斋念经，便可以消灾获福。徐国泰拜陆云章为师入教。该教规定，凡入教者，由师傅用线香在眉心正中、左右眉丛各一指划，再用线香指划囟门、脑后，至足心折转，又自胸乳划至左右两踝，自两臂前后划至手心，称为"三回九转"。拜师后，须向师傅交纳钱二三千文，由师傅领同跪拜，念经皈依。每逢朔望，皆须凑钱一二百文，把师傅领至家中，置买果品，向上供献。由传教师傅上坐，习教之人分列两旁，向师傅跪拜，再分食所供果品。教内有严格的等级，入教年久者称为"护持"，担任几年护持以后，升为"头领"。由头领将逐年敛凑之钱文，分寄崇明县之教主陈之伯，用来"报答师恩"，称为"上信"。陈之伯在世时，徐国泰曾至崇明县拜见。陈之伯、陆云章病故后，徐国泰于嘉庆八年升为头领，带领同教之人

---

① 《朱批奏折》云南巡抚陈若霖折，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

② 《朱批奏折》英和折，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③ 并非收元教之徐国泰。

拜佛。该教经卷中，载有“无生老母，天外家乡。白阳、红阳，无影山埋名姓，龙华会弥勒当极，暗生八卦，五盘四贵，暗钩贤良”等语。据徐国泰供：“经内大意，是言无生老母在天外家乡，悯念失乡儿女，救度残灵。男妇吃素，出资入教，即可将灵性逐渐复还，死后不堕轮回。”经内又有白阳、红阳同赴龙华等句，“白阳是仙境，享清净之福。红阳是红尘，享人间之福。齐赴散花天会”，谓之“同赴龙华”。“无影山”是“天赋之性”，凡人不能看见，并非世上真有此山。“弥勒佛当极”一句，“当极”指：“过去燃灯佛，现在是释迦佛，未来是弥勒佛，由三者轮流掌教。”“暗生八卦”一句，指人身上亦有八卦。“五盘四贵”一句，天地人水云谓之五盘，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谓之四贵。“暗钩贤良”一句，是指引人入教之意。①

龙天教（又名龙门教、龙天门教）

据乾隆七年山东济南府新城县被捕的寿光县人靳崇禹供，该教又名向阳教，“原是明朝隆庆年间北直正定府藁城县米祖老母传下，今米祖老母托生在京师安定门外普化寺做尼姑，法名叫普兴”。教徒于每季造具名册给师傅，念经烧化。每逢念经之日，男女教徒俱来聚会，每人布施大钱数十文。据称普兴著有《花山卷》。② 嘉庆年间被捕的龙天门教徒李和修供称，该教源自罗教。相传罗祖传过十八支，后来十三支无传，只剩下五支。其中一支是京东滦州石佛口王姓，教内之人每年到石佛口一次。一支为张姓所传，当日在京中城南虎坊桥翠花胡同，立有佛堂。并称：“近来江南船帮上习教之人，每年都于七、八月内送香火钱到京烧香。”藁城县米奶奶所传之教，即属于张姓一支。还有一支为杨宗彩所传，不知住处。再一支系刘姓所传，据传曾在交河县泊头店北边独木村住。还有一支为陈姓所传。并称“以上五支，都是罗祖徒弟”。③ 不过，在罗梦鸿的续灯弟子中，并无上述各支，而且滦州石佛口王姓所传，乃明代王森所创之闻香佛，并非罗教。李和修所供内容是否可信，还有待研究。

嘉庆年间直隶藁城县张村地方，有刘龚氏、刘幅安母子二人，沿习祖传龙门教，并建有祠宇，塑有米氏泥像，树立龙门教碑碣，在庙东里许地方，有米氏坟冢一丘。嘉庆十八年，刘龚氏母子被拿解省，因该教非其所创，仅将其各杖一百，

① 《朱批奏折》两江总督百龄折，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廿七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护理山东巡抚包括折，乾隆七年七月初九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廿一日。

寺庙改为义学，塑像、碑碣拆毁。嘉庆二十一年，刘龚氏又故智复萌，在米氏坟前搭盖棚厂并立有锅灶，住屋供设铜佛。清吏于屋内起出铜佛四十二座，图像五幅及《九品收元经》残存六页。内有“卯金刀，八牛江山不坚牢”，及“刘赶猪，十八家头目出来把人杀”；“甲子年降圣人，三月二午时辰，木子之家去为主。三甲元年龙蛇行，幽燕有灾刑”。具有反对明朝统治的内容。据刘龚氏之子刘幅安供称：“母刘龚氏，平素吃斋。”其家“十二代祖母米奶奶”，在明代万历时敕封“掌道收圆老母”名号。经卷中“卯金刀”即指刘米氏。“三月三，圣人出”两句，系指刘米氏生辰，龙门教即系米氏倡立，自任教主，人称“米祖”。后来，其家历代均系妇女相传。①

老天门教

嘉庆十七年河南滑县武举冯克功等人所传。是年四月，有滑县人霍应壁引其堂弟霍应方等拜冯克功为师入教。该教规定，每日三次朝拜太阳，闭目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每逢朔望，烧香叩头。霍应方入教后又传本村十四人入教。②

黄门道

嘉庆十八年，直隶晋州人张锦玉所传。张锦玉平日靠推小车卖杂货度日，后来在外佣工。嘉庆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在直隶宛平县齐家庄，路过该村谭结家门首，因口渴入内讨水。谭结邀张锦玉进屋闲谈。张见其家人多热闹，向谭询问。谭即答以是黄门道会期，正在做会。并称若入此教，“求财得财，求福得福”。张锦玉即拜谭结为义父，与其子认为手足，谭即传他为徒入教。该教规定，早晚烧香，向东南西北四方磕头，以“一家向玉”四字为暗号。凡外出见人，将头向上一看，向地一看，名为“拜天地”，口称“一家向玉”。这样彼此即可知对方系同教。后张锦玉即以此传徒，于同年被捕。③

如意门教

嘉庆十八年，山东静海县安定庄人孟瑞等人所传，该教规定每天按子、午、卯、酉磕头礼拜。④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二年三月初四日。

② 《朱批奏折》署直隶总督章煦折，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③ 《朱批奏折》山西布政使陈桂生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白阳教即未来教

嘉庆、道光年间，直隶献县人孙荣父子所传。嘉庆四年，孙荣与同县人臧登法、赵万有等拜臧绍为师入教。臧绍故后，孙荣继续传教。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后，官府查禁甚严，孙荣"畏惧改悔"。道光三年十月，献县发生水灾，孙荣因贫苦难度，欲传教敛钱，即将白阳教改称"未来教"。宣称：过去是青阳教，是燃灯佛掌教；现在是红阳教，是释迦佛掌教；未来是白阳教，是弥勒佛掌教。劝人学好修行，今生可以获福，来世可以做官发财。传徒时授以"无生老母，先天老爷，未来菩萨"等咒语。每逢朔望，向空焚香叩头礼拜。孙荣之三个儿子，也随同习教。其长子因有口才，令其劝人入教，借此敛钱。道光七年，同村之人见孙荣家来往之人甚多，遂传言孙荣将来必要闹事，连累好人。孙荣听后气愤，遂与其子孙庭基等商议，与其被人告发，不如乘势起事。遂打造铁枪头等物，并向本村村民扬言，谁敢多言，定将其全家杀害。又编有："老天在上，父母得知，弟子某人愿归白阳教，保辅我主孙荣执掌江山。如有三心二意，天打雷轰"等誓言。道光八年八月被官府查获，教徒八十八人被捕。①

牛八教即挥率教

嘉庆年间湖北襄阳一带方手印、武维金等所传，又名挥率教。乾隆五十三年，河南汝阳县人方手印传新野人廖四洲为徒，廖四洲又传武维金为徒。教徒后称方手印为"爷"，见面要向他磕头，称方之妻子为"太太"，入教须交钱数百文或数千文不等。在河南的教徒，尊方手印为掌柜；襄阳由武维金任掌柜。方手印故后，武维金等人仍将敛得钱文送到方手印家中。嘉庆年间方手印的儿子、徒弟继续传习该教，嘉庆二十一年破案。从该教破获后的情况来看，其教义、教规俱不清楚。仅知入教后烧香磕头，教内传有咒语。②

金丹圆顿教

乾嘉年间，在山西曲沃一带流传。相传该教传自直隶滦州石佛口王姓，及陕西西安府观音堂刘姓二处。乾隆年间，曲沃县南董村任景翰传习该教，藏有刷印经卷及板片佛像。乾隆二十七年，任景翰故后，其妻吕氏收养其侄任进德为嗣。任进德自幼随嗣母吕氏吃斋，及长，吕氏始告以吃斋信教之原委。乾隆四十七年吕氏故后，任进德学业不成，家道贫难，欲借传教敛钱。乾隆五十七

---

① 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2期。

②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马慧裕折，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年，他按照任景翰所习金丹圆顿教之名称，设立“乐善堂”传徒，供奉三清、观音、北极祖师及如来、韦陀诸像，并印刷经卷售卖。每年于二月、十月望日做会，以仁、义、礼、智、信为主旨，传授戒杀、戒盗、戒淫、戒酒、戒妄五戒。每逢会期，教内之人俱至乐善堂礼忏，各出香资，自二三百文至四五千文不等，由任进德收用。任进德为了“哄动人心”，于嘉庆十四年正月向教徒敛银四十两，于是月十五日与教徒周正基等人同往滦州石佛口拜见祖师。在石佛口见到王如青，送银二十两，王如青则送给护道榜文一本作为回报。嘉庆二十年，任进德因贫苦，又以往石佛口拜师为名，向徒众敛钱。后被教徒赵斌在霍州供出，旋即被拿。①

白阳教即圆顿教

嘉道年间河南涉县申老叙所传习。嘉庆十年，申老叙来至直隶任县一带贩卖花椒，向该县人王法中等谈及红阳是释迦佛掌教，白阳是弥勒佛掌教。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现在月光圆至十八日，若圆至二十三日，便是大劫。若入白阳教即圆顿教可以避劫获福。王法中等听从，至申老叙家拜师入教。申老叙向众人传授：“南无天圆太宝阿弥陀佛，南无量闻（文）佛救苦观音十字佛号。”传给教徒赵理《荣华经》一部，《未来星斗图》三张。内开列南斗十二星，北斗十三星，东斗十五星，西斗十九星，中斗三十星，十八阎君星五十四祖等。传给教徒赵顺青《未来易经》一部，内叙五祖相传中央戊己土系王姓，东方甲乙木系张金斗，南方丙丁火系李彦文，北方壬癸水系刘姓，西方庚辛金即系申老叙。又将河图、洛书加圈点。将八卦增加二爻，改为十二卦，内加“兴吉平安”四卦。将六十四卦改为一百四十四卦，内加“用则高王江河”等八十卦。又将十二时辰增添“纽宙唇未推酬”六时，成为十八时。将九宫增添“红皂青”，并多一白字，其余多系叙述王姓等四人悟道亡身之事。申老叙又给李老欣家补卷一部，内载“牛八以灭，木子兴兵，大闹幽州”等语，其余多系叙述刀兵水旱瘟疫劫数之语。嘉庆十九年申老叙病故后，王法中等人便推赵理为“当家”，赵理转传次女吴赵氏入教。因吴赵氏素不识字，王法中即将申老叙所画未来星斗名目，用红绸书写，称为“降龙宝”，假托吴赵氏“明心见性”，忽能写字，以示神奇。后来，吴赵氏大量传徒，遍及直隶任县、隆平、南和、巨鹿、新城、定兴、沙河、邯郸、永年、平乡、枣张、宛平、衡水、安平等县，此外还传有旗人入教。②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廿六日。

② 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2期。

五荤道

道光年间山西省传有"五荤道"。据陕西道监察御史徐继畬奏称,"风闻山西阳曲、盂县、代州、崞县、五台、忻州、定襄一带,颇有传习邪教者,土人不知为白莲教,因其烧香念经不戒荤酒,称之为五荤道,实即白莲教之别名"。① 从这段史料可知,五荤道之得名,系因为该教不像其他秘密教门那样,要求信徒茹素食斋,而是"不戒荤酒",该教大概同清初刘佐臣所创立的"五荤道、收元教"有某种联系。至少说明在秘密教门中确实有不戒荤酒的支派,因而以"五荤道"为名。

圆顿教即油腊教

嘉庆二十二年,清吏在山西、陕西一带破获了圆顿教即油腊教,教首王钊、解枝征等家,从远祖时即信奉该教。相传该教系明代山西汾阳县罗城村人魏希林所创立。他在院内的楼上设立教堂,供奉神像,曾传本县人曹三入教。曹三又转传陕西人解枝征之远祖及李纪通之祖先入教,到嘉庆二十二年该教遭破获时,已传徒八九代。故教内皆尊山西魏希林为"老魏大爷",称曹三为"曹三老师傅",称解枝征之远祖为"解老爷"。该教除供佛像之外,还将魏姓、曹姓、解姓三人俱塑像供奉。每逢老教首魏姓生辰,教徒们俱要凑钱做会。② 魏希林与曹三在世时,该教已传至山西临县、隰州、永济及陕西华州等处,教处所诵经卷内容"俱系劝善鄙俚之词,并无悖逆语句"。③ 教内规定,每日的子、午、卯、酉四个时辰,各烧香一次,诵念偈语,称为"四正香"。每年正月十三、四月初七、七月初四、十二月二十等日,拜佛念经一次,以期消灾获福。因山西临县、隰州二处离汾阳路途较近,每年四季,教徒们皆须赴魏希林家拜佛念经,致送香资。永济县离汾阳较远,故在本地建立教堂,名为"圆顿堂",供奉魏希林之像,四季自行拜佛念经,每年轮流派教徒一人,赴魏家致送香资。陕西华州离汾阳更远,并不每年致送香资,而是数年内前往魏家探望一次,送香资一二两至五六两不等。魏家在收到香资后,用纸一条,盖上魏希林图章,作为回照。④ 乾隆十五年,永济县

---

① 《军机处月折包》,陕西道监察御史徐继畬折,道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转自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2期。

②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朱勋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

③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朱勋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④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成格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

王家教堂被官府访获，王钏祖父一家俱情愿改悔，当局即将该教堂所挂“圆顿堂”匾额，改为“明伦堂”，添设孔子牌位，谕令王姓人出教。乾隆三十五年，汾阳魏姓家族亦被访获，将当时掌教之魏子明杖责，谕令改悔。其后，永济王家仍暗中习教，魏子明因贪图各处香资，亦继续传教，不过将圆顿教改为“油腊教”，借以掩饰。嘉庆六年魏子明身故，其妻魏孔氏因二子俱尚年幼，遂自行接教，收受香资，借以糊口。嘉庆八、九年及十二、三年，曾有李纯通、田广正等教徒，先后来到汾阳县罗城村魏家，面见“小魏大爷”，并送给银一二两。嘉庆十三年，魏孔氏因贫苦难度，又遣其子魏兆富等前往陕西，寻找同教之人，告帮银两。后因魏兆富并无银两寄回，各自教徒亦因官府查禁甚严，不敢前往魏家送香资。魏孔氏遂于嘉庆十七、十八、十九及二十年，派其女婿、外甥等人，前往临县、隰州二地，讨取香资。该地教首以官府查禁严紧为词，嘱其切勿再往。嘉庆二十一年秋，魏孔氏贫极无奈，忆及其夫在日，曾言及临县一带向多同教，又令其婿丁文亮至该县教徒曹遵道家，要求帮助银钱。曹遵道等即令教徒杜洪林等各出钱三五百文，自己也送银五两，但告以该处官府查禁甚严，不可再来。加之该处仅他一人传教，难以多帮银两。魏孔氏见敛银无望，且心生畏惧，即未敢再外出讨银，嘉庆二十二年十月被官府拿获。[①]

洪蒙教

嘉庆年间山东聊城人康洛升改白莲教为洪蒙教。康洛升向习白莲教，后因白莲教屡次犯案，人多不敢加入，康洛升遂将白莲教改称洪蒙教。嘉庆二十三年传在他家佣工之张立名为徒入教，令他每日早午晚饭时，烧香磕头，口念上供三十三天，下供十方诸佛地水风火、四大菩萨等咒语。并且假托“仙人”口气，造《劝世文》，内称：“吾初生第一世，名李长白，第二世名赵继白，第三世名孙具白。三世临凡，从冷泉寺提出功成圆满，得坐莲台”等语，暗隐“白莲”二字。又说，冷泉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暗藏“真空家乡”四字。而“仙人临凡”则暗藏“无生父母”之意。并告诉弟子以后传徒时，必须考察其人“实在心明”，才可把白莲教本名及《劝世文》中暗藏之情由告知。后因康洛升身故，张立名亦年老患病，便由张立名之子张瑶借传徒以敛钱，但人多不信。嘉庆十六年十月，张瑶赴柏乡县探望亲戚，顺便来到康洛升之子康灿沈家中，为康洛升上供。康灿沈知系同

①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成格折，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教，便留他住宿。张瑶见康灿沈的书中夹有康洛升所造《劝世文》草稿一纸，与其父张立名所诵内容相同，欲携回刻印，借以敛钱，遂向康灿沈借用。康灿沈已不再传教，亦即应允。张瑶回家后，便与同教中人梁存人商议，以《劝世文》诱人入教，敛钱均分。张瑶又因《劝世文》中内容仅有暗藏“白莲”二字及“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等寥寥数语，且语气平淡，难以令人信从。于是在文中又添加“山东、直隶有灾星，天篆、地篆那常灾大真，听说眼倾泪”，暗寓自己坐莲台说法之意，以期使人闻而生畏，俱来入教。又恐这样仍然无人相信，便将《劝世文》原稿烧毁，将自己所编的内容默记熟练，然后装病，称“仙人附体”，口授梁存人录写，注意其父子姓名。梁存人自称“信心弟子”，张瑶又令梁存人雇人将这些言语刊刻，在附近张贴。村民见后，纷纷传播，咸怀畏惧，张瑶即趁机传徒，旋被官府捕获。①

未来真教即天门真教

嘉庆年间，直隶静海县蔡公庄人崔焕即崔四等所传，亦名天门真教。崔焕自幼曾随赵道士学习音乐会，遇村民丧葬之事，前往吹打乐器，唪诵《心经》等经忏。嘉庆十一二年间，崔焕随父崔文载拜交河县崔大功为师，入未来真教即天门真教。崔大功传给三皈、五戒，及“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过去现在，弥勒未来”四句咒语。并称此教于顺治、康熙年间传自河南人张姓，张姓故后，其教不再流传。至乾隆三四十年间，又有清河县王官庄人刘功复兴此教，由刘功传给崔大功，崔大功又传给崔文载。崔文载又收徐兆敖为徒，崔文载故后，徐兆敖又拜其子崔焕为师。崔焕又编撰“回头是善”等十劝歌词，陆续传胞兄崔宾、族人崔三（崔才）等三十四人为徒。嘉庆十九年间，崔焕闻知刘功、崔大功先后身故，便自行接管教务，向徒众敛钱。因恐徒众不肯信从出钱，便邀请教内之张柏青，令其假装过阴，传神佛言语，称“派崔焕接管教事”。并称河南张姓及崔大功为二仙，应与崔焕共为“三宗法子”。嘉庆二十一年崔焕等被官府破案逮捕，官吏在崔三家中搜获墨写“逆词”五纸，刻板残旧经卷二卷。一单内写有：“一根三眼所出，那根长那根所短，金丹道流落我心，卯金刀二立江山。”另一单上写：“还有后来话，已住却是乘，将会柜实紊，莫管他人灾。刀兵三六月，以后有安派。会开登高品，细话里面埋。”第三单内写有：“姓朱子明顺，同著法师公，明日事依

---

①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经额布折，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施，即去顺天行。”又有：“改换乾坤水火风灾要换世”等句。在经卷《佛说当来弥勒出西宝卷》。内载有：“过去青阳会，现在红阳会，未来白阳会。弥勒下世，圆顿教修无为三乘。大法心王为太子，父是先天母无生，龙华三会各逞能。阴阳常颠倒，辊在无生怀，无为元妙诸人出世诀，十人孩子艮卦生，弥勒下生，龙华三会从新立。”①

一炷香教（如意教）②

嘉庆九年，山东城武一带有姜明等人传习的一炷香教又称如意教。该教规定，每年三月三、六月三、九月九开三个大会。凡入其教者，俱至姜明家中听他讲道。平时也有前往听道聚会者，“俱是夜聚明散”。姜明是山东城武县徐新庄人，绰号姜六和尚，要求徒众在他面前“跪香”，“跪香之时，姜明坐在正面椅子上，教中人都在姜明前打千领香，跪在院内。谁的香先着尽了，算谁的心虔”。姜明发给徒众的香都是定做的，长五寸，有的中间配有火药，点至火药时，火药一亮香尽，便算此人心虔。③ 教内传有歌词，令徒众诵习。其一为：“双膝打跪一桌前，对给老天说实言，父母堂前多行孝，别要哄来不要瞒，犯法事情再不做，钱粮早上米先完。乡里养德多恕己，这是行好才全还。行好劝人三件事，戒酒除色莫赌钱。”其二：“依天靠天，向天要吃穿。天赐雨露，普地下遍。丰收了都吃饱饭，不受饥寒，天也没图半文钱。日都吃三餐，拍拍心，该将佛念。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上述歌词劝人学好，孝顺父母，戒除酒、色、赌诸恶习。因此该教又名“好话教”。歌词中也劝人安分守己，向官府早缴纳钱粮。同时宣扬“靠天吃饭”，反映了封建小农的思想与愿望。

嘉庆十三年，直隶南宫县人王金玉也传习一炷香如意教。该教规定，每逢朔望，焚香一炷，口诵：“敬天地，孝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吃屈忍奈，戒去杀祸”等语句。王金玉传南宫县人于三、臧三为徒，于三又转传苑洛广，臧三又转传献县人王景叙，交河县人张太吕等为徒。所有教徒俱至王金玉家焚香礼拜，称王金玉为“当家”。王金玉故后，同教尊其子王红眼为当家。④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徐辊折，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廿一日。

② 嘉道年间山东、直隶一带流传的一炷香教，包括如意教、好话教、摩摩教等不同渊源的教门。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英和等折，嘉庆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④ 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2期。

嘉庆、道光年间直隶南宫人陈恭所传一炷香如意教，系三元教改名。陈恭原名陈恭玉，又作陈攻玉，嘉庆元年出家，拜房山县观音堂道士高产真为师，学习三元教，后改名一炷香如意教，念诵“八仙咒”，为人治病。其师故后，陈恭便在宣化、大同一带化缘。嘉庆十三年，他来到滦州红家林裴云卜家，为裴治病，后收裴云卜、裴俊义为徒。裴俊义又传熊庭云等为徒。嘉庆二十年，裴俊义犯案被拿，陈恭亦畏惧还俗，改名王凡，逃往山东。次年又逃至奉天，在各处佣工度日。道光七年，流寓吉林的滦州人阚希令因病求医，适有亲戚熊庭云前去探望，告以拜师学习一炷香如意教，病即可痊愈。阚希令便拜熊庭云为师入教。熊庭云传授他诵念“南方离卦透天真人高老爷”名号，并教以运气之法。[①] 南方离卦透天真人高老爷，便是离卦教开山祖师郜云龙，说明陈恭在直隶南宫一带所传一炷香如意教，乃离卦教之异名支派。另外，嘉庆二十一年直隶清河县人王本、张洛庆所传“如意教”，亦属离卦教的一支。[②]

嘉道年间，直隶广平府邯郸县冯大坤等人传习一炷香天爷教。冯大坤系山东禹城县人，尹祥系直隶清河县人，李士贵为直隶邯郸县人。邯郸县之户村内，有龟台寺一座。冯大坤之祖冯万恩、尹祥之师王太和、李士贵之父李如芝在世时，便在寺内奉习一炷香天爷教，又名如意教。他们在院内用砖垒砌高方约二尺之台，名为“天地台”，每逢朔望，皆烧香跪拜，口念“敬重天地，孝顺父母”，及“倚天靠天，为善报天”等词语，称如此便可以除病消灾。嘉庆十八年，河南、山东一带天理教起义后，冯大坤即畏惧回至山东禹城，尹祥等亦不敢继续习教。道光五年，李士贵以事隔多年，又欲复兴其教，便与冯大坤、尹祥联络。称兴复旧教，俟日久人多，得有布施钱文，可均分使用。又在邯郸龟台寺内设立天地台，每日烧香跪拜，并将劝善各话，编成歌词，用鱼鼓剪板拍唱，劝人行善。道光七年破案被捕。[③]

嘉道年间山东历城县郑家码头三官庙孙大凤所传一炷香教，系康熙年间山东商河县董四海所传之正宗。一炷香教又名天地门教、顺天教、金丹如意教，是明末清初山东商河县（今惠民县）董家林村人董计升即董四海创立。董四海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初四日寅时，终年

---

① 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 2 期。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③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道光七年八月初十日。

七十一岁。董四海的青少年时代,适值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时期。他为了摆脱苦难的生活,走上了创立秘密教门的道路。教内相传他于二十岁时,东渡黄河,来到章丘县的韵峪庵出家学道,大约受到当地秘密教门之影响和启迪,经过十余年的修炼,终于"炼就大法,豁然贯道",于顺治七年(1650)三十一岁时,创立"天地法门",即天地门教。他于创教之后,取号明扬,先后传徒八人,称"八大圣师",即李修真、张希玉、马魁元、马开山、刘绪武、杨年斋、石龙池、黄少业。此八人因系在董家林村所传,故称"林传八支",他们均按照董四海所授八卦方向,分头到各地去传教。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董四海名声日隆,被章丘县雪山寺住持请去主持寺务。他在上方井修炼时,又收徒弟八人,称"山传八支",即徐明扬、董成所、邱慧斗、郝金声、于庆真、蔡九冈、邢振邦、杨超凡。董四海故后,由顾铭馨接任教主,掌教三十五年。其后,该教之八支自成系统,互不统属,不再有统一教主。一炷香教实行"传贤不传子"的制度,教内教职有四等,即教主、圣师、当家师傅和一般教徒。董四海被徒众奉为弥勒佛化身,称他为"董老师"。该教主张夫妻双修,共同传教,故教内有不少女教徒,并设有女当家,称"金传二支",俗称"二当家"。该教没有印本经卷,仅有早期传人的口头经卷,称"无字真经",崇拜神祇亦为无生老母,以弥勒救世为信仰核心,以龙华三会为理想境界。一炷香教每年举行两种"圣会"。一是每年四月初四日董四海忌辰时举办,以纪念董四海之立教恩德,并且为教徒超度先人亡灵。二是"阖会大众圣会",于每年十月十五日地藏菩萨诞辰和元宵节举办。该教吸收教徒,最初并无固定仪式,仅堆土插草为香,磕头拜师即可。后来,随着教徒日增,仪式也逐渐复杂与规范化。入教时,先要有本师即引进师介绍,待当家师傅允准后,择日举行收徒仪式。届时,佛堂正中要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和"天地君亲师"牌位,并摆设香炉和供品。由当家师傅带领本师、徒弟直跪供桌之前。当家师傅先取香一根,向老师傅(教主)禀报,然后把香递给本师,由本师点燃供上。本师再取一根香递给徒弟,由徒弟自己点燃供上,即所谓"赤子单传一根"。当香烟袅袅上升之时,当家师傅便向新入教者提出各种问题,如:为何入教、能否遵守教规、诚心修炼等。入教者须一一回答。当家师傅首肯后,入教者便成为正式教徒。一炷香教不戒酒肉,该教《佛偈》中说:"别的门教,吃斋把斋,天地法门,酒肉齐行",但要求教徒按照教内之规定进行修炼。一是在董四海忌辰时,要到董家林村董四海坟前朝拜;二是每日烧香磕头;三是为人治病祈福。教内规定,

有病不吃药，专靠烧香上供，念经派功，求天地君亲师保佑。嘉庆元年，山东历城县孙大凤拜该县郝家码头三官庙道士刘中文为师，习一炷香教。刘中文告以，每日早晚须在家烧香磕头。逢朔望，教徒聚集围坐，敲击木鱼，诵念佛经，名曰道场。遇有不识字者入教，无法诵念，便编唱佛歌，即令其跪香一炷，以期消灾免厄，故称一炷香教。平日靠替人治病招引徒众，其治病之方法是：令病人向北磕头，诉说自己生平的罪过，由教主给予短香一炷，令其对香长跪。病痊之后，不许向病人索谢。教徒入教时均须"净身"即阉割。董四海最早的弟子徐名扬、曲星斗在日均净身修行。教内传称："曲星斗临终时系在太平椅上坐化，鼻垂玉柱两条，得成正果。"故每逢七月初七日曲星斗、徐名扬忌日，同教之人均赴坟上烧香。[①] 教内杜景盛等四人，见曲星斗生前得到同教人尊敬，死后享受香火，因而心生羡慕，亦各自行阉割。[②]

嘉庆二十四年，山东恩县人陈起祥亦传习一炷香教。陈起祥自幼拜庐县王汉实为师习一炷香教又名如意教。王汉实系山东恩县人，寄居平原县，早年拜山东禹城县李成名为师入一炷香教。据李成名称，该教系山东商河县董家林村董姓所传。李成名传徒时，令徒弟早晚磕头烧香，并称"门首烧香系敬天，就地烧香系敬地"。并传诵"父母恩理应赞念"等歌词。该教每月做道场两三次。做道场时，并不敛钱，令教徒们各自携带干粮，齐集一处。用鼓板敲打，念佛歌唱。该教与其他秘密教门不同，只传男子，不传妇女。并且规定，凡不孝敬父母，或有奸、盗、赌博等行为者，一律不许入教。该教以为人治病相号召，其治病方法是：按照病人发病之部位，来确定病因。如病人头痛，便推断必系不孝敬父母。若手足痛，则必系兄弟不睦。若肚腹痛，则必系"良心不善"。判定病因后，便令病人对天磕头改悔，称如此不久即可痊愈。该教还规定，为人治病时，不许索要谢礼。该教因是否入教，皆听人自便，故又称"如意门"。[③]

道光十五年，直隶清河县戴洛占、鸡泽县宋姓等传习一炷香教破案被捕，供称该教传自董师父。官府于戴洛占处起获纸折一扣，名为《排头记》[④]。内称"山东老师傅董吉升，字四海，生于前明，住居商河县董家林村地方，传徒李秀

① 《朱批奏折》署理山东巡抚琦善折，道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② 《朱批奏折》署理山东巡抚琦善折，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④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七，道光十九年十月乙亥。

真、刘绪武、张锡玉、黄小业、杨念斋、刘新还、石龙池、马开山等”。[1] 其中张锡玉所传一支，后来又称“一炷香五荤道”，马开山所传一支，又称“添门教”。清吏根据戴洛占等人所供，至山东商河县董家林村将董四海七世孙董坦即董坛拿获。董坦供称，其七世祖董四海即董吉升于早年创立一炷香教，董坦本人也“接习祖教”，凡习教之人，皆尊他为师。他曾到过直隶，有故城县人张路安拜他为师。张路安又收德州人孙礼、罗龙等人入教。道光三年寒食节，有直隶人刘盛和、秦有志、傅裕良至董家林村，为其祖董四海上坟，并向董坦磕头，尊他为师父。[2] 董坦于审讯录供后病死狱中。与董坦一同被捕的还有直隶永年县宋得保父子等人。宋得保家中供有用黄纸写的“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牌位，为病人治病时，令病人在牌位前烧香磕头，宋得保口念：“敬天地全凭一炷香，劝人行好敬上苍，得了诸般杂病，不用良医外边方。”代为祝祷，收受香资。病人愈后，须至其家上供还愿。

三阳教的复教活动

三阳教是由混元教改名而来，故该教在复教活动中仍以老教首王怀玉及其子王法僧（王发生）的名义相号召，并有王怀玉的子孙参与其事。嘉庆十四五年，安徽阜阳人朱明道发起复兴三阳教的活动。朱明道曾随父朱继祖习三阳教，乾隆四十七年其父犯案充军，朱明道本人虽逃脱，但亦不敢继续传教收徒。由于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中，三阳教仅有少数首领参加，教内骨干大多隐匿下来，未曾暴露。嘉庆八年，白莲教起义已到后期，朱明道欲借“复兴旧教”敛钱，便与同教张珍之子张立文等相商，进行复教活动。朱明道因系接续其父掌教，有一定号召力，被同教尊为“续灯”即教首。朱明道复兴后的三阳教规定，凡入教之人，须开写名单，用朱笔点过，再将名单焚化，称为“天榜挂号，地府除名，扫除灾祸”。有拜师入教者，传给咒语：“奉母亲命走万天”及“波泥真皈依佛”等句。“奉母亲命走万天”等句疑即“奉母亲命祖完篇，安天立命总收缘，替佛完结立后世，真经母子保团圆”。入教者每人须纳三百文至一二千文。所敛得之钱，从嘉庆八年至十四年，皆由朱明道与张立文等六人分用。嘉庆十四年，王双喜

---

① 《军机处月折包》，直隶总督琦善折，道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转自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2期。档案记载与教内流传略有差异。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琦善折，奏文日期不详，据《清宣宗实录》卷二十九，道光十六年二月辛未上谕判断，该折当为道光十六年二月所奏。

的堂弟、王廷章之子王三保逃荒来到安徽太和县，由同教徐良壁收容留住。嘉庆十五年三月，王三保"邪心复炽，起意借教敛钱"，遂与朱明道合为一伙。王三保以自己乃是老教主王怀玉之侄孙，而王家向来曾传有歌词："生在韩门长在刘，到了王家才出头"。隐喻王家最早生在韩家，后来改姓刘，指乾隆四十年混元教破案后，王廷章改名刘盛洲，将其侄王双喜儿改名刘成儿。将来再恢复王姓原姓时，便可以有"出头"的日子了。嘉庆十五年，王三保因自己寄居同教家中，贫苦难度。又想到其堂兄王双喜在黑龙江配所亦缺钱使用，于是同朱明道等人合作，借复兴三阳教来敛钱。朱明道也因王三保系老教首王怀玉之侄孙，便自愿奉他为教首，以资号召。这样，双方一拍即合。王三保、朱明道等人恢复三阳教以后，为了招引徒众，多多敛钱，又利用从前老教主王怀玉曾有王法僧是"弥勒佛转世"，刘之协也有过王双喜是"紫微星临凡"等说法，遂声称"现在是弥勒佛掌教，若愿出钱送给教主，将来即可免水火刀兵之难"。并嘱令同教之李珠等人四处传布，以期多收徒众。李珠等人也因王三保是"老教主王怀玉亲丁，素常敬重"，因而"俱各听从敛钱"。当地群众因为希望"免受灾难"，也多愿出钱资助。这样，王三保等人便敛得大量银钱，由张立文经手，转交王三保，再送往黑龙江。自嘉庆十六年至二十年，共送过九百六十余两。① 银两送到后，均交到王双喜婶母、王法僧之妻王王氏处。据王王氏供："自十六年至今，四次共收到寄来银九百六十两，俱系安徽省头目张立文同我族侄大保儿在那里敛钱，使阮凤仪等七人前后送来。"在嘉庆年间三阳教复教活动中，刘松之侄刘文魁也积极参与。他不仅帮助安徽方面教首向王王氏传递银两，而且继续传徒。据教徒岳陇贵供：嘉庆十六年秋，刘文魁在配所劝他入三阳教，对他说入该教之后，"可以消灾免祸，死后辈辈托生人，不转畜类轮回"。并告诉他说"咱们这教，上不言师，下不言徒，不可向人泄露"，并传授他一首咒语："西去一玻璃，真玻璃盏，玻璃在东土，玻璃天，玻璃年，前言咒语引一时，古今妙应，四两二字不能担，一法万通古今应。"刘文魁令岳陇贵每月初一、十五向西磕头四个，默念一回。

嘉庆十九年刘文魁又在配所传遣犯丁跑来入教。丁跑来是福建晋江人，因受雇于海盗抢劫商船而被发配黑龙江。嘉庆十九年四月，向刘文魁谈及病后身体虚弱，刘文魁便乘机劝他入三阳教，告诉他入教可以"延年去病"，丁跑来便拜

---

① 《朱批奏折》黑龙江将军特依顺保折，嘉庆二十年九月初二日。

刘文魁为师入教,刘令他每天早晨向东南、晚上向西北磕头,虔心迎拜太阳。[1]

嘉庆二十二年,王三保等人复兴三阳教一事破案,经审理,王法僧之妻王王氏被斩决。王双喜虽然身在狱中,并未参与其事,也被处斩。王三保、朱明道二人系复教活动的策划者,均被处斩。阮明龄、刘文魁二人因与此案有牵连,被处绞决。

道光年间的混元教

混元教自从嘉庆初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受到镇压以后,仍在民间秘密流传。道光二年,安徽阜阳人邢名章来到河南新蔡县行医,暗中传习混元教。他自称通晓天文,不久将会天降灾殃,如习混元教之经咒,即可以避免。该县即有朱凤鸣(朱麻子)等人拜他为师入教。邢名章传授他念诵"无量寿佛,开法开法"八字经咒,及"奉母金母[2]祖完篇,安天立地总收缘,替佛完结利后世,真经子母保团圆"四句,称为"五子经"。这"五子经"乃是乾嘉年间混元教内流行的咒语,不过邢名章所传内容,字句上稍有差别。后来,邢名章见入教者日增,遂萌发政治野心,与朱凤鸣等十一人商议造反。邢名章自称"治劫祖师",称其子邢五为"紫微星临凡",徒众们则尊其子为"小续灯"。凡入其教者,每日俱向邢名章父子磕头三次。邢名章又预做白衣帽数十件,白旗一杆,又购买旧刀、旧铁枪头十件,立有"王百川灵牌"一座。封其徒王景盘为"定江王",王兴仁为"元帅",刘洪宗为"护国将军"。因人数尚少,决定由入教者再多多纠人。又声称七月十五日天降水灾,兼有瘟疫,劫数难逃。邢名章有法船三只,可载无数之人,且有符咒可以避瘟疫。若肯入教参拜,便可"避劫登仙"。用此办法又纠集了一百多人,准备造反。[3] 七月十七日,朱凤鸣在新蔡县廖小庄聚集徒众,手刃其幼子,祭旗起义。声言欲为被正法之同教王百川[4]报仇,由河南进入安徽,屯于阜阳县岳家寨,拟由颍州进兵宿州、亳州。旋为官府所败,二百余人被擒拿。[5]

邢名章等人的造反活动失败后,安徽阜阳人王会陇等人,仍在河南、安徽一带传习混元教。安徽阜阳人王会陇、俞平修、高登第等人与河南鹿邑县朱文友

---

① 《朱批奏折》安徽巡抚康绍镛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② 疑为"亲命"。

③ 《朱批奏折》安徽巡抚孙尔准折,道光二年九月廿七日。

④ 王百川于嘉庆二十年王三保一案内被拿处死。

⑤ 《清宣宗实录》卷四十,道光二年八月乙酉。

等俱为混元教徒(当时官府仍称为白莲教)。道光二年七月,王会陇等因官府查拿严紧,即不敢习教。道光七年正月廿六日,该县之赵中信即赵宗信来到王会陇家中闲谈,言及贫苦,欲复兴白莲教(混元教),设立"西天老教神牌"。俞平修、高登第等人俱拜赵中信为师入教。赵中信向他们传授"人生天地间,大伦理不差,只有男立志,那有女当家"。及"奉母钦〔亲〕命祖完篇,安天立地总收缘,替佛完劫利后世,真金子女保团圆"等,令俞平修等每逢朔望焚香拜诵。又用黄纸书写"弟子某人请我佛东临受香气供养"字样,在神前焚化。令弟子交纳根基钱三五百文,称凡送给香钱供佛者,便可以消灾获福。道光八年二月,赵中信等被捕获监毙。①

① 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2期。

第十六章　天理教与老理会

一、天理教

嘉庆年间在直隶京畿和河南一带流传的天理教，是由京畿一带的红阳教与坎卦教及河南八卦教中震卦教等秘密教门融合而成。老理会也是八卦教的分支，属于八卦教中之坎卦。

（一）京畿及直隶流传的红阳教

红阳教早在明末清初便在京城及京畿民间流传，嘉庆年间再次活跃。该教大多以为人治病相号召，信者颇多，特别是妇女入教者甚众。在融入八卦教后，叛逆性增强，不断起来造反。嘉庆九年，在京畿宛平县，有孟六、庞五夫妇及彭会、康四等人，拜本村人谷老为师入红阳教。谷老在家中供奉飘高老祖画像，每年五月十四日、九月十七日在家做会。孟六等人教之后，每逢会期，各出京钱一百余文，送给谷老作为上供烧香之资，并念诵《源流经》、《明心忏》。孟六等入教后，也在外庄为人治病，祈求佛祖"看病下药"。其治病的方法是，用茶叶、花椒等让病人煎服。凡治愈者，即拜师入教。道光九年，谷老患病沉重，将飘高老祖画像交给孟六供奉，孟六用黄布一块，上画太极图，令杨氏缝做帏幔供奉。谷老病故后，孟六等人继续传习红阳教，于道光二十七年被官府访拿。①

嘉庆十六年六月，直隶东安县李文习传该县刘弼为徒，习红羊（阳）教。李文习传授咒语为："唧喇国，唵喇国，安阳国，灵善云成地府百草鞭，双连寿。安定针，掷竹莲。太上火，十王梯"等。供奉"飘高老祖"及"五圣老母"。②

① 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2期。
② 《朱批奏折》巡视南城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巴龄阿折，嘉庆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嘉庆初年，宛平县宋家庄一带，也有红阳教流传，后来改为荣华会。据该教宋文潮供称，同村宋进会"原是红阳教的人，他常劝我入会，说入了会有好处，米见吃，柴见烧"。遂于嘉庆七年与同村的宋文哲一同拜宋进会为师入红阳会（教）。嘉庆十三年红阳教被人告发，宋进跃与宋进会商量，将红阳教改为"荣华会"。①

大兴县一带，也有红阳教流传。大兴县除林清（详后）把红阳教与坎卦教合并外，还有两支红阳教。在该县东门外薛家庄的周大即周庆麟，自幼随庄内王二楼习红阳教。嘉庆二十三年王二楼病故后，周大接充教首，曾传道人谢八等人入教。每逢正月十五六等日，周大与徒众在庄内菩萨庙前殿念诵《源流经》，二月十九日念诵《菩萨送婴儿经》。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初八日，念诵《伏魔经》，为同庄人消灾祈福。每逢念经之期，徒众们到庙内烧香磕头，交纳京钱数十文至一二百文，或麦子、高粱一斗数升，作为庙内香火及念经时的饭食开支，剩余部分用来置办庙内器具。遇有村民家有丧事，周大等前往念经，念毕即令徒众苏太等十人在庙内后殿，望空向"少林十祖师"磕头，学习少林拳法。教内的李国梁，擅长针灸，常常为人治病，兼能画符。遇有病人，即用香头在黄纸上画黑道数行，烧化后溶于水中，令病人服用。道光十二年周大等被拿充军。②

道光年间，大兴县河津营地方有李自荣等传习红阳教，又名"净空会"。李自荣平日靠种地为生，其父在时，随同习红阳教，念诵《源流经》，供奉"净空老祖"。每年立夏以前，教内之人俱到北京朝阳门外黄姑庵内，给净空老祖坟墓叩头。平日并不吃素，每逢正月十五日，二月十九日，四月初八日、十月十五日在本村庙内念经。③

嘉庆十八年，京畿通县马驹桥一带，有李五等传习红阳教。据该教张七供称："我系商河县人，五十岁，向在京南通州马驹桥种地，与宋九、宋二、董二、白大幅等人认识。嘉庆十八年，有白莲教李五，④系宋九的妹夫，传授宋九'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咒语。宋九又传授宋二、白大幅等人，是年六月，宋九邀我入

① 《朱批奏折》给事中李培元等折，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九日。

② 庄吉发：《清代道光年间的秘密宗教》，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六十五卷，第2期。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步兵统领耆英折，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④ 李五后来曾参与天理教起义并成为攻打紫禁城的骨干。

教，传我八字咒语。”[1]马驹桥一带的红阳教，后来加入天理教。教内流传着许多叛逆性诗句，为天理教起义作准备。如在大周俞地方流传有一首歌词：“大周俞有个刘三祖，徒弟度有一万五。大徒弟李朝佐，二徒弟是小崔五。大徒弟使的勾连枪，二徒弟使的月牙斧。先进通州城，后平顺天府。”[2]歌词中所说刘三祖，当指林清，因为林清自称刘姓转世，并称卯金刀或后天祖师刘林。

在顺天府三河县的混元教，也是红阳教的支派。该县张景山在家中藏有经卷如泰山娘娘、源流及伏魔、灶王等经，皆属红阳教经常诵习之经卷。张景山早年曾拜刘仲玉为师入混元教，吃斋念经，为人治病。嘉庆十七年六月，刘仲玉令张景山接管教务，张景山便把混元老祖神像及经卷等物带回供奉，并创造了许多新的名称，如带领徒众行礼称为“领众”；经管上供烧香者称为“坛主”；负责陈设经卷者称为“经主”；负责约束众人者称为“管众”；管教众人吃斋者称为“调众”；买办祭品者称为“供主”；催人办供者称为“催众”。教内萧呈、王国里两家比较富裕，凡教内之人无力上供时，均由两家垫办，故称之为“大乘会首”，取承担大众之意。[3]

（二）林清、李文成与天理教

天理教是嘉庆年间新出现的一支秘密教门。首领主要有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

林清（1770—1813），祖籍浙江绍兴，自幼从其祖父迁居直隶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县）黄村宋家庄。“林清，顺天府大兴县人。其先世居浙江绍兴，父先本自浙北徙，侨居大兴县黄村之宋家庄，充南路巡检司书吏。清少无赖，先本捶挞之，不克悛，屏处药肆，习贾人业。体生疡疽，贾人逐之。清大困，为宣武佣役，击檄守夜。先本卒，清充黄村书吏，旋革去，乃往江南充粮道署役，复役丹阳县署。清有口给，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弃若粪土。及事觉，官绳以法，清潜逃后窘甚，附粮艘短纤至通州，归宋家庄，偕诸无赖少年贩鹌鹑于京师之西安门外。有王将军者，清为书吏时旧相识，与其家人同开雀鸟铺，分金不均，且奢用无节制，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刘环之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③ 《上谕档》曹振镛等折，道光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又见逐，嘉庆丙寅依其甥董国太家。"①其外甥董国太称："我外祖林原是绍兴人，移住大兴黄村地方，在黄村巡检衙门当书吏，又充南路厅稿工。我舅舅林清于十七岁时曾在京中西单牌楼南首路西九如堂药铺内学徒三年，学会手艺，并略懂医病，就出了九如堂，到三里河不记店名药铺内做伙计，每月得工食京钱六千。因他常在外嫖娼，身生疮毒，被药铺逐出，他就雇给顺城门外街道上打更。其时我外祖父已死，黄村衙门书吏缺底顶与别人，每年给我外祖母京钱五千。后来那顶缺的不肯给钱，我外祖母在南路厅控告，要将书吏缺底归还我舅舅充当。南路厅批准，我舅舅就接充了有一年。因浑河办工私折夫价，被本官查出革退，就在黄村将所折夫价做本钱，同他大姐夫崔老伙开茶馆，约有半年。他终日赌钱，亏输折本，崔老不依，将他撵了。他就偷扒边墙出口，到热河投在汗巴大人处管布达拉石作工程，得了些钱。回到黄村，每日吃喝嫖赌，把钱花完了，就上苏州，找着他三姐夫施姓，替他转荐到四府粮道衙门当长随。后因本官丁忧，他跟了丹阳县知县。又因知县解铜去了，他到江宁一路替人医病，赚得钱文，随手花费。后来不能存活，雇给粮船上拉纤，回到通州。……回到我家住了几天，上京来至顺城门外，向素识的旗人平老二雀鸟铺内赊了鹌鹑，在街上挑卖。后来有西安门内光明殿地方姓王的老爷，听说是做过将军的，因买鹌鹑认识。看他的相，说他有出息，交给他京钱一千吊，伙开雀鸟铺。他娶了一个女人，仍旧混花，把本钱花光。那时王老爷死了，王少爷本要将他送官。他再四恳求，才饶了他，撵了出来，在宋家庄租房。居住数月，因他女人身死，他往张家口讨鹌鹑账去了，至嘉庆十一年方回。我母亲因我父亲已死，叫他住在我家照料家务。"②林清在入教之前，是个流氓无产者，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嘉庆十一年五月，林清由董博望介绍，拜宋进耀为师入荣华会。③ 荣华会又称龙华会，属京畿红阳教系统，又称"白阳教"或"白阳教荣华会"，"一名天理会"。④ 林清师父宋进耀说："嘉庆十年，我拜青云店顾文亮为师入白阳教。"⑤荣华会首领郭潮俊则称："于嘉庆十一年十一月间，拜顾文亮为师入白阳教荣华会，他教我八字真

---

① 《靖逆记》卷五，"林清"。

② 《董国太供词》，载《故宫周刊》第222期。

③ 《靖逆记》卷五，《董国太供词》。

④ 《靖逆记》卷五，《董国太供词》。

⑤ 《宋进耀供词》，载《故宫周刊》第222期。

经。"[1]荣华会的前身是红阳教。据宋文潮供:"本庄住的宁进会原是红阳教的人,他常劝我入会,说入了会有好处。米见吃,柴见烧,我应允,随于嘉庆七年正月间同宋文哲拜宋进会为师,入了他的会。他教给我'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咒语。到十三年上,因红阳会被人告发,宋进耀与宋进会商量,把红阳会改为荣华会。"[2]可见荣华会(龙华会)或白阳教、白阳教荣华会,乃是京畿红阳教的一个支派。我们从郭潮俊供词中,又可知白阳教或白阳教荣华会,又是八卦教中的坎卦教。郭潮俊说:"(嘉庆)十二年六月间,顾文亮病故,我的徒弟宋进会、宋进耀推我掌坎卦数"。[3]

嘉庆十三年,京畿红阳教被人告发,林清受到牵连而吃了一场官司,但事后却使他成了坎卦教的首领。据董国太供:"(嘉庆)十三年间,他(按:指林清)在家教书,因同会的陈茂林被陈茂功在保定府告发,牵连杖责,所有坎卦头目宋进耀、宋进会、刘呈祥俱已充徒。郭潮俊亦不能办事,说我舅舅命大,让他做了教首。"[4]当时情况是,林清在受到红阳教一案牵连而遭杖责,并押解到保定去作证。回来后首领宋进耀、宋进会、刘呈祥等皆被发遣,教内群龙无首。资格比较老的郭潮俊又"性怯啬,遇事畏葸",得不到教徒们的拥护,林清便趁机取得了教内领导权。据郭潮俊供称:"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来,我因他势大,就将坎卦交林清掌管。"[5]

这里遇到一个问题:即荣华会、白阳教的前身是红阳教,而白阳教、红阳教又属八卦教中坎卦一支,那么,红阳教与八卦教之间有无渊源关系呢?近来有学者提出:清代华北地区的八卦教,实来源于明末以来京城一带流传的红阳教。嘉庆年间秦学曾即秦理供称:八卦教"传教的祖师,自顺治年间太监魏子义转传与李乐天,到山东又改名刘奉天,传与南方郜姓,又传与清丰人秦姓,又传与曹县人王姓"。"这先天老爷就是刘奉天。这王姓就是震宫王老爷"。据此,认为供词中的刘奉天便是八卦教创始人刘佐臣,而"刘佐臣很有可能就是李乐天,至少也是红阳教首领李乐天的徒弟"。因而认定"八卦教是红阳教的一个支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给事中李喜元等折,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九日。
② 《郭潮俊供词》,载《故宫周刊》第222期。
③ 《郭潮俊供词》。
④ 《董国太供词》。
⑤ 《郭潮俊供词》。

派”。[①] 这个论断虽然尚属推测性质，不过从八卦教的教义、教规和师承关系来看，此说尚属可信。因为八卦教按八卦收徒，以山东单县为中心，北方为坎卦，京城地处单县之北，故称坎卦。而且京南一带的坎卦一支，同华北地区八卦教，确有密切关系。乾隆三十三年，坎卦教首张柏曾收京南大兴县的屈得兴为徒，屈得兴直到乾隆四十二年还在大兴一带传习坎卦教。有学者曾推出京南一支坎卦教的师承关系如下：

刘省过→张柏→屈得兴……顾文亮→郭潮俊→宋进耀→林清。[②]

正因为红阳教同八卦教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林清后来才能以荣华会即坎卦教首领的身份，到山东、河南等地去联络那里的八卦教徒。林清在传教时，自称为“后天祖师”，假托刘姓转世，也就是因为刘佐臣系“先天祖师”之故。

林清在取得京南大兴、宛平一带荣华会（坎卦教）的教主地位以后，又逐步把京畿青阳教中屈四领导的一支，和红阳教中李老领导的一支也吸收进自己的教派，又进而统一了京东通县和直隶固安、雄县等地的坎卦教。此后，林清又开始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这时，他记起了因红阳教犯案而在保定作证时认识的牛亮臣。

牛亮臣（1760—1813）河南滑县人，曾充任滑县“库房”。嘉庆十一年因“赔累窃当库贮脏衣六件”而逃往保定，住在唐家胡同解役的小店，后来返回河南。嘉庆十三年再次来到保定，住在马家店内，帮助照应门面。同年，林清因红阳教一案来保定作证时，也住在马家店内，遂与牛亮臣相识。牛亮臣曾与林清攀“教道”，林清对他说：“这教本名三阳教，分青、红、白三色名目，又名龙华会。因分八卦，又名八卦会，后又改名天理会。每日朝拜太阳，念诵经语，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乱时候，并可乘时图谋大事。”[③]牛亮臣因林清“讲的理深”，对他甚为佩服，遂拜林清为师。嘉庆十三年春，林清案结之后，便带牛亮臣来到大兴县黄村，并推荐他在附近苏光成家教书。后因学生听不懂他的河南口音，把他辞退。牛亮臣于嘉庆十五年二月返回河南滑县。嘉庆十六年二月，林清打算联络直鲁豫三省八卦教，便想到了牛亮臣。他带领教内支进才、孙九来到河南滑县，找到牛亮臣。又通过牛亮臣，认识了牛的连襟冯克善及冯的表兄李文战。

---

① 李尚英：《天理教新探》，载《华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② 马西沙：《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载《清史研究集》第4辑。

③ 《牛亮臣供词》。

冯克善(1777—1814)河南滑县人,少年时曾从该县朱吕村人唐恒乐(唐胡子)学习武艺,精于骑射与枪法。嘉庆二年又拜山东济宁人王祥为师,学习拳棒。[①]“克善尽得其术,徒手搏击,数十人无敢近者。”[②]王祥系八卦教内离卦教首部生文后代部添麟的弟子,可见冯克善当时不仅向王祥学习拳棒,而且可能也学习离卦教。所以嘉庆十五年春间,牛亮臣发现冯克善拳法中有“八方步”时,问他说:“你脚步是按八卦么?”冯克善问他:“你何以知道是八卦?”牛亮臣答以“我本习的是坎卦,我所以懂得是八卦。”冯克善便称自己所习是“离卦”,二人大喜。牛亮臣说:“你既是离卦,我们是离坎交宫。”[③]嘉庆十七年四月,冯克善在山东德州收宋耀隆父子为徒,习离卦教。后来,回到滑县,又收牛亮臣之子牛文成和浚县李大成为徒,逐渐成了离卦教头目。

李文成(? —1813),河南滑县人,世居该县谢家庄。他“少孤,为木工佣保,人呼李四木匠”。后来他放弃木工手艺,“从塾师习书算”。李文成颇为颖异,学算学时,“粗解意义,辄疑难相辩驳,塾师厌之,遂请绝焉”。他“专研算术”,并兼涉“星家象纬,推演颇验”。[④] 嘉庆十年拜刘国明为师入震卦教。李文成颇有领导才干,在教内,凡“有条理不当者,文成厘次剖晰,众推服之无异词”。[⑤]

林清在结识冯克善、李文成后,三人结为“刎颈交”。这一年,林清先后于二月、五月、九月三次来到河南滑县,与冯克善、李文成共同商议联合当地各教派之事。为了得到当地各教派的信服,林清诡言系刘姓转世。在教内宣传“老刘爷从前是弥勒佛下来,死过多年,如今真姓转生,不过四十多岁,名叫刘真空,又叫刘林,号霜木即双木,原是单县宋家庄人”。[⑥] 他“自言预知未来事,审祸福,明吉凶”。[⑦] 他还利用自己能言善辩的本领,帮助李文成向当地震卦教教主梁健忠夺权,成为震卦卦主。据教内骨干秦理供称:“梁健忠本系八卦会内九宫卦首,平日吃斋静坐,同教人都信服,帮给银两使用。李文成从前也敬奉他,自与林清结识后,因林清常说梁健忠所传道不真,李文成曾同众人到梁健忠家讲论,

① 《冯克善供词》。
② 《靖逆记》卷五,《冯克善》。
③ 《冯克善供词》。
④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⑤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⑥ 《张建木供词》。
⑦ 《靖逆记》卷五,《林清》。

争做卦主。梁健忠因势力不敌,始将家存教内经卷、底簿交给李文成掌管。后来,李文成就敛取众人银钱,送林清使用。"①据刘宗林称,梁健忠任卦主时,广为收徒。凡住在附近村庄者,大多被招引入教,并交纳粮食钱文,家中所藏登记教徒交纳钱粮之底簿即有七本,内中"开写男妇姓氏三千八百余人,每人名下注有钱文、粮食数目,并地亩品级"。②

林清在帮助李文成夺得震卦卦主地位后,又以《易经》中"帝出于震"一语,称"震卦乃八卦之首",遂令其余诸卦,"各听约束"。这样,李文成便以"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成为当地八卦教的总教主。李文成为了答谢林清对他的帮助,便"奉林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形成"八卦九宫,林李共掌"的局面,③从而完成了统一滑县一带八卦教的目的。

统一后的八卦教仍然沿用林清在京畿传教时所使用的天理教这个名称。不过,直到天理教起义失败之时,教徒们仍然习惯于自称"白阳教"、"荣华会"、"龙华会"或"坎卦教"。新形成的天理教,也同其他秘密教门一样,最初既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没有造反思想,教首们主要着眼于传徒敛钱,教徒们则为了消灾避劫和祈福。教首们为了敛钱,规定入教时必须交纳"根基钱",也叫"种福钱","入教者俱输以钱,曰种福钱,又曰根基钱"。④ 声言凡入教交纳根基钱者,"若逢未来佛(按:即弥勒佛)出世,即有好处"。故"此时名为根基钱,将来即为元勋钱"。⑤ "给伊家根基钱,待弥勒佛出世,共享荣华,间有所给其家之钱,名为元勋钱者。均不过欲其家将来能与人富贵之意。"⑥根基钱之数额各地多寡不一。有的"入教之始,每人纳钱二百文"。⑦ 有的"交给根基钱三百,三百三四十不等"。⑧ 有的则"给粮食一二升至一二斗不等"。⑨ 要根据交纳根基钱之多寡,决定来世得到之好处。除根基钱外,还有"跟账钱"。入教以后,每逢年节,教徒

---

①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二;《军录》那彦成奏片,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② 《刘宗林供词》,《军录》托津等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③ 《靖逆记》卷五。

④ 《靖逆记》卷五,《林清》。

⑤ 《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二。

⑥ 《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二。

⑦ 《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⑧ 《金乡记事》卷二,《八月二十三日通禀》。

⑨ 托津等:《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八。

还要向教主交纳奉献。“清明、中秋，随力致献，谓之跟账钱，卦主受之。”[1]秘密教门首领们向入教信徒们敛钱，实际上是他们借传徒来追求金钱的手段，并无“革命”的意义。有人认为“这种钱则纯粹是为了救青黄不接或荒歉年月的贫民的。由此可见，天理教的性质，是农民阶级和城市贫民的一个革命组织，是一个进步的秘密团体”。[2] 这无疑是对天理教的理想化。实际上，天理教和其他秘密教门的首领们，通过传徒等手段敛得之钱，绝大部分由他们自己花用，甚至用来购置产业、田地或为子弟捐官。用于周济贫苦教徒者，却较为罕见。

天理教在教义、教规等方面，大多沿袭红阳教或八卦教的内容。其中有关青阳、红阳、白阳三劫之说，便来自红阳教。《靖逆记》中提到天理教“造妖书，言弥勒佛有青洋、红洋、白洋三劫，此时是白洋应动”。这里所说的青洋、红洋、白洋实际上便是青阳、红阳和白阳。三劫之说乃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共同信仰，按照红阳教的说法，现世社会乃是由释迦佛掌教，是属于红阳劫期，并且已经到了红阳劫的“末期”。这时，堕入东土的众生，将要遭到巨大的劫难，蒙受水火刀兵之厄。红阳劫过去之后，则是充满光明、幸福的白阳劫期。因此概括出“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的教义，引导人们向往白阳劫的到来。红阳教这个教义，完全被天理教所继承和发展。在天理教的经卷《三佛（教）应劫总观通书》中，所说的“三佛”便是指过去佛即燃灯佛、现在佛即释迦佛和未来佛即弥勒佛。他们分别是青阳劫、红阳劫和白阳劫期的主宰即掌天盘者。因此，京畿一带的红阳教也称“三阳教”，或分别称青阳教、红阳教与白阳教。三阳教崇拜的未来佛便是弥勒佛。林清在传教时宣扬：“有青洋（阳），红洋（阳），白洋（阳）三劫，此时白洋（阳）应劫。”又说：“若逢未来佛出世，即得好处。”[3]天理教也从八卦教教义中吸取了不少内容。如林清自称“后天祖师”，便是假托自己系山东单县刘姓即八卦教创始人刘佐臣转世。天理教的教义、教规，也多来自红阳教与八卦教。如入教时，教首向教徒授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每日盘坐向着太阳，曰抱功，两手拳抱当胸，早念二十七，午念五十四，晚念八十一遍”。[4] 有的“每早东向跪接太阳诵二十七遍，午间南向跪朝太阳五十四遍，晚间向西跪送太阳

---

① 《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② 萧育民：《清嘉庆天理教起义》，载《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三联书店，1958 年。

③ 《靖逆记》卷一，《平定林逆》。

④ 《朱成珍供词》。

八十一遍”。[①] 有的“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书于白绢，暗室供之”。[②] 除每日三遍礼拜太阳外，还要练运气功夫，并口诵咒语：“太阳出来一滴油，手执钢鞭倒骑牛，闭住红门血不流。”

各地天理教的仪式不尽一致，有的教首传徒时，也创造一些新的内容。如教首徐安国在传胡德成为徒时，“叫我（按：指胡德成）洗了脸，喝了茶，点着香。徐安国左手大指、食指伸起掐诀，右手食指、中指伸着，说是剑诀，嘴里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咒语。还说：每日早晨、晌午、晚上念三遍，久了自有好处。若替人治病，大病念五十六遍，小病念六十六遍，又叫我上了几个钱。如上一个钱，将来就是一亩地”。[③]

二、老理会即坎卦教

嘉庆年间，在直隶新城、固安、新安一带，流传的老理会即坎卦教，与大兴一带林清传习的坎卦教即荣华会（后改称天理教），有着密切关系。坎卦教是八卦教中最早的三支之一，由山东金乡人侯棠充任教首。乾隆年间，由直隶容城人张柏任卦主，在直隶、山东流传。山东一支以孔万林为首，直隶大兴一支，以屈得兴为首。林清的天理教，实际上是红阳教与坎卦教融合而成。

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清吏在搜捕天理教教徒的过程中，发现了直隶新城、固安一带的老理会。被捕的老理会首领，为了免于受到天理教的牵连，竭力否认该教同天理教之间的关系，也尽量掩盖该教同八卦教之间的关系。因而在这些供词中，有不少是不实之词。为我们研究老理会的情况，造成很大困难。在教首王锐的供词中，为了掩盖该教同八卦教的关系，称该教系山东李二所创立，传与其妹李氏。李氏后来嫁给山东曲阜人刘姓为妻，生有三子，长子刘大红，次子刘二红，三子刘三红。[④] 刘氏弟兄又“转传不知何县人王二，到直隶容城县，传与已故之张二即张柏及高时雨二人为徒。张柏又传固安县王国秀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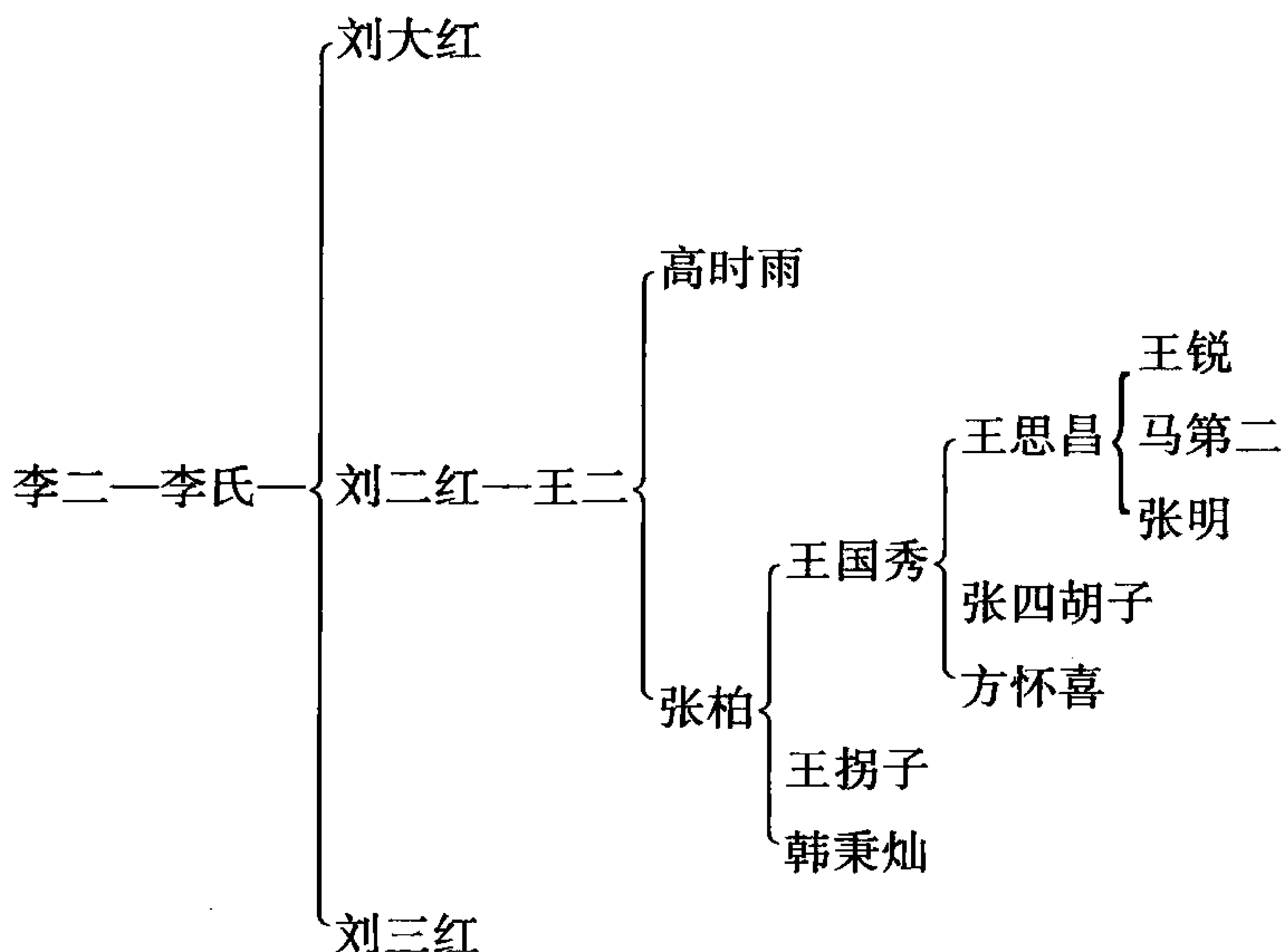
① 《金乡记事》卷一，刘五、周拴等供词。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同兴折，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

④ 《王锐供词》，转自刘铮云：《清代的宗教结社——以直隶老理会为例的个案研究》，载（台）《食货月刊》复刊第十五卷，第十一、二期合刊。

新安县王拐子、雄县韩秉灿为徒。王国秀又传王思昌、姜士连、历枚、马添保、刘大用及固安县王起信、辛基远、王栋等人为徒。王思昌又传王锐等为徒。有学者根据王锐的供词，把老理会的师承关系，列成一表：①



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guin）认为，王锐供词提到的刘大红、刘二红、刘三红，便是山东单县的八卦教首刘大洪、刘二洪、刘三洪。红与洪同音，可能系录供者之笔误。但台湾省学者刘铮云却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刘大红弟兄并非刘大洪弟兄。他提出三点理由："首先，籍贯不同，刘二洪是单县人，刘二红是曲阜人；其次，兄弟数目不同，刘二洪有兄弟四人，刘二红则仅有兄弟三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身世不尽相同。刘二洪可谓是宗教世家……刘二红的家世没有这么显赫，其父是否教徒，仍待考"。又说："由于白莲教各派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宗教组织，虽同是八卦教，可能因创始人不同，而不相统属。因此，这坎卦教与当时流行于直隶的其他坎卦教有何关系，仍是个问题。然而，我们确知，老理会的坎卦教与林清所领导的坎卦教（又称荣华会）并无直接联系。"②

那么，事情真相究竟为何呢？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件奏片，为我

① 刘铮云：《清代的宗教结社——以直隶老理会为例的个案研究》。
② 刘铮云：《清代的宗教结社——以直隶老理会为例的个案研究》。

们探讨老理会同八卦教的关系，提供了线索。该奏片写道："从前查办单县人刘省过接充教主一案，刘省过之子刘铨即刘大洪、刘齐年即刘二洪，刘把印即刘三洪，均经拿获，分别正法、发遣。"又称刘姓弟兄三人"皆系刘佐臣子孙"，"单县刘姓，实为老教首，刘大洪等并非籍隶曲阜，王锐所供，自系错误"。[①] 此奏片不知作者为谁，仅知系嘉庆二十三年八月即老理会结案时所奏。在奏片中老理会教首的名字已写作刘大洪、刘二洪、刘三洪，而非王锐供词所说刘大红、刘二红与刘三红。奏片明确指出刘大洪等三人"皆系刘佐臣子孙"，而且王锐所供刘大洪等籍贯系曲阜，"自系错误"，从而解答了刘铮云先生认为刘大红弟兄不是刘大洪弟兄的疑问。同时告诉我们，直隶固安、新城一带流传的老理会，便是山东、直隶一带流传的八卦教，刘大洪等人父亲便是八卦教教首刘省过。老理会并非山东人李二所创立。王锐所供，无非为了掩盖该教同八卦教间的关系。在王锐的供词，虽然竭力否认该教与八卦教的关系，但我们从供词中提到该教教首张柏与潘均一事中，可以找到老理会同八卦教之间的密切关系。王锐提到：刘大红、刘二红、刘三红"到直隶容城县传与已故之张二即张柏及高时雨为徒"。"山东章丘县已故之潘家庄人潘均，系由曲阜刘姓所传。"[②]这表明张柏与潘均皆系刘大红弟兄所传之徒。实际上，张柏与潘均都是刘省过掌教时期八卦教内的重要教首与骨干。乾隆四十年，大学士舒赫德曾提到"白河沟张二即张柏系属卦主"。[③] 坎卦教首孔万林还是张柏之徒。孔万林自称："系坎卦支派，传自直隶容城县人张柏。"[④]张柏同八卦教教首刘省过有着密切关系。乾隆二十二年刘省过进京传教时，曾住在张柏家中，临行，张柏又送给他一辆马车并派遣弟子护送。潘均也是八卦教内的重要教首与骨干。在刘省过掌管八卦教时期，潘均多次把敛得之银钱送给刘省过。据山东巡抚陈预奏，"乾隆三十七年办理刘省过接充教主案内有章丘县人潘筠与刘省过认识，曾代历城县人崔兴东寄送刘省过银两"。又说："潘筠即潘均，本系刘省过案内寄送银两之犯。"[⑤]

这些事实表明，直隶固安、新城一带的老理会，实际上便是山东单县刘姓所

---

① 《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594/4。

② 《王锐供词》。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舒赫德折，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④ 《朱批奏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⑤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初五日。

传的八卦教支派。因直隶固安、新城一带地处山东单县之北，在八卦中以坎卦为北，所以老理会乃八卦教中之坎卦教。那么，这一支坎卦教同大兴一带林清所传坎卦教即荣华会有无关系呢？回答也是肯定的。大兴县一带的坎卦教教首屈得兴，便是八卦教坎卦教首张柏的弟子，对此前面已经叙及。张柏正是直隶固安、新城一带坎卦即老理会之教首。据坎卦教内王士俊供称："乾隆三十四年间，有容城县的张柏传与屈得兴，屈得兴又传给了我。他教我运气养身，曾说过他们的教主是刘省过。"①嘉庆年间，大兴县一带坎卦教教首为顾文亮，顾文亮传宋进会、宋进耀为徒。据刘环之奏，杨石曾"拜青云店顾文亮为师，教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杨石后来又"转传宋家庄之宋进会、宋进耀"，宋进耀"又传与林清做徒弟"。林清的外甥董国太也供称：杨石"与青云店顾文亮系亲戚，他入理是顾文亮传的，顾文亮又传给郭潮俊。郭潮俊传给宋进耀时，是杨石引进的。宋进耀又传给我舅舅林清"。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弄清，大兴县一带坎卦教，乃传自直隶容城人张柏。嘉庆年间，这里的坎卦教教首顾文亮传给宋进会和宋进耀，宋进耀又传徒林清。嘉庆十三年，坎卦教遭到破获，便由林清改组为天理教。可见老理会与大兴坎卦教实为一支，都是由张柏所传。当然屈得兴与顾文亮之间的师承关系，由于史料缺乏，尚不清楚。但老理会与天理教之间有密切关系，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档案史料中还可知道，老理会的部分骨干，还加入过林清的荣华会。据直隶总督方受畴称："林清及随同滋事之犯，多系老理会改入荣华会，是老理会最为酿逆根柢。"老教首王国秀之子王亮也供称："不记年份，有素识之魏白儿劝伊入林清荣华会，伊曾两次出钱，每次四五百文，至魏白儿家做会。是魏大彬用纸将各人姓名开写，众人挨次跪下，给林清磕头完毕，将纸焚烧，名为动纸。至会中人，伊只认识李五、魏大彬。"②参加天理教起义并攻打紫禁城之役的老理教教徒，不仅有首领李五，而且还有厉玉、张廷玉、王添瑞、白玉、张荣等人。他们"均因入荣华会，随同逆犯滋事，拿获正法"。③ 当然，老理会中拒绝参加天理教起义者，也不乏其人，如教首王锐本人就因为自认系该教"根子"，加之认为举行起义还时机不到，因而拒绝参加林清的荣华会。嘉庆十八年六、七月间，王锐的舅子崔文平在劝他入荣华会时，他回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绵恩折，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答说："我原是山东老理会的根子，如何肯入你们的教，叫你们管着呢？我们教内有四本大账，并听得我父亲曾说过，二十八宿于丙戌年落凡，尚有九曜星宫中央转，八大菩萨转在黄宫院，真紫微壬辰年间也落凡，这个时候尚早，二十八宿尚未转下，如何闹得事呢？"①

我们从王锐等人的供词得知，老理会分为四支，其中北方一支以张柏为首，其他三支因史料缺乏，未知其详。张柏曾传徒王国秀，王国秀又传徒王思昌，乾隆五十九年王思昌身故，老理会由其子王锐掌教。王锐又名王瑞，系直隶新城县色垡村人，与其兄王珂均随其父王思昌习教。王锐掌教后，教徒们因他"年轻理浅"，加上他又不熟悉医道，也不会推拿之术，难以借治病来招引徒众，因而对他"都不信服"，以至纷纷散去，使老理会"渐就衰歇"。嘉庆二年，王拐子欲重振老理会。王拐子是新城县尹家庄人，张柏之徒。嘉庆二年二月，他携带其子王玉前往山东章丘，寻访老教首潘均。潘均即潘筠，系张柏同时期之教首，曾在直隶容城一带传教，认识之人甚多，在教内有较大影响，所以王拐子打算利用潘均的声望来振兴老理会。当时潘均早已过世，其子潘恒阁外出赶集，仅见到潘均之侄潘五在家。王拐子便留给潘五十斤棉花，让潘五转送潘均之妻。在询知潘五靠卖香为生时，便告诉潘五说，容城、新城一带香价较贵可以前去售卖。②嘉庆六年二月，潘五用小车装载了四五百封香，到阜城、河间、任丘、容城、新安等县售卖，于三月二十日来至尹家庄，拜访王拐子。王拐子便劝潘五假充潘均之子，以便向徒众敛钱。潘五允从，遂有教内马第二、张明、王锐等人来到王拐子家，向潘五行礼。潘五则按照王拐子的吩咐，对大家说："好好儿行这个礼，不要瞒心昧己做坏事。"王拐子利用潘五假冒潘均之子的名声，控制了老理会的教权，让教徒们纳钱给他。老理会称新入教者为"新来的理"，必须拜一名老教徒即"老理"为师傅。师傅则向他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经，及盘腿坐功运气之术，每逢初一、十五，要烧三炷香，念诵"八字真经"。入教后，新教徒称师父为"叔叔"，或"老人家"，这一点在秘密教门中比较特殊。在教内有一定地位者，则立有名号，如张柏称"道德真实"，高时雨是"盛德真实"，王国秀是"普度诚实"，王思昌是"尽度诚实"，王拐子是"厄度诚实"。现存资格最老的教首，

---

① 《王锐供词》，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及其支派》，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8期，1980年5月。

②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陈预折，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被尊为“老教根”。[1] 老理会也同其他秘密教门一样，教首要求徒众们定期交纳钱文。教内有所谓“教中老根如紫微，大家都要供给他”的惯例。至于所纳数额，则未加规定。王拐子说纳银乃“随缘助乐，不拘多少”。一般每年交纳一次，或二三次。数目则自一二百文至七八百文不等。当时每个雇工，每天可得工钱约七八十文至一百二十文，据此判断，教徒所纳之钱，数额尚不为多。教徒所纳之钱，也由教首们层层上交。据王锐供称，其父王思昌每年向徒弟们敛钱，然后交给王国秀，王国秀再送交张柏，张柏又转交刘大红。老理会的成员，也多为下层劳动者，如农民、小商贩、手工业者。在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中，只有少数人以个人名义加入了起义。但是，起义失败后，老理会也受到牵连，主要教首皆被捕，该教亦随之消失。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第十七章 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九、十月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起义,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京南大兴、宛平的一支起义队伍,在宫中太监接应、引导下,攻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①] 以致嘉庆皇帝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还告诫群臣,要"永不忘十八年之变"。事定之后,混战中射在隆宗门匾额上的一个箭镞,一直被保留着,以告诫爱新觉罗皇室的子孙们,永远记住天理教攻入皇宫的教训!这次起义,是继嘉庆初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后,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以秘密教门为旗帜的农民起义,对清王朝封建统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当然,它不可避免地有其缺点与局限性,我们今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应该对其功过是非,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起义的性质和原因

分析天理教起义的性质,首先涉及天理教本身性质的看法。以往,一些学者为了歌颂农民起义,往往对天理教加以理想化。有的学者称"天理教的性质是农民阶级和城市贫民的一个革命组织,是一个进步的秘密团体"。"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革命情绪",具有"革命性质"这些说法,多由于对秘密教门性质的误解所致。过去有人称秘密教门是"农民的宗教","造反的宗教","被压迫阶级的宗教"。[②] 其实,在秘密教门的教义中并无"造反"或"革命"的内容,只是在阶级矛盾激化时,农民起义首领或教门首领,把秘密教门中某些教义加以引申,并加入诸多与下层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世俗性口号。宗教总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它引导人们向往来世的幸福和死后天堂的美好生活,都只能起

---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

② 《历史上有无被压迫阶级的宗教?》,载《青海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到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至于秘密教门,从本质上看它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参加者大多出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的原因,是希望借助于秘密教门的势力去实现改善自己地位与处境的理想。因此,它不是宗教团体而是秘密结社,天理教也同其他秘密教门一样,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所以不能称为"农民的宗教",或"被压迫阶级的宗教"。

至于天理教起义的原因,也应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作为一次农民起义,它乃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这方面以往学者们作了不少分析。如有人指出,乾隆中叶以后,地主阶级加紧掠夺兼并土地,官吏大肆贪污,营私舞弊,从而加剧了直鲁豫三省的阶级矛盾。嘉庆年间,这一地区占有数百亩以至数千亩土地的大地主,比比皆是。而终岁辛勤劳动的农民,却仍然"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儿号寒,几于无生"。[①] 嘉庆十七、十八年,直、鲁、豫三省连遭天灾,到处歉收,广大农民衣食无着,地方官又趁机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从而引发了这场农民起义。

其次,我们还应该从秘密教门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寻找原因。某个秘密教门的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形成一股社会势力之后,其首领必然萌发登极称帝的政治野心,企图对现政权取而代之。林清、李文成的经历均说明了这一点。林清本来是流氓无产者,李文成是木匠,入教之初仅是一般小头目。后来随着在教内地位的提高,便希望利用教内的势力,进行夺权,所以,天理教起义,也是该教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

二、起义的酝酿与准备

天理教起义是林清、李文成等利用当时广大农民对清统治的不满,发动的一次带有教门色彩的农民起义。林清、李文成在成为天理教教首后,首先大量向徒众们敛钱,宣称:"凡有送给钱文、粮食者,许俟李文成成事之后,给与地亩、官职,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②]天理教首领在敛钱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组织,扩大队伍。林清、李文成取得河南滑县一带八卦教领导权后,又通过弟子把其势力向各地扩

① 道光《辉县志》卷十八,《艺文志》。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托津等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展。李文成的弟子徐安国原来曾在直隶长垣、东明一带传徒，拥有一定势力。嘉庆十七年又受李文成之命，去同山东曹县、金乡、定陶一带的八卦教徒相联络，使之俱归入了李文成的震卦教(天理教)。是年八月徐安国来到金乡县，会见了当地离卦教首崔士俊、张建木等人。对他们说"震卦教胜于离卦"，劝其"改离归震"。崔、张二人听从其劝说，并拜徐安国为师，改习震卦教。[①] 又告诉他们："各卦已零落断绝，现俱无人。今刘姓教首(按：指林清——引者)生于坎方，合震、离两卦即为三才。"[②]经过徐安国的宣传、鼓动，使山东定陶、曹县、单县、城武、金乡等地，有大批人加入天理教。嘉庆十六年，徐安国又收曹县人朱成方为徒，朱成方又大量收徒。其中有"男女大小徒弟一百三十家，共约六七百人"。[③]李文成通过冯克善、刘国明等人，又将山东德州以宋跃隆为首的一支离卦教，与山东曹县以朱成贵为首的震卦教联成一气，纳入天理教的势力范围。

林清、李文成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便着手确定起义的具体日期。嘉庆十六年八月，清廷钦天监奏称"彗星出西北方"，此兆"主兵象"。朝廷遂以"本朝不宜闰八月"为理由，"改癸酉闰八月于次年二月"，[④]以躲避兵灾。李文成则以"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乃举兵造反之预兆。经过推算，起义造反之日期确定为"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为起义举行之期。[⑤] 适有民谣"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发"，[⑥]与李文成确定的起义时期恰好吻合。因为清廷虽然把闰八月改为九月，而九月十五日便是第二个八月中秋，故"八月中秋，中秋八月"，而"黄花满地发"，则可暗指起义的爆发。同年九月，林清来到河南滑县，便商定了这一起义日期。

嘉庆十七年九月，林清再次来到河南滑县的道口镇[⑦]，住在孔继太店内，同李文成、冯克善、于克敬、冯学礼、牛亮臣等商议起义的具体步骤和有关事宜。正式确定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组成领导核心。据林清供

① 《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同兴折，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③ 《徐安国供词》。

④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⑤ 《靖逆记》卷一，《平定林逆》。

⑥ 《靖逆记》卷一《平定林逆》。

⑦ 道口镇当时尚属浚县，今属滑县。

称:“众人说我是太白金星下凡,又说我该做天王(皇),有卫辉的冯克善该做地王(皇),李文成该做人王(皇)。将来事成之后,天下是人王的。天王、地王就同孔圣人、张天师一般。”①并且确定了宫主与宫伯。计有:

兑宫王:刘国明

震宫王:宋克敬即宋老秀

巽宫王:王修治

艮宫王:刘宗顺

坤宫王:冯相林

坎宫王:尹老德(故后由其子尹振继任)

乾宫王:寿光德

离宫王:王道隆②

在八宫王之下,每宫又设八个宫伯,因此,八卦共有六十四个宫伯。据史料记载可以查到的有下面一些人。

震卦伯:王元士、王元相、霍云璧、霍经扬、张大有、孙大可、安怀普、陈国安;

离卦伯:程动、王聚、袁得建、周大禄、刘之江、赵得一、张奉桂、李存信;

艮卦伯:史泳山、蒯应宗、周方付、周呈贵、冯可广、李大来、宋元勋;

坎卦伯:冯坦、王元杰、董仓、张一凝、李奉岐;

坤卦伯:吕国太、冯见礼;

巽卦伯:刘万仓、任连、王修身、刘福荣、尚大兴;

乾卦伯:张思敬、程百岳、蔡之忠、董计文;

兑卦伯:朱成贵、黄兴宰。③

因被捕者口供彼此歧异,并不准确。

此外,还确定了起义使用的旗帜、服色与联络暗号。大家根据牛亮臣的提议,决定起义时使用白色旗帜,用白布裹头、系腰。并且确定“明号”即公开的口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若有人查问,只说得胜二字,就认成一家,可免杀害。”④

① 《林清供词》。

② 《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八及《秦理供词》。

③ 据李祖德:《林清与京畿天理教暴动》。

④ 《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八。

嘉庆十七年十一月，牛亮臣、李文成、于克敬等亲自来到京南大兴县宋家庄林清家中，进一步策划造反之事。于克敬把一部《三教应劫书》即《三教(佛)应劫总观通书》献给林清。这部经卷对林清、李文成举行造反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该经卷中"以燃灯佛、释迦佛、未来佛为三劫"，"其书内有天盘三副"说，[①]即过去由燃灯佛掌教，现在由释迦佛掌教，将来由弥勒佛掌教。三劫说与天盘三副说，为林清、李文成的造反行动提供了教义上的依据。既然天上掌盘的神都要改变，人间的主宰自然也可以改变了。

其次，林清见该书内有"十八子明道"一语，便附会说："现在姓李的应世，李文成应做人王"，[②]向徒众们宣称："李文成即明朝的李自成。"[③]在林清的鼓动下，李文成又自称"李自成转世"。[④] 又因河南各地有民谣："若要红花开，须要严霜来"，便自号"盐霜十八子"，为自己登极称帝制造舆论。林清也因自称刘姓"转世"，徒众们皆尊他为"刘老爷"，他便在教徒中传播歌谣："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⑤]汉帝即指林清本人，因他以刘姓自居。另外，他还在京南大兴、良乡一带民间散布民谣："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⑥]天理教还用劫难将至，入教参加起义可以免灾难来吸引徒众。林清根据《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中有关劫变说的内容，声称："本年八九月间，白阳大动，刮黑风七昼夜，惟入教之人，临时各给奉天开道小白旗，即可免祸。其余遭劫，一概死亡。"[⑦]又说："今岁九月后交白阳劫，劫数到时，教主给白布小旗树于门，可免杀戮。""凡无旗者尽杀之。"[⑧]

许多群众为了躲避灾难而纷纷入教并加入起义队伍。通过教徒的辗转相传，入教者越聚越多。教徒王垣等人入教并参加造反，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情况。王垣原籍山西，寄居山东德州，与景州人宿元漠相熟识。嘉庆十八年

---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② 《牛亮臣供词》。

③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

④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⑤ 《靖逆记》卷五，《刘国明》。

⑥ 《卢沟桥都司陈绍荣供词》，载《故宫周刊》，第226期。

⑦ 《金乡记事》卷一。

⑧ 《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九月初，宿元漠告诉王垣说天理教即将造反，届时只有持有教内所发布旗者，才可免被杀害。他给了王垣白布旗二块，上写“奉天开道”四字，令他待起义爆发后，将尖角旗插于门首，方旗插在妇女衣襟，作为暗号，并且为造反者烧茶煮饭，即可保得身家性命。王垣听从，又将此事转告给素习清净门教的齐呈祥。齐呈祥闻言十分畏惧，即拜王垣为师入天理教。王垣便仿照宿元漠所给之旗帜式样，制造六块，分给齐呈祥二块，魏福生二块，自己保留二块。齐呈祥又另外仿制布旗二块，转传道士罗功。罗功入教后，又转传素好的马渊、杨逢年。杨逢年干脆出钱给罗功，让他买布制造了布旗四十块，上写“奉天开道”字样。马渊取去十三块，杨逢年取去十二块，罗功又分给素识之王泮二块，张盛二块，孙起和三块，刘爽三块。这样，教内白旗先后又制造了五十余面，传徒数十人之多。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天理教的首领们，终于把京畿大兴、宛平、良乡、通县及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带的天理教徒和大批穷苦农民及其他下层群众，引上了起义造反的道路。

三、起义始末

天理教的领导集团，在经过一系列筹划与准备之后，决定于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在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同时举行起义，直鲁豫三省的队伍迅速来京会合，以夺取政权。这个战略决定，是嘉庆十七年十一月李文成等人在京南大兴县黄村林清家中作出的。“冬十一月李文成来见林清于黄村，约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时，直隶、山东、河南同时起事。且曰：公此间兵少，滑县兵不下数万，仆当选精兵先期诡作商贾，陆续驰至以助公，蔑不济矣！”并嘱咐林清说：“必俟滑兵至，公乃发，毋轻举！”[①]八月十六日林清从河南回到大兴后，李文成又派其养子刘成章来到黄村宋家庄林清处，告诉他“九月十五日河南兵必至京”。林清得到这一保证后“大喜”，遂于八月二十日与陈爽来到北京城内，同太监刘得财、高广福商议九月十五日攻打紫禁城的具体方案。[②]

---

① 《靖逆记》卷五，《林清》。

② 《靖逆记》卷五《林清》；《董国太供词》。

(一)滑县首义

在起义的计划、步骤确定后,天理教首领们便着手做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

在河南方面,李文成令牛亮臣率领八百余人在浚县大伾山之东坡地方打造军器。李文成本人则在滑县谢家庄进行组织与筹划工作。因事机不密,被滑县老岸司巡检刘斌所侦知,[①]报告县府。知县强克捷闻讯,于九月初二日派遣差役陆安帮、陈天路等将李文成、牛亮臣等拿获。审讯时,李文成"坚不吐实",并"指斥县令诬良为盗"。[②] 强克捷闻言大怒,遂"喝用夹棍,复用木棍挞之数百,文成两股顿烂。又杖牛亮臣数百,血流遍体,收禁下狱,将解省正法"。[③]

李文成、牛亮臣的被捕,对于正在酝酿中的起义,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教内骨干黄兴宰、黄兴相弟兄及李文成的妻子李张氏等,商议于九月初七日攻打滑县,进城杀官劫狱,以营救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前往山东德州去约宋跃隆举事的首领冯克善,在得知李文成、牛亮臣被捕后,遂急忙返回道口,同于克敬、黄兴宰等人策划攻城劫狱之事。初七日清晨,冯克善、于克敬、黄兴宰弟兄、李张氏及李文成几个侄子,带领八宫王六十四宫伯及手下徒众约三千余人,于"初六日五鼓攻城,入县署屠之,吏役德克捷,缒克捷城下。克捷孑身走封邱,后自缢于封邱廨"。[④] 于克敬、冯克善等人占据滑县,救出李文成、牛亮臣。李文成自称"大明顺天李真主",在滑县城"开帅府、设羽帐,帐中出令七传,呼声彻数里"。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分理军事。[⑤] 次日,李文成又派冯克善、于克敬率领一军去攻打邻近的浚县,但一直包围了二十多天,仍未能将县城攻占,但清守军也已疲惫不堪。[⑥] "先是士座有惫卧者,呼之则起,后则扶之乃起,至是虽扶之有不起者。"

(二)直鲁响应

滑县举义对邻近各县产生很大震动。九月初六日与河南滑县相邻的直隶

---

① 赵如椿:《黎阳见闻录》。
②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③ 《靖逆记》卷三,《滑县之难》。
④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
⑤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⑥ 《黎阳见闻录》。

长垣县知县赵纶，风闻该县离城十八里之苇园村有“邪教”活动，便亲自率领衙役，以“出城查看秋禾”为名，进行查访搜寻。赵纶抵达后，即被当地“头缠白布，身穿白衣，手执器械”的天理教教徒所包围并擒杀。① 接着，鲁西南一带天理教也纷纷起而响应。

曹县

九月初三日，教首徐安国、朱成方令该县教首胡德成、纪大幅在城内举事。九月初七日，教内骨干朱成珍等七人被捕，情况十分紧急。初九日晚，胡德成、纪大福等便率领徒众二三百人，往攻县城，以营救朱成珍等。初十日，攻入城内，在千总衙门杀毙千总杨云汉。然后赴监狱营救朱成珍，最后至县署，将知县姚国旃杀死。②

定陶

九月初十日，天理教起义军进攻定陶。由署县贺德瀚率兵守城。破城后，清军外委张廷力率兵丁抵拒，后因头受枪伤败逃。起义队伍即直奔县署，将贺得瀚杀毙。曹州营参将刘凤喈闻讯带兵往救，也大败，仅以身免。

金乡

金乡天理教教首崔士俊系徐安国之徒。早在嘉庆十八年二月，徐安国来金乡时，便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告诉崔士俊等说，“今岁九月后，交白洋劫。劫数到时，教主给白布小旗竖于门，可免杀戮”。其后，徐安国又带领崔士俊、张建木等来至滑县，拜见李文成、刘国明。李文成鼓励他说：“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同年七月，崔士俊被捕后解省处死，当地教徒群龙无首。而新任县令吴阶又做了充分的防守准备，起义很快遭到失败。③

天理教起义使清廷受到很大震动。嘉庆皇帝令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率兵由北面进军；令山东巡抚同兴在滑县东南方面堵截，令河南巡抚高杞紧守西、南两面，以防起义军进入太行山区。④ 后来，又令山西大同镇总兵张绩在扼要处驻扎，令徐州镇总兵迅速“迎头北上”，以便“并力兜围”。又令两江总督百龄在徐州驻扎，以防起义军南逃。

① 《靖逆记》卷二，《长垣定曹之变》。

② 《靖逆记》卷二，《金乡守城事》。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同兴折，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④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三，嘉庆十八年九月丁丑。

（三）血溅紫禁城

当清廷忙于调兵遣将，打算集中兵力将河南滑县等地的天理教起义军一举歼灭时，京畿的天理教徒在教首林清策划、指挥下，于九月十五日按照原定计划，由宫中太监引导，袭击了紫禁城，造成一起“汉唐宋明未有”过的“癸酉之变”。清制每年七月至九月，皇帝循例要赴承德避暑山庄，其间还要去木兰围场行“秋狝礼”。这时，朝廷的政治重心便移至承德，只留皇子及一些大臣在北京皇宫中，处理日常事务。嘉庆皇帝于嘉庆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自圆明园启程，于七月二十四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一直住到八月十五日，八月十六日动身前往木兰围场。林清等人正是利用了北京和宫中守卫松弛之机，采取了袭击紫禁城的行动。

林清最初打算派人去烟郊（燕郊）围场劫持嘉庆帝，后来虑及围场清兵守卫严密，而改为袭击紫禁城。据被捕的屈四供称：“去年（嘉庆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刘第五引我到宋家庄见刘四即刘呈祥。他们二人对我说，我们宋家庄、桑垡两处现有五六十人，你那里要挑三五十人，凑合一百多人，齐上燕郊。我说，我们庄上‘在理’不少，内中有年老幼者，不能得力。要挑精壮后生，只挑出十来个人，不能有三五十人之数。他们二人就将我的话告知林清。随后林清叫我去见，说‘你那里既凑不了三五十人，我这里也分拨不开，围上护从官兵也多，竟不必上燕郊，九月十五日往京中闹事，官兵们措手不及，必能得手，我们据了京师，就好说了。”又说：“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①所以他对于袭击紫禁城一事，并未认真准备。他平日也不习武，有人劝他练习击剑，他竟说：“吾有神助，剑术不足道也。”②只向徒众们说：“此时是改换天盘的时候，未来佛要掌教，我们该时兴了。”“闹了京城，想皇上就要回关东去了。”③把一切成功的希望均寄托于“神助”。有人担心人数太少，难以取胜，要求林清等候河南兵到后再动手袭击紫禁城。林清回答：“一人一骑破幽州，这不值什么。”④又说：“入城只

---

① 托津等：《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

② 《靖逆记》卷五，《林清》。

③ 《屈四供词》。

④ 《刘得进供词》。

用数十人,多则语易泄败。其精锐悉布外城,迎河南兵,外城乱,内城不攻自破矣。"①

林清主要把希望寄托在联络统治阶级内的曹纶和宫中太监身上。

曹纶是独石口都司,汉军正黄旗,出身官宦之家。当时曹纶生活十分窘迫,林清在成为天理教教首后,时常周济曹纶,并把他拉入教内。嘉庆十七年五月,曹纶进京领饷时,曾去大兴黄村宋家庄与林清相见,并参与了策划袭击紫禁城的密谋。九月十三日,林清曾派人去同曹纶联络,希望在袭击紫禁城时,得到他的帮助,后因未能见到曹纶而作罢。

林清同宫中太监的联系,是通过教内陈爽所建立的。最早加入天理教的太监刘得财,是大兴县桑垡村人。嘉庆十七年二月,同村的陈爽邀他回村,对他"厚待之,欢宴累日,赠之兼金",并同他"约为兄弟,患难相共"。刘得财感激之余,便应陈爽之邀,加入了天理教。刘得财入教之后,又传太监王福禄、高广福、张泰、阎进喜、杨进忠等人入教。② 嘉庆十八年三月,林清在紫禁城西华门外饭铺会见了太监刘得财、刘金、高广福、张泰、王福禄等五人。对他们说:"劫运将到",让他们准备在袭击紫禁城时充当内应。是月二十四日,林清再次来到北京,在顺城门外菜市口酒铺内见到刘得财等四人,告诉他们将于九月十五日起事,让他们届时在宫内负责引路。向他们许诺,将来事成之后封刘得财为大总管。九月初二日,陈爽又约见刘得财,交给他白布数方,作为入宫引路之用。③

为了动员教徒参加袭击紫禁城之事,林清等采取了利诱、威逼或欺骗的手法。教徒王有信说:"九月十二日,陈爽叫我同他到京去东华门闹事,事成后看我功劳大小,给我官做。"④李得全供:"他(林清)说,现在劫运已到,九月十五日他要起事,叫我帮助。我说将来事成有何好处?他说,事成之后,总有官给我做。"⑤有的教徒供称:"同他们进京闹事,将来许小的做个县官。"⑥对于不肯参加造反行动的,则加以威逼。朱套儿供:"九月初二日,屈四约我跟他进城闹事,

① 《靖逆记》卷五,《林清》。
② 《靖逆记》卷六,《刘得财》。
③ 《靖逆记》卷六,《刘得财》。
④ 《王有信供词》。
⑤ 《李得全供词》。
⑥ 《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八。

给我白布二块，刀子一把。并说，如不肯随他，定行杀害，我只得应允。"①阎七供："十五日黑早，我女人亲弟屈明儿来对我说，屈四今日造反，要你帮助他。"阎七不敢应允，屈明儿说："你若不去，屈四将来得胜，你全家性命不保。"②韩达子也说：韩来车儿劝他参加进京闹事时威胁他说："林清利（厉）害，若要不去，在家也是死，我就应允了。"③屈四还威逼在城内唱戏的安国泰，令他在城内引路，对他说："如若不去，先把你杀了。"④有些徒众和一般群众，则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骗入城内的。屈四在让李振邦进城时，告诉他"十五日起早到东华门去，到了那里给你刀，你先在那里等着，到那里再告诉你做什么。"⑤屈四在让刘狗儿买刀时，对他说是"宰牲口使用"。⑥ 这样，一些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引上了进京造反的道路。

在天理教袭击紫禁城的行动中，林清等人在大兴、通县及邻近的直隶固安、新城、雄县等地，动员了一百四十多人。九月十三、十四日，各地的教徒陆续来到大兴县黄村宋家庄集中，林清从中挑选了七十余人，分别由陈爽、陈文魁二人率领。九月十四日晚，林清让大家吃过晚饭，每人发给白布二块、刀一把，然后连夜进京。由陈爽率领黄村、桑垡两地的二十余人，由东华门攻入；由陈文魁率领宋家村、洪家村、太平庄及雄县、固安等地的五十余人，由西华门攻入。为了便于行动，不被官府发现，决定将起义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进城，并且扮作小贩，暗藏武器，在外城菜市口等处会齐，然后进入内城。据李兰供，其父于九月十二日买了两筐柿子，在筐底藏了十三把刀，于十四日晚来到永定门外歇息。十五日早晨挑柿筐来到前门外，然后来到西华门。李六供，十四日晚带了刀子、白布来到熊老五家，把刀放进熊老五的柿子筐内，路上轮换挑着。到菜市口遇见贺八等人，分头在饭铺吃了饭，然后来到西华门外，从柿子筐中取出刀子，掖在衣底。⑦ 九月十五日中午，大家按照约定的时间，分别来到东华门与西华门附近。据陈爽供称："本年九月十四日，林清拨派我进京起事，约定十五日陆续进南西

① 《故宫周刊》第226期。
② 《故宫周刊》第227期。
③ 《故宫周刊》第229期，《韩达子供词》。
④ 《李振邦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⑤ 《安国泰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⑥ 《刘狗儿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⑦ 《李兰供词》，《李六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门，进前门到东华门外南池子酒铺会齐。午刻进去，分为两拨，我带龚恕、祝显、李龙、王升，有三十多人，进东华门。陈文魁带同刘进亭、贺八、许进玉等四十余人，进西华门。”“至晌午时，我同龚恕等数人，携刀先后进东华门，有内监刘得财、刘金领我进去，奔苍震门。往北遇见两人，我砍了一刀，就见一人躺下，有官人赶上将我打伤拿获。至我带进东华门的虽有三十余人，因官人查拿关门，我们只进去五六个。”①龚恕供称：“我于九月十五日将刀一把揣在怀内，起身由南西门走进前门，至东华门外南池子地方，内监刘得财先在酒铺等候。我与陈爽等三十余人先后走至。刘得财说：‘进去走东边苍震门，就有预备，我们三十余人要进东华门，被门上官兵拦住查拿，只有五六人跑进。刘得财在前引路，有官人拿棍打我，我用刀砍了他一下，跑至东边窄狭地方，即被拿获。”②太监刘得财供称：“十五日早起，我出东华门遇见陈爽们，说带了三四十人来，我同他们在酒铺坐着，到午时同他们进内。我同刘金引路，从苍震门进去。只进了龚恕、刘进玉二人，就被打倒拿住。”③松筠奏称：“署护军统领杨澍增于九月十五日轮值景运门该班。是日早晨进门，于午时刻有进内回事之镶白旗护军校图敏，杨澍增随令其前赴各堆拨，取查报单。忽见图敏慌忙跑回，声言东华门兵丁喊有贼人内。杨澍增即同图敏各持腰刀跑出，向南夹道传喊：快关东华门！并传集各堆拨。该班官兵见有一贼持刀自南夹道来，奔至北夹道南门，杨澍增当同图敏喊截，随有东华门追捕之兵赶来用刀连砍。时杨澍增同图敏俱曾砍贼一刀，随即缚住，看时已经杀死。适闻苍震门太监喊说内里有贼，杨澍增即带兵赶赴门口。太监说不可擅入，内里之贼我们自行捉拿，令在外边守护。忽又传报东华门有贼，其时兵丁已传集百十余人。杨澍增即分派一半人守住苍震门，自带一半人至东华门围捉。见门已关闭，有贼五人持械乱跑，随督兵将其攒射、矛扎、刀剁，立时歼毙。”④

西华门一路。陈文魁带领的四十多人，在太监张泰、高广福引导下，由西华门进入紫禁城，很快来至隆宗门，抢得门卫的弓箭，作为武器，准备由隆宗门进入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大内”。守卫兵丁急忙将大门关闭，造反者被阻于门外，

① 《陈爽供词》，见《故宫周刊》第203期。

② 《故宫周刊》第203期。

③ 《刘得财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④ 《朱批奏折》松筠折，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其中一人便爬上大墙,准备越墙而入。当时,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急得"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身边的太监常永贵提醒他"用鸟枪拦打"。旻宁遂在养心殿门外,用鸟枪将爬上西大墙的教徒射杀。当时在墙头的尚有三人,其中一人手执白旗指挥,结果也被旻宁射杀。不久,成亲王永理、镇国公奕浩率领官兵五六十人赶至隆宗门前,天理教教徒们在首领李五率领下,同清军进行了一场混战。混战之中,一个箭头射中了隆宗门的匾额,至今尚可看见。

天理教教徒们面对手持火器、刀矛、弓箭的官兵,难以抵拒,被迫从隆宗门向西华门方面撤退,并在西华门附近与清军展开一场激战,双方各有伤亡。后来,太监高广福把起义者由西华门马道登引上皇宫的城墙,有人拿出写有"顺天保民"及"大明顺天"字样的白布旗,往来于雉堞之间挥舞展示,希望得到来自河南接应者的援救。少数天理教徒见大势已去,便投入御河而死,有的则被官兵射杀。几个人藏于城墙堞草之中,后来又潜伏于五凤楼内(即皇宫午门之城楼)。入夜,清卫兵在城墙上搜寻,仍未被发现。次日天亮前,教徒们欲纵火将五凤楼焚烧,以便趁混乱中出逃。但火势很快为大雨扑灭,残存的教徒,亦被搜捕净尽。①

在九月十五日天理教袭击皇宫事件中,计有十七人被杀,十四人被擒获,共伤亡三十一名。次日又有二十七人被擒,十四人被杀,共伤亡四十一人。两天之内,共有七十二人被擒杀。② 宫中太监当中,高广福在紫禁城城墙上被射杀,杨进忠于事败后出逃,旋亦被捕。刘得财、刘金、王福禄、张泰、闫进喜等俱被捕获,后被凌迟处死。太监阎进喜在受审时,又供出许多虽未参与袭击皇宫事件但已入教为徒的太监,其中包括:毓庆宫的王进得,西六宫的王平,坤宁宫的周进喜,景仁宫的彭秃子,大殿的康景玉,天雄殿的孔景得,御花园的张正庭,三阿哥住所的彭老二,自鸣钟处的谢贵,及因赌博已被发遣的顾进禄。③

林清在派拨陈爽、陈文魁等率教徒进京造反后,便留在大兴县黄村宋家庄家中等候消息。造反事败,清吏从大量被捕教徒口中得知此事乃林清策划,即派人至黄村宋家庄逮捕林清。十七日清晨,林清及其外甥董国太被拿获。④ 据

---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②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

③ 《阎进喜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托津等折,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董国太供:"十五日早上,我舅舅出门一次,早饭后回家,叫我们打钹吹筒,他打鼓板。晌午后,他要睡觉,吩咐我们说,'若有人来就叫醒我'。起灯时,他醒了,叫我们各自睡去。十六早上,祝林们回来,同他说了几句话。他闷坐着,吃了一日的烟。到晚上,叫刘福受们打更,并说,倘有人来,即刻告知。十七黑早我起来出恭,见官人将他拿住。官人见我就一并拿住了。"①与林清同时被捕的,除林清妻子、亲属外,还有在林清家中做工的工人及同院邻居共二十余人。审讯时,林清供出了教内许多机密及同教教首、骨干的姓名。九月二十三日林清及教内田马儿等四十六人皆被凌迟处死,已故者亦被戮尸。② 参与这次事件者,除本人受到严厉惩处外,家属、亲友亦受到株连,事后官方共逮捕了近四百人。清朝当局对被捕者进行了将近四十天的审讯,"熬审竟日,跪练板责",用尽一切酷刑。最后被凌迟处死者七十三人,戮尸者五十五人,斩绞者六人。亲属因缘坐而被发遣新疆为奴者四十九人,被押送到闽粤、四川为奴者八十八人。

九月初十日,嘉庆皇帝自承德避暑山庄启程返京。十六日行至白涧,接到仪亲王等奏报天理教袭击紫禁城之事后,大为震惊。并于回京途中,在燕郊颁布《罪己诏》。诏书首先为自己表白,说自己继承皇位以来,"兢兢业业,十有八年,不敢暇豫。""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因此,对九月十五日这起"坐生肘腋,祸起萧墙"事件的发生,"实不可解"。遂把责任全部推给臣下,说是臣下"因循怠玩"所致。"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而"诸臣未能领会,悠手为政",终于酿成了这起"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③

(四)决战告终

林清策划并袭击紫禁城行动的前后,在河南滑县及直、鲁交界地带的天理教起义军,仍在继续活动。

在山东金乡,起义军在金乡久攻不下,九月十五、十六两日,起义军首领李卓立等率众在该县盐场地方与清军兵勇会遇打仗,结果大败。④ 曹县、定陶一带的起义军,人数虽多,但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且缺乏战略眼

① 《董国太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董诰等折,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③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

④ 《靖逆记》卷二,《金乡守城事》。

光，只顾眼前小利，主要从事劫掠商人，抢劫仓库，因而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从九月末到十月上旬，起义军先后在剪山、韩家大庙、马家集、扈家集、安陵集、郝家集等地同清军接战，都以失败告终。到十月初八日，山东的起义军已被全部消灭。但这时在河南北部起义军尚保存着相当大的力量。

清廷在平定了紫禁城事件之后，便集中力量镇压河南、山东、直隶一带的起义军。嘉庆皇帝在回到北京后，于九月十七日命令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节制山东、河南各路清军，并调清军中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固原提督杨遇春，率二千名官兵来河南助战。又令护军统领庆祥率火器营兵五百名、副都统长庆等率健锐营官兵五百，由北京出发前去“协剿”。又调西安将军穆克登布率满兵一千，副都统僧德等率马兵一千，皆受那彦成节制。

那彦成于九月二十六日出陕西潼关，由孟津渡过黄河，于十月初八日抵达河南卫辉。与直隶总督温承惠、河南巡抚高杞、山东巡抚同兴，从北、南、东三面对起义军形成包围圈。那彦成到达卫辉后，闻知滑、浚一带天理教起义军人数不下三万之多，便采取先不同起义军正面接触，而是调兵遣将，对起义军实行围剿的方针，以防再次出现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起义军蔓延数省的局面。他在与杨遇春联衔的奏折中写道：“贼匪情形已经洞悉，刻下贼匪大股仍在大伾山、道口、滑城一带盘踞，约计三万余人。”“惟此时兵力不厚，虽日见胜仗，不能痛剿，转俾贼匪学会打仗，愈长贼智。或得胜后我兵力量不能追杀到底，转致贼势蔓延。”“前次川陕教匪流毒数年，前鉴具在。”①嘉庆皇帝对于天理教攻入紫禁城一事余恨未消，急于消灭起义军，因而对那彦成等人的作战方针，极为不满，甚至对那彦成等破口大骂，在十月初六日的“上谕”中说：“本日接汝奏折，愤恨极矣！大逆林清勾结滑县李文成谋危社稷，现在李逆株守滑县，机不可失。朕日夜焦急，寝食俱废，望汝速剿大逆，奠安民社。不想汝到卫辉，迟疑不进，逗留观望，以等兵为词，大失朕望，是何肺肠，忍心病狂，天良何在！非阿桂之孙，非朕之臣，任汝为之可也。近因温承惠迟回贻误，所以用汝。孰意汝之因循疲玩，更甚于彼。汝以世家满洲，不及一山西人，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间乎！”“稍有人心者，孰不思灭此朝食，而汝漫不关心，可恨之极。可恨朕屡用庸臣，败坏国事。今

① 《朱批奏折》那彦成、杨遇春折，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日之旨，是汝生死关头。信与不信，凭汝自议。掷笔传汝，好自为之。”最后威胁那彦成说：“汝若再有迟疑，朕永不见汝面矣。”[1]面对来自皇帝的巨大压力，那彦成仍然坚持对起义军实行围剿的方针。起义军方面，李文成则错误地把主要兵力集中于道口、桃园、滑县这一三角地带，落入了那彦成设下的圈套之中。因此，在决战之前，胜负已经大体上决定了。双方在决战阶段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

1. 道口之役

道口系“滑浚屯粮大镇，西通怀庆，联接太行，为河南粮运大道”。[2] 对清军来说，“一得道口，即攻剿滑城，四面兜围，无难克捷。”[3]那彦成于十月十九日，命令兵丁假扮成乡勇秘密向道口移动，把道口包围。驻守道口的天理教首领徐安国、朱成方、黄兴宰等人为了突破清军的包围，于十月二十一日同清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双方皆有重大伤亡。二十五日，起义军决定从卫河东岸西渡突围，结果受到那彦成、高杞两面夹击，付出了惨重代价。二十七日，清军依恃炮火的威力，突入道口，起义军千人伤亡，首领徐安国、黄兴宰等率残部逃往滑县，清军则乘胜又将滑县包围。

2. 司寨之役

滑县被包围后，起义军主要首领李文成被困在城内，这对起义军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十一月初一日，天理教起义军首领刘国明、宋克俊、王学义等率领十百余人，乘夜从滑县北门（清军包围的缺口）进入城内，将李文成接出。次日清晨，李文成在刘国明等八百人保护下，乘车从滑县撤出，来至南湖，与当地起义军会合，然后率四五千人来到辉县境内的司寨。见该处“背山临川”，且“壕深墙固”，遂决定在此据守。[4] 这一战略决定，实际上是一大失误。因为清军很快便赶来这里，使起义军从滑县转移一举，失去意义。十一月十八日，清军总兵杨芳派步兵六百，又令吉林、黑龙江马队六百人分为两翼，埋伏于司寨附近山坳之中。十九日清晨，杨芳派侍卫苏伦保率兵四百前来诱敌。起义军派出三千余人迎战。苏伦保佯作败退，将起义军诱入埋伏圈内，伏兵枪箭齐发，苏伦保又返身

---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七，嘉庆十八年十月十六日上谕。

② 《靖逆记》卷三，《道口之捷》。

③ 《朱批奏折》那彦成折，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九日。

④ 《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

攻击,起义军大败,损失二千余众,清军乘胜将司寨包围。二十四日清军对司寨发起猛攻,寨内仅剩四五百人,仍拼死抵御。清军“屡次越壕攀墙,皆被枪石所阻”,以至“饮血苦战,尸如山积”。中午,寨墙的一段被攻破,起义军又用木板砖石堵塞,最后仍无法抵御清军的进攻。清军进入寨后,双方展开巷战。“寨内街道逼窄,短兵相接,贼势不支,纷纷避匿民房,悉力抵拒。”寨内有民房三百多间,皆系“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楼十余座,亭亭屹立,坚不可破”。起义军利用这一有利地形“据险掷石,枪炮齐发”,使清军“死伤甚众”。直至日暮,双方仍相持不下。总兵杨芳下令“举兵焚寨”,清军“且焚且攻”,很快便使得寨内“烟焰蔽天,贼尸塞路”,许多起义者被烧得焦头烂额。李文成等首领们踞守在一座碉楼之上,杨芳、特依顺保等率众登楼。突然,有一人自楼上跳下,自称刘国明,持刀击杀清兵数人,旋为官兵刺杀。杨芳令欲诱令李文成等人投降,喊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李文成抱必死之决心,在楼上大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当官兵登上碉楼后,发现李文成已举火自焚,其余数十人亦“群相拥抱而死”![①]

3. 滑县保卫战

李文成、刘国明率领一部分起义军从滑县转移出去以后,留在这里的起义军领导人是宋元成、牛亮臣、徐安国及李文成之妻马氏[②]。据牛亮臣供,“城中系李文成之妻马氏主持一切”。[③] 从十一月初起,清军就陆续向滑县附近集结,准备对滑县起义军包围之后加以歼灭。这些队伍包括来自北京的健锐营与火器营,吉林、黑龙江的马队,及来自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各省的驻军,加上本县招募的乡勇五千余人,共计有两万余众。十一月初十日以后,双方在此相持了近二十天。清军虽依恃优势的火力,以大炮对县城进行轰击,但“缘城郭甚坚,仅外层破皮,急切不能摧毁。”[④]从十一月下旬起,那彦成下令“于各门暗挖地道,中置地雷火药,以备轰城”。杨遇春还将林清之首级悬挂在滑县西门外的营帐之上,用以瓦解起义军之军心。起义军方面也加强了防守,赶造了四门大炮,十一杆鸟枪,并从地下刨出六百斤硝磺,用来制造炸药。十二月初二日,双

---

① 《靖逆记》卷三,《司寨之役》。

② 《靖逆记》把李文成之妻记为张氏。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牛亮臣供词,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④ 《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

方展开激战。清军在西南城角一带，堆积了大量积沙布袋，准备登城。起义军在城上"枪炮乱发，复抛下断碑巨石等项，致将地道打塌"。在东门一带，起义军原并未发现清军已经把地道挖至城下，守城起义军于夜间持火炬瞭望，恰好一个火把落入地道之中，结果"地雷猝发，内外俱焚，烧毙城内贼匪无数，官兵正在地道之中，亦被焚烧"。[①] 清军攻城未能得手，加之地道被起义军用巨石打塌，又于县城西南角挖掘明暗两条地道。十二月初九日晚间地道竣工，其中暗道已挖至城根，于地道内放置火药。十二月初十日，清军发动总攻击，双方进行了猛烈的攻防战。那彦成奏称："初十日卯刻进兵，齐攻五门。贼众在抵拒，枪石如雨。官兵奋勇扑近城根二次，均为枪石所阻。正在相持，奴才等一面令发地雷，一面催兵四面直进。讵贼匪施放枪炮，益加抗拒，官兵乡勇多有伤亡。时西南角地雷轰发，南门裂开城墙二十余丈，砖石乱飞，轰毙贼匪无数，贼始惊慌。"当清军利用云梯爬上城垛时，起义军"复在垛口拼命抵敌"。最后，五门俱被清军攻破，起义军在战斗中死伤了四五千人，余众"退回民房，闭门抗拒"。[②]

当晚宋元成、牛亮臣、徐安国等首领决定乘夜突围，率众欲从西南墙角被轰毁城墙缺口处冲出，但被清军截回，起义军只好在城内展开巷战。次日清晨，牛亮臣、徐安国劝李文成的妻子扮作难民出逃，她说："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遂挥舞双刀，一连击杀清军数人，最后"阖门自缢，幼女年十二，亦自刎"。[③] 起义军首领徐安国、牛亮臣等于城破时，藏于地窖之内，旋为清方俘获，被押送京师处决。宋元成在战斗中牺牲，王道隆、刘荣顺、冯相林、尹振、寿光德等皆被俘。起义军被杀、烧死者达一万七八千人，被俘者达二千余人。[④]

清军在镇压天理教起义过程中，每破一城，即大肆纵火焚烧，所到之处，多成废墟，使无辜百姓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起义失败后，清军又在滑县等地大肆抢掠人口。据那彦成奏："官兵所带幼孩，大率皆系良民，并有携带女孩者，甚至领队大员中，竟有每员带七八人，十余人不等。无怪乎沿途多有车辆，况有带回逆犯家属之事。纵暴殃民，莫此为甚。"又说："官兵将滑县子女纷纷携带归途，

---

① 《朱批奏折》那彦成等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②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③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④ 《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六。

所过如广平、顺德、赵州各属州县无贼之区,亦将良民幼孩任意带回。"①充分暴露了清军的野蛮与残暴。天理教在起义过程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值得中国人民自豪。而起义的失败,再次表明广大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不可能从秘密教门这种组织及其领导的造反活动中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通过入教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与处境。

(五)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清廷对教门的惩治力度的再次加大

嘉庆亲政后,在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后期推行的"不问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政策,尽管只是为了加紧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权宜之计,但是,毕竟改变了乾隆将教门信徒一概视为"谋逆"和认为"教即是匪"的做法,而是严惩为首,宽赦胁从,并将一般信徒同参加起义的教徒分别看待,以缩小打击面,有利于对起义军的瓦解与镇压。但是,新政策也确实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在此以后,官员们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教门活动的查禁。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各地教门又纷纷崛起,如嘉庆初年在陕甘的悄悄会(圆顿教);京畿、直隶、河南、山东一带的红阳教和八卦教;京城的无为教;直隶藁城县的龙天门教;河南滑县的老天门教;直隶晋州的黄门道;山东静海的白阳教;湖北襄阳一带的牛八教;山西曲沃的金丹圆顿教;河南涉县的圆顿教以及山东武城的一炷香等,其中不乏举兵造反者,最突出的就是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袭击紫禁城事件,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极大的震撼。事后,有大臣奏称:"办理邪教,总以有无传习经咒,供奉邪神,拜授师徒为断。至白阳教即系白莲教及八卦教之别名,最足为害。嗣后为首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律,拟绞监候,为从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旗人销除旗档,与民人一律办理。至红阳教及各项教会名目,并无传习咒语,但供有飘高老祖及拜师授徒者,发往乌鲁木齐,分别给旗民当差为奴。其虽未传徒,或曾供奉飘高老祖及收藏经卷者,发边远充军。至坐功运气,虽非邪教,亦比照故自伤残律,杖八十。若讯明实止茹素烧香,诵念佛经,只图邀福,并未拜师传徒,亦不知邪教名目者,方予免议。"嘉庆批示:"嗣后审办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凡传徒,为首者定拟绞决,其红阳等及各项名目,即照刑部所议办理。"②接连不断的教门

① 《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六。

② 《大清会典》卷七七六,刑部(三)。

案件和造反事件,和大臣们的奏报,促使清廷对惩办"邪教"的力度再次加大,相关条律也再次修订。清廷鉴于嘉庆十八年袭击紫禁城的天理教又名白阳教,属八卦教的分支,认为白阳教"即系白莲教及八卦教之别名,最足为害",应与其他未参与造反的教门区别办理。于是在嘉庆二十年将清律有关惩治教门的律例修订为:"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为从未逾六十及虽逾六十而有传徒事情,俱改发回城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如被诱学习,尚未传徒而又年逾六十以上者,改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旗人销除旗档,与民人一律办理。至红阳教及各项教、会名目,并无传习咒语,但供有飘高老祖,及拜师授徒者,发往乌鲁木齐分别给旗民当差为奴。其虽未传徒,或曾供奉飘高老祖,及收藏经卷者,俱发边远充军,坐功运气者杖八十。如有具结改悔,赴官投首者,准其免罪,地方官开造名册,申送臬司衙门存案。倘再有传习邪教情事,即按例加一等治罪。若拿获到案,原只为人治病祈福,并无传习不经咒语,亦不知邪教名目者免议。"①这样,就把原来《大清律》中"禁止师巫邪术"的笼统规定,改为以不同教名分别情况定罪,增加了官员在治理教门的可操作性。

嘉庆后期尽管由于天理教袭击紫禁城事件而导致对教门惩治力度的加大,但是,鉴于当时习教者人数众多,只好对肯"悔罪"者准予免罪。嘉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湖广总督孙玉庭奏报湖北省襄阳一带有邵元胜等多人传习牛八教,经地方官"宣谕开导,具结改悔",投案者共有364名。嘉庆帝鉴于习教者人数众多,随谕令对投首者免予治罪。认为:"乡民听信邪说,信从入教,本应治罪。但人数过多,愚民无知,一时被诱,不予自信之路,朕心实所不忍。"但又考虑到:"惟是此内真心改悔者固不乏人,恐亦有希图免罪,暂时投首者,阅时既久,难保其不故智复萌。应酌定条例,以示警戒。"遂又谕令地方官员"将此项具结改悔之人,再行晓谕,以该犯等本系有罪之人,现奉恩旨,准予自新,系属法外施仁。若改悔之后又复习教,则是怙恶不悛,定将加等治罪。责令各出具再犯习教情愿加等治罪甘结,方准免罪。"②

道光初年,又决定把原来留于本境"枷号示众"的人犯,立即解往配所。道

① 《大清律例根源》卷三十九,"禁止师巫邪教"。

② 《大清律例根源》卷三十九,"禁止师巫邪教"。

光元年十一月十六日上谕称："方受畴奏邪教案内留于本境永远枷号人犯，请即行解配等语。邪教案内应行发遣人犯，留于本境枷示，原以化诲愚蒙，俾知儆戒。今本犯既不知改悔，匪徒复踵习其教，自不若投之遐荒，免滋煽惑。著即照该督所议。""嗣后拿获邪教案犯审明应发遣者，均即行解配，其有情节较重者，发往配所永远枷号，毋庸留于犯事地方监禁枷示，以消萌蘖。"①

① 《大清律例根源》卷三十九，"禁止师巫邪教"。

第十八章　清茶门教与收圆教

一、直隶滦州石佛口王姓传教家族

清代的清茶门来源于明代的闻香教。闻香教创始人是明万历年间的王森。王森原名石自然，出身贫寒，本人做过皮匠，原籍顺天府蓟州，后迁居永平府滦州石佛口。其父名石奉，生有三子，王森行三，故在清茶门教的经卷中称他为"石家第三郎"。[①] 王森原习白莲教，后因得到"妖狐异香"而取名闻香教。相传"王森于先年曾路遇妖狐被鹰搏击，口作人言求援。王森抱回家，遂断尾相谢，传下异香妖术，后称闻香教"。[②] 由明万历年间的闻香教起至清嘉庆年清茶门被禁止，流传了二百余年，王森及其子孙在滦州石佛口和卢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教家族。

王森创立闻香教之初，以"吃斋拜佛"和"修桥铺路"相号召，颇受下层人民的欢迎。以后，王森见徒众日增，便以"夜聚晓散"的方式，从事秘密传教活动，宣扬天堂地狱之说，声称"信我可为王侯宰相，不信打落地狱"。[③] 广大下层群众为了消灾祈福，纷纷入教，人们不分男妇，"互相牵引，云合响应，顶礼皈依"。[④] 使闻香教很快蔓延数省。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森见皈教者益众，便开始"结纳将官"，并大量刊刻经文，准备举行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同年七月，将王森逮捕入狱，后以"左道乱正"之罪名判处绞刑，王森利用贿赂改判监禁。获释后，王森来到北京攀附外戚，结交宦官，"认王皇亲为一家"，改名王道森，又和太监王德祥认了本家，因而在京师一带"行教自如"，在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② 岳和声：《飧微子集》卷四《擒妖始末》，附：《妖首王好贤父王森旧招节略》。

③ 岳和声：《飧微子集》，《妖首王好贤父王森旧招节略》。

④ 岳和声：《飧微子集》，《遵蓟永三道会审妖首王好贤详招》。

"京邸盘踞日深",且以重金"招至营路健壮家丁吃双粮者"为徒,在各省、府、县置办庄田,"积杂粮无数"。这些田庄分布在永平、建昌、遵化、通州、密云、滦州、迁安、真定、广平等地。王森通过大量传徒敛钱,从原来一个贫苦皮匠,变为"家成巨富"的暴发户,其住宅"周围墙垣用石垒砌,屹然如城"。其子王好贤娶有一妻四妾,家中有家丁、仆役数十人。教内会首、传头中,也有许多人拥有巨资,娶妻纳妾,成为殷实富豪。王森故后,其子孙们继续从事秘密传教活动,并且同王森一样,也企图利用秘密教门的力量来实现其政治野心,跻身于上层社会。

明末,王森的子孙们看到腐朽的明王朝行将灭亡,便以投机心理,投靠关外的满洲贵族。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闻香教主"王石佛"曾派人赴辽东"请天聪为皇帝",以表达其对满族统治者的拥戴之情。后来,又派教徒崔应时、胡有升作书与清方联络,愿于清军攻锦州时约为内应。[1] 在明清战争中,王森子孙们投向清军一方,王森孙子王可就曾被清军授予参将,其家族也因此成了"汉军旗"。康熙皇帝为表彰其军功,还特制《诰命碑》:"尔王道森乃延绥镇延安营参将之祖父,植德不替,佑启后人,绵及乃孙,还彰鸣绪,休贻大父,聿观世泽。兹以覃恩,赠尔为昭勇将军,延绥镇延安营参将。"王可就之祖母孙氏,也因此而被赠为"淑人"。[2] 但是,清政权逐渐巩固以后,便改变了对"邪教"家族的宽容态度。王森子孙们传布闻香教(后改名清茶门教)的活动,不断受到打击,并未因王姓家族祖上立有军功或曾投入旗籍而稍加宽容。

自明末闻香教兴起至嘉庆二十年清茶门教被彻底摧毁,王森子孙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袭传教家族,成为一个以王姓子孙为骨干的地下神秘王国。

下面我们按照王姓家族的各支及其传徒情况,及王姓传教家族繁衍的情况,加以简要的叙述:

王森生有三子,长子王好礼,次子王好义,三子王好贤。

长房王好礼一支。

王好礼生子王图新,因无子,过继其兄王可就之三子王焕为嗣。王焕生子王敏迪,于康熙年间因传教犯案,拟绞监候,雍正三年遇赦释回。据直隶总督那苏图奏:"石佛口族人王敏迪,因祖父接交大乘教,经前督臣审拟绞罪,奉赦

① 孟森:《满洲老档译件论证之一》,载《明清史论著集》。

② 《民国滦县志》卷二,地理,丘墓。

释回。”①

据清档记载，雍正十年直隶总督李卫曾派人打入大乘教（即闻香教，亦称东大乘），探明该教教首系滦州石佛口王姓旗人武举。李卫奏称：“查得大成教首系旗人王姓武举，果住滦州石佛口，名下有次掌教二人，一系周世荣，住饶阳县曲吕村，今因瘫痪，有伊弟广东丁忧通判周臣代主其事；一系王瑛，住深州贡家台。周姓教中约有千余家，王姓教中几及千人。凡教内有能宣经讲道者，即为小教首，分住各处，招引众人。如深州之郑自昌，衡水之杨林全、侯遂平，河南地方之靳清宇，皆其领头门徒。”②

王敏迪生有三子，长子名王永泽，次子名王永德，三子名王永福。王永泽之子王炽早亡，又过继其弟王永福之次子王度为嗣。王度即王如青，曾在河南滑县及直隶邯郸、磁州传教，收徒郎文王、刘焕等人，后病故。

王度生有三子，长子王逢太，次子王交太，三子王履太。王逢太在河北邯郸、磁州一带传教，拥有“青山主人”称号，于嘉庆十九年被捕，解部监毙。王交太于嘉庆二十年在山西被捕，遣送回城为奴。

王敏迪之次子王永德生子王炜即王阛邦，在河南滑县传王献忠为徒。王献忠又传山西凤台县人孟克达为徒，孟克达又传王进孝为徒。

王炜无子，过继王好义之七世孙王汝谐为嗣。王汝谐又名王景益，嘉庆十九年犯案，在江苏扬州被捕，据两江总督百龄奏：“王景益即王汝谐，……该犯原籍直隶滦州，世习大乘教，后改清茶门，于乾隆五十九年间来至江南行医，带卖茧绸，寄寓山阳县人徐乔家内，旋将所习之教传授徐乔附近之张学义，并同籍之郎文玉，如皋县人李华山、吴书万、陆如春、段国兴，兴化县人周伦少等九人，骗钱四五百文至一二千文不等。讯非白莲等项邪教，诵习“报答天地日月水土父母之恩”等“不经咒语”。经审讯，判处发遣乌鲁木齐为奴，解至安徽凤阳地方病故。③

王敏迪之三子王永福亦生有三子。长子王诏，生子王际昌，于嘉庆十九年因在江南传教犯案，发遣邢台充徒。次子王度过继给王永泽，三子王融绝嗣。

二房王好义一支。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苏图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辑，直隶总督李卫折，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江总督百龄折，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王好义生子王可就，曾充任清军参将。王可就生有三子：长子王应麒，次子王应豸，三子王焕（过继给王图新为嗣）。王应麒的子孙中，尚未出现有名的传教家。王应豸的子孙中，则有几人颇为能干。王应豸无子，过继安家楼的王代修为嗣。王代修又无子，又过继其叔王应麒之子王永年为嗣。王永年生有四子，长子王勋，王勋的第四子便是过继给王炜的王汝谐即王景曾。王永年之次子王烈，曾在江南传教，嘉庆十九年犯案，解京途中病故。王烈将大乘教改名清茶门教。据两江总督百龄奏："王烈传大乘门，嗣改名清茶门，念诵佛偈，曾传过王际昌等人，给人供茶治病。"①

王烈生有二子，长子王秉钧，曾在江南传教，嘉庆十九年犯案，发遣庆云县。次子王柱儿，嘉庆十九年破案时尚年幼。

三房王好贤一支。

王好贤生子王如纶，王如纶之子王鼆举家迁往卢龙县安家楼，成为王森子孙中另一支传教世家。

王鼆生有四子，长子王通修，次子王逊修，三子王代修（过继王应豸为嗣），四子王德修。王通修一支传至王允恭时，曾偕其子王时玉赴河南新野传教。后王允恭病故，王时玉于嘉庆十九年犯案，被凌迟处死。

王逊修生有四子，长子王愓，次子王克己，三子王恺，四子王怿。王愓无子，过继四弟王怿之三子王廷俊为嗣。

大约在乾隆中叶，王鼆子孙开始向外发展，纷纷赴外地传教。王廷俊赴湖北，传徒李光大、吴大深等。王廷俊生有二子，长子王兴建即王勤学，在其父故后，曾四次赴湖北传徒，嘉庆二十年在湖北被捕后供称："我是直隶卢龙县安家楼人，年六十五岁。父王廷俊，母阚氏俱故，妻王氏，子王九思，孙带青儿。我家祖传清茶门教，我的教是父亲王廷俊传给的，我父亲从前在湖北传教。我父亲故后，我也往湖北传教，共计到过湖北四次。前后传过徒弟王自玉（种菜园）、王王氏、王三姑、方仲才（开剃头铺）、张受太（开剃头铺）、李塌鼻子（挑剃头担子）、王三婆、吴三婆、邹姑等二十人。王自玉等又传徒弟徐帼、陈家恒、方炳三人。"②

嘉庆二十一年，地方官再次对王兴建进行审讯，追查其传徒情况。查明王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江总督百龄折，嘉庆十九年三月初三日。

②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第48—49页。

兴建"收已故之王世中及其妻李氏,并现获之王之玉即王自玉为徒。嘉庆六年及十五、十七等年,该犯又潜行来楚,收现获在汉口开贸香铺之方四即方仲才、李塌鼻子、吴三婆、王三婆、邹姑、彭荣富、张寿太并王之玉之妻李氏即王王氏、王之玉之姊魏王氏即王三姑等为徒。王之玉又诱引已故之徐治幅、陈家恒及现获之房鸿江等,均拜王兴建为师。又究出王兴建于嘉庆三年在河南桐柏县已故之叶长春家,传教与随州人张士贵。"①

王逊修之次子王克己无子,过继其弟王怿之四子王栗为嗣。王栗生有五子,长子王三省曾赴湖北传教,次子王三聘即王绍英,见王炜在山西传教获利,曾于乾隆五十七年与五十九年,两次借看风水为名,到山西凤台县,找到孟克达、王进孝等。但仅住了一个月,并未传教,旋即返籍。嘉庆四年,王绍英再次来到山西传教。嘉庆十年,王绍英又来山西阳城县北音村,住在徒弟延克仲家,收徒传教。②

嘉庆十八年王绍英犯案被捕,审讯时供称系"直隶永平府卢龙县安家庄人","与滦州石佛口住的王景益皆系同族弟兄"。"小的三房祖在世时吃斋行教,每日清早向东朝太阳磕五个头,供一杯水。正午向南,晚间向西,均供水磕头,名为清茶门红阳教。奉的是未来佛,念的是'天元太保南无阿弥陀佛'。又有四句偈语:一朵白莲妥妥开,风吹花落地尘埃;因为修行百事理,磨坏铜帮铁底鞋。"③

王栗之三子王三顾即王泳太,于嘉庆三年来到湖北传徒,收汉阳人李朝桂即李朝柱、江夏人侯大华即侯大化等人为徒。嘉庆八年再次来到湖北汉阳,住在徒弟李朝柱家中。其徒侯大化又介绍方维炳即方文炳拜王泳太为师入教。王泳太又在汉阳收种菜园之陈大幗即陈大谷及镇四即镇大才二人为徒。嘉庆十五年,王泳太因家中贫苦,又到山西阳城县地方,寻见其兄王三聘,住了数月。嘉庆十七年三月,又到湖北汉口等处向其徒李朝桂等敛取根基钱,不久回家。嘉庆十九年,因石佛口王姓家族犯案,王泳太捏称并未习教,仅被逐解回卢龙家乡保释。回到卢龙后,见当地稽查甚严,恐怕败露,即于嘉庆二十年再次前往湖北躲避,住在汉口镇四家中。因查拿风声甚紧,故未敢逗留传徒,仅住了数日,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广总督马慧裕等折,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署理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署理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即前往襄阳,住在苏道士庙内。同年九月起身回籍,十二月初回至滦州境内,闻知石佛口仍严查清茶门教及王姓子孙,便未敢回家,逃到边外大乌兰地方,遇见胞侄王珠儿。嘉庆二十一年又与王珠儿由清河"进边",不久被捕。①

王逊修之四子王怿,因族祖王敏迪等于雍正年间犯案,王怿又因大乘教(大成教)名称难以招人,兼恐受到查禁,遂改称"清净无为教"。王怿曾赴河南传教,收杞县人王辅公为徒。王辅公又传江苏沭阳县人周天渠、通州(南通)人周受南为徒。因该教皆以清茶供佛,故又称"清茶会"。

王怿生有四子,长子名王秀,次子名王苞,三子与四子皆过继给同族为嗣。

王秀即王锦文,又名王景文,曾赴江南传教。乾隆三十六年在安徽安庆因传教犯案发配充军。王秀生有二子,长子名王亨恭(功),即王家栋,又名王来仪,因家中有堂名"忠顺堂",故号王忠顺。王亨恭即王忠顺成年以后,因家道渐贫,加之所传清净无为教无人信从,即于乾隆二十九年九月自称"弥勒佛转世",改清净无为教为"白阳斋教",而外间仍称其为"清茶会"。同年王忠顺与其父王秀以行医和看风水为名,赴各地传教,曾在京师传卖草帽之李尚升等人为徒。其后,王秀、王忠顺父子又南下传教,先至河南开州,又至杞县王家楼,打听王怿当年所传之徒,以收其父、祖之徒借以敛钱。他们在当地闻知王怿之徒王辅公已经身故,其子王汉九尚在,并为讼事所困扰。王秀父子即来至王汉九家中,言明自己身世后,便责怪王汉九"奉教不诚",以致"连年涉讼",且无子嗣。王汉九闻言大惊,甚为信服。王忠顺见王汉九已上圈套,便又称王汉九所奉之佛乃是"过去佛",而他本人乃是"现在佛",是弥勒佛转世,能知过去、未来。王汉九听后更加折服,遂拜王忠顺为师入白阳斋教,送给王忠顺白银二十两。王忠顺又让王汉九将房门方向加以改变,声言如此于一年之内即可得子。随后王忠顺因目疾返里,其父王秀仍赴江南行医传教。次年王汉九果得一子,对王忠顺更加信服,并与其妻汪氏亦收徒传教。

乾隆三十年,王汉九来到江苏的江都(扬州)、通州(南通),安东(涟水)等地传徒,声称教主系王忠顺,欲招集王忠顺旧日之徒归教,并收新徒入教,准备迎接教主王忠顺到来。乾隆三十四年王忠顺之祖父王怿去世,王汉九至扬州向徒众敛钱,每人一至四两不等,作为香奠送给王忠顺。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王

---

① 《朱批奏折》晋昌等折,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忠顺与王汉九一同由河南来到扬州，会见教徒，向徒众们宣讲“三皈五戒”。“听讲教徒每人纳钱五十文至二百文不等”。后又到安徽泗州传教。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湖北地方官府破获了严金龙传习“邪教”案件，捕获数名白阳斋教教徒，供出该教教主乃直隶滦州石佛口的王忠顺，遂派人在安徽泗州将王忠顺、王汉九捕获，[①]王秀受到牵连，亦被发遣至陕西临潼，旋于配所病故。

乾隆三十八年白阳斋教再次受到打击。是年二月，河南信阳州捕获白阳斋教李元义等十人，供称该教教首系湖北应山县人朱洪。官吏从教徒身上搜出《太阳经》及对联。对联中写有：“人从天命顺，佛明七窍真；阴阳还理照，天换世界人。”[②]上报朝廷后，乾隆皇帝认为对联内容“极为悖逆”，下令彻底查禁白阳斋教，[③]从而使石佛口王森子孙所传白阳斋教受到牵连。

王秀之次子王亨仲即王允元，也曾于乾隆五十三年九月来到湖北传教，收湖北京山县的余为淇等人为徒。余为淇原为其父王秀之徒，按照清茶门教的传统，老教主故后，其徒弟要重新拜老教主的儿子为师。嘉庆二十年王亨仲破案被捕后供称：“我是直隶卢龙县安家楼人，年六十三岁。我家世代传习清茶门教，我父亲王秀，我十八岁时父亲因入教犯案，问了军罪。”“我听母亲说，湖北京山县有我父亲传的徒弟余为淇们，我于五十三年九月到湖北安陆府京山县，找到余为淇、余为洗、刘东山，又到随州二道河，找着郑胜玉、陈少奇五人，共敛凑大钱四千五百文，名为根基钱。”[④]经审讯，王亨仲等于嘉庆二十年十二月被凌迟处死。[⑤]

乾隆三十六年王亨功（恭）即王忠顺被处死时，其子王殿魁年仅七岁。王氏家族为了使传教事业得以延续下去，在王殿魁年满二十岁成年之后，便由其祖母李氏向他传授清茶门的教义、教规，并口授“三皈五戒”，及为人供茶治病等。乾隆五十九年，李氏又令王殿魁赴江南收其父祖之徒。因他人生地疏，李氏便

① 《军机处月折包》，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何煟折，及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一日裴宗锡折，转引自庄吉发：《清代清茶门教的传布及其思想信仰》，载台湾：《大陆杂志》卷六十八，第6期。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南巡抚何煟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③ 《清高宗实录》卷九二八，乾隆三十八年三月甲子。

④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第49页。

⑤ 《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

让当年曾跟随王忠顺在江南传教时的家人马二陪同前往。王殿魁来到江南后，先后在江苏江宁府收其父王忠顺之徒秦过海、吴长庚等为徒，在淮安府传徐二宁为徒，在安徽泗州传王添弼为徒。以后，这些徒弟们每年皆要凑白银二三十两至四十两，送给王殿魁。

嘉庆八年以后，王殿魁在江苏山阳(今淮安)河下二十四、二十五堡蔡桥地方，以开设粮店为掩护，传徒行教。① 嘉庆二十年十月，王殿魁与其子王朝万在江南传教处所破案被捕。审讯时王殿魁供称："原籍是滦州石佛口人，顺治七年上祖上即移往卢龙县安家楼。""小的家世传清茶会即清净门，劝人吃斋念经。祖父王景文、父亲王亨功，于乾隆三十六年在安庆府传教犯案，把父亲正法，祖父发遣。那时小的才七岁。后来小的叔祖王烈、叔父王景益曾在江南传教，先后犯案问罪。小的于乾隆五十七年才到江南传教，先到淮安府吉安村徐二宁家，又到江宁府溧水县秦大彩之子秦过海家、泗州王维善之子王添弼家，南京城内人吴长庚家，均传了教。因他们父亲都是小的父亲徒弟，故此他们也给小的做徒弟。小的在淮安府山阳县河下二十四、二十五堡蔡桥开永昌粮食店，财东系山西汾州府介休人伍盛元。小的到淮安每隔五七年回家一遍。"②

王怿次子王苞曾在湖北传教，收李良从、张忝榜、李应豪、熊之信、李尚桂及妻樊氏为徒。王苞之子王秉衡即王书鲁，又名王景曾、王三重，绰号王大鼻子。乾隆五十二年随其父王苞来至湖北，传徒樊万兴、夏王氏、魏延宏即僧人相纯及杨振朝、李熊氏、莫国栋等。嘉庆十年，王秉衡到江南仪征，与该地柳有贤同住一处，遂收柳有贤为徒。又收湖北汉阳人、道士刘光宗为徒。嘉庆十二年，刘光宗回至武昌，劝其表弟杨玉麟吃斋入教。同年，王秉衡来至湖北，住在刘光宗庙内，杨玉麟即拜王秉衡为师。嘉庆十五、十八等年，王秉衡又先后来到湖北敛钱，并传徒姚大受等人。每次王秉衡回家时，入教之人皆送钱二三百文，名为"线路钱。"

嘉庆二十年八月，王秉衡在江苏犯案被捕，审讯时供出教内许多重要内容："年五十六岁，直隶永平府卢龙县人，学名秉衡，表字景曾。父王苞，母王氏。高祖是老三房，原住滦州西乡石佛口，嗣移居卢龙安家庄，离石佛口有十二里路。"

---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小的祖辈就是长斋，已有七八代了。传的是红阳教，又名大乘教、无为教，别号清净门。供奉观音，入教者须遵三皈五戒。""家中还有《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两部，《元亨利贞钥匙经》一部。现起抄白经两本，一名《老君度夫子》，一名《孔子度元关》，是小的父亲所遗，假托老子言语，劝人明心见性。"①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大体上可以弄清楚王森子孙在入清以后的分支及其在各地传教的基本情况。

二、清茶门教的教规、教仪与经卷

（一）教规、教仪

清茶门教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规、教仪，教徒们皆须严格遵守。当然，乾隆中期以后，王姓家族各支在各地传播时，又各有创新，因而其内容也不尽相同。

清茶门教在传徒时，首先要向入教者传授"三皈五戒。""三皈"是：一皈佛，二皈法，三皈师。"五戒"是：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邪淫，四戒荤酒，且不许食生葱、生蒜，五戒诳语。②

清茶门教作为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对教徒进行严格的约束，教内实行封建家长制，徒众们对教主要绝对信从，并要像对神灵一样顶礼膜拜。徒众们称王姓师父为"爷"，称师父的儿子为"少爷"，徒弟对师父自称弟子，见了师父要磕头，甚至见了王姓家族的幼孩，也要磕头给钱。③ 徒弟向师父跪拜时，师父端坐不动，并不答礼。徒弟不仅在拜师入教时向师父送钱，而且在入教以后，仍要定期向师父送钱，称为"朝上"。每年正月及十二月，均各向师父送钱一次，数量不限，称为"根基钱"，意指所送之钱，乃是为将来弥勒佛降生时获得幸福所打下的根基。也称"种福钱"，意指为将来得到幸福所种下的种子。

教内规定，每逢朔望，早晚要烧香，供清茶两盅。教内所崇奉的神，主要是弥勒佛即未来佛，也供观音菩萨、无生老母与阿弥陀佛。在乾隆中叶以后，由于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江总督百龄折，嘉庆二十年十月十四日。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③ 《郭大举供词》，见《清代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第51页。

王姓子孙纷纷出外传教，故在各地的清茶门教，其教规、教仪也不全相同。王三聘即王绍英在山西阳城一带传教时，称"清茶门红阳教"，其教规、教仪受到红阳教影响，每天向太阳供清水一杯，磕头三次，口诵"天元太保南无阿弥陀佛"。山西凤台县孟克达等传教时，规定朔望供斋烧香，口诵："一炷真香上金炉，求助获福免灾殃，免过三灾共八难，保佑大小多平安。"并规定每日早晚朝天供奉清水一杯。[①] 王阛邦在山西凤台传教时，亦称"清茶门红阳教"，除礼拜太阳与供清水外，口中还要念诵："圣里佛爷，凡里佛爷，治天治地佛爷，无生父母佛爷。"[②]王汝谐即王景益在河南涉县传徒时，称为"清茶门教"，除传授"三皈五戒"外，还授以咒语："酒色财气四堵墙，迷人不识在里藏，有人跳出墙而外，就是长生不老方。"[③]及念诵"一报天地之恩，二报日月之恩，三报水土之恩，四报父母之恩"四句偈语。[④] 该县清茶门教还规定每年三月初三，七月初十，腊月初八聚会三次。届期要悬挂弥勒佛像，供清茶三杯，并念诵《伏魔宝卷》、《金科玉律戒文》。王景益在该县传徒王幅，王幅之后由王九息接传，作为当地教首。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后，该教一度因官府查拿严紧而敛迹。嘉庆二十年七月，教内刘景宽因贫苦难度，又与同教之李太年商议复兴旧教。因无弥勒佛画像，即捏称王幅为凡祖法师，王九息为二法师，用黄纸写成牌位，供于家内。[⑤] 王时玉在河南新野一带传教时，也传有四句咒语："这杯清茶甜如糖，师父坐下讲家乡。只说凡事有父母，谁知慎中有亲娘。"[⑥]该咒语比王汝谐所传咒语的宗教色彩更浓，其中所谓"家乡"，当指"真空家乡"；"父母"，当指无生父母。在咒语中包含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这一教义。王秉衡即王书鲁在江南传教时，称"红阳教"、"大乘教"、"无为教"及"清净门"。传徒时除传授"三皈五戒"及咒语外，还要举行一次复杂的仪式，称为"卢木点杖"。其仪式为：传教师父用竹筷点入教者之眼耳口鼻等处，点过之后，将竹筷插在瓶内供奉，声称人死之后，到阴司可以此筷作为在阳间曾入教吃斋的凭据，因而还有一套说法："用竹筷点眼，不观桃红

① 《军机处月折包》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转自庄吉发：《清代清茶门教的传布及其思想信仰》。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十八日。

③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江总督百龄折，嘉庆十九年三月十八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河南巡抚方受畴折，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⑥ 《朱批奏折》河南巡抚方受畴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八日。

柳绿;点耳,不听妄言杂语;点鼻,不闻分外香臭;点口,不谈人恶是非。”由师父告诫徒弟,遵依后不许破戒。举行完“卢木点杖”后,还要磕七个头。四个是报天地、日月、水土、父母恩;两个是拜佛,一个是拜师。磕头时要两手合拢,手指分开,磕在手背上,名为“安养极乐国”。[1] 王秉衡还向徒众们宣称,王家祖先现在正在天上“掌盘”。在西方有一座“聚仙宫”,凡吃斋之人,故后便都被度到那里去享清净之福。又说凡皈依吃斋者,皆可避免刀兵水火之劫,死后免堕轮回,不入四生六道。要求徒弟初一、十五在各自家中敬神,用青钱十文供佛,名为“水钱”。供毕将其收集一处,等候各人的师父来时收走。当师父收了水钱临走时,徒弟还要另外再送给盘缠钱,称为“线路钱。”并说:“一线引路到他家,以为来世根基。”又说凡师父来家,徒弟供养了师父饭食,师父将于转世时归还,届时徒弟便可得到富贵。[2] 借此骗取钱文饭食。

总之,清茶门教这些教规、教仪,其宗旨都是为了使教徒虔诚皈教,对教主俯首帖耳地绝对顺从,并且从经济上对教首作各种奉献,而教首则通过传徒得以大量敛钱致富。

(二)经卷与教义

清茶门教的经卷,主要是一部《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嘉庆二十年清朝地方当局从教徒王克勤家中搜获一部。据王克勤供称,该经卷系由石佛口王度传给河南滑县人张甫城,张甫城又传给王克勤之祖父收藏。清吏曾于镇压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一带天理教起义时,发现过该书,事后对该书严加搜查,教徒们多将其烧毁,未敢存留,致使该书未能流传下来。我们今天只能从清吏有关奏折及教徒们供词的片段中,对该书的内容和该教教义作大概了解。

直隶总督那彦成在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奏折中提到,《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内载有“青山石佛口”字样,并且“胪列三皈五戒”。又载有“以燃灯佛、释迦佛、未来佛为三劫”,及“天盘三副”之说,即:“过去系燃灯佛掌教,每年六个月,每日六个时。现在是释迦佛掌教,每年十二个月,每日十二个时。将来系未来佛掌教,未来佛即弥勒佛。每年十八个月,每日十八个时,未来佛降在石佛口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广总督马慧裕折,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广总督马慧裕折,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王姓家内,经卷内有石家第三郎之语。"[1]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中又提到:"所有起出《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前年林清滋事,持此书惑众,扬言为应劫起事。又所称三教分掌天盘,弥勒掌教时每十八个月为一年。"[2]王殿魁在供词中提到,他本人未见过《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但记得祖母曾对他讲过,教内声言过去的是燃灯佛,九劫,一年六个月,一日六个时。现在是释迦佛,十八劫,一年十二个月,一日十二个时。未来的弥勒佛,八十一劫,一年十八个月,一日十八个时。并相传"未来佛将来出生在王姓"。又说:"龙华会就是上供,后天就是未来佛,无生父母是无极,以前三会总收源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会,统在一起为收源。红阳会是青阳、红阳、白阳三教;未来收源,未来天盘,未来皇极,俱是弥勒掌教的意思。"[3]王克勤也供称:"我母亲只口传我说,过去的是燃灯古佛,现在是释迦文佛,未来的是弥勒佛。待等弥勒佛出世,教里的人就可得富贵,弥勒佛将来出世在石佛口教祖王家。"[4]教徒樊万兴等人所供有关天盘三副说的内容更为详细:"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道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尼僧,是五叶金莲为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5]

上述内容皆系《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一书内之片段甚至是只言片语,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但若对之加以仔细分析、研究,则可以看出这些内容本身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所宣扬的"天盘三副"说,关键在于未来将由弥勒佛掌天盘。一旦弥勒佛降生人间,世界将发生巨大变化,弥勒佛不仅掌管天盘,而且将成为人间的统治者。这个统治人间的弥勒佛将降生在石佛口王门。这个思想在该书下面这段内容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清朝以(已)尽,四文正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原来是土星。"这句话虽然表面上来看具有"反清复明"的含义,但关键是"四文正佛"即弥勒佛将降生在王门,未来世界将由王家子孙来统治,取代清朝统治。可见,石佛口王家早已怀有登

---

①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② 《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
③ 《王殿魁供词》,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第48页。
④ 《王克勤供词》,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第51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广总督马慧裕折,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极做皇帝的政治野心了。《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中有关弥勒佛将出生在石佛口王家这一内容,被王姓子孙一再宣传。王兴建供:"听见我父亲讲过,三皈五戒并过去燃灯佛掌天盘,现在释迦佛掌天盘,未来弥勒佛掌天盘。并说弥勒佛将来出在王姓族中。"[①]王亨仲也供称:"我只经母亲口传过我三皈五戒,并未来佛将来出在石佛口王姓家中,要掌天盘。"[②]教徒郎文玉也供:"闻得滦州石佛口王家,将来有弥勒佛出世,遵其教者必有好处。"[③]为了使人们相信弥勒佛将降生在石佛口王家,王姓家族又把石佛口附近的青梁山,称为"青山",石佛口称为青山石佛口,并造出"青山主人"这一名号,作为未来人世间的统治者。这一称号被确定为由王森长子王好礼一支的后裔承袭,所以王克勤说:"青山主人是王逢太。"即王森的七世孙。

清茶门教的经卷除《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外,还持诵《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和《元亨利贞钥匙经》。在嘉庆二十年清朝当局查办清茶门教时,在离石佛口二里许的围峰山峰寺内搜到一部《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大概就是《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据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研究,该宝卷乃是雍正年间江西饶州府人黄德辉(1684—1750)所著。黄德辉曾于雍正十年创立"皇极金丹教",故有"黄九祖"之称。这部宝卷便是黄德辉宣讲教义之蓝本,其内容大体为下:弥勒佛受古佛圣祖之命,来拯救九十二亿下凡尘世的"失乡儿女",于东土无为府的三心堂作无为教主,讲无为金丹道。后来,无生老母命他返归天上,他便告诫人们谨守未来佛号,于末劫到来时,转为龙华三会,遂返归天界。[④] 清人黄育楩在《续刻破邪详辩》中,曾摘录了《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中五条经文:

一、"无生老母差遣弥陀下界,转为无为老祖,隐姓埋名,度救众生。"

二、"东神洲有二十四处名山,十二处仙贤洞,五块伏阳地。北芦洲有二十二处练金山,七块佛留地。西贺洲有六十四处名山,三十六处弥陀洞,二下四处元金地。南赡洲有三十六处圣宝山,三十六处通元洞,三十六处仙贤地。北岸上古家乡又有三山九岛,三关三台、九元洞、八宝地、五元池、九元门、古云城,皆

---

① 《王兴建供词》,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49页。

② 《王亨仲供词》,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49页。

③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④ [日]泽田瑞穗:《宝卷研究》,第110页,转自[日]铃木中正:《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三节"直隶昌黎县石佛口王氏的教派"。

是古佛家乡，收元了道去处。”

三、“过去佛掌了十万八千年，现在佛该掌二万七千年，未来佛该掌九万九千二百年，三佛共掌二十三万四千二百年。”

四、“真精掌领坎卦，真神掌领离卦，真魂掌领震卦，真魄掌领兑卦，真阳掌领乾卦，真阴掌领坤卦，真明掌领艮卦，真行掌领巽卦。”

五、“元来贤良九十六亿，无极度了二亿，太极度了二亿，皇极止有九十二亿。”“传教宗派有九杆十八枝，以后共有一千四百九十四万枝干，排满未来天盘。”①

以上五条经文基本上概括了《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即《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的大意。只是其中第三条前面还有一句话，黄育楩未录出，即：“过去燃灯庄严劫，现在释迦掌教尊，未来弥勒星宿会。”这一段与黄育楩所摘录的“过去掌了十万八千年……”联系在一起，便是石佛口王姓所倡三教应劫说的来源。同时也是明清时期各种秘密教门有关三佛、三世、三劫思想的总根源。②

在清茶门教诵习的经卷中还有《伏魔宝卷》和《金科玉律》戒文。《伏魔宝卷》全名是《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共有二十四品。内容主要胪列关帝（关羽）事迹，并阐述善因自种、福慧自修诸思想。黄育楩在《破邪详辩》卷三中，曾摘引其文：“拈着香，来哀告，青青天天。大慈悲，来加护，可可怜怜。俺三人，原不求，富富贵贵。只求俺，弟兄们，平平安安。”③

《金科玉律戒文》主要是宣扬孝顺父母，广行阴德等内容，以劝人行善。④

嘉庆二十一年，清吏在石佛口王家查获的经卷还有以下几种：

《销释木人开山宝卷》二本；

《观世音菩萨普度授记皈家宝卷》二本；

《销释收圆行觉宝卷》一本；

《销释显性宝卷》一本；

---

① 《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 年，第 84—86 页。

② ［日］铃木中正：《清中期宗教结社向千年王国运动的倾斜》第三节“直隶昌黎县石佛口王氏的教派”，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

③ 《清史资料》第三辑，第 30 页。

④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60 页。

《销释圆通宝卷》一本。①

其中《销释木人开山宝卷》称，古佛"无生"将"通天圣宝"传给石佛祖即王森，后来又传给弓长老祖(张姓)，再传给木子(李姓)，因而成为石佛口王姓所传清茶门教教义的重要来源。木人便是指王森，全书共有二十四品，如今在日本存有《唤醒当人品第四》的一部分。其中"桃开四相品第三"专门论述了"三皈五戒"。如对"皈依佛"作了如下解释："所谓皈依佛，即认识到佛并非泥塑木雕，亦非铜佛铁佛，而且有真如佛性，只要认得真佛，则到临危时就不会堕入轮回之苦。"对五戒中戒酒肉解释说："第四戒酒肉，以斋为根本，五戒以酒为首，它可使人性乱信迷。"另外还阐述了吃斋的意义，并具体介绍了入教者的誓词、主持人唱的戒文，如："有缘之人来入会，参师访友，遇明师受戒，你就会立即明心见性。"并讲述了"卢木点杖"仪式。②

三、收圆教

嘉庆二十年(1815)八月，安徽和州一带地方当局破获了以方荣升为首的收圆教散"逆帖"、图谋造反一案。当时正值清廷在直隶、河南、湖北、江苏等省查办清茶门教之际，官员们从被捕的王姓教首口供中，发现安徽和州的收圆教教首原来同清茶门教教首王秉衡有牵连，从而进一步查明方荣升所传收圆教系传自柳有贤、金悰有的无为教。

(一)柳有贤、金悰有所传无为教

嘉庆十六年末，安徽滁州府全椒县知县杨国卓拿获该县民人王裕德，供出曾拜巢县人金悰有为师，"吃无为长斋"，并送给金悰有钱文。金悰有则传给他《大法真言执仪》及《迎圣送圣》口诀。又供出巢县人许念祖曾携带幼孩李元兴来至其家进行"走阴祷圣"等巫术活动。当局又在王裕德家中搜获《金刚经》、《敬信录》等经书。地方官员们根据王裕德供出的线索，逮捕了同县吃斋之梁步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钱臻折，嘉庆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② [日]铃木中正：《清中期民间宗教结社及其和千年天国运动的倾斜》第三节，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章等十四人。其后又在和州拿获同案之方荣升、陈潮选、陈恒青、朱上志、萧元兴即李元兴等人，并在陈潮选家中搜出《皇极钥匙》等经卷。在巢县拿获金悰有、许念祖、孙盛兴、余连、李荣春、刘元章等十余人；在怀宁县拿获韩国祥、朱上信等五人。并且将同案之笠太佐、张起禄等十三人，从江苏江宁（南京）、上元等地押解来安徽审办。安徽巡抚钱楷亲自对金悰有等人进行审讯。

金悰有供称，所习之无为教系得自柳有贤传授，听信吃斋，并得有"五等执仪"，迎圣送圣口诀，并做过"龙华三会"。钱楷追问柳有贤下落，金悰有供称："柳有贤现住江苏仪征地方。"钱楷即派人至仪征，将柳有贤及其子柳自明拿获，押解到安徽审办。当时柳有贤已经七十三岁，双目皆瞽，加之押解途中患有重病，在受审的次日，即告身亡。他于临终前供称，原籍系安徽巢县，于乾隆五十九年迁居江苏仪征县。因三十年前其父柳东山落水淹毙，即食长斋。嘉庆七、八年回籍扫墓，遇见妻侄刘元章及葛正彩、朱象贤、申华章四人。柳有贤向他们说：若能吃无为长斋，便可免遭水火风三劫。刘元章等四人听信其言，便出钱拜柳有贤为师入教。柳有贤向刘元章等人传授"五戒"。刘元章等各出"五十三参钱"五十三文，"八十一劫钱"八十一文，及"摆设添盘钱"一百二十文，送给柳有贤。嘉庆九年，柳有贤再次回巢县扫墓，向刘元章等人声称："吃斋拜佛，须受佛门执仪，祷病忏悔，方有灵验，死后有仙童接引。"又说：执仪共有五等：一等批宝法会，二等加修，三等大法真言，四等金丹，五等会头。凡欲领执仪之人，一等需要交钱一千文，二等交钱四千文，三四等交钱二千文，五等交钱八百文，称为"礼钱。"刘元章等交纳礼钱后，柳有贤即传授"批宝法会"执仪，及"迎圣口诀"，即"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谈动三乘妙法"等句。送圣口诀是"佛归灵山，神归本位"。告诉他们，"做龙华三会，普度世人，功德始大"。同年，柳有贤之徒葛正彩又遇见巢县人金悰有，劝其入教，金悰有听从，即摆供拜葛正彩为师。后来，葛正彩、申华章等人先后身故，刘元章、朱象贤等便开斋吃荤。嘉庆十二年，柳有贤见金悰有吃斋虔诚，说他是"有根基之人"，遂给予"一等批宝法会执仪"，并传授"迎圣、关圣"口诀。又以自己年老，不能出外做会，劝金悰有做"龙华三会"，普度众生。金悰有即送给柳有贤白银五两。嘉庆十三年九月，金悰有欲在家做"龙华头会"，刘元章与其师葛正彩皆系柳有贤之徒，遂一起做会。嘉庆十五年九月初一日，又在江宁借住夏景云家机房，做龙华二会。同年九月十九日，金悰有又来到安徽和州朱上信家，做观音会，招引附近之人，摆供吃斋，借以敛钱。其后，金悰有等又分别传徒。其中刘元章传有郑奇音、滕之

义、张起禄、魏陇铨四人为徒;金悰有传其外甥许念祖、许会祖及方荣升等十四人为徒;许念祖又转传司徒元为徒,司徒元又转传夔之林并转传葛彩谋为徒。刘元章授给其徒魏陇铨等人以"大法真言执仪",金悰有也授给许念祖、方荣生等"加修"、"大法"、"真言"、"金丹"等项执仪,及迎圣、送圣口诀。徒弟们则向师父交纳一二千文或数百文不等的"礼钱"。

无为教在金悰有掌教以后,逐渐发生变化,并且与弟子方荣升改名"收圆教"。金悰有最初担心仅靠做会难以取信于人,便在传教内容里加入当地的巫术,让弟子方荣升、许念祖等假"走阴祷圣",查人前世根基及讲"神语"等手法,招引徒众。至于金悰有与弟子方荣升于何时改无为教为收圆教,史料中尚未见明确记载。但从方荣升供词来判断,当在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间。

嘉庆十六年无为教遭破获,金悰有等人被全椒县当局捕获。经审讯,金悰有、刘元章等人均被以传习"邪教"之罪,发遣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许念祖、王裕德、方荣升等,各杖一百,徒三年。[①] 嘉庆十八年三月,方荣生又被发遣至安徽省灵壁县。

金悰有、方荣升所传习的无为教和收圆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过清茶门教的重要影响。金悰有之师柳有贤曾拜清茶门教的王秉衡即王景曾为师入教,并代其师传教收徒。柳有贤在被捕后录供时,曾提到所习无为教系"得自直隶人王景曾"。但他未说出王景曾便是直隶滦州石佛口的王秉衡。清朝官员后来因在直隶清苑县抓到一名叫王景曾的人,于是放松了对王秉衡的追捕,使王秉衡在无为教遭破获时得以漏网。后来王秉衡被捕,才供出了他同柳有贤之间的密切关系:"嘉庆十年三月,我到江南仪征县寻觅生意,会遇柳有贤,讲起他平日吃长斋,小的劝他入清净门,柳有贤就请小的到他家住。"又说:"小的在仪征因人地生疏,不能传徒,总是柳有贤在外传徒,他说就与小的徒弟一样。所以,小的在仪征除柳有贤外,并未另传别人。柳有贤传了仪征人丁文学、王崇礼,又到巢县传金悰有、刘元章们,小的都见过的。至金悰有如何递传方荣生们,实未见过。"嘉庆十五年,王秉衡又与柳有贤一同到湖广卖玉砂,并在汉口传王世中、周玉等人为徒。后来,王秉衡回到江苏仪征,娶"醮妇"秦杨氏为妻,又住在柳有贤家中,可见二人关系非同寻常。王秉衡在柳有贤犯案后之所以未被捕拿,大

① 《朱批奏折》安徽巡抚钱楷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概也出于柳有贤对他的保护。"十六年金倧有为吃斋事发,将柳有贤拿去,因错供小的籍贯致未被拿。"[①]柳有贤虽然与王秉衡关系密切,并拜他为师入教,甚至替他在外收徒。但是,柳有贤的徒弟金倧有及金倧有的徒弟刘元章、方荣升等人所习无为教和收圆教,同王秉衡所传清茶门教仍有很大差别,金倧有、方荣升一直以无为教和收圆教的名义传徒。可见,无为教、收圆教虽然因为柳有贤的关系,受到过清茶门教的影响,但并非清茶门教的支派。

(二)方荣升复兴收圆教及造反准备

方荣生是安徽巢县人,出身贫苦,以驾船为业。从十岁起便开始吃斋,粗通文墨。嘉庆十三年拜金倧有为师入无为教,后来与金倧有一同住在和州朱上信、朱上忠弟兄家中。在此期间,他曾编有《天元古册》、《天元了亿册》、《天地人三曹定功册》、《天龙八部原明册》、《龙华定果册》等经卷,共计一百三十余本。嘉庆十六年,金倧有因传教犯案被捕,方荣升受到牵连,被发配到本省灵璧县。嘉庆十八年方荣生来到配所,因"问罪后心中气愤",加之对所奉收圆教的狂热信仰,又编了一部《破邪显证明心录》,一直伺机逃回家乡,重掌收圆教。适有同教之朱上忠来配所探望,方荣升为了日后重掌教权,使昔日徒众信服,便让朱上忠传达"元吉回宫,无中金榜,等候消息"等语给徒众。其中"无中"是因方荣升自称"无中老祖","金榜"则是他的本名。他用这句话向徒众们暗示自己将回家重新掌教,让徒众们等候他回家掌教的消息。

同年九月,灵璧县洪水泛滥,方荣升乘机从配所逃跑,回到和州,住在教内朱上忠、朱上信弟兄家中。他因自己是逃犯,故白天不敢公开露面,只在夜间外出活动。朱上忠弟兄专门为方荣升筑一密室,供他编写经卷及绘制图像之用。[②]方荣升于其师金倧有在世时,曾撰有《天元古册》等经卷。嘉庆十六年金倧有破案时,这些经卷与图像皆由朱上信藏匿,未被官府搜获。方荣升回到和州以后,声称经卷、图像被保存下来,乃是"天神佑护",因而"其教应当复兴"。又向徒众们假称他在灵璧县配所时,曾经得有梦兆,"恍惚上了天,天上神圣叫我办后天的事,接掌收圆教"。[③]

① 《朱批奏折》两江总督百龄折,嘉庆二十年十月十四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江总督百龄折,嘉庆二十年九月初四日。

③ 《方荣升供词》,见《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2期。

为了复教，方荣升又令朱上信等人到江南、江北各处，把金倧有昔日徒众中未开斋者，重新归于方荣升的收圆教，总数有二百余人。嘉庆十九年四月，方荣升为了娶已故教徒朱上志之女朱世枝为妻，便假称"出神"，三日方醒，诡称孙悟空及无生老母、金倧有及朱世枝已故父母附体。又称朱世枝乃"九女星"，应该与他"配合乾坤"，此乃"天配"。朱家一向崇敬方荣升，自然不敢违拗，便于是月初十日，将朱世枝配与方荣升为妻。方荣升在和州，平日静坐于密室之内，日间不见人。徒众们拜见他，皆于黑夜进行，故在他回到和州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皆未被外人发现。徒众们拜见他要顶礼磕头，他则"端坐不动，俨有臣主之分"，逐渐萌发了造反当皇帝的政治野心。为此，他又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第一，是编造怪体字。金倧有在世时，曾编造过许多怪体字，其中有几十个便是方荣升所造。方荣升返回和州后，又编造了更多的怪体字。他称现行的文字为"五行字"。他又增加了慧、动两行，"以天光为慧，以天行为动，在天为运行，在人为心意，故有七行字"。遂称他所编的怪体字为"七行字"，并称此乃"天上传下来的"。

第二，把金倧有掌教时的"五等执仪"改为"九品莲台"，以便更多地招人敛钱。方荣升在金倧有所设批宝、加修、大法、金丹、会头之外，又增加"批宝庆会"、"批宝法会"、"双加修"、"单加修"、"联科圣宝"、"大法真"、"双金丹"、"单金丹"、"会头"等，合称"九品莲台"，按照入教者捐钱之多寡，分别授予。

第三，在教义中增加了鲜明的叛逆内容。在金倧有掌教时，曾宣扬"燃灯佛坐青莲，是无极，掌青阳教；释迦佛坐红莲，是太极，掌红阳教；弥勒佛坐白莲，是皇极，掌白阳教。如今太极退位，该由弥勒佛皇极当令"，因而有"戊辰己巳天换天"之说，意指嘉庆十三、十四两年释迦佛已退，将由弥勒佛掌天盘。这些内容尚属讲天上之事，而方荣升则将把它搬到人间，他对徒众们说："天上换盘，人间亦当末劫。"唯有入教食斋方可遭劫难。又说："燃灯佛为初祖，坐三叶金莲；释迦佛为二祖，坐五叶金莲；弥勒佛为三祖，坐九叶金莲。金倧有是四祖，乃弥勒佛转世。"从前金倧有之死，乃是"回宫。"如今已借方荣升之躯体下凡，以了前愿。这样，方荣升便成了现世的弥勒佛，自称"无终老祖"、"紫微星"、"朱雀星"下凡。他把现存世界称为"五浊恶世"，未来世界将由弥勒佛治世，也就是他本

人当人间的统治者，人间将变为“香腾世界”。[①]

第四，编撰《白阳定品》一书，准备“将来换世界，照此定官职”。[②] 书内立有三官、六院、大将军、大学士、丞相、王侯、公伯、大夫、六部等品级。

第五，绘制《天图》十幅，《皇极总图》一幅。《天图》十幅分别用“返、本、还、原、地、真、空、古、家、乡”十字作为图像之编号次序，以暗指“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另外，还撰写了两本小册子《普天同庆》与《地转香腾》，称为“脚册”。天图内容是“讲各图内所画天上的路径及那些房屋等类名色”，假称自己曾“亲到天上看见的天宫路径”，故系照天上样子绘制而成。《皇极总图》则是绘制的宫殿设计图，是“将来转世界时，即照此形式造宫殿房屋”。

第六，编写“收圆宫对联”。方荣升撰写了五幅收圆宫对联，每行俱从头一字横着念，如“慧、动、真、空、本、性、道、德、立、香、腾”，又于每字之下，凑成诗句。准备将来建成收圆宫，用此作为对联。

第七，令人镌刻一颗“九莲金印”，以便登极称帝后“坐朝问道”时使用。该印由方荣升本人设计，印有九只角，像九瓣莲花，内有九条龙，中间为方孔，内用他所造的“七行字”写成印文，共有八字：“执掌山河，圣寿无疆。”用所谓“七行字”改写后，如独令为“执”，当令为“掌”，硬石为“山”，水冲土为“河”，天地同修为“圣”，日月同春为“寿”，元空为“无”，圣凡同兴为“疆”。

第八，把以前撰写的《破邪显证明心录》改用“七行字”抄写。书中“等候鸡犬高叫”一句，“鸡犬”是指癸酉、甲戌两年即嘉庆十八、十九两年，“高叫”是暗示他将于这两年内“出头”。经卷末尾注有“蓬莱无中老祖”及“宝霞佛”，乃方荣升假托之佛号。经卷开头所写“金榜宝霞传治”一语，金榜是方荣升学名，宝霞是他假托宝霞佛转世。

第九，编撰《万年时宪书》。金倧有在世时，教内传有《应劫书》，可能就是清茶门教所传《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书内有“四十二宿，九十甲子”等内容。故称：“弥勒佛掌天盘，要换过万年时宪书，十八月为一年，四十五天为一月，十八时为一日。”方荣升在《应劫书》的基础上编成《万年时宪书》，准备“将来换了世界，就用这些时宪书”。秘密教门为了夺取政权，往往对现行历法加以改变，以表示“改天换地”。这一做法最早始于黄天教。在该教所传《普明如来无为了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江总督百龄折，嘉庆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② 《方荣升供词》。

义宝卷》中提到:"老君八十一化,设立乾坤世界,遗留九甲混源真经,重换山河,另立星辰,安天治地,倒海移山。还丹九转,同登彼岸。南北针停,二九相见。一十八劫已满,改形换体,十八个月为做一年,十八时辰乃为昼夜。一年正合九甲,四十五日为做一月,昼夜一百四十四刻,循环周转,总计八百一十日。"①

方荣升继承了秘密教门改变历法的传统,以《应劫书》为蓝本,对当时通行的历法加以改造。其具体做法是:"假说如今是弥勒佛掌管天盘,二十八宿去了井张二宿,改为四十二宿,加了如、会、铖、袁、辰、蒙、赤、正、兴、全、阴、荣、玉、生、升、花十六宿,故为四十二宿。"又把八卦改为十二卦。"八卦加了平、安、吉、凶四卦。"十二地支增为十八地支。"十二地支加了纽、宙、唇、末、酎、元六字。"因为地支改为十八支,那么就需要九甲才排得过来,故"又将六十甲子纳音改为九十甲子。"既然是十八地支,"一年就应有十八个月,每月四十五天才派得过来,小的就造成《万年的宪书》"。但是,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是改不过来的,于是便"假说弥勒佛掌盘,不久天要混沌四十九日,黑暗无光。自后日月在南北出入,天地气候都要改长了"。只有习其教者,是弥勒佛弟子,不怕混沌,不遭此劫。《万年时宪书》上还写有:开宫、同宫、正宫、交宫、闭宫,是指月光经天行走,按九天一转,每月五转,故四十五天为一个月,并有"增轮、满轮、退轮、尽轮,也是讲日月盈缩,一月五转的话"。另外,《时宪书》上还注有"忌辰",都是已故吃斋人忌日。

第十,又造了《万祖册》。方荣升声称,天下吃斋的人,都是"佛祖",将来死后都封了佛。如方荣升之父方云从是"霞光佛",朱上志是"定慧佛",魏陇铨是"灵安佛",金悰有是元吉佛,陈恒青是丹霞佛,金悰恒(金悰有之兄)是金丹佛,金悰有之侄女是"妙慧圣母"。朱上忠之子朱世元是界牌佛,朱上志之父朱英是天性佛,朱上志之母陈氏是"地命圣母"。

方荣升在做了以上一系列"谋逆"的准备之后,感到仅仅依靠手下的一些徒弟,尚难以成事,必须再联合其他力量。恰好他有个弟子严士陇,从前曾习过原明教。后来虽拜金悰有为师入收圆教,但仍同原明教中刘李氏即李玉莲时有往来。方荣升闻说刘李氏所掌"原明教"内之人甚多,茅山一带种芋的棚民都是他的徒弟,便设法与之联络。

① [苏联]娥·斯·司徒洛娃译注:《普明无为了义宝卷》,1922年。

刘李氏即李玉莲，住居江宁。因患气蛊症，腹大不消，早在二十年前便向人声称系因弥勒佛投胎所致，故自称“佛母”。每逢替人看病时，便口称神佛向她说及祸福休咎，须做道场祈禳，遂通过延请僧尼，从中骗钱取利。她还自称系圆明教教首，不忌荤酒，又有大小尺香团，称为“灵尺定香”，并用纸布印作佛像莲花，供人买供，称如此便可以消灾获福。数年之前，她曾赴茅山进香，见该处种山棚民甚多，遂向人宣称茅山棚民皆皈依其教。方荣升闻知李玉莲手下有大量棚民为徒，势力甚大，便欲利用其势力来达到自己造反的目的。他令其徒弟严士陇夫妇到李玉莲处，相约会晤。向她假称方荣升曾“出神上天，查过李氏有洪福，应与李氏同举大事，邀其合伙。”李玉莲初未应允，其后，方荣升又与朱上信、李元兴等亲自前往劝说：“我见了天神，说有你的洪福，天上吩咐叫与你合办后天的事。从前太极当令，是姜尚造封神榜。如今皇极当令，是我造封佛榜。”李玉莲亦想趁机骗钱，便诈称需要念经打醮请示于神，要求方荣升先付醮费二十两白银。方荣升回到和州后，便让严士陇付给李玉莲二十两白银。李玉莲因自己所居石桥地方，离石观音庵不远，便诡称神圣示有八字：“真主在江南石观音”，以附会方荣升所说李玉莲有洪福之说。方荣升便写了“合同”送给李玉莲，并称她为“圣母”。嘉庆十九年，安徽、江苏一带年岁荒歉，人心浮动，方荣升遂欲“乘机倡乱”。嘉庆二十年正月，方荣升又编造“逆帖”，派人到处散布，并且把李玉莲也写进逆帖之中，“若问皇极真命主，隐藏江南石观音”。石观音便是指李玉莲所住之处。写好之后，抄写了六百多件，分别用黄纸包好，在卦皮上半截写有“执掌之才”四字，下半截编列卦名，后面写有“得此锦囊如不呈上，雷殛天诛”。由严士陇、朱上信传给杨荣先、殷正基等七人，分别赴河南的归德、开封，江西及湖北的江汉、汉阳，江苏的句容、丹阳、仪征、江甫、镇江、苏松等地散布。方荣升后来又听说李玉莲手下并无多少徒弟，后悔以前被其骗走二十两银子，便令严士陇前去讨回合同与银子，并将在“逆帖”中“隐藏江南石观音”一句，改为“赵王山前暗招军”。又同严士陇等人商议，两江总督百龄对邪教查拿严紧，嘉庆十六年金悰有一案又系百龄所办理，对之怀恨在心，便欲对百龄、方宝岩二人加以诬陷。遂在“逆帖”中又增添《锦囊示谕》，将百龄、方宝岩与刘伯温的名字写在一起。觉得“只要说得恍惚，令人无处揣摸，加之方宝岩的祖坟在句容县赵王山”，而逆帖内又有“赵王山前暗招军”一语，地方官将此禀报朝廷，朝廷便会怀疑方宝岩同方荣升有联系。方荣升想趁年岁荒歉之机造反夺取，登

极称帝，又不作人力和物质上的准备，只希望侥幸成功。他在受审时供称："小的谋逆的意思是要抛砖打入人群，使人各处先乱，我好从中取事。若有器械，早有人看破了，且我又不能多有积蓄，哪能制备刀枪。教下人又都贫穷，住的房屋都小，也无处去造。如果外省的人见了帖子，纷纷起事，我便乘势勾结，他们自有军械，何必预先自为制备！"①

方荣升这种指导思想必然导致失败。清方在发现"逆帖"后，首先逮捕了教内骨干严士陇，严士陇又供出同教数十人。方荣升因回巢县探望其姐而漏网，同年八月十八日也被拿获归案。此案清方先后捕获参与其事的教徒一百五十余人。方荣升被捕后，作为首犯，于"常刑之外，加以压杠跪链箍夹诸刑"，使他"备受毒楚"，然后凌迟处死。其祖父母、父母之坟墓也被"焚毁抛散"。清方在破获方荣升收圆教"谋逆"案的过程中，搜获了大量经卷，计有以下一些：

《破邪显证明心录》二本；

《万年时宪书》二本；

《白阳定品》一本；

《合同》一张；

《万年天书》二本；

怪体字《字母》一本；

《怪体字杂局》一本；

《群星册》三本；

《万祖名号册》二十本；

《脚册》上、下卷二本；

《收圆教徒名单》一张；

《收圆教执仪单》一张；

《巡茶仪注单》一张；

《定劫宝卷》二本；

《末劫真经》一本；

《应劫宝卷》一本；

《九转宝卷》一本；

① 《方荣升供词》。

《结果宝卷》二本；

《还乡宝卷》二本；

《九莲赞宝卷》一本；

《钥匙宝卷》一本；

《画图》十一轴（天图十轴，皇极总图一轴）；

《天元了亿册》四十八本；

《龙华定果册》五十三本；

《天元古册》八本；

《三曹定功册》三本；

《八部原明册》八本。

第十九章　嘉道年间的离卦教

在嘉道年间的八卦教中；以离卦一支势力最大。离卦教在八卦教中历史悠久，早在康熙年间刘佐臣创立五荤道、收元教，按八卦收徒时，便立有离卦教。刘佐臣让住在河南商丘的郜云龙任离卦卦长，因为河南商丘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山东单县之南。按照八卦的方位，离卦应在南方。郜云龙后来自称“透天真人”，郜姓家族世代掌离卦教。到郜云龙子孙郜添麟时，“因祖、父们传习这教屡屡闹事，于（乾隆）五十二年秋间搬到山东聊城县东关外居住，改姓高”。① 郜添麟改名高道远，另一支仍住在河南商丘老家。在河南商丘这一支离卦教在郜生文掌教时，传徒直隶清河县人刘功即刘恭。刘恭是个能量极大的教首，嘉道年间，他曾传徒直隶巨鹿人孙维俭、尹老须与马万良等人。孙维俭后来改称大乘教，尹老须仍称离卦教，马万良之子马进忠则改称明天教。这三个人的传教活动，在嘉道年间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孙维俭所传大乘教

孙维俭是直隶巨鹿县人，曾拜清河吴二瓦罐即吴洛兴为师入离卦教。吴二瓦罐乃清河人刘功之徒，刘功为离卦教教首、河南商丘人郜生文之徒。据嘉庆十九年署直隶总督章煦奏：“缘杨遇山籍隶南和县，向在各处行医卖药，与巨鹿县大乘教匪犯孙维俭等均拜从犯案发配、旋已病故之吴二瓦罐习教。吴二瓦罐与现犯张希胜，又系清河县人刘功之徒。刘功系由河南商丘县犯案正法之郜生文传授。”②吴二瓦罐于嘉庆初年在巨鹿一带以按摩治病为名，传习“好话教”即离卦教。孙维俭与任县人刘美奂同拜吴二瓦罐为师入教，吴二瓦罐向他们传授并讲解《金刚经》、《扫心经》及坐功运气之术。在教内，因吴二瓦罐辈分最高，

①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钟祥折，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② 《朱批奏折》署直隶总督章煦折，嘉庆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被尊为“老当家”，其子吴洛云即吴生彩被尊为“少当家”。嘉庆五年，吴二瓦罐、刘美奂与同县之高观贤同赴赵州聚众讲经，被当地官府捕获，后“杖责递籍”。当时吴二瓦罐等未将孙维俭供出，使之得以幸免。

嘉庆六年孙维俭至刘美奂处探望，见刘处有《性命归旨》①一书。孙维俭阅看之后，感到此书比《扫心经》更为“动听”，欲借此“立教骗钱”。又忆及家中存有《护道榜文》一轴，内有“大乘”字样，便另立“古大乘教”，从此便脱离了正统的离卦教。他把《性命归旨》一书中所载“性在天边，命在海底，欲得不老，还精补脑”等句向人宣讲。声称“闭目运气，使性命呼吸相通，今生袪病延年，来生必有好处”。借此诱人入教。他先后传得同县之李景福、李经、吕兴旺等人，刘美奂也加入其教。凡入教者，各送给孙维俭大钱二三千文，名为“买道钱”。每逢朔望，俱赴孙维俭家中焚香礼拜。届时，孙维俭高坐堂前，李景福等人跪听讲道。李景福等人日久也熟悉其传教讲道内容，遂各自在家设教，传徒敛钱。后来，孙维俭的大乘教日益发展，他本人先后传宋连捷等四十一人为徒，李景福也收赵美明等三十三人为徒，李经收得李清之等十人为徒，吕兴旺收得陈继宗等九人为徒，刘美奂也收得吴文明等为徒。在不长的时间内，已辗转收徒九十五人。其后，孙维俭的三传弟子宋连捷等九十五人又各传徒一二十名至九十余名不等，总共收徒达一千六百余人，教徒遍及许多府、州、县。

孙维俭见徒弟日多，恐被人目为“邪教”，欲设法取得合法地位。于是决定用敛得之银钱，建造一所“列圣”经堂，既可避“邪教”之名，又可进一步敛钱渔利。考虑到如在本县具呈建造，会把传教之事泄露，遂与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等人商议，赴山东曲阜，求衍圣公代为具奏。因建造列圣经堂是一件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为此，孙维俭便把三传弟子宋连捷等九十五人升格为“二会首”，让他们分头向教徒们劝捐敛钱。截止到嘉庆十三年冬，已经敛银一万四千一百四十六两，皆交孙维俭收存。嘉庆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孙维俭又派遣李景福、吕兴旺、刘美奂等人，携带银两，来至山东曲阜，住在姜永全客店内，请姜永全代为引见孔庙执事孔传扬，表示愿意先捐白银五百两，作为修理祭器之用，并要求兴建孔庙中之佛堂。孔传扬则表示，孔庙中之佛堂，非民间所应建造，劝李景福等修葺尼山祠宇，声称此举需银五六万两。李景福等便返回向

---

① 《性命归旨》即《性命圭旨》，系道家讲修炼之书，相传为明代尹真人弟子所著，分元、亨、利、贞四集，于明末万历年间问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曾影印。

孙维俭报告,并令其徒宋连捷等各率手下弟子,敛得白银三万三千九百六十七两,仍交孙维俭收存。宋连捷等在两次敛银过程中,也侵吞过其中的银两,不过为数尚小。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孙维俭同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等,将敛得之银两,载赴曲阜。这时孔传扬已经身故,其弟孔传标便留孙维俭等在曲阜暂住。孙维俭向孔传标谈起曾与孔传扬商议修尼山祠宇之事,孔传标答应继续承办,随即带领孙维俭等五人前往谒见衍圣公孔庆容。因系初次见面,孙维俭未敢多言,随即辞出。当他们回到孔传标处时,询知祭器尚未修理,便又捐银三百两,交给孔传标,由孔传标把此事交给曹秉和等二人去承办。孔传标为了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便在孔庆容面前保举孙维俭等充任"书写"等官职。孔庆容见孙维俭等"急公好义",遂给予孙维俭"书写",李景福以"赍奏",李经以"掌书",吕兴旺以"启事",刘美奂以"伴官"等执照各一纸,并行文地方官"取结"。其后,又由孔传标、曹秉和等,带领孙维俭等去勘估修尼山祠宇之工程,预计需银六万余两。孙维俭便把带来之银四万二千三百余两,交与孔传标购料兴工。孙维俭欲将此事直接禀明孔庆容,但被孔传标挡驾。孙维俭等因孔传标乃"四品执事",又系孔庆容之长辈,遂深信不疑,旋即辞归,将所剩之银两瓜分,每人各分得五百四十两。

嘉庆十五年正月,孙维俭之母身故,孔传标闻讯即赶来吊唁,顺便又拜访李景福等四人,向他们谈及祭器修理费不敷使用,又向孙维俭勒索了白银四百八十两。孙维俭等人借修建列圣经堂及修葺尼山祠宇而敛得之银钱,除带往曲阜及往来路费花用之外,仅剩四百余两。同年四月,孙维俭见工程进度缓慢,便令李景福等赴曲阜催促。同年十月,李景福等再次往催,见孔传标对工程一事支吾不办,便声言欲行控告。经曹秉和等从中劝说,商定嘉庆十六年开始动工兴修。嘉庆十六年四月,孙维俭等人被巨鹿县王邦彦控告传习邪教,此案由直隶总督温承惠审理,温承惠便派人将孙维俭等五人拿获。经初审,认为孙维俭等人习教之初仅只为了骗钱,后来修盖佛堂,修缮尼山祠宇也仅为了避邪教之名,并无"不法妖术"。而所起获之经卷,亦"并无悖逆别情",故并未打算对他们加以严惩。但后来又发现孙维俭所藏《护道榜文》,乃乾隆年间广西查办邪教时"奉旨饬禁缴销之物",于是加重了对他们的惩处,将孙维俭"拟绞立决",李景福等四人均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二会首宋连捷等九十五人则发配云贵、两广充军。此案又牵扯到吴洛兴(吴二瓦罐),因他系孙维俭之师,故也被发

配至"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吴洛兴行至永福县地方病故。[①] 其余一千六百余徒众,因人数众多,皆派员"开导",令其"改悔具结"。[②] 孙维俭等人向徒众们敛得之钱,并未用于修理孔庙祭器与尼山祠宇,而是被孔府中的孔传标等人侵吞。事发后,孔传标被逮捕,在审讯中"供认李景福等捐银四万二千两属实,伊思不过用银万两将尼山祠宇略为修葺,其余即可侵蚀。嗣曹秉和、张协中知其意存乾没,各向索去五千两。又有执事官王信堂、孔昭辉、王肇基、李盛华、许宗珍、钱思廉、刘源深、杜春魁等讹去银自一百两及一二千两到数千两不等,所剩银两伊置买房产还债用"。[③]

孙维俭传习大乘教一案,反映当时秘密教门的势力和能量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少数教首通过辗转传徒,在短短数年之内,竟可传徒一千六百余人,并向教徒和其他群众捐敛白银四万余两之多。秘密教门利用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的虔诚和愚昧,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与掠夺,其贪婪程度,实不下于官府和一般地主。

孙维俭等受到惩处以后,其徒众并未完全按照清朝当局的命令"改悔具结",其中有一位名叫刘帼名的徒弟,便将《护道榜文》藏匿起来,拒不呈缴,并且以孙维俭等人所传大乘教,"既有护道榜文,何得称为邪教"为理由,欲设法辩明此事,以兴复其教。嘉庆十六年十月,刘帼名请南和县人张九成即张有用(绰号张小猴)来到其家,一同商议此事。张九成素习医卜星相,兼习拳脚功夫,与孙维俭的弟子李景福是亲戚,且与李经、刘帼名等熟悉。刘帼名把所藏《护道榜文》拿给张九成阅看,张九成看后对他说:"榜文内只载圣旨,并无御宝,未足为据。若欲兴教,必须伪刻御宝钤盖,方能令人信服。"刘帼名闻知南和县大乘教教首王清禄以木匠为业,兼能刻字,即将镌刻御宝之事与之商量。王清禄表示,如有样本,即可镌刻。张九成素知另一教首刁兴隆系官宦之家,存有祖传诰轴,即托亲戚王连向去借诰轴。王连向假称家中有病人,欲借诰轴用来"压邪"。在诰轴借到之后,张九成便将满、汉文之"制诰之宝"与"敕命之宝"二印,用纸描出,送给刘帼名。刘帼名见到后,又欲再寻觅明代诰轴,以便刻戳,钤盖于榜文之上,更可作为祖遗年远之物。张九成又打听到隆平县人黄自明家,存有明代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九年七月三十日。

②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温承惠折,嘉庆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③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温承惠折,嘉庆十六年六月(日缺)。

诰轴，便又诡称“压邪”之用，向其诓借。借到之后，张九成又把轴内“制诰之宝”篆文描出，请王清禄仿照刻成“御宝”，盖在榜文之上。其后，刘帼名又与张九成商量，多备榜文，以便广为传徒。遂令徒众吕有义等，照原底本，缮写《护道榜文》三十余张，均将仿制“御宝”盖于榜文之上。刘帼名见所刻木戳印文与原式相仿，可以假乱真，遂欲遣人携带榜文，进京“控辩”，以期为孙维俭一案平反，使被发配之教首得以释回，便又与张九成设法让同教之人帮凑讼费。嘉庆十七年，刘帼名、张九成令吕有义、王心亚等携带《护道榜文》及呈祠、经卷，起身赴京，三月十七日在通州被盘获。刘帼名闻知后，仍不甘心，又令孙明等再赴京续控。王心亚等被捕后，将刘帼名等人供出，巨鹿县旋即将刘帼名等捕获，不久刘帼名死于狱中。[1]

其后孙维俭的亲戚、巨鹿人萧老尢继续传习大乘教。萧老尢自幼随母改嫁吉姓，改名吉三白，又名吉俭。及长，恢复萧姓，名老尢，与同县人李如陵、牛老康，南和县人阎老得等相识并入孙维俭之大乘教。嘉庆十六年孙维俭犯案，萧老尢因仅系“散会首”，故只具结改悔，免治其罪。李如陵等因系二会首，被判充军。嘉庆二十五年大赦，李如陵等被释放回家。道光三年，萧老尢在巨鹿县充当县役，李如陵充任代书。萧老尢欲复兴大乘教，遂与李如陵商议。李如陵恐教中之人不肯信从，忆及孙维俭掌教时，曾有过《护道榜文》，孙维俭犯案故后，榜文均被官府起获销毁。萧老尢知孙维俭当年曾诓借刁兴隆家所藏诰轴，临摹诰轴上之御宝，此时萧老尢也欲仿照，遂向刁兴隆之妻徐氏诓借诰轴携回。又令李如陵用白纸仿照，书写榜文，将诰轴上“敕命之宝”篆文描下，用梨木刻成印章，盖于榜文之上。向同教之人声称，有此榜文，就可以兴教，不致被拿问罪，令同教之人转相传播。又令张书兴将日月水火兴五字刻成图章，作为记号。遂有杜尔盛等十余人，先后入教。道光六年，萧老尢见教内人少，难以复兴，便与解龙奎、马好仁等人密商，用张贴匿名揭帖的办法，使“人心动摇”，以便趁机招人入教。他给两人每日盘费二百文，令其前往山东兖州、东昌、临清、济宁等处打听当地居民姓名，登记簿内携回。萧老尢便编写谋反之匿名揭帖，把解老奎等人抄录回来的姓名，列入揭帖之人，用纸封固，让马好仁携至山东临清州、直隶正定府，各贴一次，又令马好仁赴顺德府张贴一次。但事后并未听闻各地官府

[1]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温承惠折，嘉庆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对匿名揭帖一事进行查拿,萧老尤又欲用纵放火的办法,扰乱民心,但亦未收到预期效果。道光十一年六月,萧老尤见同教之阎老得、姜老梅等多往离卦教首尹老须处送钱入教,心怀愤恨,欲伺机对尹老须报复。他曾听姜老梅言及尹老须耳有白毫,臂有肉龙,自称南阳佛,住房名飞龙寺。便将此事加以夸大,写成匿名揭帖,作为尹老须定期造反之证据,进行陷害。内称"尹老须父子国号大兴,甲午年承齐天下,先占山东,后占河南,再占山西。天鸡叫,地鸡应,聚大五土立中京,信书传到州城里,时辰到了天下通"。结尾处写入由山东抄来的名单。又向监生孟老净即孟桂箱称,尹老须聚众敛钱,必要造反,欲行举发,嘱令书写揭帖。孟老净初未应允,萧老尤再三恳求,孟老净即代为书写。萧老尤又用伪造之御宝用靛印出,再令教内之人赴河南怀庆、山东临清各处张贴,后被兵役查获,萧老尤陷害尹老须一事随即败露,并被官府捕获。[①]

二、尹老须所传离卦教

嘉道年间,直隶清河人尹老须凭借传教敛钱,成为暴富,遭到同教人之忌妒,这在秘密教门中可算是一个典型。尹老须即尹资源,亦作殷老须,直隶清河县杜(豆)家村人。乾隆六十年拜直隶南宫县人田㥁忠为师入离卦教。田㥁忠指点他:"耳为东方甲乙木,目为南方丙丁火,鼻为西方庚辛金,口为北方壬癸水。性在两眉中间,外为十字街,内为方寸宝,地是中央戊己土。"又称:"性是无生老母所给,无生老母住在三十三天中黄天,名为真空家乡。"又向他传授闭目运气之方法:"(气)从鼻空收入,名为采清。又从鼻内放出,名为换浊,统名而字功夫,取承上起(启)下之义。"并称:"用此功夫,生前免受灾病,死后不致转生畜类。"又传给教内暗号"在理"二字,若遇同教之人,彼此问答,便可知系同教。[②] 后来,田㥁忠见尹老须功夫纯熟,便带他到清河县离卦教"总当家"刘功处"领法"。刘功向传他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及四句"灵文":"后有一祖叫收元,名换折金驾金船,怀揣日月先天气,袖吞乾坤把道传。"尹老须将此默记在心,时常念诵。刘功称,按照教中规矩,领法以后,便可以自行传徒,称为"开

① 《朱批奏折》曹振镛折,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曹振镛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法”。他在“领法”以后，曾传同县的韩似水父子及其子尹明仁兄弟三人为徒。①嘉庆十五年，尹老须“因习教日久，积妄生魔，每逢闭目，如见天上人来往，又似听闻音乐”。自称“悟道明心”。刘功闻知此事，便把尹老须传唤到家，问悉其情，称许他“功夫深透，可以上天至无生老母处办事”。又进一步向他传授教内礼仪：“按每年立春、立秋、立夏、立冬日期在家上供，名为四季祭风。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至期上供，名为三元。可以祈福消灾。”刘功又向他口授祭文，内有“进全供一桌，望圣慈悲”等语。尹老须将其用黄纸书写后焚化，称为“升单”。刘功又给他“丰”字作为记号，称升单时填写在内，即可升到无生老母处。尹老须回家后，便按照节气日期上供，并将同教人姓名填入单内，代为祈福，借以敛钱。

嘉庆十八年，刘功的弟子犯案，供出刘功。刘功见形势日紧，便来到尹老须处，让他接管教务。并告诉他经文内有“老手扳指等南阳”等语，指日后有南阳佛出世，离卦教当兴，嘱咐尹老须牢记。刘功不久被捕，于嘉庆十九年初解往山东途中病故。嘉庆二十一年，离卦教内骨干韩老吉等人来至尹老须家中探望，谈及刘功已故，传教无人。尹老须便将刘功生前嘱托之意相告，韩老吉等便公推尹老须为“总当家”。这样，尹老须便正式接管了离卦教的教务，刘功生前的徒众，纷纷拜在尹老须门下。②

尹老须曾从刘功处得授教内所传：“无生老母留下九十六亿儿女，以前青阳劫内燃灯佛收去二亿，红阳劫内释迦佛收去二亿，现在白阳劫内弥勒佛要收九十二亿”等语，遂让同教之人，将姓名开列，称为“书丁”。每人出钱百文，汇送至尹老须家上供，死后免堕地狱，并可升天至无生老母处，借此招徒敛钱。到嘉庆二十五年，尹老须见教徒众多，而将教内之人分为南北两会。其中山东清平、冠县等处共有教徒一千余人，称为南会。高唐、夏津、聊城、邱县、堂邑等处教徒称为北会。兰山、峄县、邳州等处之人，计二千余名，也前往尹老须处“书丁”入教。大量教徒入教，使尹老须在数年之内，竟成巨富。他利用传教得来的钱财，不仅置买田宅，设立店铺，还为其长子尹明仁报捐州同职衔，为自己捐请六品封典。不过，尹老须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希望追求更多的权力与金钱。他忆及刘功所言日后有南阳佛出世，离卦教当兴之说，便自称“南阳佛”。又因其耳内旧有长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曹振镛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曹振镛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毫,又捏称臂有"肉龙",称自己"生有异相",可成大业。又陆续盖房两所,共有一百余间。西面一所作为住宅,东面一所用来接待教徒,以取经内"收找元人归家认母"之义,将正厅命名为"收元厅",整个住所称为"飞龙寺"。以后,他又和教内谢老闻编造"无生老母与先天老爷要随时考察众人功夫,增添福力"之说,创立大场、小场、朝考、均正、巡香等名目,令谢老闻开写传单,载明月日时刻,分送各头目处,依次传给教徒,先期敛钱,凑交各头目,汇送其家,置办祭供。届期各做功夫,预备考察。又令教内之萧滋、田福荣假充明眼,闭目出神,上天问话,声称"加福",以出钱之多寡,确定"加福"之等级,借以骗钱。又令萧滋趁"上天问话"之机,编造将有"劫数",使人心怀畏惧,从而更多地出钱,以祈求消灾免厄。又由谢老闻书写传单,载明某年将有"黑风劫",某年将有"臭风劫",届时将有妖兽吃人等内容,企图借此恐吓徒众,更多地骗钱。尹老须因徒众日增,且分布于各处,"恐日久分离,不能联络"。又编造:"八卦本系文王所定",他本人便是"文王转世",所以充当离卦教首。其长子尹明仁是"武王转世",而年近八十的韩老吉乃是"太公转世",由他辅佐尹明仁传教。为了使人信服,又令萧滋在"出神上天"时,假称这些都是"先天爷言语",[①]用以欺骗徒众。尹老须借传教和装神弄鬼等手法,骗得大量钱财,以致成为一个暴发户。加上他把其他教门的徒众也吸引到自己教中来,必然引起其他教首的忌妒。上述八卦教系统中大乘教教首萧老尤编造"逆词",写成匿名揭帖对尹老须进行陷害一事,便是秘密教门之间互相争斗的典型。在这次事件中,尹老须虽然侥幸漏网,但道光十二年,官员在审理王法中传教案时,从阎老得等人口供中究出了尹老须,便将尹老须、韩老吉等人捕获。在押解到刑部会审时,面对刑具,尹老须丑态百出。他"稽首乞怜,涕泪交流,供称出神上天并无其事"。结果还是被判处"凌迟",在行刑前,尹老须"其急惶之像,恐惧之形,不堪言状。至凌迟时,犹复苦苦哀号,连叫数十声而后死"。[②]

三、马进忠所传明天教

道光初年,山东临清州一带有马进忠等传习明天教,并演出了一场登极做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曹振镛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②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载《清史资料》,第3辑,第21页。

皇帝的闹剧。

马进忠是直隶清河县人，其祖父马勤与继父马万良俱拜白阳教即离卦教教首刘功（恭）为师。嘉庆十九年刘功犯案后，由吴得荣接管教务，马万良又拜吴得荣为师。[1] 吴得荣掌教后，又将白阳教即离卦教改名八卦教，按八卦收徒，马万良任乾卦首领。道光三年，吴得荣被捕处死，马万良等人脱逃，后被奉为八卦教教首。同年四月十二日，马万良见其继子马进忠"言语灵便，能造歌词"，便将教首职位传于马进忠。马进忠因八卦教屡次犯案，便改名为"明天教"，[2]自号"圣人"。[3]

马进忠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满足于原来离卦教仅仅传徒敛钱的传统做法，而企图利用秘密教门的势力，来实现他登极称帝的梦想。道光三年五月，马进忠见地连年被水，收成不好。又因刘功、吴得荣俱犯案身死，同教中人皆谓"行好人受屈"，遂欲利用这一形势起事造反。他假称为刘功、吴得荣报仇，来动员同教造反，"共图富贵"。他对同教中人说："八卦内原有九宫，万派归一。从前教祖是李太王，凡同教中人，都应改为李姓，合成一家。"又说刘功是尧王转世，其父马万良是舜王转世，马进忠是禹王转世。按照尧舜相让的办法，如今天下应由马进忠执掌。六、七月间，马进忠又同教内乔大志等人商量，分头纠人造反。马进忠编了六百多个字号，作为暗号。每个字作为一包，分给众人收执，待将来事成之后，按字查对，凡有此字号者，便是同教，可以"封官给赏"。计划于十二月十五日，暗进临清西门，于夜晚动手，乘人不备，先抢文武衙门，得了枪炮器械，再去攻抢清河县城。

马进忠为了实现其登极称帝的野心，于十月初一日在馆陶刘允中家演出了一场禅让与登极称帝的闹剧。据马万良供："初一那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继子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登极，众人磕头，起了天心顺年号。"马进忠称帝之后，又封马万良为明天教主，封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了氏及董顾氏等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等为将军、六部、丞相，封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有七十二贤，十二差官等名目。当天因只到了三十多人，这些"官职"，有的是当面封的，有的是缺席封的，还有后

① 《朱批奏折》署山东巡抚琦善折，道光四年三月十八日。

② 《马万良供词》大学士董诰折附，《军录》2398 号。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署理山东巡抚陈预折，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来回清河后封的。①

马进忠在山东馆陶刘允中家中"登极"以后，便要回直隶清河老家。由于大肆招摇，以致被乡民告发，马万良、马进忠等人皆被拿获。马万良供："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继子在刘允中家与刘氏成亲后，二十四日头扎红绸，身披黄绫，同刘氏坐车回清河家中，口称圣人回家转道。二十八日转回，外间就有人说是邪教。继子赶将黄袍、黄白旗各一面叫刘氏絮在棉袄里，一面与刘允中、吴佩连、贺七、王兴周们商量，催人闹事，就被官人访拿了。"②

秘密教门的首领们，之所以冒着杀头、坐牢、充军发配等危险，传播其教义，发展徒众，当然并不只是出于对信仰的虔诚，主要是为了追求金钱和权力。在秘密教门的历史上，通过传徒敛钱而发家致富者，屡见不鲜。有些教首，则更热衷于对权力的追求。他们控制教徒，让教徒对自己顶礼膜拜，固然可以满足其权力欲。但还有一些人，则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即希望得到世俗的最高权力——登极做皇帝。这在秘密教门的历史上，同样不乏其人。当然，对于其中大多数想过皇帝瘾的人来说，虽然明知当皇帝仅仅是幻想，但仍然要去一试。马进忠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角色。他和门徒们，为了演出这场登基称帝的闹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马万良、马进忠等二十四人被凌迟处死，李振兴等六十二人以"共谋"之罪将立即处斩，五十二人被秋后处决，三百零九人被发往新疆为奴，五十七人发往云贵两广充军。③

四、先天教与曹顺起义

先天教是八卦教中离卦教的一支，其发展脉络据山西巡抚鄂顺安在奏报办理先天教起义一案时奏："曹顺则称，曾闻韩鉴说过，其教系由山东传至直隶，由直隶传至山西。山东里府里有一教首姓刘，因而往找，并不知其名字住址。臣查此教本系傅邦疑(凝)父子传至山西……据(傅邦凝)供：伊父当日习教，系赵其祥引进，拜侯冈玉为师。侯冈玉之师系孟见顺，孟见顺之师系萧文登，萧文登之师系吴二瓦罐，吴二瓦罐之师系山东人，寄住直隶清河县之刘恭(家)。曹顺

---

① 《马万良供词》。

② 《马万良供词》。

③ 《朱批奏折》山东巡抚琦善折，道光四年三月十八日。

所供山东刘姓即系刘恭，山东与直隶交界各府州，土语称为里府里。"[1]该教在吴二瓦罐掌教时，仍称离卦教，至其徒萧文登时，则改称"无为救苦教"。[2] 乾隆五十五年萧文登传徒孟见顺，孟见顺又于乾隆五十九年传巨鹿人侯冈玉，这时又称"离卦门下无为救苦教"。[3] 嘉庆四年，侯冈玉与同教之赵其祥来到山西平定州，住在外甥傅济家中。傅济原籍直隶巨鹿县马房村，寄居山西平定州之柏井驿地方，"阳充兽医，阴习邪教，夜聚晓散，名为学好"。[4] 赵其祥令傅济拜侯冈玉为师，傅济应允，便在家中"焚香供茶，同跪无生老母神前设誓。"侯冈玉遂把"离卦门下无为救苦教"内所传坐功运气之法，授予傅济。侯冈玉口称："俺今替祖亲传密密还乡道，直指将来出世人。俺传的是正法正道，若传邪法哄了大地群黎，将俺自身化为脓血。"傅济答称："遵当家，愿受拘束。若还不遵，自身化为脓血。"誓毕，侯冈玉又向傅济授以坐功运气及心想"无生老母"四字。并声称《龙华经》内有"无生老母立先天"之说，其教尊奉无生老母，习练长久可免三灾八难，死后免入轮回。[5] 从此，离卦教便由直隶传入了山西。

傅济入离卦教后，也开始传教。嘉庆五年他传平定州人叶生宽为徒，授以坐功运气之法。次年，叶生宽又传忻州人王宁即王银入教。嘉庆九年，傅济久病不愈，其舅赵其祥传授给他一件《老子点化歌》。告诉他每月初一、十五焚香跪拜诵习，可以除病消灾。傅济即遵照念诵，不久其病果然得愈。他见歌词有灵验，便又将其传给弟子叶生宽，并将《龙华经》即《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一部授予他，令其诵习。嘉庆十年，叶生宽又将《龙华经》带至赵城县，传与弟子王宁。嘉庆十三年，傅济传习《老子点化歌》一事被本地生员刘呈如告发，旋被捕拿。地方当局以他仅系传诵歌词，未予严惩，只发遣黑龙江为奴，后于嘉庆十八年改发湖北江陵。叶生宽受到牵连，被发配山西崞县，旋于嘉庆十四年释回。傅济之子傅邦凝与表弟杨潭幸免脱逃，继续传教收徒。[6] 王宁在得到其师叶生宽所传《龙华经》后，又在本村新唐寺向僧人普锐借得《药王经》与《九莲经》各一部，于嘉庆十九年十二月间传本县宋长荣、李克明等六人为徒。宋长荣又转

①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鄂顺安折，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②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③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④ 《朱批奏折》江南道监察御史蔡子壁折，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⑤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⑥ 《朱批奏折》江南道监察御史蔡子壁折，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传韩鉴等为徒,李克明亦转传刘长禄等为徒。叶生宽于嘉庆十四年释回后,又因贫苦难度,于嘉庆二十年借传授坐功运气以敛钱糊口。但本地人皆知道他曾于嘉庆十三年犯案发配,不肯信从。他闻知其徒王宁在赵城县传徒多人,即前往投奔,并怂恿王宁做会以收取布施。王宁答以自己收徒不多,难以靠做会敛钱,仅送给他二千文钱。叶生宽无奈,只得又返回平定州,在傅济之子傅邦凝开设的染房中做工度日。后因辛苦难忍,便于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再次来到赵县,劝王宁做会敛钱。对他说《龙华经》内有"一字为宗,六字普度"之语,由自己择一"徵"字作为"一字之宗",而让王宁再摘取六字,发给徒众而令其信服。王宁应允,便在《龙华经》中摘取"平、照、京、天、喜、动"六字,自己取"平"字,其余照、京等五字则分给徒弟李世洪等人,让其各在无生老母神位前拜祝焚化。谎称此乃"上达天庭记号",持此"死后免见阎王,不入畜道"。王宁、李世洪等各送给叶生宽钱数百文。叶生宽见众人皆信服,又附会《龙华经》内"无生老母立先天,收源结果凭查号"之语,倡设"先天教",又名"收源教",尊王宁为"总当家",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又画天地人图一纸,送给王宁。①

叶生宽、王宁立先天教传徒一事,旋为廪生卫君选所风闻,欲行呈报官府,而苦于未获实据,于是设法打入先天教内部以探悉其内幕。他投拜王宁之徒刘长禄为师入教。同年闰六月十四日适逢立秋之日,当晚王宁、李世洪、刘长禄等人设坛供奉无生老母神位,拜祝供献,卫君选亦参加其中,探得先天教内情后,即赴县署禀报。地方当局即派人将王宁等三十八人捕获。审讯时王宁又将叶生宽供出,不久,叶生宽亦在平定州被捕。叶生宽又供出其师为巨鹿人侯冈玉。官方又在直隶抓住了侯冈玉及其师孟见顺,终于弄清了先天教的来龙去脉。山西巡抚衡龄奏称:"查孟见顺、侯冈玉等在直隶供出离卦教、无为教苦教名目,传教首犯系已故离卦教首部姓。侯冈玉、孟见顺系由已故教匪刘恭辗转传授。……随提侯冈玉、孟见顺等逐加诘讯。据供,此教实同已故教匪刘恭传授吴二瓦罐,吴二瓦罐传与已故之萧文登,萧文登转传孟见顺,孟见顺转传侯冈玉。从前萧文登传教之时,原有离卦教头殿(透天)真人部老爷门下通诚言语,并有无为救苦教之名,该犯侯冈玉因于习教之后,会遇吴二瓦罐,告知离卦教头部姓曾经传教破案,该犯虑恐称其门下招惹是非,是以嘉庆四年赵其祥邀其劝

①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教傅济之时，该犯讳言离卦教，只向傅济传授设誓并坐功运气功夫，尊奉无生老母。王宁等倡立先天教，伊等实不知情。”①这段奏文比曹顺所供先天教源流更为明晰。此案结案时，王宁、叶生宽均被绞立决，其徒等被枷杖发落，韩鉴获释后，数年之内，未敢再行传徒。

道光二年，韩鉴因贫苦难度，又在赵城县传曹顺入教为徒。曹顺（1804—1835）原籍山东曹县，寄居山西赵城县耿峪村，“平日学习阴阳，并会治病，兼学拳棒”。② 道光二年，先拜韩鉴为师入先天教。韩鉴曾向他传授闭目运气之法，并教内之咒语：“观音老母造法船，造在婆娑海岸边。船板船底沉香木，鲁班带去做桅杆。若问法船有多大，听我从头说根源：东至东洋东大海，南至普陀落伽山。西至古佛雷音寺，北至老龙游马滩。王母娘娘位上坐，十八罗汉列两边。金童玉女分左右，二十八宿来拉船。有朝一日船开了，想上法船难上难。”③该咒语的中心意思是诱劝人入教以便尽早上“法船”，如果错过机会，再要入教上“法船”就要难上加难了。

曹顺向来同该县僧人道洪交好，两人常在一起行医。曹顺入先天教之后，见道洪庙内藏有《九莲经》一部，遂向其借阅诵习。道光五年春，傅济的弟子、赵城县人吉洪便前往直隶，邀请傅邦凝来山西“传徒兴教”。并与韩鉴、韩奎、宋银奎等四人拜傅邦凝为师。道光十一年十一月，韩鉴、吉甫清又陪同傅邦凝来至山西赵城，并令曹顺亦拜傅邦凝为师，称傅邦凝乃是从前先天教老师傅傅济之子，曹顺允从。傅邦凝临行时，曹顺按照教内规矩，送给他盘费一千文。道光十二、十三年，曹顺又先后凑过“上供钱”，由吉甫清转送傅邦凝。道光十四年九月，韩鉴因自己年老力衰，便将教内事务交与曹顺掌管，并令其弟韩枝即韩滋、韩奇即韩瞭，其子韩修娃即韩根苗、侄韩苗儿等人，俱拜曹顺为师。曹顺在担任教首后，看到傅邦凝远在直隶，每年自己却要将敛到之钱送给他花用，不如自己在本地自立门户，可不再把敛得之钱送往直隶。于是向徒众们声称：“从前教中人用手指下巴，传法不真”，而另创新法：“用手指插入口内，向上一挑，名叫挑莲，能长气力，兼祛疾病。”④传徒时，令徒众向无生老母磕，再用中指点其口中，

①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衡龄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② 《曹顺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③ 《曹顺供词》。

④ 《曹顺供词》。

吹气一口，令其闭目吸气。声称照此坐功运气，日久可以消灾除病，兼能精通武艺。[①] 又向徒弟们诡称自己乃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说教内之人，都有来历。称韩鉴是吴汉转世，韩金宝是燃灯佛转世，韩瞭是海瑞转世，张汝斌是魏延转世，李吉星是徐庶转世。[②] 以后便不再与吉甫清等人来往，传徒所敛之钱文，也不再送给傅邦凝。由于曹顺在传教时创造了许多新颖内容，所以本县各村之人，纷纷拜他为师，徒众日增，甚至有县衙中的书吏董良史、县役狄思亮、赵法玉等人入教。

道光十五年正月，曹顺在修房取土时，刨出一颗铜印，他以“铜印非常人之物”，“既然得受，将来自当大贵”。加之见到徒众日多，“遂起意造反”。同年二月十六日，曹顺与韩鉴、韩瞭、张汝斌、苗赞庭及僧人道洪等人商议，拟于同年八月十五日在赵城县、平阳府、霍州、洪洞县四处同时起事。并令徒众多多招人，打造军器。此事不久即被乡约张继斌探闻，并于三月初二日进城，欲行首告。他先与县衙书吏董良史商议此事，董良史已经入教，便将他劝阻。而当时县令杨延亮也已风闻曹顺传教并欲造反之讯，即派遣县役郭二魁等前往查拿。差役狄思亮（先天教徒）闻知此讯，便急忙向住在城内的僧人道洪报告，道洪也火速向曹顺等人报信，嘱令他们“赶早起事”。[③] 曹顺闻报急忙同众人相商。韩鉴提出恐人少没有兵器，难敌官兵。曹顺则认为，若被县官拿住，都没性命，不如先行动手。杨溯法说，赵城县地当大道，若把往来文报截阻，各处不得信息，救兵一时不能前来，可裹胁多人守险抗拒。最后，大家决定于三月初四日举行起事。当时决定由苗赞庭等书写传单，通知各处教首。内称：“老母限期已满，吾主定于五日子时起手。将你人马发起。如一人不到，立时杀死。一家不到，杀个鸡犬不留。于初四日晚间一齐入城，乞道长见字，如令速发。”并通知僧人道洪等在城内接应。道洪接到通知后，便为众人准备了饭食，并令狄思亮准备火把，以便届时为众人引路。初三日夜间，韩鉴等人搜取各家刀、棍、农具等物，令人将弯的改直，圆的改尖，并令徒众们连夜打造兵器。初四日，韩鉴等纠约了村内二百多人，每人皆分给兵器。各人头上扎挽绸布，作为记号，称“英雄结”。以红色为大，蓝色为中，其余皆挽青色，以便互相识别。曹顺担心众人畏惧不前，假称

① 《朱批奏折》山西巡抚鄂顺安折，道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② 《曹顺供词》。

③ 《苗赞庭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自己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为众人壮胆。又封韩瞭、张汉斌为领兵元帅,李吉星、苗赞庭为军师。计划在攻占赵城之后,再前往霍州、洪洞、平阳府等处。曹顺与韩鉴等人留守在村中等候消息。

初四日夜晚,韩瞭带领六七十人,从县城坍缺之处爬进城内,集中在道洪庙内。四更时,由教内张金子开启城门,放入余众进城。韩瞭、张汉斌与僧人道洪等率众进入县署。由差役狄思亮、赵法玉在署内接应,执火把引路。当时,知县杨延亮全家均在睡梦之中,猝不及防,皆被杀死。住宅与县署大堂,均被焚烧。赵城县典史章际清望见县署火起,急忙带同兵役刘清、李德奎等赶前援救。见教徒人多势众,难以抵敌,即一面派刘清通知家属躲避,一面率兵役去保护监狱,结果被教徒杀伤,逃到县署马号内空屋中藏匿。外委李大法等亦率兵七人赶至救援,亦为教徒杀散。初五日清晨,韩瞭与张汉斌、僧道洪等商议,派军师苗赞庭带领宋长隆等向南攻打洪洞县城;派靳晚虎、张汶建等率众向北攻打霍州城。苗赞庭一支队伍约一两百人,加上沿途加入者共四百余人,于当天中午到达洪洞县城,立即攻城,结果被守城兵丁打退。当晚再次攻城,又被击败,只得连夜逃回赵城。由靳晚虎等所率一支队伍,加上沿途参加者约有三百余人,于初五日申时到达霍州城小南门外,放火攻城。结果被守城兵丁以炮击毙数人,众人发现曹顺所言可避火器一事,纯属欺骗,遂纷纷败退逃散。

山西巡抚鄂顺安于三月初六日接到霍州知州惠馨的禀报,得知赵城县城已破,县署被焚烧,知县生死不明。晚间又接灵石县知县祥玉禀报,得知霍州城亦被包围。鄂顺安立即调集省城官兵八百人,及附近各县官兵五百五十人,亲自前往赵城一带镇压。又调大同镇总兵清安率兵三千,前往会剿。清兵尚未及赶到,先天教起义的队伍已经溃散。首领韩鉴逃至霍州内山,绝食身亡。曹顺、李吉星闻知事败,即逃至赵城县东山山神庙内躲藏,然后乘夜出逃,于初十日又与张汉斌等相遇,商议一同逃往山东去寻找"老教主刘姓"。三月二十二日,曹顺等在山东曹州府观城县西关外一座空庙内,被巡逻兵丁拿获。起义事败之后,当局对参与其事者严加惩处。曹顺因系"首逆",被处以"寸磔"。杀死知县之韩瞭等四人被凌迟处死,并且"摘心致祭"。起义军首领张汉斌等二十人亦被凌迟处死,韩枝等七十七人被斩决枭首示众。韩鉴等五人被凌迟戮尸,其他被戮尸者,还有李沅等十七人。

第二十章　从江西大乘教到青莲教

浙江的姚门教在流入江西以后，在乾隆年间吴子祥[①]掌教时，又融入来自北方的黄天教支派——圆顿教与罗教系统大乘教，改称“大乘教”。吴子祥故后，其弟子何弱(若)继续传教，后遭破获，被发配到贵州龙里，他在那里又辗转传给当地的袁志谦等，以后，袁志谦的弟子在四川华阳(今双流)将该教进一步发展为青莲教。

一、吴子祥与江西大乘教

在姚门教向江西大乘教演化的过程中，吴子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民间教门的经卷里，可以看到诸多有关吴子祥生平的记载，尽管其中有许多神化吴子祥的内容，但其中有的尚有可信成分。在青莲教的经卷《正宗祖派源流》里称吴子祥“讳紫祥，号静林”，“于大清康熙间七月十三日诞降于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以往清档记载吴子祥是江西贵溪人，大约是因为他两次在贵溪被捕所致，《正宗祖派源流》有关吴子祥是江西抚州府金溪县的记载当属可信。至于所称吴子祥“后承九祖道统，阐道高山寺”，和“初黄祖遇吴祖于有缘寺、应元寺两地名时，黄祖命吴祖执役服劳。一日令浣衣，视见其真实不欺，叹曰：‘载道器也’。遂将天盘交付”等说教，无非是为了神化吴子祥而已。

从档案记载可知，乾隆年间，吴子祥先加入了姚门教，后来，来自北方的圆顿大乘教传入江西，吴子祥又与之融合，改称大乘教。而这支圆顿大乘教，又是罗教系统的大乘教与黄天教支派圆顿教融合而形成的。据雍正年间江西圆顿大乘教教主黄森官之父黄廷臣供称：所传圆顿大乘教“原系圆顿教”，又名“三皇圣祖教”、“白阳会”。该教“教名明显地带着大乘教与圆顿教混合的痕迹”。[②]

---

① 清档中写作“吴子祥”，而教门经卷中则写作“吴紫祥”。

②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100 页。

而圆顿教又是来源于北方的黄天教的支派，这也正是吴子祥为什么作为一名姚门教的教首，竟然能够使该教同来自北方的圆顿大乘教融合的原因。本书前面提到姚门教来源于浙江处州缙云县应继南的无为教，而处州无为教实际上乃是来自北方的黄天教。只是在应继南时融入了罗教的因素，并以罗教自居，遂自称罗教。姚门教实际上也是来源于黄天教，所以从应继南的无为教到姚文宇的姚门教，皆继承了黄天教以普字派名的传统。而来自北方的圆顿教和吴子祥的大乘教也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如吴子祥的弟子张起坤的法名便是"普甜"。实际上，整个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中，仅有黄天教、圆顿教、应氏无为教、姚门教和吴子祥的大乘教以"普"字派名。这说明上述几个教门之间，确有密切关系。

从档案史料可知，吴子祥大乘教直接来源于姚门教。据嘉庆年间(1796—1820)唱戏为生的贵溪人张起坤供称："乾隆五十七年，有同班唱戏已故之万年县人叶益章，述及向习吴子祥所传大乘教即三乘教。[该教]起自前明罗姓，法名普仁，传徒殷姓，法名普能。普能传徒浙江庆元县人姚大宇，法名普善，流传徒众，称为姚祖教。迨吴子祥编造《大乘大戒经》，称为大乘教即罗祖教，均以普字派名。"并称入教时要传授"五戒"及"十步教法"，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1] 供词中的"姚大宇"实为姚文宇之误。从上述供词可知吴子祥所传大乘教，实际上便是姚门教。史料记载，罗维行所传大乘教乃是罗教的分支，罗梦鸿故后，其嫡传弟子继续以罗教名称流传，而其子佛正、女佛广则以大乘教之名流传。[2] 入清以后，罗教中由佛正、佛广流传的一支便称大乘教，如雍正年间苏州的大乘教，便是罗教的分支。不过，罗维行所传大乘教，已经同来自北方的圆顿教接近以至融合了。如吴子祥的弟子叶益章在传张起坤入教时，还抄给他罗教的经卷《正信除疑自在经》、《破邪显证钥匙经》、《巍巍不动泰山经》、《苦功悟道经》、《叹世无为经》，[3]这便是罗教的《五部六册》。那么吴子祥又是如何与来自北方的罗祖大乘教汇合的呢？我们从该教骨干龙海燕的供词中可以找到线索。嘉庆二十五年(1820)，龙海燕于赴京恳请官府换给《护道榜文》，结果被拿获，审讯时供称："康熙六年有素习大乘教的直隶民人罗维行，领了官给的《护道榜文》在

---

①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② 彰宝折《史料旬刊》第15期。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外传教。后罗维行四传至江西民人何若为徒，何若得了榜文，到贵州省内习教。"[①]我们从道光二年(1822)江西巡抚阿霖的奏折中，可以知道何若与吴子祥有密切关系。据吴子祥之侄媳吴张氏供称，乾隆四十八年(1783)吴子祥编造大乘大戒经忏及斋单，并用盘装果供神，名"斋盘"。立有天、地、人、神、圣五等名色，取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之义，祛病延年。并以吃斋念经，期在超凡入圣。随以圣盘为首，吴清远(吴子祥之侄)供圣盘，何樊英之父何若供天盘。另外，从青莲教、先天道和一贯道等把吴子祥尊为十祖，何若尊为十一祖来看，吴子祥与何若确有着师承关系。据《道统宝鉴》记载："吴子祥号静林，乃文昌帝君化身，于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降生于江西抚州府贵溪县，遇九祖在江西说法度人，遂参拜九祖门下。"这里所说的"九祖"，便是青莲教、一贯道所说的黄德辉。《道统宝鉴》称黄德辉"系原始天尊化身，于康熙年间二月初八，降生于江西饶州府鄱阳县"，"九岁时得神仙传授金丹口诀并传至玄，从此遥接心传为第九代掌道祖师"。关于何若，《道统宝鉴》写道："何若号了苦，生于乾隆年间三月初九日降诞。世居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南乡石林三板桥。"他"生性好静，意淡名利，立志修道。忽遇神童传以采取功夫，授以大药丹法。又遇吴祖心投意合，同修同徒，给经十二本，内载《榜文》"。[②] 可见，吴子祥确实与罗维行一支大乘教有密切关系。所谓罗维行四传而至何若，应该是指罗维行、黄德辉、吴子祥与何若。说明吴子祥作为一名姚门教的骨干，这时又接受了与来自北方的罗祖大乘教与圆顿教，并"编造《大乘大戒经》"，遂把教名改称"大乘教"。此后，吴子祥所传大乘教也持有所谓《护道榜文》了。

所谓《护道榜文》乃是大乘教孙维俭弟子刘幗名与张九成等人所伪造，[③]后来一直在秘密教门内流传。1984 年在江苏睢宁县发现的一件《护道榜文》，是用朱笔抄于《苦功悟道卷》之卷首，题为《钦颁护道榜文》，首页有"御制"诗一首，原件伪称系明正德甲戌年刻本，清康熙六年礼部奏准颁布，民国年间抄录。文内称清康熙六年"礼部奏准，圣旨敕赐龙牌与天下庵堂、修道大众人等"。并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补)刑部戴均元等折，附《龙海燕供词》，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

② 《道统宝鉴》，转引自王见川《台湾斋教研究之一：先天道前史初探——兼论其与一贯道的关系》，载《台北文献》第 108 期。

③ 《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温承惠折，嘉庆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称"圣旨知会各部衙门,出给榜文,护持正教,颁行天下十三省布政司、各府州县:大乘道人等众,各守清规,每逢朔望,礼拜开统,为国报恩,祝诞圣寿无疆。凡一切持斋道人,请给度牒。果系学道参禅道人,许令抄自刻录《护道榜文》,随身执照"。"凡遇关津,军民人等,毋许阻滞。凡遇十三省布政司、四大名山,遇有崆峒道场基址,任凭结草为庵。""不许各州府县大小衙门官员、军民人等、差役及地方乡约里长诸色人等限制。如有此等,许大乘道人焚香宣读榜文,扭锁到官,依律治罪,发边充军。"①

从清档所载康熙六年(1667)直隶民人罗维行携带"官给《护道榜文》,在外传教",并且"四传至江西民人何若",而何若又是吴子祥的弟子②等情况来看,吴子祥确实接受了罗维行所传的大乘教。但是,他并不是单纯传习罗维行的大乘教,而是把它同自己原来所传的姚门教融为一体。新形成的大乘教,既具有罗维行大乘教的特色,如诵念"大乘真经"《五部六册》,以大乘教为名,并拥有《护道榜文》;同时又具有姚门教的特色,如以普字派取法名,并有十步教法等。

二、江西大乘教流入贵州和青莲教的形成

乾隆四十九年(1784)吴子祥故后,该教一度沉寂。乾隆五十四年(1789),吴子祥之徒何若,"在临川县地方,记忆从前经文,添凑默写,邀人诵念敛钱。经县拿获,将何若审照左道惑众为从例,发云贵两广烟瘴充军"。③ 何若被发配到贵州龙里县后,仍然暗中传徒。"何若到黔,收八寨故民王道林及其妻钱氏为徒,给经一包又五本,内一本载有榜文。又收龙里县袁志礼为徒,给经十二本,内一本亦载榜文。"④有关王道林的情况,据其弟王道才供:"已故胞兄王道林从前拜江西民人何若为师。嘉庆五年何若身故,就是王道才传徒。"王道林先后又在当地传其妻钱氏、弟王道才等五百余人入教。据龙海燕供称:当时王道林所传弟子尚有七十四人,他们"习的是大乘正教,礼佛念经,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

① 承陆仲伟先生提供,谨此感谢。
②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阿霖折,道光二年七月初十日。
③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阿霖折,道光二年七月初十日。
④ 《朱批奏折》云贵总督兼署贵州巡抚伯麟折,嘉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位,烧的是九烛香,念的是无生老母,忏的是劝化世人的《大乘经》"。[①] 该教拥有《护道榜文》及《大乘经》十二本。信徒各在家里烧九炷香,口诵无生老母发愿文,并念诵《报恩经》,内容系:"一报天地复载恩,二报皇王水土恩,三报日月临照恩,四报父母养育恩。"[②]

袁志礼是青莲教和一贯道的十二代祖师袁志谦之兄。"贡生袁志礼因子嗣艰难,曾拜何若为师,吃斋念佛。何若留与经本卷十二本,袁志礼存于家中。"[③] 嘉庆二十五年(1820),贵州丹江厅教徒龙海燕而被当局盘获而导致王道才、袁志礼等人被捕。经审讯,袁志礼、龙海燕、王道才等人被判"先枷号一个月,满日重责40板,迁徙云南为民,分别安插,交地方官随时管束"。[④]

有关袁志谦当时的情况,档案尚未提及,在《正宗祖派源流全部》中"第十一代何十一祖小传"中提到,袁志礼和袁志谦是在听何若说法后"一同皈依入道"的。[⑤] 为了进一步了解袁志谦的情况,笔者曾前往贵州龙里县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在该县龙山镇找到了袁志礼、袁志谦弟兄的后裔、已经七十八岁的袁思忠老人。据他说贵州龙里的袁姓,是明末清初从四川大足县迁来,如今在距龙山镇三公里才尧钵山牛打场一座小山上,还保存着袁志礼、袁志谦父辈为袁志礼祖父袁开祺所立墓碑,碑文刻有以下文字:

文林郎	考	公讳开祺	
皇清诰封	显	袁	之墓
老孺人	妣	母孙太君	

落款中提到立碑者有袁志谦父辈袁琮等人,袁琮曾任湖北荆州府公安县知县。袁志谦同辈共有弟兄十人,即袁志道、志忠、志宽、志刚、志和、志仁、志圣、志信、志礼、志谦。其中袁志礼行九,袁志谦行十,与档案记载袁志礼又名袁九,袁志谦又名袁十相符。

道光七年(1827)四川巡抚戴三锡在奏报杨守一、徐继南(阑)一案时称:"访获新都县民杨守一等茹素念经,坐功运气,立会传徒,臣提犯严鞫。缘杨守一籍隶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补)英和折,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初二日。
② 《朱批奏折》云贵总督兼署贵州巡抚伯麟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③ 《朱批奏折》云贵总督兼署贵州巡抚伯麟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伯麟等折,嘉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
⑤ 杨净麟:《青莲教初探》,硕士论文未刊稿。

新都县,平日算命营生,买有道教《性命圭旨》及《唱道真言》各一本。茹素念诵,并坐功运气。道光七年三月间,来至华阳县属新街,租得张俊空屋,开设命馆。遂有县民徐继兰(阑)、蒋玉章、余青芳,往令算命。因杨守一推算颇验,徐继兰等信服,常相往来。"道光七年(1827)五月初间,"有贵州龙里县人袁无欺,来川售卖土绸,亦至杨守一铺内算命。因杨守一所言多中,袁无欺常往坐谈,遂称相好。袁无欺得知杨守一吃斋念经,即言伊有一种《开示真经》,须供奉飘高老祖并无生老母牌位,每日烧香念诵,可以消灾获福。如能学习,伊肯相传。杨守一欣然愿学,即拜袁无欺为师,随给抄写《开示真经》一部。袁无欺旋即回籍"。是年五月二十三日,徐继兰等人来到杨守一处闲谈,杨守一欲传徒做会,敛钱使用,遂"先以念经求福之言问探,徐继兰等皆以为然。杨守一即将袁志谦传授经卷,令其供牌念诵,可以消灾获福,并盛称其经精妙,诱令徐继兰等从伊学习,徐继兰等允从。杨守一因寓所窄狭,约定于二十五日在徐继兰家拜师做会念经。至期,杨守一前往相会,徐继兰、蒋玉章、余青芳各送给杨守一一千文,拜其为师。杨守一将《开示真经》及《唱道真言》给予阅看。曾闻供奉飘高老祖系属犯禁,遂以《唱道真言》为青华道祖讲道之书,用黄纸书写"青华老祖"并"无生老母"两牌位供奉,即取名为"报恩会"。并将《开示经》改称《恩书》,掩人耳目,且引人入会。"众皆依从,供设牌位,烧香念经"。"徐继兰将《开示经》照抄一份,同原供牌藏于家内,杨守一等聚众烧香念经。"同年闰五月初十日,杨守一等聚众做会、传徒敛钱之事,被地方官员访闻,前往查拿。徐继兰等当时就获,杨守一因先已出外,闻风逃逸。官府在杨守一家中搜获《性命圭旨》一本,《唱道真言》一本,《开示经》一本。在徐继兰家搜获《开示经》一本,黄纸书写的"青华老祖"和"无生老母"牌位各一个。① 奏折对于袁志谦及其弟子徐继南(兰、阑)和杨守一如何创立青莲教的情况作了简要叙述。唯文中提到被捕者供称杨守一等所立之教取名为"报恩会",有学者据此认为"青莲教"一名称,可能是官府强加给杨守一等人的"诬称"。② 不过,从后来青莲教教徒供词来看,杨守一等所传之教,确属青莲教而非报恩会。(详后)所谓《开示真经》又称《礼本》,是青莲教、先天道的主要经卷之一。该经也颇受黄天教的影响,有些段落完全照抄黄天教经卷《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如《开示真经》有关三皈五

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月折包》道光七年六月十六日戴三锡折,转引自王见川:《先天道前期史初探》,载《台湾的斋教与鸾堂》,天南书局有限公司,1996 年。

② 王见川:《先天道前期史初探》,载《台湾的斋教与鸾堂》,天南书局有限公司,1996 年。

戒的内容是:“要五戒严精,三皈清净。三皈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饿鬼,皈依僧不堕旁生。五戒者,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酒肉,五不妄语,此乃是三皈五戒。佛法僧者,皈依佛不是泥胎,不是彩画,不是泥塑木雕,不是铜打铁铸,要皈活泼泼转辘辘,有静有动,常放五彩毫光。圆陀陀,赤洒洒,无新无旧。为众生乃为一尊真佛,自性为佛。皈依法,不是王法,不是家法,不是邪魔外道法,不是呼风唤雨法,不是邪魔魇镇法。要皈依明晃晃、亮堂堂,晶辘辘,金轮常转。悟道之人,蕴空妙法,取经发卷,乃为真法,自性为法。皈依僧者,不是人僧,不是尼僧,不是众僧,不是看经念佛僧,不是走方云游僧,不是一切人中僧。要皈依褙褙转,巍巍妙元元,无尘无垢,无身无体,半虚空放一段光明,乃为真僧,自性为僧。”①这段经文一字不差地抄自《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的《钥匙佛如来开悟道修行分第七》。这说明吴子祥、何若、袁志谦一系所受黄天教影响之深。道光八年(1828)贵州巡抚松溥也奏:“袁无欺本名袁志谦,系龙里县生员,告给衣顶,常在川省贩卖绸布,并为人看择风水。嘉庆二十五年(1820),该县因其外出游荡不归,详革衣顶。”②在一贯道的《道统宝鉴》中有关袁志谦的记载称:“十二祖姓袁讳退安,道号志谦,又号无欺,乃原始天尊化身,生于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降诞于贵州龙里县。少壮入泮,又补廪膳生员。自受何祖点化指教,授以至道,复赐祖位。初开荒于黔滇,复阐道西蜀,日以算命卖卜遮身,常讲三教合一之理。”③这些史料都说明袁志谦是青莲教和先天道内的重要人物。

三、道光年间青莲教在川楚贵等省的流传与发展

道光年间(1821—1850),青莲教在川楚贵等省得到了广泛发展,而且,对后来秘密教门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青莲教分裂后形成的一贯道、先天道、普度道、同善社、归根道等,皆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会道门。

道光七年青莲教遭破获,杨守一虽然闻拿逃逸,不久亦被拿获。袁志谦在

① 《礼本》(《开示真经》),载台湾林万传:《先天道研究》第二编《先天道经典汇编》。

② 《朱批奏折》贵州巡抚松溥折,道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③ 有关《道统宝鉴》之引文皆转自王见川的《先天道前史初探》一文,载《台湾的斋教与鸾堂》,天南书局有限公司,1996年。

教徒黄金榜帮助下，逃往湖北汉口，改为"吉姓"，扮作卖绸商客，在汉口潜匿下来。[①] 教内骨干也大多被捕，后被发遣到"回城"为奴。其中如陈文海、郑子青等，因以充军者身份参加清政府平定张格尔叛乱，事平后被免罪释回。一些教内骨干在返回内地后，"仍复习教"，使青莲教在川楚贵等省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其中袁艾等人继续以"报恩会"的名义，在贵州龙里一带传徒敛钱。在四川南部县的邓良玉、谢永先等，仍以青莲教名称传教。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湖南清泉人周位抡，拜城步人吕文柄为师，皈依青莲教，学习坐功运气之术，念诵《三皈五戒》、《无上妙品》等经卷。该教"以达摩为祖，有众生、添恩、证恩、保恩、引恩、顶航名次"，[②]并且尊袁志谦为十二祖。[③] 道光十七年(1837)湖南人徐万昌、张有林拜青莲教骨干彭超凡为师入教，供奉无生老母牌位，并抄藏礼拜表偈忏语，念诵《悟性穷源》等经卷。

在青莲教逐渐恢复元气之后，教内首领与骨干李一源、陈文海、林祝官、郭建文等人，便商议对青莲教的组织进行整顿，开始所谓"复兴青莲教"的活动 。道光二十二年(1842)，李一源在四川约陈文海、彭超凡等商议复教之事，但无结果。次年二月，青莲教教首、骨干再次商议其事，认为大家都在四川传徒，所传不多，且容易遭到破获，遂决定分别前往各省传徒。有人提出必须扶乩判出字派，方好传徒，事后，众人相约分别前往湖南善化县，进行复教活动。[④] 陈文海等人来到善化县后，在该县东茅巷地方以行医、算命为掩护，租房潜住。适有江宁人刘瑛来到湖南长沙贸易，贩卖杂货，与素识之湖南人莫光点相遇。莫光点向他谈及陈文海等复兴青莲教之事，邀刘瑛入教。刘瑛即拜莫光点为师入教，莫光点将刘瑛带到善化县，与彭超凡等人相见。刘瑛时常帮人扶乩，彭超凡便请他设坛扶乩，定出十七字派。即以"元、秘、精、微、道、法、专、真、果、成"十字，都用"依"字加首，称为"十依"。又定"致温"、"致良"、"致恭"、"致俭"、"致让"五名，又恐人多不敷使用，又添"克"、"特"二字，共凑够十七字派。又分出"内五行"五人，专管乩坛；"外五行"五人，同五致字为"十地"，分别往省传徒。

在道光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1843—1844)青莲教的复教活动中，教首、骨

① 《上谕档》道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谕"。

②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八。

③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李星沅折，道光二十年三月初八日 。

④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干之间为了争夺教内的领导权，产生了不少矛盾与冲突。教内形成了以李一源、彭超凡、陈文海为核心的主流派，同以周位抡、郭建文为首的非主流派间的生死搏斗。

周位抡是湖南清泉县人，道光十三年（1833）拜吕文柄为师入青莲教。道光十九年，周位抡独自外出传徒，自任"顶航"，号"摘光祖师"，先后在江西、湖北、湖南各地传徒。他不仅传习青莲教，而且"奉的添弟会"，并传授坐功运气之术。他还在各地货摊上收购到许多经卷，如《推背图》、《风轮经》、《东明律》、《托天神图》等。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周位抡在湖北汉口"静坐出神"，诡称"忽见天有白光，知世人遭劫"，遂制造金冠云履、仙衣寿带、黄旗佛冠、七星宝剑等，并且绘画兰草，书写龙虎二字，扬言能"镇邪驱瘟，可除妖魔"，[①]并编成七十二种"魔道"，"未来三灾八难"，名为《九莲宝赞》，写书散布。又宣称他本人曾得"天书"三卷，书中注明周位抡是"弥勒佛转世"，将成大道。另外还制有纸旗一面，上书"饬令万云龙"五字，表明他已同天地会取得了某种联系。

周位抡的活动，主要是为了争夺青莲教的教主地位，所以，引起了李一源等人的警觉。为此，陈文海、彭超凡等人与周位抡曾在黄雀楼"谈道"实即辩论。周位抡以陈、彭"道真人假，好讲符箓"，彼此不合，并且"另传金丹道，收徒敛钱，彼此争利"。而彭超凡等则称"八牛主是弥勒佛转世，名叫朱普明"，并依仗势众，不许周位抡在汉口传徒，周则因势单力薄，恐遭加害而前往卧龙岗避难，并改名为张利贞。[②] 其实，金丹道之名称，并非始于周位抡，而是青莲教的别名。道光年间青莲教便又名"金丹大道"。据湖南巡抚裕泰奏称："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有四川成都府人王又铭来至武岗州算命，与从前查办斋匪案内缉拿未获之程孔固会遇。王又铭称有青莲教，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③]到周位抡弟子刘振麟时，仍"假称金丹大道"并解释说："金者坚之称，丹者圆之谓，讲究坐功运气，要人学习，心坚始能修道圆满之意。"但"仍以青莲教原编顶航、引恩、宝恩、证恩、天恩各名次，以顶航为上等，凡入教之人由天恩递进"。[④] 可见，周位抡及

---

①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李星沅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李星沅折，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转自庄吉发：《清代青莲教的发展》，载台湾《大陆杂志》，1985 年第 5 期。

③ 《朱批奏折》湖南巡抚裕泰折，道光二十年五月十八日。

④ 《朱批奏折》湖南巡抚裕泰折，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其弟子所传“金丹大道”，实际上仍然是青莲教。而郭建文即刘仪顺、宋慈照即刘汉忠所传的“灯花教(会)”，也就是青莲教和“金丹大道”。据史记载，“孙明高周历各省传教，并无定所，称说四川有三佛下界，刘汉忠是三佛军师，所习名金丹大道，又名灯花会”。①

李一源等为了同周位抡、郭建文等争夺总教主的职位，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与彭超凡等在湖北汉阳萧家塘租用当地刘王氏的空屋，设立乩坛，“设坛请乩”，将“无生老母”改称“瑶池金母”，称汉阳为“云城”，所设之坛称为“紫微坛”。陈文海又假托“圣贤仙佛转世”，以达摩为初祖，袁志谦为十二祖，徐继阑、杨守一为十三祖。凡有人入教，先给予劝善书本，如《玉皇心印》、《十人二圆觉》、《悟性穷原》、《慈行性理》等。然后供奉香火，传授愿忏语句。每人捐献功果钱数千文或银数十两、百两不等，所得钱文用作教内人相互接济。② 李一源见入教者日多，便与陈文海等商议，须奉一人为教主，以巩固同教人之心。在拥立教主问题上，青莲教教首间产生了尖锐冲突。葛依元即郭建文声称周位抡现有云履、仙衣、寿带及天书三卷，天书内“道理高妙”，且书中注明周位抡是“弥勒佛转世”，将成大道，故应奉为教主。而李一源、彭超凡、陈文海等则以周位抡“为人狡猾”，不及彭超凡表弟朱明先为人老实。又称朱明先法名“中立”，道号“化无”，暗号“牛八”，与教内《开示真经》中“八牛普度”一语相吻合。若奉为教主，可以便于招人入教。又利用“降坛”，假称“八牛儿即弥勒佛转世，未末申初之年应当成佛”。届时，凡属教内之“五行”、“十地”及传道之人皆可“大获好处”。又摘录《开示真经》内“万法流通在世间，金丹大道至极元，八牛普度开群品，丙午丁未大收元”。暗示朱明先即朱中立乃弥勒佛转世，因而力主尊朱中立为总教主。③ 但是，郭建文不服，仍坚持立周位抡为总教主。双方争执不下，只得“各行其教”。陈文海等便借做“龙华三会”，让朱中立改名“化无子”。教内又规定，以后教内往来书信，均以“云城”为暗号，免致暴露。相约以孟家巷为“紫微坛”，江夏洗马池为新坛。又恐朱中立年轻无能，又于洗马池地方设立“太和公栈”，作为往来寄住之所，由朱中立和黄文彬照管，众人仅虚奉朱中立为教主，实权仍操在李一源等人手中。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官文等折，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② 庄吉发：《清代青莲教的发展》，载台湾《大陆杂志》，1985 年第 5 期。

③ 《朱批奏折》成都将军宝兴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李一源等争得教权后，便按照道光二十三年(1843)制定的派名办法，确定青莲教教首与骨干的派名及职位。派名是：

元：邓良仕改称邓依元；

秘：林祝官改称林依秘；

精：陈文海改称陈依精；

微：李一源改称李依微；

道：刘瑛改称刘依道；

法：彭超凡改称彭依法；

专：柳清泉改称朱依专；

真：邓良玉改称邓依真；

果：范臻改称范依果；

成：安添爵改称安依成。①

其中彭超凡、陈文海、林祝官、安添爵和刘瑛五人为“先天内五行”，在湖北掌管“云城”、“洗马池”两处坛事，总办收圆。后来，刘瑛入教后“因未获利”，而“改教回去”，由宋朝真改名“宋依道”顶替。② “内五行”又分别以水、火、木、金、土为序，上述教首与骨干又排列为：

水：彭超凡即彭依法为“水法子”；

火：陈文海即陈依精为“火精子”；

木：安添爵即安依成为“木成子”；

金：林祝官即林依秘为“金秘子”；

土：宋朝真即宋依道为“土道子”。

又以李一源等五人为“后天外五行”，分别排列为：

元：余克明即余依元，号“依元子”；

微：李一源即李依微，号“依微子”；

专：柳清泉即朱依专，号“依专子”；

果：范臻即范依果，号“依果子”；

真：邓良玉即邓依真，号“依真子”。

以夏继春等五人为“五德”，以“致”字再加上“温良恭俭让”派名：

---

① 《上谕档》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

②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温：夏继春改名为夏致温；

良：谢克畏改名为谢致良；

恭：黄文彬改名为黄致恭；

俭：张蔚泽改名张致俭；

让：张俊改名为张致让。

先天五行又称“五内”，职责是“总持坛事”；“后天外五行”与“五德”，构成“十地大总”，职责是掌管各省传徒之教务。又把全国十八省划分为“道家十方”，由“十地大总”，各认一方，再由他们将其徒弟分为108盘，分散到各地去传徒。具体分工是：

余克明（余依元）掌管浙江、福建；

李一源（李依微）掌管四川、陕西、甘肃；

柳清泉（朱依专）掌管江南；

范臻（范依果）掌管江西；

邓良玉（邓依真）掌管广东、广西；

夏继春（夏致温）掌管云南、贵州；

谢克畏（谢致良）掌管河南、直隶；

张蔚泽（张善即张致俭）掌管山东、山西；

黄克立（黄致恭）掌管湖北；

张俊（张克广即张致让）掌管湖南。

在确定了传徒的任务后，教内骨干便分头赴各省发展信徒。不过，由于教内的争斗，使得原来计划不得不作部分改变。原来认往浙江的郭建文和认往山东的张蔚泽，因与陈文海为争夺教权发生矛盾，张蔚泽出教，郭建文另立灯花教。只好改由邓仕良、詹乾元等去浙江，徐惠先到山东，柳清泉、林祝官到江南，邓良玉到广西，范臻到江西，谢克畏、徐传贵、文先觉、钟大环等到河南，张克广、彭超凡等到湖南。又决定去贵州传教者，由云南派去，去广东传教者，由广西派去，去福建传教者，由浙江派去，去江苏传教者，由江南派去，去安徽传教者，由江西派去，去直隶传教者，由河南派去，去山西传教者，由山东派去。声言传教事，须互相照应，接济银钱，互相帮助。①

①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教内又设立“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等教职，“以顶航为上等，凡入教之人，由添恩递进”，[1]逐步提升。传徒时，借扶乩假托圣贤仙佛转世，劝人吃斋行善，声称如此便可“获福延年，不遭水火劫难”。信徒要在神像前盟誓，宣称“后若改悔，定遭雷殛”，并由教首或师父传给打坐运气之术。朱中立虽然名义上被拥为“总教主”，而实际教权仍操在李一源、彭超凡等人手中。朱中立本人并没有什么本事和背景，他本来在家乡靠种田和做小生意为生。李一源等见他为人老实，不会同他们争夺教权，而且他姓朱，可以藉此以“复明”相号召，才将他奉为总教主。

李一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带领夏长春、王潜川等人，自湖北返回四川原籍，自任教主，并借教人坐功运气之术，劝人诵经，广招徒众。为了诱人入教，他声言凡入其教者，即系108盘内之人，将来可同赴龙华三会，定获厚富。又恐人不相信，便与王潜川等捏称未末申初之年，将有水火刀兵和瘟疫大劫，届时将有教主成佛，以度世人。若能虔诚入教，并出功课银赴会，受到教主代为忏悔，便可免灾获福。李一源又自制桃木剑一柄，称善降妖魔。又画符篆多张，声称系“云城”寄来的嚂唵二偈，分给王潜川等收执，以便散发给入教徒众佩带，抵御灾难。李一源见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地域辽阔，便将三省教区划为数号。四川分为四号，陕西的西安、汉中各为一号，甘肃为一号，一共七号。他本人在四川南部各县传徒，派夏长春、毛智源等赴甘肃传徒，将经卷《斗牛宫普度规条》、《灵犀玉玑璇经》各一本，交给二人收执诵习。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夏长春、毛智源从南山僻路行抵兰州省城，住于城外空庙中，以行医为掩护，暗中传徒，先后收谈芝怔、陈正伦、赵洪顺等人为徒。李一源本人在四川南部县收萧刚、邓三谟等为徒。又分派萧刚赴陕西西安、邓三谟赴汉中传徒，并把《斗牛宫普度规条》、《偈诗宝光宝录》、《金丹口诀》等经卷，交给他们带往各地，用以传徒。邓三谟又令其徒黄三由陕西汉中，前往甘肃，带给夏长春银信及符篆50张，称为嚂唵二偈，分给信徒佩带。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夏长春因甘肃省城兰州稽查严密，难以传徒，欲令毛智源、陈礼等分别前往宁夏之凉州传徒。毛智源等尚未及起程，便与夏长春等被捕，不久，萧刚等也在西安被捕。[2] 据四川总督宝兴奏称：“据简州、南充等州县先后访获教匪彭汝昌等六名，讯系素习青

①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初六日。

② 庄吉发:《清代青莲教的发展》，载台湾《大陆杂志》，1985年第5期。

莲教。内郑子青一名，系杨守一案内逸犯，曾经陕省拿获发遣，嗣因平定西口外逆回防堵出力释会，仍复习教。并据供有籍隶南部县教犯李一源，辗转传徒，遣令分赴湖北、陕西、甘肃各省传教。"①李星沅奏拿获萧刚一名，起出经卷、歌诀20本，符箓101张，金丹口诀98张，供奉"无生老母"。萧刚系四川仁寿县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在南部县拜李一源为师，学习龙华会，又名青莲教。同年十一月，李一源传给他符箓，并令他赴陕西传徒敛钱。萧刚在收宋会为徒后，与之一同赴陕，旋在西安收萧德尚、邓红顺为徒。其后，李一源又令教内之谢泳县、康太生、周导亨等，赴陕西传徒；令张利贞、邓三谟等，赴陕南汉中传徒；令夏长春等赴甘肃传徒。萧刚、张利贞等刚到陕西，即被拿获。② 据萧刚等供，李一源"素习青莲教"，以达摩为初祖，供奉无生老母，自号"五行十地佛"，教给弟子坐功运气之术。并称今年四月将来收圆普度，同赴龙华三会。又供称："徐继阑(南)为内盘，杨守一为外盘。"并且"假称兵火，妄托鬼神，以劫难之危词，遂煽诱之私计。"③道光二十四年(1844)六月，谢克畏与湖南人文先觉、钟大环等来到河南省城开封，以算命为掩护，暗中传教收徒，曾传当地开算命馆的湖南人任秋阳为徒。后因当地查禁甚严，恐致败露，便与文先觉等先后赴温县、洛阳等地，令任秋阳、钟大环等赴直隶传徒。赴云南传徒者是林祝官之徒夏继春与孙可功。夏继春原名夏连祚，是云南宜良县"已革给顶生员"，孙可功是云南蒙化厅人。两人在四川贸易时，与林祝官相识。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林祝官写信给他们，促其前往湖北入教。同年四月，二人来到湖北汉阳孟家巷，拜林祝官为师入教。夏继春被赐名"夏致温"，孙可功则得到"顶航"头衔。同年七月，二人返回云南，分头传徒多人。

贵州乃是青莲教的发祥地之一，道光二十五年(1845)初，又有云南人史青在贵州传习青莲教，称为"清真大道"，收贵筑县人李元偆为徒，传给《无生老母经》、《愿忏经》、《开示真经》及运气歌诀等，并给予法堂天恩名号。后来，史青返回云南，李元偆即在贵州继续传习清真大道即青莲教。

在广西传徒者，多为范臻的徒弟。李一源等本来决定，由郭建文即葛依元赴广西传徒，后因郭建文坚持奉周位抡为教主而闹翻，遂决定改由邓良玉即邓

① 《朱批奏折》四川总督宝兴折，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②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李星沅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

③ 《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李星沅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依真前往广西传徒，并且兼管广东教务。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邓良玉与范臻由四川重庆乘船来到湖北荆州，然后顺路到湖南长沙，在静乐庵找到了彭超凡。彭超凡见邓良玉年老多病，恐一人前往广西传徒难以胜任，即派自己的弟子徐万倡、张有林与之同往。徐万倡办事干练，已被列入教内"克"字派，赐名"克驾"。张有林又名邓知礼，乃彭超凡嫡传弟子。彭超凡派令徐万倡、张有林帮助邓良玉办理教务，邓良玉专门管钱。同年八月，邓良玉等一行来到广西桂林，租赁房屋暂住。由张有林在家照料，邓良玉以行医为名，徐万倡以摆摊算命为掩护，秘密传徒。后来，徐万倡等见省城桂林无人肯信，即前往阳朔传徒，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邓良玉、徐万倡等在当地被捕。

派赴江南传徒者是湖南人柳清泉即朱依专。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柳清泉来到江苏仪征，寄居在内弟刘昌荣家中，并收其为徒。后来，因该处入教者甚少，柳清泉便由仪征转往湖南原籍，由所传弟子在该处传徒。

派赴浙江、福建传徒者原系余克明，后因有事从湖北返回江西原籍，陈文海遂改派邓良仕前往，给予桃木剑、朱符、经咒等物，并令余克明之徒詹乾同往浙江。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邓良仕等人来到浙江省城杭州，收王一清为徒。王一清又转收僧人悟通及许海福为徒。同年四月，邓良仕被捕，兵役从其住处搜获《梵王经》、《威德咒》各一本；在许海福处搜获《悟性穷源》、《慈航性理》、《性命圭旨》、《刘香宝卷》等。①

赴山东传徒者，是徐惠先即徐致俭。徐惠先是四川仁寿县人，道光五年拜杨守一之徒石如松为师入教。道光八年(1828)破案被捕，发遣"回城"充军，后在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战役中出力，免罪释回。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在湖北汉阳洗马池被派为"内五行"，改名为徐致俭。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山东兖州传徒时被捕。②

周位抡在受到李一源等人的排斥、打击后，便以"金丹道"的名目继续传徒。当他闻知林祝官之徒夏继春、孙可功等返回云南传徒时，便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令教内之潭致富、周灿、刘隆恩等来到云南，寻找夏继春、孙可功"争教"，互相攻击。周位抡自称金丹道可以"延寿修真"，指责青莲教诵咒扶鸾乃"邪魔外道"。青莲教则自称入其教者可以"消灾获福"，指斥金丹道坐功运

① 庄吉发：《清代青莲教的发展》，载台湾《大陆杂志》，1985年第5期。

② [日]浅井纪：《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结社研究》，日本研文出版社，1990年，第409页。

气为虚妄空谈。为了躲避陈文海等人的迫害，周位抡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由湖北来到陕西汉中，与其兄周位猷、侄周荣正相遇，向其兄、侄告知，恐陈文海等人加害，现已改名为张利贞，如今正在各处躲避。嘱令其兄、侄亦改变名字，以防陈文海等加害。周荣正改名为“张清江”，周位猷将周字拆开，改名为“固上一”。

后来，这支青莲教即金丹道又与添弟会(天地会)发生了密切关系。周位抡在传习金丹道的同时，又自称“奉的添弟会”，并所制杏黄旗上书写“饬令万云龙”字样。[1] 到周位抡弟子刘振麟时，金丹道更与添弟会进一步融合。青莲教内非主流派中的郭建文一支，则逐渐发展为灯花教。

四、道光年间青莲教的造反活动

道光十六年(1836)，在湖南、广西边境地区，爆发了蓝沅旷即蓝正樽领导的青莲教起义。蓝沅旷是程孔固的再传弟子。道光十五年(1835)，青莲教首程孔固在湖南收新宁人雷昌和为徒，雷昌和又收该县麻林岗瑶族生员蓝沅旷为徒。蓝沅旷“素性狂悖，妄思倡乱”。入教后，萌发造反思想。为了组织信徒造反，他“假托初生时，伊母梦见玉玺悬天，伊妻梦见双龙将来，富贵无比”。[2] 道光十五年六月，蓝沅旷与该县圳源峒内九陇庵僧人张和尚即张永禄及素好的陈仲潮结拜弟兄，并商令各人分头纠人，“许俟事成后同享荣华”。张和尚等应允，分头邀得新化还俗僧人罗清才等共九人，在九陇庵内，共同商议造反之事。因闻知武岗州人程孔固“传习青莲教，劝人吃斋，人多信服，冀借习教为名，多得伙党助逆”。蓝沅旷、陈仲潮遂拜程孔固之徒、新宁人雷昌和为师，张和尚亦拜雷昌和之徒萧再发为师，一同习教，“以冀互相勾结”。同年八月，蓝沅旷又令陈仲潮等制造黄布令旗多面，作为招引徒众之用。约定“每旗一面，议招一百壮丁，每招一丁，给钱一千文，俟多集伙党，制齐枪炮器械，再行起事”。蓝沅旷又编成“逆书”三十条，称为《王政本子》，“假托仁义之言，诋毁时事”。并给其祖先和妻子加了“封号”。原定于十二月间起事，旋因所招人数太少，未敢举动。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蓝沅旷又令罗清才等加紧四处邀人，并赴武岗约会与他素好的

①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卷八。

②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纳尔经额折，道光十六年四月初十日。

已革兵丁王连三，嘱他转纠旧时同营兵丁，“备办粮草”，并于起义军攻城时，“施放空枪空箭”。又与同教之孙老大，约会城内观音庵的僧绍宗、僧能兴等，探听各衙门消息，暗做内应。王连兴以此事关系重大，未敢“谋及多人”，仅同交情较密切的兵丁孔光照、王登寿等四人，密谋其事。未料孔光照等皆称，“我等在营食粮，素知守法，岂肯帮人谋反?”即欲首告。王连三则威胁说：“如要到官，定即扳为同谋。”孔光照等害怕受到连累，只得隐忍，未敢出首。王连三见事已办妥，便致信罗才清，称城破之后，他仅参与“引路打劫富户粮草，余事不能多管”。同年二月初，蓝沅旷见九陇庵及新宁所属之安心观、武岗州所属之蔡家塘等处，已召集了约千余人，决定先攻打武岗，待得有人马粮草，再攻宝庆府等处。并且写就登极“伪诏”，建立“刚健年号”。又书写“逆启”，令人持往武岗州城，“晓谕让城免害”。又于当天“设法祭旗”，众人共尊蓝沅旷为主，蓝沅旷则封张和尚为“大军师”，罗才清为“大元帅”，陈仲潮为敬贤司，陈仲德为督工司，陈汶拔为敬良司，余方盖、吴大干等为带兵头目。蓝沅旷向众人许诺，事成之后，再另行“加封官职”。

二月初六日凌晨，蓝沅旷带领起义军分三路前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使起义队伍又增加了数百人。傍晚，队伍来到武岗城下，但原来约定内应之人，已于初三日被官府捕获，供出蓝沅旷将于二月初六日攻城。故使城内官兵预先做了准备，当蓝沅旷率起义军到达时，便以炮火猛烈轰击，起义军本来就是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一听炮火声音，立即逃散，起义遂告失败。①

晚清时期，青莲教不断举行造反活动，而且分裂为归根道、普度道、同善社、一贯道等，在民国年间产生过重要的社会影响。

---

①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纳尔经额折，道光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会党篇

順天大盟主林
軍令仰將軍
札得立即督率本部下人馬日
夜謹防嚴守海口要隘毋得怠
玩致干軍令未便凛須又遵

第一章　顺治、康熙年间的异姓结拜组织

一、顺治年间以互助、抗暴为宗旨的异姓结拜组织

清初顺治年间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秘密会党，仅有一些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其活动比较零散。异姓结拜弟兄这种形式，在我国由来已久，元明以来，尤为盛行。当时出现的章回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结拜弟兄的故事，正反映了社会上结拜异姓弟兄活动的盛行。入清以后，仍然有人结拜异姓弟兄。最初，这类组织尚无政治内容，仅属一般互助性团体。清朝当局虽然也加以禁止，不过最初对违犯者也未加严惩，据《大清会典》记载："国初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①各地官员们也很少把这类事情作为政治案件来处理，故保存下来的资料也比较少。我们只能从有关禁止结盟拜会的法令中，推断当时异姓结拜弟兄的存在，对其具体活动则所知甚少。

随着清廷推行对汉族人民施行民族高压政策而导致满汉矛盾的加剧，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形式，往往成了汉族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逐渐带有政治色彩。顺治五年三月初十日，江苏如皋县内草观音堂，聚集有二百余人，结拜弟兄。参加者手执器械，会场上竖立大黄旗两面，上面书有"大明中兴"四字。由李新国、李光国、周善国三家，备饭六甑，酒六坛，猪一口，抬至草观音堂犒赏众人。四月二十二日，又有五百余人在杜家观音堂聚会，亦竖立"大明中兴"黄旗。并且举行结拜仪式，由杜芳洲、杜仓州备置猪羊香案。持香者乃身长大汉，口内祝赞。向同伴问曰："此系何官？"则答曰："此系明朝中兴王都督。"内有第二人，也是大汉，与众人对天盟誓。众人皆称为首之王锡周为"王道爷"。歃血盟誓之后，各家备饭十余甑犒劳会众。②

---

①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奸徒结盟"。

② 《揭帖》，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陈之龙，顺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顺治十三年(1656),又有明宗室朱存梧等人纠人结拜弟兄。朱存梧曾于顺治六年由陕西潜至贵州,投向南明永历帝,说要“中兴”明室,领受过龙边票一张,无边札四张,空头札二张。顺治八年(1651),又来至湖北郧阳府,住在房县南明韩王处。顺治十二年(1655),借“访贤”为名,在河南等处布散札付,“架言中兴,招摇惑众”,与韩标、张玉、吴成、李进辉等人“结拜弟兄”,立誓“有官同做,有马同骑”。[①]

清廷鉴于许多反清人士,甚至有明代宗室后裔也利用结拜弟兄等方式,从事反对清政权的活动,因而从法律上又加重了对参与结拜弟兄活动者的惩处。顺治十八年(1661)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②]这条律例的颁布,表明清朝当局已对异姓人结拜弟兄事件的性质看得更为严重,把结拜弟兄完全视同参加反对清政权的叛乱活动,因而对违犯者从以前鞭一百改为处死。纵观清初顺治到康熙前半期的秘密会党,尚处于萧条状态。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小农经济的恢复,秘密会党的活动也逐渐活跃。

二、康熙前半期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异姓结拜组织

康熙年间秘密会党仍处于异姓结拜弟兄组织的阶段。以往有人从清初满汉民族斗争的角度研究秘密会党,提出康熙初年,大规模武装抗清斗争先后失败,抗清志士们便转入地下,在群众中组织秘密结社,暗中进行抗清活动,于是出现了天地会(洪门)与哥老会(汉留)。甚至有人把郑成功尊为洪门与汉留的创始人,似乎这一时期秘密会党已发展到了高潮。其实,这些说法皆出于主观猜测。因为在整个康熙前半期,无论官书、档案还是私家著述中,皆找不到秘密会党的踪迹,甚至有关异姓结拜弟兄方面的材料也甚为罕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如果实事求是地考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就不难找出它的原因了。

当时各地抗清武装已先后失败,南明几个小朝廷也已相继覆亡。随着全国政治上统一的完成,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已安定。饱经战乱

---

① 《题本》,刑部等衙门尚书图海等题,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下),第208—213页。

②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九四。

之苦的广大人民，深深感到和平与安定的可贵，下层群众虽然仍存在着种种痛苦与不满，比之明末以至顺治年间也已大为减轻。加上当时清政权已经巩固，国力强盛，一些反清志士武力推翻清政权的希望已成泡影。因此以“反清复明”或其他政治口号相号召，组织秘密团体，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当时人心思定而非思乱，所以在当时不仅不存在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就连带有政治色彩的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也很少见。当时在民间的一些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其活动多限于互济互助，很少遭到官府的镇压，更未形成大案，所以官书、档案以至私家著作中绝少提及。法律上，顺治朝仅颁布了禁止结拜异姓弟兄的条例，在顺治三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中，尚无惩处异姓结拜弟兄之专条。

康熙初年，清政权仍然面临着广大汉族人民的武装反抗，因而继续推行严禁结拜弟兄的法令。康熙三年刑部题准新例：“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杖一百。查此款律内未载，今酌议得，凡异姓人结拜弟兄杖一百，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余各杖一百，相应入律。”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奉旨：“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著即正法。”[①]康熙七年对结拜异姓弟兄者的惩处稍微减轻：“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应正法者，改为秋后处决。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仍照例鞭一百。”[②]康熙八年，刑部新颁律例：“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旋奉旨改为：“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著即正法。查此款因歃血盟誓结拜弟兄为非，所定相应，仍留此例遵行。其立决改为监候，秋后处决。如无歃血焚表盟誓，止结拜弟兄者，照依原定，鞭责一百可也。奉旨：依议。”[③]

康熙十年题准：“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④]康熙十二年将该条修订为：“凡异姓人

---

① 康熙八年题定《新颁律例》卷一，康熙三年新例。转引自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

②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奸徒结盟”。

③ 康熙八年题定《新颁律例》卷二，康熙八年新例，转引自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第182页。

④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奸徒结盟”；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七十九。

结拜弟兄,未曾歃血焚表者,为首杖一百,为从杖八十。"对"歃血焚表"者,仍"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1] 从康熙十年起,清廷在法律上已经把异姓结拜弟兄的行为,定性为政治性事件,照"谋叛未行"定罪。

康熙十八年,康熙帝特谕刑部将定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以便将律例划一。[2] 刑部尊旨编纂《现行则例》于康熙十九年刊刻。其中也包括对异姓人结拜弟兄活动的惩处。康熙二十八年应广西道监察史盛符升之奏请,将《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例》。[3] 有关惩处异姓人结拜弟兄活动的内容,成为《大清律》的重要内容之一。终康熙一朝,大体按照上述律例查处有关异姓结拜弟兄之案件。尽管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鉴于当地结拜之风甚盛,危害闾阎,奏请对结拜弟兄者"立置重典,邻右不举,连坐治罪",[4]但清廷并未对有关律例再做修改。

三、康熙后半期异姓结拜组织的反抗活动

康熙中叶以降,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逐渐增多,但多是武装起义之前奏,尚非秘密会党。

康熙三十五年,吴球在台湾诸罗(今嘉义)聚众结盟。吴球是台湾新港东四尾人,"好拳勇",精于武功,常与草泽豪杰相往来。"素有志,与草泽豪杰图举大事而未发。"他同一名叫朱佑龙的人相熟悉,朱佑龙假称明室后裔,"国变后居村落,与球素往来"。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吴球在家中设盂兰盆会演戏,参加者十余人,恰好其妹夫陈枢来访。陈枢系台湾凤山(今高雄)县粮吏,因侵吞官谷,恐事发获罪,前来吴球处借贷以弥补亏空。吴球劝他说,此事不足虑,可同他"共谋大事"。当晚吴球设宴款待众人,席间"众欢呼狂饮",且"有言官吏暴状者,皆叹息"。吴球对众人说:"吾辈久遭残暴,全台愤怨。今若举大事,推佑龙为

---

①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奸徒结盟"。

② 雍正朝《大清律例集解附例》,卷首。

③ 《清史稿》志,一百十七,刑法志(一)。

④ 姚启圣:《忧畏轩文告》,康熙十九年七月初二日。

首，以复明之旨，号召四方，则我台同志必有助我者。”众人遂“举杯为誓，约期起兵”。[①] 这是康熙后半期第一起利用结拜弟兄方式图谋造反的事件。

康熙四十年，台湾诸罗县又有刘却等人“歃血为盟”，众推刘却为“大哥”。刘却“精技击，以武力雄一方，四方无赖群附之，歃血为盟，集健儿数百”。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刘却“遍召其党，扬旗击鼓，攻下茄冬营”。十二日，官兵大集，战于急水溪。刘却兵败入山，其众亦各散去。[②]

康熙四十六年，浙江嵊县张念一即张君玉、张念二即张君锡弟兄，与施尔远等共十七人，在该县半山庵结拜弟兄。以“朱三太子”之名相号召，举兵反清。旋被清军赶逐，逃至四明山之大岚山，继续抵抗。事败，张念一、张念二等十五人逃至苏州被捕[③]。同年十一月，又有一念和尚在江苏太仓纠人结会，“给札惑众”，于是月二十六日在太仓率众起义。众人“头裹红巾，竖旗聚众”，抢劫开典当之生员陆姓，并且声言欲入州城，抢夺仓库。[④] 以往有人把张念一与一念和尚混为一人，其实，二者并无关系。张念一是浙江嵊县人，姓张；一念和尚是江苏太仓人，俗姓蔡。[⑤]

康熙六十一年，台湾凤山又有朱一贵等歃血结盟并举兵反清。

朱一贵是福建长泰人，渡台后先至台湾道衙署，欲充任差役，未被录用，即在凤山县大目丁地方种地度日(一说以饲鸭为生)。康熙六十一年春，凤山县县令出缺，由台湾府知府王珍之子摄理县事。其子赴县后，为官贪婪，于征收粮税时，“每石要折银七钱二分”，使“百姓含怨”。其后，凤山一带海水泛滥，百姓合伙唱戏酬神，祈求保佑。王珍之子又以凤山一带百姓“无故拜把”为由，逮捕了数十人，并捕获违禁入山砍竹者百余人。最后“给钱的放了，不给钱的责四十板”。王珍之子在凤山“勒索骚扰”激起众怒。是年三月，同县之李勇、黄殿、吴外、郑定瑞等来到朱一贵家，谈及地方官吏种种骚扰百姓之事，导致众心离异。对他说：“如欲举事，正当其时。”朱一贵说：“我既姓朱，声扬我是明朝后代，顺我者必众。”四月十九日，朱一贵与李勇、吴外、郑定瑞、王玉金、陈印等五十二人，

---

①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列传，商务印书馆，1983 年。

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列传。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朱批奏折》，第 1 册，曹寅折，中华书局，1984 年，第 911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朱批奏折》，第 1 册，中华书局，1984 年，第379 页。

⑤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下)，第 869—883 页。

齐至黄殿庄内结拜，众推朱一贵为首，"焚香结盟"。其后又各自纠人，共有数百之众。四月二十日，正式在凤山竖旗起义。旗上书写"大元帅朱"，朱一贵率众攻打凤山附近之冈山，并袭击清军营汛。消息传至台湾府城，总兵欧阳凯派遣游击周应龙带领兵丁四百余人前往镇压。台湾兵备道与台湾府知府又派遣县丞冯健，并调新港等处"番众"前往协助。百姓遭到清军之杀掠骚扰，纷纷投向朱一贵，数日之内，朱一贵的队伍已扩至二万余人。各地不满清朝统治的人，也纷纷起而响应。南路之杜君英，在南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之客民佣工，攻抢台湾府库。郭正、翁义在草潭，戴穆、江国论于下埤头，林曹、林骞等于新园，王忠于小琉球等地，"皆愿从君英攻府，约朱一贵共事"。这样，各地起义者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统治者。四月二十五日，朱一贵、杜君英于赤山大败清军，清游击周应龙败归府城。府城之文武将弁闻清军在赤山大败，纷纷将家眷送往鹿耳门，欲逃回大陆。当时，台湾镇总兵欧阳凯、游击刘得柴率兵千余，台湾协水师副将许云率兵五百，于府城附近"列阵以待"，以镇守府城。朱一贵派人于夜间对守城清军进行骚扰，使清军士气低落，"人无战心"。四月三十日到五月初一日，朱一贵、杜君英等率领万余人攻打府城。清军把总杨泰约为内应，并将清军总兵欧阳凯刺杀，清军大乱，将弁多被击杀。水师游击张颜贤、陆路游击王鼎、守备万奏平等率千余兵丁，乘战船逃往澎湖，游击周应龙逃归内地。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见清军大败，亦逃往澎湖，起义军遂占据了台湾府城。

起义军进入府城后，朱一贵住进台厦道衙署，杜君英住总兵衙门内。大家"同开府库，分掠金银"，得到大批兵器火药。朱一贵遂在台湾建立政权，国号"大明"，年号永和。他自称"义王"，封王君彩、洪镇为太师，王玉金为国师，杜君英、陈福寿、李勇、吴外、翁飞虎、陈印、戴穆、郑定瑞、黄殿、江国论等为国公。其余首领，皆封有侯、将军、都督、总兵、副将等官职。朱一贵下令改着明朝衣冠，因一时难以齐备，只得"或戴幞头，衣小袖，纱帽金冠，被甲骑牛，或以色绫裹其首，方巾朝服，炫黄于道"。因而民间有歌谣说当时："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

在起义军攻占府城后，驻台清军已全部撤离，台湾全岛都已在起义军控制之下，但这时起义队伍内部又开始了权力之争。最初，杜君英打算立其子杜三为王，后因众人不服而拥戴朱一贵为王。但杜君英"每事骄骞"，并"掠妇女七人闭营中"。朱一贵为了维护军纪，下令"禁淫掠"，并派人质问杜君英。杜君英不

仅不肯改悔，反而将朱一贵派去之人捆缚。朱一贵无奈，便同李勇、郭国正等率兵围攻杜君英。杜君英战败，率粤籍起义者数万出走，起义军实力因而被削弱。

清闽浙总督满保闻全台均为朱一贵所据，遂令提督施仕骠进军台湾。又调南澳总兵蓝廷珍星夜赶赴厦门，面商攻台事宜。五月二十七日，满保令蓝廷珍率将弁八十余员，兵丁八千名，战船四十号，舵工、水手四千人，自厦门启程，至澎湖同施仕骠会齐。六月二十九日，施仕骠、蓝廷珍率将弁一百二十员，兵丁一万二千人，大小战船六百只，舵工、水手六千人，进兵台湾。首先在鹿耳门登陆，然后径攻安平。起义军不敌，安平很快落入清军手中。其后朱一贵两度派兵反攻，皆大败而归，只得退保府城。清军尾随而至，朱一贵再败，率数万人逃至湾里溪，进而又退至下加冬。闰六月初五日，朱一贵率数千人来至沟尾庄，向富户杨旭索食，杨旭设计将朱一贵擒献清军。当朱一贵被押至施仕骠、蓝廷珍处受审时，他毫无惧色。“一贵尚自尊大，欲与提军抗礼，昂然而立。”当蓝廷珍令朱一贵下跪时，朱一贵不仅不跪，反而“妄称孤寡，词甚不逊”，最后遇害。[①]

上述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因多以“反清复明”相号召，以往多被误认是“天地会”。实际上，当时不但不存在天地会，而且连真正意义的秘密会党也还未发现。从这些异姓结拜弟兄组织的活动来看，也主要是公开武装反抗，而不似后来秘密会党那样主要在民间秘密传布。

① 《上谕档》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抄自康熙年间刑部隆科多等审讯朱一贵时之供词笔录；蓝鼎元：《平台纪略》，“朱一贵之乱”。

第二章　雍正年间的异姓结拜组织及其向秘密会党的转化

一、雍正初年的异姓结拜组织

雍正初年，各地仍存在不少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雍正三年二月，直隶涞水县的吕东阳等人因身居异地，谋生维艰而结拜弟兄。吕东阳又名吕学一，是江西丰城县人。雍正三年二月，在直隶涞水县遇见陕西榆次人陈铨、田开玉，江南淮安人苏镇，山东莱州人唐德，江南贵池人高元等，彼此谈及在异乡谋生之困难与苦恼，孤单无依。陈铨便提议结拜异姓弟兄，众人皆表示同意，于是一同吃血酒，结为弟兄。①

阶级压迫也是促使人们结拜弟兄的原因之一。在福建闽南一带，豪强地主，往往依恃族大丁多，或凭借政治上的靠山、经济上的实力，欺压附近的平民百姓。他们常常借各种微嫌细故，挑起事端，欺压小族小姓。后者为了与之对抗，便用歃血结盟，结拜弟兄的办法，化异姓为同姓，加速了秘密会党的发展。雍正初年，福建巡抚毛文铨奏称："福建一省民风土俗，大率喜争斗，好奢靡。""查争斗常始于大姓，次则游手好闲者。盖闽省大姓最多，类皆千万丁为族，动辄鸣锣列械，胁之以威。而为小姓者，受逼不堪，抑或纠约数姓合而为一。遇其相持之际，虽文武官员率领兵役前往缉拿，亦所不能。"②地方官往往畏惧豪强大族之权势，对于他们挑起的械斗案件，不敢前往处理。雍正五年，福建总督高其倬提到："今查得同安大姓包家与小姓齐家，彼此聚众列械伤杀。署县事、知县程远青往劝，被吓潜回，隐匿不报，该游击亦不行禀报，殊属溺职。"③由于地方官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6辑，署理江西巡抚谢旻折，雍正八年四月廿二日。

② 《雍正朱批谕旨》福建巡抚毛文铨折，雍正四年二月初四日。

③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9辑，福建总督高其倬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畏惧豪强大族，不敢干预，小族小姓为了自卫而结拜弟兄，所以闽南一带结拜异姓弟兄之风气尤盛。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结拜弟兄本来无可非议，但清朝当局担心这类组织发展起来会危及其统治，遂加以禁止："凡异姓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情事，止结拜弟兄，为首者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对于失察结盟拜会事件之地方官员，也订有惩处之专条。规定："凡不逞之徒歃血订盟，转相结连土豪、市棍、衙役、兵丁，彼倡此应，为害良民，据邻佑乡保首告，地方官如不准理，又不缉拿，惟图掩饰，或至蜂起为盗，抄掠横行，将不行准理又不缉拿之地方文武各官，革职从重治罪。其平日失察，首告之后不自隐讳即能擒拿之地方官，免其议处。至乡保邻佑知情不行首告者，亦从重治罪。如旁人确知首告者，该地方官酌量给赏。倘借端妄告者，仍照诬告律治罪。"①

二、异姓结拜组织向秘密会党的转化

雍正年间，闽、粤等省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异姓结拜组织向秘密会党的转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到各地去谋生。人口的激增，又加剧了当地人多田少的矛盾，也促使人们外出谋生。人们来到新的地方，人地生疏，亟需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已难以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出现了人数众多并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组织——秘密会党。

秘密会党在性质与功能方面与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并无本质区别，仍然是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与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了正式的会名。

雍正四年，台湾诸罗（今嘉义）出现了名为"父母会"的秘密会党。是年五月初五日，诸罗县莲花潭，有蔡阴与陈卯等十三人结拜弟兄。雍正六年三月十八日，蔡阴感到结拜弟兄的组织，人少难以行事，又在原来结拜组织基础上，纠得林生、萧养等八人，共计二十人，在萧养家中饮酒结拜，取名"父母会"。众人共推蔡阴为"大哥"，以石意为"尾弟"。不久遭官府破获，蔡阴等人被捕。经审

① 雍正《大清律例集解附例》卷十八，刑律·盗贼，"谋叛"。

讯，因蔡阴等人仅止拜盟，未曾歃血，按照清律中的规定，蔡阴被依结拜弟兄之例，杖责一百。① 同年正月，台湾诸罗茇子林地方又有陈斌、汤完、朱良、陈岳、苏亮、赖妹、朱宝、魏迎、魏祖生等首伙二十三人，结拜"父母会"。相约每人出银一两，于是年正月十三日在汤完家中歃血拜盟，各人均以针刺血，滴酒共饮立誓。相约："如父母老了，彼此帮助"。众人共推汤完为大哥，朱宝为尾弟，蔡祖为尾二。② 汤完等人所结父母会，带有明显的互济互助性质。其宗旨在于父母"老了"或去世时，能够互相帮助，以解决父母的丧葬问题。这种互助性质，吸引了附近的穷苦人民，因而迅速壮大。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汤完生日那天，又约定所有曾经入会者，写立盟书。但因事泄，于三月十八日被官府破获。经审讯，汤完虽系大哥，但因系由陈斌所发起，故于量刑定罪时，陈斌被判为首犯，处以"拟绞监候"，汤完仅作为"为从"者，处以流放。③

我们从高其倬的奏折中得知，在父母会之前还有过铁鞭会，而父母会正是由铁鞭会改名而来。高其倬指出："福建风俗，向日有铁鞭等会，拜把结盟，奸棍相党，生事害人。后因在在严禁，且铁鞭等名骇人耳目，遂改而为父母会，乃其奸巧之处。"④

雍正七年，福建出现了"桃园会"，同年，在台湾出现了"子龙会"。⑤ 雍正八年，福建厦门李彩等人结拜"一钱会"。李彩又名李才，原为清军水师营兵。他以前曾纠人结拜弟兄，因入会者每人出银一两，相约以后遇事，各出银一两相帮，故取名"一钱会"。雍正七年三月，李彩因结伙酗酒，被"枷责革粮"，发回县里安插。当时，同会之人为了帮助李彩能够"买补营粮"，继续当兵，便依照会内约定，每人出银一两。雍正八年九月，李彩回至厦门，又在同会李环机家中饮酒滋事，被辕门总统官颜汉锁拿，押解回原籍。颜汉绰号"白虎汉"，原为厦门地方有名的"闯棍"，曾受到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的枷责，后被提督许良彬所收留使用，充任辕门总统官。李彩被颜汉锁拿，心中不服，欲行报复。遂纠约会内三十余人，定于十月十五日在厦门鼓浪屿地方会齐，拟先抢当铺，然后抢夺海防衙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1 辑，福建总督高其倬折，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1 辑，福建总督高其倬折，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

③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0 辑，福建巡抚调云南巡抚常赉折，雍正六年八月初四日。

④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1 辑，福建总督高其倬折，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

⑤ 庄吉发：《从清代律例的修订看秘密会党的起源及其发展》，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18 期。

门。后来事败，李彩等被捕。①

雍正九年，广东潮州府饶平县余猊等人结拜“父母会”，其宗旨也是为了同官府相对抗。余猊即余道举，系广东饶平县“已革武举”。他平日“好为结纳，浪博仗义之名，以致未经谋面之人，皆肯为其出力”。② 从这段短短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余猊是一位行侠仗义之人，颇具好名声，由他出面纠人结会，自然有较大的号召力。一次，他因窝藏偷牛之人，被潮州府“详革枷责”。余猊对此怀恨在心，欲纠人结盟拜会，以便打闹官府，并趁势抢劫潮州府东门一带之铺户，借此制造事端，同知府为难，以报知府对他枷责之仇。雍正九年八月十五日，余猊来到与广东饶平相邻的福建省诏安县下葛圩黄五舍家中，具体商议报仇之事，请求黄五舍代为纠人相帮。黄五舍当即应允，答应为他招纳一二百人。但黄五舍旋即为官府逮捕，他在被捕前，曾嘱令其侄黄乌皮说：“如余猊来要人，你们可以约些人去。”③并令诏安县之黄加皮、黄亦宛、黄全招等前赴饶平，帮助余猊打闹官府。约定凡去参加打闹之人，每人先给一部分钱作为路费，等到达潮州之后，再由余猊付给每人银五钱。各人抢得的东西，俱由本人自行拿回处理。④ 余猊本人也在饶平县纠得陈阿兰、陈阿幼等二十余人，于九月初二日在海阳县属之归仁都横溪乡一同“歃血结盟”，取名“父母会”，众人共推余猊为大哥。结会之后，余猊便令陈阿力等人分别前往海阳、揭阳、饶平等地去散帖，纠众结盟，约定九月二十日在潮州府城南门外教场，聚齐举事。又派同会之人，在揭阳县所属之河婆六约地方“布散谣言”，声称先年曾有海丰县守备李光，被该约居民所害，如今其孙请兵前来报仇，欲行剿洗。这一说法一经传开，使得当地居民发生骚动，⑤引起了官府的关注，遂派遣兵役将余猊等十三人拿获。⑥ 雍正十年四月初七日，陈奇和等人在罗谓玉家中商议迎救余猊之事，拟于余猊押解回县时，在途中劫持。后来因各处查拿甚紧，难于下手，只得准备先下海再作商议。不久，陈奇和等被捕，迎救余猊一事，遂告失败。

---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7辑，福建海关监督准泰折，雍正九年二月廿二日。

② 《雍正朱批谕旨》广东总督鄂弥达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③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9辑，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折，雍正十年二月廿八日。

④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9辑，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折，雍正十年二月廿八日。

⑤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9辑，广东提督张溥折，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⑥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广东巡抚杨永斌折，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雍正朱批谕旨》广东总督鄂弥达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雍正年间有些结会树党活动,已具有政治斗争的色彩。

雍正七年十一月,四川忠州府垫江县新场地方,有杨成勋等人结盟拜会。①雍正七年八月十一日,垫江人黄四、赵汝海等在王可久指使下,纠集杨大铭等人到该县董家大湾山上,声称由赵汝海出银,让大家一同去渠县购买棉花。同行者还有垫江县何大、何二、何四等共十九人,来至酆都县白石丫王可久家中。王家已有湖广人陈姓、李姓等四十余人。八月十三日,王可久在家中置备了血酒,让众人同饮,立誓结拜弟兄。其誓言中有"请神归正事,孤丁无术,末劫催来,众人不许抽车拽炮"等语。其含义颇为费解。誓毕,王可久对大家宣称:忠州府杨爱咀地方出了杨家将,为首的叫杨成勋,家中藏有"金镶玉印"及《刘伯温碑记》。又说:杨成勋的第七个兄弟"必将成王",如今被捕,押送到酉阳州去了,要求大家齐心帮助。声称已招有一百多人,为首者是杨成勋、陈文彬、杜炳凡、王可久等四人。令每人先出银一两,制造纸符。王可久又写了"包约",其内容有:"立包约人王可久。今有天星出现,神圣相扶,靠众福佑。今会合各位弟兄,人众相扶,万事平安,无有虚言。若有见怪,王宅一应万事包管,并无虚言误事。立包约为照。雍正七年八月十三日立约。"王可久又抄录了《刘伯温碑记》,发给众人。其文曰:"黄河水,清三日,清四十里,崩出刘伯温碑记来。三三见九是一年,清风明月撞中之。十年之事不必问,只有清风那一年。乾坤乃无皆以定,过后黎民仔细查。菊花雪尽茶花开,血冉成河骨山推。兔儿拦面冰冰冷,龙蛇相斗血辛辛。劝君莫待春光好,禄马群羊好共生。只在猴子相交首,鸡鸣犬吠去相寻。猪鼠三年来仃胖,过后黎民得安康。刘伯温碑记。"②明清之际的许多政治性预言,皆假托"刘伯温碑记",四川忠州垫江县杨成勋等结盟拜会,并假称杨家第七子将要成王,借以号召群众,已带有反对清廷的政治内容。而所假托的《刘伯温碑记》中最后两句"猪鼠三年来仃胖,过后黎民得安康",也带有政治预言性质。猪年指雍正九年,该年为辛亥年,亥为猪年。鼠年指雍正十年即壬子年,子年为鼠年。这两句的寓意指杨家造反成功,待雍正九、十年过后,黎民百姓便可以得到安康,过上太平日子了。王可久、杨成勋纠众欲行造反一事,很快便被官府所访闻,派遣兵丁前往缉捕。陈万一、杨成勋等将前来捕人之兵丁捆

① 《雍正朱批谕旨》广东总督鄂弥达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署理陕西总督查郎阿折,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四日;《雍正朱批谕旨》四川总督黄廷桂折,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拿。后来,忠州府当局又派遣大量兵丁前来擒拿,杨成勋见事已败露,遂至屋后自缢身亡。①

雍正七年河南固始县武生周图廉约人拜把约会,也带有反抗清政权的政治倾向。雍正七年十二月,浙江总督李卫拿获"谋为不轨"的甘凤池,供出周图廉"门下党羽甚多",并且是秘密组织"小车会"的首领。小车会的成员都是"推盘子车"即二把手小推车之人。周图廉早在康熙五十八年便开始在方家集"设桌收钱",后来又与范廷侯等八人一同结拜弟兄。他对小车会会众们说:"我们虽然穷苦,中了还有出头日子。""中了"是河南方言,意指事成之后,大家便可以有"出头之日",过上富裕生活。因此,会内之人皆称他"素有大志"。他同甘凤池交往,目的就在于参加反清活动。雍正七年九月,他曾亲自去会见甘凤池。甘凤池被捕后,将周图廉供出,致使小车会也遭到破获。②

雍正十年二月,台湾凤山县(今高雄)吴福生等人结盟拜会,更进而提出"复明"等政治性口号。吴福生又名吴佛,原籍福建平和县,迁居台湾凤山县浊水溪大庄,家中有田两甲(每甲约合内地十一亩多),草房三间。平日同附近的吴慎、林好等相互来往。雍正九年,因该地练总向上级禀报吴福生"结交匪类"而受到迫害。恰好当时有素好之林好来到他家,吴福生为了对官府进行报复,便怂恿林好说:北路"番子作歹"(指台湾北路少数民族反抗清政府统治),官兵俱往北路,台湾府城守兵稀少,可以趁机起事。林好应允,并约杨秦、许筹等人,于同年二月十八日在吴福生家中"刺血拜盟",结拜弟兄。众人推吴福生为大哥,林好为二哥,吴慎为三哥,杨秦为四哥,许筹为五哥。同时议定举行反清起义,由吴福生任元帅,陈倡(一作谢倡)为军师,洪旭为副军师,杨秦为副将军,许筹、吴慎、林好为国公,并制造黄、青、白三色三角布旗及札付,上写"大明招讨左将军"。二月十九日夜,吴福生率众攻烧冈山汛清营。吴福生把队伍分成五支,自率一支,持有"长泰布"做成的三角旗,上书"大明"二字。二月三十日清晨,又焚烧旧社汛,中午,又烧猴洞地方。三月初一日,再烧石井汛,夺得清军许多兵器。初二日夜间,吴福生又与林好去会乌眼容,并于初三日早晨率领三四百人,抢夺布店,后驻扎在凤弹山顶。初五日又去埤头打仗,结果为清军所败。初八日早晨,吴福生一支队伍只剩下四十余人,回到浊水溪,然后往内山逃走。最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署理陕西总督查郎阿折,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② 《雍正朱批谕旨》河东总督田文镜折,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

后，吴福生只身由山边前往北路加冬张壮家，张壮让他改名蔡受。后来在斗六门地方张裕家中以锄草为生，旋被官府访闻拿获。[①]

雍正十年四川酉阳司兔园地方秦启柱等人纠众“违禁结盟”，也带有反抗清政权的政治内容。雍正五年三月初五日，湖广茶陵县人杨应明来到秦启柱家，称他兄弟在云南口外孙碧岭扶助姓朱的为“真主”，差他送文书一角，札付五张，交与秦启柱。在秦启柱处住了七八天之后，便称回湖广“招兵”去了。秦启柱便与同县的姚世臣等人“违禁结盟”，并“妖言惑众”，散布札付，其内容为：“钦命大镇将军秦，为委任以复中原事。戴奉圣君简命，敕行札委。凡天下草泽之间，有素怀忠义豪杰志士，文武韬钤，才干善射者，共有同心可效，一律擢用领札。率众归降，尽忠竭力，恢复天下，底定开疆，加职加爵，立功升级，为此具札。须至札者。丙午年十二月初三日。”在札付上盖有篆文方印，周围刻有龙纹。札上写有“天命镇国将军札”字样。[②]

有些秘密会党，其结会宗旨则为了依恃人多势众，抢劫殷实人家之财物。雍正六年，山西泽州与河南济远县交界一带地方，以翟斌如为首的秘密会党，便是为了抢夺本地乡绅家的财产。翟斌如是河南济远县人，他“素性奸邪，结交匪类”。又“素知医卜，兼习道教”。[③] 平日借堪舆谈星命，“妄号神仙”，当地群众皆称他为“翟神仙”。康熙六十年七月，翟斌如闻说陕西郃阳县有一潘道人，年逾百岁，能知过去未来，便亲往陕西访寻。在途经山西绛州时，恰好潘道人也在该地，翟斌如便亲往拜潘道人为师，取名“道静”，旋即归家。康熙六十一年二月，翟斌如再次来到陕西郃阳，拜见潘道人，一直住到当年九月才回河南济远。回家之后，翟斌如“忽生妄念”，借潘道人之名声“欲图大事”，又恐怕无人肯信。因忆及曾有谣传，说陕西有个李开花，又名李九桃，遂捏称潘道人欲在陕西辅佐李开花举事，而由他本人在外纠人接应。翟斌如又以其亲属周三曾于康熙六十一年正月拜见过潘道人，便同周三等人陆续纠约到李谓南、翟明远、杨延先等九人。雍正二年，潘道人屡次受到抚远大将年羹尧传唤，皆抗命拒往。年羹尧怒其妄自尊大，下令将潘道人逮捕，由威宁县知县严士俊加以审讯。审问中潘道

① 《吴福生供词》，载《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第33—35页；《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9辑，觉罗柏修等折，雍正十年闰五月初十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黄廷桂折，雍正十年八月十四日。

③ 《雍正朱批谕旨》第20册，山东按察使蒋蹬折，第62页。

人出言不逊，结果被当场杖毙。同年九月，翟斌如闻知潘道人已死，感到如仍称潘道人辅佐李开化相号召，恐难以有人响应。又看到所纠之人群龙无首，难以成事，遂与周三、李谓南等人用焚表拈阄的办法，决定首领人选。结果翟斌如拈着而被推为首领。其后，翟斌如又用散布黄符的办法，纠人入伙。规定每一大符需纠约十人，中符需纠约五人，小符需纠约一人。不久，翟斌如又听说山西长子县有个张冉公即张进斗[①]素习白莲教（无为教），教内有刘新泰、李锡侯、申伦、靳广、焦明山、李自仓等二十六人。翟斌如见张冉公教内之人甚多，欲引其入伙，以壮大自己的声势。雍正三年九月，他捏名卖卜，来到山西泽州辘轳井地方。先设法接近并结识了张冉公教内之焦明山，又在李自仓家中见到了张冉公及靳广。这时，翟斌如已有将张冉公拉入自己一伙之心，而张冉公也有将翟斌如招入自己教内之意，二人各有打算，因而“彼此诋毁，各不相能”，两人都未达到自己的目的，翟斌如旋即返回河南济远老家。不过，他并未就此甘心，而希图拉拢张冉公的弟子入伙。

雍正四年三月，翟斌如再次来到山西泽州辘轳井，住在李自仓家中，借替靳广算命的机会，吹嘘靳广八字“大奇大贵”，“不是等闲之人”。又诋毁张冉公所信奉之教乃“一派邪言”。并威吓靳广等人说：“若在他教中，将来必招大祸。”后来，恰好又有济远县一个名叫段卜年的人，也为靳广算命，称靳广“上应二十八宿之斗木獬”，将来必成大将。靳广闻言，对翟斌如更加信服，便抛弃张冉公，而同翟斌如相交好。雍正四年十一月，靳广来到河南济远县会见了翟斌如，翟斌如把从前见过潘道人并拜其为师，及潘道人要辅佐李开花之事，向靳广等人进行夸耀。对于潘道人已经被年羹尧杖毙一事，则只字不提。又把所书写的黄符多件，交与靳广，让他带到山西各处分散。声称该符可以免瘟疫，避刀兵。大符每件索银五钱，小符每件索银三钱。并对靳广说：“将来西边有事，此符可以保得全家。”还利用靳广盼望升官发财的心理向他许愿说：“将来大事若成，你即可为挂印总兵。”靳广对此深信不疑，便将黄符、印凭、合同等物收受，加入翟斌如一伙之中。雍正五年三月间，翟斌如等见已聚有多人，打算抢夺本地王、卫、陈三家乡绅之财物。但是，王姓乡绅乃是靳广的东家，靳广未允。同年六月，卫姓乡绅卫建勋之养子卫智，因犯盗案被卫家驱逐，对卫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

① 张进斗的弟子后来又发展为收元教与混元教。

便同靳广相勾结,欲借抢夺卫家财物之机泄愤。翟斌如闻知此情,便以谢神为名,散布黄帖纠人,“学习拳棒,夜聚明散”,持械逼人入伙。靳广向众人宣称:长子县的张冉公是“后天正人”,是个斋公。河南的翟神仙和杨将爷(实际上只做过清军千总),时常在大箕村走动。又说:“翟神仙说陕西出了紫微星,河南是天心地胆。河南动了,别处就都动,你们山西就来接应。”①卫智勾结靳广等人欲抢劫卫家一事,被卫建勋探知并上报官府,州县便派遣兵丁衙役前去搜捕。靳广闻讯纠集同伙,于大箕村地方率众拒捕。六月二十八日,焦明山等九十余人被官兵捕获,其事遂败。②

雍正年间还有一些手工业者与运输、搬运工人所结成的秘密会党。雍正六年,苏州砑匠栾晋公与徐乐,纠集众砑匠结盟拜会,约定同年五月初五日放火劫库,然后一同夺船下海。雍正七年九月,栾晋公之侄、砑匠栾尔集纠约砑匠段秀卿等,一共二十二人“拜把结盟”,“祀神饮酒”。③ 雍正十三年,山东高唐州手推车工人结拜“小车会”,称为“盘手”,乃“推车之人所立会名”。④ 入会者每年于寺庙处所聚会几次,每人纳钱数百文,会毕即散。每个盘手皆有暗号,有的在小车上插以雉尾,有的在车上悬挂小铃,有的挂一个小瓷瓶,有的则刻木为傀儡,或结绳穿缀琉璃,或涂染车轮,黄黑各半。用这些暗号作为标记,以便相互识别,使同会之人相望而识,以便彼此结伴而行。小车会一方面为了途中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但也往往恃众斗殴,无人敢管。有时一会多达数百辆小车,拥戴地方上的乡绅作为会首。后来,一些“市井无业之徒”,也加入其中,被发给车辆与资金,因而当地民间传有谚语说:“投了盘手不顾家。”如有会内之人在外生事犯法,被拿到官时,会内之人即以所积之钱,为之“奔走营救”,致使小车会内之人,“相藉肆横,略无忌惮”。⑤

雍正年间安徽的“抬天会”则属搬运工人的组织。严格说来,抬天会并未形成固定组织,而且抬天会的名称,也是外人对他们的称呼。“抬天会”也称“尖刀会”,雍正末年,在安徽凤阳府有一伙搬运工人,常在谢东升的饭铺中吃饭。脚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护理山西巡抚成龄折,雍正八年八月十六日。

② 高其佩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史料旬刊》第九期。

③ 《雍正朱批谕旨》浙江总督李卫折,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④ 《朱批奏折》,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作者不详,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756/1。

⑤ 《朱批奏折》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者不详,756/1。

夫温二乔、李三癞毛等十余人，每逢赚得钱，便来到谢东升的饭铺聚饮，称为“吃攒盘会”，谢东升则以饭铺主人身份充任会首。北炉桥是个水旱码头，有大量客货在此装卸。温二乔等脚夫力气甚大，虽扛抬极重的货物，仍然行走如飞。路旁行人见到后称赞他们“好力量”，温二乔等同伙中有人开玩笑说：“不但抬货，连天也抬得动。”于是，北炉桥一带的人们便把这些经常来酒铺中吃攒盘会的搬运工人，称为“抬天会”。又因他们力量大，做事不让人，说话锋利，而且“倚恃劲力，结党凶横”，人们不敢与他们争斗，又称他们为“尖刀会”。[①] “抬天会”虽然还不能算作正式的秘密会党，只是一种行帮性组织，但从其功能来看，同秘密会党已没有什么不同。

雍正十三年，在安徽颍州霍丘县有高二等人结拜“铁尺会”。高二与王三酒、宋大汉等人，聚集数十人，于当年闰四月二十日在丁届远家“拜盟结会”，并演戏，搭布棚十座，每人各执铁尺一根。高二、王三酒居中，摆列扁担二条，为刑杖。凡会内之人不听指挥者，便以扁担责打。是年五月十二、十三等日，又在菜园内演戏，接着在王三酒家中聚会。因会内之人各执铁尺，故取名铁尺会。[②] 安徽在雍正年间除铁尺会外，还有宿州的探花、大刀二会和寿州的五岳会等。[③]

---

① 江南总督赵弘恩折，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二日，载《史料旬刊》第11期。

② 江南总督赵弘恩折，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期。

③ 江南总督赵弘恩折，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十日，载《史料旬刊》第1期。

第三章　乾隆前半期的秘密会党与清廷的治理对策

一、乾隆前半期的秘密会党

乾隆前半期各地陆续出现一些“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组织，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福建漳浦的子龙会与小刀会

乾隆前半期，秘密会党又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福建（包括台湾）各地尤甚。乾隆初年有官员分析福建秘密会党盛行的原因，认为“福建地方辽阔，滨临大海，山谷深邃，最易藏奸。且生齿稠繁，即年成丰收，尚邻省接济米粮十余万石”。又说：“闽省人心又复犷悍，恃海刁蛮，以歃血谋逆为儿戏，视劫官抢掳为寻常。”①也有人说：福建人民“习尚强悍，以好勇斗狠为能，毋论秀顽，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其初意不过图御外侮，迨聚集日久，结交既广，或恃勇技过人，或逞机谋聚会，肆然无忌，遂刊伪印，散伪札，妄悖猖狂，蛊惑人心。”②其实，福建人民结会拜盟风气之盛行，其原因主要同商品经济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外出谋生有关。许多农民进入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需要借助于秘密会党的力量，既可互济互助，又可自卫抗暴。因此，在乾隆前半期，秘密会党有了较大发展。乾隆元年，福建邵武县出现“关圣会”。③ 乾隆七年，福建漳浦、诏安一带出现了子龙会、小刀会等。是年，漳浦、平和、诏安一带“春末夏初，少雨米昂，民情惶惶”，穷苦人民为了求得生存，纷纷“拜把为匪”，希望凭

---

① 《朱批奏折》广东总兵谭行义折，乾隆七年九月廿日。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一，“兵政”。

③ 庄吉发：《从清代律例的修订看秘密会党的源流及其发展》，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8期。

借集体的力量，抢夺富户米粮来求得生存。子龙、小刀二会，[1]便是其中比较突出者。是年三、四月间，漳浦、云霄一带因雨愆期，小刀会内之人便乘机"传播讹言，惊扰愚民"。漳浦县知县朱以诚派人四处访查，结果拿获云霄（当时属漳浦县）有张姓一人，平和张姓一人，皆系小刀会成员。并在二人家中起出小刀，两面有锋。[2] 其后又陆续发现小刀会成员多人，其中还有兵丁沈秦等四人。漳浦知县朱以诚移文云霄营，要求对沈秦等四名兵丁加以审讯。该营游击陈贤拒绝将该四名兵丁移解县衙，并且为其开脱。知县朱以诚以对沈秦等人加入小刀会一事"指供凿凿"，未便置之不问，但同意对入会兵丁不予惩处。而游击陈贤仍不同意，朱以诚便欲将此事禀报上级处理。小刀会首领、监生蔡怀等人担心此案查明之后，"祸必及己"，遂指使会内赖石于是年六月初三日，持刀潜入县署之内，于公堂上将知县朱以诚刺杀。[3] 同年七月，福建诏安县又有何指等人与该县白叶乡陈作等"聚众拜把"，其"党羽甚多"，会内之人还藏有藤牌等军器。该县官府闻讯便派遣兵丁一百名，民壮五十名前往拘拿。何指、陈作等便在白叶乡"聚集多人"，进行抵抗。是月十九日晚，何指等带领会众前往诏安县城。七月二十日，陈作等又带领潮、诏一带数千人，由新径圩出发，围攻诏安县城。[4]

边钱会

乾隆十二年，福安县出现了以吴和荣为首的边钱会。吴和荣素习拳棒，曾入伍当兵，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吴和荣邀集营兵孙尚文等十一人，在家中写立盟单，割破手指，滴血入酒共饮，取名边钱会。同年，福安县又有何老妹等人结边钱会。他们在结会时，将制钱对半夹开，每人各执一半，作为入会凭据，故名边钱会。[5]

父母会

乾隆十二年江西宜黄县出现"父母会"。

---

①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庆复折，乾隆七年八月初七日。

②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那苏图折，乾隆七年六月廿二日。

③ 《朱批奏折》福建陆路提督苏明良折，乾隆七年六月廿八日。

④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庆复折，乾隆七年八月初十日。

⑤ 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月折包》新柱折，乾隆十二年九月初九日，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第22页。

北帝会

福建漳浦县出现北帝会。①

铁尺会

福建宁化县出现的铁尺会，因史料缺，未知其详，仅知道该会全名为"十三太保铁尺会"，其活动主要在福建省宁化、上杭、清流等县，以及汀州府南境内。该会"一味行凶为事，欺侮善良，藐视王法"。②

蔡荣祖结会

乾隆十七年，福建漳州府南靖县，有县学文生蔡荣祖，因倡议捐银纠伙，被众人推为盟主，结为秘密会党。蔡荣祖住在福建平和县琯溪地方，与南靖县南坪山的道士冯珩相交好。冯珩自幼吃素修道，自称曾学习过"推算法术"，能知过去未来。乾隆十六年十一月间，蔡荣祖与平和县人杨藕、陈循、曾改等人，在冯珩道观内商议"同举大事"。次年二月，众人再次聚会，商议聚众举事。众人以蔡荣祖是秀才，通文墨，便公推他为"盟主"，蔡本人亦自任不辞。他倡议"捐银招伙"，众人皆表示赞成。同年四月，蔡荣祖等又与冯珩商议制造器械、札付、印信等物，推冯珩为军师。又以《易经》内有"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之句，取名"大宁国"，令人刊刻。六月十五日，蔡荣祖等同至冯珩处"祭告天地，结盟吃齐心酒"，进一步招人入伙。众人议定十二月在漳州城南门外空庙会齐，再分散到城内外，俟黄昏时以放火为号，动手攻城。后因事泄，蔡荣祖等均被捕。③

啯噜

雍正末乾隆初，四川境内"啯噜子"活动日益增加。啯噜始于何时，迄无定论，有关啯噜的许多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

首先，啯噜的得名与读音问题。"啯噜"因何得名，目前学者尚有不同看法。一种说法认为"啯噜"乃是"孤窭"，表示自己是"少年失怙恃，无庇荫之人"。官员们根据其读音而称之为啯噜。④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啯噜乃"葛僚"（音 láo）的

① 庄吉发：《从清代律例的修订看秘密会党的起源及其发展》，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18 期。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③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折，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④ 张力：《啯噜初探》，载四川《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第 2 期。

音转，最初是指僚人。[1] 第三种说法认为啯噜是"轱辘"的音转，来自彝语。[2] 关于"啯噜"二字的读音，以往不少学者读作"guo lu"，甚至干脆把啯噜写作"国鲁"。[3] 有人还把啯噜读作"哥老"，认为"啯噜"乃是哥老二字的录音。[4] 根据档案资料与四川学者的研究，啯噜的正确读音应该是"gu lu"。[5]

其次，关于啯噜的来源与性质问题。啯噜的活动最早始于何时，目前尚难以确定。据张力先生研究，啯噜最早出现在雍、乾之交或更早一些。主要活动在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南山、巴山老林一带，经常同清地方政权和地主豪绅的势力相抗衡。他们袭击大户，抗击清军，并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尊为"开山祖师"。乾隆初年，四川绵竹知县安洪德在拆毁梓潼县文昌帝君庙内所塑张献忠像时提到："无怪乎年年啯噜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相谋而为恶也。"[6]胡昭曦等学者根据清人程穆衡所著《金川纪略》卷一所载乾隆八、九年时啯噜的活动，认为啯噜的出现，至迟也应在雍正年间甚至更早。[7]《金川纪略》卷一记载："又有啯噜邪教，煽惑各土司。其教本始于口外，渐流入内地。其初仅酗酒斗狠，十数年来，则奸盗皆出其中。时新都县有叛案，亦招集啯噜首犯。督臣承恩公庆复檄捕，口外番民已渐煽动不安矣！"文中所说"口外"，系指打箭炉（今康定）地区。地方志的记载中，也反映出早在乾隆初年，已有啯噜的活动。"李厚望……（乾隆）三年调重庆。先是，四川有啯噜者，皆流民恶少，强悍嗜斗，动成大狱，而重庆为甚，积案几当通省之半。厚望至，阅其牍叹曰：此皆无知犯法者也。"[8]《清高宗实录》中，乾隆八年也开始出现有关啯噜的记载："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其聚集多在州县交界处所，出没各有记认，羽党日多。"[9]档案史料记载，乾隆九年御史柴潮生奏：

---

① 胡昭曦等：《啯噜考析》，载四川省史学会编：《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② 胡昭曦等：《啯噜考析》，载四川省史学会编：《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 夏家骏：《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中华书店，1973 年。
④ 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学》，1979 年第 4 期。
⑤ 胡昭曦等：《啯噜考析》，载四川省史学会编：《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⑥ 转自张力：《啯噜试探》，载四川《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第 2 期。
⑦ 胡昭曦等：《啯噜考析》，载四川省史学会编：《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⑧ 民国《巴县志》卷九。
⑨ 《清高宗实录》卷二〇三，乾隆八年十月己卯。

"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著。后则累百盈千，漫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①

综合以上文献与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啯噜的出现大约在雍正末、乾隆初年或更早一些，最初主要在四川重庆一带活动，其成员多为穷苦的青少年。后来，由于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流民大量涌入四川，便在流民中出现一种武装集团，同四川本地的所谓"流氓恶少"相融合，形成了"啯噜"。到乾隆八、九年时，已经引起地方官吏的关注，其后不断有关于啯噜的事件上奏朝廷。乾隆十年四川巡抚纪山奏："啯噜皆有勇力技艺，党羽复众。""多系秦、楚、黔、粤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勾结本地奸匪，滋事扰民。"②乾隆十二年云南提督潘绍周也奏称："臣前在四川松潘总兵任内，每闻川东、川北一带，向有外来游匪，名为啯噜子，酗赌抢夺，结党行横，莫可谁何。"并具体提到在重庆马鬃咀地方拿获啯噜子十七人，綦江县拿获啯噜子八人，江津县拿获啯噜子三十余人。当地啯噜的活动，主要是抢劫。潘绍周提到，同年五月十四日，有民人夫妇过江北咀伍里关时，遇啯噜子十余人拦劫。将男子捆缚，抢去妇人衣服、首饰，并将头发割去，然后逃往华银山。又有永川县叔嫂二人路过双石头桥时，遭到啯噜拦劫，将其嫂扛抬至桥下强奸致死，然后亦逃往华银山。③ 乾隆十四年，四川提督岳钟琪奏报，四川境内有奸民名曰"啯噜子"，系"各省游食之人，成群结党。始则白昼聚赌，黑夜为盗。继则羽翼繁多，至有一人为首，其党或数十人、数百人者，亦有本省之徒附入其中，遂至恶焰四炽，通省各府州县以及乡村市集，无处无之。聚赌打降，抢劫强窃，播散流言，惑愚吓懦，种种不法，无弗敢为。甚至奸污妇女，焚毁室庐，不一而足。乡里良民，畏之如虎。"对于官兵的剿捕，则加以抵拒。"遇有追擒救护，辄出刀矛器械，公然拒捕敌官，颇不乏有杀伤兵役，放火报仇之事。"啯噜使用之武器，除铁尺、流星、刀、矛外，并有仿照藏民使用之"蛮刀"。④ 乾隆十五年四川总督策楞也奏称，啯噜"东飘西逐，三五成群，或者劫掠于乡场，或强梁于市肆。美衣甘食，昼赌夜淫。既无一定之行踪，亦鲜久聚之伙类。所有随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御史柴潮生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② 《朱批奏折》四川巡抚纪山折，乾隆十年一月廿一日。
③ 《朱批奏折》云南提督潘绍周折，乾隆十二年九月廿四日。
④ 《朱批奏折》四川提督岳钟琪折，乾隆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身铺盖，且不肯自为取携，到处奸拐幼童，代为背负”。[①] 以上清吏所奏，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啯噜子的情况。在乾隆前半期，啯噜的活动一直未曾间断，其人数与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其活动已遍及川西、川东、川北及贵州、湖北靠近四川的许多州县，成为一个具有秘密会党性质的武装集团。

啯噜子活动的日益加剧，引起了清朝当局更大的关注。乾隆二十三年，刑部根据四川按察使吴士瑞的建议，制定了专门针对啯噜子的条例《定啯噜匪结党轮奸及白昼抢夺例》，对啯噜子成员从严惩治：“啯匪抢夺，穷凶恶极，仅照寻常律例办理，无以示儆。请嗣后啯匪止一二人在旷野拦抢者，分别首从，该犯徒罪以上者，俱发巴里坤等处种地。其有川省啯匪潜逃近省，仍行结党犯法，即照新律严行惩治之。”[②]乾隆二十九年以后，啯噜的人数更为增多。据四川总督阿尔泰奏称，乾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四月间，各地拿获的“啯噜子”已有八百六十一人。[③] 说明乾隆中期，四川的啯噜已不似乾隆初年那样仅仅是三五成群地活动，而成了一股有较大势力的武装集团。

马朝柱利用结会造反

乾隆前半期，湖北罗田县马朝柱等人利用结会造反，也是比较突出的事件。马朝柱又名马太朝，原籍安徽蕲县，后迁居霍山，与该县白云庵僧人正修经常来往。正修粗通文墨，常为马朝柱出谋划策。乾隆十二年四月，马朝柱贫苦难度，无计可施，便同正修相商。在正修的指点之下，马朝柱编出一个神话，声言自己在16岁那年，曾有神灵在梦中告诉他，他的师傅在护国寺。醒后他便寻至霍山县火星庙，见庙内供奉之神像，同他梦中所见无异。询之寺内僧人，告以该庙原名为“护国寺”。在僧人指点下，他又前往金山，见到杨五和尚，也同梦中所见相同。他20岁那年，又梦见神灵告诉他桐城县万云山九龙洞内藏有兵法、宝剑，于是取而得之。又声称自己在乾隆十二、十三等年，曾在霍山铁炉地方，得到一柄宝剑，及镇天、先兆、喜兆、恩兆、发令、展魂等六面旗帜。又说如今西洋出了个“幼主”，名叫朱洪锦，系明室后裔，得到大学士张锡玉、大将军吴乘云（称系吴三桂之子）有李荣爵即李开花等人的辅佐，统兵三万七千人，准备兴复明朝。而马朝柱本人乃是朱洪锦的军师，改名“太朝”。正修便把马朝柱所编造的神话故

① 《朱批奏折》四川总督策楞折，乾隆十五年七月十九日。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九，刑考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640页。

③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四川总督阿尔泰折，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事,“汇成一书”,令平日认识的张朝选、宋魁元等人,广为传播。乾隆十四年二月,马朝柱移居至湖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英山县大坳沟。正修帮助马朝柱制造铜剑一柄,上面刻有“太朝军令”四字。不久,马朝柱又迁居湖北罗田县天堂寨,带领当地贫苦农民开山烧炭,趁机纠人入伙。他暗中制造一杆铜枪,一件铜笏。枪上仍刻“太朝军令”及“金枪”等字样。笏上刻有“红罗记”三字,背面刻有“丹凤朝阳”。又制造两面旗,一面铜镜。他把这些东西,事先藏在铁龟沟山洞之内,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约众人前往游观。届时,马朝柱进入洞中,把先前藏在洞内的东西取出,对众人说铜镜、旗、笏等物都是“战具”。铜镜可以“照耀天下”,见人三世。还有一件“遮天伞”,一件“撑天扇”。执拿这两件宝物,能够在云雾中行走,三时便可到达“西洋”,又对众人宣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让众人出银入伙,“歃血吞符,结盟上名”。[①] 关于马朝柱借取宝迷惑众人的情况,在同伙吕时安的供词中所述颇详:“(马朝柱)叫小的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看他取宝,小的应允了。马朝柱又说,晓得胡南山会拳棒,叫小的去约他来同看取宝。小的原去约了胡南山,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到铁龟沟即铁老沟马朝柱家。马朝柱用一块黄纸画符,与小的们冲茶吃了。到半夜时,有三四十人同到铁龟沟石头里。小的站着远望,见有二尺宽、三四尺深的一个洞,有条裂缝。马朝柱先烧香纸,后用剑舞了几下,就进洞去,取出一把剑,像是铜的。朝笏一把,还有金枪。马朝柱向小的们说,是个宝贝,小的就信了。那日马朝柱叫小的上名字,上银子。小的上了一十八两银子,小的做五次交给他的。”[②]辅佐马朝柱者除僧人正修外,还有一位以行医为业的胡济修。他被马朝柱“依为谋士”,曾为马朝柱“称扬作赞”,并作《檄文》一篇,假称系西洋大都督吴乘云所颁。是年秋冬之际,马朝柱等令人在湖北罗田县之僧塔寺、英山县之大坳沟、茅草畈等处招人,俱以辫外圈蓄发为作标记。胡济修又让刚入伙之道士王朝瑞,将所作檄文、“伪令”及赞、表等,抄录传播。马朝柱称族弟马念帮之妹为“西洋朱洪锦聘妻”,令众人呼她为娘娘,叩头礼拜。又让人暗中制造蟒袍、补褂、顶帽等,对众人假称系“西洋颁赐”。大家见蟒袍等物乃戏班行头,而补褂、顶帽又系清朝服饰,颇感疑惑。济修便同马朝柱密商,作“诏书”一道,令人刊刻,假称系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一六,乾隆十七年六月甲辰。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载《明清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07页。

西洋从云雾中"颁诏来楚",须到黄鹤楼迎接。十一月二十五日,济修遂往黄鹤楼,将"诏书"取回,对众宣读,以释众疑。其诏书曰:"奉天丞运天子诏曰:法尧舜之高风,汤武之遗迹,入洞精兵各自接驾,天将天神齐入金阙之上。龙日龙时尽起天疆之兵。阴破安庆,阳征南京。三关之上,十万神兵相助。主东盘龙阵,主西白虎阵,主南红水阵,主北黑水阵。辅臣张锡玉敬刊,太朝君令与兴明将士胡南山。天运年、月、日。"①乾隆十七年,胡济修又替马朝柱撰拟印文"统掌山河,普安社稷,既受天命,福禄永昌"②。又令人打造兵器,购买硝磺。以上情况很快为官府探闻,蕲州知州亲自赶来罗田县进行查拿,在王廷赐家发现了一座打铁炉,及打制完成或半成品的钢刀和准备用作包装兵器的白布十五匹。马朝柱手下的伙党中,闻知官府前来查拿后,多发生动摇。为了稳定人心,胡济修又对大家说,四月十六日午时,将有明朝将士从西洋前来武昌。不久,大批官兵从蕲州、英山来至罗田搜捕。马朝柱等人见事态危急,便率领徒众一百余人,于四月初三日,登上天马山寨。两三天以后,这些徒众纷纷逃散,马朝柱只得只身逃走,事情至此遂败。

马朝柱事件,是乾隆前半期秘密会党形成过程中一个典型事例。马朝柱与僧人正修、江湖医生胡济修等,利用当时穷苦人民的愚昧无知,编造神话故事纠众敛钱。在聚有一定力量后,便又萌发了政治野心,企图借兴复明朝的口号,组织群众进行造反,以实现个人登极做皇帝的梦想,实际上是一出荒唐可笑的闹剧。过去曾有人根据马朝柱事件中曾提到过"九龙洞",从而联想到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中被捕者严烟所供"马九龙",认为"马朝柱即马九龙",进而证明天地会的祖师便是马朝柱。③ 我们从马朝柱事件的内容中,丝毫看不出天地会的影子,甚至还不具有秘密会党的组织。所以认为马朝柱是天地会创始人的说法,仅只是主观猜测。

---

① 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转引自《明清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1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四一六,乾隆十七年六月甲辰。

③ 胡珠生:《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中叶说驳议》,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二、清律中惩处“结会树党”条款的增订

雍正六年到乾隆中叶，各地一些异姓结拜弟兄活动发展为“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组织即会党，如上面提到的：雍正六年(1728)福建的铁鞭会、台湾诸罗的父母会；雍正七年(1729)福建的桃园会、台湾的子龙会；雍正八年福建厦门的一钱会，雍正九年(1731)广东海阳县的父母会，雍正十三年(1735)江南霍丘县的铁尺会，乾隆元年(1736)福建邵武的关圣会，乾隆七年(1742)福建漳浦的子龙会与小刀会，乾隆十二年(1747)福建福安的边钱会、江西宜黄的关帝会，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长泰的父母会、漳浦的北帝会，乾隆十五年(1750)福建邵武的铁尺会等，乾隆二十年江苏徐州的顺刀会①等。但依据雍正三年修订的《大清律例集解附例》中，尚无针对“结会树党”之专条，且对一般结拜弟兄案件之处理又不分人数多寡，官员在实际操作中无所适从。

乾隆二十九年，福建巡抚定长针对上述情况，奏请增加针对“结会树党”的律例，并对一般结拜弟兄案件，依结会人数多寡治罪。奏文曰：“闽省各属向有结会树党之恶习，凡里巷无赖，逞强好斗，恐孤立无助，辄阴结党与，辗转招引，创立会名。多则数十人，少亦不下一二十人”。“要其本意，皆图互相帮助，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被侮之人，计图报复，亦即邀结匪人另立会名，彼此树敌，城乡效尤。更间有不肖兵役，潜行入伙，倚借衙门声势，里邻保甲莫敢举首。小则鱼肉乡民，大则逞凶械斗，抗官拒捕，亦因此而起。是结会树党之恶习，诚为一切奸宄不法之根源”。“但参酌律例，并无匪徒结会树党治罪之专条，惟例载异

---

① 乾隆二十年上谕：据富勒赫奏称，徐州府萧县地方有顺刀会名色，每逢庙会集场，押宝打架，酗酒诱赌。前在河南布政使任内，永城县有次此名，严加查禁。今徐州与永城接壤，犬牙交错之处尤易藏奸。据富勒赫所奏顺刀会一案，虽经该县拿获，审无结党聚众实迹，然非严行查禁，则棍徒积聚日多，深足为地方之害，而地方官奉行故事，以为出境即可卸责。至此省严禁，即潜匿邻疆，辗转蔓延，岂能杜绝净尽。可传谕慎毋轻忽。可传谕江苏、安徽、河南各督抚，严饬所属将顺刀会匪徒，两省关会，协力查办，务尽根株，不得稍存彼此。嗣后有此等案件，均如此办理。倘仍分畛域，任匪犯出境藏匿，以致漏网，后在他省生事，发觉者，朕必于该督抚是问。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部，刑律贼盗，谋叛，历年事例。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上谕，复谓：近来河南、江南、山东连界地方，有顺刀会名色。近闻该奸徒结会聚众但有顺刀一把，便可入伙，呼朋引类，十百成群，或逞凶打降，或使力迫胁，或强奸妇女，或抢劫财物，种种不法，深为蠹害。见《朱批奏折》山东巡抚鹤年折，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情事，止结拜弟兄，为首杖一百，为从各减一等等语。”“惟是例内特严于歃血盟誓焚表，若止结拜弟兄者，原无以人数多寡区别之明文。而承问官拘泥例文，易启避重就轻之弊。盖歃血盟誓焚表，事属秘密，过后既少有行迹可验，案犯断不肯据实供明。承审之员，亦乐于从轻完结。故讯无歃血盟誓焚表，即使结会树党并结拜弟兄至数十人之多者，皆得概于杖责释放。间有比例量为酌加，亦终不足使惩创，以致酿成巨案。”“若夫纠约多人，创会树党，结拜弟兄，其蓄心已非善良，其招引必多匪类，似不得以其并无歃血盟誓焚表概为轻恕，应即按其人数之多寡，定厥罪之差等。”奏请“嗣后凡异姓人结拜弟兄，如实有歃血订盟焚表情事，仍不分人数多寡，为首之人照例拟绞外。其虽无歃血订盟焚表，但经纠众结拜弟兄，数至三十人以上者，无论有无创会，将为首之人即照歃血订盟焚表例，拟绞监候。数至二十人以上者，将为首之人，杖一百徒三年。其为从之人，如曾转为纠约多人者，各照为首例减一等。止系被诱听从入伙者，准再减一等。若数在十人以下，为首者仍照原例杖一百，为从减一等。若虽无兄弟名色，而非实系春秋祈报，托名创会，树立党与者，均按其人数，分别首从，照纠众结拜弟兄例各减一等。如有文武衙门兵丁胥役入伙者，虽为从，各照为首之人一例问拟，乡保失察或知情不首，分别治罪，借端诬告者照律纠惩。至该管文武及地方官如平日失于觉察，迨经告发，或上司访闻，即能捕获要犯，据实详纠者，仍照例免其议处。若不准理，又不缉拿，并获犯到案故减人数，曲为开脱者，从重参处。如此，庶匪徒不敢任意纠众结党，而地方官不致瞻顾失察处分，隐匿不究，亦得按人数以定爰书，莫敢姑息养奸，惩匪僻而靖海疆。”①但清廷于同年增订成例时，并未采纳定长有关按照人数多寡定罪之建议。于乾隆三十二年“馆修入律”时，也仅把一般“结拜弟兄”和“结会树党”加以区别，强调了对“结会树党”的惩处：“闽省民人除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仍照定例拟以绞候，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审实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拟绞外。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月。各衙门兵丁胥役入伙者，照为首例问拟。乡保地方明知不首者，或

---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2辑，福建巡抚定长折，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初八日。

借端诬告者,照例分别治罪。该管文武各官失于觉察,及捕获之后有心开脱,均照例参处。若止系乡民酬社赛神,偶然洽比,事竣即散者,不在此例。"①仍未按照结会者人数多寡量刑定罪,直到乾隆三十八年才有了改变。

事缘乾隆三十八年广东揭阳县陈阿高等四十余人聚众结盟,广东巡抚德保依律将为首之陈阿高拟以绞候,发回监禁,与陈素好之林阿裕等闻讯纠众劫狱。事发,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朝廷:揭阳县先有陈阿高聚众结盟一案,经巡抚核审,拟以绞候,发回监禁。匪徒林阿裕等与陈阿高交好,探知罪名已定,起意纠匪潜谋劫狱纵放。遂乘该署县交卸之际,约期举事,潜匿城外,杀死幼孩,黄夜爬城,闻地保喊声,始行逃逸。乾隆帝见奏,认为德保对该案"拟罪过轻",原因在于"旧定之例原未允协","夫以歃血定盟,谓不分人数多寡,殊觉瞒顸失当。岂有十人内外与多至四五十人者漫无区别乎?"遂颁旨令刑部"另定条例,以示创惩"。②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刑部尊旨拟将该条例改为:"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之多,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③ 乾隆三十九年《清律》中有关歃血结盟之条例,即照此修订,仅将原奏内"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一语,改为"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④,于乾隆四十三年馆修附律。⑤ 乾隆四十五年又增定:"订盟结拜弟兄,数在二十人以上,虽众人推年长者为首,仍将首先起意纠约之人为首。"⑥

---

①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九;《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同治刻本。

②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③ 《清高宗实录》卷九五一,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据刑部奏;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二十三,刑律盗贼,上,光绪五刻本;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一十九;《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刑律,贼盗上,谋叛。

④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贼盗上。

⑤ 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二十三,刑律,贼盗上,谋叛。

⑥ 《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

第四章　天地会起源问题之一:天地会起源诸说概述

清代秘密会党是由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发展而来,最初仅仅是一般异姓结拜弟兄,鲜有“立有会名”者。雍正年间才开始出现会党名目。以往人们囿于天地会是清初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之成说,把所有会党,甚至尚无会名的异姓结拜组织,也称为天地会,以致“会党”与“天地会”几乎成了同义语。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天地会虽然是清代历史上一个重要会党,但天地会仅仅是诸多会党之一。

天地会的起源,包括天地会创自何人,始于何时,创立宗旨,产生背景等一系列问题。研究天地会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它涉及对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的作用、地位,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天地会同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关系的评价诸问题,因此一直为学术界所瞩目。近百年来,人们站在不同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说法,已有十二种之多。它们是: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天地会始于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福建藤牌兵创立天地会说,天地会始于明季说,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说,天地会始于乾隆三十二年说,天地会始于雍正年间说,天地会始于雍正初年说,“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创立天地会说,广义天地会始于雍正年间、狭义天地会始于乾隆年间说,以及天地会始于明末清初说等。[①] 可谓见仁见智,聚讼纷纭,以致有学者认为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恐永远无法解决了”。[②]

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固然有资料方面的原因,因为天地会最初只是个小小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并没有为自己的创立留下文字资料。加上它又是秘密结社,其内幕鲜为人知。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曾被革命党人用作动员会党成员参加反清革命的重要思想

---

① 所述诸说之排列,系依各说提出之早晚为顺序。

② 陆宝千:《论晚清两广天地会政权》,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1957 年,第 37 页。

武器。革命党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提出天地会（洪门）是个"民族老革命党"，是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在清初康熙年间所创立，是反清志士们见到大势已去，创立这个"民族革命团体"，以便在汉族人民中间保存一支"民族主义之根苗"。后来学者们出于对革命先辈的尊敬，便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把革命党人的结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为之寻找史料根据，或对这个说法加以诠释与论证。[①] 这样，革命党人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说法，便成了许多学者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立论依据。上述十二种说法中，绝大多数是沿用革命党人的说法，只是由于各人见到的史料不同，或对同一史料的解读不同而产生了一些小的分歧罢了。下面我们对这十二种说法作简要介绍。

一、天地会始于明清之际说

（一）天地会始于明季说

此说系王重民于1948年在《天地会始于明季说》一文中提出。他的根据是明末潘季驯《兵部奏疏》中《擒获妖党》一文所载一段内容：明万历十年二月初十日，苏松常镇兵备道揭帖称：督率兵快，诣龙华庵，将海住等拿获，又将甘露寺僧汪元洪等捕获解府。据汪元洪称，他有异姓兄弟十人，北方五人，名为黄思、黄仁、黄义、顾实、贞静，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名曰"北票"。汪元洪与雪峰、贞成、蔡元溪、元明等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曰"南票"。相约于四月初一日，南票在南京报恩寺，北票在北京天宁寺，同时举兵。据此，王重民认定洪门之创立，即纪念汪元洪，入清后演为朱洪竹或朱洪英。汪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均有"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其与洪门组织相合，故洪门乃始于明季。[②]

（二）天地会始于明末清初说

主张这种意见的有张兴伯、吴雁南与何正清。张兴伯在《天地会的起源》一文中提出天地会始于清初。主要论据有三点：第一，天地会的三个主要特点，如

---

① 详见拙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第一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见《子曰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

入会时要钻刀、歃血;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或暗语;遇有困难互相帮助等,在清初抗清队伍中皆可找到其线索。如顺治六年李鹞子等人便曾“歃血钻刀”,标榜“反清复明”,并且讲究义气,体现了患难相助的特点。第二,从乾嘉年间档案记载来看,“反清复明”虽为天地会之宗旨和对联的主要内容。但天地会只不过沿袭了清初抗清斗争时期的口号,故间接说明天地会的渊源,可追溯到清初。第三,天地会的腰凭、执照等,亦与清初农民军联明抗清时的札付、腰牌等相似。故可以“明显地看出天地会可能成立于清初”。① 吴雁南、何正清在《略论天地会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天地会起源于明末清初,至迟不晚于顺治、康熙年间”。作者认为“两宋时期的摩尼教似已具备天地会的基本因素”,如崇尚天地日月,宣传“弃暗崇明”,“归于大明”;教内之人“视为一家,通财互助”;比较平等,入教已有盟誓形式;强调“齐心和合”,团结奋斗等。到了明朝,结社集会,更为盛行,下层群众结集会社,歃血结盟的记载亦屡见不鲜,其中尤其以李自成等人的歃血盟誓和汪元洪等人的结拜,传发符票,值得注意。作者还为天地会始于明末清初说提出几点理由:其一,从它的思想渊源看,天地会是一种秘密的群众组织,同历史上的摩尼教、白莲教、道教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二,从严烟、陈丕的供词看,天地会起于雍正、乾隆年间均不可信。其三,康熙年间天地会的组织已散布于山西、北京、四川等地了。作者的最后结论是:天地会起源于明末清初,至迟不晚于顺治、康熙年间;它起源的地点,不限于四川,更不限于东南,而是在同一时期内先后出现于我国南北西东多处。②

二、天地会起源“康熙说”

(一)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

最早提出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欧榘甲、陶成章、章太炎等人。

欧榘甲在《新广东》第五节有一段话:“郑成功以兴复明室,讨灭满洲为己任。在位二十年中,无岁不兴兵伐闽浙,迄不得意,还[环]顾左右之人,既无雄

---

① 《明清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35—49页。

才大略，断难以武力与满族争衡。嗣子非材，台湾亦难久据，不得不为九世复仇之计，乃起天地会焉。其部下多漳泉人，知满清根基已定，非有私会，潜通各省行之百年之久，乘其衰敝，不能克复汉家。乃私立口号，私立文字，私立仪式，重其誓愿，严其泄露。入会者亲如兄弟，未入会者，父子亦如秦越。其所志在复明，故因洪武年号，自称洪家。旗帜服色，皆以红为尚，洪字三点水，故三合、三点等名目出焉。"①

陶成章自幼熟读经史，思想上受明末清初反满派思想家的影响颇深。及长，又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加深，清廷又推行投降卖国政策，使他本来就存在的反满思想更加强烈。他说："满人虐遇汉人，无人不愤，亦无人不恨。"近年间"欧美各国之侵迫，外界接触日甚，满人不思变计，虐遇汉人如故，刮其膏脂以为得计。于是汉人有思想者，因新仇以记旧怨，共提倡逐满主义"。② 为了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他写了一部《教会源流考》，论证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民间秘密结社即白莲教与天地会的产生，都是为了反对"异族"的统治。白莲教是为反元（蒙），天地会是为了反清（满）。他在论述天地会起源时写道："明室内乱，满洲乘之，再蹈亡国之惨。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③

章太炎也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他是光复会首领之一，抱有强烈的反满思想。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绛，别号太炎。他自幼随外祖父学习儒家经典，深受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影响。及长，又读《东华录》，了解到吕留良、曾静一案，使"夷夏之防"的思想，更印入心灵。加上后来在学术研究方面又深受浙东学派全祖望、章学诚的影响，"排满之信念日烈"。④ 他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满"宣传。他在为日人平山周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讫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

① 欧榘甲：《新广东》，载《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三联书店，1977 年，第 296 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附：《教会源流考》，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4 页。

③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15 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 年，第 157 页。

相应。熊开元、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①

民国以来，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被许多学者所沿用，并加以发挥、论证。

1920 年，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提到天地会起源时写道："天地会者，相传为延平郡王所立，以光复明室者也。""吾闻延平郡王入台之后，深虑部曲之忘宗国也，自倡天地会而为之首，其义以光复为归。"②1929 年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第十四章《天地会之起源》一节中，也对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作了论证与发挥。他首倡用"影射推求"的方法，对天地会内流传的秘密文件《西鲁序》加以解读，认为该文件中有关少林寺僧征西鲁反遭惨害的故事中，其人其事"均有寄托影射"。故事中的少林寺，乃是指郑芝龙一系及其部曲；征西鲁有功于清，是指郑芝龙撤去仙霞关兵备，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福建；清兵火焚少林寺，乃是指郑芝龙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清廷惨害之历史；传说中提到的"五祖"，便是指与郑芝龙歃血结盟的异姓兄弟或同姓兄弟而准备为郑芝龙复仇者。万云龙便是指郑成功，而明太子朱洪竹，乃是指桂王永历或唐王隆武，香主陈近南便是陈永华之自谓。经过温雄飞的诠释与发挥，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便更加具体化了："延平王郑成功据台湾，民事则委之陈永华。……郑氏三世均奉永历年号，延明祚于一线。其实(时)，桂王已被杀，郑氏不忘故主，仍奉其年号，而陈永华尤为苦心孤诣，矢志光复。自入台湾后，即知虏运尚强，难与力取。又虑日久人心涣散，无复知有茹种之痛，蓄谋复九世之仇者，乃创立秘密团体天地会于台湾，四出传播反清复明思想，唤起人心。"天地会创立的具体时间，他认为是在康熙甲寅年。他说天地会"起源之时代，自当以康熙甲寅年为可信"。"大抵天地会者，酝酿于永历帝及郑成功既死之后即康熙元年，而成立于康熙十三年者也。"③1936 年萧一山发表《天地会起源考》一文，对温雄飞在研究天地会起源时所使用的"影射推求"的方法十分推崇。认为"温先生这种推论非常重要，的确是研究天地会起源的一件有价值的贡献"。并且表示："我大体上承认温先生的推求说，天地会是陈永华和郑成功旧部组织的，香主陈近南就是陈永华的自喻。"④不

① 载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1 年。

②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546 页及 570—571 页。

③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商务印书馆，1929 年，第 106—110 页。

④ 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载《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1 年 3 月。

过，他认为天地会并非始于康熙甲寅年，而是始于雍正甲寅年（见天地会始于雍正说）。1953年，萧一山在台湾《畅流》杂志上著文《天地会创始于郑延平》，和《天地会起源的年代》等短文[①]探讨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他说："我们看许多史书，都记载郑成功初在南澳收兵，继至鼓浪屿和同志歃血订盟，誓图恢复。所以明桂王封成功为延平王时，册文上也说："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挈，壮略沉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嚼背盟心，谢辰昏于异域。"据此，"足见郑氏是以拜盟结社来起义的，后来陈永华才扩大组织为天地会"。至于天地会创始时间，他仍坚持在雍正甲寅年说。1961年萧一山重新修订其巨著《清代通史》时，对上述说法又作了补充。提出："郑成功最初收兵南澳时，即与同志张礼、张进、洪旭等九十余人歃血订盟，誓图恢复。并改张礼、郭义、蔡禄等人之名为万礼、万义、万禄，以示'万人一心'。"[②]

后来，不断有学者对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加以论证，其中尤以胡珠生的《天地会起源初探》一文为典型。他论证天地会由郑成功创立的基本立论根据，是认为天地会乃是"清初反满派地主所组织、操纵的主要民间秘密结社和用以实现政治目的的斗争工具"。其具体论点有三：其一，在清档《严烟供词》中提到天地会是由朱姓、李姓创立的，"郑（成功）受赐朱明国姓，上述朱姓起会，对郑并无矛盾"。其二，会党巨子们（按：指刘师亮、樊崧甫等人，见胡文注释）"众口齐声指出郑成功创立洪门"。其三，洪门传说中有始祖洪英战死于三汊河，而郑成功部将甘辉也在三汊河被俘牺牲。以及传说郑君达冤死，郑芝龙亦全家被害等均与"西鲁故事""暗合"。[③]

（二）天地会始于康熙甲寅说

天地会始于康熙甲寅说，是从天地会由明朝遗老创立于康熙年间这个说法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明朝遗老创立天地会说，最早由孙中山先生提出，其用意在于利用这个说法，来号召会党成员参加反清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为了向海外华侨，特别是华侨中的洪门成员宣传反清革命，曾亲自加入洪门组织并

① 台湾《畅流》卷七，第2、5期。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902页。

③ 载《历史学》，1979年第4期。

且被檀香山洪门成员推为"洪棍"。为了"劝告洪门人士实行反清复明",[①]他向洪门组织宣称洪门"原为民族老革命党",[②]是"中国提倡革命排满之元祖"。[③]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又将以往有关洪门起源的说法加以系统化。1917 年,他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一文中提出:"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立本意也。"[④] 1924 年,孙中山在论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又对洪门起源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会党在康熙年间最为盛行。那时,明朝的遗民已经留存无几,其中有一些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他们看到大势已去,无法再同清政府相抗,于是设法建立会党,以便把民族主义的"根苗"流传给后代。但是又觉得不可能依靠文人学士去保存这个根苗,于是把"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们,收罗起来,结成团体,以便在他们中间保存民族主义的根苗。就像强盗入室时,富人便把金银财宝全藏在污秽之中,使强盗不易发现。[⑤]

孙中山先生有关洪门起源的论述,对后来学者们影响甚大。1928 年,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便完全沿用了孙中山先生有关洪门起源的说法。认为洪门即天地会,创始于"清初康熙时代",因为当时距明亡未久,明朝忠烈之士,仍在力图"匡复",誓不臣清。但是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已难挽回明朝灭亡的命运。二三遗老认为清祚已固,"兴复大业"非一时所能奏效,乃欲以"种族思想"留传后世,于是创立了洪门天地会这个秘密团体。[⑥] 1934 年罗尔纲先生写的《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也是用"民族革命"说的模式来解释天地会起源的。他说,在明朝末年,由于《水浒传》曾做过"流寇"的行动根据,故不免有"诲盗"之嫌。宋江等人的活动,曾被士大夫们加以痛骂。但是在明亡以后,"中国的大问题,已不再是流寇的事件,而是亡国的悲痛与异族的压迫。遗民们感到国运已无可挽

---

① 《近代史资料丛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 304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170—171 页。

③ 《近代史资料丛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 304 页。

④ 《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170—171 页。

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三讲。

⑥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6 册,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7 页。

救，因而转希望于草泽英雄，把以前被人们深恶痛绝的宋江等人，反而当作英雄加以推崇了。一班“志士”，便以《水浒传》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以《水浒传》的理想来组织一个秘密结社。“这个秘密结社就是天地会。”关于天地会创立的具体时间，他根据会内流传的《西鲁故事》，确定为康熙甲寅即十三年。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仍有学者沿用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作为论证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的立论根据，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赫治清的《论天地会的起源》一文。他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关于洪门天地会缘起的论述”，“无可辩驳地证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既然如此，天地会就应该是康熙元年（1662 年）南明王朝覆亡，公开武装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政权对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之后不久的产物。”②

三、“以万为姓”集团创立天地会说

（一）福建藤牌兵创立天地会说

此说最早是 1947 年周贻白在《洪门起源考》一文中最先提出来的。作者根据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所载康熙年间福建藤牌兵参加中俄雅克萨战役一事，对会内流传的“西鲁故事”作了新的解读。在《广阳杂记》卷二《杨涵斋述建义侯林兴珠阿克萨之捷》一条，有如下记述：“乙丑（按：指康熙二十四年即 1685 年）春夏间，上命往征罗刹国阿克萨城。罗刹国在极西，绝荒远，幅员极广。阿克萨……在乌龙江侧，与梭伦邻，栅木为城。”“上既平三藩，未尝一日忘罗刹也，乃命彭椿公领铁骑三千，为陆路将军；林兴珠领滚牌五百，为水路将军，往征之，水陆并进。”五月二十三日围阿克萨，二十五日敌方救兵至。林兴珠令众人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顶，持刀以进。敌兵火器无所施，藤牌兵以藤牌蔽其首，枪矢不能入，杀敌大半。林兴珠不失一兵一卒，而将阿克萨城攻占。康熙并未叙其功，反将藤牌兵遣散。周贻白认为《广阳杂记》中所述“罗刹”便是指俄罗斯，阿克萨便是雅克萨城，在黑龙江左岸，又名阿尔巴津。因罗刹地处极西荒远之西伯利亚，故称之曰“西罗”。

①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所附《水浒传与天地会》，该文最初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1934 年 11 月 26 日。

② 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 5 辑，中华书局，1984 年。

而“西鲁”便是西罗之音转。将福建藤牌兵帮助康熙皇帝征罗刹一事同“西鲁传说”相对照，如林兴珠奉命率领藤牌兵征雅克萨，得胜还师，不失一兵一卒，立有殊功而未获奖赏，反被清政府遣散诸情节，同“西鲁传说”中少林寺众僧帮助康熙皇帝征讨西鲁，得胜立功而不受奖赏，反遭诬陷，被清廷派兵将少林寺焚毁，使众僧大多惨死等情节，有诸多相似之处。并认为雅克萨城系以木为城，似即西鲁传说中之“木杨城”。藤牌兵被遣散之后，便返回家乡，“纠集同志，毅然作反清复明之举”。而西鲁传说中的前五房即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后五房即吴天成、洪太岁、李识第、桃必达、林永昭，俱属藤牌兵中之重要人物。而万云龙大哥便是“万姓集团”的万礼即张要，郑君达便是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故事中的张建秋、陈宏系指“部议诸臣”，车夫马宁儿则指清将施琅。由此认为天地会便是福建藤牌兵被遣散后，返回福建同万五道宗所建立。①

（二）“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创立天地会说

1953 年台湾的蒋君章也提出：“从天地会的各种文件来综合，它的起源是：有少林寺僧 108 人，曾为政府建立边功，反而遭忘，于康熙十三年突破围攻，仅五人走免，得一镌有‘反清复明’及洪英等字的香炉于海中。乃折草为香，对天立誓，拜长林寺长万应（原文如此——引者）龙为大哥，洪英为盟主，陈近南为军师。洪英一名天佑，据说就是崇祯之子。这个万云龙和陈近南都是化名。原来，有张礼、郭义、蔡禄等，插（歃）血为盟，组织秘密社团，以‘万人一心’为标准，他们自己都改姓万，改名万大、万二、万七等”。这原是闽南的秘密社团，郑成功起义时的歃血为盟，其性质亦极相类似。成功来台，这一秘密社团也跟着回来，并正名为天地会。”②

1975 年郭廷以在《台湾史事概论》一书中，也采用天地会是由“以万为姓”集团组织扩大而建立的说法，指出：“郑成功决定起义师之时，首先和他的朋友陈辉、张进、洪旭等九十余人缔盟歃血。张礼、郭义、蔡禄等亦相同盟，以万人合心，以万为姓，改名万礼、万义、万禄，依照行次，有万大、万二、万七之称。”③

---

① 《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 16 号。

② 蒋君章：《认识台湾历史》，第 6 节《反清复明运动转为地下组织》，载台湾《后备军人》，第 158 期。

③ 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台北正中书局，1954 年，第 118 页。

1977 年，翁同文先生在《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创立天地会》一文[1]中，对这个说法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先论证江日升《台湾外纪》中提到的长林寺僧万五道宗乃是达宗之误，与"西鲁传说"中的万云龙即长林寺僧达宗乃同一人。然后推论说："所谓少林寺僧兵退敌立功，清帝负义遣兵放火焚寺，乃影射蔡禄率部降清，又与其部下在河南（少林寺所在地）被杀。所谓少林寺焚余五僧逃出与长林寺僧遇合结盟，当指蔡禄部下有残余分子脱逃回闽，与万五重聚。五僧虽未必就是从未出现的'以万为姓'集团成员如万三、万四、万六等人，也属该集团范围。故此，可说少林寺五僧与长林寺僧达宗，两方都是'以万为姓'集团的人，天地会即彼此等建立。只因讳言降清而又被杀"，故此借少林寺僧兵故事影射，指万七蔡禄降清后，于康熙甲寅年因响应吴三桂反清被杀一事。

20 世纪 90 年代，罗炤先生利用在福建东山找到的《香花僧秘典》，详细地论证了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

罗炤和赫治清等学者认定天地会为万五道宗创立主要的史料就是被罗炤命名为《香花僧秘典》的手抄本。因为在其中的《古来寺赞集》"源头曲词"中有如下内容："飊为大公，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一理皆同。地（古字）本威风，万水朝东，伸头露脚，一心尽忠。会人曾僧，名山慧灯，十八口日，一片利人。"罗炤认为诗的前两段是任何天地会会簿都有的。（按：天地会《会簿》中的原诗是："天本团圆，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万里皆同；地本威风，万水朝东，身头露脚，一心尽忠。"并没有"会人曾僧，名山慧灯，十八口日，一片利人"一句。）所以认为这是天地会"真正的源头"。[2] 而《香花僧秘典》中的《花会歌》中更写有天地会《会簿》中的一些人物，如吴天成、洪太岁、方大洪、林大江、李式开、方惠成、郑君达、郑玉兰、桃必达等，因此被认为是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最珍贵的史料"。赫治清先生还认为《香花僧秘典》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天地会结盟仪式、会场陈设、联络暗号隐语、思想渊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依我看，对于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来说，这种价值，比起嘉道以及以后发现的任何一种会簿都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3]他说：《香花僧秘典》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辑录了与天

① 载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史学论集》，台湾省华冈出版公司，1977 年。

②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华工商时报》，1994 年 10 月 19 日起连载，每日一期，共 138 期，第 45 页。

③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33 页。

地会秘密文件《会簿》中有关文字几乎同出一辙的内容。""还有天地会会簿记载的部分五祖、郑君达、郑玉兰以及清初著名思想家王船山、黄南雷(黄宗羲)等。[①]又说:"《香花僧秘典》虽不全是会簿,但是,它对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来说,却是一件具有重大价值的宝贵资料。它的价值在于,与天地会秘密文件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秘典》录自长林寺五祖词的《源头曲词》,通过藏头诗的形式,不仅点出了天地会会名,而且交代了'会人曾僧'的真相,披露了天地会初期的组织成分。"[②]罗炤也说:"康熙皇帝处置蔡禄,与天地会会簿所述康熙火烧少林寺,屠杀僧人的性质是一致的:昏君负义,壮士始为朝廷效力,终被谗陷受诛。"[③]"蔡禄在四月间被清政府杀害于河南,随从他去河南的数千名部众,这时肯定有一些跑回福建故乡。""如今蔡禄惨遭康熙皇帝杀害,道宗不可能不有所行动。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重要节日盂兰盆会,又称中元,俗称鬼节,届时要做水陆法会祭奠亡灵。道宗是僧人,此时距蔡禄之死已有两个多月,他肯定已经闻知噩耗,必定会主持最大规模的水陆大法会祭奠、超度亡弟。""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天地会在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义了。"[④]赫治清也认为:"当蔡禄被杀的噩耗传来之后,深谋远虑的万五道宗,一方面借用中元节超度亡灵的传统习俗,在蔡禄家乡云霄最著名的灵王庙即高溪庙,为亡弟设祭,亲自主持水陆法会,超度亡灵冤魂。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结束普度的宗教仪式,乘僧众群情悲愤之际,沿用过去化异姓为万姓、歃血结盟的习俗,结拜天地会。"[⑤]

四、天地会起源雍正说

(一)雍正甲寅说

此说最初是萧一山在《天地会起源考》一文中提出来的。其根据也是会内

---

①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128页。

②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③ 罗炤:《天地会的两个源头》,载《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0月19日起连载,每日一期,共138期。

④ 罗炤:《天地会的两个源头》,载《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0月19日起连载,每日一期,共138期。

⑤ 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载《清史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流传的“西鲁故事”。他认为温雄飞、罗尔纲两人主张天地会始于康熙甲寅年，是因为“罗、温两先生都是根据洪门传说中较晚的记载而断定的，他们不知道较早的抄本中，尚有雍正十二年甲寅之说”。并推断温、罗二人所见“西鲁故事”抄本中有关第一次结盟为“康熙甲寅年”，乃是“传抄上的错误”。因为“说西鲁入寇是康熙年间的事，以后说火烧少林寺拜盟结会，也许忘记写雍正的年号了，只书甲寅。后来的人就不免抄成康熙甲寅了”。又说：“我们在天地会文件中更有一个最重要的证明，就是他们说成立于雍正十二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这决不是想象出来的，必定有一件事在那个时节发生。我们再看历史上的证明，乾隆以前，尚未有天地会的名称，更可知起于雍正甲寅之说为可信。”不过，他又说天地会起于雍正末年，不等于在康熙时代就绝对没有。认为“大约天地会在康熙时已竟有了，不过没有像后来那样严紧的组织。有之，则是从雍正末年起。”于是又提出雍正甲寅年天地会曾经历过一次“改组”之说。他引用了会内文件中一条史料：“雍正十二年万大哥故后，又有桃必达联盟五虎大将，改立天地日月，分派父母兄嫂……”。据此，他认为“所谓又有桃必达联盟五虎大将改立天地等事，已可见天地会有改组之事”。[①] 也就是说，天地会在康熙年间业已存在，不过不够严紧。经过雍正甲寅年“改组”之后，才成为一个严紧的秘密会党组织。

（二）雍正初年说

1974年，中国台湾学者翁同文先生发表《天地会以死为生传统与太阳诞辰节》一文，[②]提出天地会始于雍正初年的说法。他首先确定天地会始于闽南，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会内又有以忌辰为诞辰的传统，如传说中“五祖”的忌辰为七月二十五日，而这一天便是天地会的诞辰。闽南人以阴历三月十五日（另说三月十九日）为太阳诞辰节，便是为了纪念明思宗殉国。而太阳诞辰节，便是起源于天地会。他又提出康熙十六年蔡寅假朱三太子三月十九日起兵，雍正四年、六年在台湾破获两起父母会结盟案件，其结盟日期都是三月十九日。雍正十三年台湾诸罗县的反清事件，在布旗上中间画红圈，写一“日”字，圈上写“大明朱四太子”。可见太阳乃是朱明王朝的象征，而以崇祯殉国之日转为太阳生日加以纪念，应当始于天地会，后来才传播到闽南民间。直至雍正六年民间尚

---

① 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

② 原刊于《星洲日报》1974年12月12日“文化版”，后转刊于台湾《史学集刊》第7期。

无太阳诞辰节，可见，天地会的起源，应推到雍正初年。

（三）雍正年间说

此说系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所提出。他认为天地会起源的准确时间已不可考，但肯定同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起义相距不远。因林爽文起义时被捕的会内骨干张破脸狗是乾隆四十六年加入天地会的，再结合天地会的前身拜父母会系始于雍正初年，可知天地会大约始于雍正年间。①

五、天地会起源乾隆说

（一）乾隆二十六年说

该说最初由蔡少卿于 1964 年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②一文中提出。他首先指出，以往有关天地会起源于康熙甲寅说的缺陷是，在档案与官书中，有关天地会活动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之时。如果说天地会果真始于康熙十三年，那么，从天地会的成立到台湾林爽文起义，其间相距 100 多年，天地会竟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如果说在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前，天地会已有活动，而天地会的名目又始终未被清统治者所发现，“似乎也不大可能”。因此，他推断天地会创立的时间，应当距林爽文起义不会太远。他便从研究林爽文起义的档案史料入手，探讨天地会起源的问题，终于从清政府追查天地会“根源”的史料中，发现天地会是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首先创立的。关于天地会的创立时间，又在嘉庆初年清吏汪志伊《敬陈治化漳县风俗疏》中找到了答案。该奏疏明确写道：“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指使，谋为不轨。”③蔡少卿的新说提出后不久，中国大陆上便开始了十年动乱，学术研究被迫停止，所以蔡的说法也未引起反响。“四人帮”垮台以后，学术研究重新活跃起来，蔡少卿有关天地

---

① ［日］佐佐木正哉：《清末秘密结社》，前篇《天地会的成立》，［日本］严南堂书店，第 249—250 页。

② 《北京大学学报》，1964 年第 1 期。

③ 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三。

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说法，也引起了争议。许多学者认为汪志伊在“奏疏”中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说法缺乏佐证，故对蔡的新说提出质疑。[①] 1985年夏，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外纪簿》中查到了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审拟提喜之子僧人行义、嫡传弟子陈彪的奏折，终于为汪志伊的说法找到了确凿根据，并先后发表《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②]及《伍拉纳奏折的发现与天地会起源研究》等论文，[③]使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1988年，台湾省学者庄吉发先生在《明代闽粤地区的人口流动与秘密会党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倡立天地会的……是福建漳浦县人洪二和尚万提喜”。“就现存档案资料而言，天地会的出现，更始于乾隆二十六年。”[④]大陆学者连立昌先生在所著《福建秘密社会》一书中指出，以往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论文“连篇累牍，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天地会为洪二和尚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后创始于福建漳浦县的说法是正确的。而另外几种起源说，往往无有力的史料证据，假设、猜测较多，剖析常多抵牾。”[⑤]

(二)乾隆三十二年说

此说是台湾省学者戴玄之先生于1968年在《天地会的源流》一文中提出。他认为：“天地会经乾隆帝命令有关各省督抚及地方官严密追查，历时三年之久，始查明起源的全部真相：创始人为洪二和尚，亦称万和尚，法名提喜(法号云龙禅师)，俗姓郑(由其子郑继可知)，乳名洪，因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关于天地会创立的具体时间，他认为清吏汪志伊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之说，“无史实根据，不足征信”。他本人则根据《清高宗实录》中所载许阿协关于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之供词，及对天地会内“木立斗世”隐语之解释，认定天地会始于乾隆三十二年。[⑥]

---

① 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历史学》，1979年第4期。

② 《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③ 《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

④ 台湾《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

⑤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3页。

⑥ 台湾《大陆杂志》，第36卷第11期。

（三）广义天地会始于雍正年间、狭义天地会始于乾隆年间说

台湾省学者庄吉发先生在《天地会文件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中，把天地会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认为：“广义的天地会是包括各种会党，即以天地会为通称者”，如雍正年间便已存在的铁鞭会、铁尺会、父母会等。“狭义的天地会，则指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以来正式出现而使用天地会名称的本支而言。”[①]后来，庄先生已经放弃了此说。

---

① 载台湾《大陆杂志》，第 68 卷第 4 期。

第五章　天地会起源问题之二：史实之澄清

天地会起源问题，经过百余年来的研究，许多说法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如今尚有“康熙说”较为盛行，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天地会创立的原因和宗旨存在不同看法。主张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的基本立论依据，是认为天地会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是明朝遗老或汉族士大夫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民族革命团体”；而主张天地会起源乾隆说的诸学者，则认为天地会的产生，并非由于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是清中叶社会矛盾的产物。是下层社会的部分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

一、天地会是否由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

我们先来考察清初的明朝遗老是否有可能创立天地会这样的民间秘密结社。该说法最初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提出来的，他们出于“反满”斗争的政治需要，提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之“反满民族革命团体”。这个说法并非学术研究的结论，缺乏严格的论证和史料依据。我们如今研究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应从历史事实出发，不必拘泥于革命党人的结论。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中，需要争取和依靠两大势力：一是国内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二是海外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特别是其中的洪门（天地会和哥老会分子）。洪门是一股现成的组织，有的还拥有武装；华侨、华人中的洪门组织，则可以在经济上支援国内的反清革命，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青睐。满族贵族对广大汉族人民施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给汉族人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因此，革命党人提出的“革命排满”口号，对于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对会党和海外华侨、华人中的洪门人士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革命党人是借宣传洪门（天地会和哥老会）是明朝遗

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来动员海内外洪门参加和支援反清革命。为此,他们一方面大力鼓吹清朝"暴政"和对汉族人民施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揭露其祸国殃民的罪行。另一方面则宣传洪门乃是清初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

孙中山、陶成章等人作为革命家,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力求依照他们的目前政策的需要以观察'以往'",[①]他们的说法只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寄托了革命党人的一种理想和愿望。1903年美洲华文《大同日报缘起》一文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明季"昏主失德,张、李横行,外患遂巨。满洲部落乃乘间而取中国,屠江淮,剪闽粤,汉人全部受诛锄而屈服,无复可延残喘之地。而为九世复仇之策之豪杰,乃诡辞诡事,托子虚乌有之事,以激其忠愤,以广其流传,以冀后世有大英雄起而推广其意,变通其法,以合至大至多至久之会党,一变而为极有思想、极有组织、极有基柢之政党。"[②]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正是希望借助于明朝遗老"反清复明"的历史,来鼓舞广大汉族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但却找不到历史根据。因为,到康熙年间,明朝遗老的群体已经分化,清朝当局通过开"博学鸿词"科,举山林隐逸,以及撰修《明史》等措施,使相当多的遗老已经同清政权合作,走上仕途,不再反对清朝;少数遗老虽然仍坚持反清立场,拒绝与当局合作,但也只能消极反抗,甚至精神颓废,逃禅为僧,很难找到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而创立天地会的史料。孙中山先生在天地会《会簿》中看到了"反清复明"的内容,于是便把明朝遗老和"下等社会"的会党结合起来,提出"强盗入室藏珍宝与污秽之中"的说法,阐述明朝遗老把"民族主义"保存在"下等社会"的洪门会党之中。其实,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清朝初年那些明朝遗老,主要是由明朝的高官和士大夫构成,他们受到儒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内心是看不起"下等社会"那些贩夫走卒和江湖游子的。遗老们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失势,但是,不少人仍然拥有相当的财富,属于贵族、地主阶级。要让他们放下贵族、士大夫的架子,去同下层社会的贩夫走卒和江湖游子为伍,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猜想,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在清代大量会党的档案中,除了有极少数底层社会的读书人参加会党外,根本找不到明朝遗老同下层群众相结合结拜

---

①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三联书店,1995年,第12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册(上),第361页。

天地会的史实。在大量明朝遗老的诗文中，也找不到任何有关事例的蛛丝马迹。以往有关顾炎武在北方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传说，尽管被人们一再宣扬，却并非事实。

清初由于满汉民族矛盾激化，反满情绪在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中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一点有大量史料足资证明，无须赘言。明朝遗老为了寄托对故国的哀思，书写了大量诗文，这方面谢国桢先生曾经做过深入研究，所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已经充分阐述了清初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的情况。他通过对明朝遗老情况的分析，指出明朝遗老的政治态度大体上分为三派：“一派是同志们看见国已经亡了，家已经破了，他由激昂的胸怀而变为放浪江湖，寄情诗酒，颓废的举动，这一派可名为颓废派。又有一派他觉着虽然国破家亡，他们还是要不顾生死地干下去，这一派可名为激进派。”“在清代严酷政治之下，激进一派自然是杀戮无遗不必说了，就是放浪诗酒的颓废派，也被清廷弄得焦头烂额，这又是何等的惨酷的事情！”①“那些明季的志士，只有在荒江老屋之中遇见几个同志结起一个诗社，作楚囚对吟，或者做点秘密工作，以冀兴复于万一，还有些颓废的人就做了和尚。像明季遗民周唯一，他曾一度到剡源当和尚，去了头发，做了一个发冢。”②至于那些同清朝合作的明朝遗老，当然就更不可能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了！

过去许多学者都大谈顾炎武北上抗清，作为明朝遗老“反清复明”的典型事例。王春瑜先生在《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中，以大量事实否定了这些说法，并披露了许多以往被认为同顾炎武一同进行过“反清复明”活动的明朝遗老之真实情况，如：

万寿祺，崇祯庚午举人，明亡后，起初在山阳浦西隐居，后来则悲观厌世，“每念生无益于世，后且与草木同腐朽”，遂削发为僧，自谓“脱去世谛，人我两忘”。显然，这种隐避逃禅与世无争的颓废态度，尽管客观上也许不无略含抵制清朝的意义，但对待现实竟消极到这种地步，是绝不可能冒生命危险，去积极从事所谓秘密抗清活动的。

申涵光，字凫盟，永年人。明亡后，开始尚乡居力耕，抵制清朝；但时过境迁，渐更初衷。他深深感到，明朝是一去不复返了。在《览镜》一诗中，写尽了这

---

①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40 页。

②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57—158 页。

种胸怀:"览镜发惊白,浮生亦可怜。儿童犹昨日,心事已衰年。自笑谋生拙,人讥闭户偏。驻颜岂有术,怀古愧徒然。"从此抱定主意,"随便安分,便是安乐法",成了十足的与世无争者。后来更公开宣扬与清朝合用:"官粮必早输纳,每岁收入先除此一项,余者乃以他用。"实质上即劝人们做清朝的恭顺臣民,不要起来反抗。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与顾炎武一起,去从事所谓抗清活动?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康熙十八年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未被录取。后来投靠徐乾学,收其弟徐元文为弟子,予修清一统志。徐乾学死后,他哀叹"穷老不遇",写了《吞声》、《残年哭知己》等诗,如丧考妣。后来胤禛写信给他,召他赴京,他已年近古稀,且正卧病在床,竟"霍然而起",奔赴京中,力图飞黄腾达。结果到京后便病死。显然,醉心于爵禄,一点民族气节都没有的阎若璩,如果说他曾与顾炎武秘密抗清,即使验诸常理,也断不相容。

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起初,拒不出仕,自称中南山人。康熙十八年,他与潘耒、严绳孙、朱彝尊等人,以布衣应试博学鸿词科,中一等第七名,授官检讨。他不仅自己应试,而且还力劝李颙出仕。虽然,李因笃后来给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密疏,获得康熙的特别许可,辞官回家。但我们从他的为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绝不是胸怀异志,能够冒险去从事秘密抗清活动的人。[①]

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通过开博学鸿词科、举遗贤修明史等一系列措施,大大缓和了明朝遗老和清朝当局的矛盾。许多明朝遗老及其子弟纷纷应试,走上仕途,这标志着明朝遗老及其子弟对满洲贵族君临天下,由排击转而合作支持。就连被人们认为抗清态度最为坚决的顾炎武,在临终前夕,也由先前抗清,继而不合作,再变为希望"庙堂之上"能为"万世开太平"了。[②]

在清初这些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当中,有些尽管内心充满着对前明故国的怀念和眷恋之情,对清朝统治也充满了仇恨和不满,但是,史料中从未发现过他们同下层群众利用歃血结盟的方式建立秘密结社的记载,更不用说建立天地会了。即使遗老们所结的诗文社,后来也遭到清初当局的禁止:"顺治庚子正月,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

---

① 王春瑜:《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② 王思治、刘凤云:《论清初"遗民"反清态度的转变》,载《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89年第一期。

治罪。"[1]在清廷的严厉打击下,这些士子们的结社活动也逐渐"敛迹",甚至"社盟"也改称"同学"了。[2] 更何况创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天地会!

以往学者认定天地会是明朝遗老所创立的主要依据,是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其实,"反清复明"口号,主要存在于天地会《会簿》或传会花帖之中。在天地会历次起义的实践中,虽然有反满复汉的内容,但鲜有以"反清复明"为明确口号者。

从天地会的历次武装起义中,很少看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者。过去有人用朱一贵起义为例,说明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创立,但从朱一贵起义的史料中根本看不出朱一贵是天地会。根据档案史料的记载,乾隆三十三年福建省漳浦县卢茂等人发动过一次由天地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可是,这次起义并未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相反,首领卢茂还因"无辞惑众",而虚捏赵良明之名,假称系宋朝后裔。[3] 如果天地会确实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那么,卢茂就无须再虚捏赵良明之名,假称系宋朝后裔了! 这次起义是在天地会创始人提喜即洪二和尚"暗中主使"下进行的,说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并非为了"反清复明"!

乾隆五十一年末到五十三年,在台湾爆发了清代前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天地会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这次起义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件,包括清廷官方文件及起义军的告示、信札,天地会盟书等史料,多达一百五十余万字。此外,有关这次起义的史料还有:清廷官修史书《清高宗实录》、《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及私家著述如杨廷理:《东瀛纪事》;佚名:《平台纪事本末》等,对这次起义皆有较详记述,但并无一处提到过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记载。起义前,天地会的歌诀是:"日月车马三千里、□□□□□□□;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4]。起义爆发后,在发布的告示中提到的口号主要是:"安民心,保农业"[5];"剿除贪官,拯救万民";[6]"剿除贪官,以保民生"。[7] 乾隆六十

① 徐珂:《清稗类钞》,会党类,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626 页。
②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72—173 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崔应阶折,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④ 《天地会》(一)第 71 页。
⑤ 《天地会》(一)第 153 页。
⑥ 《天地会》(一)第 154 页。
⑦ 《天地会》(一)第 156 页。

年，陈周全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以“争天夺国”为口号，[①]仍未提及“反清复明”。

在嘉庆年间天地会的武装起义中仍鲜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和口号者。台湾天地会的分支小刀会曾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活动，如嘉庆二年十二月，台湾淡水杨肇等聚众一百多人，攻打粤人村庄。[②] 嘉庆三年九月，台湾凤山（今高雄）人汪降等结拜小刀会，攻打县城。[③] 嘉庆五年台湾嘉义县陈锡宗等结拜小刀会，并攻打盐水港。[④] 嘉庆九年，台湾凤山李顺等结拜小刀会，欲抢劫富户。[⑤] 这些起义均未曾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内地的情况也大多类此。嘉庆七年，广东博罗县爆发过一次天地会（添弟会）发动的武装反抗活动。起义首领陈烂屐四聚集了一万余人，自称“大王”，起义大旗上书写“顺天行道”[⑥]这个天地会的传统口号。同年，广东归善的天地会起义首领是陈亚本和蔡步云，也是以“顺天行道”为口号。[⑦] 永安天地会起义则以“官逼民变”为口号。[⑧] 嘉庆八年，江西广昌、宁都、石城天地会起义，起义大旗上书写“唐天子”三字，亦未提“反清复明”。[⑨]

进入晚清以后，天地会的武装起义层出不穷，但也很少直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天地会的水上武装“艇军”，其主要活动的“包江食水”，即是在江河上从事抢劫活动，并无政治目的，主要提出“劫富济贫”的传统口号来号召群众。虽然首领陈亚贵一直具有反清思想，但也是以“顺天行道”[⑩]和“劫富济贫”为号召。[⑪] 太平天国时期的另一天地会首领张嘉祥，也是以“劫富济贫”为口号。[⑫] 太平天国时期两广地区的天地会起义，建立了多个政权，其中著名的有朱洪英、胡有禄建立的“升平天国”，陈金刚建立的“大洪国”，陈开、

---

① 《陈周全告示》，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折，嘉庆三年六月十八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折，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折，嘉庆十年二月初十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附《陈士庄供单》，嘉庆七年十月初一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僧人宽成供词。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亲承恩折，嘉庆九年四月十六日。
⑩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37页。
⑪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第59—60页。
⑫ 民国《钦县志》卷十四，《纪事志》。

李文茂建立的"大成国"，这些天地会起义虽然在檄文中谴责清朝统治的残暴和要求恢复汉族统治的内容，但大多仍以天地会传统的"顺天行道"为口号。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厦门小刀会起义，发布的告示或檄文中虽然有反满复汉的内容，但并无明确的"反清复明"口号。四川余栋臣起义时，甚至还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只是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党人的大力宣传，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创立宗旨的说法才日益流行，以致人们便认为天地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

事实上"反清复明"的口号主要存在于天地会的《会簿》、传会花帖及盟书、誓词及会簿之中，是为了借标榜"反清复明"来争取广大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对天地会来说，"反清复明"的口号，仅仅是发展组织的手段而非创立的宗旨。

从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到，在乾隆末嘉庆初形成的天地会《会簿》中，才开始明确出现"反清复明"的口号。嘉庆十六年十月，广西荔浦县李遇恩、苏枝嵩、蓝辉彩等结拜天地会，苏枝嵩称：乾隆五十八年，浙江人范七于病故前传给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①] 嘉庆十六年广西东兰州武缘县姚大羔等结会时所立《会簿》中，出现"天下知世清该绝，万里合同明在兴"；"黄河自有绝清日，复明岂得无运时"等诗句。[②] 在广西田林县抄本的图像中，出现了"扶明灭清"字样。[③] 在贵县修志局本中，开始出现明确的"反清复明"口号。如称"西鲁故事为《反清复明根苗》，还有一首诗《反清复明诗》："新造木杨城，惊动众洪英，干戈重重起，反清又复明。"[④]

嘉庆年间在天地会的盟书、誓词及歌诀、问答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复明"字样。嘉庆五年，广东仇大钦等结会盟书中，提出了"恢复明祚"[⑤]，次年"教读为活"者林添申在盟书中写道："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⑥]嘉庆七年，广东博罗添弟会起义军旗上定有歌诀："日月清风百马候，三姓结万李朱洪；木立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初一日。

② 《天地会》(一)第5—6页。

③ 《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第485、528页。

④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1、5页。

⑤ 《朱批奏折》汪志伊折，嘉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汪志伊折，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斗世知天下，顺天兴明合和同。"[①]起义大旗上书写"顺天行道"。[②] 嘉庆十六年，姚大羔等人所立《会簿》中，出现了"兴明绝清"、"扶明绝清"等口号。[③]

总之，"反清复明"对于天地会来说，无非是一种舆论宣传的手段，而非创立的宗旨。

纵观有清一代的历史，"反清复明"乃是汉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共同的口号，并非某一群体所独有，不同群体使用这个口号时，其内涵也各有不同。清初明朝遗老使用这个口号，确实是为了恢复明朝社稷。而汉族士大夫，特别是一些汉族思想家，如王、黄、顾等人，他们使用这个口号，则是为了"严华夷之辩"，要求恢复汉家天下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下层群众使用这个口号，则是为了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如乾隆年间的清茶门教曾提出"清朝以尽"和"日月复来属大明"的口号[④]；嘉庆初年川楚陕等五省教门大起义时，也提出"弥勒佛降生，保辅牛八"及"兴汉灭满"等的口号。[⑤] 天地会、哥老会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但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却不是为了恢复明朝统治，而是为了反抗清朝的压迫，是继承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打着前朝旗号反抗现政权的惯用手法。因为对于广大下层群众来说，恢复明朝统治，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也不仅是为了反对满族，而且是为了反对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

二、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与历史事实不符

鉴于康熙初年，清廷通过一系列措施，如开科取士、撰修明史等，笼络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使他们纷纷走上仕途，同清朝统治阶级合作。唯一尚同清朝当局相抗衡的就只剩下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了，于是人们便把创立天地会的重任，加在了郑成功身上。

郑成功为"反清复明"而创立天地会的说法虽由来已久，且为不少论著所认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吉庆折，嘉庆七年十月初五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觉罗吉庆折，嘉庆七年九月十九日。

③ 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一历史档《天地会》(一)第3—29页。

④ 《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⑤ 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白莲教起义军布告》，载《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第5册，第1页。

可，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然而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第一，在天地会档案史料和天地会秘籍中，皆无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记载。

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后，清朝当局曾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追查天地会的“根源”。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档案，为我们探索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起义军副元帅杨振国被俘，供称天地会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①] 同年，广东饶平县一批天地会成员被捕。当审讯中清吏问及天地会根源时，林功裕供称起会人“有朱洪德，系食仙桃孕生，约十五六岁”。[②] 许阿协等供：“赖阿边勾引入会时，告以洪李桃系头人姓名。”[③]林阿俊供：“梁阿步引入队会时，告以头人系李九陶。”[④]乾隆五十三年，最早到台湾传播天地会的严烟被捕后供称：“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份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八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喜。”[⑤]

从上述天地会成员供词中可知，乾隆年间会内相传天地会创始人计有：朱姓少年朱洪德、李姓、马九龙、李九陶、洪李桃、万和尚涂喜等，并无郑成功。

到了乾隆末嘉庆初，天地会内的传说、歌诀等形成文字，写入秘籍之中，形成天地会《会簿》。在这些《会簿》中，均未提到过郑成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十六年清吏从广西东兰州武缘县姚大羔等人处搜获的天地会《会簿》中有关天地会缘起的传说，不再提朱、李二姓创会及马九龙纠集和尚演就驱遣阴兵法术等内容，代之以西鲁番作乱，甘肃少林寺僧征西鲁得胜，后遭惨害，幸存六人以“师尊万提起”为首，再结一百零七人歃血结盟的故事。其中为首的人物是“师尊”万提起即万云龙；道光年间广西田林县天地会《会簿》中天地会结盟为首者是高溪庙的长老万提喜。1866年荷兰人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在荷兰殖民当局于苏门答腊巴东一家华侨家中搜获的天地会秘密文件中，提到的天地

① 《天地会》（一）第64页。
② 《天地会》（一）第87页。
③ 《天地会》（一）第86页。
④ 《天地会》（一）第86页。
⑤ 《天地会》（一）第91页。

会为首的结盟者是“达宗和尚”；在《贵县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中，天地会结盟为首者是长林寺的僧长万云龙，他号慈光，字达宗公。在《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中结盟为首者是洪大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西鲁叙事》中结盟为首者是“万大哥”、《西鲁序》结盟为首者是“达宗”，法名和满。光绪年间天地会《会簿》中的天地会结盟为首者“姓万名提起，法号云龙”。皆没有提到郑成功。

第二，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与郑氏本人实际情况不符。

抗清在郑成功一生经历中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他通过抗清斗争，从最初只拥有三四百人的小队伍，发展到北征前夕所拥有的二三十万人的大军，成为当时抗清阵营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在这期间，从未发现郑成功通过创立天地会以扩大队伍的任何史料。郑成功既然拥有强大的正规军队，又公开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天地会呢？

第三，以往认定天地会为郑成功或陈近南（陈永华）创始的主要史料依据，就是“西鲁故事”（从有陈近南之名可证）。可是，这些学者忘记了一件基本事实，那就是：如果天地会是郑成功在台湾所创立，那就应当在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以前。而“西鲁故事”却称天地会创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如果按照胡珠生的说法，天地会具体由陈近南（陈永华）为实际组织者，于康熙甲寅年创立，那么，“西鲁故事”就应该把西鲁入侵和天地会结盟的时间写作“大明永历甲寅”，因为，郑成功及其后继者郑经一直奉南明永历正朔，[①]不可能在天地会的文书里使用“大清康熙甲寅”这个年号。正如台湾学者张菼所指出：“如果是在康熙十三年，有明朝的正朔可用，为何不称“永历甲寅”呢？这是有背事理的。或许有人说当时不知有永历年号，但用永历年号从政的陈永华如果不知道有永历年号，那不是天大的笑话？[②] 以上事实说明，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三、天地会由“万姓集团”创立说难以成立

以往提出和论证此说的一些学者，很少提出具体的史料依据，大多属于推

① 温雄飞指出：“郑氏三世均奉永历年号，延明祚于一线。其实桂王已被杀，郑氏不忘故主，仍奉永历年号。

② 张菼：《天地会的创始年代与五祖为台湾人》，载《台湾风物》第三十五卷第2期，台湾风物杂志社，1985年。

测或曰“影射推求”。近年来罗炤先生则利用田野考察中找到的《香花僧秘典》,详细论证了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因此,需要认真加以探讨。

1993年,罗炤先生为了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曾不辞辛劳,多次到福建的云霄、诏安、东山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寻找天地会起源的史迹,并从1994年10月起,在《中国工商时报》上连续发表了长达138期的调研报告《天地会探源》。[①] 这份调研报告既为天地会起源研究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也留下了遗憾。罗炤先生在诏安县官陂镇山区找到了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长林寺”遗址及清人江日升《台湾外纪》中提到的“以万为姓”集团的一些遗迹,澄清了以往文献记载中的一些讹误,弥补了一些缺漏。如《台湾外纪》把“万姓集团”的大哥张耍(即万礼)误作“张要”;[②]而且对于“万姓集团”的成员,仅提到万大即万礼、万二郭义、万五道宗和万七蔡禄等人,而罗炤先生在调查中却得知“万姓集团”共有18人,除上述几人外,其他还有:平和县的叶冲、鲁英,诏安县的廖猛、刘阿贤,五通的黄靖,南陂的吴钩等人,使人们对“万姓集团”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③] 特别是在长林寺遗址中发现万五道宗自称长林寺“开山僧”等题字,证之卢若腾《赠达宗上人》[④]诗序所说道宗乃万礼之弟,说明《台湾外纪》中记载的“达宗”就是万五道宗。又通过访问,了解到万五道宗同档案记载的“万提喜”有密切关系。这些成果对于天地会起源研究,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但是,调查中找到的《香花僧秘典》却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罗炤先生在发现长林寺遗址后,就断言万五道宗就是天地会《会簿》中所说的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而“万姓集团”便是天地会的“根”。[⑤] 这一结论立即在当地引起轰动,在诏安官陂镇这个偏远的山区,天地会一时间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几乎人人谈论天地

①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0月19日起连载,每日一期,共138期。

② 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

③ 罗炤:《天地会探源》(50),载《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0月19日起连载,每日一期,共138期。

④ 翁同文:《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载新加坡《南洋大学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论文》,1975年12月。

⑤ 据史料记载,“以万为姓”集团是明季崇祯年间平和、诏安一带张耍等人,为了反抗“乡绅肆虐”而结成的异姓结拜组织,取万人同心之意而改姓万,史称“以万为姓”集团。见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3页。

会，个个研究天地会起源，还成立了“南少林与天地会研究会”。[①] “万姓集团”中万礼即张要的后裔，更是奔走相告，高兴地说：“几百年来我们一直被当做贼的后代，[②]抬不起头来。如今天地会是革命组织，我们也平反了！”在这种氛围下，人们便纷纷向调查者提供天地会起源的史料。罗炤在东山考察时，遇到了一位自称“香花僧”出身的道裕法师。道裕对他大谈天地会的历史说：“香花僧是天地会里的人，你们外人不知道，我知道。”并向他出示了一件手抄本《古来寺赞集》。因文内载有一些涉及天地会的内容，尤其是《源头小曲词》三段曲词的头一个字相连，便是“天地会”三字，《古来寺赞集》遂被确定为天地会的重要文件。

《古来寺赞集》属于香花科仪，其内容除了举行法会时的科仪外，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有关古来寺的历史。现据罗炤文章转引如下：（删节为罗炤原有，标点为罗炤所加，有误。）

古来寺溯源

古来寺原是苦菜寺，建于明成化三年，僧明雪熙贤倡建，原址龙潭山，后移至铜坑，去草字为古来寺。

古来寺源起莆田兴化府仙游（清源）凤山，相邻九座寺，咸通六年仙游度尾留埔村觉禅师倡建。僧人最多达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著称，传临济宗。明天顺六年该寺主持遣送熙贤到各地弘法。……成化五年熙贤广授学徒，……文武同修，僧众达五十余人，成为铜山十大庙之一。……

源头小曲词

靝为大公，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一理皆同。

地（古字）本威风，万水朝东，伸头露脚，一心尽忠。

会人曾僧，名山会灯，十八口日，一片利人。

……传至日瑞老和尚重兴，僧众派遣铜山各寺，……民国28年，楼胜利破除迷信改（解）散，此乃古来寺之简志。[③]

鉴于《古来寺赞集》中提及“民国28年，楼胜利破除迷信改（解）散，此乃古

① 汉杰：《东山县成立南少林与天地会研究会》，载《闽南日报》，1994年。

② “万姓集团”在当地打家劫舍，因此被当地百姓称为“老万贼”或“九甲贼”。几百年来当地人甚至用“九甲贼来了”来吓唬小孩，使之不敢哭闹。（见罗炤：《天地会探源》（43），载《中华工商时报》。）

③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45期。

来寺之简志”一语[①]故不可能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抄本。罗炤也认为《古来寺赞集》中有“不少文字应该是后人加上的，特别是里面记有民国时期的事情，显然不是很早的抄本”。[②] 道裕也承认：“这是我徒弟从拱清师父那里抄来的，他加上了一些”。[③] 后来，道裕又帮助罗炤在东山县一位周姓渔民家里找到了该件的全本，罗炤说：“全书没有题目，我名之为《香花僧秘典》。”[④]其内容除了讲述古来寺的历史外，还抄录了其他内容，包括“古来寺赞”、“法式规仪”、“法式物什”（即做法事时所用物件，有柳枝、桃剑等物）、“醮斋笼担物件”（36件法器及衣帽等），还有“净天地神咒”、“化莲堂歌”和赌博用的“花会”歌。

因“秘典”里写有天地会《会簿》中的人物，如吴天成、方大洪、李式开、郑君达、郑玉兰（莲）等，所以《香花僧秘典》的发现被认为是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重大突破”。[⑤] 有的学者说：《香花僧秘典》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天地会结盟仪式、会场陈设、联络暗号隐语、思想渊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依我看，对于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来说，这种价值，比起嘉道以及以后发现的任何一种会簿都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对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说来，却是一件具有重大价值的宝贵资料。它的价值在于，与天地会秘密文件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秘典》录自长林寺五祖词的《源头曲词》，通过藏头诗的形式，不仅点出了天地会会名，而且交代了‘会人曾僧’的真相，披露了天地会初期的组织成分。”[⑥]并且以《香花僧秘典》为基本史料依据，出版了专著。[⑦] 《香花僧秘典》既然如此重要，当然需要认真对待！

2005年周伟良教授在福建东山进行南少林问题的学术考察时，拜访了当地苦莱寺当家学宜（白文太），见到了《香花僧秘典》的真本《正源》，发现《正源》同《香花僧秘典》有着巨大差别，遂将此事告诉了笔者。笔者觉得《香花僧秘典》的真伪事关重大，遂邀同周教授等学者再次到福建东山拜访苦莱寺的白文太，

①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45期。

②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46期。

③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46期。

④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52期。

⑤ 邵雍：《天地会起源的重要突破》，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薛瑞禄：《天地会起源研究的可喜突破》，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

⑥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6—128页。

⑦ 赫治清：《清代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见到了该寺所藏《正源》的原件。我们把它同《香花僧秘典》相比较，发现《香花僧秘典》中那些有关天地会的内容，在《正源》里根本没有。我们向白文太请教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他回答说："香花僧"的文献有三种：一是香花僧念诵的"经文"；二是有关香花僧历史渊源的《正源》；三是"杂文"。前两种抄录者不得做任何改动，第三种"杂文"，抄录者则可以添加自己需要和感兴趣的内容。因为"香花僧"是靠超度亡灵谋生的，必须迎合社会上人们的需求和兴趣，所以在杂文中可以添加新内容。① 罗炤教授找到的抄本，就是"杂文"。这说明，《香花僧秘典》中那些有关天地会的内容，并非如某些学者所断言，大部分出自康熙年间万五道宗之手，而是抄录者自行添加上去的。当然，问题关键还在于"秘典"中有关天地会的内容究竟是乾隆或嘉庆年间之抄录者所添加，还是后人在转抄时所添加？"秘典"虽然写有"为纪念喝参莹公老和尚圆寂转抄了坚、达铉两和尚手书，嘉庆戊寅年阳月僧泽安书于凤山报国禅寺忠祖堂"，但从"秘典"内容判断，那些天地会的内容应该是后人转抄时所添加，而非原件中所固有。

我们把《正源》同《香花僧秘典》相对照，发现两者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有很大区别。为了使学术界对《香花僧秘典》有正确的了解，有必要把白文太先生出示的真本《正源》同罗炤先生命名的《香花僧秘典》加以比较。

《香花僧秘典》中《溯源》的原文如下(标点为罗炤所加，有误)：

"夫古来寺源承兴化清源九座寺，唐懿宗咸通年间，正觉禅师号曰智广上人倡建。凡寺九座相连，故称九座寺。时倡严整威仪，肃恭斋法，钵承南祖临(济)义玄禅师，广传临济正宗。寺僧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誉。后开辟南山广化，四众立堂，讲经说法，普利人天。明天顺间，大德主持随缘赴感，拈花悟旨，亲送寺祖明雪熙贤南下弘法。时居龙潭山涧，着忍辱铠，卧无畏床，坐法空座。时邑人赞其德，请师于苦莱寺，归众日增，名扬邑里，结文绅名士，论诗书礼乐。虑非发祥之地，请与怀恩沈公，选于五都之铜坑鼎见寺舍，广授教徒五十余人，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精通妙理，法脉滋长。"②

---

① 罗炤也认为："香花僧是以做佛事超度亡灵、祝福吉庆维持生计的一个特殊的佛教派别，为了能够吸引群众、争取到更多的佛事'市场份额'，他们对传统的法事仪规做了许多重大改革，不同于正统的丛林(禅宗寺院)佛事活动，从形式上更加热闹、丰富多彩，有非凡的吸引力，从内容上顺应民间的多神信仰的现实。"见罗炤：《天地会探源》(58)。

②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 年连载第 53 期。

据福建学者研究，在《溯源》短短的几百字中，就有诸多讹误。因而得出结论说：《香花僧秘典》乃是"史地与文化水平都比较差的某香花僧人，杜撰加抄袭，七拼八凑成册抄传下来的"。[①] 从内容来看，《香花僧秘典》确如白文太先生所说，属于"香花僧"文献中的"杂文"。那些同古来寺历史渊源无关的内容，如"花会歌"中有关天地会中人物的内容，就是抄录者自己添加上去的，因为在真本《正源》中根本没有其踪影。《香花僧秘典》中大量遗漏和讹误，也证实了福建学者的上述结论。

白文太先生出示的《正源》有暗红色木板相夹，并用土黄色布累层包裹。整份抄件共32页，楷书，无题名，其扉页上有三行字："古来院东园嗣法僧祖永重抄《正源》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十祖祀日"。

抄本前面一段内容主要讲述禅宗从第一代祖迦叶到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的法脉，接下来是讲九座寺的历史渊源：

开山九座寺智广禅师第一代祖师，临济正宗十四世，无尘塔为祖茔。

开基铜山苦莱寺明云熙贤禅师第一代祖师，临济正宗二十一世。

开山铜山五都古来院印来本源禅师临济正宗三十世。

九座法脉字辈

智慧清净　道德圆明　真如性海　寂寞普通

悟本正觉　继祖绍宗　广开心印 宏是宽容

九座寺联

创修历一十朝耿耿全精龙象伏

气量涵三千界巍巍宝殿凤凰仪

古来院联

古佛称正宗准乃慈悲含有济

来寺由本源提人觉悟总成真

苦莱寺联

準我慈悲救苦救难含有济

提人觉悟希圣希贤总成真

该抄件中关于禅宗达摩以后的法脉写道："祖于少林面壁九年，法传慧可大

① 杨美煊：《也谈九座寺与广化寺》，载《湄洲日报》1995年11月26日；蒋维锬：《〈香花僧秘典·溯源〉正误》，载《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5年第4期。

师，可传僧灿大师，灿传道信大师，信传弘忍大师，忍传惠能大师，能传南岳怀让，让传马祖道一，一传百丈怀海，海传黄檗，檗传希运，运传临济，济传义玄禅师，为临济宗第一代宗祖。"这些内容均符合禅宗的历史，根本没有《秘典·溯源》中所谓智广"钵承南祖临（济）义玄禅师"等错误说法。

该抄件明确写着"古来院东园嗣法僧祖永重抄"，时间是"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十祖祀日"，比周姓渔民所藏抄自嘉庆二十三年的抄本（即被罗炤命名为《香花僧秘典》）早八年。问题还在于《正源》中没有"秘典"中那些与古来院历史毫无关系的内容，如"花会歌"、"化莲堂名称歌"，也没有"秘典"里那些有关禅宗历史的常识性错误。

《正源》原文：

> 夫始祖于莆留坡智广上人，唐懿宗咸通乙酉开山九座山太平禅院，系南祖黄檗、嵩山、戒法、临无等禅师，参悟圆通……广传临济正宗，门叶繁荣五百余众，称南少林之誉。考师唐元和二年丁亥正月初九日诞，迄长嘉四年卯辰辞亲，投福州桃枝山出家。年登十八，越开成二年丁巳礼如愿禅师为之落发，继临济十四世。光启二年癸亥八月十一日示寂，计春秋八十，僧蜡五十脱凡，葬于西溪双峰之下，干宁中谥正觉祖师。后宋端明学士蔡襄题曰无尘塔，元佑元年泉州陈觉明丞相封慈应之称。明天顺壬午六年，明雪熙贤禅师劫逃南下，时居龙潭山间云坞石室。着忍辱铠，卧无畏床，潜修苦行。明成化三年，邑人赞其德，蒙黄刘檀樾叩关晋院厚黼庵，道风日着，檀信日增，募缘拓建苦莱寺，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结文绅名士，论诗书礼乐，宗风丕振。

接下来的内容是关于清初迁海使该寺化为灰烬，康熙壬戌（二十一）年，本源禅师在东坑重建古来院的一段历史。下面我们把《正源》同《溯源》相比较，问题就清楚了：

第一，《正源》明确提到莆田留坡的智广上人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开山九座山太平禅院。此处既未使用"九座寺"这个俗称，也没有"秘典"的《溯源》中"凡寺舍九座相连，故称九座寺"的错误说法，而是直接提到智广上人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开山于"九座山"的太平禅院。当地文史工作者说，太平禅院俗称"九座寺"，

是因为该寺周围有九座山峰。我们在该寺考察时看到情况确实如此！

第二，关于太平禅院法脉的传承，并非如《溯源》所说“钵承南祖临（济）义玄法师”，而是说智广“系南祖黄檗、嵩山、戒法、临无等禅师参悟圆通”。在《正源》里没有《溯源》所谓“后开辟南山，广化四众立堂，讲经说法，普利人天”一句，[①]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智广开辟南山广化寺庙的事实。据史料记载，广化寺创建于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初名金山院，智广在世的八十年间，广化寺一直名为“灵岩寺”，宋太平兴国初年(976年)始改为广化寺。这时，智广已经圆寂九十余年，不可能通过化缘“开辟南山广化寺”。[②]

第三，《正源》中详细地介绍了智广本人的经历：“考师唐元和二年丁亥正月初九日诞，迄长嘉四年卯辰辞亲，投福州桃枝山出家。年登十八，越开成二年丁巳礼如愿禅师为之落发，继临济十四世。光启二年癸亥八月十一日示寂，计春秋八十，僧蜡五十脱凡，葬于西溪双峰之下，干宁中谥正觉祖师。后宋端明学士蔡襄题曰无尘塔，元佑元年泉州陈觉明丞相封慈应之称。”这段重要内容恰好为“秘典”中《溯源》所遗漏。

第四，下面一段《正源》与《溯源》均提到，但文字略有不同。《正源》记为：“明天顺壬午六年，明雪熙贤禅师劫逃南下，时居龙潭山间云坞石室。着忍辱铠，卧无畏床，潜修苦行。明成化三年，邑人赞其德，蒙黄刘檀樾叩关晋院……募缘拓建苦莱寺，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结文绅名士，论诗书礼乐。宗风丕振，二百余众，兴少室而条昌。”《溯源》记为“明天顺间，大德主持随缘赴感，拈花悟旨，亲送寺祖明雪熙贤南下弘法。时居龙潭山涧，着忍辱铠，卧无畏床，坐法空座。时邑人赞其德，请师于苦莱寺，归众日增，名扬邑里，结文绅名士，结文绅名士，论诗书礼乐。虑非发祥之地，请与怀恩沈公，选于五都之铜坑鼎见寺舍，广授教徒五十余众，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精通妙理，法脉滋长。”[③]

第五，“秘典”中《溯源》遗漏了以下重要内容：“迄长庆四年甲辰，辞亲投福州桃枝山出家，时年登十八。越开成二年丁巳，礼如愿禅师为之落发，继临济十

---

① 该句罗炤断句有误：罗炤将该句断为“后开辟南山广化，四众立堂，讲经说法，普利人天”。于是得出结论说：智广通过化缘“开辟了南山广化寺”。（罗炤：《天地会探源》第56期）正确断句应该是：“后开辟南山，广化四众，立堂讲经说法，普利人天。”

② 蒋维锬：《〈香花僧秘典·溯源〉正误》，载《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5年4期。

③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53期。

四世。光启二年癸亥八月十一日示寂,计春秋八十,僧蜡五十脱凡……干宁中谥正觉祖师,后宋端明学士蔡襄题曰无尘塔。元祐六年,泉州陈觉明丞相加封慈应之称。明天顺壬午六年,明雪熙贤禅师,劫逃南下,时居龙潭山间云坞石室。着忍辱铠,卧无畏床,潜修苦行。明成化三年,邑人赞其德……募缘拓建苦莱寺,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结文绅名士,论诗书礼乐。宗风丕振,二百余众,兴少室而条昌。"这段内容与罗炤于 1993 年在考察时在由当地林振宁处看到的《重修唐正觉祖师本行》①和《仙溪志》中有关正觉生平的记载,大体一致。

第六,"秘典"中《溯源》随意抄录了许多与智广禅师和九座寺即太平禅院历史毫无关系的内容:

第一,《古来寺赞集》,包括《源头曲词》、《法事式仪规》、《法事什物》、《净天地神咒》、《红花亭赞曲》、《花会歌》与《化莲堂名称歌》、《木杨城曲词》等。其中《花会歌》、《化莲堂名称歌》里提到的人物有:天地会《会簿》中的吴天成、洪太岁、方大洪、林大江、方惠成、吴延贵、黄昌成、郑道德、李式开、姚(桃)必达、郑君达、郑玉兰(莲)等;《台湾外纪》、《先王实录》里提到的人物有:万九官(万里即张要)及郑成功的部将:周全斌、忠振伯(洪旭)、沈明、郑攀(擎)柱、张魁、萧拱辰(宸)、陈天(六)御、翁求多、余新、余宽、黄志高、卢若腾等;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船山、傅青主、黄南雷(黄宗羲),还把满族大臣明珠也列入其中。以上名单中不仅把清初的历史人物和天地会传说中的人物混杂抄在一起。而且,"秘典"还抄录了黄宗羲的语录:"南雷曰:通天地,恒(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王夫之的语录:"船山白:阴阳二气,充满太虚,天之象,地之形,皆其范围也。"顾炎武的语录:"亭林白:盈天地之间者,气也。"而且把黄宗羲所说"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天地会《会簿》中的诗句混杂抄在一起"乌龙渡江洪飘见,月伏波心水复潮;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四面八方都来到,五祖台前逞英雄;祖师传下一支香,高溪庙内把炉烧"。

上述内容说明《香花僧秘典》确如白文太先生所说属于"杂文",许多内容是抄录者自己加上去的,从其内容判断,抄录者乃晚清之人,是对嘉庆二十三年僧人择安手书的再转抄,在抄录时添加了晚清时期才出现的内容。(详后)

第二,在"秘典"的《花会歌》里提到的天地会《会簿》的人物中,出现了郑君

①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 年连载第 119 期。

达和郑玉兰(莲)等人的事迹,说明抄录者添加的有关天地会的内容,系抄录自晚清时期天地会《会簿》。据罗尔纲、翁同文等人对于天地会《会簿》的研究,认为贵县修志局本为最早的抄本,因为该抄本中尚没有郑君达等多余的故事,郑君达、郑玉莲的故事最早是在萧一山辑录的《西鲁序》和《西鲁叙事》中才出现的。[①] 而据萧一山考证,该两抄本均系“晚清粤人手抄”,[②]“盖同出咸丰时人手笔也”。[③] 据罗尔纲先生考证,贵县修志局本乃太平天国时期红巾军中陈开一支起义队伍占据贵县时所遗留。[④]

第三,道裕说,古来寺是“革命僧来东山建立”的,又说“古来寺是革清朝命的组织”。从《正源》来看,古来寺前身是苦菜寺,始于明代,康熙三年毁于迁海,康熙二十一年由本源禅师在东坑重建,把苦菜寺寺名中“苦菜”二字去掉草字头,称“古来院”,后升格为“古来寺”。并非道裕所说“革命僧来东山建立”,道裕的说法是为了说明天地会是“革命组织”而编造出来的。

第四,《秘典》中收录的许多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的语录,特别是有关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语录,在清初康熙年间尚不为人们所广泛了解。到了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被革命党人大力宣传,才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就连罗炤本人也对《秘典》中收有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人的语录感到“费解”。众所周知,王夫之在世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著名,就连罗炤也说“王夫之名声大著,是晚清以后的事”,“在道光时期之前,几乎淹没无闻”。[⑤] 特别是《秘典》中还抄录了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一书《太和篇》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秘典”产生于何时。我曾经为此专门请教戴逸教授,他说:“只要文件中有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肯定不是康熙年间的。”我又查阅了清代史学史著作,发现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著作,在他生前并未刊刻成书,直到同治初年才由曾国藩广为搜集,刻成

---

①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7 年,第 36 页;翁同文《今存天地会‘创会缘起’抄本的源流系统》,载台湾《东吴文史学报》,1986 年第 5 期;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载《清史论丛》,1993 年。

②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年影印。

③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三,第 8 页。

④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 36 页。

⑤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第 70 期。

《船山遗书》二百八十卷。[①] 康熙四十一年或嘉庆二十三年的人，是不可能见到，如何能将其抄入在《秘典》中呢？罗炤也承认，黄宗羲的一些先进思想，如《秘典》中引用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才产生强烈影响的，那么，康熙或嘉庆时的抄录者，又如何对之如此重视呢？这只能解释为抄录者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的人。

第五，《秘典》把清朝的"清"，写作三点水加月，天地会《会簿》中确有此种写法，不过，那是晚清时才出现的。迄今发现的天地会《会簿》中，无论是现存最早的"姚大羔本"（嘉庆十六年清吏所搜获）、道光八年广西田林县"杨氏抄本"，还是"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均未把"清"字写作"汌"。后来，天地会为了表示"满无头，清无主"，才把"满"写作"㳕"，把"清"写作"汌"。所以在萧一山辑录的《西鲁序》和《西鲁叙事》及《守先阁天地会文件》、荷兰人施列格及日本人平山周所见抄本、光绪年间洪顺堂抄本中才出现把清写作"汌"，把明写作"汩"的写法。[②] "秘典"中既然出现晚清时期天地会《会簿》中的内容，表明抄录者即抄自晚清时期的《会簿》，当然不可能是嘉庆时的僧人择安，而是抄录者对僧人择安抄本的再转抄。

第六，《秘典》中出现了"同盟会"字样。众所周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才建立的革命组织，康熙或嘉庆年间的抄录者，如何能知道后世会出现"同盟会"？

总之，通过对香花僧文献《正源》同《香花僧秘典》的比较，不难发现《正源》乃是苦菜寺（古来寺）保存的真本，而"秘典"乃是对《正源》的转录本，由于转录者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起码的佛教史知识，所以，在《溯源》部分出现了大量常识性错误。而抄本中有关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人物，乃是转录者为了迎合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兴趣和需求而添加上去的，所以，以此为史料依据所得出的天

---

①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写道："夫之家贫，著书纸笔多取给于门人故旧，书成因以付之，其收藏于家者甚少。且夫之自居遗民，窜身壮瑶敛迹匿影，当世鲜知之者，故亦无大力为之收辑，是以书多散亡。道光二十二年，邓显鹤、邹叔绩始刻《遗书》，共成百八十卷。咸丰四年，板毁于火。同治初年，曾国荃复出资重刊，广为搜辑，合以邹氏旧刻，共成二百八十卷，同治四年成于金陵，即今留传之《船山遗书》。"（《清代通史》卷上，第七篇《清初思想之大势》，第1007页。

②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第2—6页。

地会由万五道宗创立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四、天地会起源新论

天地会起源问题如此复杂，以至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难解之谜，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天地会创立之初，乃是由少数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后来该组织扩展为海内外举世瞩目的团体，却是天地会创始人所始料不及的，故未留下创会的文字资料。加之，初期天地会是个不合法的秘密组织，自然不敢把创始人的真名实姓，创立时间与地点，写入文件，以免被朝廷查获后一网打尽。所以，在天地会内部，首领、骨干与会众，均对该会之缘起讳莫如深。

第二，清廷虽然在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下令各省地方官员追究天地会根源，并且于乾隆五十四年查明了天地会的"根源"。但那时台湾林爽文起义早已遭镇压，起义首领或牺牲、或被俘、或被杀。清廷追究天地会起源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之，天地会创始人万提喜早已病故，清吏"查验骨殖属实"，因而不像林爽文起义初期那样重视天地会之根源。只是把追查的结果作为结案的档案，存入宫中，而这些档案中最关键的部分即闽浙总督伍拉纳等审拟提喜之子行义与嫡传弟子陈彪的奏折，直到1986年才被发现，公之于世。因此在这以前，人们无法了解天地会起源之真相。

第三，天地会内部曾将该会缘起巧妙地隐藏在洪门秘籍的"西鲁故事"之中。以前，学者们囿于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之定见，不是对洪门秘籍作科学的分析，而是采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方法，对西鲁传说的人物进行"影射推求"，从而使天地会起源之研究，陷于主观臆想之中。

第四，从20世纪60年代起，虽然有不少学者开始从官书、档案中探寻天地会起源，但是，一直未查到有关天地会起源的关键性史料。加之，这些主张以官书、档案为根据研究天地会起源的学者，又都忽视了对洪门秘籍的研究，故其结论，也未能为史学界普遍接受。

以往学者们在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时，往往把"天地会"同秘密会党、甚至

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相混淆。于是，只要见到史籍中提到某某会，甚至有人歃血结盟，结拜弟兄，便将其视为天地会，其实，这纯属误解。天地会虽以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成，但不等于所有歃血结盟的组织都是天地会，二者不应混为一谈。笔者认为，我们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首先不应拘泥于前人的结论，仅仅为前人的结论作论证、补充或加以诠释，而应大胆地探索。其次，应该既重视官书、档案史料，又重视洪门秘籍，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互相印证。最后，应该从清代秘密会党发展、演变的规律中去研究天地会的起源，而不是把天地会起源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单纯加以考证。

（一）天地会产生的根源

首先，天地会产生的历史根源。

天地会是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所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结拜异姓弟兄这种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在陈寿所著《三国志》中，已记载东汉末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的事迹，称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①] 至宋代，异姓结拜活动更广为流传，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五代平话》等，便分别描写了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的经过和黄巢与朱温"结义为兄弟"的故事。元明以来，结拜异姓弟兄之习俗已流行于民间，元明之际的评话与章回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皆曾对于异姓结拜弟兄的习俗加以描述。这些评话和章回小说，又推动了中国民间的异姓结拜弟兄活动。明末李自成少年时曾与同里刘国龙等三人"具牲醴诣关庙，仿桃园故事"结拜弟兄。[②] 成年后又与高闯王"欢如鱼水，同至土山，结为兄弟，宰马设誓云：'患难相扶，富贵共享。若有二心，神其不佑！'"[③]

清初，异姓结拜弟兄的活动仍然存在，而且逐渐发展为结会树党的"会党"。所以，清代会党经历过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步发展过程。最初仅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存在，后来发展到"立有会名"，最后才成为比较完备的秘密会党。天地会正是清代秘密会党发展到完备阶段的产物。

---

① 陈寿：《三国志》卷三六。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义》，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11 页。

③ 《李自成起义》，第 112 页。

清初顺治年间，异姓结拜弟兄的规模较小，最初，还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所以清廷虽然禁止，但对违犯者也仅处处"鞭一百"的惩罚。顺治末年，这种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已逐渐带有反清政治色彩，因而将违犯者处以死刑。康熙年间也有许多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有的规模已相当大。但是，从其组织状况和活动内容来看，还比较简单，主要是以歃血结盟、焚表盟誓的方式结成，其活动大多属于武装反清，而且还未出现会名，与后来的秘密会党相比，尚不完备，仅处于秘密会党的萌芽阶段。到了雍正与乾隆前半期，秘密会党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始立有会名，雍正年间有铁鞭会、铁尺会、父母会等，乾隆初年有子龙会、小刀会、边钱会等。雍正、乾隆之际，在四川的外省移民里还出现了以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的武装团伙，当地人称之为"啯噜子"。经过雍正及乾隆前半期的发展，秘密会党无论在组织形式，结盟仪式及活动方式等方面均已逐渐成熟与完备。乾隆二十六年天地会的创立，便是秘密会党走向成熟与完备的标志。天地会在结盟仪式上，不仅有一般结拜弟兄时的歃血与焚表盟誓，而且要举行"钻刀"仪式，即仪式主持人用两手执刀或剑，斜架作叉，令入会者从刀、剑下钻过，然后在神像前立誓："有忠有义刀下过，不忠不义剑下亡。"并用"三八二十一"暗隐洪字，会众见面时，以"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还编了许多诗句歌诀，并将"洪"字嵌入"逆诗"。[1] 后来，天地会的仪式与隐语、暗号发展得更为复杂与完备。这些，都是以往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所没有的新内容。到乾隆中期，清廷虽然尚未发现天地会的名称，但对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新内容、新特点，也已经有所觉察。因此，在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大清律》时，便将一般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同"结会树党，阴作记认"这种较成熟的会党加以区别。清律载："闽省民人，除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仍照定例拟以绞候，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审实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拟以斩绞外。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2]清代会党的发展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像天地会这样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备的秘密会党，绝不可能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只能在秘密会党逐步发展完善以后，才可能出现。

其次，天地会产生的经济根源。

---

① 见《天地会》(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522—527 页。

② 《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

秘密会党的发展、完善与天地会的产生，也是清初以来经济发展的结果。清初顺治与康熙前半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均遭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之苦，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经济凋敝，人口剧减。到康熙中叶以后，江南和东南采取的恢复社会经济的各方项措施已经发挥作用，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甚至超过了明代最高水平，清王朝的历史，步入了“康乾盛世”。在东南沿海一带，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农村租佃关系的变化，分成制已转变为定额租制，特别是永佃制的流行，提高了广大佃农的劳动积极性，他们愿意并可能对所耕土地投入更多劳力与工本。加之耕作技术的改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为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闽南一带，大量种植茶叶、烟草、甘蔗及各种水果，广大农民同市场发生了联系，突破了我国几千年来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经济作物的发展，又带动了手工业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许多人便从传统的农业中解脱出来，从事手工业、商业的经营。于是在城乡出现了大批流动人口。乾隆前半期我国人口的激增，更加剧了福建各地人多田少的矛盾，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了流动人口的行列。据统计，清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五千多万，到乾隆初年已增至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三十年，更增至二亿以上。[①] 清廷虽然大力鼓励垦荒，使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但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清初，福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尚有 17.11 亩。到乾隆三十一年，已减到 1.71 亩。[②] 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涌入城镇市圩。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是，因受到封建制度的钳制，不可能真正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城市中的工商业，不仅经营范围狭小，主要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服务，而且规模也不大，很难容纳农村涌入的大量过剩人口。大量农村人口只能充当小商小贩、雇工、小工业者、水陆沿线的运输工人，或者成为没有固定职业的无业游民。这些人背井离乡，身居异地，谋生维艰，亟须把各自微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通过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求得立足之地。这样，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又受到钳制与阻碍，使大批流动人口难以谋生存活，从而为秘密会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

① 杨其昌:《清代人口问题及其历史教训》,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

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91—396 页。

最后，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雍正至乾隆前半期闽南一带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加速了秘密会党的发展，成为天地会产生的重要社会根源之一。一个重要社会矛盾是宗族械斗，而械斗背后，往往隐藏着阶级对立与斗争。宗族械斗一般是豪强大族欺压小姓小族所引起的。雍正五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查福建漳、泉二府，民间大姓欺凌小族，小族亦结连相抗，持械聚众，彼此相杀"。[①] 雍正六年高其倬又奏："查闽省同安大姓李姓、陈姓、苏姓、庄姓、柯姓合为包姓。小姓各杂姓合为齐姓，彼此聚众列械格斗，互相伤杀。[②] 雍正七年，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也奏："查泉属七县，晋江、南安、同安最为难治。安溪、惠安次之，永春、德化又次之。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联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者。"虽经清政府"严饬地方官查拿禁止"，械斗之风稍有敛戢。但官府的查禁，只能使一般的宗族械斗有所缓和，而对于那些有政治靠山的豪强大族，却毫无效果。据刘师恕奏："晋江之施家即施世纶、施世骠之族也。人丁最多，住居衙口，石上、大诸村，贩私窝匪，强横无比。"[③]乾隆前半期，因大族大姓欺压小族小姓而引起的械斗事件，仍不断发生。福建巡抚陈弘谋奏："闽省山海交错，风俗犷悍，尚气好事。大姓恃其族众，欺凌小姓。小姓联合数姓，抵敌大姓。凡遇地土告争，口语微嫌，动辄号召多人，列械相斗。虽云斗殴，俨同厮杀。更有预为议定抵命之人，然后出斗者。通省命案，起于械斗者居多，漳、泉二府尤甚。"[④]宗族械斗中大族大姓欺压小姓，小族小姓为了与之相抗，便采取结拜弟兄的办法，"化异姓为同姓"，以增强其间的凝聚力。所以，宗族械斗的存在与加剧，也是造成秘密会党发展的重要原因。

乾隆前半期，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分化与贫富不均，也促成了秘密会党的发展。当时，闽南一带大批穷苦人民难以谋生，便被迫铤而走险，从事偷盗、抢劫、绑架勒索等活动。为此，往往需要纠集多人，于是也采取结盟拜会的办法，把那些贫穷无告者聚拢起来。福建云霄一带，"其地所生，不足以供其所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9辑，福建总督高其倬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年。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高其倬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③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4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折，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

④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第163页。

食。招朋呼类，四五成群，即能为盗"。[①] 同安县"游手攘臂之徒，纠伙结盟，各立门户，寻事生风，殃及绅衿"。[②] 那些从事肩挑负贩、开小店铺、摆地摊的小商小贩们，为了免遭偷窃、抢劫，也纷纷加入秘密会党，以寻求保护。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后被捕的天地会骨干中，有许多都是为免遭抢劫而加入天地会的。如许阿协供：广东饶平人，常到邻近的闽南平和县小溪地方贩卖酒曲。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十八日，他携带银两赴平和小溪赖阿边处购买酒曲，途中被天地会内之人将所带银两抢去。他将此事告诉赖阿边后，赖阿边对他说："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便与他一同"焚香拜会"，赖果然将被夺银两讨回还给许阿协。另一名会内骨干赖阿恩，也是广东饶平县人，儿子在福建漳州唱戏。他在赴漳州探望儿子时，于途中被会内之人将衣物抢去。他将此事告知漳州戏班梁阿步后，梁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赖阿恩遂与他一同结拜。梁阿步不但为他讨回被抢之衣物，还传授他以后在路上遇到天地会内之人抢劫时对付的办法。对他说：如遇有人拦路抢劫，"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的心坎"，对方就不抢了。[③] 上述史料虽出于天地会创立之后，但也可从中看到乾隆年间一般下层群众为了免遭抢劫而加入秘密会党的情况。

（二）天地会由万提喜创立的史料依据

我们通过对清代官书、档案、洪门秘籍及田野考察实，断定天地会的创始人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创立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创立地点在福建云霄高溪（清代属漳浦县）。

官书、档案中的记载。

在清代官书《清高宗实录》、《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等史料中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记载，主要是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清廷下令各省（福建、两广、云贵、四川）地方官员追查其"根源"过程中所形成。官书是依据档案原件编成，仅略有删节、修改，内容与档案大体上一致，只是档案记载更为原始、可信。

---

① 《云霄县志》卷三，风俗。

② 《同安县志》卷十四，风俗。

③ 《天地会》（一）第70—71页。

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清吏从被捕者供词中得知天地会的存在，当即对天地会之根源进行追查。是年正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常青奏：据被捕者杨振国即杨咏与杨轩供："这天地会是（乾隆）五十年十二月里，有漳州平和人庄烟即严烟过台来兴起的。小的们听得严烟说及起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凤花亭（疑即会簿中之红花亭——引者），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哪里。"[①]并将此事移咨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孙士毅，希望广东协助查拿洪二房与朱姓二人。正月十二日，孙士毅接到常青有关咨文，随即奏称："闽省来文虽未开明何府何县人氏，但据讯供，天地会名目，起于逆犯林爽文，而根源由于该二犯，则该二犯平日必系素为众匪信奉亲近之人。实系何府何县人氏，伙犯断无不知之理。"故一面札复常青，"如再获有他犯，将洪、朱二犯籍贯究讯明确，立即移知到臣，查拿更易"。[②] 乾隆帝接到常青等奏折，即于同月二十日发出上谕："台湾逆匪倡立会名，戕官占城，实属罪大恶极。""至所供其会根由，和尚洪二房并姓朱的俱是广东人，朱姓年只十五六岁，何能纠聚匪徒，兴起会名，辄敢有谋叛等事？恐即系洪二房依附朱姓名目，从中煽诱。又如从前朱一贵谋逆情事，皆未可定，不可不严行根究，著传谕孙士毅查明后溪凤花亭究在何府、州、县，即将和尚洪二房并朱姓严密踩缉，迅速查拿。"[③]三月十一日上谕略谓：据李侍尧奏，搜出贼匪书稿内，有广东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洪姓结盟之语，是即系从前常青究出之广东洪二房和尚及朱姓人犯。此系案内倡会结盟要犯，著传谕孙士毅无须严饬所属，设法踩缉，务须弋获。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疑系三月——引者）二十二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称：前接常青知会，当即遴委干员严密查访，经臬司姚棻遍查惠潮等属，又并无其地。惟风闻嘉应州遂乡堡地方，庙后有亭，其后半被火烧毁，内有洪和尚及朱姓等。当经姚棻派惠州府知府顾声雷驰赴确查，并无遂乡堡及被烧庙宇。据嘉应州知州戴求仁查得，离州三十余里之灵峰寺，有洪朗、洪科二僧，与俗家朱姓十七八岁僧人立嵩同住，与闽省来咨恰合。经派员搜查，寺僧七人，并无不法字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常青折，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天地会》（一）第64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孙士毅折，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二日。

③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日"上谕"。

迹，所供住址、族属，俱在附近，历历可查。左右并无溪亭，寺后亦无曾经被毁之事。传讯寺邻保甲，佥供平日并无为非，愿具保结。饶平、海阳县所获姓洪之耀珠和尚及其子、僧人秀节，亦非此案正犯。断不敢听属员锻炼邀功，累及无辜。[①]对于此奏，乾隆帝于四月初九日上谕中称：粤省访出之洪姓和尚等，既讯非此案匪犯，自不必累及无辜。但提醒孙士毅：外省地方官习气，往往回护前非，于缉捕事件一经查无踪迹禀报之后，即或续行查出，虑及前此查办疏漏，恐致获咎，不肯据实秉出，一以乌有完事，捏饰于后，最为可恶可畏。著传谕孙士毅务宜详悉开导，谕以：该犯等现虽查无下落，如将来查有凤花亭等地名，仍挡据实禀报，其从前疏漏之咎，俱可宽免。倘从此跟求，果能弋获正犯，并可仰邀升擢。[②]

不久，广东饶平县即捕获天地会成员许阿协等四人。

许阿协供："小的系饶平县上饶乡人，年三十岁，平日卖酒曲生理，常在福建平和县小溪地方赖阿边曲店贩曲，零卖度日。上年十月初八日，带番银至小溪买曲，路过麻塘地方，被四五个不识姓名的人，将番银抢去。小的到赖阿边家告知，赖阿边说，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以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小的一时情急，当即应允，与赖阿边并与他兄弟赖阿立，一同焚香拜会，就将抢去的银子替小的要回，叫小的路上行走，如遇抢夺的人，伸出大拇指来，便是天字，要抢夺的人必将小拇指伸出，就是地字，彼此照会，就不抢了。并说：如遇会中的人，吃烟吃茶都有暗号，又教小的诗句两首，小的记得不清，只记得内有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两句。这木立斗世，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二年，世字系因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故借这世字暗藏的。"[③]

赖阿恩供："小的饶平县小榕乡人，年四十二岁。小的儿子赖娘如年十六岁，向在漳州福兴班唱戏。上年七月内，小的带了三件衣服，衣包一个，在家起身到漳州去看儿子。将近漳州路上，被三四个不认识的人赶来抢去。小的赶到戏馆里，告诉有管班的梁阿步，是闽省龙溪县埔南墟人。说你只要人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小的听说可以讨回衣包，就依允了。梁阿步叫小的烧了香，拜了天地，他就传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孙士毅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九日，《天地会》(一)第90—91页。

②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九日"上谕"。

③ 《许阿协等人供单》，《天地会》(一)第70—71页。

授小的暗号。如遇有抢夺东西的人,叫小的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抢了。又说举大指为天,小指为地,又传授小的四句诗,小的还默写得几句,头一句是日月车马三千里,第二句忘了,第三句是木立斗世知天下,第四句是顺天行道合和同。又说:如说破机关死作刀下之鬼。若不说破,万代富贵。"①

林阿俊供:"小的年四十四岁,饶平县小榕乡人,小的儿子林阿真与赖阿恩的儿子赖娘如,同在漳州福兴班唱戏。那管班的梁阿步原与小的相熟。小的去年十月里到漳州去看儿子,给小的些银钱回家。梁阿步说,这路上不好走,须防人抢夺。小的问他,他说只要你入了天地会,就没事了。小的糊涂应允,他就叫小的当天烧香立誓说,如说破机关,死作刀下之鬼。若不说破,万代富贵的话。路上如有人拦抢,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胸,就知是会中人。原有几句诗教小的,小的还记得:触破机关定不可,忠义存心不可忘二句。"

涂阿番供:"小的是平和县小榕乡人,年四十七岁,平日在墟上卖饭过活。有福建诏安县人黄阿瑞,常到小的乡里趁墟贩卖木桶。买小的饭吃,欠小的饭钱。小的向他要钱,他说我们漳州有天地会,若入了会,便有好处,并教小的以大指为天,小指为地,吃烟用三个指头接烟筒为号。小的问说有何好处?他说你若到福建路上,遇有抢夺的人,做暗号给他看,就不抢了。小的因没事要到福建去,就没听他的话,也没有与黄阿瑞拜会。"②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两广总督孙士毅等奏,饶平县又捕获天地会内林功裕一名,供称:向在闽省平和、漳浦各处唱戏,与平和县林边乡人林三长认为同宗。上年六月,林三长勾引入会,令从剑下爬过设誓,教以三指拿烟、吃茶,及遇抢夺之人,用三指按住胸膛为号。问从哪里来?只说水里来三子,便知同会。再,传授歌句有:"洪水漂流"及"桃李红"、"木立斗世"等字。林三长曾告以:"有朱洪德,系食仙桃孕生,约有十五六岁,系闽省诏安县云霄人张扳桂告知,该犯并未见过朱洪德等语。"③

林功裕原供词称:"小的是饶平县南陂乡人,今年二十七岁,父母俱故,兄弟二人。哥子阿店,小的过继堂伯林阿发为嗣,平日到漳浦、平和各县唱戏度活。

---

① 《许阿协等人供单》,《天地会》(一)第71页。

② 《许阿协等供单》,《天地会》(一)第72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孙士毅折,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天地会》(一)第86页。

(乾隆)五十年间,小的在平和县地方唱戏,有林边乡人林三长到戏馆闲坐,与小的认为同宗。上年五月,小的聘定平和下寨乡周杰的婢女为妻。林三长对小的说:尔定了老婆,须入天地会才好娶回,小的应允。六月二十四日,林三长叫小的到他书房,用桌子供设香炉,把剑两把义(叉)地下,叫小的由剑下走过,发誓若触破事机,死在刀剑之下。并教小的用三指接递烟茶,如路上有人抢夺,把三指按住胸膛,即可无事。同会的人查问,只说是水里来的话。又教小的诗句:洪水漂流泛滥于天下,三千结拜李桃红,木立斗世天下知,洪水结拜皆一同。林三长又说:有个朱洪德,系食仙桃孕生,约有十五六岁,是闽省诏安县云霄人张扳桂向他传说的,并没有说及洪李桃是头人。"①

据许阿协等又供:"所传歌句尚有:洪水横流李桃洪,李朱洪,及兄弟结拜共姓洪等字。"又称:"赖阿边勾引入会时,曾经告以洪李桃系头人姓名,是福建汀州人。"赖阿力则称:"梁阿步勾引入会时,曾经告以有本会头人洪李桃,年四十多岁,俗家住彰浦县榕树脚,向在漳州龙溪县东门外福连寺做和尚。"林阿俊则称:"梁阿步勾引入会时,告以头人系李九陶,是平和县小溪乡人。"②

乾隆帝接此奏折,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谕闽浙总督李侍尧、两广总督孙士毅、福建巡抚徐嗣曾等略谓:林功裕供出之朱洪德、洪李桃等,与闽省从前究出之后溪凤花亭洪二和尚及朱姓形迹相同,或即系洪朱二犯,亦未可定。此系倡会结盟、煽惑人心首犯,不可不严缉务获,根究党羽,以尽根株。现据所供姓名、住址,俱在闽省,且有记号歌诀,转相纠约,抢夺财物。是该犯等在闽生结会滋事,竟系明目张胆,毫无忌惮。著传谕该处,将朱洪德、洪李桃二犯严缉务获,讯明伙党。③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在台湾主持镇压林爽文起义的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与鄂辉同奏:"台湾民刁俗悍,抢窃成风,结会拜盟尤为恶习。所有天地会名目,起自内地,展转私传。""臣等到台湾后,屡将天地会根由讯问贼犯,仅知取烟吃茶俱用三指,说话不离本字等暗号,不能备悉其详。""随思严烟系首先在台湾传会之犯,且系有名贼目,必须严拿根究。当即严密查缉,已将该犯拿获。

① 《林功裕供单》,《天地会》(一)第87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孙士毅折,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天地会》(一)第86页。

③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上谕"。《天地会》(一)第87—88页。

臣等亲加严讯，严烟即系庄烟，又名严若海，系漳州平和县人。于乾隆四十八年借卖布为名，来至台湾。四十九年在溪底阿密里庄传授天地会。"臣等以该犯既系台湾首先传会之人，则天地会传自何人，起自何地，必知备细，向其逐一根究。据供：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份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又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府来到漳州诏安县云霄地方传会。有个张姓，不知名字，因面上疤痕甚多，号破脸狗，他常留赵明德等在家居住。附近高坑庵、马坑庙、丁仔峡、石礤尾溪，都是传会之处。乾隆四十八年，陈彪借行医为名，到平和县才传我入会的。这些人是陈彪告诉我的，其实都未见过。又闻得陈丕也曾到过台湾传会，如今早回内地去了等语。又供：凡传会，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也不写帖立簿。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同传会的李姓，实在不知名字。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暗号，所以叫洪二房。贼旗上书写洪号字样，并有五点二十一隐语，都是取洪字的意思。晓得暗号就是同会，即素不认识之人，有事都来帮助等语。复严究此外有无不法语句，据该犯供出木立斗世，及李朱洪等暗号，与孙士毅从前查奏之语，大略相同。①

严烟即严若海原供称："我系福建平和县人，年二十七岁，父亲严国，母亲许氏，俱已身故。""我向来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我村上有个行医的陈彪，系广东人，劝人入天地会，我也随同入了他的会，于四十八年来至台湾，在彰化地方开设布铺，也时常引人入天地会。""天地会名目因人生以天地为本，不过是敬天地的意思。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至此教起自何年，我实不能知道。但听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说在四川。万和尚传

①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五十八，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等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天地会》(一)第97页。

教，闻说在广东。即陈彪告诉我的时节，他亦不能记清年份，指定地方，我更无从晓得。”“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至二房上加增红字，及用洪字作暗号，说（陈）彪说，都是朱、李二家传下的，实未告诉我别的缘故。及作何讲解，不敢妄供。”

又供：我只知道陈彪是广东人，实不知道他住在何州县村庄。至朱鼎元、马九龙，据陈彪说都是远年之人。万和尚及赵明德、陈丕，也都是陈彪告诉我的，我并未与他们见过，实不知道他们的地方住址及现在下落。”①

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据张破脸狗供，“向无行业，以开场窝赌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夏间，有广东人赵明德、陈丕、陈栋三人，曾到该犯家内聚赌。赵明德等告以在广东曾入天地会，已传有四五十人。劝令亦入此会，该犯即行听从。及诘以结会后有何好处？据供一入此会，就有同会之人相护，开赌便不怕人搅乱。其传授暗号，只是吃茶吃烟俱用三指。如有人问及有无兄弟，答左右俱有兄弟，便知是会中人。”又供：“赵明德系潮州府大埔县人，在东门外下寮乡住，年约五十余岁。陈丕、陈栋亦系大埔人，年俱约三四十岁。② 并将此事知会两广总督孙士毅。

关于赵明德、陈丕、陈栋三人情况，图萨布奏：“拿获天地会匪犯陈丕，讯供究出传会之僧人提喜，籍隶福建彰浦县，住在高溪乡观音亭。又同会之陈彪，住在平和县云寮乡，赵明德住在彰浦县云霄城北内仓边巷。”③

两广总督孙士毅接到李侍尧有关赵明德等人下落的咨文，立即密令潮州府知府孙泳及因公来潮办事的普宁县知县许宪，连夜赶赴大埔。孙泳等调查了保甲底册，通县共二十甲，并无下寮乡村名，亦无赵姓烟户。复查户口最多之古源、源高、大麻三甲，间有赵姓居住，俱无赵明德其人。至陈丕、陈栋二人，来咨并无住址，遍查通县各处，陈姓烟户较赵姓为多，势难人人传齐，因令各属耆老到案，讯据供称，族内实无陈丕、陈栋二人出外之事，倘将来究出实有其人，我等情愿一体治罪。④ 乾隆帝接到孙士毅此折，于六月十七日谕令闽浙总督李侍尧、

---

① 《审讯严烟供词笔录》，《天地会》（一）第110—112页。

②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六十一，闽浙总督李侍尧折，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天地会》（一）第104—105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八。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孙士毅折，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天地会》（一）第114—115页。

广东巡抚图萨布：将张破脸狗详悉根究，务将越明德、陈丕、陈栋等实在下落究出，严拿务获。[1]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四川总督李世杰接到上谕：前据康安奏，严烟供称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传自四川，既有此供，且指出系朱姓、李姓所传，未可因年份久远，且无实在下落，遂置之不问。于七月四日奏称：前在川任职共八年有余，一切风土民情，时加访问，并未闻有天地会名目。本年调任以来，又密加稽查，并无天地会名色。兹据闽省拿获首先传天地会之严烟供称，此会是朱姓、李姓传自四川，朱姓名朱鼎元等语，虽未将该犯等籍贯、住址供指明白，但既有此供，必非随口捏混，自应严密稽查，俾令根株净绝。现在不动声色，密札司道等官，饬属在于四境留心察访，如果有传习天地会之人，即行掩捕穷诘务得实在下落。[2]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四日谕李侍尧、孙士毅：据严烟供出，从广东人陈彪传教，伊（乾隆）四十八年到台湾时，陈彪尚在漳州。又有赵明德、陈丕，俱在福建各处传教。又万和尚涂喜，在广东传教。所供必非无因。自必尚在闽粤一带藏匿，著李侍尧、孙士毅再行饬属妥密缉拿务获。

七月十五日，李侍尧奏：上年在漳州办案时，于审办漳浦张妈求案内，有陈檀等六十余名；陆续拿获已经审明者陈德意等十名；审拟外遣之吕阿河等三十二名，并张破脸狗供出之郑成、郑诗二人，先后共获犯四十九人。每于获到各犯饬审时，务将起会根由穷加究讯，并究明有无转传及相识内有无入会之人。一经供出，立即密饬访拿。[3] 并于奏片中称，"前据张破脸狗所供赵明德乃广东大浦人，而据孙士毅咨以广东潮州府大埔县并无其人其地，亦无大寮乡村名。经复审，张破脸狗供称：我并无到过广东赵明德等住处，系伊自己向我说知，并非捏造。是赵明德确有其人，至居住不实之处，或系当日该犯诡说地名，亦未可定。现尊旨派委署邵武府同知李浚原，将张破脸狗解赴广东，交图萨布讯究"。[4]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三日谕闽浙总督李侍尧、四川总督李世杰、广东巡抚

---

①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天地会》（一）第117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四川总督李世杰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天地会》（一）第126—127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李侍尧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天地会》（一）第130—131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李侍尧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天地会》（一）第131—132页。

图萨布等："严烟所供天地会来历并传教人犯，凿凿有据，且前后讯供如一，必非无因。著传谕李世杰、图萨布严密查访，如有严烟等供出各犯踪迹，不可以现查无获遂回护前非，不肯认真缉获，致要犯远飏漏网。其陈彪各犯，俱曾至闽省传教，或目下仍在闽省藏匿，亦未可定。并著传谕李侍尧再饬属一体严缉，亦不可因前此查无该犯等下落，遂存回护。"①同日谕刑部堂官：即将严烟严行审究，并加刑讯，务令将天地会名目实在起自何处，传自何人之处，一一据实供吐，毋得任其再有狡展。②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图萨布奏：张破脸狗于八月初十日解到广东，督同臬司许祖京等复加严讯，据供：平日在家窝赌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五、六月内，有陈栋、陈丕到家赌博数日，他们都说是广东大埔人。因彼此熟识，遂告知曾入了天地会，遇事有人帮助，不怕欺侮，并劝令入会。我因现开赌场，恐人骚扰，故此听从他们，不久也就去了。到四十八年，陈丕又同赵明德到家，说是同会之人。赵明德极称天地会好处，因问他籍贯、住址，他说是大埔县东门外下寮乡人。当诘以：你在福建供称赵明德系四十六年同陈丕、陈栋到家劝令入会，如今又说赵明德系四十八年才来，因何前后互异？到底传会的人现在住居何处？陈栋是否即系陈彪？又供：当日委系陈栋、陈彪先到，劝我入会。那赵明德实系四十八年才来，我当初因同是会内之人，原无分别，是以信口供出。至他们姓名、住址，俱系亲对我说的。至陈栋年约三四十岁，是否即系陈彪，实不知道。③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谕闽浙总督、协办大学士福康安：据图萨布奏，拿获天地会匪犯陈丕，讯供究出传会之僧人提喜，籍隶福建漳浦县，住在高溪观音亭。又同会之陈彪住在和平县云寮乡，赵明德住在漳浦县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已飞咨闽省严拿务获，现将陈丕确审定拟。著传谕福康安：即督饬所属，按照该犯住址，严密查拿务获，毋令闻风逃窜。④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谕闽浙总督、协办大学士福康安：魁伦奏据漳

①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三日"上谕"，《天地会》(一)第128页。

②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三日"上谕"，《天地会》(一)第129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东巡抚图萨布折，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天地会》(一)第133—136页。

④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上谕"。

浦县报称，于该县高溪地方拿获僧人行义，供称伊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其赵明德一犯，亦称系漳浦县人，现已飞饬漳州道府查拿务获等语。嗣据图萨布奏拿获陈丕一犯，究出洪二和尚，现在彰浦县地方居住，是洪二和尚实为此案要犯。虽据伊子行义供称洪二和尚业已身故，所言殊不足信。著福康安将行义一犯严切根究洪二和尚实在下落，是否身故，并将赵明德一犯，一并饬属严拿务获，讯究起会根由，毋任狡饰。[①]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谕闽浙总督、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广东巡抚图萨布：福康安等奏，拿获天地会内陈彪及首先传会僧人提喜之子行义，据行义供父提喜即洪二和尚，在观音亭为僧。行义本名郑继，后为僧改名行义。伊父在日，曾教过三指诀，原为诓骗银钱，并无别故，亦未传与别人。陈彪则坚供实不知洪二和尚传自何人，必有不实不尽之处。且所供提喜已无其人，及并未纠人入会之处，更为狡展。今既据行义供认伊父提喜即洪二和尚，是提喜为此案正犯，已无疑义。若指出其父葬地，即可完事矣。从前严烟所供起自川省，显系狡展。著传谕福康安：务向行义设法严刑究讯，伊父所传之人除赵明德外，尚有何人，逐一吐供，按名查拿务获。其提喜一犯是否尚在，即或实系病故，亦须得有确据，不可因行义有业已病故之供，遂尔不行深究，以致要犯得以漏网。[②]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日上谕：图萨布奏，审讯天地会匪陈丕，籍隶福建彰浦县，三十二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后因同乡人卢茂等破案治罪，即害怕在家耕种，并无陈彪传授，亦未到过台湾。虽该犯所供与陈彪在闽省所供稍异，但既与张破脸狗同拜提喜为师，入会多年，未便因供情稍有未符，辗转咨查，徒滋延宕，请将陈丕拟绞立决。乾隆帝以为陈丕虽未据实吐供，但若将其正法，嗣后拿获会中人，转因质证无人，难于逐细跟究。况陈彪及提喜之子行义，俱经闽省拿获，自应将其解赴福建，严加审讯。于是传谕图萨布，派委妥员兵弁，将陈丕解交闽省，与已获之陈彪质讯，或能从此究出会内要犯，亦未可定。[③]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六日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奏："上年（按：指乾隆五十三年——引者）十一月内，据平和、漳浦二县拿获天地会匪陈彪、僧行义二犯，解省经前督臣福康安会同臣徐嗣曾提犯严讯。缘犯供游移狡展，未

①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谕"。

② 《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上谕"。《天地会》(一)第139—140页。

③ 《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日"上谕"。《天地会》(一)第140页。

閩浙總督臣覺羅伍拉納
福建巡撫臣徐嗣曾 跪
奏為審明會匪陳彪等切實根由定擬具
奏仰祈
聖鑒事上年十一月內據平和漳浦二縣拏獲天地
會匪陳彪僧行義二犯解省經前督臣福康安
會同臣徐嗣曾提犯嚴訊録犯供游移狡展未
意實圖不軌藉此結盟糾衆煽惑人心迨至三
十三五等年疊次破案之後此風稍為歛匿至
四十四年提喜於臨終時復傳伊子行義而陳
彪餘孽復萌又敢傳習舊語誘以入會之人遇
事有人幫助愚民又為蠱惑遂及嚴烟傳之臺
灣致林爽文藉以滋事則四十四年之後該犯
等或又潛圖為匪斷非僅止騙錢且轉傳必廣
斷非僅止數人況經疊蒙

伍拉纳、徐嗣曾有关天地会起源之奏折首页

尽确实，尚须彻底究讯。经福康安会同徐嗣曾将陈彪、僧行义隔别研讯，据供提喜实系四十四年三月身故，已经烧化，捡入瓦罐，葬漳浦仙峰岩。罐上有瓦狮子一个，当即暗为存记，飞饬汀漳龙道德明额亲赴该处查起瓦罐骨殖解省。臣等查看，罐面果有半破瓦狮，并令行义滴血验试无异，是提喜之久经病故，似无疑义。适福康安调任两广，臣伍拉纳莅闽，复会同臣徐嗣曾检阅全卷，悉心查核。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其传会口诀既以五点二十一为暗号，而悖妄诗句内胆敢嵌入洪字，以致台湾逆匪造作洪号、顺天等字，皆缘此而起。该犯又编出木立斗世等字，为三十二年起会之根，情节甚为可恶，非寻常惑众敛钱可比。兹虽查明[提喜]病故确实，而陈彪为该犯教授之徒，行义为该犯亲生之子，结会缘由，传习人数，必向该二犯严切细究，方足以抉底里而净根株。陈彪恃其年老，狡猾异常，福康安在闽时，设法逼劝，除供同会之人陈丕、张破脸狗、徐炎、陈栋等数名外，续又供出何哲等十余人，俱系卢茂谋叛案内著名之犯。查乾隆三十三年卢茂一案，首伙共三百余名，当时并未讯有天地会名色，因复督同司道等反复细勘，熬刑究诘，始据供认卢茂等与该犯后先俱拜提喜为师，卢茂之叛，提喜本属同谋。查该犯等供称，提喜于乾隆二十七年即在高溪观音庙传布天地会，卢茂等即于是年入会，陈彪由方劝指引入会。赵明德本名赵宋，于二十八年拜陈彪为师，带见提喜，改

名入会。卢茂于三十二年起意纠集同会谋叛，陈彪系何哲邀允入会伙，该犯又转邀赵明德入伙，因卢茂于三十三年三月内先期破案，该犯等闻风逃逸，而僧提喜则系暗中主使，不露姓名。众人以其系传教之师，曾经穿刀设誓，均不供出。而所传之天地会诀，亦只用三指按心，并无标色登记可查，各犯遂皆隐匿未吐，以致漏网。又有李少敏即阿闵一犯，亦系同时入会，因提喜所编诗句内有李朱洪字样，李阿闵复于三十五年间捏造朱振兴名字，为前明后裔，纠众谋匪，旋即拿获正法。嗣后提喜、陈彪等均各敛迹，不敢复行传会。至四十四年提喜患病，有亲生之子郑继于十七岁时赘与潘姓为婿，生有子女，来庵探病。提喜传与会诀，并告知从前所陈彪、陈丕、张破脸狗、张普等数人，以为将来依倚谋食之计。提喜病故，郑继因提喜遗有寺田，随于该处落发为僧，改名行义，又号续培和尚，接住耕种。有方汉到庵做工，始将会诀试传。而陈彪于四十七年因提喜已身故，年久案烟，故智复萌，又起意传会。时有该犯族叔陈紬及李摘、严烟等入伙，各送给番银一二圆及钱千文不等。严烟于四十八年前往台湾，转传多人。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逆诗句，而卢茂、李阿闵两次叛案，皆该犯会中所传，可见其本意实图不轨，借此结盟纠众煽惑人心。迨三十三、三十五等年，叠次破案之后，此风稍为敛迹。至四十四年提喜于临终时复传伊子行义，而陈彪余孽复萌，又敢传习旧语，诱以入会之人遇事有人帮助，愚民又为蛊惑，遂及严烟传之台湾，致林爽文藉以滋事。且严烟在部所供：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朱李洪诗句，得自陈彪口传。其中藏



万提喜


重修后的观音亭



素珠牌

有姓名，应唯该犯是问。再加设法刑诘，据供从前实因卢茂、李阿闵破案害怕，不敢再传。迨至提喜死后，陈彪穷老，复思骗钱使用。行义本系蠢人，提喜向亦不以为子，只因患病时见其前来探视，怜其穷无依靠，传与指诀，俾可借以觅利。诘其传与严烟诗句，供称得自提喜口传述，只晓得结万是指结交万和尚即洪二和尚，因漳浦土话万洪同音的缘故。朱李桃实只见过李少闵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实不知真假。① 至此，清廷对天地会根源的查办，基本结束，认定天地会是洪二和尚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所创立。

从档案史料和实地考察的资料可以确定：洪二和尚万提喜是福建漳浦县（今属云宵）高塘村人，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俗名郑开，排行第二，中年出家为僧，初居寅钱寺（当地俗称榕仔脚庙），后住持高溪村的观音亭。郑开死后，尸体烧化，捡入瓦罐，葬于漳浦仙人山麓之仙峰岩。天地会《会簿》中《西鲁序》中提到居住福建云霄高溪的始祖万云龙，当指洪二和尚万提喜。

嘉庆年间大量档案记载为伍拉纳、徐嗣曾的说法提供了佐证。嘉庆年间福建巡抚汪志伊根据当时的大量天地会案件，在《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确认了这个说法。② 嘉庆十一年三点会首领周达宾在供认改天地会为三点会的原因时说："天地会查拿严紧，因此会系洪二和尚起立，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③在众多的天地会案件中，均记载天地会在结盟拜会时多供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的牌位，从来没有供奉"万五道宗"牌位者。这说明天地会的真正创始人乃是万提喜而非"万五道宗"。仅嘉庆年间江西省的天地会案件中，结拜时供

---

① 笔者所见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外纪簿》，伍拉纳原折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刊于《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71 辑。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三。

③ 《天地会》（六）第 301 页。

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者就有如下一些:嘉庆二十三年龙泉县黄凤三案,[①]嘉庆二十五年南赣县邱胜恩案,[②]道光二年大庾县张正元案,[③]道光三年赣县余隆发案[④],道光三年万安县唐兴通案、[⑤]道光三年赣县范恩仔案,[⑥]道光三年南康县蓝世兴案,[⑦]道光八年兴国县王传告案,[⑧]道光十年上犹县陈沅祥案[⑨]等。道光二年九月,江西南康县人吴潮文等在传会花帖结尾处写有"洪英年立"字样,破案后吴潮文供称"洪英"系"取洪二和尚英雄之意"。[⑩]

田野考察和口碑资料

1988年笔者曾与几位学者前往福建云霄实地考察,见到了提喜当年传会的高溪观音亭及洪门秘籍中提到的高溪庙,即灵王庙(在上高溪村、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咸丰四年重修),并考察了清档中记载的仙峰岩提喜骨殖葬地。其后,该县方道金、方群达两位先生,对有关天地会的遗迹、民间传说及有关文物,进行了深入调查,找到了高塘村郑家后裔的第二十二代传人郑自成老人。据郑自成老人称,高塘郑家有两支,一支是该村原来的郑家,另一支即他本人这一家,系明永乐年间由南安石井迁来。郑自成一支现在高塘有二十余户。郑家第十一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邱树棠折,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载《天地会》(六)第372—373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瑺弼折,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载《天地会》(六)第370—371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程含章折,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载《天地会》(六)第385—387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程含章折,道光三年十月十四日,载《天地会》(六)第383—384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成格折,道光五年二月十九日,载《天地会》(六)第389—390页。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折,道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载《天地会》(六)第409—411页。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折,道光十年七月十二日,载《天地会》(六)第399—401页。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邦庆折,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五日,载《天地会》(六)第412—413页。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折,道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载《天地会》(六)第407—409页。

⑩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折,道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载《天地会》(六)395—397页。


云霄高溪庙

世祖生有三子，长子郑茂夭折了，次子便是“和尚仔开”，三子郑答于乾隆三十三年移居台湾。和尚仔开最初在本村寅钱寺为僧，后来才到高溪村观音亭为僧（当地称供佛教神祇者称寺、岩或亭）。“和尚仔开”为了当皇帝，结了什么会（族中传说不知是天地会）。后来造反，连累了亲族。族内传说，和尚仔开当年住过房子的地基尚存。但村中无人敢使用，否则必遭灾祸，至今只能作养猪之用。其后，我们考察了高溪观音亭所藏提喜塑像（根据原物回忆所塑）。当地同志邀请到当年曾在高溪观音亭为僧的广东潮州人李阿星及船场村（与高溪村相邻）的几位老人，向他们了解有关提喜塑像一事。据几位老人说，该塑像是1978年或1979年根据村中老人回忆所复原。建国初期，群众为了破除迷信而将该庙改为幼儿园，庙中神像俱被抛弃。1978年前后，村中老人见本县各地皆在修庙，他们认为观音亭本是村中古庙，应该恢复。但庙中所供神像早已不存，便邀请当年见过庙中神像的老人及曾在该庙为僧的李阿星，共同回忆。当年庙内除“观音佛祖”、十八罗汉塑像外，记得在角落里还有一个神龛，供有一特别的神像。该神像右手三指按胸，左手中指与无名指拳起，其余三指伸直。据李阿星称，他初来庙中时，曾向蔡姓师傅问及该像为何神。师傅答以：“是本庙祖公，不可对外人说。”又问手势有何意义，师傅回答，右手是表示“自己人”，左手是拿东西用的，并一再嘱他不可对别人说。我问几位老人，该像所塑之人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老人们称，“听老人们说，是个和尚，他想当皇帝，脚上穿一双铁拖鞋，听说从高塘村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高塘郑自成老人所述情况，与船场村老人回忆相符。郑开原住高塘村，在该村寅钱寺为僧，后来才到高溪观音亭为僧。塑像主人，正是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通过实地考察，证实了官书、档案及洪门秘籍中有关天地会由万提喜即郑开创立的记载。

洪门秘籍《会簿》的记载。

在天地会《会簿》里有一个关于该会缘起的“西鲁故事”。大意是：康熙年间

有西鲁入侵中原,清廷屡次兵败,康熙皇帝无奈之下,发出榜文,征集天下英雄豪杰去抵御西鲁。少林寺众僧见到榜文,立即赴北京应征。他们在神将"六丁六甲"的帮助下,一举打败西鲁。回京后他们婉谢了皇帝的封赏,仍回少林寺清修。后遭奸臣的诬陷,清帝派兵将少林寺焚毁,劫余五僧逃至福建云霄遇僧长万云龙,适有小主朱洪竹前来,一同结拜,立誓"反清复明",是为天地会之缘起。

"西鲁故事"的内容本身荒诞不经,但是,其中却隐藏着天地会创立的秘密。

由于流传下来到各种《会簿》抄本不仅内容详略不一,而且有关天地会"始祖"万云龙姓名的记载各异,从而为西鲁故事的解读造成了困难。

在较早的抄本,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姚大羔等所立《会簿》中,称僧长万云龙是"师尊万提起,法号士曰云龙"。[①] 在广西田林县发现的洪门秘籍杨氏抄本中,则称万云龙"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②] 在罗尔纲先生辑录的《天地会文献录》中,《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称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③] 在萧一山辑录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西鲁序》中,说万云龙"在家他称一号达宗,出家法名和满"。[④] 在上述四种洪门秘籍抄本中,哪一种写法更可信呢? 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原则,当以较早的抄本为可信。在上述四种抄本中,档案中的姚大羔抄本,系清吏于嘉庆十六年所查获,其流传时间当早于嘉庆十六年。洪门秘籍杨氏抄本,系道光八年所抄录。而《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的洪门秘籍抄本,据萧一山称系出自"晚清粤人手抄"。《天地会文献录》中的《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据罗尔纲先生考证,系咸丰初年陈开率部占领贵县时所流传。据此,我认为上述四种洪门秘籍抄本中有关万云龙本名的写法,当以姚大羔与杨氏抄本为可信。姚大羔本中万云龙本名写作"万提起",我曾推测"万提起"疑系"万提喜"之误。1985 年广西田林县杨氏抄本发现后,证实了我的推测,万云龙本名果然是万提喜。洪门秘籍中所说居住在福建云霄高溪的"始祖",便是官书、档案中所说的在高溪观音庙为僧的洪二和尚万提喜。正因为云霄高溪是天地会的发祥地,所以在洪门秘籍中,无论西鲁传说、图像还是诗句、对联,均把高溪庙奉为圣地。在姚大羔抄本中,提到高溪、高溪庙者,不下十余处。如万提喜与五僧结盟后,与清兵

---

① 《天地会》(一)第 4 页。

② 《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84 页。

③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上海正中书局,1947 年,第 2 页。

④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

交战身亡,“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在诗句中有:“一盏明灯在佛前,五祖开旗拜祖先,祖灯点来不可食,留转高溪奉祖先。”在洪门秘籍杨氏抄本中,也说万提喜住在“丁山之上的高溪庙”。在《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中,提到众人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起义”。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图像部分,绘有高溪庙之图,门上对联:“一派溪山千古秀,三河峡水万年流。”在诗句中有:“地镇高岗(溪),一派江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所描绘的景象,酷似高溪观音亭。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西鲁故事前有个图像,旁书“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综上所述,当我们把官书、档案与洪门秘籍结合起来,再参之以实地考察的结果,便可以确定天地会是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所创立。

首先,“西鲁故事”并非天地会创立的真实历史记录,而是逐渐形成的传会工具,各种抄本的内容互相歧异,但其中却隐藏了天地会起源的奥秘。

在天地会创始之初,尚不存在后来会内流传的《会簿》,当然也就没有“西鲁故事”。从现存文献史料如《清实录》、地方志、纪略、方略、会典等清代官书和档案记载来看,在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前,从未出现过有关天地会的记载。在林爽文起义爆发后,清朝官员才从被俘的起义者口供中发现了天地会组织的存在,并立即追查天地会的“根源”。乾隆五十二年,清吏搜获了一件《添弟会会簿》,内容仅记录成员姓名与住址,并无“西鲁故事”;[①]乾隆五十三年清吏捕获了最早在台湾传布天地会的严烟,他在回答有关天地会根源时也未提及“西鲁故事”,[②]说明当时天地会内还没有作为天地会缘起的“西鲁故事”。

“西鲁故事”是天地会《会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从天地会《会簿》谈起。我们见到的天地会《会簿》主要有以下一些:

迄今发现最早出现一件《会簿》,是嘉庆十六年清吏在广西东兰州武缘县姚大羔等人处所搜获。[③] 其流传时间大约在乾隆末到嘉庆初年;其次是道光八年广西田林县的抄本,其流传时间当在道光年间。[④] 过去,翁同文和罗尔纲先生,曾经对当时能看到的各种天地会《会簿》之流传时间做过仔细考察,认定各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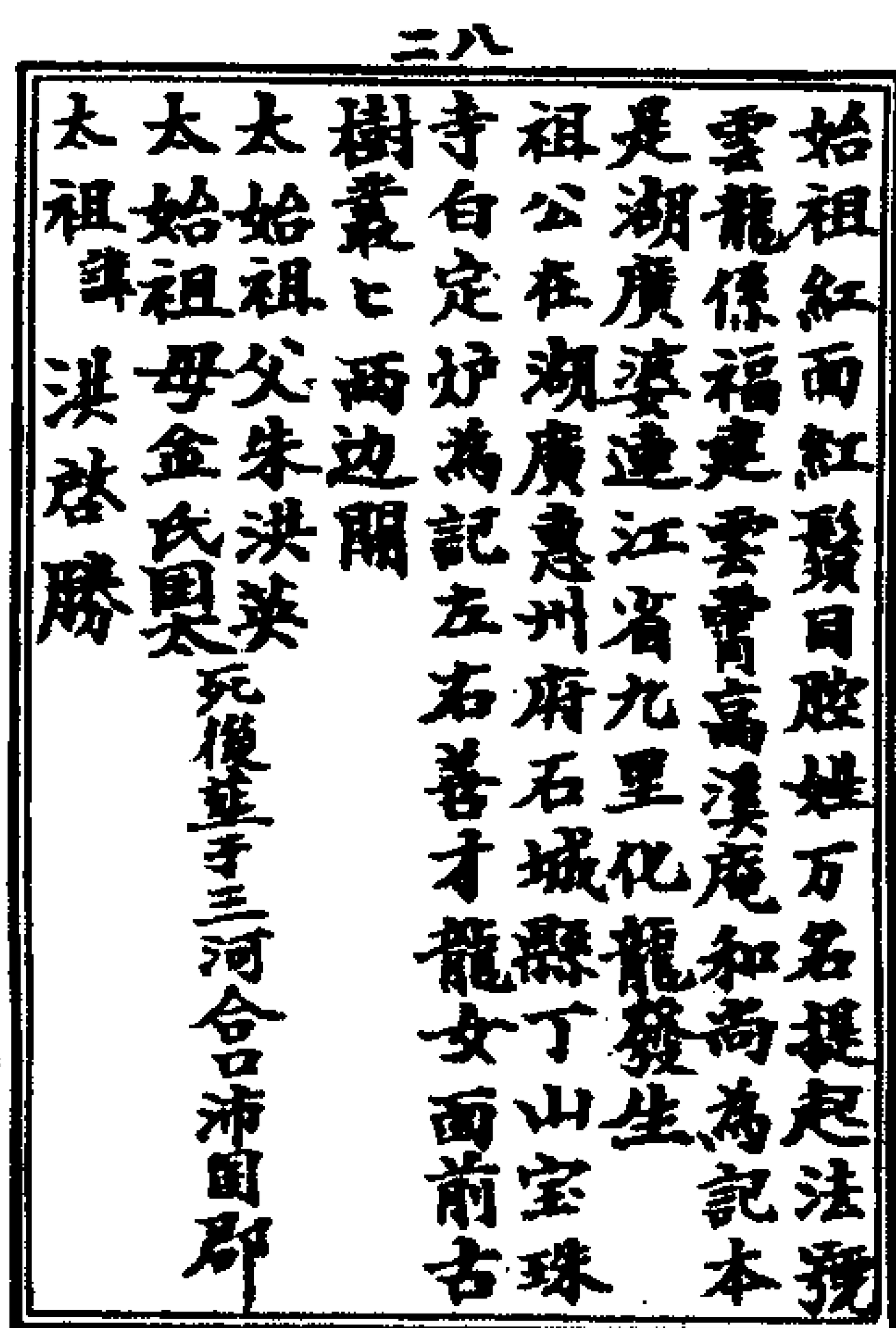
① 《天地会》(一)第80—83页。

② 《天地会》(一)第96—97页。

③ 《天地会》(一)第3—30页。

④ 载《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0—551页。

《会簿》抄本中，以贵县修志局本《反清复明根苗第一》为最早。罗先生提出：该抄本“所述火烧少林寺故事，情节简要，结构清楚，它没有关于郑君达的多余神话。那些神话只是在不列颠博物院藏的《西鲁序》抄本中才出现的”。[①] 翁同文也认为该抄本为最早，因为其内容比较“简朴”，“始终并无郑君达及其家人出现”。[②] 对于贵县修志局本的具体流传时间，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是在太平天国时期陈开率领的一支红巾军占据贵县时所遗留。[③] 所以，其流传时间晚于姚大羔本也晚于田林县本。至于萧一山先生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抄录的两件天地会会簿，据萧一山本人所述，乃“晚清粤人手抄”。其具体流传时间，尚无明确记载，对照荷兰人施列格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巴东所见天地会会簿，可以确定是在 1851 年即咸丰元年前后。徐柯在《清稗类钞》中所述“西鲁故事”，系抄自日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内容同《西鲁序》、《西鲁叙事》大致相同，其流传时间也大体相近。迄今见到最晚的抄本是光绪壬午（十八）年洪顺堂的《锦囊传》，[④]其流传时间当在光绪年间。


二八
始祖紅面紅鬚日殿姓万名提起法號
雲龍係福建雲霄高溪庵和尚為記本
是湖廣婆連江省九里化龍發生
祖公在湖廣惠州府石城縣丁山宝珠
寺自定圹為記左右善才龍女面前古
樹叢々兩边開
太始祖父朱洪英
太始祖母金氏奥 死後葬于三河合浦国郡
太祖弟洪啓勝
82

锦囊传

对天地会历史研究有素的胡珠生先生也曾对各种天地会《会簿》抄本做了详细考察，也认为应该依据抄本情节之繁简来确定其产生之先后。他指出姚大羔本为最早，次为广西田林县抄本，再次为守先阁本及修志局本，其他均为晚出。他提出：“从语音来说，姚本以闽南音为主，田本带赣南客语，守本、贵本及萧书诸本均夹杂乜、咁等粤语；从传说内容来看说，姚本、田本有五祖和万云龙说而无陈近南其人，姚本、田本、守本均未见天佑洪说，而贵本和萧书诸本并见后起的陈近南和天佑洪说；从体系的完整性和罕见材料的补充性来说，贵

①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 36 页。

② 翁同文：《今存天地会‘创会缘起’抄本的源流系统》，载台湾《东吴文史学报》，1986 年第 5 期。

③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序。

④ 上一个壬辰为道光十二年，因道光年间天地会内尚无将清写作三点水加月字者，故可断定此壬辰年当为光绪壬辰，即光绪十八年。

本以下均无法和姚本、田本相抗衡。"[1]上述学者的论证表明"西鲁故事"乃是逐渐添加而成，并非天地会创立的历史记录。

各抄本内容的繁简程度，也证实《会簿》是天地会创立后逐渐形成的。

各种抄本中，以姚大羔本的故事内容最为简略，西鲁入侵的时间仅记为"康熙年间"，众僧结盟是在"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不仅没有郑君达的事迹，也没有提到陈近南和朱洪竹，更没有邓德胜、陈文耀及马二福或亚七的事迹。而且把少林寺写作"甘肃少林寺"，称师尊为"万提起"，说他"法号士曰云龙"。而广西田林县抄本虽然内容已经大为丰富，但关键内容却与姚大羔相同或相似，把西鲁入侵的时间记为"康熙元年"，众僧结盟也写作"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也称少林寺在甘肃，故事中也未出现陈近南的事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抄本称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为"万提起"或"万提喜"，更接近档案与官书的记载。[2]

贵县修志局本和守先阁本的内容较为接近。前者把西鲁入侵写作"康熙时"，未写明具体年代，把火烧少林寺的原因归之于叛徒马二福向丞相陈文耀、邓德胜诬告众僧"通番卖国"，虽然开始出现陈近南，但仅提到众僧"拜陈近南为军师"一语，把万云龙写作"长林寺"的僧长，说他"号慈光，字达宗公"。把众僧结盟的时间写作"大清康熙年间，甲寅年三月二十五日"。后者把西鲁入侵的时间写作"康熙十六年"，火烧少林寺的原因归之于奸臣张连秋对少林寺僧的诬陷。称"太子"朱洪英乃"西宫娘娘李心燕"所生，改名"天佑"。称陈近南是一位和尚，众僧尊他为先生，在宝珠寺与洪大岁等一起结盟，未表明结盟的具体时间。

萧本《西鲁叙事》把西鲁入侵的时间记为"康熙甲午年"即康熙五十三年，众僧结盟为雍正甲寅（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火烧少林寺的原因，归之为奸臣邓胜欲将寺内所藏御赐宝物攫为己有，遭到拒绝而诬陷众僧欲图谋反，怂恿雍正皇帝将少林寺焚毁。该抄本多有矛盾之处：一是称雍正十三年邓胜诬陷众僧谋反，并烧毁少林寺，而劫余五僧却于雍正十二年结盟；二是将万大哥与万云龙分作两人。先说劫余五僧在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与万云龙一同结盟；然后又说众人来到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太平寨白鹤林岳神庙，与万大哥歃血结盟，因他"身材高大，猛勇过人"而拜他为大哥。

萧本《西鲁序》的内容较《西鲁叙事》丰富，也把西鲁入侵的时间记为"康熙

---

① 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载《清史论丛》，1993年。

② 《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第484—487页。

甲午年”，众僧结盟时间仅写作“七月二十五日”，并把少林寺写成“福建圃龙县九莲山少林寺”。把火烧少林的原因归之于奸臣张建秋和陈宏，蛊惑皇帝说少林寺僧人“如狼似虎”，“倘有异心，我主江山难保”。叛徒马宁儿因打破寺内宝灯被逐，心怀愤恨而为清军引路。故事中出现了郑君达及其妻郭秀英、妹郑玉莲、子道德等人的事迹，称郑君达与少林寺众僧有“八拜之交”，少林寺僧遭惨害后，郑君达也被皇帝赐死。故事中还增加了谢邦恒和吴廷贵等人物，将劫余五僧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与李色开确定为“前五祖”；并增加了“后五祖”：吴天成、洪太岁、李识弟、桃必达和林永昭，以及“五虎大将”：吴天佑、方惠成、张敬昭、林大江、杨文左，以及杜方、杜龙、何开、陈彪、苏洪光等人。称陈近南“当日在清朝为翰林院出身，兵部大堂之职，因奸臣太多，是以辞官不做，往白鹤洞中修道”。称万云龙乃浙江太昌府扶婆县人，“在家称一号达宗，出家法名和满”。因打死人命，中年出家。他“身高丈余，头大如斗，阔面红发”。

《清稗类钞》中“西鲁故事”之内容同日人平山周之《中国秘密社会史》内容基本相同。有关西鲁入侵的时间笼统地写作“康熙时”，众僧结盟的时间为“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清廷火烧少林之原因，归之于廷臣陈文耀、张近秋“怀叛志”，因惧少林僧众之勇武，惮不敢发，欲除之。遂向皇帝进谗言，皇帝听信其言而派令二人焚毁少林寺。将少林寺叛徒写作马仪福，因好色引诱郑君达之妻郭秀英、妹郑玉兰而被逐，遂引导清军将少林寺焚毁。也有“五祖”：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与李色开，及谢邦恒、吴廷贵，把“后五祖”：吴天佑、方惠成、张敬照、林大江、杨文左写作“五勇士”。有关陈近南之事迹已经更为丰富：“近南为学士，于帝之焚寺也，力争以为不可。以文耀、近秋之谗，辞官不做，回到家乡在白鹤洞研究道教。遇五僧，一同前往下普庵之红花亭，一同结拜。对于万云龙也作如下描绘：当陈近南带领五僧等众人与清军交战失败退至万云山时，在万云洞见到万云寺之院长万云龙，即“浙人胡得起”，他“貌魁梧，肋力过人，以少年曾杀人，惧罪为僧”。

光绪抄本《锦囊传》所载“西鲁故事”，称西鲁入侵为“康熙年间”，众僧结盟在“吉(七)月二十五日”。少林寺地址在“福建福州府盘龙县九连山”，称郑君达为解粮官，因打败西鲁有功而被封为“镇守湖南将军”。清廷火烧少林寺之原因是奸臣张建秋与陈文耀向皇帝进谗言，称寺僧既有“驱豹逐虎之能”，又与郑君达有八拜之交，一旦造反，无人可敌，遂设计将少林寺焚毁，皇帝也将郑君达

赐死。替清军引路者乃叛徒马宁儿,因打破寺内什物被逐,对少林寺怀恨在心。劫余五僧逃至长沙湾口遇见吴廷贵、谢邦恒,因清兵追赶,又投到乌龙江高溪庙,遇见黄昌成夫妻,又投到云南,在灵王庙遇郑君达之妻、妹,吴天成等五人及陈近南等人一同结拜。又与朱洪竹及天佑洪,一同往"长安"进发。经过浙江,遇见平昌府芙蒲县人胡提起,他字和满,法号万云龙,又名达宗公(各有三点水)。他身高丈余,头大如斗,面阔眼圆,手提双龙宝棍,勇冠三军,众人拜他为主帅。在与清兵交战时因马失前蹄,死于岩石之下。该抄本在图像之后写有如下文字:"始祖红面红须,目腔(瞠?),姓万名提起,法号云龙,系福建云霄高溪庵和尚。"

"西鲁故事"从简到繁的演变过程,表明它是后人逐渐添加而成,并非天地会创始时的原始记录。

其次,编撰"西鲁故事"的蓝本。

"西鲁故事"的内容虽然荒诞,但也非毫无史料价值。经过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天地会不仅在台湾,而且在福建全省及广东、广西、江西等省迅速传播开来。到嘉庆初年,天地会已经成为清朝当局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清朝督抚大吏皆称天地会"最为地方人心之害",千方百计加以打击。天地会被迫奋起反抗,从原来互助性秘密组织,转变成为具有公开反抗性的团体。会内首领们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形势:既要继续秘密发展会众,又要同清朝当局进行斗争。这时,以往"顺天行道","剿除贪官,拯救万民"的一类口号,和朱鼎元、李九桃、马九龙等兴会的说法,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在兴会缘起中增添一些带有悲情色彩的内容,用来激发人们的义愤和增强会内的凝聚力,西鲁故事也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这类利用悲情故事争取舆论同情和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做法,在民间秘密结社中早已有之,其效果屡试不爽,且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因而成了"西鲁故事"的蓝本。

明末清初在福建流传着一支秘密教门姚门教,也称为"老官斋教",该教经卷《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中有一个有关罗祖打退番兵,解救朝廷有功反被下入天牢的悲情故事:"外国有一十万八千红毛鞑子,如今来到北京城下,明军损失惨重。罗祖于是带领众军前去退番兵,他在阵前连射三支箭,只见三朵莲花自空中而下,番兵看见心惊胆战,只得带领兵马返回本国。罗祖三箭退了番兵,

为朝廷立下大功,明帝不仅未加封赏,反而将他监禁在天牢”。[1]

清初八卦教的经卷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内容是:顺治年间吴三桂造反攻到北京,“满朝中,武将军,难敌吴王”,“顺治爷,无了奈,出了皇榜;若有人,退吴王,封官朝纲;俺师徒,明大道,才揭皇榜;在城头,用法术,退了吴王;顺治爷,龙心喜,把我封奖”。后来李廷玉的弟子宏亮,得罪了朝廷的两个奸臣,他们“起奸心,谋害我,师徒命亡。二奸贼,到金殿,齐把本上;他参我,是邪法,要谋朝纲。康熙王,就准了,奸贼本章;出圣旨,选宫卦,齐进朝纲。用计谋,设下了,毒丹酒药;说开道,费心苦,庆功一场。我言说,修行人,皈戒为上;若不遵,苍天怒,恐把命伤。奸贼说,用药酒,快把命丧;若不然,钢刀下,亦是命亡”。“俺师徒,恨恨心,皆把酒用;一个个脱苦海,哭回天宫”。[2]

这类故事的悲情内容很容易激起人们的义愤,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西鲁故事”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再次,西鲁故事的基本素材。

从天地会《会簿》各种抄本的内容和近年来许多学者调研的成果来看,“西鲁故事”是以“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的事迹作为基本素材而编成的,所以,人们在“西鲁故事”里,似乎可以看到“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的影子。有的抄本还把天地会最早倡议结盟者写作“长林寺”的“达宗”,而达宗也作“道宗”。[3]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把“万姓集团”误认是天地会,把万五道宗误认为天地会创始人的原因。《会簿》作者之所以选择“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的事迹作为故事的基本素材,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福建漳泉一带向来有“化异姓为同姓”的习俗,天地会创始人万提喜便继承了“万姓集团”以万为姓的传统。据江日升《台湾外纪》记载,明季崇祯年间,漳州平和人张礼即张要(《台湾外记》误作“张要”),因“乡绅肆虐”而与郭义、蔡禄等结拜弟兄,化异姓为同姓,以“万人一心”之意,皆改姓万,称万礼(万大)、万义(万二)、道宗(万五)、万禄(万七)等,聚众反抗乡绅之压迫。化异姓为同姓这个习俗在闽南一直保留下来。从清档可知,雍正年间,福建漳泉一带仍有化异姓为同姓的结拜组织,如“以海为姓”、“以齐为姓”、“以包为姓”和“以

① 《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之《山东初度》。

② 教门经卷抄本《李廷玉训》。

③ 卢若腾:《增达宗上人》序,载《留庵诗文集》。

万为姓"等,天地会创始人郑开即洪二和尚自称"万提喜"也就是沿袭了"以万为姓"的传统。

其次,天地会创始人万提喜本人仅仅是个穷苦和尚,结会之初既不出名,也无社会影响,他最初创立的天地会,无非是同陈彪、卢茂、李少敏等少数几个穷苦百姓结拜的秘密组织,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创会事迹可以记载。而"万姓集团"却在闽南云霄、诏安一带具有较大的影响。"万姓集团"最初仅仅有十八个人,在诏安九甲一带打家劫舍,后来发展到数千人,在接受郑成功招安后,其主要成员又成了郑成功的将领。万五道宗虽未入伍,却是"万姓集团"的谋士,名声颇大,在卢若腾的《留庵诗文集》中,还保存着一首作者赠万五达宗的诗——《赠达宗上人》,他在诗序中写道:达宗(道宗)系"建安伯春宇公之弟,原住长林寺。春宇公即万礼,原姓张名要,平和小溪人。崇祯年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以万为姓,推要为首,率众踞二都。至永历二年,归郑国姓,永历封为建安伯"。他在诏安修建长林寺时,就曾得到郑成功部将多人的资助。① 他不仅在闽南,而且在闽中的仙游也有多处题字,在民间颇有影响。故事编者出于对"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的仰慕,所以用"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的事迹来假托天地会创立的历史,既可以表明天地会源远流长,又可以增加天地会的社会影响,以招徕更多的会众。类似情况在青帮的创始故事中也可以找到。青帮本来是由漕运水手的行帮组织演化而来,形成于晚清时期,而青帮自己却把其创立的历史提早到明代的永乐年间,把创始人假托为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金碧峰"。②

再次,西鲁故事的作者之所以选择"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的事迹作为素材,还有具体原因,那就是万提喜同"万姓集团"和道宗之间有着某些密切关系。据罗炤等考察,福建云霄一带民间传说万提喜是道宗的第五代传人,提喜还继承了道宗的"功夫"。不仅如此,万提喜还继承了道宗释道合一的信仰。道宗的大量题词说明,他是释道合一的信仰者,如他在仙游县九鲤湖的题词"仙道归宗",就表明了这一点。从天地会《会簿》可知,天地会不仅尊禅宗的达摩为祖师,而且把道教的八仙尊为崇拜对象,说明万提喜继承了万五道宗信仰释道合一的传统,二人有着不寻常的密切关系,这也是西鲁故事作者以"万姓集团"和

---

① 罗炤:《天地会探源》,第26、30页。

② 陈国屏:《清门考源》,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39—41页。

万五道宗的事迹为基本素材的原因。当然,万提喜虽然同万五道宗有密切关系,甚至如罗炤所说万提喜是道宗的“孙裔”或武功传人,但万提喜创立天地会并不等于是万五道宗创立了天地会。

那么,“西鲁故事”的作者为什么不直接把“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的事迹写入故事之中,而要虚构出一个少林寺和尚的故事呢?这反映了故事编者的某种尴尬和苦衷!

众所周知,“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虽然在闽南,特别是平和、云霄和诏安一带颇有名气,但是,他们的事迹中的诸多污点也为人们所熟知。他们最初靠打家劫舍为生,对平和、黄岗一带进行过杀掠,被当地人称为“老万贼”或“九甲贼”。[①] 特别是他们在背叛郑成功投降清朝时,“万姓集团”的蔡禄、郭义等人还率部在东山、云霄一带大肆焚掠,造成的灾难给当地人民留下很坏的印象。“万姓集团”降清后,许多人都成了清朝的高官,郭义任广西南宁镇总兵,蔡禄任河南省河北镇总兵,其他如叶冲、陈升、黄靖、曾英等人,均成为清军的高级将领。而万五道宗又是“万姓集团”叛郑降清的主谋。这种情况使故事编者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既要把“万姓集团”的事迹作为天地会的缘起写入西鲁故事,以表明天地会源远流长,为名人所创,又无法回避“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力主降清的污点。因为,从反清的立场来看,“万姓集团”的事迹,特别是万五道宗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这对于以“忠义”和“反清复明”相标榜的天地会来说尤其无法接受。所以,只好使用隐喻的手法,编造出少林寺和尚征西鲁有功于清,但反遭残害的悲情故事。

至于为什么要以少林寺僧征“西鲁”的故事展开,则同清初以来福建流传的“西虏犯边”传说有关。据福建学者曾五岳考证:由于福建漳州方言,“鲁”与“虏”同音,所谓“西鲁番”,其实是“西虏番”的讹传或错抄。有关“西虏番”进犯清廷边境河州一带的民间传说,在闽南一带早在顺治年间就有所流传。在杨英《先王实录》里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郑成功在中左所(今厦门市)谕泉镇韩尚良云:“今西虏悉有秦地,肇庆失守,李率太(泰)仅以身免,羊城危在旦夕,李西藩兵临南雄、南赣、南昌,风鹤靡宁,此亡清之秋也!”[②]说明郑成功当时已经听

① 罗炤:《天地会探源》,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28期。

② 杨英:《先王实录》,第99页。

到"西虏番"从陕西进犯到肇庆的传言，可见其流传之广。[1] 这个传说也就成了天地会《会簿》中"西鲁故事"的素材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天地会《会簿》中的"西鲁故事"，乃是会内之人出于传会和增强内部团结的需要而陆续编撰出来的，并非天地会创立的历史记录。因此，把它当作天地会创立的历史来叙述显然不妥。而依据该故事对天地会创立的历史进行"影射推求"，其结论也难以令人折服。只有利用档案史料进行解读，才能真正揭示出"西鲁故事"的奥秘。

用上述档案记载来解读"西鲁故事"，就具有说服力了："西鲁故事"中的"万云龙"，也就是档案和官书中提到的天地会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即郑开。故事的编者虽然以"万姓集团"和万五道宗的事迹为天地会创立基本素材，借以表明天地会源远流长，并有着轰轰烈烈的历史，但会内之人又清楚天地会的真正创始人乃是万提喜。所以，尽管有的故事抄本把天地会最初主盟者写作"长林寺"的"达宗"，但会内之人毕竟知道天地会乃万提喜所创立，因此更多的抄本中则仍然把最早的盟主写作"持喜"、"万提起"、"万提喜"，而且尊他为"师尊"、"始祖"、"万祖师"。在伦敦大英博物院所藏天地会文献中，图像部分还有如下文字："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所以，只有用档案史料进行解读，才能真正揭示出"西鲁故事"的奥秘，揭开天地会起源之谜！

（三）天地会的创立及初期活动

天地会创始人提喜（约1720—1779年）是福建漳浦县高塘村（今属云霄县莆美镇）人。其生年尚有不同说法。天地会早期骨干陈丕于乾隆五十三年受审时供称，提喜"现年六十八九岁"一语，可推断提喜生于康熙五十八九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终年五十八九岁。方群达先生根据提喜之弟郑答后裔郑康东先生保存的族谱，提到郑答生于乾隆十一年，认为郑开不可能比其弟郑答年长二十五岁，因此，认为提喜当生于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年。[2] 可是，如果把提喜生年向前推至康熙四十九年或五十年，他则比其弟年长三十五六岁，似更不合理。从当地郑氏族内传说可知，郑开最初在高塘村寅钱寺出家，后来在高溪村观音亭为僧。乾隆二十六年以前，便参与过高溪粪箕湖（一个小山谷）下枫林寺僧人

① 曾五岳：《天地会创始人及起会年代考》，载《东南文化》1993年1期。

② 方群达、方道金：《提喜的俗家籍贯与世系考》，载《天地会史学研讨会论文》打印稿。

们的不法活动。乾隆二十六年，他在高溪村的观音亭与李少敏、桃元、朱鼎元等人结拜弟兄，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取名为“天地会”。创造了三指诀即大指为天，小指为地，接递烟茶俱用三指作为会内相互识别的暗号。又用“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编造“悖妄诗句”。[①] 从乾隆二十七年起，提喜在高溪观音亭以天地会的名义传徒结会，最早的徒弟有卢茂、方劝、陈彪、赵明德、陈丕、张破脸狗、张普等人。天地会最初仅仅是提喜等少数几个人自发结成的秘密组织，其宗旨是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具有较强的反抗精神。当天地会的人数渐多，势力日强以后，便要求共同反抗清朝统治。天地会早期所进行的两次重要反抗斗争，便是乾隆三十三年的卢茂起义和乾隆三十五年的李少敏、蔡乌强起义。两次起义都是在提喜“暗中主使”下进行的。

卢茂起义

卢茂(？—1768 年)福建漳州府漳浦县杜浔乡人，居住在漳浦县杜浔海滨，向与该处之何哲相好。何哲又与同县之林咸“同习拳棒”。乾隆三十二年八月，经何哲介绍，林咸同卢茂结识。同年十一月，卢茂在提喜策划、主使之下聚众起义，拟攻打漳浦县城，遂与何哲、林咸商议纠人入伙。何哲先后纠得杜浔的郑朗、小溪鹿溪村的王垂、黄石。林咸纠得在漳浦县城居住的程天助和在马坑村居住的亲戚吴纱即许纱。吴纱又转邀同族吴康及邻村的霞潭、蔡通入伙。十月十八日，一齐来到卢茂家中，一共十人，“拜神结盟”。众人以卢茂“颇有智量”，推他为大哥，何哲为二哥，林咸为三哥，其余三人俱依年龄为序，“同饮香灰酒齐心”。卢茂分给每人一块花兰夏布为号，并令何哲等回去后再招熟识之人入伙。卢茂计划先抢县城仓库及城内富户，待“钱财充足再行举事”。卢茂“又虑无辞惑众，捏出赵良明姓名为宋代后裔”，编造军师为蔡德灵，元帅为林鹤鸣等，以壮声势。并编成“悖逆歌词，令伊伙布散惑众”。何哲等人接受任务后，便在本村同族及平日相识的人中，以“抢掠分财”相哄诱，陆续招人入伙，先后招有洪辉等一共首伙三百三十二人。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初，林咸探闻漳浦城内兵丁有赴府“候挑”之信，估计城内兵力较少，将此报告卢茂。卢茂见同会人数已众，县城兵丁又少，正是举事的好机会。遂于三月初八日，约何哲等骨干来至林咸家中商议。卢茂查看《通书》，以三月十四日酉时为吉利，又称年向大利东西，遂令蔡通

① 《伍拉纳、徐嗣增奏折》，载《天地会》(七)，第 522—527 页。

等回去纠约各自同伙，定于十四日乘昏暮抢入西门。卢茂同何哲、郑朗引导杜浔一支队伍从东路来城接应，由林咸、程天助在城内作为内应。卢茂所纠之人，听说要抢劫县城仓库，大多畏惧，以致"大半先期逃避"。卢茂等见众人不至，十四日未敢率众攻城。吴纱等八十三人却仍按原定计划，各执刀棍等器械，于十四日在后径山坳会齐。林咸也于十四日黎明赶来后径山坳，然后率众于午后赶到西门。漳浦县知县徐观孙闻讯连夜赶回，于十四日率把总曾大猷带领兵役，出城搜捕。恰值林咸、蔡通等已赶至城门，双方展开搏斗。林咸手下的吴谐等三十三人被枪箭击杀，王对等三人负伤，林咸率众败逃。在城内准备内应的程天助等九人亦被捕。吴纱等连夜赶回向卢茂报信，十五日早，卢茂又写"顺天当事"拜帖，令何哲等人"持贴邀伙"，并同洪辉等人在该村青竹山"竖旗号召"。后因会伙皆已逃避，难再纠人，且闻官兵已赶至查拿，卢茂、何哲便将旗帜掷藏，分散逃匿。后来卢茂在山洞中被拿，参与其事之人，大多被捕。① 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等，通过对提喜之子行义、嫡传弟子陈彪的审讯，终于查明"卢茂之叛，提喜本系同谋"，"因卢茂等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先期破案，该犯等闻风逃避，而僧提喜则系暗中主使，不露姓名。众犯以其系传教之师，曾经穿刀设誓，均不供出。而所传之天地会诀，亦只用三指按心，并无标色登记可查，各犯遂隐惹未吐，以致漏网"。② 卢茂起义失败后，提喜因得到众弟子之庇护，得以幸免于难。

李少敏、蔡乌强起义

李少敏（？—1770年）又名阿闵，系福建漳浦县下曾村人（今云霄陈岱镇下曾村），拳师出身，在诏安县溪雅村庙中开馆教习拳棒。乾隆三十五年，在提喜策划下，与蔡乌强纠人起义。蔡乌强原住诏安县溪雅村，后迁居漳浦县陈岱村，靠"做糖料生意"。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李少敏来到蔡乌强家中，向他说："平和县有个姓朱的，家资富足。"邀他去平和与姓朱的拜把，蔡乌强当时未答应。十月二十日，李少敏又来到蔡乌强的店铺，对他说"那姓朱的要谋举大事"，叫他纠人入伙。"先抢夺村庄富户，再行举事。"并称已经纠得溪雅村的林勇、郭选、金秦、林厚、丘阔，及大吴村的吴孕等人入伙。又拿出一块红绫札付给蔡乌强，让他"做总兵之职"。该札付"横约一尺五寸，长约一尺二寸，泥金横书'大

---

① 《天地会》（七）第528—533页。

② 《天地会》（七）第522—527页。

明'二字",中书"大总镇"三字,左边写"马将",右边写"步将"。告诉他如纠得百人,给予番银百圆。蔡乌强见有利可图,便同李少敏一同到长田村转纠沈润中入伙。李少敏许给沈润中"游击职衔"。其后,蔡怀强又陆续纠约溪雅村的林裕,马厝村的李讲、李中,竹港村的吴玉等人入伙。[1] 李少敏为了号召人们参加,又编造出"朱振兴名字,为前明后裔"。[2] 其纠人活动,旋被诏安县知县方鼎访闻,李少敏、蔡乌强俱被捕杀,提喜策划的反清活动,再次失败。其后,提喜便与弟子陈彪隐匿各处,"不敢复行传会",乾隆四十四年提喜病故。

乾隆四十七年,陈彪"因提喜已故,年久案湮,故智复萌,又起意传会"。曾传其族叔陈曲及李摘、严烟等人入会。每传一人,即可得"番银"一二圆及钱千文。李摘又转传侯迈、林龙、陈卓、李桐姑、许松姑五人入会,林龙等又转传邓昌、廖浦二人入会。[3] 严烟于乾隆四十八年渡海赴台,在彰化开布铺为生,暗中纠人结拜天地会。乾隆四十九年在溪底阿密里庄传林爽文入会,[4]从此天地会在台湾得到迅速发展,并于乾隆五十一年举行了著名的林爽文起义。

① 《天地会》(七)第534—540页。

② 《天地会》(七)第524页。

③ 《天地会》(一)第524页。

④ 《天地会》(一)第110—111页。

第六章　乾隆后期天地会以外的秘密会党

一、四川的啯噜

四川的啯噜，是以结拜弟兄方式结成的武装集团，早在雍正末、乾隆初，四川已有啯噜活动的记载。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各省流民大量入川，使四川的啯噜再次活跃起来。

乾隆后半期的啯噜，在阶级构成方面，同以前并无变化，仍然以外省游民及四川本省下层穷苦人民为主。据湖南巡抚刘墉奏："川省啯匪，分棚为匪，亦有湖广、江西游民被诱入伙随同抢夺。"①从当时被捕者口供来看，尚有陕西、广东、贵州、福建等省入川之游民。② 从乾隆三十八年金川之役以后，不少溃败的清军兵丁，也加入了啯噜的行列。据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初，四川有啯匪而无教匪，啯匪者金川之役，官兵溃于木果木，其逃卒之无归者与失业役夫，无赖悍民，散匿川东北，剽掠为生。"③从乾隆三十九年起，史籍、档案中有关啯噜活动之记载逐渐增多，乾隆三十九年四川总督文绶奏称，"拿获拒捕啯噜匪犯匡贵等现在审拟一折，称该犯等二十余人，在雷波厅属中山溪地方滋扰，经该通判王兴谟访闻，会同营员亲往擒拿，匪犯各持刀械，奔出抗拒。当经放枪伤三犯等，拿获十九犯，究审定拟"。④ 乾隆四十六年以后，啯噜的活动更进入高潮。当时啯噜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不似以前大多三五成群，忽聚忽散。其首领称为"棚头"，率众活动。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8辑，湖南巡抚刘墉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②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四。

③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④ 《剿捕档》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①啯噜发展组织，同其他秘密会党相同，也采取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拜时，要求把发辫割下，烧化溶入酒中共饮盟誓。据湖南巡抚刘墉奏称："据黄胜才等各犯供称，川省匪类各有记号，其割辫伙内邀诱成群，结拜弟兄。有将割下之发，烧灰调入酒内，共饮盟誓，期于久聚不逃，被获不攀，各护各党，不相混杂。"②啯噜结拜时，为什么要割辫化灰，溶入酒中共饮呢？过去曾有人解释为此举系为了表示反清之决心。不过，据啯噜内部人称，割辫具有便于活动等功能。"据称头上留辫，伙党割去。如到市场抢劫，从后面望见短发者，便知同伙，即可接递赃物。若遇事主捉拿，头无发辫，难于揪扭，亦可脱身。"③啯噜内部有严格的规约，入伙之后，不得随意脱离，否则会受到惩处。"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④其为首领者称为"老帽"、"帽顶"。其管事之人称为"大五"、"大满"。"其兄弟辈所带之龙阳曰干儿，呼各兄弟曰伯、曰叔。伯叔相遇，不敢亵语。如犯之，拔刀相向，甚于调其妻妹。"⑤啯噜使用的武器，多设法加以伪装，以免在集市上活动时被人发现。他们带有一种"矛伞"，外表看上去，仅一遮雨之油布伞，而其中却暗藏枪矛。⑥ 另一种则平时仅携带矛尖，需要时在老林中用毛竹为杆，用过之后，将杆丢弃，甚为方便。"林中所产老毛竹，节密而坚，柔而劲，贼匪砍作矛杆，长一丈七、八尺，抗拒时，千矛攒刺。短兵砍拨，软不受刀。前矛甫开，后矛已至。贼势不支，则拔出矛头，弃杆翻山，形成猿猱。窜至他处，又砍竹作杆。"⑦

乾隆后半期，四川的啯噜分为两支：一支主要活动于川东北老林地区，一支活动在川江上游沿岸的重庆、夔州一带。

川东北老林地区的啯噜

这一支啯噜，主要在老林地区从事抢劫活动。其成员中，有些是自愿参加的。乾隆四十六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称，捕获之啯噜喻攀灵，原籍四川，家无

---

① 《剿捕档》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9辑，湖南巡抚刘墉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③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8辑，湖南巡抚刘墉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④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⑤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⑥ 《朱批奏折》署四川总督黄廷桂折，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⑦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策略"。

恒业，出外游荡。乾隆四十六年四月间，在太平县地方遇见啯噜首领朱大汉、罗麻子及同伙数十人。喻攀灵听从朱大汉之纠约入伙。同年五月，随同朱大汉等人在太平县上、中、下神口及达州河左岸、右岸、庙提等处，赶集抢窃，并在村中抢劫农民苞谷二十余石。① 又如湖南人黄胜才，赴川谋生，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在四川彭水县盈水场遇啯噜首领李小八，被引入棚中，割去发辫，加入啯噜。② 有的人被啯噜首领认为义子而加入啯噜。湖南武陵县人张老大，赴川谋生。初在射洪县开豆腐房为生，娶有妻室。后因折本，无以为活，沦为乞丐。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张老大来至涪州，遇见皮学礼即皮麻子，亦在该处行乞。张老大见其年轻，即诱为干儿子，将其鸡奸，遂成为啯噜子。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张老大、皮麻子二人来至太平县遇素识之罗和尚，邀他同往抢劫过客银钱。同伙多人，各于草帽上系以白布带为号，后遇官兵逃散。以后张老大等人多次纠伙抢劫。③ 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乞食，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至四川巴县地方谋生，遇该处啯噜刘胡子、周包包等，令他入伙，一同抢夺。周德入伙后，同住岩洞，手执刀棍，同至巴县抢劫。五月初，周德又与刘胡子等同至巫山县地方抢夺。另外，又有江西赣县人刘理寿，赴川觅工，于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在云阳县遇见啯噜首领李满八、严正纲及同伙三十余人。李满八令刘理寿入伙，给予海刀一把。五月初三日，刘理寿与之同至太平县之母猪场抢夺。又有湖南会同县人向群经湖北来凤，来至四川寻觅工作。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在秀山县，遇见啯噜黄老么等六人，邀其入伙。向群即同黄老么等在秀山县黄白地方抢夺猪贩子银钱。此外，还有湖南桃源县人荣士清，江西金溪县人李定山，江西吉水县人刘隆科等来四川谋生，加入啯噜，参加抢夺。④

有些人加入啯噜，则出于被迫。凡"强拉入伙"者，皆被首领"视同奴仆"，"住则煮饭打柴，走则背负行李"。啯噜首领对这些被迫入伙者，只给予口食，不分给钱文。为防止这些人另投他伙，便硬割其发辫。⑤ 四川资阳人童臣贵于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来到江津县腰店子地方谋生，被啯噜首领张正恒等人胁迫背

---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9辑，署陕西巡抚毕沅折，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8辑，湖南巡抚刘墉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③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8辑，湖南巡抚刘墉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④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1辑，署理湖南巡抚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⑤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9辑，湖南巡抚刘墉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包,并令他认头目张正恒为"干父",同住岩洞。① 类似事件,尚有多起。

啯噜的另一支在川江重庆至夔州一段及其沿岸地区活动,以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伙。大多以年长者为首,故称其首领为"长年儿"或"老大"。啯噜组织内部的日常事务,如分给饭食、角钱、赃物等,皆由"长年儿"或"老大"负责。有的虽然由"强梁"者为首,并非年长者,但仍称为"长年儿",或称为"棚头"。啯噜内部分为"红线"与"黑线"。凡白日行窃者,称为"红线";黑夜行窃,则称为"黑线"。啯噜的首伙姓名、排行,皆经常变化,连籍贯也各不固定。且一人数名,皆非真实姓名,这主要为了对付官府之搜捕。被捕者于审讯时,皆另捏姓名,使官员难辨真伪。②

这一支啯噜中,许多成员皆来自川江木帆船上之水手。如湖北监利县人彭家桂即彭老三,最早在四川奉节县卖酒为生,后来因折本歇业。乾隆四十六年在川江"推桡",同年三月行抵梁山、垫江到交界之小马溪地方,被素识之黄大年等邀入啯噜。该伙共有四十一人,分作两起,居住岩洞。三月十二日,首领陈升、罗恒令其伙党,前赴马家堰抢劫。彭家桂手持铁尺,抢得过路人钱十余千文,并将一名过路之人打伤。其后,该伙又去垫江县市集抢劫柴米等物。③ 湖南清泉县人彭宏富,先在四川重庆驾船为生,后因患病,无法在船上操作,靠乞讨度日。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来至巴县地方,遇见啯噜棚头王正德、李老三,一同结拜弟兄。王正德令彭宏富割去发辫,背负包裹。四月十五日,在石坳场地方,一同抢劫客商钱文。④ 湖北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同年十二月遇见素识之魏老虎等五十余人,一同结拜,各携刀械赴梁山一带进行抢劫,成为啯噜。

川江之水手们加入啯噜,从事抢劫,大多为生活所迫。水手们的劳动十分艰苦,生活也极贫困。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提到过水手们加入啯噜的原因,指出:"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按纤夫——原注)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船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府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

---

① 《朱批奏折》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② 《朱批奏折》四川总督文绶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日缺)。

③ 《朱批奏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④ 《朱批奏折》湖南巡抚刘墉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悉水道水手,板主(即船主——引者)另雇而行。荆宜所来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手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三四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尽,则卖所穿之衣服履物。久之,则成精膊溜矣。(原注: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谓之精膊溜)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匪伙党。"[①]从啯噜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来看,它是由下层穷苦人民,主要是流入四川的外省游民及本省穷苦无告之人和川江上失业水手、纤夫所组成。其特点是拥有武装,是一种以抢劫为生的武装团伙。乾隆后半期,特别是乾隆四十六年以后,更为活跃。乾隆五十三年,清政府以啯噜的啯字,与国家的国字字形相似,下令将啯字改为"啯"字,其后"啯噜"的官方文件上,一律写作"啯噜"。[②]

二、台湾的小刀会

乾隆后半期,秘密会党加紧了活动。除天地会外,在台湾又出现了名为小刀会的秘密会党。当时,天地会尚未传入台湾,这支小刀会仅属一般秘密会党,不同于嘉庆初年台湾的小刀会,后者系天地会"变名",属于天地会系统。

乾隆后半期台湾小刀会,大多是为了对付营兵而自发结成的自卫抗暴性的组织,因以小刀作为武器和标志而得名。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正月,在台湾大墩(今台中市)有街民林达,因卖槟榔时,被讯兵"强买殴辱"。气愤之下,邀集林六等十八人结为一会,相约若遇营兵欺侮,各带小刀帮护。故多罗质郡王永瑢认为小刀会之出现,乃兵丁所激成。他说:"查台湾一府,地居海中,番民杂处,是以多设兵丁,以资弹压。乃兵丁等反结伙肆横,凌辱民人,强买强卖,打毁房屋,甚至放枪凶斗,以致该处居民,畏其强暴,相约结会。各持小刀,计图抵制。是十余年来,小刀会之举,皆系兵丁激成。"[③]

林达等人所结小刀会,后因会伙先后身故,逐渐瓦解。不久,又出现了彰化

---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

②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六日。

③ 《军机处月折包》永瑢折,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一日。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81 年,第 23 页。

小刀会，首领林阿骞又名林阿赛。乾隆三十八年，林阿赛邀黄添等五人结会，旋有黄江等人陆续加入。凡入其会者，各备小刀一把作防身之用。彼此相约，如遇营兵及外人欺侮，则各执小刀帮护。会外之人畏其强横，又以小刀会之人，敢同兵丁相抗衡，大如王爷，故又称王爷小刀会。①

乾隆三十九年，又有陈缠等，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各自结成小刀会，会内还有衙役参加。乾隆四十年，台湾府知府蒋元枢曾访拿李水等十人所结小刀会。乾隆四十四年，又有卢讲等人结拜小刀会。以后，小刀会之势力越来越大。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台湾又有林水等人结拜小刀会，以对付营兵之欺侮。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有兴化营兵在杨振文门首，公祭远年阵亡之同伴。因旧时设祭之处被杨振文建盖房屋，兵丁们便在杨振文门首摆列祭物。杨振文率众阻止，将祭品抢散。兵丁陈玉麟与杨振文斗殴，其他兵丁一齐帮助。结果，兵丁郑高先被杨振文殴伤，即回到营房，取回鸟枪施放，误伤贩卖果品的林水腿肚。林水不依，即赴县控告。彰化县知县焦长发差拘陈玉麟、郑高等到案，杖责发落。后经调解，令杨振文出番银一百五十圆，给陈玉麟等买地建造祠屋。营兵们因林水赴县控告致遭杖责，于心不甘，屡次欺侮百姓。林水气愤，遂于乾隆四十五年九月间，邀同孙番、杨报、林葵等四人，结拜小刀会。相约如遇营兵欺凌，彼此举刀帮护。②

乾隆四十七年，台湾彰化县再次发生小刀会的骚动。是年八月二十三日，该县莿桐脚庄演戏，有漳州籍人在戏场开设赌场。三块厝村小刀会内漳州籍人黄添，与泉州籍人赌博。泉州人赌输，因其所出之银成色不足，彼州争闹。黄添之子黄璇等纠众将居住秀水庄之泉籍人廖老殴毙。报告县署后，因凶犯未拘，泉籍人心中不服，于二十六日赴黄添家殴抢。漳州籍人亦拦抢泉人杂物，彼此成仇。这时，又有泉州籍人吴成，告诉同籍之谢笑，称小刀会黄添等欲纠众攻庄，谢笑即倡议传帖，知会各泉人村庄，彼此相帮。黄添因见泉人众多，恐难抵御，遂私约漳州籍住居大里杙之林姓，于八月二十九日，进攻泉人住居之番仔沟、过沟子、鹿仔港等地方，彼此焚杀，各有伤亡。最后导致一场大规模械斗，涉及梨头店、芦卢墩、沙辘、大脚街、牛骂头、大武郡、燕雾、东西螺、海丰港、布屿禀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富勒浑折，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十六日。

②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24—26页。

等处，历时月余，彰化县受到扰害之村庄，约二百余处。①

三、牙签会与掖刀会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广东西宁县人仇德广纠人结拜牙签会。是年九月初，仇德广与高明县人梁季丹、卢首贤商量，纠人结拜弟兄。如被人欺侮，可彼此帮护，并可骗钱使用。三人共纠得陈兴远等二十二人，于九月初八日，齐集西宁县杜城圩新庙，每人出钱三百文，交给仇德广收受。众人不序年龄，共推倡会者仇德广为首，一同在神前拜把。仇德广即解身佩牙签一幅，声称以“牙签会”为名，每人身带一份，作为暗记，俟照样造成，即散给众人，并嘱众人再转相纠人。十月十八日，仇德广又与新纠之李五九等二十一人，在广西苍梧县文村古庙结拜，众人仍推仇德广为首，同在神前结拜。仇德广称，每人除备银牙签外，尚须打造银图章一个，装入小盒，各自佩带，作为信记。图章上刻“贤义堂记”四字。其后，牙签会多次进行抢劫活动。②

乾隆五十五年，江苏徐州府周廷相纠人结拜掖刀会。周廷相原籍江苏邳州，向与同县之张士全、常泳祥等人交好，平日各带掖刀、顺刀、铁鞭等物防身，自称“掖刀手”，遇有争斗之事，即纠人打斗，人皆畏惧。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周廷相等人同赴邻近的山东台儿庄赶集，因无盘费，张士全倡议抢夺，周廷相等皆同意。当夜，张士全等各执掖刀、顺刀，在山东兰县桃墩村，将赴镇赶集之王友信驴二头及所驮麦子五袋抢夺，并将王友信杀伤。周廷相等人皆被称为掖刀会。③

徐州府铜山县也有类似组织，该县有号称“虎牙”之张三，称“黑虎”之王贵及“金翅鸟”之吕英等人，平日亦各带掖刀、顺刀等防身。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张三倡议结拜弟兄，王贵等允从。各出钱七八十文，买备酒食，共饮磕头，按年龄之长幼为序，彼此弟兄相呼，主要从事打架斗殴等活动。④

---

①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26页。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8辑，广西巡抚孙永清折，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③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孙士毅折，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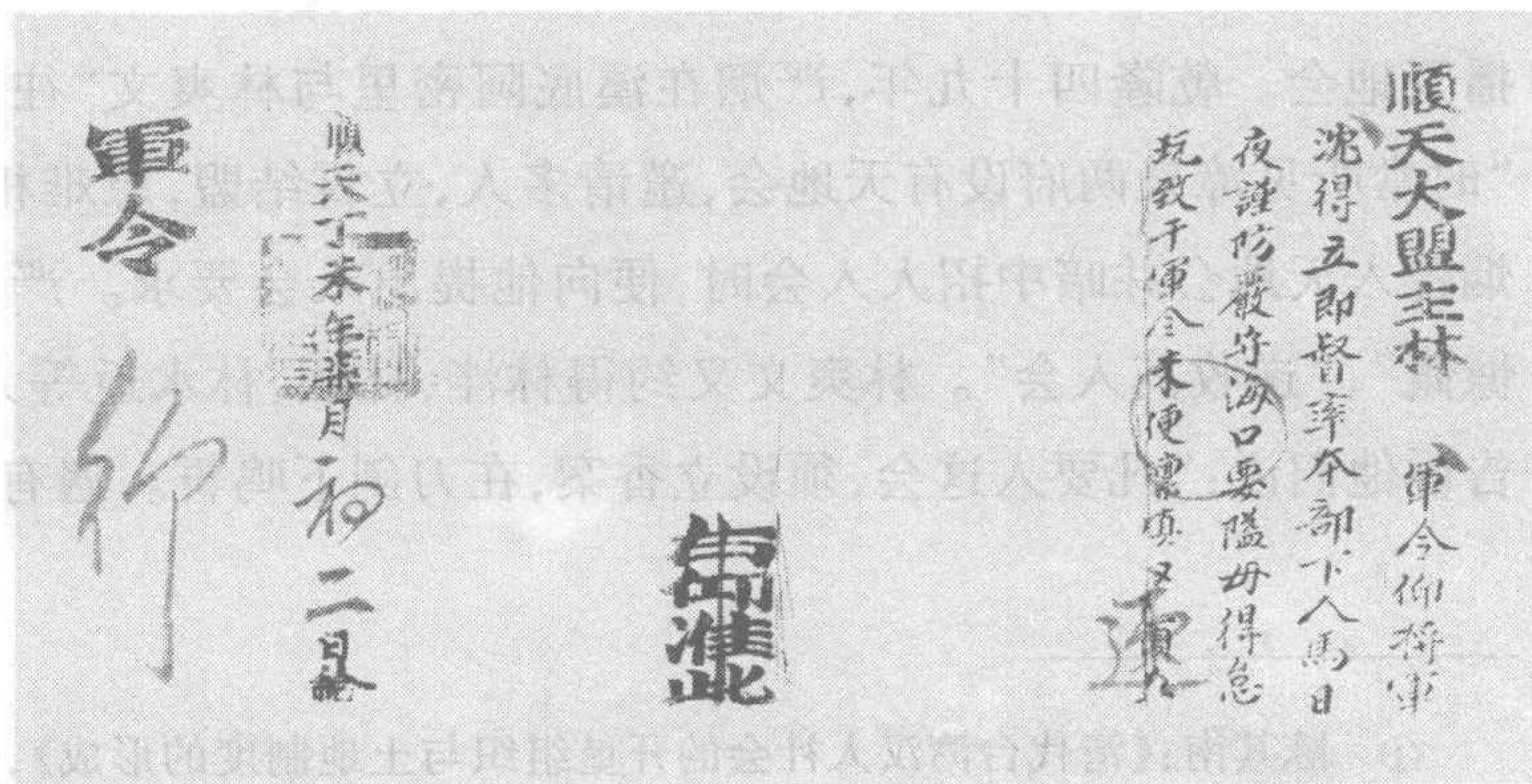
④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孙士毅折，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第七章　台湾林爽文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台湾爆发了一场由天地会所领导的武装反清起义,这是清代前期由秘密会党所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清前期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廷对这次起义十分重视,乾隆皇帝把对这次起义的镇压行动,列入他的"十全武功"之中,并且在承德与厦门两地勒石以记其事。

一、起义的背景与原因

我国大陆与台湾学者,对林爽文起义都做了不少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以往人们大多从不同角度,对林爽文起义的原因加以探讨。有人认为这次起义是地主阶级兼并土地所引起的农民起义,有人认为是汉族人民的"反满革命"。我认为林爽文起义是一次典型的秘密会党起义。秘密会党是下层群众,包括农民、手工业者,以及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转化来的雇佣劳动者、小商小贩和无业游民(在台湾称为罗汉脚)等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秘密会党中纯粹的农民并不多,土地问题并非其关注的重点,最妨碍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是官府的压迫和贪官污吏的勒索。


順天大盟主林　軍令仰將軍
洸得五郎督率本部下人馬日
夜謹防嚴守海口要隘毋得怠
玩致干軍令未便
順天丁未年　月初二日
軍令

林爽文起义之"军令"

所以，林爽文起义既非一般的农民起义，也非“反满革命”，而是秘密会党与台湾下层群众反抗贪官污吏的斗争。

林爽文起义的爆发，同台湾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天地会的传播均有密切关系。

台湾岛地处亚热带，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归清以后，南部经济发展在原有水平上进一步提高，中部与北部也得到开发。来自大陆的人力、物力和先进的耕作技术，大大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台湾学者陈其南先生研究，台湾农田水利设施，在乾隆年间早已基本完成，而且有一半以上是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完成的[1] 旱地改为水田，使以前只能种植杂粮的土地，也可改种水稻。由于水源充足，稻田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乾隆五十三年福建巡抚徐嗣曾提到，台湾彰化一带“一年两熟，约计一甲可产稻谷四五十至七八十石。丰稔之年，上田可收百余石”。[2] 当时台湾的稻米不仅可满足本地的需要，而且可以输往内地，以致福建漳、泉一带，“皆靠台米为食”。粮食充裕以后，经济作物的发展也有了保障，为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壮大了自耕农、永佃农、小手工业者，雇佣劳动者、小商小贩的实力。他们同清朝当局和贪官污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为秘密会党天地会的传播，提供了存在的土壤。

台湾的天地会是从福建传入的。天地会于乾隆二十六年在闽南一带创立后，曾先后举行过两次反抗斗争，均先后失败，一度沉寂。乾隆四十七年，提喜的嫡传弟子陈彪因“年久案烟，故智复萌”，重新进行传会活动。他在家乡福建平和县传严烟为徒。次年，严烟渡台谋生，在彰化县以开设布铺为掩护，暗中传播天地会。乾隆四十九年，严烟在溪底阿密里与林爽文“往来熟识”。林爽文“时常听见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邀请多人，立誓结盟，患难相救”。[3] 在得知严烟曾入天地会并暗中招人入会时，便向他提出入会要求。严烟见林爽文“为人慷慨”，“遂收其入会”。林爽文又约得林泮、林领、林水返等人一同入会。严烟告诉他们说：“凡要入这会，须设立香案，在刀剑下鸣誓。遇有事情，同教之人大

① 陈其南：《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开垦组织与土地制度的形成》，载《食货月刊》复刊，第九卷第十期。

②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六十五。

③ 张葳：《林爽文案诸犯供词》（上），载《台湾人文》第3期。

家出力，共同帮助。”①在林爽文等带动下，彰化的刘升、王芬；淡水的王作、林小文；诸罗（今嘉义）的杨光勋、黄钟、张烈、叶省、蔡福；凤山的庄大田、庄大韭，以及陈傍、许溪、郭盛、陈樵、吴带、吴卞、李积、郭却、阮泽等人，也先后加入天地会。他们入会的目的，是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如陈傍说：“入了这会，就不怕人欺侮。”

天地会在林爽文等人入会之后，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以致“声势联络，直通四邑”。“北路分为三房，林爽文为长房，蔡福为次房，叶省为三房，其党皆数百人。”这样，天地会在台湾很快便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并团结了大批穷苦群众。当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忍无可忍时，天地会首领便挺身而出，率领会众和其他下层人民奋起反抗。

乾隆末年，台湾的贪官污吏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与压迫，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台湾镇总兵柴大纪于起义爆发前两年接任总兵职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贪污赃银已达五万两之多。② 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在知府任内共亏空白银十万余两。③ 诸罗县知县唐镒，家中本来比较清寒，而“委署诸罗县事为时未久，即寄回银二千两之多”。乾隆皇帝也认为，唐镒“若非在任时肆意贪婪，何从得此多赀？”④林爽文起义爆发后，乾隆皇帝下令对地方官员追究其责任，发现当时在台湾的官吏，皆“贪其土地丰饶，不以涉险为虞，转以得调为幸。而督抚亦不问其才具如何，率多用其私人。此辈莅任后，利欲熏心，遂置地方公事于不问，更或听断徇私，侵婪任意，小民无可告诉”。⑤ 又说，“此等劣员到台湾，若无所津益，何以视为美缺？而其津益非取之商民，从何可得？”⑥当时地方官员的贪污活动，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据被俘的起义军首领于受审时控诉说：“台湾孙知府开造户口册籍，每户俱要几块番钱。刘同知丈量地亩，每亩也要几块番钱。”⑦当时台湾地方官员贪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向出入港口的商船索取“陋规”银。台湾地方当局在鹿耳门海口设立文武两馆，负责防守与稽查之责。武馆由台湾

① 《天地会》（一）第110—111页。
② 《天地会》（四）第395页。
③ 《天地会》（三）第326页。
④ 《天地会》（五）第24页。
⑤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二。
⑥ 《天地会》（二）第99页。
⑦ 《天地会》（四）第401页。

镇总兵派安平中、左、右三营游击、千总,分年按季管理。凡船只入口,船户需交纳"番银"三圆,出口船交纳四圆,作为文武员弁办公饭食之用。台湾官员们贪污的办法,是向超过载运限额者,收取额外的费用,当时人称之为"陋规"银。官员们规定,每只船只准载米二百石,如超过这一限额,超过部分,每百石要交纳番银六圆。据事后官员们奏报,在鹿耳门海口,仅陋规银一项,每年即可收入二万余圆。这笔钱由管理海口的游击、千总们负责征收,其中送给台湾镇总兵三千八百八十圆。在柴大纪任总兵后,又令春季加送六百圆,另送安平协副将二千圆。除书吏工食及纸张等办公费用开支外,其余全部由游击、千总们贪污。鹿耳门的文馆由海防同知管理,入口船只收取番银二圆,出口船每只收三圆。领取朱单者,每船加收九圆。如有额外超载者,每百石也要收取陋规银六圆,每年共征收三万余圆。除用于文馆管理官员饭食、纸张及设立小船引领商船出入,及零星费用二千圆外,其余便由海防同知贪污。鹿仔港与鹿耳门港情况相似,只是因为往来商船较少,所收陋规银数目稍逊。林爽文起义失败后,清廷曾追究当地官员收取陋规银一事,查出在台任职的官员当中,如游击李隆、守备曾绍龙、千总陈邦光等,俱曾得受过陋规银。同知杨廷理虽然任期不长,但也曾得到过一千四百余圆。台湾镇总兵柴大纪所得到的陋规银最多,计一万六千七百余圆。

在台湾居民之中,受贪官污吏之害最深的,是从事商品生产与销售的自耕农、永佃农、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林爽文起义军的首领与骨干,大多属于这一阶层。现据林爽文起义军中被俘者口供,将起义军首领、骨干的职业分布,统计于下:

姓　名	职　务	原来职业
林爽文	盟主大元帅	耕田赶车
庄大田	洪号辅国大元帅	家道小康
蔡　福	总督内外军务	卖糕饼
陈秀英	中南总统大元帅	训蒙度日
陈天送	巡查察院	剃头度日
谢　桧	都督将军	替人种田
郑　记	总先锋	替人喂鸡鸭
吴　领	股头	替人种地

杨振国	副元帅	差役
林小文	元帅	捕役
庄大韭	开南大将军	开鞋铺
庄大麦		训蒙度日
简天德	总参军	训蒙度日
林　汉	辅国左将军	替人种地
许光来	副元帅	种田为生
陈　牙	洪号开南总先锋	替人种田
高文麟	鹿仔港总爷	开杂货店
蒋　挺	信义将军	衙役
林耀兴		耕田度日
许　尚	靖海侯兼都督使	种田度日
陈　傍		肩挑度日
萧　然		木匠
陈　樵		宰猪为生
林　耽		县役
简　鸠		画匠
何朝英		斥革外委
连水清	军师	测字为生
杨　章	元帅	肩挑度日
沈　度	报马	快役
陈妈求	先锋	佣工度日
刘怀清	彰化知县,后主管都察院	刑房书办
何从龙	大司马	监生
陈　梅	军师、安南大将军	算命起课
李　七	平西大将军	种田度日
萧悟天	军师、远大将军	挑卖杂货后出家为僧
林　侯	户部尚书	开酱园
金　娘	女军师	画符治病(女巫)

王坑朗	副元帅	卖鱼为生
赖　应	镇北大将军	开药铺
黄　富	护国将军	种菜度日
严　烟		开布铺

从现存林爽文起义军发布的告示来看,其中提出的口号与要求,也主要反映了这一阶层的利益与愿望。起义军在攻克彰化时发布的《告示》中写道:"本盟主为众兄弟所推,今统雄兵猛士,诛杀贪官,以安百姓。"①在攻占下茄冬时发布的《告示》中,也提道:"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②在顺天丁未(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发布的《告示》中,也写道:"本盟主因贪官污吏剥民膏脂,爰是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官,拯救万民。"③同年七月又在一份《告示》中说:"本盟主因文武贪污,剥民膏脂,爰举义旗,共灭剿除,以快民心。"④从这些起义军发布的告示中,不难看出,这次起义所针对的,主要是清朝当局的贪官污吏,起义代表了农村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和城市平民下层的利益。宗旨并非"反满"或反对土地兼并。

二、起义的爆发

林爽文起义是当地官吏、差役在搜捕天地会成员时的种种暴行所引发的。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台湾诸罗地方官官员对当地天地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搜捕。事件的起因,是该县天地会首领杨光勋与其弟杨妈世为争夺家产反目,各自纠人,欲行械斗。杨光勋又名杨功懋,系捐职州同杨文麟之养子,杨妈世系杨文麟亲生之子。杨文麟偏爱杨妈世,将杨光勋析居,仅供给口食。杨光勋不敷花用,父子、兄弟之间常常为争财吵闹。乾隆五十一年六月,杨光勋约人潜至杨文麟居室搬取财物,被杨妈世发觉赶逐。杨光勋更加愤恨,纠人拟于秋收时,抢割庄稼。他先后纠约何夜等多人结拜,以"弟兄日添,则争斗必胜",而取名"添

① 《天地会》(五)第194页。
② 《天地会》(一)第153页。
③ 《天地会》(一)第154页。
④ 《天地会》(一)第155页。

弟会”。[①] 杨光勋在此以前,已经加入天地会,在当地有较大势力。其弟杨妈世不甘示弱,亦纠人结会。他以杨光勋不肖,必为雷击,因而取名“雷公会”。双方各不相让,一时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署诸罗县事董启埏闻讯后,担心酿成械斗大案,即于闰七月初四日,派遣兵役将杨文麟、杨妈世及添弟会内之黄钟、雷公会内之黄冷等十四人捕获,押解回县审办。是月初六日,诸罗县石溜班汛把总陈和又拿获天地会内张烈一名,亦押解赴县。

杨光勋等侦知后,邀集添弟会何夜等四十七人,持械潜赴斗六门地方,欲于中途劫囚。陈和等押解囚犯一行,途经该处,夜宿倪二客店。杨光勋等将客店包围,双方发生冲突,陈和被当场击毙,兵役皆乘乱逃散,杨光勋等遂将张烈等五人救走。初九日,台防同知董启埏,北路协守备郝辉龙等率领兵役,来至斗六门督拿。台湾镇总兵柴大纪闻讯后亦率兵赶至,将何夜等捕获,杨光勋逃至彰化后,亦被捕获。官员们将捕获之人犯,或处死,或发遣。

张烈等五人,逃至彰化县附近之大里杙村,受到天地会首领林爽文之保护。

林爽文(1757—1788年)福建平和县火烧楼村人。父林劝因“贫无聊赖”,于乾隆三十八年携全家渡台,“佣工于彰化”。[②] 林爽文成年后,最初在彰化县充当差役,后被斥革,便在家中靠“耕田赶车度日”。[③] 官书中说他平日“交结无赖,行窃窝匪”,“时出掠劫”。但承认他为人豪爽,“凡系于狱者,爽文皆脱囊资之,以是倾动其乡人”。[④] 他本人也说,“我并没有什么本事,众人因我为人爽直,所以称我做盟主的”。[⑤] 张烈等五人逃至大里杙村,因受到林爽文的保护,地方官员便欲进村强行搜捕。为了防备官府的袭击,林爽文于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五日邀请会内林泮、林领、林水返、何有志、张四、王芬、陈奉先、林里生等人,在大里杙村内车轮埔“歃血饮酒,互相约誓,有难相救,有事相帮”。[⑥]

大里杙村距彰化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山,枕溪面田,多蓄水,唯一径可达。藏奸匿宄,吏不敢问”。新任彰化知县俞峻派遣差役前往搜捕张烈等人,林

① 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一历史档《天地会》(一)第171页。
② 《天地会》(五)第191页。
③ 张葳:《林爽文诸犯供词》(上),载《台湾人文》第3期。
④ 《天地会》(五)第191页。
⑤ 《天地会》(四)第398页。
⑥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五十四。

爽文率众"自恃该处地避人多,不服拘拿"。[1] 会内林泮、王芬等欲推林爽文为首,率众拒敌,为林姓族长所阻。同年十一月初,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巡阅营伍,途经彰化。知县俞峻、北路协副将赫生额等恳请柴大纪亲自率兵前往大里杙,以迫使林爽文交出张烈等五人。柴大纪便以调兵为名,返回府城,仅派游击耿世文率兵三百,会同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前去办理,知县俞峻亦率差役百余人同往。十一月二十日,清军抵达大墩(今台中市),此处距大里杙尚有六里。俞峻所差兵役来至大里杙,强令村民交出张烈等人,并以焚毁村庄相威胁。林爽文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斗六门地方有杨光勋兄弟,因分家起衅,立会招人入伙。被人告发,并牵连到我们,一齐呈告。彰化文武官同差人各处查办,衙役等人从中勒索。无论好人、歹人,纷纷乱拿,以致各村庄俱被滋扰。"[2]又说:"若到道府衙门控诉,恐同城官官相护,不能替我们办理,反遭其殃,所以不曾控告,就纠众杀官。"[3]后来,清方差役、兵丁将天地会内林泮等人房屋焚毁。林爽文在王芬、林泮等人劝说下,率众奋起反抗。他招集各庄村民与会众二千余人同官府对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此爆发。

从林爽文起义酝酿的经过来看,乃是下层群众被迫举行的一场自卫抗暴斗争,最初并无明确的政治目的,后来也只以反对贪官污吏相号召。这种情况,正好体现了秘密会党的特点。

三、起义初期的胜利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官府派遣兵丁、差役,驻扎在离大里杙六里的大墩,准备对大里杙进攻。起义军为了麻痹官兵,故意让村民"携牛酒伪至军前献款",声称:"请缓师,当擒林爽文敬献麾下,以保村中老幼。"清将赫生额信以为真,致使清军"益懈,不为备"。当晚,起义军结队来至大墩,清军误作是"献款者"。后闻枪炮之声,方知中计,"始仓皇为备"。入夜,有一人假称奉知县之命自大里杙潜回,有机密求见主将。进见时,"忽掩入火药所,以火投之。顷刻,火焰烛天,火药皆尽"。清将赫生额、耿世文及知县俞峻等,皆当场毙命。次日,

---

① 张菼:《林爽文诸犯供词》(上),载《台湾人文》第3期。

② 《天地会》(一)第254页。

③ 《天地会》(四)第400页。

起义军又乘胜进攻彰化县城。途中不断有人加入起义队伍,到达县城时,起义军已达三四千人。十一月二十九日天降大雨,清军枪炮难施,加上守城官兵不及百人,且多系老弱,起义军冒雨攻城。在城内天地会成员接应下,顺利打开城门,进入县城。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同知刘亨基、都司王宗武等,皆被击毙或处死。起义军缴获到大批粮食与武器,释放了狱中囚犯。

起义军在彰化建立起军事性政权,林爽文自任盟主大元帅,以原彰化县署为大盟主府,改乾隆五十一年为"天运丙午年"。林爽文又以杨振国为副元帅,陈奉为军师,侯老为谋士,王芬为平海大将军,王作为征北大将军,林与为先锋,刘贤士为海防同知,林光为理番同知,刘四为彰化知县。又令高文麟驻守鹿仔港,蔡福驻庵古坑,李七守斗六门。在起义军内部,沿用天地会的平等原则,虽有职务上的差别,但彼此间仍以兄弟相称,也没有官府中那套仪礼。首领蒋挺说:"我等虽受官职,不论大小,俱称林爽文为大哥。见他时,坐立俱系随便,并无向他跪拜的。"[①]林爽文本人也说:"我手下人的官职,俱系董喜编造名号,听我封了他们,就有体面。我原只以弟兄相待,他们见了我,没有什么一定的规矩。也有坐着说的,也有立着说的。"[②]林爽文所建立的军事性政权,对起义军占据的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在起义军发布的《告示》中,明确宣布:"兹查顽梗棍徒,在于各庄籍抢粟石财物,肆横无忌,不法属甚。除分头查拿究治外,合行示禁。为此示仰邑属各庄衿耆人等知悉: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在庄肆横,籍抢粟物等项,许该庄民、会众捆解赴本府,按法究治,决不姑宽。"[③]为了满足军需方面的需要,规定了税则,"山地按一九抽,水田按二八抽。若不足用,则向各殷实富户派银"。[④]

起义军占领彰化后,除由高文麟率领三四百人驻守县城外,又将主力分作两支:一支由王作、林小文率领,向北攻打竹堑(今新竹);另一支由林爽文亲自率领,向南攻打诸罗。

诸罗地处台湾南北通衢,系府城屏障。台湾道永福、海防同知杨廷理闻知起义军进攻诸罗,急催总兵柴大纪前往守御。柴大纪开始只派游击李中扬率领

---

① 《天地会》(四)第347页。

② 《天地会》(四)第398页。

③ 《天地会》(一)第156页。

④ 张葳:《林爽文诸犯供词》。

五六百人前往,后来又加派一千二百人增援,并未亲自前往督战。十二月初六日,起义军在诸罗趁大雾弥漫之际,"以火绳结竿上,向施枪炮,绕城四呼",借以张大声势,同时暗中派人赴城下掘城。一部分人将城墙"掘崩之",然后"蜂拥而入",于城内举火为号。① 主力军见城内火起,乘势攻下北门,守军皆溃。署诸罗县事、台防同知董启埏,典史钟燕超,游击李中扬,守备郝辉龙等被击毙。诸罗城内居民热烈欢迎起义军的到来,"也有送银子的,也有送番钱的,还有没钱,供给他们饭食的"。② 总兵柴大纪率援军赶往诸罗途中,闻知诸罗已失,便撤归府城。王作、林小文所率一支起义军,北攻竹堑,行至途中,又有月眉庄李同,猫里社黄阿宁、何添等率众参加起义军。淡水同知程峻、守备董得魁前于起义军攻占彰化时,曾率军赴中港防守。此时闻知王作、林小文率起义军北进,董得魁便急回竹堑。行至途中,遇到义军伏击,程峻自杀身亡,董得魁只身逃到艋舺,竹堑遂为起义军所攻占。

在北路林爽文起义军接连获胜的喜讯鼓舞下,台湾南路凤山一带天地会会众,在首领庄大田等人带领下,也举兵起义。

庄大田(1736—1788)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乾隆七年随父庄二渡台谋生。初居诸罗,后迁居凤山县笃家港,靠种田度日。他因"勤于耕作"而"家道小康"。③ 家中有房屋十余间,田四十余甲,年产稻二百多石,蔗园可产糖两千余斤。另外,在北路台斗坑地方,还另有田二十余甲,年产谷一百多石,由其表弟黄天养代管。④ 乾隆四十九年,庄大田与弟庄大韭等入天地会,后来他成为凤山一带天地会的首领。在林爽文起义之初,曾派陈天送到凤山招人起义。庄大韭与陈天送在凤山聚集了一百余人,准备举行起义。他们向各铺户按家敛钱,并抢夺当铺,凑足三千圆番银,分与众人,并用夺得的布匹,制造布旗。陈天送、庄大韭本来打算把队伍带往北路,与林爽文起义军会合。但会众们不肯离开南路远行,遂推庄大韭为首,在南路独立活动。庄大韭因自己年轻(仅二十岁),恐难以服众,遂推其兄庄大田为"大哥"。庄大田于数日之内,聚集了二三千人,并且"出家资,制器械",自称"洪号辅国大元帅"。他以简天德为军师,许光来为副

① 《天地会》(五)第173—174页。
② 《天地会》(二)第245页。
③ 《天地会》(三)第197页。
④ 张葳:《林爽文诸犯供词》。

元帅。[1]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庄大田率领起义军攻打凤山（今高雄）。清军守将瑚图礼于城外迎战，并用大炮轰击。起义军见强攻难以取胜，便佯作撤退之状。瑚图礼遂只身放马直追。另一支起义军见清军无人指挥，即乘势攻入城内，守军猝不及防，"枪炮莫施，旋即溃散"。[2] 凤山县知县汤大奎、典史史谦皆被起义军处死。瑚图礼见县城已失，便只身逃往府城（今台南）。

林爽文闻知南路凤山大捷，便派人约庄大田联合攻打府城。清同知杨廷理、守备王天植为了防止南北两路起义军会合，率领官兵、"义民"前往大穆降驻守。府城的清军也加强了戒备，由总兵柴大纪，游击蔡攀龙分别防守城南北两面，杨廷理又在府城内招募了八千名"义民"，协助防守。十二月十八日，南路庄大田一路进至离府城南十里之桶盘盏，北路林爽文军也攻至离府城北面十里之盐埕桥。二十九日南北两路起义军会师于大穆降。清军撤回府城，起义军随即将府城四面包围。

林爽文起义爆发之后，于半月之内，连克彰化、凤山、诸罗、竹堑诸城，清军仅控制着府城及鹿仔港等四五处地方。起义军在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胜利，是由当时双方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从清军方面来看，统兵将领腐败无能，兵丁士气低落。在台湾驻守的清军，号称万人，但是，军队的兵丁，大部分被派在各级将弁衙署内充当杂役，分作旗牌、伴当、材官（或曰内丁）、管班四种。在总兵衙署内听差人数就多达三百名。副将至守备的衙署中，听差人数按照总兵之数，依次酌减，最少也有二三十人。据当时统计，清军兵丁在台湾各级衙署内充当各种杂役的人数，超过兵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致"存营兵丁，所剩无几"。[3] 清军各级将弁层层克扣军饷，使兵丁们连起码的衣食皆难以保证，只得外出谋生，仅在兵营内挂名，雇请同营兵丁，每日清晨点名时，代为"应卯"，这种情况在当时甚为普遍，称为"包差"。外出兵丁，或者在街头巷尾充当小贩，出售槟榔、糕饼，或者编织草鞋出售，或者到皮货铺内帮做手艺，有的甚至"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领兵将领们甚至把清政府用来为兵丁们修缮营房的款项也饱其私囊，造成兵营年久失修，房屋坍塌。

① 《天地会》（五）第198页。

② 《天地会》（一）第234页。

③ 《天地会》（五）第96页。

兵丁们"无可栖止",若"租赁民房"又"力有不赡",只好借住娼家。因为"娼家留兵居住,借以包庇,而兵丁既省房租,兼可寄食"。种种弊端,使得台湾各处戍兵,"离营散处,技艺生疏。即遇操演之期,亦复虚应故事,并不按名全到"。兵丁们因"经年不操演",以致"鸟枪俱已锈涩难用"。[1] 清军统兵将领们又往往遇事推诿。总兵柴大纪身为台湾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当他巡阅营伍途径彰化,当地官员恳请他亲往大里杙帮助地方官搜捕天地会成员时,他竟以调兵为名返回府城,不肯亲往。当起义军攻打诸罗时,同知杨廷理等人一再催促他速往救援,他却一再拖延不往。最后,杨廷理提出:"若将总兵印付我,当代为出城。"[2]柴大纪才勉强答应前往诸罗。但仍以人夫短少,炮位、火药无人抬送为借口,故意拖延时间,以致诸罗被起义军攻占。

从起义军方面情况来看,首领、骨干主要是城乡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他们身受官府的压迫与贪官污吏的勒索,已经无法忍受。他们是为生存而奋起反抗,因而士气高昂。加上天地会作为起义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天地会崇尚义气,忠于誓言,强调同会之人要互济互助,打仗时彼此帮助,互相关心,首领与一般成员平等相待,容易鼓舞士气。起义军内赏罚分明,"每胜必犒牛酒"。对于战场上牺牲的弟兄,必要将其尸身抢回,妥善安葬。[3] 起义军士气旺盛,勇敢顽强。起义军成员大多出身下层劳动者,吃苦耐劳,不畏艰辛。这一点与清军恰成鲜明对比。起义军常常利用雨天清军枪炮难以发挥其优势之时,发起攻势。清军则因"平日习惯娇惰,不耐雨淋,往往吃亏"。起义军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常常把从清军或富户处得来的钱米,散发给穷苦人民。因而不断有"无食游民"加入起义队伍,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在战略方面,起义军在初期也运用得当。在攻克彰化后,趁内地清军未大批到达以前,迅速攻占了诸罗、凤山、竹堑等重要城市,控制了交通要道与战略要地,使驻守在府城的清军,腹背受敌,坐守孤城。

起义军之所以未能将府城一举攻占,主要是当地地主武装——"义民"所致。在府城,杨廷理招集了八千多名"义民",日夜在城上巡逻,大大加强了清军的防御能力。各地地主武装又不断对起义军后方进行袭击,也迫使起义军无法

---

①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六十一。
② 《天地会》(四)第322页。
③ 《天地会》(五)第250页。

集中兵力来攻打府城。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泉州籍“义民”林凑、黄邦、许伯达等，率领数千“义民”，协助清将陈邦光袭击彰化。当时，彰化仅有起义军三四百人，闻知清军来攻，急忙退守县城西门，接战后，很快便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首领杨振国、高文麟、杨轩、陈高等被清军俘获，彰化重新落入清军之手。在淡水，清军署都司易连在“义民”协助下，袭击了驻守新庄的起义军，将被起义军俘获的淡水同知程峻、新庄司巡检李国楷等人的家属救走。起义军首领林小文打仗失败，逃至昆仑山顶观音庙内躲藏，又被“义民”所捕获。[1] 淡水同知程峻的幕宾寿同春，在起义军攻占竹堑时，假意投降，并骗得起义军的信任。他暗地又勾结原竹堑俸领巡检李生椿等，纠集“义民”数千人，偷袭起义军驻地，将首领王作等人杀害，恢复了清政权在淡水一带的统治。在南路，同样也发生了“义民”袭击起义军的事件。凤山县举人曾中立等，趁庄大田攻打府城之机，率“义民”攻打庄大田所居之笃家港与阿里港。迫使庄大田率军回防，放弃了对府城的包围。林爽文因彰化受到“义民”的袭击，竹堑、淡水又告失陷，恐大里杙再受威胁，只好也从府城撤军。这样，第一次联合攻打府城的战役，便因“义民”的干扰而失败了。

四、从相持到起义失败

方林爽文起义军于半月之内，连下数城，守城清军接连败北，消息传到福建，清督抚大吏极为惶恐。闽浙总督常青急令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兵三千，自厦门径渡鹿耳门；令闽安协副将徐鼎士率兵一千，从闽安口出发，赴鹿耳门与黄仕简会合。福建巡抚徐嗣曾闻知台湾形势严重，惊慌失措。一面调集本省各地驻军齐集泉州，听候差遣。一面咨会广东督抚提镇及浙江抚、提二臣，于附近水师营内拨二三千名，预备策应。因过于慌张，以致在未同闽浙总督常青咨商的情况下，便“越制”命令闽安协副将徐鼎士率兵渡台，结果同常青的命令相冲突，以致受到了乾隆皇帝的严厉训斥。

在林爽文起义之初，乾隆皇帝并未予以重视。他认为黄仕简抵台后，起义军很快便会“望风溃散”。当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请亲自赴台镇压起义时，乾

---

① 《天地会》(二)第229页。

隆皇帝竟在奏折上批曰："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①]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乾隆皇帝的预料！黄仕简、任承恩同时到达台湾，起义军不仅未"望风溃散"，反而同清军相持了将近一年之久。黄仕简抵台后，命令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向北进攻诸罗，令海坛镇总兵郝状猷向南进攻凤山，他本人坐镇府城。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柴大纪率清军一千九百余人，自府城出发，攻打诸罗。该处守将为起义军首领蔡福、叶省，二人闻知清军来攻诸罗，便把主力撤往诸罗附近的山区，仅留数百人守城。清军守备邱能成率部抵达诸罗时，守城起义军尽皆逃散，使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诸罗县城。台湾镇总兵柴大纪闻讯后，急忙向清廷报功。他故意把这次战役描述得十分激烈，并且把大批百姓作为"生擒贼匪"上报。其中所奏"生擒贼匪林老并番妇留娘等共八十二人，拿获伪军师侯辰一名"，纯属虚报战果，并非事实。

在柴纪奏折中开列的八十二人的名单中[②]，有许怀等三十五人均属无辜平民。福建巡抚徐嗣曾在查明此事之后奏称："据署嘉义县张森禀称，前柴大纪所奏正法及戮尸各犯内，竟有其人尚在者。访系柴大纪误拿，经前任知县陈良翼审属良民，具保释放。"陈良翼称：当日审明保释者"实有许怀等三十五名，委系良民。因柴大纪以匪犯具奏在先，逼迫通报，以符奏案，只得听从具详"。徐嗣曾认为此事"其舛错荒谬，实出情理之外"，遂与知府杨廷理等人，亲自驰赴嘉义查办。审讯时许怀等三十五人供称："上年（指乾隆五十二年——引者）正、二月内，嘉义甫经收复，或因官兵初到，出城迎看，或因迁避他处，回至县城探亲，途中误被捉拿。并有肩挑贩卖及在店生理，遇有不肖兵丁、义民强买抢取，与之较论，转被误拿者。"经徐嗣曾等讯原保人。保人坚称："当日县城初复，缉匪甚严，如城内遇有贼犯，我等正要擒献究治，岂肯转为容隐！唯因稔知许怀等实系良民，方敢出结，如有欺隐，情愿全家治罪！"后经徐嗣曾等亲自查看，在许怀等三十五人中，"内有张海已年逾八十，翁送来年甫十五，素患疯病之陈应，避难流离之番妇留娘，其衰弱疲癃，势难从贼，更一望可知"。徐嗣曾又询问知县陈良翼，陈良翼称："上年柴大纪克复嘉义之后，凡遇官兵、义民有报获之犯，不论在何处拿获，即以临阵生擒贼伙若干名，遽行入奏。""其许怀等三十五名，再四研鞫，实系被人误拿，俱有邻保人等环诉呼冤，昼夜络绎不绝。"当陈良翼向柴大纪提出

---

① 《天地会》（一）第190页。

② 《天地会》（三）第15页。

应将其释放时，柴大纪却说，“事已具奏，并经咨报各地”，必欲按名正法。陈良翼又同教谕江浩等前往力争，柴大纪又称：“我已奏定系拿获匪犯，万难更改。尔若开释，必须照依原奏通报立案，我就不管，否则必要将伊等正法。”徐嗣曾又向当事人核对，证明陈良翼所述属实。① 说明柴大纪所奏生擒番妇留娘等八十二人一事，纯属虚捏。

在南路方面，由海坛镇总兵郝壮猷等，率清兵二千一百余人，于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六日从府城出发，向南攻打凤山。他率兵日行五里，直到十九日才来到距府城二十里的大湖地方。在这里因受到起义军的阻击，滞留一月有余。黄仕简只得又加派福宁镇游击延山，带领五百人前去增援。并命令水师游击郑嵩由海路绕至凤山南面，对起义军进行两面夹击。

起义军首领庄大田见清军来势汹汹，便将主力自凤山撤出。二月二十一日，郝壮猷率清军来到凤山，见只有一座不设防的空城，便命令游击蔡攀龙带领八百人进驻城内，自率主力驻扎凤山城外。黄仕简见凤山已复，以为南路已不足虑，又担心府城受到北路起义军的攻击，便将较为得力的游击蔡攀龙调回府城防守，将副将丁朝雄调回安平守御，仅留参将瑚图礼，游击郑嵩驻守凤山。庄大田探知清军主力纷纷调离，便着手恢复凤山。他先以调虎离山之计，将凤山守城清军引开，派兵分别攻打新园（今屏东县）、水底寮及三角湖等地。郝壮猷果然中计，便又把瑚图礼派往新园。瑚图礼在前往新园的途中，被起义军阻于硫磺溪下游。庄大田又假造一件公文，用山猪毛守备邵振纲的名义，向郝壮猷求援。在公文上盖以瑚图礼以前在凤山失守时遗失的官印。郝壮猷未察真伪，便又将郑嵩派往山猪毛。凤山县城只剩下了郝壮猷本人一个光杆司令。郑嵩所率救援山猪毛的清军，也被阻滞于硫磺溪下游。起义军早已将溪水于上游拦截，待瑚图礼、郑嵩两支清军在溪河下游驻扎后，突然把溪水在上游放开，使溪水一涌而下。清军猝不及防，大部被溺死，郑嵩只身逃归凤山。

三月初八日，庄大田趁清军在硫磺溪溃散之机，大举向凤山进攻，郝状猷急忙退入城内。次日，庄大田自率主力继续同清军相持，同时另遣一支队伍，身穿于硫磺溪缴获的清军服装，混入凤山城内，他们趁庄大田攻城之际，于城中举火为号，内应外合，一举将城内清军消灭。游击郑嵩、延山毙命，总兵郝壮猷、参将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纪簿》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折，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那穆素里、都司罗光炤等，率残兵四百人，逃归府城。[①] 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共歼敌一千四百余人，缴获鸟枪一千余杆，炮五十余门。[②]

清军在凤山大败的消息奏报到朝廷，乾隆皇帝见后大为震怒，下令将总兵郝壮猷于军前正法，参将那穆素里以下将弁俱"革职暂留军前效力赎罪"。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二人也因贻误军机，被"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③] 又调湖广总督常青为闽浙总督，亲自赴台湾主持镇压林爽文之军务。常青本来是个依靠权臣和珅之力爬上高位的庸碌之辈，督兵打仗，素非所长。加上当时台湾清军处境又十分困难，他更无力扭转清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常青抵台时，清军"旧有之戍兵已散失殆尽"，而现存兵丁仅一万三千名，且分扎于数处。凤山战役之后，清军"兵力益形单薄"。[④] 清廷自镇压林爽文起义以来，已耗费了大量军费，在数月之内，已花费白银三十三万两。台湾本地府库原存之银二十五万两，粮二十万石，此时也已用尽。清军控制的地区，日渐缩小，"惟府城及鹿仔港等四五处"，还在清军手中。

林爽文和庄大田利用凤山大捷后的有利形势，再次联合攻打府城。

三月二十六日，南路庄大田一军已攻至离府城仅三里之三嵌店，北路林爽文派其三弟林勇率三千人与之同攻。这时，府城的清军仅有三千余众，临时雇募了万余名乡勇。二十七日，起义军号称十万大军，对府城发起攻击。清将蔡攀龙被起义军包围，战马亦被击伤，蔡本人仅以身免，所部全部被歼。府城内雇募之乡勇，没有多大战斗力。他们见官兵连吃败仗，"皆退入城，城中大扰乱"。[⑤] 当时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力，大有一举将府城攻占之势。但在此关键时刻，发生了起义军将领庄锡舍叛降清军事件。庄锡舍本来奉命攻打府城南门，在起义军发动总攻的前夜，他密遣心腹庄登潜至清营，向台湾道永福等密报庄锡合已决意"悔罪投诚"，并向清方泄露了起义军内部的机密。他告诉清方："庄锡舍已坚意投顺，故叫我先来报信。现在庄锡舍手下带有两千余人，已与他们说明，俱各情愿投降。明日临阵，不敢与官兵抗拒，庄锡舍亲入投诚。"[⑥]二十

---

① 《天地会》(二)第84页。
② 《天地会》(二)第124页。
③ 《天地会》(二)第68—69页。
④ 《天地会》(二)第124页。
⑤ 《天地会》(五)第213页。
⑥ 《天地会》(二)第125页。

七日清晨,庄大田率起义军对府城发起攻击后,各路队伍,纷纷奋勇攻城。庄锡舍却命令所部"弃械安顿城外",自己单身进入城中向清方投降。他对清将永福"磕头涕零,情词恳切"地表达了投降的心愿。清帅常青虽"观其降出至诚",但仍命令他说:"如果实心投首,即应带手下人,一同杀贼,方见诚心投顺。"庄锡舍便"遵谕出城",随同蔡攀龙、特克什布、杨廷理等人的队伍,"往杀庄大田贼众数十人"。起义军方面于攻城之际,突然发现庄锡舍"反戈横击",以致"登时哄乱"。[①] 庄大田急令起义军撤回南潭。林勇见大事不妙,也率部返回北路,第二次南北两路联合攻打府城之役,再次以失败告终。

府城战役后,清政府加强了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从福建、广东等省加派兵丁八千余人,渡台增援,又从粤海关拨银三十余万两,作为镇压起义军之军费。起义军方面,庄大田一军驻守在距府城以南二十里之鲫鱼潭、南潭一带,对清军进行骚扰性袭击;林爽文一军,则全力攻打诸罗。北路起义军为了切断诸罗与府城之间的联系,于四月中旬,控制了府城以北三十里之麻豆庄。五月末,林爽文又攻占了诸罗的出海口笨港。至此,府城同诸罗之间陆、海两方面之联系,均被切断。六月初十日,林爽文已将诸罗县城包围。清台湾镇总兵柴大纪被围在城内,只能将奏报军情之折稿,书写于"寸纸"之上,雇用当地平民于夜间潜赴鹿仔草,再由海路送往府城。常青到台主持军务以来,丝毫未能扭转清军的被动局面,而且使清军的处境比以前更加不利。不仅诸罗已被起义军包围,连府城实际上也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在府城以外二三十里的地方,便由起义军控制。常青面对这种局势,一筹莫展,于是向乾隆皇帝奏请再派一"大员",来台"督办军务"。乾隆见奏,感到常青昏聩无能,难以胜任,遂决定派遣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接替。

被围困在诸罗城内的总兵柴大纪,不断向常青告急求救,"以安垒卵"。常青自从诸罗被包围以后,曾先后四次派兵前去救援。起义军则采取围城打援的战略,将救援清军加以重创,然后将其放入诸罗。进入诸罗的援军,刚刚吃过败仗,加上缺少武器弹药,只能给城内清军增加负担,"徒增吃用之人,愈形拮据"。[②] 到同年八月,诸罗形势已十分危急。柴大纪奏称:"诸罗被围两月,粮饷、铅药一切匮乏。""新到之兵,其气甫挫,一时不能出剿。旧有之兵为数无多,

---

① 《天地会》(二)第125页。

② 《天地会》(三)第234页。

只堪力守。"又说:"孤城坐守,深可忧虑。就地煮硝制药,所得无几,且米谷一项日见空乏。"[①]乾隆皇帝见诸罗已危在旦夕,遂于八月二十七日命令柴大纪"突围而出,不可拘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见,固守勿去,致有意外之虞"。[②]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福康安以"钦差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偕参大臣海兰察,领队大臣普尔普、舒亮,成都将军鄂辉,以及巴图鲁侍卫章京一百二十余人,统领调自湖广、四川、广西、贵州等省的满、汉兵丁及"屯练降番"万余人,号称十万大军,渡海到达台湾。

福康安对于赴台镇压林爽文起义,做了周密的准备。在厦门等候渡海之时,福康安便采取了政治攻势,大肆宣扬"十万大军不日抵台",企图先从心理上对起义军造成压力,又大力网罗从台湾逃来内地避难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出谋划策。这些因躲避起义军来到内地的知识分子,对起义军充满仇恨,又熟悉台湾本地情况,他们所献计策,对福康安来说,有较大参考价值:使福康安在抵台前,对那里的情况,就有了一定的了解。清军抵台后,又设法瓦解起义军士气,到处张贴告示,"先檄招来,并户给盛世良民旗号,谕令归庄者无罪"。[③]并宣传凡叛降投向清方者,俱"优加奖赏,擢受官职"。[④] 在军事上,福康安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派舒亮带领一支队伍,去攻打大里杙,而以主力去解诸罗之围。对外则声言以主力进攻大里杙,以便把起义军的主力吸引到大里杙方面来。十一月初六日,他与海兰察从鹿仔港出发,径攻诸罗附近的起义军。为了防备起义军从中途狙击,福康安把队伍分为五起,以便互为应援,又令"义民"在前"踩探道路",充当打头阵的任务。十一月初八日,清军攻占了仑仔顶。由海兰察率领的前队,很快到达距诸罗六七里之牛稠山,突破了起义军的包围圈,进入诸罗。福康安所率后队,则负责清除小股的起义队伍,也很快进入诸罗,与海兰察一支清军会合。起义军面对清军的强大压力,被迫放弃了对诸罗的包围,撤退到斗六门。清军立即尾随而至,双方在大埔林、中林、大埔尾等处,先后接战。起义军接连战败,被迫退回大里杙。福康安、海兰察率领清军主力,很快也赶来大里杙,与先期来到该处的舒亮一队会合。

① 《天地会》(三)第228页。
② 《天地会》(四)第95页。
③ 《彰化县志》卷十一。
④ 《天地会》(四)第95页。

起义军趁清军尚未扎营之际，首先用大炮对清军进行轰击。双方展开激战，直至日暮。入夜之后，起义军继续展开攻势，“往返扑压五六次”，一直打到次日黎明。二十五日，福康安留下一部分队伍，与起义军正面相持，而自己则同巴图鲁侍卫等，率军由大里杙西南、西北两门攻入。起义军首领林素等二百余人牺牲，大里杙遂被清军攻占。十二月初四日，集集埔被清军攻占，林爽文又率所剩两千余人，转移至小半天地方，在此竖立木栅，垒石为墙，并将路旁树木砍倒，作为路障，以阻清军前进。清军由普尔普率领的一支队伍，攀援直上，砍倒木栅，清除路障，将小半天攻占。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林爽文手下仅剩二百余人。清军派巴图鲁侍卫二十一员，率贵州、广东屯练兵丁数百名，改装易服，扮作平民，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将林爽文、何有志等人擒获，北路一支起义军至失败。

接着，福康安又率军往南路攻打庄大田一支起义军。庄大田一支队伍，主要聚于凤山及府城东北部的大武陇，以及府城南面的南潭等几个据点。正月十九日，清将鄂辉、普尔普分别从南北两面攻入大武陇。福康安则自府城出发，攻打南潭、大穆降一带。不久，凤山落入清军手中，庄大田于二月初率领数千人退至台湾南瑞的瑯桥。二月初五日，清军兵分五路，自山梁依次排列，直达海岸，向瑯桥进攻。清将乌什哈达率水师于沿海密布船只，以防备起义军撤往海上。最后，清军从四面合围，水陆并进。起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牺牲了二千余人。许多起义者见大势已去，便“相率投海”，以致“尸浮海面”。庄大田于战败后逃入树林，黑夜坠马，跌伤颈项，加之素患气喘之症，难以远行，遂为“义民”所擒获。庄大韭、许光来、简天德等重要首领及起义军家属八百余人，皆被清军俘获。南路起义军也告失败。

五、起义失败的原因与历史作用

台湾林爽文起义，经过一年多浴血奋战，最终失败了。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虽然一度控制了台湾平原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与清统治者的力量相比较，仍然过于悬殊，不足以与之抗衡。福康安所统领的清军，是从内地七个省调来，而且粮饷、物资皆由大陆源源不断地运往，而起义军却只能在当地就地筹集。清统治者曾断

言,“林爽文党羽不过漳州一处之人,为之抗拒官兵,较之粤东、泉州义勇百姓,仅止三分之一”,即“以台湾之人攻台湾之贼,已属事半功倍,况加以如许官兵,更复何往不克,又况陆续添调之兵,源源接应耶? 且林爽文所有粮食、火药等项,止系在台湾各处抢掠,随用随尽,岂能久支? 而官兵粮饷军械,铅弹火药,络绎运送,用之不竭,是贼人之力量有尽,而官军之接济无穷。贼匪又何能负固一隅,相持日久?”①这些说法虽属夸大其词,但双方力量悬殊,却是事实。所以,在当时情况下,起义军想坚持下去或取得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

林爽文起义失败,当然还有一些具体原因。

首先,清军从统帅到兵丁,都受到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与掌握武器的技能。清军统帅福康安是一名镇压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老手,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其副手海兰察,是清军中有名的“悍将”。他足智多谋,多次辅佐福康安东征西讨。原先驻扎台湾的清军兵丁,虽然腐败无能,但当地地主武装即“义民”,在镇压起义军从过程中,却弥补了清军的这一缺陷,使起义军未能于清援军抵达之前占据台湾全岛。起义军的首领到一般成员,皆未受到过军事训练,武器也较简陋。首领林爽文、庄大田皆一般农民出身,缺乏统率军队打仗的组织能力与军事才能。起义军中虽然设有“军师”、“谋士”一类职务,但多由测字、算命者或巫师、和尚等一类人物充任,这些人当然也没有作战经验。由于起义军缺乏有远见卓识和军事才能的领导者,在指挥作战时,往往会出现失误。如起义军比较重视攻城,却疏于防守。在占据彰化、诸罗、竹堑等城市后,不设重兵防守,往往轻易又将其丢失。尤其是忽视了对沿海港口的控制,使清政府得以把援兵、物资源源不断地由内地运来台湾。福康安的幕宾赵翼曾指出:“幸林爽文等皆山贼,但知攻城,不知抢海口,故我师得扬帆至。然海舟大不能附岸,须鹿港出小船二十里来渡兵。倘贼有智计,先攻鹿港,鹿港无城可守,其势必拔。拔则海口禁小船,我海舟虽至,亦不能薄而登。”②起义军在第二次联合攻打府城失败后,基本上未再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只在府城、诸罗两处长期与清军相持,使清军得以从容调兵遣将,从内地七个省调来大批援军。这种长时间与清军相持的错误战略,同领导人缺乏卓识远见和军事知识不无关系。

其次,林爽文起义军的首领、骨干都是由城乡小生产者、小私有者所组成。

---

① 《天地会》(三)第336页。

② 《天地会》(五)第247—248页。

他们提出的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在起义初期确实起到了动员群众和鼓舞士气的作用。人们出于对清朝贪官污吏的痛恨，在作战时，奋勇向前，连连获胜。但是，当起义军占领一些城市、乡村，杀掉一批为人民所痛恨的贪官污吏之后，便以为起义的目的已达到。这时，起义领导者，未能根据新的形势，即时提出新的纲领口号，使群众的热情难以保持。加上长期打仗，起义军被拖得疲惫不堪，因而士气逐渐衰颓。相反，福康安带来的清军援军，却是刚刚参战的生力军，其士气与战斗力，都大大超过起义军。一经接战，起义军便连连失利，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便土崩瓦解了。

林爽文起义在清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起义，历时一年有余，一度控制了台湾岛上平原地带的大部分地区，使清廷大为震惊。清廷为了镇压这次起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先后从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浙江、贵州、湖广七个省，调集了大批军队，总数共计六万余人，耗费军饷达白银一千万两，相当于清廷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清军在林爽文起义爆发之初，接连败北，统治集团两易清军统帅，并将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水师提督黄仕简“革职拿问”，将海坛镇总兵郝状猷于“军前正法”。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起义军共击毙清军千、把总以上将弁一百四十八人。清军兵丁伤亡、失踪总数达四千九百五十余人。福康安抵台后，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清军伤亡也很惨。其中满汉官兵伤亡四百七十八人，四川屯练兵丁二千八百七十八人。①

林爽文起义，使清统治者看到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的仇恨，被迫惩办了一些声名狼藉的贪官污吏，取缔了不合理的港口出入口陋规。

① 《明清史料戊编》第四本，第 361 页。

第八章　乾隆末年天地会的活动

一、福建漳浦县张妈求攻打盐场衙署事件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正当清廷忙于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之际，福建漳浦县又发生了以张妈求为首的天地会攻打该县盐场大使衙署、税馆事件。张妈求是福建漳浦县人，居住在该县眉田社。这一带一向是天地会活跃的地区，张妈求的父亲、叔叔生前都是天地会“会内之人”。① 张妈求与同村之张南、邱哇及附近之方开山、何体、张令、张莪、张柱、张养等，皆入天地会。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张妈求等赴黄峰圩场，在何体家内聚会，各道贫难，大家感到零星抢劫，无济于用度。张妈求提出，先抢县城仓库，可以多得钱财。待有了银米，可多纠人，人数众多，便可起事。即使官府查拿，也可率众抵御。如不能占据县城，难以立足，还可以抢夺商船，逃往台湾，去投奔林爽文。大家议定后便去分头纠人。张妈求记起乾隆三十三年卢茂起义时，曾用“顺天当事”之旗号，又听说林爽文自称“顺天将军”，于是让人制造红绸方令旗一面、尖角小旗六面。因方开山素能刻字，便令他镌刻“顺天将军”四字木印，以便起事后假称台湾林爽文发来。众人推张妈求为首掌印，张南、邱哇二人为之羽翼，执掌方旗，方开山、何体等人各执尖角小旗。计议已定，便同至黄峰后屏山上，“密行跌筶”，订盟而散，约定分头纠人。其后，张妈求招来胡仲江等二十人，张南招得郑玉琪等七人，邱哇纠得郑火等十二人，方开山招得黄芋等九人，何体招得黄清等九人，张令招得康川等七人，张莪招得张王送等十一人，张柱招得蔡穆等九人，张养招提赵炳等六人，一共一百零八人。定于十二月十二日夜，齐赴漳浦县城外关厢举事。张妈求令张养等人先期预伏城内，于夜间放火为号，以便乘势攻入，抢夺仓库。

---

① 《天地会》(五)第368页。

是月初，会内张从等人抢夺附近百姓牛猪衣物。事主声言报官，张从等声称："抢取牛猪算什么事，将来县城内仓库也俱是我们的。"事主将此事报告官府，县署闻讯严加戒备。张妈求等得知县里有备难以突袭，遂决定提前举事。是月初七日，张妈求、方开山等率众各执器械，来至户头水汛清军营房，喊称："台湾林爽文党伙数千，随后即到。"随即攻入营地，砍伤汛兵，焚烧税房，夺得银钱及衣物多件。然后，又来到漳浦县盐馆，杀死管事亲丁、捕哨等多人，夺得关部船牌三张、县照三张、拨单一张、盐价银一百二十八圆，钱二十一千文，以及衣物等。烧毁盐四十余包，馆屋七间。张妈求等决定，俟抢得较多物资后，便夺船渡海赴台，参加林爽文的队伍。是月初八日，张妈求等率众来至杜浔海滨地方，一路高喊"尚有台湾数千人在后"，奔入盐场大使萧存骞衙署之内，又夺得许多银钱、财物。接着又赶至下缯地方，烧毁清军营房一处。漳浦县知县闻讯，会同署漳州镇左营游击许腾蛟，带领兵丁前往擒捕，署提督常泰等得知后亦连夜前往督捕。张妈求见官兵势众，难以抵敌，遂各自逃散，后为官兵擒拿。①

张妈求等攻抢漳浦县盐场大使衙署、税馆一事，是当地社会矛盾的产物。盐商们对盐民"吮骨吸髓"，"尽哺之编氓与晒丁，并其家口老幼之血肉而归之"，②盐民、晒丁们还要受贪官污吏之敲诈勒索，因此，张妈求等率众烧抢盐场、税馆受到当地穷苦盐民与晒丁的支持。

二、台湾的"复兴天地会"活动

福建省的漳州与泉州两地民间向来不睦，甚至互相械斗，这个传统也随着移民带到台湾。张标籍隶福建漳州，与当地泉州人中仇家甚多，欲纠人结会，以防备泉州人。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遇见素识广东人谢志，与之谈心，称欲纠人结会，防备泉人。谢志回称，"既欲纠人结会，何不复兴天地会？"张标回答"很好"，并问如何结法。谢志回称，结会时"要排设香案，在神前要歃血饮酒钻刀，对天立誓，如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张标即与谢志商定，再邀几个同心之人各去分头纠邀，才得人多。张标邀得吴顺光、张阿秀、萧翁、陈把、江元禄、张夜、张文、林禄八人并告知谢志。遂与谢志商量，所邀之人要有凭据给与。谢志

① 《天地会》(五)第363—374页。

② 《漳州府志》卷十五。

交给张标“图书”一方，并称凡有入会之人，将图书印信纸片一张，作为凭据（上刻“福忠兴万和合”）。张标与谢志约定，九月初二在南投虎仔坑僻静处所订盟结会。至期，张标所邀之吴顺光、张阿秀、萧翁、陈把、江元禄、林禄、张夜、张文八人，并张标、谢志一共十人齐集。吴顺光等俱称该应张标做大哥，张标辞不敢当。在虎仔坑排设香案，在神前宰鸡歃血钻刀。谢志拿出誓章一纸，称系从前天地会旧誓，张标同吴顺光等在神泉（前）跪读毕，将誓章在神前焚化。张标与众人饮血酒。谢志又称，会内之人相见，左手伸三指朝天为暗号，这是从前天地会的旧记号。张标嗣后又添邀赖束、赖使、陈月德、寥罗、王都、陈选六人，于九月十五日在张标家中又行结会一次。张标各印给图书纸片一张，并传授伸指朝天为暗号而散。谢志亦邀施铗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谢志家结会，张标所邀之吴顺光、张阿秀、萧翁、陈把、江元禄、张夜、张文等又各分头邀人。吴顺光转邀张卢、萧降、陈光三人，于九月十九日在吴顺光家内结会；张阿秀转邀张万、林廉、张萍、萧喜、刘添、顾安六人，于九月二十一日在张阿秀家结会；萧翁转邀曾动、刘吉、陈和三人，于九月二十二日，在萧翁家内结会；陈把转邀王受、张谰、谢振三人，于九月十九日在陈把家内结会；江元禄转邀杨成呈、吴刊二人，于九月二十四日在江元禄家内结会；林禄转邀施莫、赖宅元，于九月二十三日在林禄家内结会；张夜转邀张凭、何堪、张福、张英四人，于九月十八日在张夜家内结会；张文转邀陈兰，于九月二十日在张文家中结会。赖束等十一人，均经供认入会，分给图书纸片，并传过天地会伸指朝天暗号。审讯时，清吏诘以图书因何刻“福忠兴万和合”此六字。张标供称：“这就是谢志给我的图书，他曾说入会的人如肯忠心兴会，多多招人，大家合和，便有福气。”又诘以誓章内的话。据张标供：“我记不全了，总要同心协力，若是负盟，刀下亡身的意思。”又供：“原约定稻谷收成后，合作总会，好立会簿，登记人数。”①

谢志供称：“我是广东人，自幼随同父母来到彰化，平素肩挑为活。上年七月二十八日，遇见素识的漳州人张标，与我谈心。他说起向与泉州人不和，仇家甚多，想要纠人结会，防备泉州人的话。我说既要纠人结会，何不复兴天地会？张标问我如何结法，我说要排设香案，在神前宰鸡歃血钻刀，对天立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并与张标商量再邀几个同心的人，各去分邀，才得人多，我与张标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按察使万钟杰折，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七日，载《天地会》（五）第375—378页。

各去邀人。我想入会的人应该有凭据给他，又想大家若肯忠心兴会，多多招人，便有福气。当叫不知姓名人刻了图书一个，上刻福忠兴万和合六字。隔了几日，张标来对我说，他已邀了吴顺光、张阿秀、萧翁、陈把、江元禄、林禄、张夜、张文八人，俱应允转去邀人入会。张标又说，入会的人要有凭据给与。我就将图书交给张标，并嘱凡有入会的人，将图书印给纸片，以为凭据。张标约我九月初二日在南投虎仔坑僻静处所订盟结会。至期张标同吴顺光、张阿秀、萧翁、陈把、江元禄、林禄、张夜、张文连我一共十人，在虎仔坑齐集。吴顺光们都推张标做大哥，张标推辞，我也说张标该做大哥。张标依允。当在那里排设香案，在神前宰鸡歃血钻刀，我拿出天地会旧誓章，同张标们在神前跪读了，将誓章在神前焚化，与众人分饮血酒。我又将天地会用左手伸三指朝天旧记号传授众人记明散回。"[①]又供称："乾隆五十三年，贼匪初平时候，有陈信逃在南投，我与他认得。陈信借在我家暂住，我见他衣包内有天地会誓章一纸，我问他天地会如何结法，他说：要排设香案，在神前宰鸡歃血钻刀，对天立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立誓毕，将誓章在神前焚化，吃了血酒。会内的人相见，用左手伸三指朝天做暗号。至誓章内说话，我记不全了，总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刀下亡身的话。"[②]福建按察使万钟杰针对此案奏称："此案张标胆敢潜谋纠人结会，转邀吴顺光等八犯，唆其辗转纠人，并与谢志商量复兴逆匪林爽文天地会名目，其居心实堪痛恨。"若依据乾隆三十九年修订之律例，仅能照"谋逆未行"例，将为首者张标等绞候，为从遣戍，如此"则不唯不足蔽辜，而且无以照惩创"，故奏请将张标等二十八人均照"谋叛罪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③]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七日，乾隆皇帝在"上谕"中批准万钟杰对该案的处理："天地会名目系逆匪林爽文纠约拜盟，聚众滋事。自剿平贼匪后，严行查禁。甫及数年，张标、谢志胆敢潜谋纠结，以复兴天地会为名，钻刀设誓，暗立记号，不法已极。闽省民俗最为剽悍，而台湾远隔重洋，结会械斗之风尤甚。今张标等兴复逆匪会名，实堪痛恨，若不严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台湾镇总兵奎林折，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初六日，载《天地会》(五)第381—382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台湾镇总兵奎林折，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初六日，载《天地会》(五)第381—383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按察使万钟杰折，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七日。

加惩创，何以安良善而靖地方？”称万钟杰将张标等照谋叛例斩决，“所办实属可嘉”。①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台湾彰化县又出现陈潭等人“重起天地会”事件。据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彰化县拿获吴实、陈水、杨福、卢勇、刘荫、许南六人，据供系听从陈潭纠邀入会。据陈潭供：“向在水尾庄外搭盖草寮，排卖槟榔度日，与吴光彩、吴基们平素相好。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内，吴光彩、吴基到我寮里闲坐，说起生意平常，难以度日。我说要过好日[子]，除非纠人结会抢夺。吴光彩、吴基说，这也做得。我说要结天地会，方可邀得人多。聚人多了，即有兵役来拿，便好拒捕，但不晓得天地会如何结法。吴光彩们说，我和你且留心打听，慢慢再做。四月初九日，吴光彩、吴基同了王都、张英、吴刊走来。吴光彩说，他们都是张标天地会内的人，都从内山出来。天地会怎样结法，问他们三个就晓得了。我向王都们问明，要排设香案，在神前宰鸡，歃血饮酒，钻刀立誓，并伸指朝天记号。我与吴光彩、吴基就会分头邀人。”②经审理，哈当阿奏请将涉案之陈潭等三十人，比照张标一案，一律斩决。③

此案上奏后，引起清廷对台湾“复兴天地会”活动之关注，遂于乾隆五十七年在重修《大清律》时，增加有关条例：“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理。”④

三、天地会与秘密教门成员传递密信事件

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不仅未被清统治者“净尽根株”，反而加紧了在台湾、福建、广东一带的传会活动。清廷也加紧了对天地会的搜捕和镇压。被捕的天地会首领、骨干，大多被残酷地处死。一般会众则多被发遣到边远地

① 《上谕档》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载《天地会》(五)第380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六日。

③ 《天地会》(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95页。

④ 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二十三，“刑律贼盗”；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贼盗上”。

区充军，詹清真就是被发配到新疆喀什噶尔的一位天地会成员。他原籍广东饶平县，乾隆四十八年在福建诏安教读时，拜该处吕河为师，入天地会。乾隆五十年十月，传会给其弟詹含辉，告诉他凡同会相见，用三指按胸，大指为天，小指为地，接递烟茶亦用三指，即可彼此关照，无人欺侮。在家可免偷窃，出外无人抢夺。路遇强人，只须三指关会，便可无事。詹清真旋因破案被捕，发配到新疆喀什噶尔充军，在配所与八卦教徒刘照奎相识。刘照奎原籍陕西华阴县，入八卦教后，经常往来于山东、广东、新疆等地，为被发遣的八卦教首领同亲属、教徒之间传递信息。① 乾隆五十五年，在喀什噶尔（今喀什）配所的八卦教首领王子重，令他前往江南、广东一带传递信息，再往山东"复兴八卦教"。临行时，詹清真托他代为传递密信一件，告诉他该信送到广东后，将信中所附两个字条交给其家属阅看，必得重谢，刘照奎遂将詹清真的密信随身带走。詹清真在信中所附字条，内容系天地会内两句歌诀："结万扶明李桃洪顺天，顺天服明合和同。"②刘照奎行至陕西渭南时，被其族侄告发，随即被捕。这个事件表明，无论是秘密教门还是秘密会党的成员，即使被捕后发配至边疆，仍然千方百计与教内、会内之人进行联系，以便继续从事传教、传会活动，体现了秘密社会成员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避艰险的精神。

四、苏叶、陈苏老结拜"靝黥会"

乾隆五十七年，福建晋江又出现苏叶、陈苏老"复兴"天地会的活动，为了避开官府的查拿而改称"靝黥会"。据闽浙总督伍拉纳等奏：福建晋江县属之河市乡有陈滋、陈池等听从同安洪塘乡陈苏老、苏叶暗设"靝黥会"。并派令伙党，潜往各乡，招人入会，欲图约期抢掠，当即派遣兵役，拿获陈苏老等一百三十二名，并搜出刊刷及墨书名号纸等物。

陈苏老籍隶福建同安，与陈滋、陈池并苏叶素相交好。乾隆五十七年五月，陈苏老至陈滋家中探望，适由陈池同庄堆、黄饱、苏叶、姚训、杨拂送、洪廷贺等亦先后至彼。"均系游惰，各道贫难"。陈苏老遂与陈滋等起意纠众抢掠，因人数无多，恐被拿获。复忆起从前天地会内之人，到处纠约，互相帮助，是以无人

① 见第六章乾隆后期八卦教部分。
② 《天地会》（五）第409—415页。



苏叶等所传暗号及歌词

敢欺。又闻说广东石城县高溪地方洪三房即朱九桃，亦有起会之事，遂向陈滋等怂恿结会，均各允从。陈苏老遂传授三指诀，并教令入会之人，须架起双剑，先从剑下钻过，焚香设誓，受拜为师，令其各自纠伙。嗣陈苏老见会伙渐多，三指手诀众所皆知，恐难分辨。且天地会现在查拿严紧，随改造“靝黰会”二字，作为暗号，刊刷分给。并书写“顺国源分”四字，又编造口歌四句：“天一成水水成仙，地二成火共水连。此卦合成天地格，到时变化万千千。”也是暗合天地二字，①令入会之人诵习，以便互相照会。复令各觅刀械防身，于抢劫之时遇有兵役查拿，即可备抵拒之用。“顺国”二字原系仿照林爽文年号，只说从台湾根源分来，以壮声势。尚未举事，即遭破获。

五、郑光彩等结拜小刀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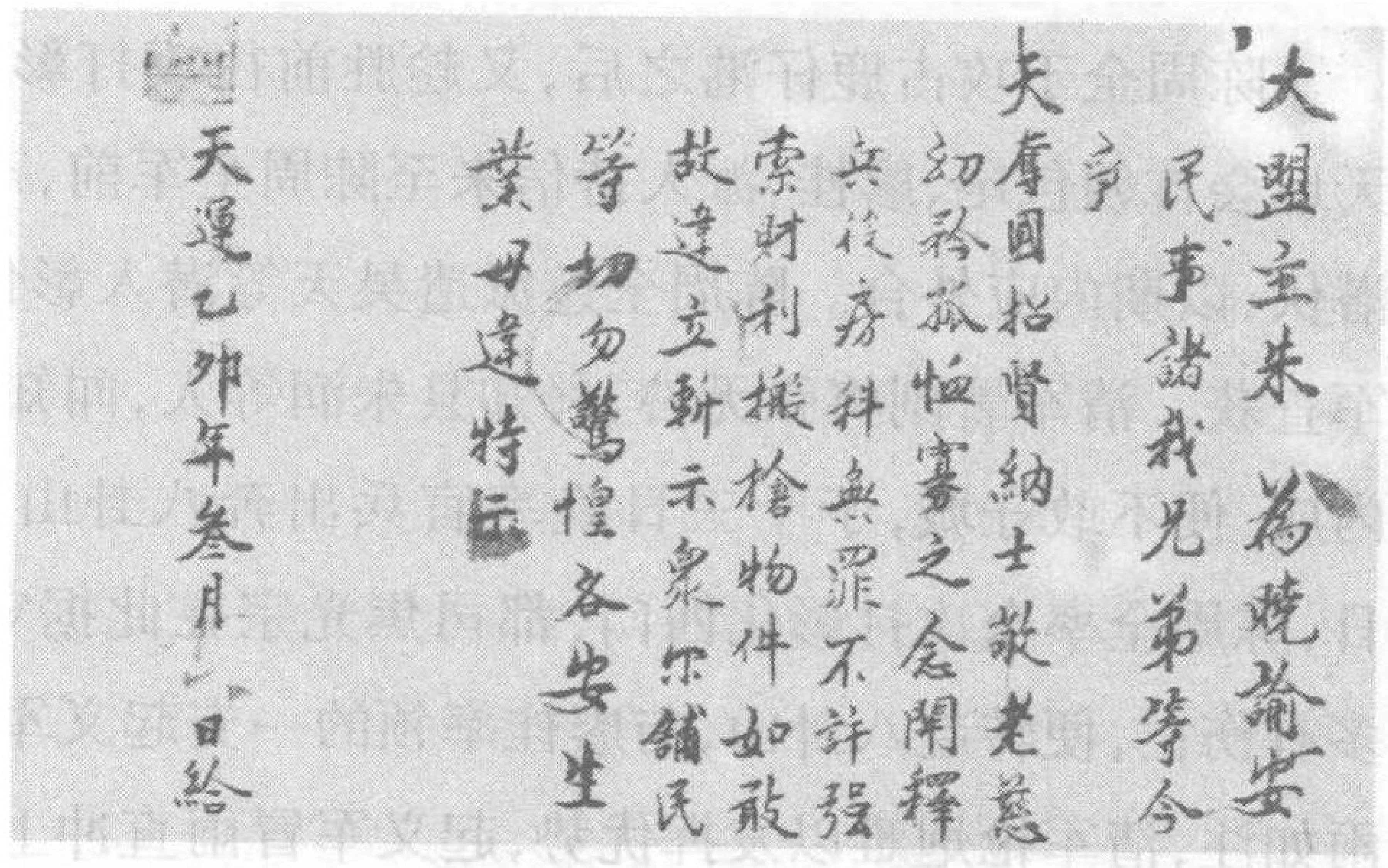
天地会系统的小刀会，是台湾凤山的郑光彩于乾隆五十九年创立的。郑光彩(1752—1794)原籍福建龙溪，自幼在台湾凤山县生长。成年后，与陈旺、魏东、杨骨等人交好，俱无恒业，平日靠替人看守田园为生。他们常常强令附近村民“岁给工钱”，为其保护田园，不受骚扰。如有不依，则对其田园庄稼，强割偷窃。附近庄民皆畏惧允从，唯广东籍村民不服，声言欲对郑光彩等人“告究”。郑光彩虑及结仇甚多，若被控告，无人帮助。忆起从前天地会之人，遇事互相帮助，人皆畏惧，遂欲纠人结拜天地会。乾隆五十九年五月，郑光彩将纠人结会一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伍拉纳等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事，与陈旺、魏东、杨骨等人商议后，各分头纠人。郑光彩纠得侯旋等十二人，又逼胁蔡侯等七人；陈旺、魏东等亦邀得洪赞等三十二人，于五月二十三日同到杨骨家中会齐，备办牲醴香烛，到庄外僻静空埔，排列香案，歃血饮酒，拜天盟誓。众推郑光彩为大哥，陈旺第二，魏东第三，杨骨第四，首伙共五十四人，一同结拜。相约会内之人，都要齐心。“如一人有事，众人协力相帮，背盟之人，死于刀下。”令各人皆置备防身小刀一把，用牛角做柄，随身携带，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及防身之用。杨骨等人因“天地会会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换名称，以“掩人耳目”，遂改名为“小刀会”。[①] 可见，郑光彩等人所结小刀会，是天地会系统内的小刀会。郑光彩等人结拜小刀会后，各地下层群众纷纷效仿。

六、台湾陈周全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台湾爆发了由陈周全所领导的天地会起义。陈周全又名陈周，福建同安县人，自幼在台湾长大。乾隆五十七年回到同安原籍，参加苏叶、陈苏老所结之靝黗会。苏叶等人事败，陈周全逃回台湾，在凤山县靠卖糖度日。乾隆六十年正月，参加了陈光爱起义，失败后逃至彰化，在西螺地方躲避，后来又来到湖仔内庄，在泉州人马江家中居住。同年三月，台湾发生粮荒，加上内地漳、泉一带“冬春之交，米价日渐昂贵”，[②]船户纷纷来台抢购大米，致使台湾米价“骤增数倍”，彰化县内发生饥民抢米事件。台湾府知府遇昌、清军游击陈大恩等，率兵前往镇压，捕获数十人，并令有谷之富户，出谷平粜，其事始平。[③] 陈周全与遇昌返回府城后，即乘机率众起义。由潮州人陈容即陈


大盟主朱　為曉諭安
民事諸我兄弟等今
大尊國招賢納士救老慈
幼矜孤恤寡之念開釋
兵役房科無罪不許強
索財利搬搶物件如敢
故違立斬示眾爾舖民
等切勿驚惶各安生
業毋違特示
天運乙卯年叁月　日給

陈周全起义之“告示”

---

① 《朱批奏折》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② 《台湾档》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上谕”。

③ 姚莹：《东槎纪略》卷五。

光辉、漳州人黄潮、黄亲等分头招人。陈周全将众人分为漳、泉、粤三股，拜晋江人洪栋为军师，以陈光秀、许篇、阮四、吴加会、杨成佳等为将军。又假称内地朱一贵之后朱九桃等将率海船数千，兵马数万，于三月十五日抵达鹿仔港，前来接应。陈周全于起义军大旗上，书写“大盟主朱”字样。又令人刻木印一方，四角有“竖、仰、攻、济”四字，中有一桃形，桃中刻有朱字。[①] 三月初十日，军师洪栋决定先攻鹿仔港。陈周全召集众人在荷包仓蓉树下，“砌棹为坛，歃血祭旗”，[②]定于十二日夜间正式举事。届期，陈周全见所集之人尚不满四百。为了扩大声势，便对众人声称：“今夜艇船数十号，兵马数万，约定四更齐攻鹿仔港。尔等但随我往，定破鹿港。”[③]他又暗中派遣杨成佳潜赴鹿仔港海墘，放火数堆。又至北桥头、彰化路各处举火。陈周全见各处火起，便对众人宣称内地援兵已到，众人信以为真，士气大振，奋勇前进。鹿仔港海口并无城墙赖以防守，同知朱慧昌、游击曾绍龙等率领兵丁在此守御。陈周全率众到达后，首领陈光秀“奋勇直前”，不幸牺牲。正当危急之时，港内的“罗汉脚”[④]多人，抛石掷土，打向清军。当时天尚未明，陈周全趁势佯呼援军已到，港内喊声大震，“众胆益壮”。清军于昏暗之中，不辨真伪，“势孤胆怯，遂败”。清军水师游击曾绍龙当场毙命，起义军乘胜攻打理番同知衙门。同知朱慧昌自恃有膂力，执械拒守，亦被击毙。驻守彰化县城之游击陈大恩，闻知鹿仔港势危，欲往援救。后闻知鹿仔港已为起义军所攻占，即率军驻于八卦山。

陈周全于攻占鹿仔港之后，又趁胜前往攻打彰化县城。这时，彰化城内之天地会首领包尾、廖桂，派人持信来至陈周全军前，声称将于十四日在彰化城内潜伏，以期内应外合。陈周全遂派遣吴天等潜入彰化城内，前往协助，不幸为清军查获。清军署副将张无咎，署知县朱润等人，闻知城内已有起义军潜伏，欲做内应，便不敢守城，于十三日晚率官兵出奔八卦山，与陈大恩会合一处。十四日，陈周全率众攻打彰化西门，都司焦光宗在此据守，他下令用炮轰击，起义军多有伤亡，便转赴八卦山，与廖桂率领的一支起义军会合，两面夹击清军。适大雨如注，清军枪炮难以发挥优势，起义军冒雨直冲上山。山上清军守将张无咎、

① 《天地会》(六)《陈周全告示》。

② 《彰化县志》卷十一。

③ 姚莹:《东槎纪略》卷五。

④ 罗汉脚指福建、台湾一带没有固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游民。

游击陈大恩、署知县朱润等,俱在镇番亭中。起义军逼近后,游击陈大恩情急,用火种将火药桶引爆。亭中文武将弁,俱当场毙命。都司焦光宗在彰化城内望见八卦山火起,知已失守,亦无心固守,起义军又趁势攻入彰化县城。典史费运增、千总郭云秀、吴见龙等俱被击毙。焦光宗见城破无处可逃,欲拔剑自刎,但为"义民"拦阻,藏于城内。

起义军在彰化城内释放了囚犯,缴获了仓库所藏军器、粮米。又张贴告示,以安民心。其原文为:"大盟主朱,为晓谕安民事。诸我兄弟等,今争天夺国,招贤纳士,敬老慈幼,矜孤恤寡之念,开释兵役科房,无罪不许强索财利,搬抢物件。如敢故违,立斩示众。尔铺民等,切勿惊惶,各安失业,毋违。特示。"①

三月十六日,清福建水师提督兼台湾镇总兵哈当阿、台湾府知府遇昌等,率领官兵九百余人,自府城前赴彰化,因遇雨被阻于湾里溪。十七日,陈周全率部攻打斗六门,该处王快等数百人起而响应。起义军乘雨夜攻,清军斗六门守备吴大瑞因赴彰化救援,临时由千总龙升腾率兵抵拒。起义军为了防备清军枪弹,将湿棉被蒙于车上,人藏于车后,推拥前进,清军复以大炮轰击,以阻起义军进攻。陈周全因斗六门未能攻下,又与马江率领三百余人,于三月十七日往攻黎头店巡检署,当晚驻扎在柴坑仔。武生林国泰率领"义民"于夜间进行突袭,起义军猝不及防,死伤大半。陈周全见势败,未敢返回彰化,军师洪栋亦逃逸。清军都司焦光宗率领"义民",乘势夺取了彰化县城,鹿仔港也为清军夺去。陈周全只身逃到埔心庄,为"义民"俘获,旋遇害。关于陈周全被擒的情况,清吏所述互相歧异。一称系"义民"首杨仲舍等四人,招募了二千余人,假意投入起义军,然后出其不意,将陈周全擒获。② 一称系"义民"陈祈、庄南光将陈周全捕获。③ 为此,乾隆皇帝命令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行核查,并下令将陈周全押解赴京,以明真相,而地方官员却迫不及待地将陈周全处死。看来,地方官员有关陈周全被俘的真相,有所隐瞒。从《东槎纪略》、《彰化县志》的记载及清吏的大部分奏折来看,皆未提及有两千"义民"投入陈周全起义军一事,故关于"义民"首杨仲舍假意投入起义军然后伺机将陈周全擒获一说,值得怀疑。陈周全起义失

① 《天地会》(六)第11页。

② 《台湾档》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上谕"。

③ 《台湾档》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七日"上谕"。

败后，清统治者对被俘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仅被凌者，即达一百四十余人。[①]陈周全起义提出的口号"争天夺国"，比起林爽文起义时提出的"顺天行道"、"剿除贪官"，具有更鲜明的政治内容。

① 姚莹：《东槎纪略》卷五。

第九章　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发展

嘉庆、道光年间，是秘密会党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些秘密会党中，大多属于天地会系统，也有一些属于一般秘密会党。从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来看，在组织上繁衍出许多新的分支。在地域分布方面，也从福建（包括台湾）、广东等省，蔓延到江西、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秘密会党的发展，引起了清廷的严密关切。各地官府，命令属员严厉查办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活动，使各地秘密会党的组织，纷纷遭到破坏，首领与骨干大量被捕，为清朝当局进一步打击秘密地党的活动，打开了缺口。秘密会党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继续求得生存与发展，对付清统治者的镇压与搜捕，便不断改换名称。鉴于会党组织遭破获后，会内机密如结拜仪式、隐语暗号大量泄露，会内首领与骨干，也对这些内容不断加以改变，使之日趋复杂完备。为了号召更多的人参加，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又提出了“反清复明”等政治口号，使秘密会党逐渐带有政治色彩。天地会在各种秘密会党中，十分突出，它不仅有一套内容丰富、复杂的隐语、暗号，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秘密文件。从阶级构成来看，秘密会党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平民的下层，特别是活跃在各地的小商小贩、雇佣劳动者参加。其社会功能也从互济互助、自卫抗暴，发展为参与政治性活动，成为完备的秘密会党。

一、名目的繁衍

嘉、道年间，天地会的组织迅速发展，对清统治已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被当地官府视为心腹之患，说天地会“最为地方人心之害”，必欲除之而后快，千方百计地加以搜捕与镇压。一旦发现天地会的活动，便立即出动大批兵丁差役前往镇压。平时还雇用“线民”打入天地会内部，探明其首领和组织的情况，以便一网打尽。天地会的首领、骨干们为了对付清朝当局的镇压，不断改换名称，一方面用来迷惑官府，一方面也减少了群众加入天地会的顾虑。除了乾隆年间已

经存在的天地会、添弟会、小刀会等名称外，又创造了许多新的名目，不过仍然属于天地会的系统。下面我们分别介绍嘉道年间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

和义会

嘉庆七年，福建永定县张配昌等人所结。张配昌是福建仙游人，在永定县西坡乡开首饰店为生。嘉庆七年四月，由素识之黄华曾带领一名贩卖茶叶的漳浦县人陈邦来到张配昌店铺借宿。张配昌在店内同陈邦闲谈，提及单身在外，甚感孤单，恐怕受人欺侮。陈邦称伊系天地会内之人，若肯入会，均有照应。张配昌便邀黄华曾一同拜陈邦为师入天地会。陈邦向二人传授了会内的隐语、暗号。同年五月十四日，黄华曾因"贫苦难度"，来到张配昌处借贷。张配昌当时无钱借给，便商议纠人结会敛钱。因恐天地会受到查拿，人们畏惧不敢参加，便改称"和义会"。议定之后分头邀得卢体贴、简红咀等二十四人，于五月十六日来到张配昌店内结拜。张配昌声称，结会以后，可以彼此帮助，免受人欺。入会者每人送给张配昌等钱二三百文。张配昌按照陈邦传授的天地会隐语、暗号，传给众人。[①]

阳盘会与阴盘会

嘉庆八年，江西天地会首领李凌魁把所结之天地会分为两支，称为"阳盘会"与"阴盘会"。李凌魁原籍福建省建宁县，在江西省城南昌开纸行为业，有"捐纳州同职衔"，与江西贵溪人吴子祥交好。吴子祥是江西斋教(大乘教)教首。乾隆四十七年，吴子祥告诉他，该教有《恩本经》，吃斋诵念，可以消灾治病。李凌魁便拜吴子祥为师入教，吴子祥传授他《恩本经》一本，李凌魁则送吴子祥"番银"四圆作为回报。同年李凌魁回到福建家乡，将经本照抄，用来卖钱，陆续卖过十余本，共得"番银"五十余圆。嘉庆六年四、五月间，李凌魁与浦城县人郑得源、江西南丰县人高廷彩等，在崇安县遇见邵武县人吴韬。吴韬称天地会内之人"最为豪侠"，"若入此会，到处皆有照应，无人敢欺侮"。他本人曾学得会内之手诀、口号，邀约郑得源、李凌魁等入会。郑得源、李凌魁、高廷彩便拜吴韬为师，结拜天地会。吴韬向李凌魁等传授天地会的手诀、口号等。后因天地会"奉拿严紧"，李凌魁忆及《恩本经》内的"阴阳语句"，于是把天地会分作两支，分别以阳盘会、阴盘会为名，用阳与阴暗寓天地之意。有愿入阳盘会者，传授天地会的手诀、口号，交番银二圆；愿入阴盘会者，抄给《恩本经》，传授诵经吃斋。

---

①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玉德等折，嘉庆八年闰二月十六日，见《天地会》(六)第158—159页。

得受全本经书者，须交银二十两四钱，半本者须交银十两二钱。[1]

双刀会

嘉庆六年，王光等人在福建闽清县结拜双刀会。嘉庆六年三月，福建兴化府仙游人侯二八雄即侯祥兴，来至闽清县泉州人王光碗厂闲坐。王光邀约侯二八雄结双刀会，同时入会者共六人，俱拜王光为师。王光传授天地会会内口诀、暗号，给予侯二八雄红布小旗一面，《会簿》一本。[2] 以后又有福建建阳人江水柏等，结拜双刀会。[3]

百子会

嘉庆十年，福建瓯宁县李于高纠人结百子会。李于高原籍江西，嘉庆十年十月，纠约柯尚元、黄祖宏等一共十人，结百子会。众人拜李于高为师，李于高传授天地会暗号，每人送李于高钱二百文，同饮鸡血酒。[4]

三点会

嘉庆十一年，江西会昌人周达滨等改天地会为三点会。周达滨平日靠"肩挑度日"，嘉庆十一年六月，在福建省永定县遇见素识之曾阿兰、邱宗源等人。曾阿兰等称已投拜卢盛海为师入天地会，会内之人有事互相帮助，可免人欺侮。周达滨便央恳邱宗源等帮助引见卢盛海，拜师入会。卢盛海应允，收周达滨入会。其后，周达滨在武平县收安远县温细满、长宁人彭祖元等人入会。同年七月，回到江西会昌，邀素识之朱矮伯等五人入会。后来周达滨因"天地会名目犯禁"，以该会"本系洪二和尚起立，洪字偏旁三点"，而将天地会改名为"三点会"。[5]

洪莲会

嘉庆十三年，福建永定县人廖善庆等改三点会为洪莲会。廖善庆即廖善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等折，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见《天地会》（六）第244—248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见《天地会》（六）第210—211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二十年八月十一日，见《天地会》（六）第295—300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天地会》（六）第194页。

⑤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见《天地会》（六）第300—303页。

磬,又名廖玉章,平日靠"小本营生"。嘉庆九年曾在广东大埔县与陈千等人行劫,嘉庆十二年五月,又在广东镇平县纠众结拜,后闻拿逃跑。同年九月回到福建原籍,遇见王腾蛟,王告以福建武平县人钟碧珍系天地会内之人,交友众多,若能拜他为师,可免外人欺侮。廖善庆便同王腾蛟往拜钟碧珍为师,各送洋钱一圆。钟碧珍传给会内口诀、暗号。嘉庆十三年二月,廖善庆挑送行李至安远县地方,遇见廖月似、朱石崇、杨金郎等人,谈及天地会即三点会"奉官查禁",遂改为"洪莲会"。①

江湖串子会

嘉庆十三年,福建武平人朱德辉等人结拜江湖串子会。朱德辉原籍福建武平县,"务农为业"。因闻知福建有天地会,入会之人遇事互相帮助,可以免被人欺,于嘉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邀集朱三古、李学周、钟秀等十六人,在家中聚会结拜。每人各出钱文,购买香烛酒肉,供奉神牌,旁设红木棍一根,立誓会内之人有事互相关照,如背誓不到,则用棍责罚。众人共推朱德辉为"总大哥",其余之人则依照年龄长幼为序,排列名次,称"散大哥"。誓毕,朱德辉分给每人半边钱一个,红布一块,布上盖以"辉记"图章,作为会内记认。又将姓名登在会簿之上。因"添弟会奉禁甚严",遂"改作江湖串子会,其情事仍与添弟会相同"。②

三合会

嘉庆十六年广东顺德县严贵邱等人"私立三合会名目",这是有关三合会最早的记载。严贵邱系顺德县本地人,嘉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严佩玉、郑亚卓、陈潮远等来至严贵邱家探望。严贵邱同他们谈起"彼此孤单,被人欺侮",商议纠伙结拜弟兄,遇事互相帮助。严佩玉等应允,并分头纠得六十六人,每人各出铜钱二百文,交严贵邱买备香烛酒肉,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严贵邱村外荒地结拜,共推严贵邱为大哥,其余依年岁序列,取名"三合会"。③

仁义会

嘉庆十八年三月,熊毛等人在福建宁化县结拜仁义会。熊毛原籍江西石城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四年八月廿八日,见《天地会》(六)第312—318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七年六月十四日,见《天地会》(六)第179—184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蒋攸铦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廿六日,见《天地会》(六)第496—501页。

县，向在福建省宁化县地方靠打造首饰为生。嘉庆八年三月十五日，熊毛在亲戚伊仰先劝说下，同谢鲁仔同拜李大禄为师入天地会，各送李大禄钱三百三十文。后因官府查拿会党严紧，未敢纠人结合。嘉庆十八年三月，熊毛贫苦难度，欲借结会敛钱，先后纠得邱耀祖等三十三人，每人送熊毛钱三百三十文，拜熊毛为师，结拜仁义会。熊毛照李大禄所传天地会手诀、口号，传给众人，饮鸡血酒。①

仁义双刀会

嘉庆十八年江西人封老三等在福建光泽县首次结拜仁义双刀会。封老三原籍江西南丰，又名得珍，曾在江西多次参加结会活动。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封老三同陈上元、卢清等十六人一同结拜，取名"仁义双刀会"。②

仁义三仙会

嘉庆十八年，封老三等又纠人结仁义三仙会。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封老三与徐三等四十五人，在邵武县天台山空庙中结会，因见庙中供有三仙，即称"仁义三仙会"。各人拜封老三为师，封老三传授天地会之口诀、暗号，并宰鸡取血滴酒同饮。每人送封老三钱三百三十文。③

拜香会

嘉庆十九年，福建长汀县人曹怀林等结"拜香会"。曹怀林是长汀本县人，因恐被人欺侮，于嘉庆十九年正月纠人结会，以期遇事互相帮助。先后邀得邓思岳等五十一人，定于二月十五日在该县观音山上空寮内结拜。届期有九人未到，共四十二人结拜，众推曹怀林为师。曹怀林摆立神桌，上置香烛、牲醴、刀棍、戥子、算盘、镜、尺等天地会结会时所用之物，立誓互相帮助，宰鸡滴血入酒共饮。④

父母会

嘉庆十九年福建霞浦县欧狼等人结拜"父母会"。欧狼本名欧品重，原籍福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天地会》(六)第193—195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九年四月初一日，见《天地会》(六)第183—184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见《天地会》(六)第184—185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见《天地会》(六)第184—192页。

建漳浦，迁居霞浦。嘉庆十九年六月间，他因贫苦难度，闻知结拜天地会可以敛钱使用，遂纠人结会。先后邀得谢奶柱等三十六人，于是月十三日在县属之天岐山空庙内齐集结拜。众推欧狼为师，取名父母会。[①]

洪钱会

嘉庆十九年福建建宁县有江文兴等结拜洪钱会。江文兴原籍江西南丰县，迁居福建建宁，嘉庆十九年同该县贡生杨克荣等人结会，称"洪钱会"，内容与天地会同。[②]

明灯会

嘉庆二十一年福建沙县人邓方布纠人倡立明灯会。邓方布籍隶该县，于是年九月纠约到二十四人，约定于十月初二日在本县白鹤山空庙内会齐结拜。众人共推邓方布为师，邓方布传授天地会内取物、吃茶俱用左手三指等暗号。因结拜时点燃明灯一盏，故名。[③]

平头会

嘉庆二十五年，福建瓯宁人江亚敂等人结拜"平头会"。江亚敂曾于乾隆五十四年拜林同哥为师入天地会。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因生意折本，贫苦难度，打算纠人结会敛钱。先后邀得曹爱俚等三十人，于同月二十八日在建阳县东历空厂内会齐，按照天地会结合仪式结拜，众人推江亚敂为师。江亚敂以会内之人皆系平等称呼，故称为"平头会"。[④]

保家会

道光十三年，李江泗等在福建邵武县结拜保家会。李江泗与李魁即邹李魁，俱系广东龙川县人，后移居福建邵武。李江泗以开杂货铺为生，李魁靠"搭厂种茶"为活，二人彼此交好。道光十三年八月，李江泗来至李魁处闲谈，言及以前在广东时曾入三点会，又名双刀会。同会之人，遇事互相帮助。今寄居异地，打算纠人结会，以免被人欺凌，邀李魁一同结会。李魁应允。两人复邀得江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巡抚王绍兰折，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见《天地会》(六)第215—217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见《天地会》(六)第192页。

③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06—107页。

④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庆保折，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见《天地会》(六)第223—225页。

西人王万太等三人，在李江泗家中结拜。李江泗声称三点会原名天地会又名三合会。李江泗故后，李魁继任会首，以会内人少，拟每年结会一次。因虑及本地之人不肯加入天地会或三合会，遂改称"保家会"。表示"入会之人彼此帮护，可以保家防身。"①

二、结盟仪式与联络暗号之演变

天地会与同时期其他秘密会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它有一套独特的结盟仪式和隐语、暗号。有的秘密会党虽然也有类似内容，但却不如天地会完备。这也许正是天地会能够历久不衰，而其他秘密会党却大多旋起旋灭的重要原因。

天地会在建立组织或吸收新成员时，举行特殊的仪式，目的在于使入会者产生一种神秘感，以便入会后在行动上受到约束，保守会内秘密，忠于誓言，听从首领指挥，以期同会之间得以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随着天地会组织的发展和在各地的传播，天地会的结盟仪式，又增加了更多的内容与神秘色彩。天地会内的隐语、暗号，主要是为了会内之人互相识别。按照会内的规矩，即使素不相识者，只要通过隐语、暗号，便可得知彼此俱属同会，要遇事拔刀相助。对于同会之人，亦不加侵犯。可是，随着天地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成员大量增加，加上天地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会内隐语、暗号往往泄露出去。会外之人往往利用这些隐语暗号，冒充会众，官府的差役，也可利用这些隐语、暗号，作为识别和搜捕天地会成员的工具。这样，便迫使各地天地会的首领、骨干们，不断对原有隐语、暗号加以改变、增加。加之天地会并不是一个统一、严密的组织，因此各地天地会所用的隐语、暗号，也不尽相同。下面我们根据档案史料中各地被捕天地会首领、骨干的供词，对嘉道年间天地会在各地使用的结盟仪式与隐语、暗号加以叙述：

福建省

福建省的天地会组织，从其结拜仪式与隐语、暗号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支：

---

①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程祖洛折，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见《天地会》(六)第230—236页。

一支基本上沿用乾隆年间原有的内容,未作大的改变。如嘉庆三年建阳县游效标、毛羽丰等人结会时,仍沿用以往钻刀、歃血等比较简单的仪式,联络暗号仍为"取物、吃茶俱用三指向前。"①嘉庆五年龙溪县颜和尚等结会时,提到的"手诀"为"口不离本,手不离三",与乾隆年间大体一样。②

另外一支则作了较大改变。嘉庆二年七月,永定县黄华增与卢三等人结会时,黄华增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并且用米桶插五色纸旗五面,中插红纸旗一面,用椅背与布搭桥,令卢三从桥下钻过。黄华增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并用刀宰鸡取血,滴入酒中同饮。又付给卢三红布花帖,作为传徒凭据,及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手诀及"三八二十一"暗隐洪字口诀。相约会内之人,发辫从左圈转,以便互相关照,有事相帮。③ 嘉庆七年黄华增与张配昌结拜和义会时,又增加"一面不相识,今日来相逢",作为暗号。④ 嘉庆十七年武平县朱凤光等结会时,相约外出,"外面布衫第三纽扣宽着不扣,发辫梢向上",作为相互识别的暗号。⑤ 嘉庆二十一年八月,江亚㗅在建阳县结会时,在供桌上设一米斗,将刀、尺、镜、线插入米斗内,令各人向米斗行礼。江亚㗅宰下鸡头,取血滴酒立誓:"各人有事若不相帮,即如鸡头一样"。众人俱拜江亚㗅为师,江亚㗅向众人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手诀,相约发辫盘于头上,辫尾垂落右边,胸前衣扣解开,作为彼此识别之暗号。又分给每人线系铜钱一个,作为入会凭据。如有人被欺侮,将钱涂抹粉印盖于印内,再包鸡毛一片。会内之人一接此信,即须赶往帮护。江亚㗅又造红白布旗五面,上写"朱洪广记"四字,分给会内骨干黄孙奴等人。⑥ 嘉庆年间福建各地天地会结会时,所供牌位除"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外,还有供"洪祖师"及

---

① 《朱批奏折》署闽浙总督福昌折,嘉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见《天地会》(六)第139—140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巡抚李殿图折,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见《天地会》(六)第154—157页。

③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廿三日,见《天地会》(六)第345页。

④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八年闰二月十六日,见《天地会》(六)第159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董诰等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见《天地会》(六)第203—204页。

⑥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庆保折,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见《天地会》(六)第223—225页。

观音、土地者。① 道光年间天地会的结拜仪式与联络暗号，又有新的变化。道光十三年八月，李江泗、李魁等人结会时，用红纸写“五祖之位”贴在墙上，作为牌位。又用五色纸旗五面，剪刀、裁尺、戥子各一件，插在米斗之内，供奉香烛鸡酒。并于牌位及供桌旁边，设一竹圈，圈上缚木柄刀两把。李江泗立于上首，令李魁等人先向牌位跪拜，再从圈内钻过。然后立誓：入会后如有异心，死于刀下。众人共拜李江泗为师。李江泗将各人姓名开单焚化，宰鸡取血。又把每人左手食指刺破，滴入酒内，每人各饮一口。除传授“开口不离本，起手不离三”口诀外，还相约：如有人问姓，答以：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皆用三指。约定每日上午发辫自右盘左，下午自左盘右。胸前纽扣解开两颗，折入襟内，作为同会人之暗号。②

江西省

嘉道年间江西省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与联络暗号，有三个系统。

一个属于三点会系统，由卢盛海、周达滨等人由福建传入，其内容同福建卢三等人传授的内容大体一致。嘉庆十一年周达滨所结三点会、嘉庆十三年廖善庆所结洪莲会及嘉庆十九年钟锦泷所结三点会，都不外用布搭于两个椅背之上，作为“桥”，令新入会之会众从桥下钻过。如卢盛海、周这滨等人于结拜三点会时，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蓝、白布各一段，搭放两边椅背，作为布桥。又将红布一块用秤钩挂在桥上，令众人从桥下钻过。卢盛海又“口诵俚词，以申信誓”，然后宰鸡取血并用针刺手指，滴血入酒共饮。又将红布一块，上写请神名号，及历来传会者之姓名。又给红纸花帖一张，写“卢盛海相传”字样，帖尾写有“顺天年×月×日”，作为日后传徒之凭据。③

另一个系统是受江西斋教（大乘教）影响较深的阳盘会、阴盘会。会首李凌魁本人因曾拜大乘教首领吴子祥为师入教，并得受《恩本经》，令入阴盘会者茹素食斋，入阳盘会者传给天地会会内口号。后来，会内的陈淑金、杜世明等还相约将姓名加以改变，即“将洪字作为总姓，金字作为排行，以取同心坚志之意。”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廿八日及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见《天地会》（六）第176—179页及第210—214页。

②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程祖洛折，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见《天地会》（六）第230—236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见《天地会》（六）第300—301页。

陈淑金遂改名为洪金鸿(淑?),杜世明改为洪金明,其他人亦照此模式,将姓名前二字改为洪金,原名中第三字保留。[①] 嘉庆十八年李老五在江西上饶结会时,在仪式上也加入了秘密教门的内容。李老五即李商厚,原籍福建,寄居江西上饶。幼年学习裁缝、银匠,又改习外科,常在福建行医,贩卖神曲,并得有扶乩驱邪,祈祷治病等书。纠人结拜添弟会时,买备鸡酒,并写明各人之生辰八字,烧化入水。在所设供桌牌位上,中间写太上老君,旁边写"紫微三官",又写"靝龘㓂"暗寓天地洪三字。令入会之人在下跪拜,李老五披发赤足,左手持水碗,右手画符,口称:兄弟结拜,如有负心,不得好死。然后杀鸡滴血入水分饮。[②]

第三支天地会,在结会时又汲取了乾隆年间其他秘密会党的内容,如嘉庆十九年崇义县天地会首领钟体刚等人结会时,尊乾隆年间湖北罗田县秘密会党首领马朝柱为"祖师"。在符书内写有:"拜请本祖师马朝柱,并天地、阴阳兵将,雷兵雷将等"。立誓:"此后有事,互相帮助,无论兵役查拿,亦当同心相拒。"[③]

广东省

嘉道年间广东的天地会,多由福建传入,故其结拜仪式与联络暗号,亦与福建相近,仅略有改动。嘉庆五年广东阳江县仇大钦纠人结会时,其仪式便是由福建人何其昌传授,内容比较简单,仅"架起双刀,各于刀下钻过",共推仇大钦为首,歃血饮酒。结盟时所用"盟书",亦得自何其昌。"仇大钦有旧存天地会盟书一张,系福建漳州人何其昌送给。"仅"填名改换首尾",并添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等语句。[④] 嘉庆六年陈礼南等人在广东东莞结会,其仪式也主要是钻刀,所用盟书系得自福建同安人陈飘学,但增加了"均愿姓洪,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字样。[⑤] 嘉庆七年新会县郑嗣韬等人结会时,其仪式也与福建相仿。结拜时郑嗣韬用木斗一个,内插五色旗五面,上写日、月、清、风、令五字,又插剑二柄,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二十年八月十一日,见《天地会》(六)第295—300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百龄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见《天地会》(六)第357—364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阮元折,嘉庆二十年六月廿三日,见《天地会》(六)第355—357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觉罗吉庆折,嘉庆五年七月初一日,见《天地会》(六)第416—419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董诰等折,嘉庆六年五月十三日,见《天地会》(六)第421—424页。

将剪刀、尺各一把，铜镜一面，置放桌上，又用黄纸书写“众兄弟沐浴，拜请天地日月，各人以洪为姓，患难相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等字。所用盟词系福建人陈文南所传。郑嗣韬持刀在手，口称：“忠心义气剑前过，不忠不仁刀下亡。”令众人皆从刀下钻过，立誓日后听其指挥。并分给每人大小布记号二张，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作为日后相逢之暗号。[①] 其后，广东各地天地会的结拜仪式与联络暗号，大体上与此相同，仅在此基础上略有增减。如嘉庆九年八月，永安县黄庭华等人结会时，另雕“万合和同”及“人合天赐福”木板两块，用红、白绸布剪成小块，加墨印成入会凭证，发给会众。[②] 同年九月，钦州叶凤轩等人结会时，则镌刻“顺天行道”长木戳一个，并刻尖戳三个，上刻“彪彪彪”三字，盖于白布之上，分给会众，作为入会凭证。[③] 嘉庆十九年永安县赖元旺等结会时，其仪式亦与郑嗣韬相同，仅增加用白布制成的大、小布旗二面。大旗上方写“明圣德顺天行道”七字，小旗上书“军令”二字。[④]

广西省

广西的天地会组织，最初多由广东客民所建立，故其结拜仪式与联络暗号，亦在广东天地会的仪式与暗号基础上加以发展、变化。嘉庆十一年，广东人李元隆在平乐县邀人结会时，于供桌上用木斗贮米，将顺刀二把插入米斗之内，供设香烛。结拜时李元隆向前拈香，与众人用鸡血滴入酒内，在神位前分饮，立誓“彼此帮助”。然后用刀斜架作叉，令众人从刀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手势。相约出门时，各人将项下纽扣解开，衣解向内斜折，并将雨伞柄朝上，作为同会相识之标记。[⑤] 嘉庆十二年五月，广东人潘老草在上林县结会时，将入会者分作天、地两号，由为首二人拈香领众跪拜，用瓷片割破手指出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折，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见《天地会》(六)第432—433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五年五月廿七日，见《天地会》(六)第482—486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年六月十一日，见《天地会》(六)第486—489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蒋攸铦折，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见《天地会》(六)第303—506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二年四月廿四日，《天地会》(七)第186—189页。

血，同鸡血一同滴入酒内，分饮立誓。[1] 嘉庆十三年，广东南海人颜亚贵在贵县纠人结会时，其仪式、暗号与潘老草大体相同，但稍有变化。如传给每人白扇一柄，名为“清风扇”，上写“𥨐、𥦘、𥨒、𥨊”等字。[2] 并有南海人颜超传之《桃园歌》，歌词内有“始祖洪启胜”字样。[3] 嘉庆十六年以后，广西各地天地会的结盟仪式变得更加复杂。嘉庆十七年正月，桂平县尹之屏、何达佳等纠人结会时，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用语，如改大哥为“正名”，师父为“结万”，用竹扎架称“红门”，结会时令人在外观望，称为“把风”，红门两旁站立二人，手中持刀，称为“把剑门”，引人入会者称为“保举”，带领入会之人钻过红门者，称为“带令”，拜神祝祷称为“祀神”，上香称为“副香”，为结拜者煮食之人称为“落厨”。[4] 嘉庆二十四年，灌阳县唐之莪等人结会时，其仪式更为复杂。用竹篾扎成拱门三层，每层拱门左右各有一人，手执顺刀、铁尺，门下放水一盆。仪式主持人燃香三炷，令入会之人俯伏跪地。然后将香投入水盆之内，领众盟誓：“有忠有义桌下过，无忠无义刀下亡。”并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如有人不下跪、不盟誓，则用铁尺打击其背，其刀架其颈上，示以欲杀之状。二层、三层亦如此，名为“过三洞”。会堂之上，架桌三张，上面安放米斗一个，上插五色小纸旗五面。另外再用红纸书写：“日月光照，尽忠报国”八字，贴于桌边。一人立于桌上，称为“大哥”；一人旁立执笔，头扎红巾，名曰“先生”；另有一人引导入会之人，跪伏下面，问新入会者：“汝自来或父母令汝来?”即须回答：“自来，”又问：“心愿不心愿?”则要答以“心愿”。又问：“上坐者可做大哥否?”必须回答：“做得。”又云：“大哥到旨，要汝等攻劫剽掠，一一遵依。”问毕，由新入会者自报姓名，开列于红纸单内，又刺中指出血，滴入酒内分饮。还有一人名曰“教师”，即称为千里马者，各授以新草鞋一双，扇子一柄，然后仪式结束。[5]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见《天地会》(七)第201—204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见《天地会》(七)第207—213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百龄折，嘉庆十四年五月廿四日，见《天地会》(七)第260—262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见《天地会》(七)第346—349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内阁侍读学士卿祖培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十四日，见《天地会》(七)第372—380页。

云南省

云南省天地会的组织，多系由广东、广西客民传入，故其仪式、联络暗号亦同该二省相近，但也有所变化。嘉庆十六年广东翁源人林润才在师宗县纠人结会时，除沿用广东天地会仪式外，又在会场地上挖一个“火坑”。仪式主持人令新入会者从火坑上跳过，然后再走至所供牌位前面盟誓，并书写表文，对天焚化。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再发给每人号片一件，作为入会凭据。上面写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字，旁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四字，作为相互识别之记认。① 嘉庆十一年，广东曲江县人杨憨头在文山县纠人结会时，除沿用钻刀、跳火坑之仪式外，又规定将发辫向左绕去挽住，作为同会识别之暗号。② 道光十一年，宝宁县人平四纠人结会时，又在以往仪式、暗号基础上加以创新。他用竹桩数根，钉在地上，安放簸箕一个，上面供奉“五祖”牌位。四周用竹扎门，令入会者由竹门进入，再至牌位之前行礼盟誓。众人向他磕头，各饮鸡血酒一杯。有愿领红巾号片者，出钱一千文，作为日后相见时之记认。③

贵州省

天地会传入贵州的时间，较以上各省为晚，最初也是由福建、广东、广西的客民所建立，故其结会仪式与联络暗号，亦以该三省的内容为基础，又根据本地情况作了改进与创新。嘉庆二十一年，福建人严老三、严老五与广东人麦青等人在贵州兴义府结会时，用竹扎关门三层，每关有两人各执长尖刀，立于两旁，将刀架于中间。又于关门内搭一高台，上置木斗一个，安放洪英等牌位五个，斗内插五色小旗五面，及尺、秤、剑、镜等物，中间插红布帅字旗一杆。严老五站立头关、刘老五站在二关，严老三在第三关内，披发仗剑，站在台上。入会之人俱拆开发辫，用红布包头。先由头、二关报名，从刀下钻过，再进第三关，至严老三面前盟誓，声称：有事俱要舍命相助，不许翻悔畏避。然后各刺中指，滴血饮酒，一齐磕头，结拜弟兄。并把众人姓名开列盟单焚化，令众人均由火上跳过，以表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云贵总督伯麟折，嘉庆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见《天地会》（七）第426—430页。

② 《朱批奏折》云贵总督伯麟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见《天地会》（七）第444—448页。

③ 《朱批奏折》云贵总督阮元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见《天地会》（七）第503—505页。

示"同赴水火,俱不畏避之意"。因见人数众多,难于认识,遂相约不扣外衣第二纽扣为暗记。严老三又将"举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手式传授大家。[①] 道光十一年,开泰县马绍汤等人结会时,按照广东船户吴老二所传内容,稍加改变。他先于洞内搭一方形高台,上面安设木斗,并供"始祖洪起胜,太子洪英"牌位。又用红纸条书写:"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付(复)明朝。"桌上四旁各插五色纸旗,桌后烧火一盆,又于洞外用竹编扎三关。马绍汤手执长刀,立于第三关门边,将刀架在关门上,令会众依次过关,从刀下钻过进洞。然后众人在牌位前点插香烛盟誓,誓言内容为,"如日后有事,彼此相帮,不许翻悔"。均于火上跳过。又各刺中指滴血入酒分饮。又饮水一口,名为"三合水"。并念诵:"三合河水出高溪,阳春庙里有诗题,你今吃了三合水,保佑五主早登基。"然后一同叩头结拜,"以示同赴水火,俱不畏避之意"。并传授"开口不离本,起手不离三"口号、手势。相约今后出门,卷起左手衣袖,垂下右手衣袖作为相互识别的记号。[②] 道光十五年,黎平府徐玉溃[③]等结会时,也用竹扎成"三关",并且为第一关起了名称:第一层称为"水关",第二层称为"火关"。头两层暗寓入会以后,"同赴水火,俱不畏避"之意。第三层供奉洪启圣及"太子"洪英牌位。并于桌上安设斗米及七星灯一盏,斗内插五色旗二十五杆,黄纸伞一柄,红纸帅旗一杆,旁边扎草人一个。徐玉溃头包红布,插纸金花一双,令众人俱从关门钻进,各将草人用刀砍一下,表示日后有事,若有人不肯相帮,即照草人一样受刀砍,然后率领众人叩头盟誓。徐玉溃又将会内歌诀、诗句向众人传授,作为同会互相识别之记号。又各刺中指,滴血和酒共饮。所传暗号有"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歌诀有:"对面不相逢,只怕半边风。""三八二十一,合来共一宗"及"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附(复)明朝"。"五房留下一首诗,深山洪英无人知,有人识得亲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一匹青草嫩悠悠,兄弟识得在路途,今朝吃了洪家饭,走尽天下无忧愁。"[④]

---

① 《朱批奏折》贵州巡抚文宁折,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见《天地会》(七)第448—453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贵州巡抚嵩溥折,道光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见《天地会》(七)第483—491页。

③ 应为徐玉贵,清朝官方文献上皆将被捕者姓名上加三点水,以示贬低。

④ 《朱批奏折》贵州巡抚裕泰折,道光十五年正月廿四日,见《天地会》(七)第151—522页。

湖南省

嘉道年间湖南省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与联络暗号,一般与两广等省相似。如嘉庆十九年黄得陇等人在江华县结会时,写立盟表,设立神位,口诵:“有忠有义刀下过,无忠无义刀下亡。”用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并传授口诀:“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又刊刻木板一块,内写“共洪和合”等字。每人分给绸布一块,作为入会之凭证。[①]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苏俸等人结会时,亦用竹篾作圈。为首者两手执刀,斜架作叉,立于圈旁,令众人从圈内钻过。口诵:“五色果子在中央,有人看守有人尝。有忠有义吃天禄,无忠无义半路亡。”[②]同年,道州府谢大年等结会时,基本仪式与苏俸结会时相同,所诵歌诀为:“自古留传一首诗,有人问我我不知,头发未乾心未晓,专望大哥指教师。”[③]道光年间湖南天地会结会仪式与联络暗号,基本上与两广相同,不再赘述。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南巡抚陈预折,嘉庆十九年二月廿三日,见《天地会》(七)第438—441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南巡抚吴邦庆折,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见《天地会》(七)第469—472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南巡抚吴邦庆折,嘉庆廿四年九月初三日,见《天地会》(七)第479—483页。

第十章　清代前期天地会的秘密文件

天地会《会簿》是天地会内流传的重要文献，也是该会的传会工具，只有拥有一件《会簿》才算得有“真传”[1]，享有充当“大哥”的资格，从而可以自行结会敛钱。[2] 所以，《会簿》乃是会首做大哥的凭据。[3] 天地会《会簿》如何产生，及《会簿》中所隐藏的天地会起源的秘密，在本书第四章已经详加论述，此不赘言。天地会最初的《会簿》仅仅登载入会者的姓名、住址等简单情况，后来才逐渐添加了西鲁故事及诗句歌诀等内容。《传会花帖》与《会簿》有相同的功能，只是内容较为简单。

一、天地会《会簿》

（一）《会簿》的原始形态

现存最早一件天地会《会簿》，是台湾诸罗（今嘉义）添弟会首领杨光勋所立。同后来的天地会《会簿》相比较，尚属于原始形态，其内容仅登记成员的姓名、住址及入会的时间，还没有“马九龙演就驱遣阴兵法术”的传说或少林寺僧征西鲁有功于清反遭杀害的故事。

杨光勋所立添弟会《会簿》

七月初一日

何　庆	住石溜班	张　能	住保长廍
黄添才	住九芎林	杨　池	住九芎林

① 《天地会》（七）第433页。

② 《天地会》（七）第319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赵慎畛折，道光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载《天地会》（七）第415—416页。

张　猛　　住打猫庄

初二日

李　鸿　　住石溜班　　张　仁　　住石溜班

沈　典　　住他里雾

初三日

胡　再　　住打猫庄　　柯山贵　　住打猫庄

初四日

林　陈　　住九芎林　　蔡　正　　住打猫庄

赖　省　　住石仔坑

初五日

陈　郡　　住九芎林　　何　嗣　　住打猫庄

赖　荣　　住九芎林　　简　正　　住马稠庄

许　夸　　住九芎林

初六日

吴三元　　住九芎林　　卢　和　　住九芎林

邱　饱　　住九芎林　　蔡　庇　　住他里雾

初七日

黄　钟　　住九芎林　　赖　斗　　住九芎林

初八日

叶　东　　住九芎林　　何　谈　　住石溜班

初九日

刘　信　　住九芎林　　黄　怜　　住九芎林

王　碧　　住他里雾

初十日

张　烈　　住石溜班　　沈　扬　　住打猫庄

陈　道　　住九芎林

十一日

张光辉　　住九芎林　　赖　丕　　住九芎林

十二日

高　杭　　住林仔庄

十四日

林　日　　住他里雾　　何　才　　住石溜班

十五日

罗　来　　住打猫庄　　陈　辉　　住石溜班

十六日

赖　军　　住打猫庄　　柯　英　　住石溜班

十七日

张　伟　　住石溜班

二十日

赖　茂　　住石溜班　　王　弼　　住九芎林

张　刊　　住打猫庄　　何　郎　　住他里雾

二十一日

邹　旺　　住他里雾　　蔡　福　　住打猫庄

魏　景　　住石溜班

二十二日

吴　远　　住九芎林　　赖　运　　住九芎林

二十三日

何　夜　　住打猫庄　　陈其三　　住打猫庄

二十四日

涂　华　　住打猫庄　　周　桃　　住他里雾

蔡　孝　　住九芎林

二十五日

卢　桓　　住山仔顶　　陈　养　　住打猫庄

二十六日

王　青　　住九芎林　　许　微　　住九芎林

叶　省　　住他里雾　　张　关　　住九芎林

二十七日

蔡　绸　　住石溜班　　黄　抱　　住石溜班

姚　托　　住他里雾

二十八日

张　燕　　住九芎林　　郭　卜　　住牛稠溪

柯　费　　住九芎林

二十九日

吴　朝　　住九芎林　　何　养　　住石溜班

闰七月一日

张　散　　住打猫庄　　张　汀　　住石溜班

何　叠　　住打猫庄

闰七月初二日

赖　振　　住石溜班　　张　员　　住石溜班①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乾隆年间完整的《会簿》。嘉庆十七年,广西平乐县已革监生李遇恩纠约蓝辉彩等结拜天地会。案发后,李遇恩供称:嘉庆十六年十月,有苏枝嵩向他与蓝辉彩说,乾隆五十八年,有浙江人范七,于病故之前传给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② 但未供出《会簿》之详细内容。③

(二)早期天地会的《会簿》

迄今发现的天地会《会簿》有多种抄本,比较完备的《会簿》,最早大约出现在乾隆末、嘉庆初,流传于嘉庆、道光年间。以往人们看到的天地会《会簿》,大多是咸丰、同治年间所流传,如同治年间荷兰人施列格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看到的抄本,辛亥革命前夕日本人平山周在两湖地区所见抄本,以及20世纪30年代罗汉家中所藏《守先阁天地会文件》和抗战期间在广西贵县发现的抄本——《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萧一山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的《西鲁序》和《西鲁叙事》,以及在加拿大发现的洪顺堂抄本——《锦囊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天地会《会簿》即姚大羔本和

① 《天地会》(一)第80—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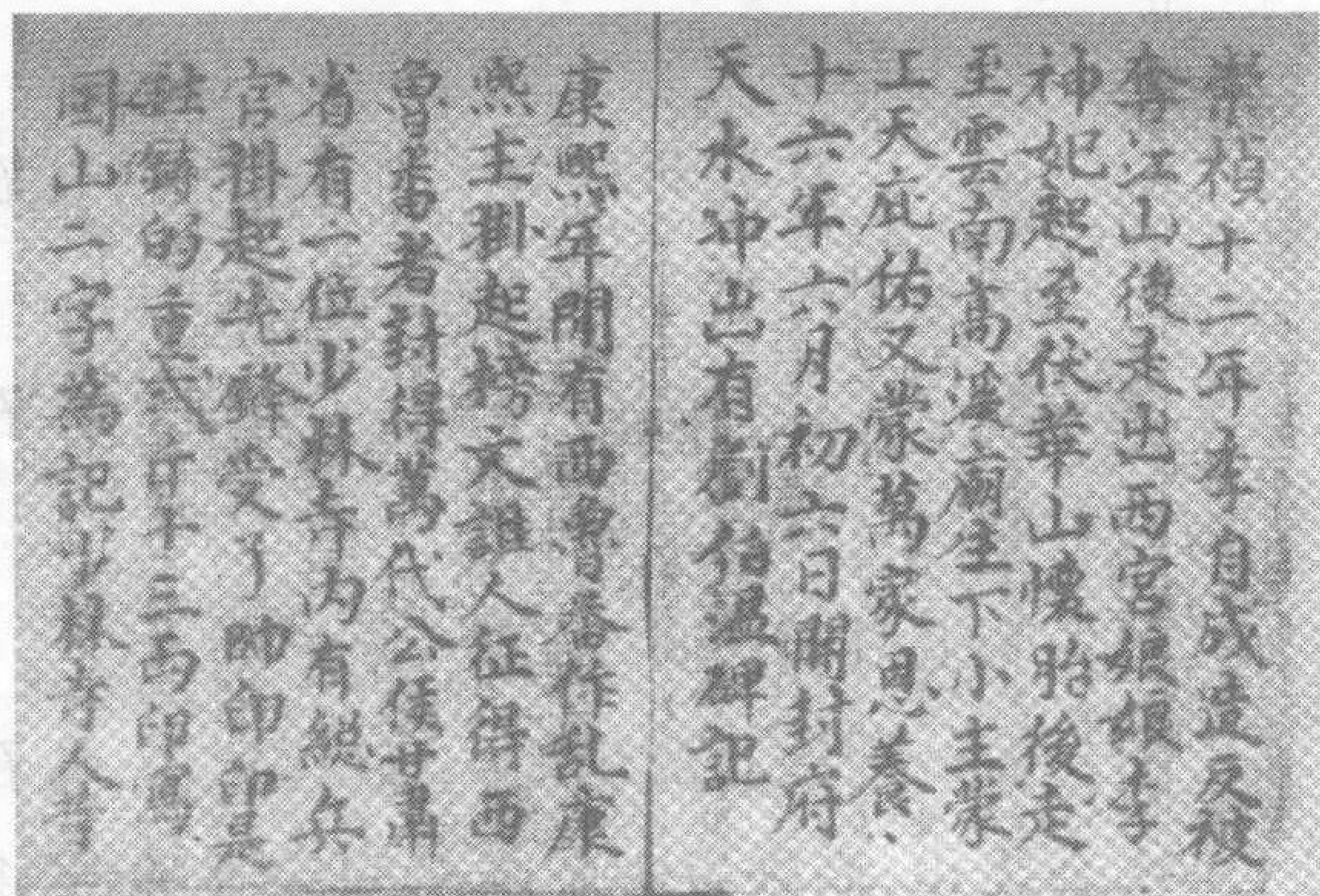
② 《天地会》(六)第328页。

③ 天地会《会簿》不同时期的抄本,内容颇有差异。为了论述方便,特将天地会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会簿放在一起。

广西田林县发现的杨氏抄本,则是迄今流传最早的抄本。鉴于后两件抄本尚未被学者广泛使用,特将其中有关天地会缘起的"西鲁故事"的内容,抄录于后,供读者参考。

天地会《会簿》姚大羔本

嘉庆十六年清吏在广西东兰州武缘县查办姚大羔结会案时在会众简兴富家中所搜获。[1]载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将该《会簿》同其他《会簿》相比较,有以下不同之处。


崇禎十二年李自成造反被
奪江山後走出西宮娘娘李
神妃起至伏華山懷胎後走
至雲南高溪廟生下小主蒙
上天庇佑又蒙萬家恩養、
十六年六月初六日開封府
天水冲出有劉伯溫碑記
康熙年間有西魯番作亂康
熙主掛起榜文誰人征得西
魯番者封得萬代公侯世襲

嘉庆年间天地会会簿首页(姚大羔本)

开头部分的一段内容为其他《会簿》所未载:"起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只可自己看,不可外传人。别人看里,误了自己终身!"并有:青氣为天,黑氣为地,山乃为合(疑为会)。

	青为天号
青黑山	黑为地号
	山为会号

下面一段亦为该会簿所独有:"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被夺江山,走出西宫娘娘李神妃,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六日,开封府天水冲出有刘伯温碑记。"

下面为少林寺僧征西鲁的故事,但内容十分简略,仅有三百余字,不过已经具备西鲁故事的基本内容,后来的《会簿》大约均系在此基础上繁衍而成。具体内容是: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被夺江山后,走出西官娘娘李神妃。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六日,开封府天水出有刘伯温碑记。康熙年间,有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

---

① 《天地会》(一)第3—30页。

② 载《天地会》(一)第3—31页。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印是鉎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圄山二字为记。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等打得胜鼓回朝。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众人就取一百（白）锭香炉，当天盟誓，正（止）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法号曰云龙，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歃）血拜盟，结为洪家。众兄弟拜万师父为大哥。至九月初九日，云龙择日与清兵交战。云龙阵上死去，小军报知五位兄弟，保驾小主。兄弟得知，即日出军，与清军对垒交战。清兵败走，后来兄弟将万大哥尸首收回，向东烧化。万大哥云（魂）上九霄而去，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午向。五位兄弟回来，不见小主，不知下落，身无依靠。"①把姚大羔等人所立《会簿》中有关西鲁传说的内容，同咸同年间流传的《西鲁序》、《西鲁叙事》及《反清复明根苗》相对照，不难看出，在会内文件的早期抄本中，有关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其内容比较单薄，情节亦较为简略，还处于初创阶段。不过，正因为如此，其虚构的成分还比较少，保存的天地会起源内容，也更真实，如《会簿》尽管虚构了少林寺僧征西鲁的故事，但仍保存了最早结会者"万提起"同他的几个弟子的姓名。由于广西方言"起"与"喜"读音相近，很可能万提起便是万提喜之误，而万提喜正是官书、档案中提到的洪二和尚万提喜即郑开。只是到了咸同年间的抄本中，才把万提喜的姓名删去，仅仅保存万云龙这个名号。后来的《会簿》抄本，内容与情节多是在此基础上繁衍而成。

天地会《会簿》广西田林县抄本②

1985 年广西田林县中学老师王熙远在其舅父、该县浪平乡江洞村毛拜陀杨再江家中发现；该抄本是用毛笔、烟墨抄于桂西土产的纱纸（又称棉纸）之上，用纸绳装订成一册，共计 52 页 104 面，抄本长 27 公分，宽 17 公分，封面及本内各

① 《天地会》(一)第 3—4 页。

② 载《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80—551 页 。

页均呈黄黑色，书口及左下角磨损较多，每页均有一二字残缺。① 抄本中写有“太岁戊子”与“道光之有×年×月”字样，说明该抄本抄于道光八年(1828)，虽晚于姚大羔本，却大大早于以往常见的其他抄本。其中西鲁传说的内容，更明确地提到天地会创始人“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这件《会簿》的内容，目前尚鲜为人知，现将其中西鲁故事部分，转录如下：

“启〔起〕②义根苗肯从〔自从〕井〔甘〕肃省庆阳府河水县有一座太〈白〉山，山上有一少林寺，寺内有一百二十八人。有一位好汉，姓彭名元凤，在寺内教习武艺。一十八般鹖〔韬〕略，件件精通。只因崇祯仁主有一位西宫娘娘，姓李名神妃，所生一位宫〔公〕主，年方〈一〉岁。一个太子四岁，因李闯王扰乱绵〔锦〕绣江山，满朝文武尽投纂〔闯〕王驾。崇祯仁主将宫〔公〕主剑誓而亡。神妃娘娘移出向死，仁主逃梅〔煤〕山自缢。有一仆姓李名范，将那四岁太子剩〔乘〕乱军之中逃出，走至河水县太白山处寺闲坐。寺内师徒出外问其来由，李范将抱出太子说了一遍，众师徒〈知〉是崇祯后代，执在少林寺内，修其闲房，安一仆。一日，李范〈下空十六字〉崇祯驾下为出官，拜兵马侍郎之〔职〕。朝中〈空三字〉辞官告老，主见难舍，即将分宫楼前张挂宝剑二口：一名桃红忠臣剑，二名龙枪珠剑。先斩后奏，免见君王。那日李仆放至得见，洪公问其根由。仆将李闯谋朝，仁主梅〔煤〕山前自缢，娘娘为死，抱太子在少林寺安身说了一遍。洪下泪，即排鸾驾至太白山迎接太子至府安住。恐后泄漏风声，即将太子为孙，更名朱洪英，隐匿于府，音信不出。只因康熙元年，有一两〔西〕鲁番人作乱，攻下甘肃。朝中差来大将一员，姓杨名飞龙，带领二十万雄兵，西鲁大战不却，亡于阵前。番人同攻西宁府，番总兵官马进忠即〈奏〉本人京报知。熙主闻奏惊，即宣满朝文武共议退兵之策。有张托武都昌奏曰：‘我差大将，亡于阵前，我主精兵，恐朝空〔虚〕。主依臣奏，可出一张招军榜文，泗〔四〕门张挂，招纳天下英雄，哪人平得西番者，宜〔赏〕千金彩缎，官封万户侯之职。’主允臣言，即张榜文张扬四门。榜出一月，无人揭榜。一日，扬〔传〕到河水县太白山。师徒一百二十八人，彭元凤带领众师徒前〈往〉京都揭榜。守榜军士报与黄门官代〔带〕朝熙主，三呼万岁。主问曰：‘臣乃何〈处〉人氏？姓甚名谁？’元凤奏曰：‘臣乃河水县太白山少林寺内修真之人。今闻西鲁猖狂，为臣前来领〈榜〉，于〔为〕主上分忧改〔解〕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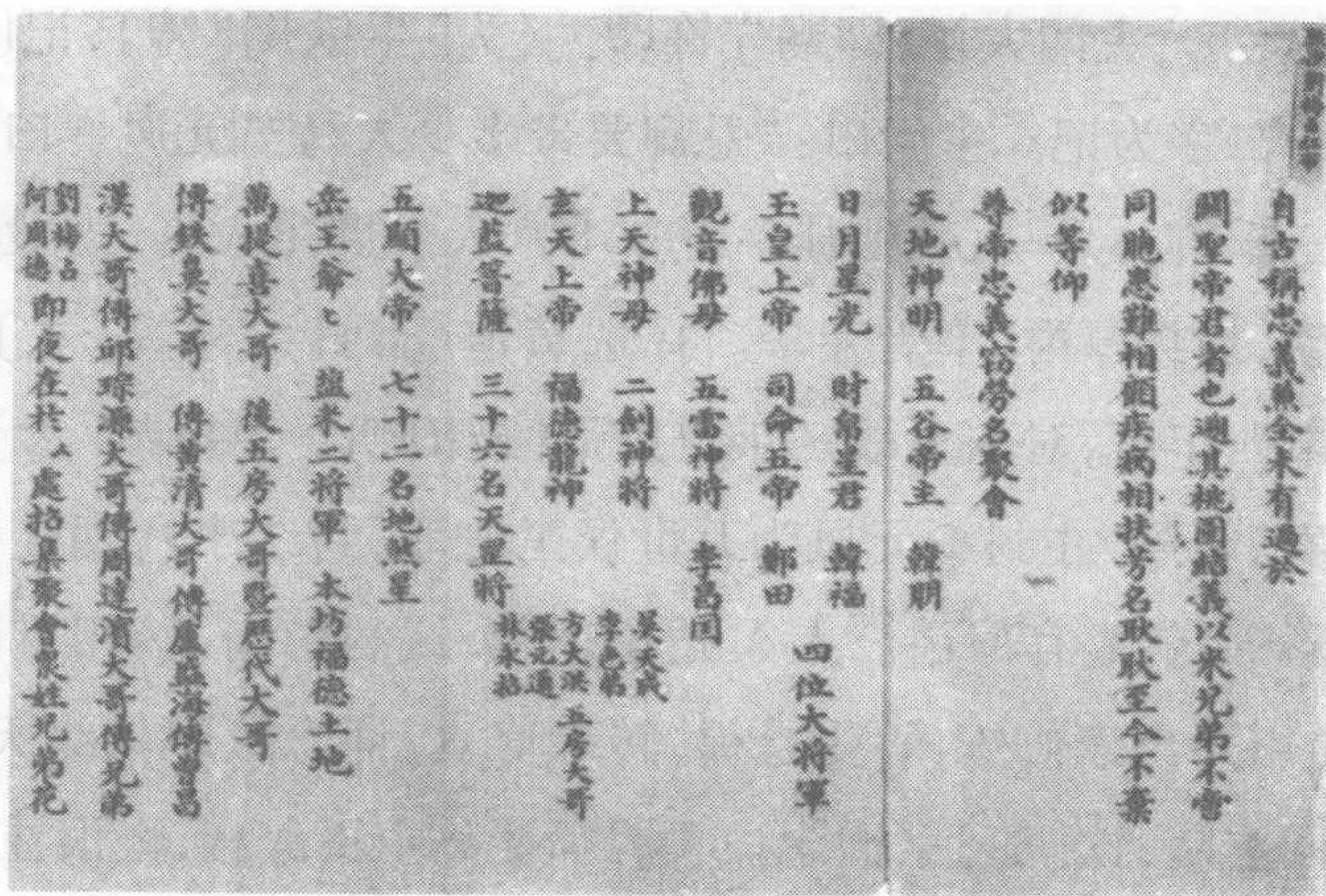
---

① 王熙远先生曾以该抄本的复印件相赠，特此感谢！

② 文件中〔〕中内容系王熙远校订时所改正之字，〈〉中系根据上下文所增补之字。

〔疑〕。'主闻大悦,即赐先锋印。〈为〉生铁蠲〔铸〕,记〔计〕重二斤三两,上有白山二字为记。主问曰:'爱卿要带多少人马?'元凤奏曰:'臣不用许多将士,只要三千御林兵马,我师徒一百二十八人。'熙主大喜,当殿赐〔送〕御酒三杯,早胜回朝,加封厚爵,享受荣华。择选黄道〈吉日〉,建笠〔立〕旗号,旗炮开兵,来到甘肃西宁府,对垒大战三年,打得胜鼓回朝。奏报恭〔参〕见熙主万岁,万岁,万万岁。〈熙〉主封彭元凤为万世侯王之职,封二十八师徒为二十八家总兵,赐千金彩锦,赏高官厚爵。人人插花,个个饮酒游街,恭相重赐禄位。元凤伏俯奏曰:'臣乃出家修炼,不受恩禄,转寺修真,诵念黄庭以终天年'。当殿辞驾,师徒各回本院,饮〔茹〕素诵念。只因师徒辞主不辞相,怪恨在心。一朝,康熙皇帝升登金殿,文武朝驾毕,都昌执本冒〔出〕奏:'天丹有西鲁造〈反〉我主,磊〔屡〕差大将数员不能平服,何况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人,有〔如〕何处治?三千御林,能平面〔西〕番?况今又不〈受〉官禄,岂不是与番通?何〔若〕日久纠同攻我国,其患不少〔小〕,我主思之。'熙主闻奏大惊,即询曰:'爱卿有何良策能招转回封他官禄?'奸妄〔佞〕奏曰:'依风〔臣〕遇〔愚〕见,如此如此,依计而行,可能除之。'熙主一时暗准密本,会〔令〕武都昌点齐三千御林兵丁,暗带码〔硫〕磺黑硝火药,甘〔干〕柴引火之物,行至太白山,将少林寺围困。八月十五夜半子刻,用火四下攻超〔烧〕。寺内师徒正睡朦胧,复〔忽〕见火光冲天,众师徒们可〔齐〕出跪告皇天昊土,惊动佛祖、观音,即驾五色祥出〔云〕。空中放下五色系〔丝〕线,化作大根大板铜桥,救出师〈徒〉一十八人。却被官〈兵〉看〈见〉,代〔带〕兵〈追〉赶,十一人逃至广州府。官兵又追至。官军追至,十八人又逃至惠州。居三日,官兵(缺四字),走至长沙岔口,十八人烦恼,复后大战一阵。只〔无〕奈孤不敌众,又来十(缺四字),逃走石陇上住,七日官兵至,五人向广东地界而走。五人向前一看,啊呀!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投天无路,入地无门,吾命休矣!五人抱住大哭,跪下倒〔祷〕告天地,悲声惊动上界昊天金关〔刚〕。玉皇大帝正座〔坐〕灵窗〔霄〕宝殿,耳烧面热,御位不安。即问左右'仙乡凡〔还〕有冤枉,临殿不安'。千里眼、顺风耳俯伏奏到〔道〕:"因为奸臣武都昌定〔点〕火坟〔焚〕烧少林寺,仔命忠良,焚被一百一十三人,只剩五人,现在海边无门逃。少林寺阴魂不散,哀冲上界,故乃我主御体不安。'玉帝大怒,即降青麻包石香炉一个,差天御使捧着忠义榜文齐下高溪松要张桂,封少林寺一百一十三人阴司总兵之职。西天佛祖敕会〔令〕观音菩萨,空中降下水浮三板铜铁桥度救,五人即从桥而过,去海岸

后，浮桥不见，知是神打（搭）救。五人跪地向空拜谢。官兵追至双观无踪迹，四散而回。五人游江面上，运至双塘口三江河，远见海内百毫光现，紫雾迷迷。五人往前看时，连见得（下缺十三字）重五十二斤十三两，五人即去榜〔捧〕起一看，上有四字：𩆜氧氤氲。旁有四字：洪平天下。底有四字：扶明灭清。下有观音手掌印一颗，上面有行小字。称也有五十二斤十三两，下称也有五十二斤十三两。复至海岸藏隐其物，巡〔循〕江西土〔上〕，走至高州府自城县，有座丁山，山上有座高溪庙，庙内有一位长者，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系太平府太平县太平庄人氏。因为看破红尘，出家在宝珠寺。”下面讲述五人同拜万云龙为师，万云龙又令人下山，到各处“约来弟兄共有一百零七人。万元〔云〕龙择取甲寅年孟秋七月二十五日子丑二时。“弟兄结拜洪连胜会”。①


自古稱忠義兼全未有過於
關聖帝君者也週其桃園結義以求兄弟不啻
同胞患難相顧疾病相扶芳名耿耿至今不棄
似等仰
尊帝忠義容芳名聚會
天地神明 五谷帝主 韓朋
日月星光 时部星君 韓福
玉皇上帝 司命五帝 鄭田 四位大將軍
觀音佛母 五雷神將 李昌國
上天神母 二劍神將 吳天成 李色開
玄天上帝 福德龍神 方大洪 張近道 五房大哥
迦藍菩薩 三十六名天罡將 林永招
五顯大帝 七十二名地煞星
岳王爺爺 盤木二將軍 本坊福德土地
萬提喜大哥 後五房大哥 歷代大哥
傳鉄莫大哥 傳黃清大哥 傳盧盛海 傳曾昌
漢大哥傳邱琮源大哥傳周達濱大哥傳兄弟
劉梅占 何周德 即便在於人處招集聚會眾姓兄弟花

周达滨传会花帖

该会簿的内容较嘉庆年间姚大羔所藏《会簿》内容大为丰富，但比咸丰、同治以后的抄本，仍要简略。

二、天地会传会花帖

传会花帖是天地会《会簿》的简单形式，同《会簿》有同等功能，只有持有一件传会花帖，才有权传徒结会。有的地方并非参加拜会者均可得到传会花帖，必须交纳较多地钱，才能够得到。② 嘉庆十一年六月，卢盛海、周达滨所结三点会时，便给每人红纸花帖一张，写有“卢盛海相传”字样，帖尾写有“顺天×年×月”，作为日后传徒凭据。

① 载《广西会党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2—487页。

②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卢盛海结会时所传《花帖》，内容写有：

“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溯其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啻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芳名耿耿，至今不弃，似等仰尊帝忠义，窃劳名聚会。”

天地神明	五谷帝主	韩朋	
日月星光	财帛星君	韩福	
玉皇上帝	司命五帝	郑田	四位大将军
观音佛母	五雷神将	李昌国	
		吴天成	
上天神母	二剑神将	李色弟	
玄天上帝	福德神龙	方大洪	五房大哥
		张元通	
		林永招	

迦(伽)蓝菩萨	三十六名天罡将	
五显大帝	七十二名地煞星	
岳王爷爷	盐米二将军	本坊福德土地
万提喜大哥	后五房大哥及历代大哥	

传铁鼻大哥，传黄清大哥，传卢盛海，传曾昌汉大哥，传邱琮源大哥，传周达滨大哥，传兄弟刘梅占、何周德，即在于△处召集聚会众兄弟花名于左：

今据滨等非敢以邪慝为心，忘生异志，愿同心同力。凡持身处世，不敢有负神思，忘背盟义。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财彼此相应，贵贱则甘苦同情，是非则神灵默佑。愈久愈昌，不敢口吐诗句。自言不敢以大压小，以强欺弱。不敢谋骗兄弟财产，奸淫义嫂。不敢林身退缩，借公挟私。不照状书施行，诸神共诛。如依此盟，天神共降富绵绵，福寿禄全，子孙昌盛，奕世书香。

伏望神祇鉴察。

顺天×年×月×日。

卢盛海所传纸折抄件

桥尾有联一对：身背宝剑游我门，手执木棍打江山。

圣帝起义联一对：英雄豪杰定乾坤，万里江山共一轮。

土地伯公联一对;争天夺国一枝供,泄漏军机剑下忘(亡)。

横牌联四字:云白连天。白定堂。

桥尾横联:竹龙孔致。

观音横联:兹(慈)航广济。

观音对联:日日千人拜,夜夜万盏灯。

木杨城对联:地镇高岗,一派溪山千古在;

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白云冬青洪姓府,天照分明成祖家。

桥尾伽蓝菩萨对联:飘飘摇摇影无踪;(右)

万物静观日已红。(左)

桥头下对联:日照西河映北斗,被世山谷身真洪。

黄凉伞写四字:开国元帅。

八拜:一拜盟心玉宝明,二拜誓愿招国上天神,三拜社公肝胆尽忠义,四拜交付一家四海人,五拜兄弟结拜似青龙,六拜招贤纳士集英雄,七拜尽忠尽义公侯位,八拜后日称帝各封王。

五标:洪泊淇江汰清潢泊泳

会诗:青气山下乃分明,满山梅木舟中兵。

黑道通气人君在,日月合成共大极。①

陈纪传所传华帖

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省城[成]都大平府太平寨少林寺修身和尚,字提喜,佛名万和尚,传下四字:㕼㕼㕼㕼,再传授到广东惠州府高溪,兄弟议论,分开五房,共议传下四字:韵白连天。兄弟各别,二房在高溪,三房在广省,以后兄弟立业,分为五处,再传下四字:木立斗世。五房五兄商议,传下顺天行道四字。方大洪大哥、三房在万山起义立业,众兄弟再传下四字:顺天字号为记,如今众兄弟万山传出帖,交与兴化弟子承领,日后若查出不忠不义,割头示众。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所附天地会传会花帖。

在场:祖洪押、德标押

保结:彦惠押、殿韵[押]、郃周押、成珍祯押

代笔:高材押

天	顺
号	字

非亲有义须当敬

是友无情切莫交

黄河自有澄清日

顺天吉义合同心

天地会《会簿》和传会花帖,乃是天地会流传的重要手段,只有拥有会簿和花帖,才有资格传徒结会。《会簿》和传会花帖也是我们研究天地会产生、发展的重要史料,我们从二者的演变中可以看到天地会在各地的发展变化。

第十一章　嘉道年间会党的发展与清廷治理对策

一、嘉道年间天地会在各地的传播

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组织,不但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在地域上广为蔓延。在福建、广东,天地会的组织几乎遍及全省。而且又由两省的移民带往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及海外。在广西、贵州谋生的湖南人,又把天地会带入湖南南部。天地会在闽、粤两省的发展,同两省人口大量增加,穷苦人民难以谋生密切相关。闽、粤两省早已存在人多田少的矛盾,而人口增长过速,更加剧了这一矛盾。据统计,1661 年福建人丁仅有 140 多万,广东人丁为 100 多万。到 1830 年,福建人丁已增至 1800 多万,广东人丁增至 2400 多万。[①] 人丁的增长,也反映了整个人口的增长趋势。相反,同一时期两省耕地面积的扩大,却无法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相比。大量农村人口难以在农村立足,便大量迁往海外或内地省份,有些则进入附近的城镇市圩。进入城镇市圩者,谋生仍然困难。当时,闽粤两省商品经济虽较内地发达,但城镇中的工商业规模尚属有限,难以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这些来到城镇市圩的谋生者,仍然同其前辈一样,主要充当雇佣劳动者、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未能找到正当职业者,便成为无业游民,靠乞讨、偷窃、抢劫度日。广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大多来自闽粤两省。早在雍正年间,福建、广东的穷苦农民、手工业者,便已开始大量向内地省份流动。嘉道年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流动的浪潮更有增无减。来到内地的移民,不仅要受到当地官府的压迫,地主、富商与高利贷者的剥削,而且还要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因而很难立足。总之,无论是进入附近城镇市圩还是到内地谋生者,都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在新的环境,新来乍到,举目无

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58—262 页。

亲，急需互相帮助，而天地会正适应了他们的这种要求。因此，嘉道年间的天地会，较前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且随着人口的流动，从福建、广东逐渐进入广西、江西、贵州、云南、湖南等省。

移民们有的本来在闽、粤家乡便已加入天地会，有的则在家乡听说或熟悉天地会内的结拜仪式、隐语暗号，有的在家乡得到过会内秘密文件传会花帖或《会簿》。于是来到新的地方，便纷纷结拜天地会。

福建省建阳县

嘉庆三年九月初五日，龙岩人张管在该县青洲地方与邱麟角等共十九人，结拜天地会。① 同年十一月，游效标、毛羽丰等七人结拜天地会。十二月，毛羽丰又与揭六仔等十人结拜天地会。② 嘉庆十一年四月，邵武人杜世明与陈淑金等二十五人，在该县书坊街结拜阳盘会。③ 嘉庆十六年三月，该县江婢仔与江家万等共三十九人，结拜百子会。④

浦城县

嘉庆四年十一月初四日，该县罗名扬与僧人德贤等共三十人，结拜天地会。⑤

南安县

嘉庆四年十一月，该县潘琅与吴来等共二十四人结拜天地会。⑥

莆田县

嘉庆五年六月初五日，该县僧人弗性与许炳等共五十三人结拜天地会。⑦

南靖县

嘉庆三年二月，该县颜和尚即余和尚，与许城等二十人结会。嘉庆五年正月，又与詹集等二十六人结会。嘉庆六年四月，复与余汉及县差王崇、黄昆等结拜天地会。⑧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巡抚汪志伊折，嘉庆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② 《朱批奏折》署理闽浙总督福昌折，嘉庆四年三月十六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董诰折，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五年正月三十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五年六月十三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建安县

嘉庆十年正月，永春县人郑细观即郑赛哥，与杨荣华等共五十余人在该县结拜天地会。[①] 嘉庆十九年，武平县人李发广在该县结拜仁义会。同年闰二月，又与许增标等十一人在该县结拜仁义会。[②] 嘉庆二十年八月，仙游县人侯二八雄纠约九十余人在建安、古田交界处结拜双刀会。[③]

南平县

嘉庆十一年九月十四日，该县林应伟与罗华祖等十七人结拜天地会。[④]

长汀县

嘉庆十四年五月，谢佩成在该县与钟家旭等十三人，结拜天地会。[⑤]

永定县

嘉庆十一年五月，该县曾阿兰与平远县人卢盛海等结拜添弟会。[⑥]

武平县

嘉庆十七年九月，刘奎养拜谢国勋为师入添弟会，得有会内"秘书"一本。[⑦]

广东省

阳江县

嘉庆五年三月，该县仇大钦为替关定军报复乡绅之殴打，与王者进等十一人结拜天地会。其后，关定军又纠约施得立等42人，施得立又转纠陈上珩等34人结拜。[⑧]

东莞县

福建同安人陈礼南来至该县佣工，因在家乡得有天地会盟书一纸，于嘉庆六年正月与该县李道著等结会，其后，李道著又纠得黄效东等76人结拜天地会。[⑨] 嘉庆八年初，该县蔡庭仕纠人结拜天地会。[⑩]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二十年二月廿八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汪志伊折，嘉庆十六年二月初七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巡抚张师诚折，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⑥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浙江抚巡颜检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五年七月初一日。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董诰等折，嘉庆六年五月十三日。
⑩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倭什布折，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

增城县

嘉庆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该县关念棕与何陇佑等共九十六人结拜天地会。①

海康县

嘉庆六年七月,该县林添申与方庭相等结拜天地会。②

新宁县

嘉庆六年九月初十日,该县叶世豪等五人结拜天地会。③ 嘉庆七年九月,该县陈积引等八人结拜天地会。④

新会县

嘉庆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该县郑嗣韬等十三人结拜天地会。⑤ 同年八月,该县陈芳洽与黄泰荣等共十人结拜天地会。⑥

香山县

嘉庆七年五月初十日,该县黄名灿与梁勇生等共六人结拜天地会。⑦

潮阳县

嘉庆五年五月,该县郑阿羊等四十人结拜天地会。⑧

惠来县

嘉庆七年八月十五日,该县方振思等共六十七人结拜天地会。⑨

长乐县

嘉庆八年六月初十日,该县赖六青与揭阳人李阿七等结拜添弟会。⑩

兴宁县

嘉庆十九年五月,该县刁胜和与古三沅等共二十人结拜添弟会。⑪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倭什布折,嘉庆九年四月十一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折,嘉庆八年闰二月初八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折,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倭什布折,嘉庆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折,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倭什布折,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
⑩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倭什布折,嘉庆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⑪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阮元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合浦县[①]

嘉庆九年二月，该县蒋正儒与冯老四等共120余人结拜添弟会。

鹤山县

嘉庆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新会人梁修平与黎亚广等共37人结拜添弟会。其后又与潘二保等共54人结拜添弟会。[②]

琼山县

嘉庆九年四月初五日，博罗县人曾博罗与该县刘豆腐二等44人结拜天地会。[③]

钦州[④]

嘉庆九年五月十三日，归善人叶凤轩即叶老四与东莞人王连盛等共32人结拜添弟会。[⑤]

永安县

嘉庆九年八月十五日，该县黄庭华与黎亚满等十二人结拜天地会。[⑥] 同年九月二十六日，该县赖元旺与李斯轩等18人结拜天地会。[⑦]

仁化县

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南海县人何昌满与福建永定县人林得棕等三十人，在该县结拜添弟会。[⑧]

海丰县

嘉庆九年八月十八日，该县蔡亚堂与杨亚练、郑乌猪等61人结拜添弟会。[⑨]

长宁县

广东省惠州府所属。嘉庆十年正月十八日，龙门县人关亚，与该县监生陈传俊等四十二人，于该县河岗地方结拜添弟会。[⑩]

---

① 合浦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
②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倭什布折，嘉庆九年九月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倭什布折，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④ 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年六月十一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蒋攸铦折，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⑧ 《粤东成案初编》，卷十五。
⑨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⑩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年三月九日及九月十九日。

曲江县

嘉庆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该县黄贤通与王柱进等，共56人结拜添弟会。[①]

江西省

会昌县[②]

嘉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该县朱石崇即朱世修与何顺隆等四人结拜三点会。同月二十七日又与赖受南等九人结会，次日又与何尾子等四人结会。嘉庆十四年三月，又先后与赖官生、魏观连等结会。四月又与温庭奎等四人结会。均称三点会即天地会。[③]

长宁县

该县彭祖元等五人曾在福建入三点会，嘉庆十二年四月，返回江西长宁后，多次纠人结拜三点会。[④] 道光七年九月十一日，该县蓝世兴拜陈秀科为师入三点会。[⑤]

龙泉县

嘉庆十六年三月，福建添弟会首领卢三即破鼻花来至该县传会，在该县开店铺之陈纪传拜卢三为师入添弟会。四月十三、十四等日，有该县之温部周等二十二人，拜陈纪传为师入会。后卢三又与卢象轩等十九人结会，与叶必松等四人结会。卢三之徒冯奕运亦与杨学魁等四人结会。经辗转相传，共有一百一十八人入会。[⑥] 道光元年八月，广东龙川县人黄凤山与该县黄山九等四人结拜三点会。[⑦]

新城县

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三日，福建光泽县人李老五，与该县陶省三等六人，结拜添弟会。[⑧]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吴熊光折，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

② 属江西赣州府。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折，嘉庆十年七月十二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及嘉庆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二折。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护理江西巡抚邱树棠折，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⑧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

南康县

嘉庆二十三年六月,广东兴宁人戴俸飞在该县与蒙奉和等六人结拜添弟会。① 同年八月,该县林宝南与周其光等结拜添弟会。② 嘉庆二十五年二月,该县邱胜恩与萧品等结拜三点会。③ 道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兴国县人范恩仔与该县李老满等十七人,结拜三点会。④

泰和县

道光二年,信定县人何经先与该县李金高等共十人,结拜添弟会。⑤

兴国县

嘉庆九年五月,该县赖赞章与万荣建等结拜三点会。⑥ 同年二月,该县王传告等结拜三点会。⑦

大庾县

道光二年二月十九日,南康县人张正元与游俊元等四人结拜三点会。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张正元又与吴以发等八人;三月十九日又与吴里忠等四人先后结拜三点会。游俊元又于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南康县与曾德明等三人结拜三点会。⑧

万安县

道光三年三月初十日,该县唐兴通等与福建人蓝桂扬等结拜三点会。⑨

上犹县

道光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南康县人吴潮文与毛远麟等结拜三点会。道光十年二月十四日,该县陈沅祥与罗高望等结拜三点会。⑩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钱臻折,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程含章折,道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璐弼折,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折,道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毓岱折,道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程含章折,道光三年十月十四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折,道光十年三月初五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程含章折,道光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成格折,道光五年二月十九日。
⑩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折,道光十年三月初六日。

崇义县

嘉庆十九年八月初一日，该县钟体刚等五人结拜添弟会。①

广西省

平乐县

嘉庆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广东东莞人李元隆，与湖南永明县人杨开来，广东德庆县人张世聪等，共九十五人结拜添弟会。②

宣化县

嘉庆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广东南海人梁大有、广东钦州人何有信，与该县陆杨进等，共二十九人结拜天地会。③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该县沈惠平与梁阛宁等共四十三人结拜天地会。④ 嘉庆十六年八月十五日，该县曾庭荣与广东钦州人卢得盛、灵山县黄世荣等，共四十八人结拜添弟会。⑤

来宾县

嘉庆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该县文学生蒋声隽与范友兰等共二十六人结拜天地会。范友兰又于同年七月十五日与林亚选等共二十人，结拜天地会。⑥ 同年四月十二日，广东南海人颜超与该县人颜亚贵等共二十三人结拜天地会。⑦ 同年四月，颜超又与李文达、李太忠父子共十五人，结拜天地会。⑧ 嘉庆十四年四月初十日，该县李太忠与李西德等共五人，结拜天地会。⑨ 同年四月初八日，广东人翁老八、广西武宣人余老八与该县覃扶升等共十四人，结拜添弟会。⑩ 经过辗转相传，该县天地会组织庞大，遭清官府搜捕时，仅"投首"者即达五百五十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阮元折，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钱楷折，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及嘉庆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及嘉庆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及嘉庆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⑩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钱楷折，嘉庆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余人。①

宾州

嘉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该州杨社新与陈老四等共三十七人结拜天地会。②

平南县

嘉庆十三年七月初八日，该县卢闲家等，与广西桂平人杨显超，广东南海人张亚旺，广西藤县人莫可儿等共十三人，结拜天地会。同年七月十二日，杨显超又与该县粟金潮等共十六人结拜天地会。③ 同年八月十九日，杨显超又与蒋宗合等共五十八人结拜天地会。④ 同年八月，桂平县人苏光，广东高要人马胜忠与该县黎裕三等共二十六人结拜天地会。⑤ 嘉庆十四年五月，广东翁源县人吴崇茂，广东新会人陈亚五共五十一人结拜天地会。同年六月二十一日，陈亚五又与广东南海人游得二等共十九人结拜天地会。⑥ 嘉庆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广东人徐亚三、钟大番在该县纠得吴有正等共三十人，结拜添弟会。⑦

永安州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福建人黄世可与李元翠等二十余人结拜添弟会。⑧

桂平县

嘉庆十七年正月十四日，该县尹之屏、何达桂等二十四人结拜添弟会。⑨

藤县

嘉庆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该县何国礼等三十三人结拜添弟会。⑩ 嘉庆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该县周炳成与何惠德等共二十三人结拜天地会。⑪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钱楷折，嘉庆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赵慎畛折，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钱楷折，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
⑩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钱楷折，嘉庆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⑪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许兆椿折，嘉庆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容县

嘉庆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该县谢国典与钟向秀等共二十三人，结拜添弟会。[①] 嘉庆十三年十月初十日，该县黎树与韦老六等共四十人结拜天地会。[②] 嘉庆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该县梁奇文与谢国兰等四十四人结拜添弟会。[③]

武缘县

嘉庆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广东平远人姚大羔与该县吴通县、简兴富等共十五人结拜添弟会。[④]

荔浦县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该县李遇恩与苏枝嵩等共一百三十人结拜天地会。[⑤]

上林县

嘉庆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广东人潘老草、李发胜等与该县陈老二等共二十八人，结拜天地会。[⑥] 同年十月初二日，广东南海人李添保与该县刘光彩等结拜添弟会。[⑦] 嘉庆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广东南海县人钟和超与该县欧老三等共三十二人结拜添弟会。[⑧] 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宾州人萧彩章与该县韦特受等二十七人结拜添弟会。[⑨]

昭平县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该县梁承兰与古士风等共三十二人，结拜添弟会。[⑩]

宜山县

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该县文幅寿与古老三等共五十三人结拜添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四年四月十九日、二十六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初一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嘉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董诰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四月初七日。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四月初七日。
⑩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

弟会。[1]

贺县

嘉庆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广东人邓望受等二十八人，结拜添弟会。

灌阳县

嘉庆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湖南零陵人蒋五益等二十九人结拜天地会。其后经辗转相传，共有会众一百余人。

思恩县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广东人姚广与该县韦芳桂等共二十三人，结拜添弟会。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该县杨陇、罗县才等共八十二人结拜添弟会。同年九月，杨陇所传之会众韦现标又与韦玉章等共八十八人结拜添弟会。

阳朔县

道光元年四月初八日，广东人练老晚、湖南人傅老八与该县秦连有等共二十三人，结拜添弟会。

融县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该县龚个庚等四十二人结拜添弟会。

西林县

嘉庆二十五年四月初五日，广东人刘玉陇等八人，结拜添弟会。

象州

道光三年七月十四日，广西武宣县人许光勋与该州陆老活等四十三人结拜添弟会。

岑溪县

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容县人陈琪与该县罗远盛等十人结拜天地会。

向武州

嘉庆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广东兴始县生员林琼宴在该州与张经伯等共十七人结拜天地会。其后，林琼宴与张经伯等多次纠人结会，其会众达二百二十余人。

奉议州

嘉庆十三年七月十三日，福建永定人郑司务在该州与周文远等二十三人结会。[2]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恩长折，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田州

嘉庆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州辛老大等三十四人结拜天地会。[1]

凌云县

嘉庆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广东花县人罗亚耀与广东高明人黄老三等，共十八人结拜添弟会。[2]

南丹州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宜山县韦艳袍与该州高翔霄等八十七人结拜添弟会。[3]

古零土司

道光元年四月十二日，该地土司苏遇潮与贵州、湖南及本地"土人"共十三人结拜添弟会。[4]

贵州省

荔波县

嘉庆十七年二月，广东程乡县人凌国珍与镇平县人罗载杨等六十一人结拜天地会。[5]

兴义府

嘉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等日，福建客民严老三、严老五与广东人麦青等九十二人结拜添弟会。[6]

开泰县、永从县

道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开泰人马绍汤等三十二人结拜三合会。蒋倡华等二十八人于三月二十四日结拜三合会。同年十一月，李丹桂、王老教等二十一人结拜三合会。[7]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钱楷折，嘉庆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钱楷折，嘉庆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护理广西巡抚嵩溥折，道光二年三月十六日。

④ 《朱批奏折》护理广西巡抚嵩溥折，道光二年三月十九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贵州巡抚颜检折，嘉庆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贵州巡抚文宁折，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贵州巡抚嵩溥折，道光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古州

道光十五年六月，黎平府人徐玉贵与广东人曾大名等二十余人结拜添弟会。①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石太与杨添义等二十五人结拜添弟会。② 同年七月初一日，黎平府王大任与该州储尚忠等二十四人结拜添弟会。同年八月，储尚忠又与杨瓦匠等二十四人结拜添弟会。③

云南省

师宗县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广东翁源县人林润才与嘉应州人钟名扬等十人结拜天地会。④

广南府

嘉庆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广西客民周大赍与广西隆安人黄奉朝等共十四人，结拜添弟会。⑤

宝宁县

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广西西隆州人罗道士与该县田万和等共五人结拜添弟会。嘉庆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广西西林人周林与师宗人年老满、该县人念老三等共八人结拜添弟会。⑥ 同年三月，广西西林人岑肇基与该县苟占林一共八人，结拜添弟会。⑦ 道光十年十二月，该县平四与广西百色人刘阿大结拜添弟会。⑧ 回家后又于道光十一年三月与岑博禁等共三十八人结拜添弟会。

文山县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广东曲江人杨憨头与该县杨赞等共二十七人结拜添弟会。⑨

① 《朱批奏折》贵州巡抚裕泰折，道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② 《朱批奏折》贵州巡抚裕泰折，道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③ 《朱批奏折》贵州巡抚裕泰折，道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云南巡抚孙玉庭折，嘉庆十九年二月初九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云贵总督伯麟折，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云南巡抚孙玉庭折，嘉庆十九年二月初九日。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云南巡抚孙玉庭折，嘉庆十九年二月初九日。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云南总督阮元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云贵总督伯麟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

湖南省

江华县

嘉庆十八年，浏阳人黄得陇与广西贺县人张长么等三十三人结拜添弟会。[①]嘉庆二十年十月初五日，连州人苏俸与广东人林昌等共八人结拜添弟会。[②]

道州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该州谢大年与该县蒋华开等共十七人结拜添弟会。[③]

蓝山县

道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广东人张掰与该县李金保等共四十七人结拜三合会。[④]

从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结会活动中，可以看到，天地会的成员，尤其是其中的首领与骨干，基本上都是下层穷苦人民。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天地会档案中，首领与骨干供出职业者计321人，其职业分布如下：

（一）农民。包括开山、种山者3人；耕种度日者5人；耕佣度日者58人；耕种、手艺者3人；耕佣小贸3人；耕贸度日、耕种小贸12人；训蒙、手艺、耕种度日6人；

（二）商贩。其中小商贩28人；开小店铺者7人；肩挑负贩9人；贩卖私盐3人；卖药、佣趁2人；贩马1人；贩卖鱼盐3人。

（三）粗通文墨的穷苦知识分子。监生1人；武举1人；堪舆1人；算命3人；行医3人；教习拳棒3人。

（四）兵丁、差役。兵丁3人，差役5人。

（五）雇佣劳动者。其中"佣工度日"与"佣趁度日"者，共计130人。

（六）其他。和尚3人，更夫2人，挑夫2人，无业6人，乞丐6人，驾船水手3人，船户1人，砍柴度日1人，家道殷实3人，开纸行1人，打铁为生1人，裁缝1人。

在上述321人中，城乡雇佣劳动者最多，计有188人，占总人数的58.57%；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署湖南巡抚陈预折，嘉庆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南巡抚吴邦庆折，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南巡抚吴邦庆折，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南巡抚吴邦庆折，嘉庆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其次是小商贩，计 63 人，占总人数的 19.63%；这两种职业合计 241 人，占总人数的 75.08%。其他各项职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25% 弱。从被捕首领、骨干口供中可知，他们参加天地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其次是为了“敛钱分用”，也有的是为了“抢劫得财”，或“抗官拒捕”、“竖旗起事”。

从嘉道年间天地会在各省的传播情况来看，天地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社会功能。

首先，加强了下层穷苦人民内部的团结，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

从政治上看，清代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时期，清廷对人民群众实行严格的控制，不仅有大量军队，在必要时进行镇压，而且在清律中专门列有针对秘密会党的条款，对结会和造反者予以严惩；在地方上设有严密的保甲组织。朝廷禁止民间有任何结社活动，不许非官方认可的团体或组织存在，以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广大人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彼此间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联系。

从经济上看，我国当时虽然已是封建社会晚期，但是，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全国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统治之下。大部分城乡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仍然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或经营单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彼此间很少有经济上的交往。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同一村庄的农民，除了节日或婚丧嫁娶等重要事情之外，平日间彼此也很少往来。

嘉道年间由于天地会的传播和发展，使上述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人们在加入天地会或其他秘密会党以后，增进了彼此间的联系和团结。凡入天地会者，彼此间便结为异姓弟兄，有了一种准血缘关系。按照会规，遇事要互相帮助。拒绝履行这一义务者，要受到会内的惩处。在封建社会，没有社会保障机制，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们势单力薄，很难承受天灾人祸的袭击。天地会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保障作用。天地会成员之间，通过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的活动，也增进了彼此间的联系与团结。

其次，增强了下层穷苦人民自卫抗暴的力量。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都处于分散和孤立无援的状态。他们对于官府的压迫、豪强地主的剥削、官吏兵役的敲诈勒索，只能采取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即使起来反抗，也往往因为力量分散而失败。而天地会的传播与发展，却把以往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不仅对官吏、兵丁的压迫敢

于反抗,甚至公开竖旗起义,攻打县城,击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乾隆后半期与嘉道年间天地会所举行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当局的统治,促进了清王朝由盛及衰的转化,有助于封建统治的进一步衰落。

再次,促进了人口从稠密地区向边远地区的流动。嘉、道年间,我国人口急剧增长。乾隆初年已增至一亿四千多万,较清初已增加近一倍,到了道光二十年,又猛增至四亿一千多万。福建、广东两省增长尤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加剧了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许多农民破产而被迫涌入城镇市圩。当时我国城镇规模小,且属消费性质,很难容纳大量人口。这样,闽粤一带人口,便大量向边远地区或地多人少的内地流动。我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长期以来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除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肯离开家乡外出谋生的。他们深知来到异地他乡,立足已属难事,谋生更为艰难。即使找到谋生之路,也会遇到种种困难。可是天地会的组织,却帮助穷苦人民在新的生产与生活环境中得以立足生存。在本书前面所列举的嘉道年间天地会在各省流传的情况中,可以看到广西、江西、贵州、云南的天地会活动,大多为闽、粤两省的移民所组织。这些移民组织参加天地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身居异地,希望通过结拜天地会(添弟会等分支别名),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团结,遇事互济互助,自卫抗暴,在聚有较大力量后,便举行武装斗争。

下面具体叙述天地会在促进人口流动方面的情况。

江西省

会昌县三点会首领朱石崇是应广东人阙祥的纠约而入会的。龙泉县的添弟会则由广东兴宁人李魁升所建立,骨干有福建上杭人陈纪传与蓝老四。另一支添弟会则由广东龙川人黄风山、黄华乔为首,由广东人杨三发起组织。新城县添弟会则由福建光泽县人李老五建立。南康县添弟会由广东兴宁人戴俸飞所倡议组成。崇义县添弟会以广东人谢罗俚为首。

广西省平乐县添弟会由广东东莞人李元隆、德庆人张世聪为首。宣化县添弟会由广东南海人梁大有所建立。另一支添弟会中,卢得望等十四人,皆为广东钦州人,黄世荣等五人为广东灵山县人。末宾县添弟会由广东南海县人颜超与颜亚贵纠人结拜。另一起添弟会为广东人翁老八所建立。平南县添弟会系以广东高要人马进邦与马胜忠为首。另一起添弟会由广东翁源人吴崇茂纠人组成,骨干有广东新会人陈亚五等。第三起添弟会由广东人游得二为首,第四

起则以广东人徐亚三为首或充任会内骨干。永安州添弟会系以福建人黄世可为首。藤县添弟会由广东南海人欧亚癸为首。武缘县添弟会首领为广东平远人姚大羔。上林县添弟会以广东人潘老草、黄添尔、李发广为首。另一起添弟会由广东南海县人李添保建立。第三起添弟会以广东南海县人钟和超为首。贺县添弟会由广东人邓望受纠人结成。灌阳县天地会由湖南人蒋五益为首。思恩县添弟会由广东人姚广建立。阳朔县添弟会以广东人练老晚、湖南人傅老八为首。西林县添弟会内首领、骨干刘玉陇等皆系广东省人。向武州天地会系以广东始兴县林琼宴为首。奉议州天地会由广东翁源县人陈有恒倡议纠约。另一起天地会以福建人郑司务为首。凌云县添弟会以广东花县人罗亚耀为首。贵州省荔波县添弟会由广东程乡人凌国珍发起建立。兴义府添弟会由福建人严老三、严老五及广东人麦青纠人建立。

云南省师宗县天地会系以广东翁源人林润才为首,文山县添弟会系广东曲江人杨憨头纠人所建。

总之,嘉道年间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天地会(添弟会),大多系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所建立。这些天地会组织,在移民初到各地时,对他们立足与谋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正是因为存在天地会组织,才使闽粤移民敢于大量流向边远省份去谋生,促进了当时人口从稠密地区向稀少地区之流动。

二、天地会以外的秘密会党

嘉庆、道光年间,随着清王朝国势逐渐走向衰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大量发展,成为清政权的潜在威胁,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天地会以外的秘密会党。这些会党虽然也采取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但它们与天地会并无渊源上的联系。以往许多论著把所有秘密会党均视为天地会,甚至把天地会与秘密会党视为同义语。其实,天地会只是清代许多秘密会党之一,同其他秘密会党,既有相同之处,亦有区别,不应混淆。天地会与其他秘密会党相同之处,在于都采用歃血结盟这种形式组成,在社会功能方面也多属互助互济和自卫抗暴,也从事抢劫、打架、斗殴等活动。在阶级构成方面,也属下层人民的自发性组织。

天地会与其他秘密会党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天地会系统的秘

密会党，都有一套大体相同或相似的结盟仪式，隐语暗号及诗句歌诀，及一个有关该会缘起的“西鲁故事”，后来发展为天地会的《会簿》，作为传会之凭据。其次，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尽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除天地会本名之外，也称添弟会、小刀会、三点会等，但其渊源，则皆可追溯到天地会。我们根据这两条标准，把天地会系统与非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加以区分。

据档案史料记载，清代前期天地会系统以外的秘密会党主要有以下一些：

共和义会

嘉庆六、七年，广东省陆丰县李崇玉等人所结。李崇玉曾因“诓骗乡民银钱”之罪被发遣，但解至曲江县时，他趁机逃脱。嘉庆七年六月返回陆丰，当时，有一艘吕宋商船在洋面遭风沉溺，李崇玉纠人进行打捞，得到白银一万余两，并大、小铁炮二十七门。其友人李陆见他突然暴富，称系“天顺人愿”。李崇玉于是悬挂“顺天”记号之灯笼，以“夸耀亲朋”，并且凭借所获银钱，“广交匪类”。嘉庆八年春，李崇玉风闻官府查拿，便逃至海上，与著名海盗朱濆相结交。后来回乡，将从海船上捞得之大炮，于每乡各贮一门，并令人制造火药。将所捞小炮二十五门，存于所立新馆。各乡之人因“贪其资助”皆“尊李崇义为大哥”。李崇玉也便仿照《水浒》中的故事，自号“李义”，且称“文皇帝”，称所结之会为“共和义会”。①

担子会

担子会始于何时，尚无确切记载，不过在嘉庆六、七年间，江西已有担子会活动，首领名为萧烂脚。他是江西宁都人，原在各处抬轿为生。嘉庆六年三月，曾与李次元等二十二人在进贤县“序齿拜把”。后因犯案潜赴各处求乞度日。嘉庆七年八月，又与周瘰子纠人在临川县结盟拜会，首伙共有三十二人，称担子会。② 据档案记载，“担匪一项，本系无籍棍徒，身挑锅担，假名求乞，伺便窃据”，“纠伙多人，结盟拜把，恣行攘窃”。③

边钱会

边钱会与担子会有密切关系，其成员往往相互交错。早在乾隆前半期已出

---

① 《朱批奏折》两广总督那彦成折，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二十八日及《上谕档》嘉庆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

②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③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六月初九日。

现边钱会之名称,因入会者,每人执半边铜钱,作为入会凭据而得名。但嘉道年间之边钱会,与乾隆年间的边钱会,并不一定有渊源方面的关系。这种情况也如小刀会一样,乾隆初年的小刀会同嘉庆初年间小刀会,皆因以小刀作为入会凭据,而皆名为小刀会,但与天地会系统的小刀会并无渊源关系。

嘉道年间最早发现的边钱会,是王瞎子纠人所结。王瞎子靠行乞度日,曾入担子会。嘉庆十年遇见黄肿子及担子会内之萧烂脚等人,见丐伙渐多,遂倡议结拜弟兄。共纠得乞丐四十二人,首伙四十四人,于同年二月在临川县结拜,众推王瞎子为首。会内规定,为首者为头肩,称为"大老官"。年龄最小且善行路者,称"老满头",专司探听官府动静。首领用制钱一文,分为两半,作为记认。一边交为首之大老官或老大,一边交老满头收藏,作为聚散通信之凭据,故取名"边钱会"。结拜时,乞丐出米一升,窃贼出鸡一只及钱一二百文,同买酒肉。写立关帝神位,焚香跪拜。每年五月十三、八月十五作会两次。届时,老大乘轿而至,众皆跪迎,以示尊严。凡同会之人,除老大为头肩外,其余为二肩、三肩等。会内规定,只许偷窃,不得强劫,不许放火杀人。若有违犯,由老大问明责罚。其中年轻力壮者,平日绑架勒索,自定其价,不许事主提出要求。老弱残疾者,结伴强乞,稍不遂意,即卧地诈伤图赖。其中赌博者,由同会包揽护庇,抽头供奉老大。若受害者报官,必共同设法报复。遇官府查拿,则由老满头探听消息,以便躲避。[①] 萧烂脚在结担子会后,又于嘉庆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与饶华俚等共三十九人,在安仁县结边钱会,自任老大,由万丁香为老满头,分一肩至十四肩,会规、禁约则仿照王瞎子之边钱会,但于边钱上添用五色丝线缠绕,外面用红纸包裹。一边交老大收存,取名"坐会"。一边交三肩内之罗万受收执,取名"行令"。同会之人,分为三类,白日行窃称白线,黑夜行窃为黑线,沿途丢包掉窃称边客。[②] 嘉庆年间边钱会之规约与结会内容,基本上仿照王瞎子之边钱会。道光年间,边钱会已传至贵州,并有苗族参加。道光九年,湖南黔阳县人黄昌金在贵州台拱厅与刘万年及苗民浓耶立等结拜边钱会。黄昌金在该地靠贩卖杂货物为生,道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黄昌金往岳庚发家拜生日,与刘万年等人相遇,各道贫难。黄昌金即倡议结拜边钱会,以便恃众抢劫讹诈,得钱分用,约定十六日在梅复成家会齐结拜。是日,所约王兴邦途遇苗人浓耶立,梅复成亦向

---

①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三。

②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三。

同寨之苗民方宋告知，遂同至梅家，共二十二人，每人出钱三百文，买备香烛鸡酒，在梅家屋后空园内焚香结拜。黄昌金被众人推为大哥，称为"帽顶"，其余之人，俱听其管束。黄昌金用红线捆扎青钱一文，自己收存，作为号令，又用钱二枚，砍作四半，用红线捆绕，分给刘万年等，作为有事时传人之记号。相约有事彼此相帮，不得推诿。若传唤不到，由黄昌金处治。①

观音会

嘉庆八年，湖南江华县莫景兆等结拜观音会。莫景兆曾充任该县锦田司书职，嘉庆八年四月初四日，有吴脑、何鸣昌等来至其家，谈及彼此孤单，全仗佛力护佑。莫景兆称黄竹寨外有座观音庙，倡议结一"佛会"，每年逢佛诞之日，齐赴庙内，既可拜佛，又可结党，互相帮护，不受人欺。吴脑等应允，遂分头纠人。约定四月八日在黄竹寨外观音庙会齐，每人出钱一百二十文，交莫景兆买备牲醴香烛等物，并纸簿一本。届期，首伙共三十人，将各人姓名写于簿内，一同结拜。拜毕各照原排行称呼，因莫景兆行大，吴脑行二，即以大哥、二哥称呼。众人同饮佛酒而散，因结拜之会系在观音庙举行，故名观音会。②

兄弟会

嘉庆九年邹脑等在湖南江华县所结。邹脑是广东惠州府龙川县人，"不务正业"，素习拳棒。后与其弟邹二，侄邹光六，子邹旭仁迁居湖南连州长冲圩，在该处"招聚无赖游民，教授拳棒"。其同乡刘观祥迁居江华县围塘地方，与邹脑住居相近，随他学练拳棒。嘉庆九年三月，邹脑邀刘观祥来长冲圩结会，共十六人。邹脑见人少，又嘱令刘观祥再纠邀有武艺之人，以便彼此帮助。刘观祥陆续纠得四十余人，邹脑亦纠得多人，于四月二十六日在江华县黄竹寨刘宗福店内结拜，首伙共六十人。邹脑写立"牛王牌位"，由刘观祥派定众人名次。众推邹脑为大哥，其余之人皆按武艺优劣，分为十等，依次排序，但彼此皆以兄弟相称，故称兄弟会。邹脑见刘观祥甚能办事，便让他总管会内事务。邹脑又用钱四文，分为八半，邹脑本人收存四半，其余分别交刘观祥、邹光六等各存半边，又分给红布小旗一块。约定会内有事，由邹脑传人发出半边钱，由刘观祥核对后，用红布包裹，差人传唤，作为凭据，会众见后须立时前往帮助。结拜时，邹脑傍

① 《朱批奏折》贵州巡抚嵩溥折，道光七年七月廿六日。

② 《朱批奏折》广东巡抚孙玉庭折，嘉庆十年十二月二日。

坐，宰鸡滴血入酒，众人跪饮，誓不悔盟。[①]

守义会与集义会

嘉庆十五年五月，广东新安县人陈秉钧等结拜守义会。嘉庆十五年正月，陈秉钧同族人迎神点燃爆竹，误烧邻村江姓蔗林，被江姓斥骂索赔。其后，陈秉钧族人在田边巡逻时，又看到江姓在田边经过，失足踩坏陈家禾苗，亦向江姓斥骂索赔，并互相殴打。五月初一，陈姓族人来至陈秉钧家中，称风闻江姓欲行报复。陈秉钧遂召集族人，欲结盟拜会，制造器械，预备械斗。共有二十五人参加，每人出铜钱三百文，于初二在村外关帝庙内结拜，取名守义会。[②] 嘉庆十五年五月，新安县又有监生文松龄与文卓武结拜集义会。文姓有祖遗尝田，原由二房文挹瑞等耕种。文卓武系长房，欲让文挹瑞将田退出，文挹瑞不肯。文卓武遂纠约本房强悍丁壮文映鳌等二十一人，结拜弟兄，并制造器械，以便同文挹瑞械斗，定于十三日在义和圩外关帝庙结拜，取名集义会。众推文卓武为首，文卓武令文松龄写红签一纸，令附近小姓加入。声称凡不入会者，定将对之抢劫，遂有附近沈姓小村之人投入其会。[③]

连兄会

嘉庆十五年，广东新安县又有郑万受等结拜连兄会。是年五月初二，郑万受等在何大贵家中谈及贫苦，欲纠伙结拜弟兄，以便抢劫，若遇兵役查拿，可帮同拒捕。商允后分头纠人，首伙共十八人，于五月初三在村外关帝庙结拜，取名连兄会。[④]

朱毛俚结会称王

嘉庆十八年，江西朱毛俚与胡秉耀等结会并称王，建立“后明晏朝”。朱毛俚原籍江西余干县，又名朱万邦，靠算命为生。自幼随母改嫁，十四五岁时，回至其父处，随父到处算命。父故回至家乡，仍以弹弦算命，代人占卜为生。胡秉耀系江西临川县人，靠测字为生。嘉庆十八年八月间，胡秉耀于货担上买得残书一本，内有阵图、词语。是月十三日，胡秉耀来至素识之邱忝泽处，与邱及杨易、卢胜辉等闲谈，并将购得之书给予众人阅看。声称自己能解得阵图，如遇有

① 《朱批奏折》护理湖南巡抚成宁折，嘉庆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② 《朱批奏折》署两广总督韩葑折，嘉庆十六年二月廿日。

③ 《朱批奏折》署两广总督韩葑折，嘉庆十六年二月廿日。

④ 《朱批奏折》署两广总督韩葑折，嘉庆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名声之人,便可用兵图取富贵。杨易称朱毛俚从未读书,即能通文义,且与前明同姓,由他假托前明后裔,定能成事。卢胜辉等即往邀朱毛俚。朱毛俚来后即向神前跌筶问卜,又得“吉兆”,众人遂推朱毛俚为首。朱亦自任不辞,并改名天龙,表字万邦。是月十五日,胡秉耀率众人向朱毛俚跪拜称臣。胡秉耀见所购书内有“天下原有日安国”及“国出晏朝卫显是”二句,遂称“后明晏朝”。为了多多纠人,胡秉耀又称所购之书系“仙授”,称朱毛俚为“未来佛转生治世”。朱毛俚又封胡秉耀、邱添泽为“平肩王”,杨易为“伴驾王”,卢胜辉为“镇国大将军”,张师傅为“都御史保驾将军”,僧人涤明为“太子太保礼部侍郎”,赵双舟为“将军”。并备黄绫布纸,互改表字,交朱毛俚填写各人官职札付。胡秉耀又令人刊刻龙文凭票,于板内刻“后有牛斗”字样,声称天下将有刀兵,凡出钱领取凭票者,即算入伙,届时可免杀戮。若能转纠伙党,再封官职。朱毛俚又欲刻一九头狮子印,尚未刻成,朱忝泽即被盘获,将朱毛俚等供出,朱毛俚闻讯出逃,胡秉耀等被捕入狱。①

老表会

嘉庆十九年,广东何什养等结拜老表会。该会为首者系朱本万、何什养,首伙共八人,称“老表会”,刻有木戳两个,红绢一块。同年,广东又有张泳富纠同李畛瑞等二十二人结拜弟兄,亦取名“老表会”。会内写有小书一本,符绢五块,令会众各买顺刀防身。②

忠义会

嘉庆二十年十月,李泳怀等在广西结拜忠义会。李泳怀原籍湖南衡阳,向在广西恭城靠“小贸营生”,与广东佛山人梁老三相熟识。嘉庆二十年十月初,李泳怀同梁老三谈及“孤身无靠”。梁老三自称正与侄梁老九纠人结拜忠义会。若肯入会,可免被人欺侮。如出钱较多,派为大哥,得有红布一块,即可自行结会敛钱。会内之人如遇有疾病、事故,各帮一百零八文钱,由总大哥用尖角纸旗写一令字,传知同会,即照数出钱转给。李泳怀应允,梁老三又纠得刘老二等十一人,于十一月齐至该县栎木寨空庙内结拜。李泳怀出钱三千文,被派为大哥,梁老三自任总大哥。③ 嘉庆二十一年,梁老九等又在湖南永明县结拜忠义会。

①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阮元折,嘉庆十九年九月廿日。
② 《刑案汇览》卷十二,刑律,贼盗。
③ 《朱批奏折》湖南巡抚巴哈布折,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梁老九系梁老三之侄，曾在广西恭城与李泳怀等结拜忠义会。其后来至湖南永明县，又与李国林等共十二人，于同年十一月初六在该县清明田地方结拜。是月十六日，梁老九又与李国陇等共十一人，在该县刘贵兴家中结拜忠义会。①

公义会

嘉庆二十二年，湖南龙山县武生陈添然等结拜"公义会"。陈添然于嘉庆三年考中武生，移民四川秀山县滥泥地方训蒙度日。嘉庆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素识之保靖县人田庆人因妻病愈，酬神还愿。陈添然前往祝贺，在田家会遇张宗茂等多人。田庆人置酒留饮，席间陈添然倡议结拜弟兄，以便互相帮助，免人欺侮。田庆人等允从，议定入会者每人出钱一百五十文，以备购买香烛酒食。陈添然又纠得张义等共二十四人，于五月十三日在保靖县耦平地方结拜，取名公义会。立誓同心帮护，不许悔盟。②

父母会

道光十年二月，广西永淳县王奉祥等结拜父母会。是年二月十五日，王奉祥纠邀同县劳胜培等结拜弟兄，以便"遇事相帮"。首伙共十八人，每人出钱四百五十文，在村外空庙内焚表结拜，共推王奉祥为大哥。当时未立会名。同年四月十六日，王奉祥又与陈亚由等共二十八人再次结拜，取名父母会。③

钩刀会

道光十一年，浙江绍兴府嵊县地方有人结拜钩刀会。凡入其会者，给予凭帖一纸，钩刀一把，故名，以该县东山村富户金有鉴父子为首。金氏父子捐有职衔，交结官府，被推为会首，其成员大多为棍徒、讼师、公差，及各处游手好闲之人。入会者总数达一二千人。会内有老三十六太保、小三十六太保等绰号。每年于十月十六日，聚集村庄，赛神演戏，其众各带二尺长之钩刀，对村民"恣意派勒"。居民遇有红白事件，或逢年节，该会便向村民索取钱财。稍不如意，即打抢劫夺，甚至奸淫妇女，焚掠村庄。成为当地一恶势力。④

孤老会

道光十五年五月，湖北省江陵县郑老鼠等结拜孤老会。郑老鼠于嘉庆二十

---

① 《朱批奏折》湖南巡抚巴哈布折，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② 《朱批奏折》湖南巡抚巴哈布折，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廿二日。
③ 《朱批奏折》广西巡抚祁𡎴折，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④ 《朱批奏折》闽浙总督孙尔准折，道光十一年七月初八。

五年在公安县因行窃被捕，杖责后“交保管束”。道光十五年五月，郑老鼠逃至湖南澧州、安乡交界之焦圻地方躲避，打算纠伙结盟。适遇阿弥子即张正植，彼此闲谈。郑老鼠倡议纠人结会，阿弥子应允。议定“凡会内之人，如系孤身病故，由郑老鼠代为医治殓埋。如有父母妻子之人，亦一体照看。”并称只准行窃，免罹重罪。窃得财物，由郑老鼠派分。遇有会内人犯案，受到官府追捕，帮助照应，以便使人相信，情愿入伙。先后纠得张四九等，首伙共八十八人，于七月十三日在一座空庙拜会。因会内之人孤身者居多，故名。旋以会内人多，不便管束，遂分为两支。郑老鼠住戴家场南面，所掌管一支称“南字派”；阿弥子住北面，所掌管一支称“北字派”。由郑老鼠自居为首，阿弥子为第二。张四九等熟悉地方路径，年力精壮，便于偷窃，叙列在前。其余之人皆不论年龄大小，各按入会先后派定名次。用红纸书写首伙姓名，盟誓结拜。郑老鼠向众人宣布会中规条：只许黑夜偷窃，或白日遇便窃取鸡只、衣物，不许拦路抢劫。倘有事主指名报案，官府差拿，同伙之人，皆须允许在其家中躲避。南字派窃得财物，交郑老鼠变卖；北字派窃得财物，交阿弥子变卖。所得钱文，皆由郑老鼠作三股派分。由郑老鼠、阿弥子共得一股，行窃之人得一股，存一股留作帮助照料其他人之用。倘被官差拿获，不许逞凶拒捕，不得供扳同伙。如遇村民欺凌，同会之人互相通知，以便帮助。①

花子会即糍粑会

道光十五、六年，在江西广信府属之上饶、广丰等县；福建建宁府属之崇安、浦城、松溪等县；浙江处州府属之龙泉、庆元等县，有乞丐等结拜会党，名为“花子会”。会内有大会首、副会首、散头目等名目。大会首潜住浙江金华府之义乌、永康二县，行踪诡秘。该会每年五月十三日在僻静古庙聚会一次，蒸捣糯米为食，故又名“糍粑会”。凡欲纠众讹诈时，则以竹筷缠扎鸡毛，上系铜钱一枚，分头传示。会内之人一见此物，即须立即赶往参加。所系铜钱分红、黑、白三色，以红者为最紧急，百里之外闻报，必须于一日之内赶到。会内有吃水、放水之称，入会为吃水，背叛该会为官差充当眼线为放水，若被擒拿，立毙其命。由此会转入彼会，又有钻圈、跳圈之号。居民畏其强横，多不敢告发。② 道光十六年，江西南昌、丰城、临川、乐安、进贤等县发现有张西洲、周老满等二十六人，结

① 《朱批奏折》户部尚书王鼎折，道光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折，道光十六年九月廿日。

拜花子会。[1] 道光十五年四月，福建浦城县又有江西人老熊纠约黄细妹等二十九人结拜花子会。[2]

黑会与红会

道光十九年二月，丁魁等在湖南宁乡县结拜黑会与红会。丁魁原系该县武生，因误差操作被斥革。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丁魁与同县之廖七等谈及在外孤单，欲结拜弟兄，以便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侮。廖七等允从，遂分头纠人，先后邀到45人，每人出钱200文，由丁魁买香烛鸡酒饭菜，于是月二十五日在该县白竹坳地方结拜。结拜时，丁魁供“关帝神位”，设酒宰鸡，拈香点烛，率众跪拜。声称会内之人，如出外行窃，事在黑夜者称“黑会”，其余名为“红会”。他用钱一文，剪为两半，用红绿丝线缠绕，一边由丁魁收藏；一边交廖七收执，名为“信钱”。如遇有事故，丁魁将半边信钱交给廖七，合在一处，作为聚散通信之凭据。[3]

丫杈会

道光二十年，湖南东安等州县有赵瞎子等结拜“丫杈会”。赵瞎子与刘二伢子等皆系邵阳县人。道光二十年二月，赵瞎子与唐有导等相遇，谈及贫苦无依，欲纠人结拜弟兄，以图互相帮助，免人欺侮。众皆允从，分头纠得43人，约定是月二十一日在东安县花桥地方结拜。每人出钱100文，交赵瞎子买备烛鸡酒。届期仅有37人到会，众推赵瞎子为大哥，余俱依年龄序列，宰鸡滴血入酒共饮。规定每人皆将所执乞丐杖头上刻“丫杈”记号，以便于互相识别，故取名“丫杈会”。其后，湖南的零陵、邵阳、武冈等县之乞丐，多仿照赵瞎子之例，结拜丫杈会。[4]

从以上内容来看，嘉道年间的边钱会、担子会、孤老会、红会、黑会及丫杈会，皆系乞丐之帮会。他们或强乞或偷窃，形成一股势力，对当时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对一般群众生活造成危害。

---

①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陈銮折，道光十六年八月廿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巡抚魏元烺折，道光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③ 《朱批奏折》湖南巡抚裕泰折，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④ 《朱批奏折》湖南巡抚裕泰折，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四。

三、嘉庆年间天地会的反抗活动

（一）台湾小刀会起义

嘉庆二年十二月，台湾淡水杨肇等人结拜小刀会，并举行武装反抗斗争。杨肇（1750—1798）原籍福建漳浦，后迁居台湾淡水的鹿寮庄。他与同村之郑化、张耸、许围等人互相交好。嘉庆二年十二月间，杨肇同郑化等人闲谈，自称欲仿照天地会结盟拜会，同心举事，郑化等皆允从。是月初七，杨肇备办鸡酒，邀众同至吴兴家中结拜。众推杨肇为首，郑化等七人为头目，歃血饮酒，钻刀盟誓。其誓词曰："一人有事大家帮，泄露机关剑下亡。"相约以三指取物为暗号，同会之人相见，可不问自知。众人亦因天地会"名目张扬"，而"变名小刀会"。后来，人会者日增，聚有一百余人，杨肇即欲竖旗起义，他以闽粤籍村庄向来不和，"素分气类"，而粤庄多散处于水枧头，青礐村、半天寮、新庄仔等处，与竹堑、新庄等处清军驻防汛地相距甚远，声息难通。故拟先攻打粤庄，以激成闽粤械斗，借以掩盖结会之事，乘机起义。他令人制造"漳泉灭广"布旗，于是月二十五日聚集会众，各带半斩刀、竹篙串、木棍等，焚抢水枧头粤庄，杀死该庄村民魏华古等9人。清军营汛闻讯，前来搜捕。因官兵猝至，加之是日大雨不止，寒冷异常，杨肇所纠会众，大多未到，杨肇等只得逃散，后向官府投降。①

嘉庆三年七月，台湾嘉义徐章等结拜小刀会。徐章（1768—1798）原籍福建漳浦，寄居台湾嘉义。"向无恒业"，与同县胡杜猴、陈蔚等素相交好。嘉庆三年七月，徐章与胡杜猴等相遇，各道贫苦难度，商议抢劫富户。因恐兵役查拿，徐章倡议邀人结会，以便相帮拒捕。陈蔚、胡杜猴等允从，约定各置备小刀防身，并作为联络暗号。原拟结拜天地会，后因众从皆称"天地会名目张扬"，遂"变名小刀会"。议定后分头纠人，先后纠得18人，每人出钱300文，买备牲醴香烛，于七月初九在该县茅港尾荒埕会齐，将供物排列空地，一同结拜。众推徐章为首，拜盟立誓："伙众抢劫，倘兵役查拿，均各齐心协办，相帮拒捕。如若负盟，立死刀下。"誓毕，徐章、胡杜猴各架起小刀，由陈蔚率领众人从刀下钻过。相约日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折，嘉庆三年六月十八日。

后若在路上相遇，伸出两指，问："要到哪里去？"对方伸出一指，回答："本要到这里来。"彼此会意，即可知是同会弟兄。又约定再分头纠人，以便定期举事。旋被官府访拿，众皆畏惧逃散，徐章等均被捕获。① 嘉庆三年九月初，台湾凤山县汪降与李南、蔡光辉等人结会，欲攻打县城。旋因事泄，恐遭官府查拿，遂纠人于是月十三日夜，约定在凤山县半屏山会齐，进城攻杀。届期，汪降见纠人不多，未敢举兵。又见官兵上山查拿，遂畏惧逃散，有十余人被清军捕获。② 汪降等所结之会，据闽浙总督玉德奏，系属小刀会，他称："查台湾地方前汪降、徐章、杨安等屡次滋事，俱系小刀会匪。"③

嘉庆五年四月，台湾嘉义陈锡宗等结拜小刀会，并攻打盐水港。嘉庆五年三月初，陈锡宗与素识之王思谦、陈绵、吴泰等结拜小刀会，相约于五月初早稻收成时，得有稻谷，即可定期举事。众推陈锡宗为首，吴泰为军师，戴助、胡杜猴等20余人为头目。④ 议定届时大家齐心协力，共相帮助。四月初三日，会内侯红被捕，供出陈锡宗等欲谋起事等情。陈锡宗即于四月初五日传齐会众，提前举事。他嘱令众人先攻盐水港营汛与巡检衙门，抢夺器械银钱。当晚四更时，陈锡宗率领400余人，各持刀械，同至盐水港。首先攻入佳里兴的巡检衙门，杀毙巡检姜文柄，接着又前往攻打盐水港汛防。当时守汛之将弁皆奉命外出"缉盗"，仅有兵丁在内，无人指挥。又值黑夜，兵丁猝不及防，起义军一举攻入，于营汛内杀毙兵丁11人，伤10人，并将汛防焚毁。清台湾镇总兵爱新泰闻知后，急忙带领府城城守营参将舒万年、右营游击戚连新等，会同台湾府知府吴逢圣，率领弁兵500余人，于初六日连夜赶赴盐水港救应。初七日午刻，清军行抵木栅地方，探知该处北面沿途竹林密箐之内，俱有起义军潜伏。官兵前往攻击，起义军即从小路躲避。待清军撤回，起义军又从背后抄来。清军反身追赶，起义军又躲避如前，迫使清军进退两难，只得于该处扎营。初八日黎明，清军又分队前进，行至曾文地方，见该处林深箐密，道路丛杂，疑有埋伏。爱新泰下令以大炮轰击，起义军从两旁抄出，呐喊拒敌。爱新泰见正面起义军恃险防守，甚为严密，遂自率主力与起义军正面相持，而派参将舒万年攻打起义军之西面。战斗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折，嘉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折，嘉庆四年七月十三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折，嘉庆五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互有伤亡，连清总兵爱新泰所乘之马，后胯也被刀砍伤。台湾道遇昌恐爱新泰首尾受敌，便派镇标中营守备陈宗煌带领兵丁200人，前往接应。台防同知延青云、台湾府知府吴逢圣亦募“义民”千余，与熟悉该处地形之“义民”首陈安，联络各地“义民”，亦前往抵拒起义军。初九日黎明，起义军千余人四面向清营逼进，爱新泰督兵抵御。巳刻，起义军攻势益猛，彼此相持不下。陈锡宗亲自骑马执旗，自东北角率众向清营进逼。清军枪炮齐发，陈锡宗中炮牺牲。清军趁势反攻，起义军群龙无首，纷纷逃散。此役起义军伤亡达百余人。首领王思谦、军师吴泰被捕遇难。事败，起义者被捕者达400余人。①

嘉庆九年，台湾凤山县李顺领导小刀会起义。李顺籍隶凤山县，“向无恒业”，素与王语、胡志生、陈经、吴平等人交好。嘉庆九年八月初八日，李顺等在吴平家会面，共谈贫苦。李顺倡议纠人结拜小刀会，以便于抢夺富户。议定后李顺纠得陈乃等七人，王语纠得陈实等四人，胡志生纠得叶石原等四人，吴平纠得陈原一人，共21人，于八月十四日夜，齐至县属之崎仔头庄荒埔，排列牲醴、香烛，拜天立誓，同饮鸡血酒。众推李顺为首，李顺将众人姓名写立会单，约定于十月间晚稻登场后起事，待夺得粮食，再图大举，旋被官府访闻，李顺遂决定提前举事。他命令陈愿制造红心绿边方旗一面，通知会众于八月二十五日夜间，攻打水底寮汛清营。待夺得军械，即竖旗举事。届期，因所纠之人中，仅到23人，又因闻知清营早有准备，未敢动手。李顺只得将会单、布旗焚烧，分路逃散。后遇官兵围捕，李顺等持械相拒，杀伤兵丁二人，终因人少力弱，最后被捕。②

（二）广东博罗、归善、永安天地会起义

嘉庆七年，广东博罗、归善、永安一带爆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起义，其影响之大，仅次于台湾林爽文起义。这次起义是从博罗开始的。该县添弟会首领陈烂屐四（1776—1802）家道殷实，其父陈士庄系“捐纳按察司昭磨”。陈烂屐四从嘉庆六年起，纠人结拜添弟会。两年之内，所纠会众，已达两万余人。他见会众日增，便萌发了登极称帝的政治野心。他一面派人往各处秘密购买硝磺，配制火药，一面暗中令人打造军器，并制造大小布旗数十面，上写“顺天行道”四字。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折，嘉庆五年四月十八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折，嘉庆十年二月初十。

陈烂屐四供词

嘉庆七年八月初八，陈烂屐四在该县羊屎山罗溪营率领添弟会会众，公开“竖旗起事”，有众万余人，皆用红布包头。陈烂屐四让其父陈士庄身穿黄袍，坐于上首，自己站立旁边。众人向他们父子二人跪拜磕头，称其父为“老大王”，称陈烂屐四为“大王”。陈烂屐四封张锦秀等 25 人为元帅或先锋。自八月十五日起，先后攻打该县境内之土瓜圩、刘家围、乌泥塘、祥冈、龙华圩等处村庄。官府因事起仓促，一时未及调兵镇压。当时广东省惠州协兵丁均在附近七县守城，留于营地者仅及千人。两广总督觉罗吉庆闻讯，急调督抚两标及各协营兵丁共 5000 人，由副将李汉升、游击胡俊鸿等带领，前往羊屎山罗溪营，进行剿捕。各地营兵因路途远近不一，一时难以调齐，仅凑足 550 人。当时，署东莞县知县朱振翰，恐起义军由博罗进入东莞，便带领兵丁、乡勇三百名，在县内防守。东莞、博罗交界处之土瓜圩一带富户李枫、朱有韬等，也出资雇募乡勇千余，赶至博罗县内龙华圩救援。①

博罗添弟会起义的消息传至北京，嘉庆皇帝大为震惊，严厉申斥地方官员说：“陈烂屐四聚集至一万余人，制有号布器械，其蓄谋已久，该管府县及营弁，竟毫无觉察，所司何事？”命令两广总督吉庆对地方官员“严参示惩”。② 又令广东巡抚瑚图礼与广州将军书敬，于广东驻防满兵内，派拨部分兵丁，前往“协剿”。③ 各地清军奉命来到博罗后，分路向羊屎山罗溪营进兵。提督孙全谋率部由西路进攻，副将李汉升从东路进攻，八月十九日，齐抵柏公凹。该处两山夹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东巡抚瑚图礼折，嘉庆七年十一月初七。

② 《上谕档》嘉庆七年九月初五“上谕”。

③ 《上谕档》嘉庆七年九月十四日“上谕”。

峙，中有一河，地势险峻。起义军于山顶、山坡设立木栅，安设枪炮。孙全谋率兵由山下仰攻，起义军伤亡甚众，清军乘胜抢上山梁，砍开木栅，放火焚烧。起义军被迫后撤，清军追至平头山地方扎营。八月二十三日，李汉升一路清军由派尾地方进至羊屎山罗溪营，这里山高路窄，起义军共有2000余人，在此恃险防守。二十四日，清军进至羊屎山路口，起义军自山顶压下，掷石攻打，伤毙清军多人。[①] 二十六日，清军又攻至响水地方。该处起义军有数千之众，见官兵来攻，即高举各色大旗，奋力迎战。红旗上书写"顺天行道"字样。另外还有大红金龙旗一面，蓝、白大旗各一面。二十一日，清军由提督孙全谋率领，来至黄土迳地方，与起义军在山谷中相遇交战，双方互有伤亡。九月初，清军大举进攻羊屎山罗溪营。清军左翼镇总兵黄标由东路进攻，提督孙全谋由西面夹击，总督吉庆自率一军居中调度。九月初四，黄标一路清军攻至雷公岭、灯心塘等处。次日，孙全谋自黄土迳前来夹攻。起义军出栅迎战，后来木栅被清军用火弹焚毁，难以抵拒，元帅张锦秀、将军赖亚养、赖亚皆等，及军师徐瑞、黄锡朋，先锋刘观先等300余人，皆被清军俘获。陈烂屐四及其堂兄陈志渊把守山口，与敌相持。陈烂屐四见势难抵拒，即令陈志渊护送家眷往后山撤退，自己同胡二妹等退至范家田地方。初六，官兵将陈士庄等500余人擒获，陈烂屐四复率众奔赴罗浮山，归并余部，继续抵抗。此处有起义军数千人，附近之金沙洞地方亦有起义军数百。九月十四日，提督孙全谋率清军由响水地方前往罗浮山进攻，总督吉庆令参将郑文照前往配合。起义军见清军到来，即于山顶抛石击打，击伤郑文照及都司富增额等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寨栅被清军突破并焚毁，陈烂屐四又撤至冲虚观。此处尚有起义军千余人，并设有寨栅防守，最后亦为清军所攻占。十五日，起义军退至蓝山，再败而退至华首台。孙全谋率领清军，乘夜攻打，以炮火轰击。起义军见难以抵拒，纷纷逃散，陈烂屐四等滚崖而逃，元帅谢文光等300余人被清军俘获。九月十九日，陈烂屐四在博罗、增城交界之处被清军擒获。在受审时，他"挺身而出，毫无畏惧之状。"[②]后被处死，年仅26岁。

在博罗添弟会起义的同时，归善天地会在首领陈亚本、蔡步云等率领下，也积极准备起义。蔡步云原籍福建漳浦，寄居广东归善，陈亚本系归善本地人。嘉庆七年四月十一日，陈亚本至蔡步云家中闲坐，自称曾在闽省得知，如结拜天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七年九月十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东巡抚瑚图礼折，嘉庆七年十二月初六。

地会,出门不受人欺,并可伺机抢夺财物,提议纠人结会。二人议定分头纠人,先后纠得谢天生等16人,各出钱文,买备香烛色布,于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中结拜。所制布旗之上,书写"顺天行道"字样,每人分给一块,作为入会凭据及联络暗号。因虑人少,难以举事,又恐乡民不肯相随,陈亚本遂自称"大王",蔡步云自称"大元帅",许荣珠为"军师"。又设立东、西、南、北四路元帅及各路先锋。然后各回稔山、白茫花等处村庄,继续纠人入伙,又派人制造器械,准备起义。凡入会者,皆发给红布条为记号,共聚有数百人。① 拟于稔山、白茫花、平山三处,抢夺当地牛头会村庄。牛头会是当地富户、地主为了对付天地会而建立的组织,入会者按照家中拥有耕牛之头数,缴纳银钱,用来雇用乡勇,与天地会相仇杀。陈亚本等定于八月十五日竖旗起义,攻打村庄。尚未动手即遭官府查拿,陈亚本、蔡步云等乘机脱逃,旋亦被捕。

同年八月,在永安也爆发了一起天地会起义。永安天地会起义,是由当地牛头会对天地会的仇杀所激起的。嘉庆七年七月,该县温登元邀约曾清浩、官粤陇、赖东保、薛文胜、邹狐狸等人结拜天地会,相约遇事互相帮助。八月间,曾清浩、温登元等结会一事被该县青溪地方牛头会蓝监生所闻知。蓝监生见博罗添弟会已经举行起义,恐波及本县,遂率领牛头会之人,将天地会首领温登元拿获,送县审讯,温登元不久病故于监内。曾清浩等心怀怨恨,欲杀抢牛头会村庄以泄愤,各纠得三五百人。后来官粤陇等闻知博罗添弟会起义失败,遂向官府表示"畏惧悔改",愿充当乡勇。而当地牛头会之人,却以官粤陇等人原系天地会内之人,不肯相容,并赴县控告。官粤陇等以牛头会既将天地会内首领温登元送官监毙,又不许自己"改悔",遂率领天地会内人,进行报复,焚毁蓝举人、张监生等之房屋,并继而围攻县城。② 后来,这支队伍发展到二三千人,驻扎在距县城八十里之天字嶂。③ 同年九月,博罗添弟会起义军失败后,头目曾鬼六逃来天字嶂青溪约,劝官粤陇竖旗起义。曾清浩、官粤陇、赖东保等应允,皆自称"大王",薛文举、邹狐狸自称元帅,于是月二十六日祭旗起义。二十九日,曾清浩、官粤陇、赖东保等各率数百人,分别攻打青溪、黄塘、中埔围等处,两广总督吉庆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九及十月初三二折。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东提督孙全谋折,嘉庆八年正月初三。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内阁学士那彦成折,嘉庆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闻讯后，派令游击胡俊鸿率兵六百，都司德昌率兵三百，前往抵御。① 提督孙全谋带领官兵1300余人，于十月初二前往搜捕。十月初三，胡俊鸿所率清军抵达大钟岭地方，扎营未定，即有起义军数千从岭后拥出，奋力拼战。总督吉庆恐孙会谋兵力单薄，又奏请调江西省兵丁来粤助战，并请求增派副将、参将十员来粤。结果受到嘉庆皇帝的严厉申斥，只派广州将军书敬亲率满兵500，赴永安助战。十月初六，孙全谋率兵2600名抵达义容圩，此处距离起义军所在地天字嶂仅30里。接战后，起义军失利，连弃三寨。首领曾清浩见难以抵敌，遂率数千人赴清营投降。此数字系吉庆所虚报，实际上仅数百人。元帅薛文胜、薛成审等23人，会众450余人被俘。② 官粤陇、赖东保等亦于十月十七日在天字嶂率众投降。③

永安天地会起义失败后，当地牛头会纷纷对天地会之人进行报复，迫使天地会之人结寨自卫。官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派遣官兵到各处山寨进行"招抚"，并陆续拆毁山寨90余座。唯有铁笼嶂一处山寨的天地会拒绝受抚。该处天地会首领黄亚程、曾鬼六、温亚利、龚厘戬胆等，拥有丁壮七八百人。他们于寨上竖旗，上书"官逼民变"字样。并于山寨出口处，设置炮台三座，大炮十余门，鸟枪百余枝。黄亚程、温亚利俱称为"大王"，曾鬼六、僧人宽成为"军师"，林亚著、邱文龙等为元帅。僧人宽成向众人宣称，自己学有法术，"若官兵用炮打来，我用手一挥，叫他炮放不响，扯起衣襟，就可兜收炮内铅子"④众人信以为真，士气大振。这时，内阁学士那彦成命受主持镇压起义者之军务，他向清廷奏报铁笼嶂地势险峻，"四面陡峭，周围重山叠嶂，路径分岐，易守难攻"。⑤ 嘉庆见他有畏难之意，即命令他采取"相机剿抚"的策略。十二月初，那彦成派遣差役四人上山对起义军首领进行招抚，限令黄亚程等人于三日内投降，结果被起义军严词拒绝，四名前去招抚的差役亦被起义军处死。后来，当地乡绅杜林溥、张景仰等再度赴山寨"说令投降"，又被起义军杀死。⑥ 那彦成见招抚无望，只得决定强攻。他派令副将博多欢等率兵五百，将通往山寨的道路尽行挖断，并刨壕立堑，以防备起义军突围出逃。又调留防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东巡抚瑚图礼折，嘉庆七年十月十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七年十一月初二。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七年十一月初三。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僧人宽成供词》。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内阁学士那彦成折，嘉庆八年正月初七。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龚厘戬胆供词》。

永安、博罗及惠州府之兵丁2000名，知会两广总督瑚图礼调督标兵500名，肇庆协兵400名，广州协兵300名，罗定协兵200名，对铁笼嶂四面包围。① 嘉庆八年正月，由提督孙全谋统率各路官兵3400人，分作四路，向铁笼嶂山寨进发。起义军在此据险抵拒，枪炮并发，并掷石下打。最后，起义军力竭，被迫退上山寨。清军趁势仰攻，连夺三座炮台。次日黎明，清军四路并进。起义军首领见大势已去，遂率众由山崖绝壁"滚跌而下"，四散奔逃。元帅林亚著等六人及军师宽成等皆被俘。最后，主要首领黄亚程、龚厘戳胆等亦力尽被俘。惟曾鬼六、温亚利趁机逃脱，起义至此失败。

清朝当局为了镇压博罗、归善、永安天地会起义，先后调动了大批兵丁，耗用军费达36万多两。② 事定之后，对"失察"博罗等三县天地会结会事件及对起义镇压不力之官员，均予严惩。两广总督吉庆被革去大学士及总督头衔，广州将军书敬被"交部议处"，惠州府知府尹秉绶被"发往军台效力"，博罗县知县刘嘉颖被处以"枷号一年"的处分。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而地方当局对三县天地会结会之事仍心有余悸。为了防范天地会的反抗，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当地"编查保甲"，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约。甲设甲长，约有约正。每日皆要查明当地有无"结盟拜把"之事发生，将情况逐次上报。其次，于博罗、永安二县，"添设兵弁，以资防守"。对博罗、永安二县城墙拨款进行修缮加固，并将各处山寨全行拆毁。最后，严禁民间打造兵器，现存民间之武器，一律限令上缴。并且命令开设铁厂之人，"按月出具有无窝匪及私造违禁器械之切结"。③

（三）江西广昌、宁教、石城天地会起义

嘉庆八年十月，在江西广昌、宁都、石城一带也出现了天地会举行的武装反抗斗争。起义首领李凌魁是福建建宁人，郑得源是福建浦城人，高廷彩是江西南丰县人。李凌魁又名李昌标，向在南昌开设纸厂，曾捐纳州同。先曾拜吴子祥入斋教即大乘教，后来又听从吴韬纠约入天地会。嘉庆六年李凌魁因官府查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东巡抚瑚图礼折，嘉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庆复折，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一日。

拿天地会，而把天地会分为阳盘会与阴盘会。嘉庆八年二月，李凌魁传广昌人赖达忠，石城人廖干周、李奇天，宁都人李步高、胡仪式、王定珍等人入阳盘会。李凌魁自称“后唐天子转世”，编有四句歌诀：“天空降下一炷香，一半阴来一半阳，若得阴阳归一处，寅卯时中坐朝堂。”并宣称子丑年间（嘉庆十年）同教有难，可以起事。同年七月，李凌魁在福建被捕杀，廖干周等闻知后，欲商谋起义，为李凌魁报仇。因他素知江西贵溪人王添组自称“弥勒佛转世”，“闭目打坐，能知过去未来”。人有灾难，入教吃斋，即可得救。同年九月，廖干周来至贵溪王添组处，恳求他纠人帮助，许以将来事成之后，可封他为教主，居住贵溪县正一真人之上清宫。王添组应允，与廖干周密相计议，于大旗之上书写“唐天子”三字，以表示为李凌魁报仇之意。又将王添组的名号“瑞忠法中皇”五个小字，写于旗上，隐喻王添组在暗中相助。[1] 廖干周回至广昌后，与赖达忠等声言，嘉庆八年十月十二日亥时，系“癸亥癸亥癸亥”，乃是“万水朝宗之日”，决定竖起“唐太子”旗号，并制造如意图章，盖于号票之上，分给会众，转散他人。因恐会聚之时同教人多，互不相识，难以区别，又决定用朱色画×白布包头，作为记号。届期由廖干周、李步高、赖达忠等于广昌、宁都、石城及与福建连界之姚坊地方，分别竖旗起事。由李奇天等人在各自所在村庄，竖旗招人，前往接应。先攻广昌驿前堡，作为据点，众皆允从。廖干周之徒徐先保纠得340余人，李步高之徒温志贴等纠得200余人，赖达忠之徒赖汉魁等纠得300余人，李奇天之徒李鸾高等纠得200余人，胡仪书之徒陈顺明纠得200余人，王定珍之徒纠得280余人，一共1500余人。廖干周自称大总管，李步高、赖达忠、李奇天、胡仪书、王定珍等为大头目，定于十月十三日聚集起义。后因自十月初八以后，该地区连降大雨，李奇天、胡仪书、王定珍等人所纠之会众，均为大雨所阻，未能按时前来，仅有廖干周、李步高、赖达忠等率领400余人来至姚坊地方会聚。十月十二日亥时，廖干周率众在该地姚姓祠堂祭旗时，突然见旗杆被大风吹折，大家认为此乃“不祥之兆”，“胆寒心怯”，欲暂时散归，另外再择日举事。但是，廖干周等人密谋一事，已为当地乡绅所探闻，报告官府。该县文武差探核实之后，便密令乡绅们于十二日夜晚，聚集乡勇，严加防范。并于十三日清晨，由兵丁、乡勇突然来到廖干周等聚集之处，廖干周等踉跄组织抵抗，很快即告失败。赖达忠等57人当场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秦承恩折，嘉庆九年四月十六日。

牺牲，赖汉魁等100余人被捕，余众乘乱逃散，起义失败。[①]

四、清廷惩处会党律例的修订

嘉庆年间各地秘密会党大量出现，在各地广泛流传，并且不断举行武装反抗活动，情况纷纭复杂，清廷依据不同情况先后数次对有关律例进行了修订。

嘉庆五年（1800）四月，台湾嘉义县小刀会首领陈锡宗等攻打盐水港时，有谢崎等6人"悔罪投出"。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因"例无自首减等之文"而将谢琦等6人暂时监禁，请旨定夺。旋奉上谕："因谢崎等六犯，既系被胁入伙，并无随同焚汛戕官、抗拒官兵情事，一闻查拿，即悔罪自行投出，与甘心从逆者有间，自可贷其一死，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并谕令"嗣后遇有投出之犯，并即著照此办理"。[②] 刑部遵旨将其奏为定例："谋叛案内被胁入伙，并无随同焚汛戕官，抗拒官兵情事，一闻查拿，悔罪自行投出者，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③]

嘉庆六年，福建南靖县县役黄昆、王崇等，拜颜和尚为师入天地会，颜和尚迭犯抢劫，屡经县府查拿，黄昆、王崇等代为探听消息，通风报信，致使颜和尚数度逃逸。黄昆、王崇等被拿获后，地方官原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罪，将黄昆、王崇等"拟绞监候，秋后处决"。[④] 旋奉旨："此等在官人役，本有缉捕邪匪之责，乃胆敢听纠入会。及事发后，又复透露消息，致令首犯疏脱，实属藐法。黄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秦承恩折，嘉庆八年十二月初八。

②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律贼盗，谋叛；《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刑律，贼盗。

③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律贼盗，谋叛；《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刑律，贼盗。

④ 《天地会》（六）第163页。

昆、王崇均著即处绞。”①遂于嘉庆十年《清律》修订时增加有关惩处衙役入会案件之例文:“嗣后办理此等案件,除寻常为从之犯仍照例拟遣外,如有衙役听纠入会,并私相通信者,俱著照黄昆、王崇之例,立于缳首。”②

嘉庆八年九月,江西巡抚秦承恩奏拿获周痳子等32人,周痳子等在各乡求乞,乘便掏摸攫窃,索银取赎,聚散无常。每遇婚丧之家,强讨酒食钱米,稍不遂意,即行吵闹。嘉庆七年八月十五日,复与饶红鼻等共32人一同结拜,相约便于强赊强讨,遇有地方驱逐,差役查拿,亦可相帮照应。众人遂以周痳子为首,并未创立会名,亦无歃血焚表情事。秦承恩拟依“年少居首即属匪党渠魁,首犯绞决例”,将周痳子处以绞决。但比照“聚众结拜至四十人以上,年少居首绞决”例,则周痳子等结会尚不足四十人,故拟减等处以绞候。③ 经刑部复议,认定“年少居首绞决之例,系指40人以上而言,故歃血订盟二十人以下者,罪止绞候。若无歃血订盟,年少居首之例,不论人数多寡,盖拟绞决,不唯与例不符,且较歃血订盟20人以下罪止绞候者转重,各省办理此等案件,因无治罪明文,俱逐案比照量减问拟。请嗣后异姓结拜弟兄年少居首,聚众未及40人者,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奏准,嘉庆八年将该条例修订为:“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为首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聚众至四十人以上者,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未及四十人者,为

① (嘉庆八年五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玉德等奏拿获听纠入会审明办理一折。此案结会为匪,系在逃之颜和尚起意为首。南靖县役黄昆、王崇与余朗等俱听从入伙,同拜颜和尚为师。嗣颜和尚迭犯抢劫,屡经县府查拿。黄昆、王崇俱代为探信,以致颜和尚逃脱未能就获。现经该督等将黄昆、王崇二犯依左道惑众为首例,拟绞监候。此等在官人役,本有缉捕邪匪之责,乃胆敢听纠入会。及事发后,又复透露消息,致令首犯疏脱,实属藐法。黄昆、王崇均著即处绞。该督等仍明白晓谕:嗣后办理此等案件,除寻常为从之犯仍照例拟遣外。如有衙役听纠入会并私相通信者,俱照黄昆、王崇之例,立予缳首,庶足儆奸蠹而靖地方。余者著该部覆拟具奏。《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律贼盗,谋反大逆,谋叛。

③ 张建基等撰《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

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①

嘉庆十年吉林将军秀林以该省安插"会匪"过多，恐滋事端，奏请刑部酌量调剂。旋奉上谕：近年来闽广等省案发吉林安插者，有300余名，闻黑龙江较此更多。此等人犯，均系犷悍无赖之徒，到配后无人管束，又无口食，三五成群，易于滋事。安插各犯，自因其原犯罪案，比之各犯较轻，是以量为末减。但为奴之犯各有本主约束，给予口食，转可相安。至安插各处之犯若因无人管束，概令为奴，则竟与缘坐家属等项免减等重犯一律办理，未免又无区别。若任其散处，则既无随时禁辖之人，又复穷苦乏食，必致聚而为匪，滋生事端。且每年发遣人犯，愈积愈多，亦属不成事体。著刑部详查旧时例案，悉心筹酌，将此项人犯如何处置，如何管束，俾糊口有资，共知畏法，可期行之永久，妥议章程具奏。② 经刑部议定：此项安插人犯，均系闽广添弟会匪内听从被胁，并未转纠伙党，于首犯死罪上减等拟流，照叛案干连流徙乌喇拉地方例，发遣吉林之犯，不便与寻常军流人犯散置内地，而究非大逆缘坐免死减等可比，亦不便概令为奴。向来安置外遣人犯，除吉林、黑龙江外，唯新疆各处幅员最为广阔，当差种地，在在需人。莫若将此项人犯全行发往新疆，酌拨种地当差。③ 同年，闽浙总督玉德在处理僧人弗性结拜天地会一案时，即"奉颁新例：会匪一项，全行发往新疆交伊犁将军等，均匀酌拨当差种地"。④ 嘉庆二十四年刑部奏准："新疆遣犯照旧发往，仍复原例。"⑤（详后）

嘉庆十四年，刑部鉴于台湾"复兴天地会"活动已蔓延至福建、广东等省，故于嘉庆十五年修改律例时，以"会匪滋事，闽粤等省皆然，未便仅指台湾"，而将该条例修订为："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如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

---

①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九，刑部，刑律贼盗；吴坤修，裕禄编：《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贼盗，上，第17页。

②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一十七，刑部，名例律。

③ 吴坤修，裕禄编：《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贼盗，上，谋叛；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七，刑部，名例律，迁徙地方四。

④ 载《天地会》（六）第148—149页。

⑤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部，"刑律贼盗"，谋叛。

者，俱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理。”[①]此条于嘉庆十六年奏准改定。[②]

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蒋攸銛等奏严办结拜弟兄酌定章程一折，略谓：“粤东民情犷悍，盗贼较他省为多。缘粤民嗜利轻生，无业之徒往往各纠伙党，私立会名，结拜弟兄，希图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恐吓殷户、愚民出钱入会。若不听从即纠众辖借图利，赖在愚懦畏其滋扰，一时被胁免从，又惧事后报复，当时不敢首告，以致地方官无凭指拿。第此等匪徒，其意不过纠众依强，图诈抢窃，并无潜谋不法及公然抢劫拒捕重情。核与例载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迥异。而比之仅止结会树党，阴作记认，并未结拜弟兄者情节较重。若因其并无告案不加访拿，诚恐愚顽罔知法律，相率效尤，日聚日多，势必流而为盗。是欲清盗源，必先除会党，庶良莠分而闾阎永靖。现在顺德县属三合会一案，访查迅速，获犯多名，匪徒深知儆惕。除应行治罪之严贵邱等各犯，现在审拟另折具奏外，其间被胁勉从，有已经随同结拜者，有仅出钱尚未结拜者，均各纷纷赴县报名自首。并经绅衿乡耆赴县保其平日确系良民。此等自首之人，其结拜出钱，均由被匪逼胁，现在未奉指名拿获，即自赴官首明，共幸免累，实与罪犯闻拿投首者不同。如复问拟罪名，若辈必致观望顾虑，不敢自投，是不予以自新之路，适足坚其从匪之心。然不严立再犯之条，又恐滋轻犯之弊。”[③]七月，刑部议复该《章程》称：查粤民嗜利轻生，无业之徒往往各纠伙党，私立会名，结拜弟兄，恐吓愚民出钱入会。愚懦畏其滋扰，一时被胁免从，又惧事后报复，不敢首告，是该犯等系迫于凶悍，并非甘心入伙，若与实在为从各犯一律问拟军流，似觉无所区别。至闻拿投首及事未发而自首各犯，既因其稍知畏法，准予分别减免。如怙终再犯，情法无复可原，议请嗣后异姓结拜弟兄案内审明实系良民，被胁勉从结拜者，于为从军流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如仅止畏罪出钱，并未随同结拜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如闻拿投首，及事未发而自首，各照律分别减免。若减免之后复犯结拜，不许再首，均于应拟本罪上酌予加等，

① 此条系嘉庆十七年增订，见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部，“刑律盗贼”，谋叛；张建基等撰《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

② 此条于光绪三十一年删除。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部，“刑律盗贼”，谋叛。

③ 《军机处录奏折》两广总督蒋攸銛折，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载《天地会》（六）第501—503页。

应绞决者改拟斩决，应绞候者，改为绞决，应发黑龙江者，加枷号三个月，再发黑龙江为奴。应发极边烟瘴充军者，改发黑龙江为奴。应满流者，改为附近充军。应满徒者，改为杖一百，流二千里。应满杖者，改拟杖六十徒一年，以示惩儆。至自首免罪各犯，由县造具姓名住址清册，责成保甲族长保领，严行稽查约束，仍将保人姓名登记册内。如有再犯，除按册勒拘正犯加等治罪外，并将管束不严之保甲族长杖一百等奏准在案。查结拜弟兄之犯各省皆有，非独粤东为然。自应于原例内添纂明晰，俾各省一体遵照。再，结拜为从之犯，例有问拟徒罪枷责者。若审明实系被胁勉从，即行于为从徒罪枷杖上减一等，以示平允。原奏内统称减为杖一百徒三年，系专指为从，罪应军流而言者，其徒罪杖枷之犯，未经议及，系属疏漏。应请于例内分晰声声，以昭贮备。至会匪一项现行例内，俱改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其发遣黑龙江之处，亦应修改。又为从之犯例无发遣黑龙江之文，原奏内再犯应发黑龙江者，枷号三个月，系属赘文，应行删节。① 修改后之律文为："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为首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聚众至四十人以上者，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未及四十人者，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拟以斩绞。如为从各犯内，审明实系良民被胁勉从结拜，并无抗官拒捕等事者，应于为从各本罪再减一等；仅止畏累出钱，未经随同结拜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其闻拿投首及事未发而自首者，各照律分别减免。倘减免之后复犯结拜，不许再首，均于应拟本罪上酌予加等。应绞决者，改拟斩决。应绞候者，改为绞决。应发极边烟瘴充军者，改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应满流者，改为附近充军。应满徒以下，亦各递加一等治罪。其自首免罪各犯，由县造具姓名、住址清册，责成保甲、族长严行稽查约束，仍将保人姓名登记册内，如有再犯，即将保甲、族长拟杖一百。至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按照凶恶棍徒例，发

---

① 《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刑律二，贼盗上，谋叛。

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胥役随同结会树党，凌弱暴寡者，照为首例，与起意纠结之犯一体拟军，乡保地方明知不首，或借端诬告者，照例分别治罪。该管文武各官，失于觉察，及捕获之后，有心开脱，均照例参处。若止系乡民筹社赛会，偶然治比，事竣即散者，不在此例。"①

嘉庆二十二年，湖南巡抚巴哈布就兵役结拜弟兄应否照为首例治罪一事咨请刑部，刑部议复称："查例载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按照凶恶棍徒例拟军，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胥役随同结会树党凌弱暴寡者，照为首例问拟等语。此系乾隆二十九年奏准定例，原奏系专为闽省兵役党匪病民，故加重惩办。如他省有似此助凶济恶之兵役，向亦照此例办理。至异姓人结拜弟兄之例，以有无歃血订盟，是否依齿序列并聚众之多寡，分别首从治罪，系乾隆四十二年纂定。是结会树党与结拜弟兄，旧例原系二条，迨至嘉庆十五年本部修例时，因两条本属一事，将结会树党之例附在结拜弟兄各例之后，并为一条。其兵丁胥役入伙，照为首例问拟之语，原系专指结会树党而言。如结拜弟兄一项人犯内亦有兵丁胥役随同入伙，自应照例与平人一体分别首从科断。即谓兵丁系知法犯法，情节较重，应于本罪上酌加一等。倘本罪已无可加，或酌加枷号数月，亦足以示惩创而昭区别。"②另外，如"结会抢劫案内被胁入会，旋即走回，将分结挂布、忏语烧毁之犯，并受雇煮饭之人，均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满徒"。当时鉴于有不少僧人参加结拜弟兄活动，亦对惩处僧人结拜弟兄之事列有专条："僧人冀图讹诈，纠众二十余人结拜弟兄，情节较重，应改发新疆种地，仍照例刺字。"③

治理会党案件的关键之一是，地方官员是否对结会活动认真查拿和惩处，为了督促官员查处结会案件，早在雍正年间即曾对官员失察结会案件的惩处加以规定："凡不逞之徒歃血订盟，转相结连土豪、市棍、衙役、兵丁，彼倡此应，为

① 此条为嘉庆十七年增订，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部五十七，刑律贼盗，谋叛。

② 《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上，谋叛，嘉庆二十二年湖南司说帖；《刑案汇览》卷十二，刑律贼盗，嘉庆二十二年说帖。

③ 张建基等撰《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

害良民。据邻佑乡保首告,地方官如不准理,又不缉拿,唯图掩饰,或至蜂起为盗,抢掠横行,将不行准理又不缉拿之地方官,革职从重治罪。其平日失察首告之后,不自隐讳,即能擒获之地方官,免其议处。"但该项规定较为笼统,官员因担心失察结会事件而受到处分,往往对此类案件隐匿不报。而认真办理结会案件的官员,却往往因为失察在先而受到处分。为此,乾隆三十六年对于如何认定官员"失察"做出明确规定。事缘福建安溪县民王天送等在华封县纠众结盟,虽在一月之内破获,若按原例,地方官员当予以议处。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上谕略谓:此案署华封县承魏嗣业一经闻报,即集兵役乡众擒拿首伙各犯,而署安溪县事、县丞甘运瀶复拿获伙犯多人。该县等以佐二微员,奋勉出力,颇属能事,魏嗣业、甘运瀶俱著该督等出具考语,送部引见。至所请将失察地方文武大小官员交部议处之处,竟可不必。王添送等同谋纠党,未及一月即经败露全获,尽法究治,办理颇为妥速,不得谓之失察,均无庸交部(议处)。匪徒滋事不法,原当责成地方官,如平时漫无稽查,迨发觉后,又复迁延怠玩,不即勇往惩治,酿成事端,其咎自所应得。若当端倪初露,即能上紧查拿,迅速获犯结案,尚属有功无过。倘仍加以议处,不足以昭勤惩,且恐庸劣员弁,遇有地方奸匪重案,惧于吏议,致启弥缝讳匿之渐,于除奸转为无益。嗣后凡匪犯纠众等案,如事在三月以内即能查拿擒捕者,无庸予以失察处分。著为令。[①] 从而避免了官员因规避处分而隐匿结会案件的弊病。

嘉庆年间官员隐匿结会案件之事件频仍,于是对被认定为确实失察会党事件之官员,严加惩处。嘉庆八年七月十九日奉旨:"失察会匪纠众焚劫,与寻常失察案件不同,嗣后文武官员有失察邪教、会匪滋事重案,其应议以降调者,均按所降级实降,无庸查级议抵,著为令。"[②]

嘉庆二十四年,山西道监察御史蒋云宽针对处理结会案件中出现的问题,奏陈四项处理办法:

一、宜严兵役包庇

鉴于结会者"横行乡里,多藉兵役为羽翼",而对官员失察兵役入会的处分綦重,故而每滋瞻顾,因此奏请"嗣后拿获会匪,审系兵役在内,由后任及别县拿获者,仍将失察之员照例议处外,其本任自行拿获者,准其功过相抵,酌免处分,

① 张建基等撰:《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

② 张建基等撰:《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

庶不致心存隐饰，而包庇之兵役自无所容矣”。

二、押解获犯宜酌省烦费

各州县查拿会党案犯，购线踩缉，赏需不一。及获犯申报上司催提，每一犯用批差两人，自县至省，远者数百里、千余里不等，长途往返，候审需时，一切食用盘缠，皆由官发给，州县虑滋赔累，因而消弭了事。差役原有定额，会党之案动辄数十人，护送不敷，必启私用白役之渐。应于审明申解时，将为首之犯仍用长解，以昭郑重。至其余从犯，均照军流人犯之例，由递转解至省，庶州县之赔累既轻，查办自益为力。至委员一项，事前不资其协缉，在途不责其护送，徒滋需索，委提何益？尤应裁汰，以免牵掣。

三、州县查办会匪，宜量宽处分，以免观望。

查会匪蔓延纠党，不止一起，拜会不止一年，乃一案甫破，动致牵引处分，是不事缉捕者，尚可冀幸旦夕，而急于缉捕者，获咎反速也。即如（嘉庆）二十二年江华县知县刘遐龄获犯七十余人，解经前抚臣巴哈布审结，因案内有县役在内，并首犯未能全获，奏请革职，以致承缉之员相率观望。（嘉庆）二十年河南、安徽两省，查拿匪徒王妮子、马三振等，均经奉旨宽免历任文武失察处分，其分办之员并加蒙恩优叙。今会匪滋害情事相同，应请照办，亦酌量暂予宽免，俾得专心缉捕，而瞻前顾后之态可免矣。

四、结会案内胁从并牵连之人宜分别处理

查会匪横行乡曲，懦民并贸易之人多有被胁勉从者，亦有殷实之家畏其寻害，虽未入会而与之认识往来者，破案之后，往往正犯未获，而此等人已备尝罗织之苦，于是里长牌甲惧其未能戢暴，先已累良，遂亦相率容隐，不敢报官。应请旨敕令地方官先行出示，准令被胁免从之人到官出首，开以自新之路。其未经入会仅与认识之人，一经讯明，迅予省释，俾乡愚免遭胥吏讹索，则戢暴之中即寓安良之实政，而会匪易于净尽。①

对于此奏，嘉庆皇帝于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初九上谕中批曰：“该御史所陈缉捕事宜四条，亦俱中肯要。会匪横行乡里，多恃兵役为之包庇，盖兵役既已入会，则必代为传递信息，一闻有访拿之信，或纵之逃逸，或导之抗拒，是官弁所依以缉捕者，即会匪之耳目爪牙，尤当首先翦除。无如该管官惧于处分，率先隐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山西道监察御史蒋云宽折，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初九。载《天地会》（七）第474—475页。

讳。嗣后查拿会匪，如有兵役在内，经别县拿获者，定将该管官议处。若本管官自行访获，不存瞻徇，将会匪及入会之兵役一并查拿究办，其失察处分，即著奏明宽免。至获犯申解费烦一节，尤系近日实在情形。会匪每破一案，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一经委提差解，往返途程，食用盘费，赔累甚巨。州县官费无所出，遂一意化大为小，消弭不办，甚或转将告发之人坐诬。会匪因此益无忌惮，欲清弊源，自当酌予变通。其为首之犯，仍由该州县批差管解赴省，听候审办。余犯盖令递解或由本州县发落，并停止委提，以节冗费。至会匪在境日久，官弁畏避处分，不肯举发，实系外省恶习。但该官弁等果能实力查拿，为地方除害，虽经失察于前，其功过自足相抵。嗣后能破获巨案，准其宽免从前失察处分。或本案已缉获多名，偶有一二未获之犯，亦量于宽减，俾得专心缉捕，无所观望。"[①]上述内容日后即作为处理结会案件之法律依据。

道光二年三月，广西巡抚赵慎畛奏，以永州民人魏逢仁纠同兵役陆彩等歃血结拜弟兄，应否将陆彩等依为首问拟？抑或照为从减等，酌加枷号一事谘刑部请示。经刑部核议，奏称："查例内兵丁胥役入会照为首问拟，系指结会树党，鱼肉乡民，照凶恶棍徒拟军一节而言。至结拜弟兄首犯分别问拟绞决监候，从犯分别问拟军流，例内并无兵丁胥役入会各以为首论之文，自应仍照知法犯法例，加一等治罪，以符例义等因，谘复该抚。并恐各直省亦有误会，以致办理参差，一并通行在案。臣等伏查：原则例内务衙门兵丁胥役入伙，照为首例问拟，虽承结会树党本节而言，第系附于异姓人结拜弟兄之后，罪名纷繁，引断易滋牵混，应请于例内修改明晰，庶免舛错。再查：凶恶棍徒现行本例系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例内照凶恶棍徒旧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之处，亦应修改，以昭划一。"遂将该条例修改为："至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为从减一等。""各衙门兵丁胥役随同结会树党，凌弱暴寡者，照为首例与起意纠结之犯，一体拟军。"[②]刑部为此将有关兵丁胥役结拜弟兄之律例加以明确，奏称："查结拜弟

---

① 载《天地会》(七)第477—478页；张建基等撰《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

② (清)潘德畬刻：《大清律例按语》卷九十七，刑律贼盗，上，谋叛，道光四年，海山仙人馆藏版；坤修，裕禄编：《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贼盗，上，谋叛。后者在文字上与前者略有差异。

兄例内为首之犯，自枷杖至于绞罪而止，其纠结天地会条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应斩决；即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素非良善者，亦应拟绞决，与结拜弟兄条内罪名轻重悬殊。纠结天地会案内兵丁胥役入会，既有加等治罪成案，断无结拜弟兄案内兵丁胥役入伙竟照为首拟绞之理。本部详查旧例：兵丁胥役入会照为首问拟之例，系乾隆二十九年议复原任福建巡抚定长条奏，彼时原为结会树党，鱼肉乡民，应照凶恶棍徒拟军之案特立专条。至结拜弟兄分别首从之例，自雍正年间至嘉庆九年，本部节次修改，将首犯分别问拟绞决、绞候，从犯分别问拟军流，而于兵丁胥役入伙亦未议及。原以兵丁胥役犯事有知法犯法之本例可循。嘉庆十四年本部修改条例，将结拜弟兄例内绞决、绞候各项罪名与结会树党之军罪并为一例，仍于结会树党例文上冠以若字，而以兵丁胥役入会照为首问拟之语，附于结会树党军罪之后，并无拟绞、拟军各以为首论之文，是生死罪名虽并入一条，而冠以若字，则明之自为一节。推原例，意原为兵丁胥役随同结会，鱼肉乡民，是以诘奸禁暴之人，转为凌弱暴寡之事，故加重照为首拟发烟瘴充军。其结拜弟兄之案，审有兵丁胥役入伙，自应仍照知法犯法例加一等治罪。例文明析，一为寻绎，自可勿庸牵混。今该抚将例内若结会树党一节删去，而以兵丁胥役随同结拜亦应照为首例拟绞，是结拜弟兄较轻之犯，重于结拜天地会情节较重之犯，实属误会，应令该抚将魏逢仁案内随同结拜之州役营兵，均于为从流罪上照知法犯法例加一等治罪，以符原例案而昭平允。①

道光五年，刑部因原例内各衙门兵丁胥役入伙照为首例问拟，恐与例内歃血订盟等项首犯罪应拟绞者相混，遂于胥役下增“随同结会树党，凌弱暴寡者”十一字。“照为首例问拟”一语，改为“与起意纠结之犯一体拟军”。并将凶恶棍徒，改照现行例，拟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②

道光六年广西巡抚苏成额题奏该省李耀端等叠次结会一案，略谓：查嘉庆二十年六月，广东省题石硬轰纠同黄亚三等三十九人结拜弟兄，临期被胁之覃亚思等十四人畏罪未往，石硬轰等二十五人一同结拜，不论年齿，推石硬轰为大哥，将石硬轰依结拜弟兄并无歃血盟誓焚表，年少居长聚众未及四十人者，为首

① 张建基等：《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吴坤修，裕禄编：《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贼盗，上，谋叛。

②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部五十七，刑律，贼盗，谋叛。

拟绞监候，题结在案。核与李耀端纠邀四十人以上，临时在场结拜仅止二十八人者，情事相类。彼案既拟绞候，则李耀端未便拟以立绞，似应驳令另拟。稿尾写明：查例载异姓结拜弟兄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聚众至四十人以上者，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未及四十人者，为首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详参例内结拜弟兄并非依齿序列之文，自应以临时结拜人数为断。若纠邀人数虽多，而结拜时或畏惧未拜，或先到而畏事先回，则其人并不在序列结拜之内，未便一并计算，将为首之犯概拟绞决。此案李耀端先经两次结拜弟兄，系依齿序列，因结拜易于骗钱，因人少骗钱无多，起意纠邀多人，自为大哥，可以多骗钱文，一人独得，商允柯老六等，纠邀黄以观等共六十九人，将钱均交该犯买备香烛酒肉，临期甘畅和等四十一人出钱未拜，畏事先回，其余不序年齿，推李耀端为大哥，一同结拜。该抚将李耀端依聚众四十人以上例，拟绞立决，何广盛等拟军等因具题。臣查李耀端三次结拜，聚众至六十九人，惟甘畅和等四十一人临时并未结拜，究与在场结拜者有间，是该犯结拜弟兄实未及四十人，未便将该犯照四十人以上之例问拟绞决。为首之犯既不应拟以绞决，则为从之何广盛等亦未便发烟瘴充军。①

同年广西司说帖内称："异姓结拜弟兄纠邀人数虽多，其结拜时或畏惧未到，或先到而畏事先回，其人并不在序列结拜之内，未便一并计算，应以临时结拜人数为断。"②其后，结会案内凡结拜时畏惧未到，或先到而畏事先回，结拜人数即以临时结拜人数为断。

同年十一月，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复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调剂新疆遣犯折内，请将异姓结拜为从，随同结拜事发闻拿投首及事未发而自首，减免后复犯结拜本罪上加等，应发极边烟瘴充军者，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一条，仍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到配加枷号三个月等因，奏准通行在案，例内发新疆之处，修改为："应发极边烟瘴充军者，仍改发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到配加枷号三个月。"③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升任贵州巡抚贺长龄奏称：贵州军犯拥挤，请酌减

---

① 《刑案汇览》卷十二，刑律贼盗，道光六年说帖。

② 张建基等：《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二十三，"刑律贼盗"，谋叛。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七，刑部五十七，刑律，贼盗，谋叛。

③ 吴坤修，裕禄编：《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贼盗，上，谋叛；潘德畲刻，《大清律例按语》卷九十七，刑律贼盗，上，谋叛，道光九年。

调剂。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复:新疆遣犯改发内地,恐人数众多,不特约束困难,且与民风大有关碍,非若新疆地方辽阔,外遣人犯易于安插,所有旧时改发内地各条,仍著发往新疆,交该将军妥为安插,并严饬所属,认真查核,严加管束,毋令滋生事端,俾期积久无弊。故决定:"新疆遣犯,即照旧发往。免后复犯结拜弟兄,既发新疆之原例,现在犹存,足资引用,此条系属赘文,应行删除。"①

清律虽经多次修订,但因雍正帝曾谕令臣工:"凡各衙门条例,有前严而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若前宽而后改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一时,俟弊端革命,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向后遇事斟酌,如有应从旧例者,仍照旧例行。"②故律例修订以前原有之律例,除明确删除者外,依然有效,使新例与旧例往往互相补充。如嘉庆初年官员在处理郑光彩结会案时,除援引乾隆五十七年有关查处"复兴天地会"的律例外,复援引雍正三年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有关规定,将郑光彩等拟斩立决。③ 另外,清廷对于秘密社会(无论是会党还是教门)中的武装反抗活动,则援引"谋反大逆"之条款加以惩处。官员们由于分不清有些秘密结社组织究竟是会党还是教门,往往又援引《清律》中惩处"左道异端"或传习"邪教"的条款加以惩处。

① 吴坤修,裕禄编:《大清律例根源》卷五十四,贼盗,上,谋叛;

② 《清史稿》卷一四九,刑法一。

③ 载《天地会》(六)第73—76页,台湾郑光彩结会案。